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总策划 张余胜



上册

——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苏联〕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 著

〔苏联〕В.А.罗莫金 Б.Я.斯塔维斯基 整理

〔苏联〕Б.Г.加富罗夫 编

张丽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亚历史

——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

上册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苏联〕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 著

〔苏联〕B. A. 罗莫金 Б. Я. 斯塔维斯基 整理

〔苏联〕Б. Г. 加富罗夫 编

张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 / (苏)巴托尔德著;张丽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1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4054-3

Ⅰ.①中… Ⅱ.①巴… ②张… Ⅲ.①中亚—历史—研究 Ⅳ.①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5714号

总 策 划 张余胜

书　　名 中亚历史
——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上册)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作　　者 〔苏联〕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 著
〔苏联〕B. A. 罗莫金 Б. Я. 斯塔维斯基 整理
〔苏联〕Б. Г. 加富罗夫 编
张 丽 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总 印 张 67.25
总 字 数 899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054-3
定　　价 200.00元(上、下册)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淘宝网邮购地址:http://lzup.taobao.com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出版委员会

出版说明

随着20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20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余太山

2010年6月30日

译者前言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Василий Влидимирович Бартольд，1869年11月—1930年8月），是苏联著名的东方学家。1891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892年留母校任教。1900年巴托尔德因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引用了大量当时未曾刊布的中亚原始资料而被授予东方学博士学位。1910年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13年成为科学院院士。

巴托尔德一生论著颇丰，共有400多种。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中亚和东方史奠定了基础。鉴于巴托尔德在中亚和东方史研究领域中的突出贡献，苏联科学院于1961年6月决定将其生前论著收编成集予以出版，以供学者们参考和利用。

《巴托尔德文集》共分9卷，由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从1963年出版第1卷，至1977年第9卷出版，历时15载。本人所翻译的是1963年出版的《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中的第1部分《中亚历史》。其主要内容包括:《七河流域历史概论》、《突厥斯坦史——在突厥斯坦大学的讲课提纲》、《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塔吉克人历史概论》、《吉尔吉斯人历史概论》、《土库曼民族历史概论》等。文集的最后一部分即书评部分，由于译者没有读过这些原著，恐理解不透，所以没有翻译。

对于文集中的注释，基本上按照原文的注释方式进行处理:

注释中没有标明注释者的均为巴托尔德的注释。

原作者和编者在注释中引用参考文献时，使用的都是文献的缩写形式，译者根据书后所附参考文献索引的全称将全部俄文参考文献都由缩写形式译为全称形式，而其他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以及突厥语在内的参考文献，译者或者通过请教他人和查阅其他典籍的方式尽力将其以全称形式意译为汉语，或者按原作者和编者采用的缩写形式译为汉语，少数无法翻译的几处只能照录原文。

在录入书后所附参考文献、人名、地名、民族名称以及专有名词等索引时，由于译者不懂得除英文以外的西语，因此受输入法的限制，只能将原作者和编者所使用的其他非英文字母概用英文字母转写。

文中的印刷错误直接根据勘误表校对过来，所以不再附勘误表。

在文集翻译的过程中，大连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的王丽丹、内蒙古大学外语学院的李翠云、辽宁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许凤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伟丽等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巴托尔德懂得除汉语以外的多种东方和中亚死文字、活文字，他在文

中不仅引用了大量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的文献，而且引用了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察合台突厥文的史料与文献。其中全部英文以及部分法文、德文、拉丁文的文献目录由内蒙古大学外语学院的李翠云教授帮助翻译过来，无法翻译的几处原样保留下来，而巴托尔德在东方和中亚语言文字方面的造诣显然是译者以及译者所请教的多位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因此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只能以照片的方式保存下来。最后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以避免，期待着学者专家批评指正！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张丽

2012年12月31日

目录

上 册

绪论 / 1

七河流域历史概论

绪论 / 19
1 乌孙人 / 21
2 突厥人 / 27
3 葛逻禄人 / 31
4 哈拉汗王朝 / 38
5 哈剌契丹 / 46
6 察合台汗国解体之前的蒙古人 / 56
7 蒙兀儿斯坦 / 81
8 卡尔梅克人 / 101
大事年表 / 108

突厥斯坦史
——在突厥斯坦大学的讲课提纲

1 古代的突厥斯坦 / 117

2　阿拉伯征服和萨曼王朝时代的
突厥斯坦 / 127
3　哈拉汗王朝　塞尔柱人
哈刺契丹和花刺子模沙赫 / 137
4　蒙古征服 / 147
5　成吉思汗帝国 / 156
6　帖木儿和帖木儿帝国 / 168
7　乌兹别克汗国 / 175

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

绪论 / 183
1　前伊斯兰时期 / 185
2　伊斯兰时期的突厥斯坦 / 209
3　突厥斯坦和突厥人 / 262
4　蒙古人的统治 / 282
5　乌兹别克汗国 / 294
6　俄罗斯统治时期的定居生活
和游牧生活 / 322
7　学校 / 326
8　俄罗斯的移民运动 / 351
9　城市生活 / 369

10　土著人和俄罗斯政权 / 385
11　管理方式的欧洲化和土著人 / 415
12　俄罗斯政权和诸汗国
布哈拉汗国 / 433
13　从有史以来到俄罗斯人到来时
中亚的种棉业 / 479

塔吉克人历史概论

1　花剌子模人和粟特人 / 495
2　塔吉克人的起源及其含义的
演变 / 500
3　巴达赫尚简史 / 509
塔吉克人
——选自《伊斯兰教百科全书》/ 517

绪　论

B. B. 巴托尔德院士《文集》第2卷第1册中，包括关于中亚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也包括关于高加索和东欧历史的著作。

中亚历史研究在B. B. 巴托尔德的各种学术活动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在1927年为广大读者所写的《自传》中，B. B. 巴托尔德说明了促使他在大学时代选择自己主要研究课题的原因。他说："我觉得在地理和历史上比其他东方国家更靠近俄罗斯的地区引起了俄罗斯研究东方学的历史学家的兴趣，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因为在这里俄罗斯学者拥有比西欧学者多得多的资料。"[1]

同时，B. B. 巴托尔德还致力于对高加索民族历史许多问题的研究。他继承了俄罗斯东方学的传统，以东方的历史史料为依据进行研究。这些史料中既包含着对斯拉夫人历史、古罗斯历史、伏尔加河流域民族历史的记载，也包含着对整个东欧历史的记载。在这一领域，巴托尔德写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所有研究苏联民族史的研究者都不能绕开他的著作。

B. B. 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的开篇之作是《七河流域历史概论》，这是他1898年在韦尔内（现在的阿拉木图）首次出版的最早期著作之一。[2] 在此之前，B. B. 巴托尔德发表了关于中亚基督教的文章

---

[1]巴托尔德《自传》，第14页。

注释中没有标明注释者的均为巴托尔德的注释。——译者

[2]巴托尔德《七河流域历史概论》，第一版，《1898年统计委员会七河州纪念文集》，第74－175页，以及单行本。1943年伏龙芝城再版，此版本由A. H. 伯恩斯塔姆编辑并作序。B. Φ 米诺尔斯基和T. A. 米诺尔斯卡娅的英文译本：V. V. 巴托尔德《中亚史研究四种》，译者为V和T. 米诺尔斯基，第1卷，莱登，1956年，第73－171页（1962年再版）。关于本卷中所包含的B. B. 巴托尔德著作所有版本及其书评，参见书后所附的"著作说明"，第881－884页（注释中所标示的，均为原著页码，具体见本书边眉。——译者）。

以及其他一些与 H. H. 潘图索夫和 Ф. B. 波亚尔科夫发现比什凯克（现在的伏龙芝城）和托克马克聂斯托利派墓地有关的文章。[1] 这些文章 6 是 B. B. 巴托尔德在研究七河流域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

1893—1894 年在七河流域考察之际，他到过奥利耶阿塔（现在的江布尔城）、比什凯克、伊塞克湖和伊犁河谷。1897 年他发表了这次考察的报告。[2] 其中，B. B. 巴托尔德不仅对中世纪地理学家所记载的路线情况与现代的路线进行了对比，而且叙述了自己对古迹的观察，引用了他从文字史料中摘录的关于七河流域历史的大量资料，在附录中出版了加尔迪齐著作中《论突厥人》一章（第十一章）的波斯原文和俄文译文。

在所有这些准备性工作的基础上，B. B. 巴托尔德完成了《七河流域历史概论》一书的写作，该著在他留下的学术遗产中占据显著的地位。B. B. 巴托尔德本人也对自己的这部早期著作给以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在提到那些在《七河流域历史概论》中得到更详细研究的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介绍他以后著作（例如，《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的读者参考这部著作。[3] 在《七河流域历史概论》出版后的 65 年间，有大量考古学资料被运用于学术界，也有一些新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史料被运用于学术界，中文史料也在继续研究，这就有可能使得本概论中所研究的某些问题更加清晰。但是 B. B. 巴托尔德著作的学术地位依旧，它仍然是一部从古代到 18 世纪中叶七河流域政治史的最完整最系统的著作。[4]

B. B. 巴托尔德在苏联时期应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科学中心之请而完成的著作《吉尔吉斯人历史概论》是对《七河流域

---

〔1〕参见《七河流域历史概论》，第二版，第 4 - 5 页（A. H. 伯恩斯塔姆作序）。

〔2〕巴托尔德《1893—1894 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参见本版，第 4 卷）。

〔3〕参见《七河流域历史概论》，第二版，第 5 页（A. H. 伯恩斯塔姆作序）。

〔4〕从前七河州的土地现在已经成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东部毗连巴尔喀什湖，包括伊犁河流域的地区）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天山中部、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包括伊塞克湖和楚河谷地大部分地区）领土的组成部分。

历史概论》一书的补充。[1] B. B. 巴托尔德在 1925 年 9 月 26 日和 1926 年 12 月之间完成的《吉尔吉斯人历史概论》于 1927 年在伏龙芝城首次出版。[2]

这部著作第一次对从古代到 19 世纪 70 年代吉尔吉斯人各个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连续介绍。在这部历史概论中，作者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叶尼塞河和天山吉尔吉斯人历史的主要文献史料，迄今仍没有失去其价值，对从事吉尔吉斯民族以往历史研究的研究者而言仍然是一部必备的著作。[3] 在 B. B. 巴托尔德吉尔吉斯人历史概论所研究的问题当中有一些涉及吉尔吉斯民族起源的重要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吉尔吉斯人来到天山的时间以及"吉尔吉斯"这一民族称谓在其所占据土地上的传播问题。要想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已知的文字史料中所包含的资料还不够。B. B. 巴托尔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种资料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他所提供的这种资料汇编具有学术客观性，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现在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经常利用这个资料汇编，因为在 B. B. 巴托尔德之后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新的其中详细介绍了中世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历史的东方文字史料。最近十多年所进行的工作只是部分地订正了 B. B. 巴托尔德的某些论点。

在苏联时期，B. B. 巴托尔德还出版了两本关于中亚某个民族的历史概论，这就是：《塔吉克民族历史概论》（1925 年）和《土库曼民族历史概论》（1929 年）。这 3 本概论为进一步研究中亚某些民族的历史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为研究那些很少被研究的民族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它们也为以后各民族共和国研究中亚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最近十多年来，在这些民族共和国中都创办了大学和科学院，培养当地从事历

[1]关于请 B. B. 巴托尔德为自己写一部吉尔吉斯民族历史著作的想法，在自吉尔吉斯自治州成立时起就附设于吉尔吉斯自治州国民教育部的学术委员会活动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后来学术委员会被改组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会科学中心（Акцентр），它在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分院（КирФАН）成立之前负责领导共和国的学术活动。

[2]1943 年再版，伏龙芝，A. H. 伯恩斯塔姆编辑并作序。

[3]参见 A. H. 伯恩斯塔姆为著作第二版所做的引言：巴托尔德《吉尔吉斯人历史概论》，第 7 页。

史学研究的学者型干部。

B. B. 巴托尔德精通原著,他对中亚民族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多年的科学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却谦虚地把自己的卓越研究仅仅说成是进一步研究中亚过去的准备性工作。1929 年《土库曼民族历史概论》出版之际,他在绪论中写道:“我所编写的简史属于一种预备性的工作,在该领域中还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工作,要完成广泛的科学任务不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思议的。就这方面而言,它将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目的,未来将予以证明。”[1] 从写这些话的时候起已经过去数十年了。我们对土库曼人及其国家过去的了解已经由于考古学家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也由于东方史料的翻译和档案文献的研究而大大增多了。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作者的独立研究成果和合著。1957 年,当在进行了大量准备性工作的基础上,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原书稿如此,下同。——译者)历史学家的综合性著作问世之际,他们对 B. B. 巴托尔德作出了应有的评价,指出了他在研究中亚的过去这一领域中的学术贡献,尤其是指出了他 1929 年出版的《土库曼民族历史概论》一书的价值。正如在《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1 卷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样,B. B. 巴托尔德的著作“在许多方面都是进一步研究土库曼人及其祖先历史的起点”[2]。

B. B. 巴托尔德的《塔吉克人历史概论》中包含一系列有趣的信息,他也尝试要初步解决塔吉克民族历史中一些有争议的和不够清楚的问题。在收录这部著作的同时,我们还发表了 B. B. 巴托尔德刊载在《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上的论文《塔吉克人》的俄文译文。[3]

除了中亚某些民族的历史概论之外,B. B. 巴托尔德还出版了 2 本全面研究中亚历史的概述性著作,它们也被收入在我们出版物的第 2 卷第 1 册当中, 这就是:《突厥斯坦史》(在突厥斯坦大学的讲课提纲,

---

[1]参见后面第 547 页。

[2]《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1 卷,第 1 册,第 10 页。

[3]《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中关于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的类似文章将与《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中所有其他关于某些突厥民族的文章一起刊载于《文集》第 5 卷中。

1922年出版)[1]和《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1927年出版)。

前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从古代到19世纪中亚民族的政治史,同时也包含某些19世纪的状况。这部著作的意义首先在于B.B.巴托尔德在其中对自己多年以来在研究中亚历史某些问题及中亚历史分期问题中所取得的成果作出了总结和归纳。在研究一些个别问题时,作者引用了新资料,所以B.B.巴托尔德所发表的讲课提纲不仅对大学生和广大的读者有益,而且也对历史学专家有益。

就选题而言,大部头的《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是对简明《突厥斯坦史》的补充和发展,该著是B.B.巴托尔德内战时期在彼得格勒完成的,但1927年才出版。B.B.巴托尔德在该著中研究了广义文化史中的一系列问题,对中世纪和19世纪地方学校和教育的发展历史予以极大的关注,也对宗教史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极大关注。与此同时,作者还注重通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史和民族史,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例如,作者研究了封建社会晚期和19世纪沙皇俄国征服时期乌兹别克汗国的历史。

关于B.B.巴托尔德所关注的那些文化领域和历史事件,他在这部著作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迄今为止,许多专业的苏联学者在研究各种不同的问题时依然把他的这部著作当做最丰富的、涵盖了方方面面信息的参考书的原因就在于此。对中亚以及整个所谓穆斯林东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各种术语的发展史所作的详尽附注,尤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内容清晰、行文生动,这是该著毫无疑问的优点。大概B.B.巴托尔德在不降低该著学术水平的同时,竭力以科普性的语言来阐述问题,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迄今仍然是扩充广大读者知识面的一本有意义的书籍。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

---

[1] B.Φ米诺尔斯基和T.A.米诺尔斯卡娅的英文译本于1956年出版,名为《突厥斯坦简史》(巴托尔德《中亚史研究四种》,第1卷,第1－68页;1962年再版),我们保留了作者在俄文第一版中所使用的名称。

是《文集》第2卷所收入的最有趣的著作之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一部分原因B.B.巴托尔德本人在第一版的作者绪论中提到了)这部著作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之处。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许多领域,B.B.巴托尔德没有进行研究,或者仅仅是略微地触及一些事实本身,而没有阐明这些问题,现代读者很难理解那些为人类培养了伊本·森纳、阿利舍尔·纳沃伊、马赫图姆·库里以及其他许多杰出科学人才和文化活动家的民族的文化生活活动。其中,B.B.巴托尔德也没有把阐述中亚的文学艺术史和民间口头创作史作为自己的任务,这可能因为他认为自己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在科学史领域也是同样。

我们也提醒读者注意《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中的某些章节在实际资料的丰富程度和论述的深度方面都存在着不平衡性。例如哥萨克和农业殖民一章所引用的资料远不如其他章节丰富,关于革命前中亚定居经济与游牧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研究得相当粗略。这其中几乎没有利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罗斯史料和文献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而带有片面性的资料选择则可能得出否定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益处的结论。[1]

在第2卷第1册当中也收录了《里海沿岸地区在穆斯林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这一综合性著作,该著作主要研究了高加索和伊朗北部与里海接壤地区——首先是阿塞拜疆以及达吉斯坦、马詹德兰和古尔干的历史。这一著作的意义首先在于它系统地阐述了从古代到包括近代在内的阿塞拜疆的历史,以及与阿塞拜疆相邻的里海沿岸地区和坐落于外里海的部分土库曼的历史。B.B.巴托尔德追溯了阿塞拜疆与更遥远的中亚地区之间悠久的相互关系,在北部与伏尔加河沿岸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通过伏尔加河与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2]《里海沿岸地区在穆斯林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一书如同B.B.巴托尔德的其他

---

[1]参见后面第295-296页。

[2]在这一著作的某些章节中部分地重复了B.B.巴托尔德其他综合性著作(主要是《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和《阿拉伯关于罗斯的记载》)中的资料,但用这些资料来说明与里海沿岸地区历史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

著作一样，在中世纪史一章中所包含的资料尤其珍贵。

《阿塞拜疆简史》是为更广大听众准备的一个简明讲课提纲，而《里海沿岸地区在穆斯林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一书就是在这份讲课提纲的基础上完成的。除了这2种著作之外，在第2卷第1册当中还收入了一些B. B. 巴托尔德研究阿塞拜疆以及高加索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中更局部性问题的文章和札记，其中有4篇文章摘自《伊斯兰教百科全书》。这4篇文章分别是：《阿布哈兹人》、《阿兰人》、《希尔凡沙赫》和《沙米尔》。此外这里还有2篇摘自《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的属于东欧历史的文章——《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

在第2卷第1册中刊载的B. B. 巴托尔德的2种著作引起了研究罗斯的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这2种著作分别是：《穆斯林对俄罗斯的新记载》(1896年首次出版)和《阿拉伯关于罗斯的记载》(1940年B. B. 巴托尔德死后首次出版)。

这里发表的关于中亚综合性著作的书评对专家而言具有极高的价值。这些综合性著作包括：Ф. Х. 斯克拉因和 Э. Д. 罗斯的著作、В. И. 马萨利斯基的《突厥斯坦边区》和论文集《亚洲俄罗斯》。其中对斯克拉因和罗斯著作的书评有利于注重方法论研究的历史学家，因为B. B. 巴托尔德在书中阐述了自己对写作综合性历史著作的看法。

我们就此完成了对B. B. 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所收入的各种著作的说明，但同时也要提醒读者，在许多情况下把我们所发表的B. B. 巴托尔德的著作在内容相关的各卷之间进行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条件的，对此在第1卷的编辑绪论中已有说明。[1] 关于第2卷第1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B. B. 巴托尔德的一系列或多或少与中亚历史相关的概括性著作，如B. B. 巴托尔德关于突厥蒙古民族史的讲义以及摘自《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的关于突厥语民族、中亚某些地区和城市(布哈拉、花剌子模等)的文章都没有被收入其中。这些著作主要被收

〔1〕B. B. 巴托尔德《文集》，第1卷，第9－10页(编辑委员会就B. B. 巴托尔德院士《文集》出版所作的绪论)。

入到我们出版物的第5卷和第3卷当中。在决定把哪些著作收入到第2卷第1册当中时,绝对没有提出要把B.B.巴托尔德所有关于中亚历史的著作都集中于此的任务。这里汇集的主要是全面介绍中亚历史或其某些民族的综合概括性著作。

在B.B.巴托尔德的概括性著作中,比如在《突厥斯坦史》、《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里海沿岸地区在穆斯林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中特别清晰地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以及作者解释历史现象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详细评价B.B.巴托尔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A.Ю.雅库鲍夫斯基对此已经作了大致的勾勒,我们只是想提起读者注意,B.B.巴托尔德在研究中世纪东方历史的时候,“在许多问题上都得出了接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结论”[1]。B.B.巴托尔德经常关注经济史的问题,也关注(1905年革命之后首次表现出兴趣,以后在苏联时期亦如此)中世纪东方民族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研究,这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在B.B.巴托尔德关于东方民族中世纪历史的著作中包含许多实质性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建立在大量事实材料基础之上的,并且其中大部分已经为苏联学者所接受,而且苏联学者也在对这些结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2]

B.B.巴托尔德对东方民族、对他们丰富的过去怀有深深的尊敬,他们曾经为文明史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也“从来都没有”用为沙皇主义、殖民征服和殖民政策歌功颂德[3]“来侮辱自己的笔”。在1927年出版的《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我们在这里再版了此著)结束语中,B.B.巴托尔德明确地承认了苏联在促进东方民族命运走向好转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自己对阿富汗解放运动和印度争取民族自由斗争的同情。他看到殖民体系正在从整体上走向瓦解,认为殖民征服活动(首先

---

〔1〕雅库鲍夫斯基《巴托尔德院士著作中的东方社会史问题》。A.Ю.雅库鲍夫斯基著作中对B.B.巴托尔德观点的详细评价,参见编辑委员会绪论,本版,第1卷,第6-7页。

〔2〕关于此,参见《文集》第1卷И.П.彼得鲁舍夫斯基所作的绪论,第26-32页。

〔3〕关于此,参见《文集》第1卷И.П.彼得鲁舍夫斯基所作的绪论,第32页。

指的是沙皇俄国和英国征服者)是“以往历史上黑暗的篇章”。[1]

B. B. 巴托尔德在书评中往往表现出深邃的思想,这证明他在世界历史和俄罗斯历史领域有宽广的视野和渊博的知识。作为例证,我们提请读者注意在3卷本的《亚洲俄罗斯》的书评中,B. B. 巴托尔德谴责了在评价叶尔马克、波亚尔科夫及其16—17世纪其他“西伯利亚土地寻找者”时所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态度和现代化,他写道:“必须要按照其本来面目来塑造过去的活动家……”[2]

当然现在还远不能对B. B. 巴托尔德著作中所有的结论以及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表示赞同。正如在苏联历史文献中不止一次地强调的那样,B. B. 巴托尔德在许多时候过高估计了地理条件、商路以及文化影响、外来风俗和征服等因素的作用。编者在再版的B. B. 巴托尔德著作的注释中指出了许多类似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将着重关注第2卷第1册所刊载的B. B. 巴托尔德概述性著作中那些最突出的和最经常遇到的不正确或过时的总则、评价和表述。

13

B. B. 巴托尔德概述性著作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内容基本上是统治者和征服者的历史,通常人民和劳动群众的历史在这些著作中很少得到关注。同时在某种情况下,比如在解释当地居民对突厥斯坦沙皇殖民当局的态度时,B. B. 巴托尔德也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条件,只是局限于以某些沙皇行政官员的个人品质来说明问题。[3] 类似的薄弱之处最主要集中于B. B. 巴托尔德综合性著作中有关近代史的章节。

夸大地理条件和商路的作用有时使B. B. 巴托尔德得出了错误的预测(这些预测后来被生活本身所推翻),例如关于突厥斯坦的未来。[4] 把古代中亚的社会制度与中世纪中亚的社会制度等同起来[5]

---

[1]参见后面第433页。的确,B. B. 巴托尔德在那里表达了一个不正确的观点,似乎“完成历史任务”在过去“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的征服”。也比较第623页。

[2]参见后面第646页。也比较本版第1卷,第526页(论成吉思汗)。

[3]参见后面《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第380页。

[4]参见后面《突厥斯坦史》,第165－166页。

[5]参见后面《突厥斯坦史》,第117页;《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第173页;《塔吉克人历史概论》,第456页。

(正如在苏联文献中多次强调的这是不正确的)反映了他尊奉的是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广泛流行的“永久封建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第2卷第1册所收入的B.B.巴托尔德的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夸大文化影响和外来风俗作用的地方。[1]

正如第1卷的绪论和注释中所指出的[2],B.B.巴托尔德在许多问题上,其中包括在与俄罗斯历史有关以及与莫斯科国家形成有关的问题上[3]都错误地评价了蒙古征服的作用及其对被征服国家和民族所产生的影响。

还应该提醒读者注意,要批判地对待B.B.巴托尔德就那些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对他而言这是现代的中亚)出现的问题所发表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作者在那些年代里往往依附于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观点,他们走上了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道路,但却对苏维埃政权持观望态度。我们引用《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中的论点作为例证,这些论点说明了B.B.巴托尔德对苏维埃政权于革命初期在中亚学校教育领域所采取政策的态度。作者在这里把革命前沙皇政府对穆斯林宗教学校的态度与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进行了对比,他写道:“随着革命的胜利,学校领域中的保守主义倾向如同所有其他领域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样,让位给了其他还没有取得明确成果的倾向。”[4]如同许多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一样,B.B.巴托尔德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还没有看到中亚未来历史发展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走其他道路的现实性,《突厥斯坦史》的结论大概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5]

在B.B.巴托尔德的《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一书中所包含的陈腐

[1]参见后面《突厥斯坦史》,第113页;《里海沿岸地区在穆斯林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第653页;特别是《高加索、突厥斯坦、伏尔加河》,第789页,在那里“文化的原则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被解释成“主要的历史内容”。

[2]参见第四章,第1卷第530页注释1。

[3]参见后面《里海沿岸地区在穆斯林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第714页、717页、719页。

[4]参见后面第317-318页和注释67。

[5]参见后面第166页和注释5。

过时的表述以及对事实和事件的错误解释最多，这首先是因为在这部著作中涉及许多19—20世纪初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我们再援引几个例子。在某些情况下，B. B. 巴托尔德在谈到1905年俄国革命事件以及他称为“造反”的1916年中亚起义时使用了“混乱”一词。由于没有看到刑事犯罪和劳动群众的行动之间的区别，尽管劳动群众的行动往往也带有“抢劫”性质，但这种行动的目的却是反对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所以B. B. 巴托尔德不能对他所研究的关于“匪盗和抢劫”现象增加的统计资料予以正确的分析。[1] 作为一个公正的历史学家，B. B. 巴托尔德了解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也明白沙皇官员把犯罪率的增长归罪于解放运动即1905年革命的解释是与事实不相符的，但他本人在此情况下其实仍然坚持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2]，其原因就在于此。

必须提醒读者注意，B. B. 巴托尔德在许多情况下利用了曾流行一时但现在已经过时的不准确的学术术语。在评价民族运动以及古代和中世纪的意识形态时，他使用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些术语，但他利用的却是这些名词中比今天更广泛的含义。例如在《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中，B. B. 巴托尔德在评价马兹达主义者时使用了“共产主义思想”这一术语。[3] 在此处，在该著其他许多地方以及在《里海沿岸地区在穆斯林世界历史中的地位》[4]一书中，B. B. 巴托尔德利用“共产主义的”这一术语来表示原始公社（有阶级以前）的概念。类似术语上的不准确性在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是我们学术文献中所固有的一种普遍现象。

15

B. B. 巴托尔德用“土耳其人”一词（相应的也有“土耳其人的”）来表示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所使用的“突厥人”[5]一词，现在则只把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即奥斯曼土耳其人称为

〔1〕参见后面第385－386页。
〔2〕参见后面第385页。
〔3〕参见后面第217页。
〔4〕参见后面第669页。
〔5〕尤其参见后面第453页，巴托尔德试图在这里论证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在早期的著作中（其中包括《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巴托尔德写的是“突厥人”。

"土耳其人"。

在苏联时期,B. B. 巴托尔德在利用19—20世纪初俄罗斯文件时以及在其他情况下往往也继续使用革命前的术语。其中包括B. B. 巴托尔德在20年代末以前继续使用他已经习惯的、老俄罗斯文献中传统的术语"土著人"一词来表示俄罗斯边疆的当地居民,而这一术语当时已经完全不被使用了。当然他并没有注意到已经多少带有一些侮辱性的色彩。

在《文集》的正文中有许多民族的名称是以作者写作时的形式保留下来的,虽然这些形式已经落后于我们的时代了。编者保留了以"哥萨克"来表示现在"哈萨克"的用法,认为这在许多情况下予以说明也是得当的。在以往俄罗斯的术语中(不晚于18世纪初)存在着一种混乱现象,这就是把哈萨克人称作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后来又称作吉尔吉斯哥萨克人或者更经常称作吉尔吉斯人,而把真正的吉尔吉斯人称作"卡拉吉尔吉斯人"。此外,"哥萨克"这一民族名称又与俄罗斯军事阶层的名称产生了混乱(乌拉尔哥萨克,西伯利亚哥萨克以及七河流域哥萨克等)。哈萨克民族的真正自称——"哥萨克"在哈萨克以及苏联东部的其他语言中保留了下来。为了避免术语上的混乱,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俄语中开始把这个民族的名称写成"哈萨克"。在B. B. 巴托尔德时代,由于"哥萨克"和"吉尔吉斯"这些多义词而引起的不便是如此之大,甚至于在他的著作中有时把"吉尔吉斯"这一名称作为一个既表示吉尔吉斯人也表示哈萨克人的集合名词(在当地居民的语言中,这两个民族术语有时是不能混淆的)。

对B. B. 巴托尔德著作进行注释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他的论点(而只是对他最本质性的论点)尽可能作出局部性的纠正。编者主要是要竭力向读者介绍新的文献,在这些新文献中读者可以找到B. B. 巴托尔德所研究问题的现代资料。[1]

---

[1]注释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不包含穷尽一切的参考文献索引,读者能在书目索引第二部分所开列的著作中找到更完整的文献目录(《参考文献索引》,参见后面第948页)。

B. B. 巴托尔德去世(1930 年)后,中亚和外高加索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从 30 年代开始广泛展开的考古工作提供了大量事实资料。这些工作的进行使我们发现了许多文化和艺术古迹,也发现了许多古代和中世纪早期中亚的文字古迹,一系列 B. B. 巴托尔德囿于他那个时代资料的局限性而不得不浅尝辄止的问题得到了阐述。由于新的东方文字史料其中包括文件资料的发现和出版,由于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苏联东方各加盟共和国的俄文档案的研究,也由于民族学者的辛勤工作,所以又积累了关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的大量资料。我们不得不对收入到第 2 卷第 1 册当中的 B. B. 巴托尔德著作中涉及这些历史时期(古代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史)的问题作出大量注释。

由于在查明和整理苏联东方民族各个时期历史的事实资料领域进行了长期的工作,并且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来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因而为完成中亚某些民族历史的综合性著作创造了条件。在这些著作中对这些民族从古代到今天的命运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1—2 卷,塔什干,1955—1957 年;Б. Г. 加富罗夫《塔吉克民族简史》,第 1 卷,莫斯科,1955 年(第三版);《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1—2 卷,阿什哈巴德,1957 年;《吉尔吉斯史》,第 1—2 卷,伏龙芝,1956 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1—2 卷,阿拉木图,1957—1959 年;《塔吉克民族史》,第 1 卷,莫斯科,1963 年(其余 4 卷待版)。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达吉斯坦、鞑靼等地也出版了关于苏联东方其他加盟共和国历史的综合性著作,被收入到第 2 卷第 1 册当中的 B. B. 巴托尔德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这类著作。

尽管已经出版了这些综合性的著作以及许多关于苏联东方民族历史的书籍和论文,但 B. B. 巴托尔德的概述性著作如同他收入到《文集》第 2 卷第 1 册当中的阐述某些局部问题的著作一样,仍然是历史学家和所有从事这些民族过去历史研究的专家的必备参考书。

在事实资料方面,B. B. 巴托尔德的著作仅仅在涉及某些个别问题

时有一小部分显得过时了。从总体上讲，B. B. 巴托尔德的历史著作在几十年中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和价值，这首先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无时效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的，作者是深思熟虑地批判性地利用这些资料的，与此同时他善于对其中的内容进行鉴定挑选和仔细

17 分析。

B. B. 巴托尔德去世后出版的关于苏联东方民族历史的书籍和论文的参考书目共有1000多种。必须要考虑到的资料的规模以及编者在准备出版《文集》第2卷第1册出版工作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促使我们必须要吸引许多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语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图书编目学家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第2卷第1册的正文是由 B. A. 罗莫金和 Б. Я. 斯塔维斯基整理、由 Б. Г. 加富罗夫编辑出版的。B. A. 罗莫金和 Б. Я. 斯塔维斯基作了大量的注释。对 B. B. 巴托尔德《土库曼民族历史概论》的注释以及其他著作的一些注释是由 Ю. Э. 布列格利来完成的（名和姓的开头字母为 Ю. 布列格利），З. B. 安恰巴泽为《阿布哈兹人》一文作了注释（名和姓的开头字母为 З. 安恰巴泽）。

摘自《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的文章是 Д. E. 别尔捷利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译者的注释用名和姓的开头字母 Д. 别尔捷利斯注明）。

在筹备出版正文和编写注释时，我们注意到了 A. H. 伯恩斯塔姆（《吉尔吉斯人历史概论》第二版）[1]、A. П. 科瓦列夫斯基（《阿拉伯关于罗斯的记载》著作版）和 B. Ф. 米诺尔斯基（《突厥斯坦史》、《七河流域历史概论》和《土库曼民族历史概论》英译本）对收录到本文集第2卷第1册当中的 B. B. 巴托尔德著作以前各种版本所进行的考订和注释工作。这些学者所作的大量注释在我们此次出版的时候被重印出来，并且相应地以他们名和姓的开头字母标注出来：A. 伯恩斯塔姆，A.

---

[1]在出版 B. B. 巴托尔德《吉尔吉斯人历史概论》第二版时，编辑们进行了版本考订工作，把这一概论的正文与保存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国家档案馆中的作者本人的手抄本进行了校对，对这一工作的评价，参见克拉奇科夫斯基《关于 B. B. 巴托尔德著作的再版》。——И. Ю. 克拉奇科夫斯基（《克拉奇科夫斯基选集》，第5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8年，第430页）

科瓦列夫斯基和B.米诺尔斯基。

在第2卷第1册出版工作准备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或者提供了咨询服务，或者给编者提供了对某些问题进行注释所需要的资料，他们是：C.M.阿布拉姆佐(民族学问题)、B.A.利夫希茨(伊朗语言史)、Б.И.潘克拉托夫、Б.Л.里弗亭和B.C.科洛科洛夫(中文姓名、地理名称和术语的音译)。编者对这些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下列在筹备出版的过程中给予咨询、提供了某些参考文献以及提出批评性意见的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专家有：O.Ф.阿基穆什金、Ю.A.扎德涅普罗夫斯基、Б.A.卡雷耶夫、C.C.卡卡巴泽、C.Г.克利亚什托尔内、E.И.克恰诺夫、O.Э.利沃托娃、Л.H.梅尼希科夫、P.P.奥尔别利、И.П.彼得鲁舍夫斯基、B.Б.波图加尔、A.C.切伊什维利、K.H.尤兹巴尚。

18

在许多问题上，其中包括在编写《著作说明》时，暂时尚未发表的И.И.乌姆尼亚科夫教授编撰的《B.B.巴托尔德院士著作述评》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实质性的帮助，因为得到他的允许我们才能利用该文的校对清样。

B.B.巴托尔德著作的正文出版的时候没有进行修改也没有进行删节，只是对明显的错字进行了纠正。以前版本中被漏掉的词只有在不引起疑义的情况下才放在角括号中添加到正文里。为了方便阅读，把B.B.巴托尔德的著作《突厥斯坦史》分成了章节，在第一版中没有这样做。编辑所采用的这些章节的标题因为并非B.B.巴托尔德本人的标题，所以被放在了角括号中。在确定章节的标题时，编辑力争不要太偏离B.B.巴托尔德本人的构思意图，既考虑到了B.B.巴托尔德关于中亚历史的其他著作中的章节划分特点，也注意到了B.Ф.米诺尔斯基《突厥斯坦史》英文译本中所采用的章节标题。

在B.B.巴托尔德的大部分概述性著作几乎都没有脚注，甚至也没有总是标明作者在正文中所引用的资料的名称，这或者因为这些著作具有科普性(《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塔吉克人》)，或者因为这仅仅是提纲或讲义(《里海沿岸地区在穆斯林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突厥斯

坦史》)。编者并不力求重新编写一份作者没有的科学著作引文附录，而只是局限于对某些参考书目进行注释。只有《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中有关19—20世纪的某些章节例外。在这里B.B.巴托尔德本人对其所利用的史料作了大量的注释，编者对这些章节的引文附录进行了补充和扩展，查清了一切可能查清的“模糊不清的”史料和文献的出处。

B.罗莫金

七河流域历史概论

绪 论

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委员会让我为他们出版的《纪念文集》写一本地方史概论和大事年表的建议。对七河流域地方史感兴趣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中亚历史的研究者感到极其欣慰，因为研究者明白只有在当地力量的积极参与下才有可能对中亚历史进行全面的和全方位的研究。流传到今天的文献史料往往是残破不全的，需要以考古资料来进行补充。对短期到这一地区来因而不可能获得土著居民信任的人而言，搜集这种资料几乎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只有那些长期在当地生活的人才能够大规模地进行这种勘察工作，并以真正有价值的发现来丰富学术研究。在七河流域已经有过这样的发现（我们指的是在比什凯克和托克马克附近发现了聂斯托利派墓地），但是这种发现迄今为止还多多少少带有偶然性。绝大部分考古资料已经遗失并且对学术研究没有任何意义。譬如据我所知，托克马克居民在布拉纳附近的一些旧灌溉渠的河床里发现了许多硬币，然而是否有什么地方可以收藏这些硬币，我就不得而知了。像任何其他的事情一样，对当地古迹的研究也只有在正规机构的组织下才能够顺利进行。[1] 因此我们允许自 24

[1]七河流域是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这一地区的系统考古学研究只有在苏联时期才展开。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在以下综合性的著作当中：《吉尔吉斯史》，第1卷，伏龙芝，1956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阿拉木图，1957年。利用了苏联研究者所获得的有关前七河流域资料的出版物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考古地图》，阿拉木图，1960年。考古资料汇编参见《楚河谷地》；伯恩斯塔姆《吉尔吉斯北部考古概论》、《天山中部和帕米尔－阿赖地区历史考古概论》；伊万诺夫《伊塞克湖盆地考古学研究》；扎德涅普罗夫斯基《伊塞克湖盆地的考古学研究及П. П. 伊万诺夫研究的意义》；科热米亚科《楚河谷地中世纪早期的城市和村落》。关于七河流域南部的考古学书目，参见阿米京－沙皮罗《苏联吉尔吉斯考古学参考文献索引》。关于东哈萨克斯坦和北吉尔吉斯的考古学书目，参见《苏联考古学文献》。革命前俄罗斯关于伊塞克湖盆地古迹的书目，参见阿米京－沙皮罗《革命前俄罗斯关于伊塞克湖的历史和经济文献索引（1768—1917）》。——B. 罗莫金

己提出一个愿望:为实现这一目的将会在七河流域成立一个具有明确任务和权限的协会,就像突厥斯坦边区现有的协会一样,后者已经以类似在塔拉斯谷地找到的古突厥和回鹘碑铭[1]这种有价值的发现丰富了学术研究。

当然,在地方史研究工作中当地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并不限于对考古资料的搜集。个人对区域的了解对于把古代的地理名称与现代的地理名称统一起来是必须的,对完全弄清楚区域历史对地理条件的依赖性也是必须的。民族学资料对历史学家的意义不言而喻,在搜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当地活动家所拥有的条件也更为有利。

我们期待着这部著作将给那些有志于在上述领域工作的人以一定的帮助。我们努力把能搜集到的印刷史料和手稿史料汇编成迄今仅有的一种有关七河流域的完整的历史资料集,并且我们特别注意有关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该地区所处的日常生活条件方面的记载。我没打算写一部符合现代学术要求的真正含义上的地方史著作,完成这种著作的时机还没到来,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理解这一地区历史生活的进程,我们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打算对它们进行任何回答。本书只是未来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资料和进一步研究的起始点。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目的,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

25

[1]我们提醒读者特别关注这一发现,因为下面所叙述的历史事实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寄希望于在七河流域也将发现这种碑铭。

1 乌孙人[1]

对七河流域的最早历史记载我们是在中文史料中找到的。在更早期的古希腊和罗马作家那里我们只是找到了居住在外锡尔河地区的几个民族的名称，他们没有说出其中每一个民族的具体居住地。中国人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才对七河流域有所了解的，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寻找反对强大的匈奴的同盟者而派出使团到西部国家。乌孙也属于被匈奴打败的民族，他们最初在祁连山脉与布隆吉河[2]之间游牧。他们的王在这里与匈奴人作战时战死。匈奴单于把他刚出生的儿子带到自己那里抚养长大，后来因为战功卓著，单于便把他父亲的子民归还给他。乌孙人参与了对自己从前的邻居——也被匈奴打败的月氏人的追击，月氏人很可能起源于吐蕃人。[3] 在西迁的过程中，月氏人将塞种人赶出七河流域，人们一般认为塞种人就是希腊和波斯关于中亚的文献中经常提到的萨基人，虽然除了发音相近之外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两个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同样月氏人又被乌孙人赶走，乌孙人在最初几批中国使团到来的时候曾统治七河流域，虽然上面提到的这两个

---

[1]根据收入书中的中文史料：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

现在除了这本书的第二版之外，翻译过来的关于乌孙人的中文资料，还有屈纳《中国通报》，第68－100页。现代人对乌孙人历史的看法，参见《吉尔吉斯史》，第1卷，第53－65页；《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第40－52页。关于乌孙人历史的最新考古资料，参见阿基舍夫《1954年伊犁考古工作报告》；基比罗夫《1953—1955年天山中部考古工作》；阿格耶娃《论阿拉木图州古代葬礼的种类》。——Б. 斯塔维斯基

[2]勒河的西支流。——译者

[3]月氏人是一个游牧民族，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了中亚的主要地区，并在公元前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中亚印度国家——贵霜帝国。现在认为月氏人是操东部伊朗语族语言的部族。比较利夫希茨《中亚民族的伊朗语》，第142－143页。也参见《塔吉克民族史》，第1卷，第335－393页。这里列出了主要文献。——Б. 斯塔维斯基

26 被驱赶的民族中都有一部分仍然居住在这个地区。[1] 在这里封号为昆莫的乌孙王猎骄靡很快就强大到足以完全摆脱匈奴人控制的程度。在东面他的领地直接与匈奴人的领地相接（中国人没有说出他们领地之间的精确界限），在乌孙人的国家以南自古以来就是东突厥斯坦的定居领地，西南是费尔干纳，西面是游牧民族康居人（可能是突厥民族康格雷人）的领地。由于乌孙人居住在费尔干纳的东北，康居人居住在费尔干纳的西北[2]，所以他们领地之间的界限大致与七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之间的界限相同。至于乌孙人的起源，他们流传到今天的语言只有专有名词和封号，并且都只是中文音译，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语言学家对这些专有名词和封号进行过研究（我们只能注意到词尾"靡"经常被重复使用）。[3] 关于他们的外貌特征，一位后来的中国（公元7世纪）作者师古[4]说："乌孙人的外貌与西域诸戎差异最大，现在那些蓝眼赤须长得像猕猴的突厥人[5]就是他们的后裔。"[6]当然这一记载远不能解决乌孙人到底是雅利安人还是突厥人的问题，从阿贝尔·雷米萨和克拉普罗特开始，以前的东方学家都认为乌孙人是雅利安人，而

---

[1]塞种人建立了三块领地，中国人分别称之为罽宾、休循和捐毒（现代读音为 Цзибинь、Сюсюнь 和 Цзюаньду）。这些领地位于兴都库什山和喀布尔河谷地。希腊作家称这些地区为印度西徐亚人的领地，所以塞种人就等同于西徐亚人或萨基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一般认为罽宾（Цзибинь）就是喀布尔河地区或者喀什米尔地区。有关罽宾地理位置的各种观点，现在可以参见纳雷恩《印度－希腊语族》，第135－137页；曼德尔施塔姆《从古代到公元10世纪帕米尔和帕米尔地区历史地理概论资料》，第51－52页。休循很可能在阿赖山谷，捐毒在喀什噶尔西部或西南部。参见曼德尔施塔姆《从古代到公元10世纪帕米尔和帕米尔地区历史地理概论资料》，第55－57页。——Б. 斯塔维斯基

[2]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5－6页。

关于康居（现在读 Канцзюй）和康居人，比较后面第175页。关于康居的地理范围参见斯塔维斯基《论贵霜国家的北部边界》，第113页。——Б. 斯塔维斯基

[3]〈参见 Ю. А. 祖耶夫的著作《论古代乌孙人的语言》；《论乌孙民族史》。——Б. 斯塔维斯基〉

[4]颜师古。——Б. 加富罗夫

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65页。

[5]亚金夫·比丘林神甫常常把中文的胡人一词（野蛮人）翻译成突厥人。

[6]法文的译文稍有不同："他们有着蓝色的眼睛（或者'浅绿色的'），赤色的髯，长得像猴子，和他们的始祖一样。"（Vivien de St. －Martin《白匈奴人》，第32页）

科学院院士 B. B. 拉德洛夫[1]和突厥人研究的最新成果的作者 H. A. 阿里斯托夫[2]则认为乌孙人是突厥人。

乌孙人主要在七河流域的平原地区游牧,因为中国人说他们的土地平坦草木茂盛,又说他们国家的气候阴冷多雨。山上覆盖着针叶林。居民的数量为 12 万户或 63 万人。乌孙人能提供一支 188800 人的军队。他们的都城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主营地——赤谷城大概位于伊塞克湖东南部,因为中国人说乌孙人的都城在阿克苏西北 610 里,费尔干纳都城东北 2000 里和距康居领地边缘 5000 里处。[3] 在公元 7 世纪的一张中国路线图中也提到了赤谷城,并说它距别迭里山口总共只有 50 里的路程。但这张路线图从总体上看是非常令人怀疑的,需要汉学家对其进行新的研究。[4] 阿里斯托夫先生确信赤谷城就位于克孜勒苏河岸,我们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同意阿里斯托夫先生的观点[5]:现在寻找像乌孙人那样的游牧民族的建筑遗迹毫无意义。也没有理由像现在有时所做的那样,把保存在伊塞克湖两岸或者湖底的所有古迹都说成是乌孙人的。[6] 我们将会看到,当乌孙人这一名称本身早已消失之后在伊塞克湖还存在着城郭和堡垒。

大约在公元前 105 年,中国使者张骞来到了乌孙人那里,并建议他们东返与中国人联合反对匈奴人。张骞的计划没有得到乌孙人的支持,而且昆莫在大本营对使者的接待也不令人满意。但当护送张骞回

---

[1]《论回鹘人问题》,第 126 页。

[2]《关于突厥诸部落、部族的部落组成及其人口情况札记》,第 17 页。

[3]最后一个数据可能有所夸大,因为在另一地方(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 6 页)又说康居人的首都在费尔干纳都城西北 2000 里处。1 里大约相当于 0.5 俄里。距阿克苏 610 里的距离没有证实亚金夫神甫的观点(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地理索引,100),比丘林认为赤谷城在湖的东北部。

在古代和中世纪,1 里大致相当于 1/3 公里。参见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本版,第 1 卷,第 134 页,注释 7。比较竺可桢《古代和中世纪中国学者对天文学的贡献》,第 72 页。——Б. 斯塔维斯基

[4]巴托尔德《论前蒙古时期突厥斯坦的基督教》,第 31 页。

关于赤谷城的地理位置,参见伯恩斯塔姆《天山中部和帕米尔－阿赖地区历史考古概论》,第 97 页。——Б. 斯塔维斯基

[5]《关于突厥诸部落、部族的部落组成及其人口情况札记》,第 26 页。

[6]季亚奇科夫《凯萨尔景区》,第 12 页。

中国的乌孙使者向自己的国王讲述了中华帝国的辉煌和强盛之后，中国的威望有所提高。而在张骞之后中国使者都经东突厥斯坦和费尔干纳西行，由此乌孙人再也得不到这些使团所携带的慷慨馈赠了。所以昆莫又派了新的使团前往中国，请求迎娶中国公主，并以千匹马为聘 28 礼。中国答应了乌孙昆莫的请求，但公主只是做了昆莫的幼夫人，而这时匈奴单于的女儿也嫁给年迈的乌孙王并被立为长夫人。已经习惯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公主在草原上思念故乡，她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的悲伤之情，抱怨家人将其嫁给"以穹庐为室旃为墙，以肉为食酪为浆的乌孙王"。[1] 在中国人远征费尔干纳时（102 年），乌孙人按照中国政府的愿望派出一支 2000 人的援军，但乌孙援军却持观望立场并没有参加军事行动。[2]

昆莫临死前要求公主按照草原的习俗嫁给他的孙子和继承人军须靡，号岑陬，公主不同意，但中国政府劝她入乡随俗。[3] 岑陬身后只留下一个幼子（匈奴公主所生）泥靡。在泥靡未成年之前，暂时由岑陬的堂兄弟岑陬翁归靡继承王位，翁归靡娶了自己前任的遗孀——中国公主为妻（这已经是嫁给岑陬的第二位公主，猎骄靡的遗孀之前已经去世）。翁归靡大概是一位才能卓越的统治者，在他统治时期乌孙人走向繁荣和强大。公元前 71 年翁归靡根据与中国人的协议征讨匈奴人并大获全胜，俘虏近 4 万人，夺取牲畜近 7 万头。翁归靡也干预了东突厥斯坦事务，他的次子成为莎车的统治者，他的长女嫁给了库车统治者。翁归靡死于公元前 60 年代末，泥靡继承了王位，号狂王。

狂王娶了自己前任的遗孀，虽然她年龄很大（已经 50 多岁），但仍与狂王生了一个儿子。狂王与妻子感情不好也没有受到人民的爱戴。当中国使团来到赤谷城的时候，王后说服使者摆下盛宴，图谋在宴席上杀死狂王。计划没能成功，狂王只是受伤，之后逃走。狂王的儿子细沈瘦率军包围了显然处于王后和中国人掌控之中的赤谷城。中国政府急

---

[1]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 67 页。
[2]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 30 页。
[3]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 68 页。

忙纠正自己使者的错误，他们被带回中国处以死刑，中国政府还给国王送来了礼物和治伤的医生。在审讯的时候王后否认了自己的过错。匈奴公主与翁归靡所生的儿子乌就屠利用人民的不满反对狂王，他来到“北部山区”（阿拉套山）宣称等待匈奴人的援助，他把人民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出其不意地袭击狂王，将其杀死并继承了王位。中国人不能容忍匈奴一派获胜，于是准备进攻七河流域。由于一位嫁给乌孙贵族的中国女人的斡旋，事情得以和平解决。乌就屠就任小昆莫，翁归靡的另一个儿子元贵靡被立为大昆莫。大昆莫下辖百姓6万户，小昆莫下辖百姓4万户。乌就屠甚至作为中国人的同盟者与匈奴人打过仗，但没有获胜，而他反对中国人的军事行动倒是更有成就。[1]

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纷争和内讧。大昆莫元贵靡的孙子雌栗靡一度用强力恢复了秩序，他的统治使国家重返翁归靡时期的“安宁与和平”。同时他“诏告天下，任何人都不能到他的牧场放牧牲畜”。[2] 这大概表明在乌孙国中存在着后来被突厥人和蒙古人称作库鲁克的围场。[3] 雌栗靡被小昆莫派来的杀手杀死，此后中国人扶植他的孙子——中国公主之子伊秩靡为大昆莫。总起来说，中国人在大昆莫与小昆莫的斗争中站在大昆莫一边。当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小昆莫安犁靡的统治被推翻，他本人被匈奴人杀死后，有一位中国傀儡继承了小昆莫之位（公元前11年），他的叔叔卑爰疐带领8万人向北走，来到中国人那里，又从这里进攻两个昆莫，由此这两个昆莫与中国人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公元前1年，伊秩靡来到了中国首都，他在那里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同时匈奴单于也和他一起来到了中国首都。最终中国都护“以突袭的方式”（也可能是通过暗杀）杀死卑爰疐。

大约在公元8年左右，东突厥斯坦又重新落入匈奴人之手，中国与“西域”的联系被中断了，从公元73年才重新恢复。公元97年，中国统帅班超派一支队伍来到了里海。这些事件大概对七河流域没有产生任

〔1〕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68－74页。

〔2〕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75页。

〔3〕纳尔沙西《布哈拉史》，雷科申译本，第40页。

何影响,关于这一时代七河流域的历史我们一无所知。只是谈到乌孙人在公元 2 世纪“完全脱离了”[1]中国。我们对匈奴人在由蒙古西迁时期经过七河流域时的迁徙情况也一无所知,匈奴人的迁徙在公元 2 世纪末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从公元 2 世纪中叶起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黑暗时期,与西域的关系直至公元 5 世纪也没有得到恢复。

匈奴人在蒙古的地位被鲜卑人所取代,鲜卑人很可能是一个起源 30 于通古斯人的民族。鲜卑统治者檀石槐(181 年)向西征服了直至乌孙人领地的所有土地。[2] 顺便提一下,属于另一个鲜卑王朝的统治者郁律在公元 4 世纪初征服了“古代乌孙人的土地”。[3] 从 4 世纪末到 6 世纪中叶,中亚的霸权掌握在柔然人手中,通常认为柔然人也是通古斯人。柔然人的侵袭迫使乌孙人最终从七河流域的平原地区迁往天山山区。[4]。425 年,一些西域统治者当然也有乌孙统治者都派使者来到了北部中国,当时统治北部中国的是鲜卑元魏或北魏王朝。这样,中国与西域诸民族的联系又得以恢复。436 年,中国使团来到了乌孙人那里,后来乌孙人每年都派贡使前往中国。此后我们在历史上再也没有见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乌孙人的名字。众所周知,乌孙的名称只保留在 31 大吉尔吉斯哥萨克汗国[5]的名称中(乌伊孙)[6]。

---

[1]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 108 页。

[2]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Ⅰ,第 169 页。

现代音译为 Тань-Ши-хуай。——Б. 加富罗夫

[3]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Ⅰ,第 193 页。

[4]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 162 页。

[5]哈萨克大玉兹。——Б. 加富罗夫

[6]乌孙的名称等同于后来哈萨克的乌伊孙的观点尚存在着争议。乌孙的名称也与吉尔吉斯的名称相近(带有很大的假定性)。参见阿里斯托夫《以世系谱传说、现存氏族划分、氏族标印以及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研究为基础,弄清大帐汗国吉尔吉斯哥萨克和卡拉吉尔吉斯人民族成分的尝试》以及《关于突厥诸部落、部族的部落组成及其人口情况札记》。阿里斯托夫认为叶尼塞吉尔吉斯部落大部分是由公元前 2 世纪向天山西部迁徙的乌孙人构成的,他甚至认为“乌孙人真正的民族名称是吉尔吉斯”。在阿里斯托夫未出版的著作《西部天山　乌孙人和吉尔吉斯人或卡拉吉尔吉斯人》中也阐述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类似观点,该著的手抄本保存在全苏地理协会档案馆。——B. 罗莫金

2 突厥人[1]

6 世纪在中亚产生了一个新的游牧帝国。来自阿尔泰山的新的征服者突厥人在短期内便征服了从太平洋到黑海的所有民族。帝国的创立者伊利可汗土门死于 553 年。佗钵可汗死(581 年)后,帝国分裂为两个国家——东突厥帝国和西突厥帝国。如同后来中亚西部的绝大多数游牧国家一样,西突厥帝国的中心位于从前乌孙人的领地,即七河流域。在七河流域的历史上,突厥人统治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游牧帝国的中心对各国的商人而言总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认为这里是自己的商品尤其是纺织品的有利销售场所,纺织品是他们从中国以及西亚运到游牧民族那里的主要商品。7 世纪费尔干纳发生了持续数十年的骚乱,这种状况促使由西亚通往中国的主要商路北移。旅行者们绕过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从撒马尔罕向东北进发,经塔什干和奥利耶阿塔[2]到达七河流域的楚河沿岸,又从这里沿伊塞克湖南岸经别迭里山口到达阿克苏。据我们所知,首次提到这条路线的是 7 世纪的佛教朝圣者玄奘和中国的《唐书》。《唐书》写于 11 世纪,但其中关于西域的史料全都是7世纪或8世纪的。我们在中国路线图中没有找到对经过七河流域路线的详细描述。但这些资料却能够使我们断定至少在 7 世纪时楚河谷地就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农业文明,这种文明是由来 32

---

〔1〕除了亚金夫神甫所搜集的中国历史文献(参见第一章)之外,我们在玄奘旅行记(茹利耶译本,第 1-2 卷)、这位朝圣者的传记(《玄奘传记》,茹利耶译本)以及拜占庭使者的叙述中(科尔普斯《拜占庭历史的记录者》,第一部分)也找到了关于这些突厥人的资料。我们在这里不谈论后者,因为使者虽然经过了七河流域,但并没有对其作任何记载。对突厥人的日常生活习俗拜占庭人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资料,关于拜占庭人的记载,在 Д. И. 伊洛瓦伊斯基的著作《关于罗斯起源的研究》中有详细的俄文译文。

也参见屈纳《中国通报》,第 182-194 页;沙畹《文件》;刘茂才《中国的通讯社》。比较《苏联历史概论(3—9 世纪)》,第 378-396 页。——Б. 斯塔维斯基

〔2〕现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江布尔市。——Б. 加富罗夫

自马维兰纳尔(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文明地区)的移民带来的,就像在现代史上这样的殖民地是由浩罕汗国的居民建立的一样。在玄奘西行时期,阿姆河和楚河之间的整个地区就其文明而言都是一个整体,各地居民的服饰、文字和语言都是一样的。大概是起源于叙利亚的字母由32个符号构成,书写的时候是从上往下写,已经有了历史著作。最流行的宗教可能是摩尼教。[1] 关于居民的外貌,说他们束发露出头顶,有一些人则完全剃发,用一块丝绸围住额头。居民有一半从事农业,另一半经商。贸易中心是“碎叶河(楚河)上的城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座城市在稍晚些时期的伊斯兰文献中被称为碎叶,并且记载说该城就坐落在卡斯捷克山口南面。7世纪在碎叶城中居住着来自各个国家的商人。在碎叶城以西有数十座城市,其中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立的互不依附的统治者,但所有的统治者都隶属于突厥人。

西突厥可汗[2]的斡耳朵通常就在碎叶城周围。玄奘在这里见到了一位可汗。[3] 可汗身着绿丝斗篷,头发披散,额头上像当地的定居居民一样盖着一块丝绸。这块丝绸长达10英尺,在头上缠了好几圈之后垂到前额上。与可汗不同,他所有的侍卫头发都编了起来。可汗住在一座大帐篷中,帐篷里有许多金质的物品。身着丝绸衣服的达官显贵分成两排坐在大帐的毛毡上,他们身后站立着可汗的侍卫。“虽然这是住在毡篷中的胡人国王,但仍然不能不怀着惊奇和尊重的心情看着他。”当唐僧来到离大帐30步远的时候,可汗出来迎接,向他鞠躬致意,可汗通过翻译问了他几个问题,并吩咐为他搬来一把铁椅。突厥人不使用木头座椅,玄奘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尊重火的缘故,他们似乎认为木头中包含有火。在大帐中还有来自中国和高昌(畏兀儿,现在的乌鲁木齐、吐鲁番和哈密地区)的使者。宴会在音乐声中开始了,虽然演奏的是不开化的音乐,但听起来还是“甚娱耳目乐心意”。客人们吃

33

[1]巴托尔德《论前蒙古时期突厥斯坦的基督教》,第3-5页。

[2]突厥封号,“汗”的称号就来自于这个词的缩写形式。在俄罗斯编年史遇到的可汗 каган 这种写法是正确的,已经为鄂尔浑碑铭所证实。伊斯兰作者通常将该词写成哈干 хакан。

[3]《玄奘传》,茹利耶译本,第55-58页。

肉饮酒，给唐僧端上来的是素食和牛奶。宴会之后唐僧应可汗之邀宣讲佛法，宣讲结束后可汗举手叩头并宣称自己对佛法欢喜信受。过了几日唐僧打算起程，可汗派了一位在长安城（西安府）居住多年精通汉语的少年相送。

在可汗沙钵罗·咥利失（634—638年）统治时期，西突厥人分为十姓，其中五姓在楚河以西，五姓在楚河以东。前者被称为弩失毕，后者被称为咄陆。此后西突厥人的帝国很快便分裂为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彼此以伊犁河为界。王室家族成员之间经常发生内讧，中国人对此进行了干预。有一些可汗曾一度成功地恢复了君主专制制度，如阿史那贺鲁在651年就是这样做的。657年，中国人在征服东突厥汗国之前25年征服了西突厥人，西突厥王公此后得到了中国封号成为中国的都督。[1] 突厥王公时而起来反对中国人，并与当时占领东突厥斯坦部分地区的吐蕃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704年，可汗阿史那怀道又重新使十姓突厥人臣服于自己，但自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史那昕在库兰城[2]被杀之后，西突厥王室的世系就中断了（约在740年）。

此前有一支咄陆人强大起来，这就是在楚河和伊犁河之间游牧的突骑施人。其王公的大斡耳朵位于碎叶城，小斡耳朵位于伊犁河畔。突骑施最强大的王公是苏禄（死于738年）。实际上他的强大甚至使西突厥王阿史那怀德黯然无光，阿史那怀德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苏禄。此外，苏禄还与东突厥可汗以及吐蕃统治者通婚。738年，他被一位封号为莫贺达干的突骑施王公杀死，王位由苏禄之子继承。但莫贺达干与费尔干纳和塔什干统治者结盟在碎叶城将其击溃并俘获。740年，莫贺达干成为突骑施统治者，他命令将最后一位西突厥可汗处死，然而他本人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很久。混乱时代到来了，748年，中国节度使王正见占领并彻底摧毁了碎叶城。在接下来的10年中，突骑施人的强

[1]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I，第360－361页。

[2]现锡尔河州塔尔特（卢科沃耶）站。比较卡拉乌尔《奥利耶阿塔县考古旅行》，第7页。

34 盛一去不复返。七河流域的西部开始依附于塔拉斯城,而塔拉斯城则依附于塔什干统治者。整个地区都遭受经常内讧之苦,从中国史家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种痛苦之巨:“这里的农夫穿着铠甲互相抓捕为奴。”[1]

西突厥帝国的分裂对阿拉伯人在马维兰纳尔的成功活动非常有利,所以阿拉伯编年史家大概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希吉拉历119年(公元737年)。根据阿拉伯人的说法[2],最后一位突厥可汗住在内瓦科特城(在楚河谷地,托克马克以东)。他在这里有围场和禁山,任何人都不得靠近他的围场和禁山。遇有军事行动,牧场上的牲畜和山里的野兽可以充当食粮。可汗曾极大地危害了阿拉伯人的利益,所以阿拉伯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阿布·穆扎希姆(本义为“撞人、顶人”,即公牛或象)。但在托哈利斯坦(阿姆河以南巴尔赫以东地区)的一次战斗中突厥人被阿拉伯人打败。在回国途中可汗被一个与他有私仇的突骑施王公库尔苏利杀死。此后突厥人四散逃命。已经到了垂暮之年的库尔苏利本人于739年在锡尔河畔被阿拉伯人俘获。他表示愿出1000匹马和1000峰骆驼为自己赎身,但阿拉伯总督纳斯尔仍命令将其处死。他的尸体被焚烧,以免突厥人把他的遗骸运回国。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说法,突厥人听到这一消息比听到库尔苏利的死讯还要难过。由于阿拉伯史料和中文史料都不完整,而且其可信性都令人怀疑,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不以阿拉伯记载与中文记
35 载相互接近这一点来说明问题为好。

---

[1] 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244-245页。

[2] 塔巴里《诸先知与诸王的历史》,第2卷,第1593-1613页,1689-1691页。

3　葛逻禄人[1]

中文史料、阿拉伯史料和波斯史料使我们有可能对西突厥帝国灭亡后突厥的部落集团有一个相当准确的了解。建立了帝国的部落除了被称为突厥人以外，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被通称为奥古兹人或托库兹-奥古兹人（本义为"九姓奥古兹人"），虽然中文史料把西突厥人划分为十姓。中国人把在东突厥斯坦最遥远地区建立了国家的沙陀突厥（本义为"草原突厥"）排除在西突厥帝国之外。[2] 在阿拉伯人那里正是这些突厥人被称为通古兹古兹人即托库兹-奥古兹人。另一支奥古兹人来到了西部，在那里建立了以锡尔河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国家。在奥古兹人的传说中还保留着曾在七河流域居住的记忆，根据这一传

---

[1]中文史料只对8世纪的事件进行了一些记载。关于9世纪和10世纪七河流域的状况，我们主要是在荷兰东方学家德·胡耶出版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作中找到的（《阿拉伯舆地丛书》，共8卷，第6卷，带有法语译文）。一些对中亚作过最详细记载的地理著作，如█哈尼的著作和伊本·█尔达德别赫的大部头著作都已经遗失。但波斯作者曾利用过他们的著作，如A.Г.图曼斯基在布哈拉发现的10世纪著作的佚名作者（新发现的波斯地理学家）和11世纪的历史学家加尔迪齐，我在拙著《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的附录中出版了加尔迪齐著作的一部分。

B.B.巴托尔德出版了《世界境域志》的影印本，内附引言和索引，1930年出版；这种史料的英译本中附有大量注释，由B.Ф.米诺尔斯基在1937年出版。其他包含8—10世纪中亚和七河流域历史状况的东方文字史料，参见本版第1卷书目索引。关于葛逻禄人向中亚迁徙及其他们定居状况的资料汇编，参见沙尼亚佐夫的文章《葛逻禄部落移民史论》。关于葛逻禄人以及与乌兹别克人民族起源问题相关的民族学资料，参见卡尔梅舍娃《论某些由乌兹别克人构成的古突厥部落》。——B.罗莫金

[2]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Ⅰ，第452页。

36 说,伊塞克湖畔就是亚费特之子——神话人物秋尔克的居住地。[1]

只有突骑施人留在了七河流域,他们分成两姓——托赫西人和阿齐人(这两个名称的读音令人怀疑,可能阿齐人就是鄂尔浑碑铭中提到的阿兹人)。8 世纪下半叶,七河流域的统治权转入葛逻禄人[2]手中,当时葛逻禄人的主体已经迁出了阿尔泰山(葛逻禄人中先进的一支还在世纪之初就来到了阿姆河畔)。766 年,葛逻禄人占领了碎叶城并把自己的都城迁到了此处,他们的国王称作贾护,无疑这一封号等同于在鄂尔浑碑铭中经常遇到的封号叶护。[3] 因此,在突厥帝国衰落之后,七河流域仍然属于突厥民族,既没有被阿拉伯人征服,也没有被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在 751 年被阿拉伯统帅济雅德 · 本 · 萨里赫打败后,便不再干涉西突厥斯坦事务。阿拉伯人也只限于在 8 世纪末把葛逻禄人赶出费尔干纳。据悉,穆斯林征服者在东北面从来也没有越过塔拉斯。

通过贸易往来得到和平传播的伊斯兰文明对突厥人命运的影响远远超过穆斯林武力征服成就的影响。马维兰纳尔的居民历来富有从事贸易活动的传统,早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他们就在中亚各地建立了贸易殖民地,甚至在东突厥斯坦最遥远的地区即托库兹-奥古兹人的地区也有粟特殖民地。[4] 根据 10 世纪波斯地理学家的说法,位于卡斯

---

[1]阿布尔哈齐《突厥世系》,杰梅宗版,Ⅱ,第 9 页;阿布尔哈齐《土库曼世系》,图曼斯基译本,第 9 页。

也参见 A. H. 科诺诺夫的新版《土库曼世系》,第 39 页。——Б. 加富罗夫

在 12 世纪的波斯著作《编年史集》中有这一传说的最古老版本,该著的唯一一部手抄本收藏在巴黎民族图书馆中,古代波斯的藏书,62,第 64 页。

现在已知还有两部手抄本,分别保存在伊斯坦布尔和海德堡;参见斯托利《波斯文学》,第 1 卷,第 2 部分,第 1229 页。《编年史集》的原文 1939 年由巴哈尔出版。参见参考文献索引。——Ю. 布列格利

[2]亦称卡尔鲁克人或哈尔鲁克人。——译者

[3]中国人用同一个词来表示这两个封号(关于这个词正确的读音,参见汤姆逊《奥尔科豪恩的铭文》,第 59 页)。

巴托尔德认为贾护和叶护这两个封号毫无疑问是相同的,他的依据包括《世界境域志》中的直接论述,参见第 17 页 6,其中说"古代哈尔鲁克人的钵谛沙赫被称作贾护,也称作叶护"。——B. 罗莫金

[4]《世界境域志》,第 17 页 a。

捷克山口以北的别克里格村或(按照另一种读音)别克里里格村,其粟特名称叫做塞梅克诺[1],从中可以看出粟特人在七河流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马维兰纳尔常见的各种宗教的传教士往往会追逐着商人的足迹,在这些传教士中就有聂斯托利派基督徒。穆斯林作者见证说,在突厥斯坦的许多城市中都有基督教堂。他们说在七河流域的游牧民族之一即居住在伊塞克湖附近的炽俟人中间就有基督教徒。[2]

穆斯林作者详细地描述了从西亚经七河流域到中国的商路,他们提到了这条商路上的一些城市,但绝大多数城市名称的读音令人怀疑。[3] 在比什凯克[4]附近,大致就在阿拉梅金村的位置上有一座朱利城(可能是突厥词丘利"草原"之意),来自阿赫西肯特(从纳曼干县经卡拉科尔山口[5])的道路与来自塔拉兹(塔拉斯,奥利耶阿塔)的道路在这里交会。内瓦科特或内维科特是楚河谷地最大的贸易城市,道路在这里分成两条,一条经炽利-阿雷克峡谷[6]通往伊塞克湖畔,另一条向北通往碎叶城。朱利和内瓦科特之间的距离为 15 法尔萨赫即约 90 俄里,所以内瓦科特应该位于通往卡拉布拉克的道路与楚河左岸道路的分离处。[7] 整个这一地区都属于葛逻禄人。伊塞克湖沿岸大部分是从葛逻禄人中分离出来的炽俟人的领地。在内瓦科特和峡谷之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贸易村镇克尔明科特(另一种读法库姆别尔科

---

[1]《世界境域志》,第 18 页 6。

[2]格里戈里耶夫《10 世纪阿拉伯旅行者及其漫游中亚》,第 27-28 页。关于炽俟人的住所,参见后面。

[3]关于这条路线,参见巴托尔德《1893—1894 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 30-32 页、114 页;以及巴托尔德《论前蒙古时期突厥斯坦的基督教》,第 15-17 页。

[4]现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伏龙芝城。关于比什凯克的详情,参见后面第 533 页,注释 36。——Б. 加富罗夫

[5]《世界境域志》,第 18 页。

[6]后来(至今)称作博阿姆峡谷(现代地图上就是这样写的,正确的写法是博奥姆峡谷)。由楚河谷地通往博阿姆峡谷的人口附近之地仍然被称为炽利-阿雷克。——B. 罗莫金

[7]约距朱利 90 公里的内瓦科特(纳维卡特)的位置,大概伯恩斯塔姆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该城位于奥尔洛夫卡村,这里保留着"一个大村落的遗址,其中大部分被现代建筑物所覆盖"。参见《楚河谷地》,第 19 页以及第 21 页、25 页。应补充说明的是在奥尔洛夫卡村有一座大山丘,这座大山丘可能就是某种独立的综合建筑物的遗址。其中提到内瓦科特(纳维卡特)名称的详细资料目录,参见利夫希茨《穆格山的粟特文书》,第 27-28 页,注释 48。——B. 罗莫金

特），这个村镇属于拉班姓葛逻禄人，统治者的尊号是库特勤拉班[1]。峡谷当时就叫炽利，历史学家加尔迪齐说这个词的意思是“狭窄的”。在峡谷以南12法尔萨赫的地方有一座城市叫做亚尔城，该城能提供3000名士兵，这里便是尊号为特克辛的炽俟统治者的都城，根据上面所指出的距离该城可能位于伊塞克湖南岸，因为湖在道路的左边。在距亚尔城5法尔萨赫的地方有一座托恩城，显然该城就位于同名的河谷中，现在这里规模庞大的遗址依然清晰可见。巴尔斯罕距托恩城有三天的路程，在这两座城市之间只能看到炽俟人的帐篷。大概在巴尔斯坎温河的名称之中保留着城市的名称。根据地理学家库达玛的说法，巴尔斯罕城由许多居民区构成，其中大的居民区有4个，小的有5个。统治者的尊号是马纳克，根据另一种史料[2]统治者的尊号是特宾－巴尔斯罕。该城可以提供6000人的军队。10世纪波斯地理学家认为巴尔斯罕马纳克可能出身于葛逻禄人，但后来居民们投靠了托库兹－奥古兹人。[3] 作为东西突厥斯坦之间贸易往来的中心，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突厥人世系谱的传说中突尔克的一个儿子就叫做巴尔斯罕。[4]

38

也有一条直道从费尔干纳的乌兹根德[5]经亚西（贾西）山口、阿尔帕谷地和卡拉科因河谷、阿特巴什河谷、纳伦河谷通往巴尔斯罕。[6]阿特巴什城（现在科绍伊－库尔干遗址）就坐落在卡拉科因河与阿特巴什河汇流处附近的山丘上，距费尔干纳、巴尔斯罕以及吐蕃领地（在东突厥斯坦）的边界距离相同（6天的路程）。道路在通往吐蕃境内时

---

〔1〕《编年史集》，第273页。拉班无疑不是突厥词，虽然《世界境域志》的作者说该姓是葛逻禄人。

可能是阿尔本。——B. 米诺尔斯基

〔2〕《编年史集》，第273页。

马纳夫？——B. 米诺尔斯基

〔3〕B. Ф. 米诺尔斯基认为对原文作这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他建议这样解释：“虽然德赫干是葛逻禄人，但居民们却与托库兹－奥古兹人和睦相处。”比较《世界境域志》，米诺尔斯基译本，第98页。米诺尔斯基《塔米姆行纪》，第297页。——B. 罗莫金

〔4〕《编年史集》，第61页。

〔5〕现在的乌兹根，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奥什州州府所在地。——Б. 加富罗夫

〔6〕关于这条道路，参见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41页及以下。

可能穿过了图鲁加尔特山口。在阿特巴什和巴尔斯罕之间没有任何村落。七河流域南部被样磨人占领(一支先进的托库兹－奥古兹人),喀什噶尔也属于他们。葛逻禄领地和样磨领地之间的界限是纳伦河。[1]

最后,从内瓦科特还有一条经碎叶城的弯路与巴尔斯罕相连。碎叶城位于楚河以北,在突骑施人的土地上,处于距内瓦科特3法尔萨赫的山脚下,大概就是今天的卡拉布拉克村。统治者是一位突厥汗的兄弟,但却带有雅利安人的封号亚兰沙赫,即"英雄之王"。该城能够派出一支20000人的军队。在通往碎叶城的路上还有一座城市——彭吉肯特,该城距内瓦科特有1法尔萨赫,这座城市能够派出8000人的军队。在碎叶城附近还有3个村落,其中每一个都有自己专门的统治者。(卡斯捷克)山口所穿过的山脉被突厥人视为圣山,按照他们的宗教信仰这里是神仙的所在地。在山口以北是别克里格或别克里里格城,根据一种资料的记载其统治者的封号为巴丹桑古,根据另一种资料的记载其统治者的封号为突厥封号伊难特勤。他有3000人的军队,此外城市还可派出7000人的军队。[2] 从碎叶城到巴尔斯罕的道路商队要走15天,突厥邮车要走3天。大概这里所说的是经卡斯捷克、韦尔内,沿外伊犁山脉北坡再穿过克孜勒基亚山口(在桑塔什山地上)到达卡拉科尔的道路。相对于沿伊塞克湖北岸从托克马克到卡拉科尔的距离而言,阿拉伯人所说的天数过多了。但在伊塞克湖北岸炽俟人领地与葛逻禄人领地的交界处,有一座大的商业城市西库利,大概该城就相当于伊塞克湖城,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伊塞克湖城在帖木儿时代还存在。[3]

在所有的突厥民族中受伊斯兰文明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葛逻禄人。关于葛逻禄贾护还在哈里发马赫迪(775—785年)时代就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记载[4]是令人怀疑的。但不管怎么说,公元10世纪在塔

[1]《世界境域志》,第9页6、17页a－17页6。

[2]《世界境域志》,第18页6;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125－126页;《编年史集》,第273页。

[3]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59－60页。

[4]雅库比《历史》,第2卷,第479页。

拉斯以东的一些城市中已经出现了大清真寺。[1] 文明的影响也表现在葛逻禄人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当中除了游牧和渔猎人口之外也出现了农耕人口。[2] 但葛逻禄人经常遭到其他突厥人的进攻，特别是遭受托库兹－奥古兹人[3]的进攻，他们是10世纪最强大的突厥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托库兹－奥古兹人及其他们的汗都信仰摩尼教，但他们中间也有基督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4] 我们看到从前属于葛逻禄人的巴尔斯罕城在公元10世纪已经掌握在托库兹－奥古兹人之手[5]，此外在谈到品丘尔城(读音可疑)或现在的阿克苏时说，该城位于葛逻禄人的领地中，但其统治者却依附于托库兹－奥古兹人，后来又被吉尔吉斯人征服。[6] 吉尔吉斯人当时住在叶尼塞河上游，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在公元8世纪时阿拉伯商队每三年携带丝绸从库车到他们那里去一次。贸易往来加强了吉尔吉斯人与阿拉伯人、葛逻禄人和吐蕃人之间的联系。[7] 可能此时的吉尔吉斯人是葛逻禄人反对托库兹－奥古兹人的同盟者，他们占据了七河流域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是他们现在的故乡。不管怎样，吉尔吉斯人主体向七河流域的迁徙要晚得多。如果吉尔吉斯人在哈拉汗王朝时代就居住在七河流域，那么他们无疑在公元10世纪或11世纪就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同时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他们在16世纪的时候还是异教徒。

40　最后，葛逻禄人领地的中心即楚河谷地落到了他们敌人的手中。940年前后一些“信仰异教的突厥人”占领了在11和12世纪发挥巨大作用的巴拉沙衮城。[8] 在10世纪的地理学家中只有马克迪西[9]谈到

---

〔1〕马克迪西《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第275页。

〔2〕《世界境域志》，第17页6。

〔3〕即天山东部的回鹘人。——B. 米诺尔斯基

〔4〕弗柳格尔《摩尼教》，第105－108页；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115页。

〔5〕按照米诺尔斯基的观点，巴托尔德的这一论断是建立在对《世界境域志》原文进行错误解释基础之上的。参见前面第38页、注释15。——B. 罗莫金

〔6〕《世界境域志》，第18页a。

〔7〕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Ⅰ，第449页。

〔8〕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35页。

〔9〕马克迪西《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第275页。

了该城,说它是“一座规模很大、人口众多并且富庶的城市”。在另一个地方[1]我力求证明巴拉沙衮位于楚河谷地。我们没有关于其地理位置的准确资料。这时占领了楚河谷地的民族很可能就是建立了哈拉汗王朝的那个民族,哈拉汗王朝还在10世纪的时候就把中亚的整个西半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我们马上就要介绍这个王朝的历史。 41

[1]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33页以下。H. A. 阿里斯托夫也持这种观点(《关于突厥诸部落、部族的部落组成及其人口情况札记》,第39页)。

4 哈拉汗王朝[1]

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哈拉汗王朝是哪一个突厥民族建立的,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民族是样磨人,他们的国王被称为博格拉汗[2],在哈拉汗王朝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封号。在此种情况下,新征服者这一次是从南面侵入楚河谷地的。哈拉汗王朝在楚河谷地很快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关于这一事件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一些神话传说。根据伊本·阿尔·阿西尔[3]所叙述的一则传说,最初皈依伊斯兰教的是沙布克(或萨图克)·卡拉哈坎,他梦见有一个人从天上来到他的身边,用突厥语告诉他:"为了在今生和来世拯救自己,请皈依伊斯兰教。"根据另

---

〔1〕这一术语是由格里戈里耶夫想出来的(参见《哈拉汗王朝》),我们觉得非常贴切。无论是格里戈里耶夫还是其他学者关于哈拉汗王朝的著述所依据的都主要是伊本·阿尔·阿西尔的著作,然则后者的记载远非总是能为更早也更熟悉情况的作者们的叙述所证实,包括乌特比(阿拉伯原文在东方出版[乌特比《亚米尼史》。——Б. 加富罗夫],我使用过亚洲博物馆一种极好的手抄本,第510号[新号码为第342页。——Б. 加富罗夫])、加尔迪齐(唯一的原稿保存在牛津[第二种手抄本在剑桥,参见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本版,第1卷,第66-67页。——В. 罗莫金])和贝哈基(莫尔列伊版[新版参见参考文献索引,后面第899页。——Б. 加富罗夫]),这3个人都是11世纪的作者。贾迈勒·卡尔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他于1282年把阿尔-贾乌哈里的词典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波斯语,并在14世纪头几年为词典写了"附录"(穆尔哈卡特),目前该附录已知的手抄本只有一种,保存在亚洲博物馆第430号a(原文见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册,第128-152页。——Б. 加富罗夫),这是К. Г. 扎列曼院士从В. П. 纳利夫金那里得到的。比较巴托尔德《论前蒙古时期突厥斯坦的基督教》,第21页以下。

有关哈拉汗王朝的新作,参见普利查克《哈拉汗王朝争端》;格里戈里耶夫《哈拉汗王朝》;达维多维奇《哈拉汗王朝年表和世系谱中的钱币学资料》,其中绝大部分文字史料被赛义德·纳菲西用于他出版的《贝哈基历史》(第3卷)的注释中。出版的其他史料和哈拉汗王朝的研究成果参见本版第1卷参考文献索引。——В. 罗莫金

〔2〕《编年史集》,第273页。

比较后面第553页,注释35。——Б. 加富罗夫

〔3〕伊本·阿尔·阿西尔《全史》,托恩伯格版,第11卷,第54页。

一种传说,这一传说的最古老版本在贾迈勒·卡尔希的著作中[1],在哈拉汗王朝中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是萨图克博格拉汗阿卜杜勒·克里姆,他死于344/955—956年。[2] 毫无疑问这两种传说指的都是同一个人,因为两位作者都说这位汗是伊列克(马维兰纳尔的征服者——纳斯尔的突厥封号)的曾祖父。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孙子哈伦在一位与他同时代的作者那里还被称为博格拉卡拉汗。[3] 42

哈伦的首都在巴拉沙衮,992年[4],他因病被迫从马维兰纳尔撤退,在归途中死去。征服马维兰纳尔的事业999年由伊列克纳斯尔完成。哈拉汗王朝进一步前进的步伐被伽色尼王朝苏丹马赫穆德(998—1030年)所阻断,马赫穆德征服了阿富汗、波斯东半部和印度的部分地区。如乌特比所描绘的那样[5],"宽脸盘、小眼睛、鼻子扁平、毛发(胡须)稀少、持铁剑、着黑衣"的突厥人1008年1月4日在巴尔赫附近被彻底打败,从此再也没有向阿姆河以外进军。[6]

哈拉汗帝国在11世纪初已经被划分成封地,各封地对帝国首脑的依附程度只取决于后者的个人品质。在分封制度下很快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内讧,尤其是在哈拉汗王朝的两个主要支系即萨图克博格拉汗的两个孙子阿里(纳斯尔的父亲)和哈伦的后裔之间发生了内讧。关于这一斗争的过程以及七河流域在各个时期处于哪一方之手,我们所拥有的资料非常匮乏,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根据乌特比的说法,伊列克仇视自己的兄弟——喀什噶尔的图甘汗,怀疑他与马赫穆德勾结。

---

[1]贾迈勒·卡尔希,第35－37页。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册,第130－132页。——Б.加富罗夫

[2]斜杠前面的年代是希吉拉历,后面的年代是公历。——译者

[3]萨里比《雅基马》,巴比埃·德·米纳尔译本摘录,第340页。

[4]加尔迪齐《论述的装饰》(牛津手抄本,第134页)和贝哈基《贝哈基历史》(莫尔列伊版,第234页)都是这样说的。伊本·阿尔·阿西尔《全史》(托恩伯格版,第9卷,第67－68页)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5]乌特比《亚米尼史》,亚洲博物馆手抄本,第99页。

[6]伊本·阿尔·阿西尔所说的410/1019—1020年的远征没有为其他史料所证实。

403/1012—1013 年伊列克死后汗位转入图甘汗之手。[1] 说图甘汗统治过马维兰纳尔这是令人怀疑的，但毫无疑问他统治过七河流域也可能统治过东突厥斯坦，博格拉汗哈伦之子卡德尔汗优素福逐渐把他从那里赶走。乌特比和伊本·阿尔·阿西尔称卡德尔汗是和田统治者。从钱币资料中[2]我们得知他于 404/1013—1014 年统治过莎车，43 405/1014—1015 年也统治过喀什噶尔。

408/1017—1018 年，七河流域遭到了来自遥远东方的游牧民族其中包括契丹人的入侵，契丹人当时占据着中国北部和中亚东部地区，众所周知契丹人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中国。当他们得到图甘汗率领大军迎战的消息时，距巴拉沙衮已经只有 8 天的路程了，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3] 他们撤退了，汗追击了 3 个月，最终追上并彻底打败了他们。

根据乌特比的说法，图甘汗在这次战役之后很快便死去了，他的兄弟阿尔斯兰汗继位。但从下面将要引用的贝哈基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图甘汗在七河流域一直统治到 1025 年。根据硬币资料，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本·阿里主要统治的是锡尔河流域的东北部地区，虽然在布哈拉也冲制了带有他名字的硬币。

1025 年，卡德尔汗优素福和苏丹马赫穆德同时打算进军马维兰纳尔，当时统治这里的是纳斯尔、图甘汗和阿尔斯兰汗的兄弟阿里特勤。哈拉汗王朝的首脑与苏丹在离撒马尔罕不远处会面，加尔迪齐对这次会面进行了详细的记载。[4] 两位君主之间的见面仪式安排得非常周密，精心遵循了双方完全平等的原则。需要指出的是，突厥汗比马赫穆

---

〔1〕伊本·阿尔·阿西尔利用最多的是乌特比的著作，根据伊本·阿尔·阿西尔的著作编写的哈拉汗王朝史最近是在 B. B. 拉德洛夫的《论回鹘人问题》中被叙述的，参见该书第 122－125 页。绰号为耶明·阿德·道利亚的马赫穆德在这里被错误地说成是萨曼王朝人。

〔2〕我利用的是还没有出版的皇家埃尔米塔日收藏的穆斯林货币目录，该目录由 A. K. 马尔科夫编写，他盛情地向我提供了这份目录。

石印本在 1896 年出版，参见马尔科夫《皇家埃尔米塔日的伊斯兰财产清单》。——Б. 加富罗夫

〔3〕他们的人数在伊斯兰史料中说法各异，数字显然也是非常可疑的。

〔4〕牛津手抄本，第 153 页。贝哈基也谈到了这次会面及其结果（《贝哈基历史》，莫尔列伊版，第 82 页、255 页、655 页）。

德更笃信伊斯兰教,他没有饮用呈递上来的酒。双方签订了条约,根据这一条约马赫穆德的女儿应嫁给卡德尔汗的次子亚甘特勤[1],而卡德尔汗的女儿也要嫁给马赫穆德的儿子穆罕默德。马赫穆德承担义务帮助亚甘特勤从阿里特勤手中夺取马维兰纳尔。后来马赫穆德以进军印度为借口拒绝履行这一义务,由此条约中所规定的婚姻并没有实现。阿里特勤继续占领着马维兰纳尔,但他的兄弟图甘汗被卡德尔汗的军队赶出了巴拉沙衮。

在卡德尔汗优素福死的那一年即1031或1032年[2],他的领地除了东突厥斯坦之外,还包括七河流域和锡尔河州东部地区的奥利耶阿塔县和奇姆肯特县,他的都城在喀什噶尔。东突厥斯坦和七河流域归他的长子博格拉特勤苏莱曼所有,他采用了阿尔斯兰汗的封号。次子亚甘特勤穆罕默德[3]开始统治塔拉斯(现在的奥利耶阿塔)和伊斯菲扎布(现在奇姆肯特附近的塞兰),他的封号为博格拉汗。兄弟二人都与伽色尼苏丹马赫穆德之子马苏德有往来。重新提到了从阿里特勤手中夺取马维兰纳尔并将其交给博格拉汗的计划[4],但这一次该计划也没有完成。还提到了[5]某个塞克曼统治者(?)(原文如此。——译者)列什科尔汗,塞克曼一词未必等同于塞梅克诺即别克里格城的粟特名称(参见前面第36页。指原文页码。——译者)。

阿尔斯兰汗和他兄弟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成了敌对关系。伊本·阿

44

---

〔1〕大概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突厥词亚甘即"大象"与博格拉(双峰骆驼)和阿尔斯兰(狮子)这些封号相似。

关于这些封号以及哈拉汗国家部落的图腾,参见普利查克《哈拉汗王朝争端》,第210–212页。——Ю.布列格利

〔2〕根据伊本·阿尔·阿西尔的说法(托恩伯格版,第9卷,第211页)他死于423/1032年,而贾迈勒·卡尔希(第37页)认为他死于希吉拉历424年斋月(从1032年12月7日开始)初。贝哈基在一个地方(莫尔列伊版,第89页)说,卡德尔汗在马苏德登上王位两年后死去,在另一个地方(莫尔列伊版,第656页)又说他在马苏德登上王位一年后死去。

〔3〕贝哈基《贝哈基历史》,莫尔列伊版,第525–526页,第655–656页。在伊本·阿尔·阿西尔那里有名字,但穆罕默德被错误地说成是马赫穆德(在硬币上以及奥菲那里有正确的读音,参见后面)。

〔4〕贝哈基《贝哈基历史》,莫尔列伊版,第418页。

〔5〕贝哈基《贝哈基历史》,莫尔列伊版,第660页。

尔·阿西尔在一个地方谈到阿尔斯兰汗在435/1043—1044年把自己的领地分封给了自己的亲属，他只为自己保留了喀什噶尔、巴拉沙衮和对其他领地的最高统治权。[1] 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分封制当时已经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很可能在那个时代由于阿尔斯兰汗的软弱，帝国首脑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威望。博格拉汗在1056年俘虏了阿尔斯兰汗并攫取了他的领地，但在15个月之后博格拉汗便被自己的妻子毒死。伊本·阿尔·阿西尔把博格拉汗死亡的时间说成是439/1047—1048年，但该说被这些事件的见证者贝哈基推翻[2]，根据贝哈基的说法，汗死于449/1057—1058年。他的死亡是由于他想传位给自己的长子恰格雷特勤侯赛因，而王后想把自己的幼子易卜拉欣扶上汗位引起的。后者当上了汗，但他很快便在与巴尔斯罕统治者伊难特勤的战争中死去了。此后喀什噶尔和巴拉沙衮在16年间(451—467/1059—1074年)由卡德尔汗的另一个儿子吐格利尔卡拉汗优素福和自己的兄弟博格拉汗哈伦共同统治。他们与马维兰纳尔统治者(第一位伊列克纳斯尔的孙子)舍姆斯·阿尔·穆里克·纳斯尔进行了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签署了和平协议，和约规定马维兰纳尔和突厥斯坦哈拉汗王朝领地之间的分界线为苦盏，可能就是锡尔河。

在吐格利尔汗死后，他的儿子吐格利尔特勤统治了两个月，此后博格拉汗哈伦又统治了喀什噶尔、巴拉沙衮以及和田29年(希吉拉历467—496年；公历1074—1102、1103年)。[3] 462/1069年，当这位博格拉汗还与自己的兄弟联合执政时，在喀什噶尔就有人为他写了一部醒世长诗《福乐智慧》，这是第一部突厥语文学作品，长诗的作者是巴拉

[1]比较巴托尔德《论前蒙古时期突厥斯坦的基督教》，第23页，这里提出应该读(伊本·阿尔·阿西尔《全史》，托恩伯格版。——Б.加富罗夫)第9卷第356页而不是第11卷第356页。

[2]莫尔列伊版，第230页。

[3]伊本·阿尔·阿西尔《全史》，托恩伯格版，第9卷，第211－213页。

沙衮人。[1]

1089 年，塞尔柱苏丹梅利克沙赫夺取了撒马尔罕并直抵乌兹根德。喀什噶尔汗（可能是哈伦）大概也承认自己是他的附庸。在梅利克沙赫离开后，撒马尔罕发生了由炽俟人构成的突厥雇佣兵的起义。炽俟人请来了阿特巴什统治者和喀什噶尔汗的兄弟阿古柏特勤。阿古柏占领了撒马尔罕，但在梅利克沙赫逼近时他又逃到了阿特巴什。在这里他兄弟的军队向他发动了进攻，阿特巴什遭到了喀什噶尔人的洗劫，阿古柏本人被俘。梅利克沙赫重新来到乌兹根德并要求汗交出阿古柏。汗迟迟没有履行这一违背他人格的要求。最后他派自己的儿子到梅利克沙赫那里去，命令他带上阿古柏，把他留在一座要塞中并弄瞎他的双眼。如果苏丹不满足于此，王子就要把阿古柏带到乌兹根德。这时喀什噶尔被另一位统治者伊难之子吐格利尔包围，吐格利尔的驻地距喀什噶尔 80 法尔萨赫（约 500 俄里）。大概吐格利尔是巴尔斯罕统治者和上面提到的伊难特勤之子。汗被俘虏，当这一消息传到他儿子及其随从那里时，阿古柏说服他们放了自己。梅利克沙赫与阿古柏签订了和约并撤出了乌兹根德，授权阿古柏与吐格利尔[2]继续进行战争。关于这场斗争的结局我们一无所知。可能哈伦逃了出来，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他又统治喀什噶尔到 12 世纪初。

在 1102 年也就是博格拉汗哈伦死去之后不久，巴拉沙衮和塔拉斯统治者卡德尔汗[3]吉布拉伊尔便发动了对马维兰纳尔的进攻，他是卡

---

[1]近期之前这部作品只有保存在维也纳的一种手抄本为人所知。万别里和拉德洛夫都根据该手抄本将这部作品公之于世。万别里的德文译本很不可信（莱比锡，1870 年），拉德洛夫版本是影印本（圣彼得堡，1870 年）和注音本（1891 年）。如今（1896 年。——Б. 加富罗夫）在开罗又发现了第二种手抄本。

后来在费尔干纳发现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种手抄本即著名的"纳曼干"本。关于手抄本、作品及其作者，参见瓦利托娃《巴拉沙衮人玉素甫及其"福乐智慧"》。原文的新版本，参见本版第 1 卷参考文献索引。——B. 罗莫金

[2]伊本·阿尔·阿西尔《全史》（托恩伯格版），第 10 卷，第 112 - 116 页。

[3]伊本·阿尔·阿西尔《全史》在一个地方（托恩伯格版，第 9 卷，第 213 页）称其为图甘汗。

拉汗奥马尔的儿子和博格拉汗穆罕默德的孙子。[1] 卡德尔的军队不46 仅由穆斯林构成，而且还由异教徒构成。他占领了直至阿姆河的整个地区，但在阿姆河畔他被塞尔柱苏丹桑贾尔击溃，他本人被俘遭到杀害。[2]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哈剌契丹[3]入侵前七河流域的任何资料。

至于哈拉汗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内史，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资料。作为突厥国家中最早的伊斯兰王朝，哈拉汗王朝无疑应该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在这个方面哈拉汗王朝的统治在中亚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伊本·阿尔·阿西尔[4]叙述说，在349/960年有一个突厥民族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人数为20万帐。这一记载无疑说的是七河流域或东突厥斯坦的居民，可能指的是前者，因为东突厥斯坦游牧人口的数量从来就不多。1043年秋天，在现在吉尔吉斯草原上[5]游牧的突厥人也成了穆斯林。根据伊本·阿尔·阿西尔的说法，这些突厥人有1万帐，他们夏天住在与保加利亚人毗邻之处，冬天则生活在巴拉沙衮附近。[6] 遗憾的是，历史学家没有谈及伊斯兰教与其他文明因素斗争的情况。东突厥斯坦总是处于中华文明的影响之下，一些哈拉汗统治者甚至马维兰纳尔的统治者在11世纪上半叶还采用了塔布加奇汗或塔姆加奇汗的称号，这一封号在8世纪的鄂尔浑碑铭中只用来称呼中国皇帝。我们在459/1067年以后哈拉汗王朝的硬币上遇到了马利克阿尔马什里克瓦辛（东方和中国皇帝）的尊号。[7] 类似的事实只能用中华文明和中国宫廷的影响力来解释。[8] 不用说中国本身，就是与中国以及与

---

[1]13世纪的作者奥菲是这样写的。

参见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卷，第84页。——Б. 加富罗夫

关于他著作的手稿，参见巴托尔德《伊斯兰新史料论俄罗斯人》，第262页（参见后面第805页。——Б. 加富罗夫）。

另一位作者说他是吐格利尔汗的孙子（纳尔沙西《布哈拉史》，雷科申译本，第22页）。

[2]伊本·阿尔·阿西尔《全史》（托恩伯格版），第10卷，第239页。

[3]即西辽，又称黑契丹。——译者

[4]伊本·阿尔·阿西尔《全史》（托恩伯格版），第8卷，第396页。

[5]即哈萨克草原。——Б. 加富罗夫

[6]巴托尔德《论前蒙古时期突厥斯坦的基督教》，第22页。

[7]拉德洛夫《论回鹘人问题》，第125页。

[8]类似的封号有时用来表示该统治者位于与非穆斯林交界之处。——В. 米诺尔斯基

乌鲁木齐城、吐鲁番城和哈密城交界的东突厥斯坦的部分地区大概也未曾成为哈拉汗帝国的组成部分，因为在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在15世纪之前并未获得统治地位。最后，哈拉汗王朝硬币上的文字证明，在他们的国家当中除了通用的伊斯兰(阿拉伯)字母外也使用维吾尔字母，即起源于叙利亚的字母，一般认为这种字母是由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带到中亚来的。在《福乐智慧》中也遇到一些与蒙古人所使用的名词相似的文明术语，毫无疑问这些术语是哈拉汗人和蒙古人从回鹘人那里借用来的。这一支突厥人定居在与中国相邻的东突厥斯坦地区，他们早 47 在公元5世纪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的，信仰基督教和佛教的回鹘人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是穆斯林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在中亚这种竞争可能从前就已经产生了，只是我们还没有 48 掌握有关的实际资料。

5 哈剌契丹[1]

在公元10世纪初契丹人创建了一个从太平洋一直延伸到贝加尔湖和天山的辽阔帝国，通常认为契丹人是由通古斯人与某些蒙古人混血产生的民族。[2] 王朝位于中国北部，中国史学家把这一王朝称作辽朝。由于其在中国的统治持续了很长时间，辽王朝受中华文明的影响要大于它之前的异族王朝。1125年，另一个通古斯民族——女真人与中国的南宋王朝联合结束了契丹人的统治。契丹人的残余在一位王族成员耶律大石的率领下西迁，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国家。

契丹人的迁徙分为两条路线：一部分人经过东突厥斯坦，但被喀什噶尔阿尔斯兰汗艾哈迈德打败，后者是塔布加奇汗哈桑之子、阿尔斯兰汗苏莱曼之孙。[3] 伊本·阿尔·阿西尔认为这场契丹首领战死的战役发生在522/1128年，实际上它可能是在晚几年以后发生的，因为在

49

---

〔1〕关于契丹人的东方帝国在B.П.瓦西里耶夫教授的著作《10到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与古迹》中作了最详细的阐述。我们在奥佩尔特（奥佩尔特《牧师约翰》，第132页）以及察恩克的著作中（察恩克《牧师约翰》）发现他们试图编写一种关于哈剌契丹帝国的资料汇编。15世纪的编纂者密尔宽德借用了13世纪历史学家志费尼的资料，志费尼对哈剌契丹的论述比其他穆斯林作者更为详细。密尔宽德的叙述又为奥佩尔特所引用。但我们发现在志费尼的叙述中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所以在利用时要十分小心才好。我采用的是帝国公共图书馆的两种手抄本（手抄本，Ⅳ，第2页、34页；手抄本，哈内科夫，第71页）。志费尼论哈剌契丹一章的法文译文刊登在道森的著作《蒙古历史》，第1卷，第441页以下。

新著参见维特福格尔、冯强盛《中国辽史》；关于契丹人也参见杜曼《拓跋魏和辽国及其与中国交往史概述》；拉德洛夫《契丹人》。在一些由于被翻译成欧洲语言而通用于学术界的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中国旅行家对契丹的记载，这些珍贵资料载于沙畹的著作中，参见沙畹《中国之旅》。——B.罗莫金

〔2〕伯希和认为契丹语就是"被强烈软化的蒙古语"（伯希和 *A Propos des Comans*，第14页）。现代日本学者认为，人们错误地把契丹人看做通古斯部落，现在还不能准确地判断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但有理由认为他们与蒙古人有关系（洪达、西德尔《日本对满洲研究贡献概述》，第87页）。关于所设想的契丹人与通古斯人的人种关系问题，参见扎尔金德《契丹人及其民族联系》；瓦西里耶夫《论契丹人和通古斯人问题》。——B.罗莫金。

〔3〕贾迈勒·卡尔希如是说（参见第四章）。

苏丹桑贾尔1133年7月写给巴格达政府的信中谈到了这场不久之前发生的战役。[1] 中文史料只是知道契丹人的这次迁徙，并把其与“西辽”帝国的形成联系起来。所以哈剌契丹国家的创立者是否真的就是中文史料中的耶律大石还是令人怀疑的。[2]

同时所有的伊斯兰史料都认为，巴拉沙衮汗是第一个臣服于契丹人的穆斯林统治者。根据伊本·阿尔·阿西尔的说法[3]，有一部分契丹人（人数为1.6万帐）还在阿尔斯兰汗（可能是苏莱曼）统治时期就迁到了七河流域。他们起初定居在中国与哈拉汗王朝领地的交界处，并负责保卫山道，为此拨给他们一些土地并给他们发放一定的薪酬。有一次他们拦截了一个富裕的商队，要求商人告诉自己哪里有好牧场，商人们把巴拉沙衮即七河流域指给他们。不知道16世纪的一位编纂者[4]是借用了哪一种史料中的记载，说这次迁徙发生在希吉拉历433年（1041—1042年），并说阿尔斯兰汗要求移民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完全服从汗的要求，所以汗决定让他们安定地生活。伊本·阿尔·阿西尔只是说，阿尔斯兰汗经常袭击他们，这使他们感到非常恐惧。在契丹人进攻七河流域的时候，移民们归附了自己的同族人并与他们一起征服了突厥斯坦。

根据志费尼的说法，契丹人或者阿拉伯作家所说的哈剌契丹人

---

[1]巴托尔德《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会论丛》，第10卷，第221页。

耶律大石是在1130年春侵入东突厥斯坦的，主要事件发生在1131年，无论如何应该是在1133年才在东突厥斯坦发动了成功的军事行动。参见维特福格尔、冯强盛《中国辽史》，第622页。——B.罗莫金

[2]现代作者不同意巴托尔德的这种怀疑态度，参见维特福格尔、冯强盛《中国辽史》，第621-622页。——B.罗莫金

[3]托恩伯格版，第11卷，第55-56页。

[4]纳尔沙西《布哈拉史》，舍费尔版，第234页。移民在这里被称为是来自西藏的迁徙者。文中谈到的并且舍费尔不能确定的16世纪的著作就是阿明·艾哈迈德·拉济的《世界历史》，这位作者16世纪末生活在波斯。

不是阿明·本·艾哈迈德·拉济，而是海达尔·拉济。比较后面第630页。——Ю.布列格利。

迄今为止只知道该著有一种手抄本，保存在柏林（佩尔奇目录第418号）。关于该著，比较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2册，第271页。舍费尔出版的文本与柏林手抄本的相应章节完全一致。

(黑契丹)经吉尔吉斯人的土地来到了叶密立并在这里建了一座城,该城在13世纪只剩下了遗址。可见,他们最初是迁到了现在的塔城地区。[50]其人数达到了4万帐。出身于哈拉汗王朝的巴拉沙衮统治者(没提到他的名字)号召他们来反对压迫他的突厥部落,即康格雷人和葛逻禄人。哈剌契丹人占据了巴拉沙衮并消灭了虚弱的统治者,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从叶尼塞河一直延伸到塔拉斯。此后他们又征服了康格雷人,使东突厥斯坦归附自己。1137年[1],他们在苦盏城下击溃了马维兰纳尔统治者马赫穆德汗,1141年,在卡特旺草原上(在撒马尔罕以北,位于石桥和亚内库尔干之间)他们彻底打败了塞尔柱苏丹桑贾尔的军队,并派出一支特别部队前往征服花剌子模。

这样,七河流域连同突厥斯坦边区都成为哈剌契丹帝国的组成部分。帝国首脑的尊号为古儿汗[2],根据穆斯林作者的解释这一封号的含义为"众汗之汗"[3]。从格里戈里耶夫开始,欧洲学者都认为这个词与蒙古词古儿干 гурган(女婿)相近。[4] 众所周知,后来这一封号被帖木儿及其继承人所采纳,哈剌契丹国王以这个封号来表示自己与东方辽王朝的亲缘关系。很难说,这种观点有多少依据,也很难说古儿汗和古儿干这两个词在形式上的差别是否能用哈剌契丹人语言的方言特点来解释。用伊本·阿尔·阿西尔的话来说,第一位古儿汗长得相貌堂堂,他身着中国丝制的服装,按照这个民族国王的习惯用一块布盖着脸。他信仰的是摩尼教。他在自己的臣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军队中他推行严明的纪律,严禁抢掠地方。在占领某个城市后,哈剌契丹人

[1]伊本·阿尔·阿西尔对马维兰纳尔的军事行动以及第一位古儿汗本人的论述最为详细(托恩伯格版,第11卷,第55-57页)。

[2]关于这一封号,参见拉施特·阿德金《史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版译本,第1卷,第2册,第109页注释1。也参见专著:芒日《哈剌契丹的封号》。——B.罗莫金

[3]正如现在人们所认为的那样,Gur的意思是"全体人的,全世界的"。——B.米诺尔斯基

[4]里特尔、格里戈里耶夫《自然地理学 直接与俄罗斯往来的亚洲诸国地理 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第1册,第398页。

格里戈里耶夫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B.米诺尔斯基

只限于从每户拿走一个第纳尔[1],也就是说他们从中国带来的了自古以来便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按户征税的政策。但士兵不会因为通奸(违反当地居民的家庭法)而受到惩罚。古儿汗不向自己的助手分封领地,也不把百人以上的骑兵交给任何人领导(当然除了短期征伐之外)。向古儿汗表示驯服的地方统治者大概要在腰带上别一块银片作为称臣的标记。这种诸侯的数量相当多。据我们所知,在古儿汗直接管理下的领地只有七河流域南部地区、伊宁边区和锡尔河州的东北部。古儿汗的大本营设在伊犁河以西的楚河河畔,大概距巴拉沙衮不远,叫做虎思斡耳朵[2](字面意思为"强有力的大帐")或虎托[3](字面意思"房子")。伊犁河以北的七河流域地区属于葛逻禄汗,位于科帕尔以西平原上的海押立城是他们的都城。[4] 哈拉汗王朝继续统治马维兰纳尔和东突厥斯坦。我们发现在古儿汗的国家中,至少后来存在着三级依附于帝国首脑的诸侯,就像蒙古统治俄罗斯时期一样[5]:葛逻禄汗像撒马尔罕汗一样,大概得容忍古儿汗在自己这里派驻常驻代表;其他诸侯像花剌子模沙赫一样只需在一定的时间内接待收税官;最后,还有一些诸侯像一度掌握了世俗权力的布哈拉宗教界领袖一样,获得了替哈剌契丹人收税的权力。[6]

伊本·阿尔·阿西尔说,第一位古儿汗死于1143年初。[7] 汗位由他的女儿继承,但他的女儿很快也死去了。统治权落到了她母亲——古儿汗的遗孀以及古儿汗的儿子穆罕默德手中。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古儿汗耶律夷列——帝国创立者之子继承汗位并由其母亲摄政

---

[1]这种金币的价值相当于13法郎(约等于4卢布50戈比)。比较 Kremer, *Culturgeschichte*, Bd I, S. 15。

[2]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36页。

[3]别克兰《世界书》,国家图书馆手抄本,第205-206页(关于这部著作,参见图曼斯基《外里海边区的古迹》,载《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会论丛》,第9卷,第302-303页)。

列宁格勒《世界书》手抄本影印件1960年由Ю. E. 博尔谢夫斯基出版,与巴黎手抄本比较有异文。——B. 罗莫金

[4]关于它的地理位置,参见斯密德特《红色旅行》,第44页。

[5]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的俄罗斯史》,第1册,第1157页以下。

[6]伊本·阿尔·阿西尔《全史》(托恩伯格版),Ⅻ,第170页。

[7]参见马尔克瓦尔特《克曼人》,第237页。——B. 米诺尔斯基

是在他妹妹执政之前，这一点已经为志费尼的叙述所证实，根据志费尼的说法，12 世纪 70 年代哈剌契丹国家的首脑是古儿汗的女儿。耶律夷列在自己领地内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居民的数量为 84500 户。[1] 显然，这只是在古儿汗直接辖地上的游牧人口的数量。契丹人把他的妹妹叫做普速完。一位 13 世纪初的伊斯兰作者[2]说她的尊号也是“众汗之汗”。根据志费尼的说法，在她执政时期实际统治者是她的丈夫。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女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并开始公开与情人同居。死者的父亲发动了起义，当一群造反者包围了宫殿时，女王出来当 52 着他们的面杀死了自己的情夫。这一举动挽救了她的性命。志费尼谈到古儿汗的遗孀时说，她和自己的情夫一起被造反者杀死。这里可能错误地把古儿汗的女儿说成是她的遗孀，志费尼在其哈剌契丹历史概论中没有提到这位女儿，虽然如我们看到的他在另一处又谈到了她的统治。普速完死后古儿汗耶律夷列的次子直鲁古继承汗位，志费尼说他杀死了自己的兄长。在一些伊斯兰史料中，最后一位古儿汗被称作马尼汗，在另一些史料中被称作库曼汗。[3]。

经常性的女人摄政，尤其是七河流域玛丽亚·斯图尔特的私生活大概削弱了汗的权威。穆斯林作者们的叙述促使我们认为，一些哈剌契丹王公大臣势力并不逊色于古儿汗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上面所描写的那种管理制度便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虽然还在自己从前的祖国就吸收了中华文明一切成果的哈剌契丹帝国因为实行这种管理制度而与其他游牧民族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别。正如志费尼所指出的，哈剌契丹的收税官与以前时代不同，他们残酷压榨人民。古儿汗特使的傲慢侮辱了诸侯，最后异教徒的统治又伤害了作为帝国绝大多数居民的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很难说古儿汗自己信奉哪一种宗教，也很难说第一位古儿汗是否像伊本·阿尔·阿西尔所说的那样是一位真正的

---

〔1〕奥佩尔特《牧师约翰》，第 145 页。

〔2〕拉文迪《塞尔柱王朝史》，舍费尔版本摘录，第 21 页、37 页（在此处以及在其他许多地方，舍费尔的译文有错误）。

〔3〕巴托尔德《论前蒙古时期突厥斯坦的基督教》，第 27 页。

驸马 Fu-ma——“女婿”？——B.米诺尔斯基

摩尼教徒，或者像奥佩尔特和察恩克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基督徒，他们认为第一位古儿汗相当于中世纪欧洲神话传说中的“圣约翰”。找不到任何可信的资料来说明后一种假设，甚至找不到更早的史料来证明15世纪编纂者们所说的最后一位古儿汗的女儿是基督徒的观点。伊斯兰教没有受到压制，穆斯林作者们赞扬最初几位古儿汗的公正及其对伊斯兰教的尊重。伊斯兰教只是丧失了统治宗教的地位并安于与其他宗教平等的地位，其他宗教同样也享有扩大教徒数量的自由。聂斯托利派主教伊利亚三世（1176—1190年）在喀什噶尔建立了总主教辖区，喀什噶尔总主教的尊称是“喀什噶尔和内瓦科特总主教”，也就是说七河流域南部地区也是喀什噶尔总主教辖区的组成部分。托克马克和比什凯克墓园的最古老的聂斯托利派陵墓就是哈剌契丹人统治时期的陵墓。[1] 基督教的成就以及所谈到的政治条件可能成为激发穆斯林宗教意识的原因之一，他们发动了一场中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伊斯兰教运动。

古儿汗大概从一开始就了解这场运动的所有危险性及其它所能达到的规模。该运动起始于和田统治者的起义。古儿汗立即对最亲近自己的穆斯林封侯葛逻禄阿尔斯兰汗产生了怀疑，并要求他派兵援助。古儿汗想以此来迫使他或者公开参加起义或者参加对穆斯林的战争。在后一种情况下古儿汗指望找个借口来摆脱危险的封侯。汗按照自己国王的要求去做了。他在哈剌契丹达官显贵中有一位朋友，名字叫沙穆尔·塔班古。他将古儿汗的打算告诉汗并补充说如果这些计划实现了，古儿汗就将诛灭他的全族。所以如果他珍视自己后代的未来，那他就应抢在古儿汗下手之前自己喝毒药自尽，这样的话他的汗位有可能传给他的儿子。阿尔斯兰汗找不到别的出路，于是采纳了这一忠告。沙穆尔·塔班古的确将他的儿子扶上了汗位，后者开始和古儿汗的代

---

[1]巴托尔德《论前蒙古时期突厥斯坦的基督教》，第26页、29页。

表共同统治海押立。[1]

在与发动叛乱的穆斯林封侯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哈剌契丹政府一开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只有当被成吉思汗赶出蒙古的一伙游牧民越过帝国的东部边界时局势才发生了变化。这一群游牧民的首领屈出律是最后一位乃蛮汗的儿子，乃蛮人是西蒙古部落中最强大的部落。根据一种说法，屈出律在到达七河流域后（1209 年前后）自愿来到古儿汗那里，根据另一种说法[2]，他是被哈剌契丹军队俘获的，但赢得了古儿汗的好感，古儿汗允许他把自己部落四散逃逸的队伍召集起来，他就利用这支队伍来反对自己的恩人。志费尼叙述说，屈出律似乎与发动起义的穆斯林统治者中最强大的花剌子模沙赫穆罕默德订立了条约，这一说法根本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根据这一条约，东突厥斯坦、伊宁边区和七河流域可能将归第一个打败古儿汗的人所有。历史学家涅谢维[3]非常了解花剌子模宫廷事务，并且他本人也认识一位穆罕默德派到屈出律那里的使者，而他只是说屈出律与葛逻禄阿尔斯兰汗之子马穆杜汗结成了同盟[4]，也就是利用了在七河流域发动叛乱的穆斯林的支持。屈出律抢劫了古儿汗存放在乌兹根德的金库，同时（1210 年）与撒马尔罕汗奥斯曼结盟的花剌子模沙赫向驻扎在塔拉斯附近伊拉米什平原的哈剌契丹军队发动了进攻。战争的结果未分胜负，因为双方军队的右翼都被击溃，但哈剌契丹人的首领塔延古·塔拉兹被穆斯林俘虏，他的军队可能撤退了。穆斯林取得的这次胜利被传闻夸大了，受此影响巴拉沙衮居民认为花剌子模沙赫很快就要到达了，所以将哈剌契丹人拒之门外。一位在古儿汗那里供职的富有穆斯林马赫穆德·巴伊劝他们驯服，但徒劳无益。在经过 16 天的围城之后，城被攻破并遭受

54

[1]据我们所知，志费尼这一特有的叙述（《世纪征服者史》手抄本，国家公共图书馆，Ⅳ，2，34，第 25 页［卡兹维尼版，第 1 卷，第 56 页。——Б. 加富罗夫］）迄今还没有为任何一位欧洲学者所引用。

[2]两种传说都为志费尼所引用。

[3]法国东方学家乌达出版了涅谢维著作的原文（PELOV，系列丛书之三，第 9 卷，巴黎，1891）和法文译本（PELOV，第 10 卷，巴黎，1895）（《苏丹贾拉勒丁史》，原文第 7 页，译文第 12 页。——Б. 加富罗夫）。

[4]涅谢维《苏丹贾拉勒丁史》，译文，第 12－13 页。

了3天的洗劫,近4.7万名穆斯林被杀。这样一来,七河流域穆斯林期待花剌子模沙赫帮助的愿望落空了。穆罕默德只限于在马维兰纳尔建立自己的政权。屈出律也在巴拉沙衮附近被哈剌契丹人打败。古儿汗的金库落到了哈剌契丹军队的手中。当古儿汗要求返还这些钱财时,在哈剌契丹人内部引发了军队起义,屈出律利用了这一起义,成为起义军队的首领。众叛亲离的古儿汗向自己的敌人投降。屈出律给了他形式上的尊重,为他保留了王位,他继续统治了两年直至死去。当然实权全都落到了屈出律手中。

这一切很可能发生在1212年。[1] 还在更早些时候,1211年,在七河流域北部就出现了忽必烈诺颜率领的蒙古军队,他是成吉思汗的统帅之一。葛逻禄阿尔斯兰汗(可能是上面提到的阿尔斯兰汗之子和马穆杜汗之兄弟)命令杀死哈剌契丹在海押立的总督并承认自己是成吉思汗的臣民。[2] 在伊斯兰教运动时期,伊宁边区形成了一块新的领地。原本为匪盗头子的穆斯林布扎尔[3],最终强大到了足以控制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阿尔马雷克,他在这里自称吐格利尔汗,也承认自己是成吉思汗的臣属。

55

蒙古人西进的步伐被1211年开始的与中国的战争延缓了,这场战争将蒙古人的兵力吸引到另一方,以至于屈出律能够在古儿汗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政权。首先他可能与伊斯兰教运动进行斗争,正如我们所知他先前曾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过这一运动。从宗教的观点来看,穆斯林几乎不可能安于屈出律的统治,正如不能安于古儿汗的统治一样。像大多数乃蛮人一样,屈出律最初是一个基督徒(聂斯托利派),但后来他娶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哈剌契丹女人,这位哈剌契丹女人

---

〔1〕屈出律在1211年就掌握了实权,古儿汗死于1213年。参见维特福格尔、冯强盛《中国辽史》,第652－653页。——B.罗莫金

〔2〕拉施特·阿德金《史集》,贝勒津版,第1卷,译文,第132页;第3卷,译文,第14页。

关于葛逻禄阿尔斯兰汗臣服成吉思汗,比较拉施特·阿德金《史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版译本,第1卷,第2册,第153页、163页。——Б.加富罗夫

〔3〕与布扎尔后裔关系密切的贾迈勒·卡尔希是这样写这个名字的。志费尼把这位汗称作是奥扎尔(比较巴托尔德《论前蒙古时期突厥斯坦的基督教》,第28－29页;这里对奥扎尔是穆斯林提出了质疑,这一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以前是古儿汗的新娘[1]，她把屈出律引上了偶像崇拜的道路（可能信奉了佛教）。此外，伊斯兰教运动的主要领袖花剌子模沙赫穆罕默德指责屈出律利用了花剌子模军队打败哈剌契丹人的胜利成果并剥夺了穆斯林的必然战果，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花剌子模沙赫派使团前往屈出律那里进行威胁，但这些威胁没有任何结果。[2] 花剌子模沙赫大概不仅把古儿汗帝国的东部地区留给了屈出律，而且甚至放弃了自己在锡尔河右岸的领地（除了某些要塞以外），他自己将这些地区抢掠一空，以免落到屈出律手中。

穆罕默德无力阻挠屈出律在东突厥斯坦建立政权的举动。屈出律并没有出兵征服这一地区，而是连续3年或4年在收获季节对这一地区进行抢劫。破产的居民最终表示臣服于他。由于穆斯林的顽强抵抗，胜利者采取了最坚决地反对伊斯兰教的措施，他要求穆斯林或者皈依基督教或者皈依佛教，或者至少表面上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并穿戴契丹服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采取了路易十四反对胡格诺派那样的措施，也就是实行士兵寄宿制。屈出律的士兵被逐门逐户地安置在穆斯林家中，并且对桀骜不驯者拥有最广泛的权利。公开的穆斯林礼拜仪式和传教活动被完全禁止。

屈出律在自己领地的东北部俘获了正在打猎的布扎尔。杀死自己的对手之后，屈出律的军队包围了阿尔马雷克，但大概由于蒙古人逼近又撤退了，蒙古人在1217年又重新开始西征。1218年哲别诺颜率军2万攻打屈出律。屈出律的军队从阿尔马雷克撤围后退。哲别派布扎尔之子苏克纳克特勤来到阿尔马雷克。抵达屈出律领地的边界后，蒙古统帅宣布每一个人都有权自由信奉自己父辈的宗教。这足以唤起穆斯林发动起义反对自己的宗教迫害者。屈出律试图在七河流域的一条山路上打击蒙古人，但却被击溃并逃往喀什噶尔。[3] 大概蒙古人未遇抵

56

[1]志费尼如是说（《世界征服者史》手抄本，国家公共图书馆，Ⅳ，2，34，第133页[卡兹维尼版，第1卷，第48页。——Б. 加富罗夫]）。贾迈勒·卡尔希也说屈出律是基督徒。

[2]涅谢维（《苏丹贾拉勒丁史》，译文，第13～15页）和伊本·阿尔·阿西尔《全史》（托恩伯格版，第12卷，第179页）都谈到了这些使团。

[3]关于这次战役，参见奥佩尔特《牧师约翰》，第160页（根据普兰诺·卡尔平尼的记载）。

抗便占领了巴拉沙衮,因为巴拉沙衮从他们那里得名戈巴雷克即完好的城市之意,蒙古人一般只把那些自愿投降的城市称作戈巴雷克。[1]在喀什噶尔穆斯林杀死了安置在他们家中的屈出律士兵,像迎接救星一样迎接蒙古人。由于蒙古军队纪律严明所以和平居民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屈出律逃往萨雷阔勒岭,他在那里被蒙古人追上杀死。[2] 57

---

〔1〕比较巴托尔德《论前蒙古时期突厥斯坦的基督教》,第29-30页。

库兹-巴雷克或古兹-巴雷克?——B.米诺尔斯基

〔2〕志费尼在叙述这些事件时引用了喀什噶尔居民的说法。贾迈勒·卡尔希也谈到屈出律逃到了萨雷阔勒岭。

根据志费尼的说法(卡兹维尼版,第1卷,第50页),屈出律是在巴达赫尚被杀的。——B.米诺尔斯基

比较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本版,第1卷,第470页注释3)。——Б.加富罗夫

6 察合台汗国解体之前的蒙古人[1]

我们看到，七河流域和东突厥斯坦是自愿臣服于蒙古人的，所以这些地区与契丹、马维兰纳尔和西亚不同，根本没有经受蒙古入侵之苦。在蒙古人到达之后的几年中，有一些旅行者[2]来到七河流域，在他们的笔下这里是一个文明繁荣的国家。1212 年，陪同成吉思汗西征的契丹大臣耶律楚材就是这样的旅行者之一。他在谈到阿尔马雷克时说，它下辖八九座其他的城市。这里瓜果遍地，居民像中国人一样种植所有的五谷杂粮。西辽的首都虎思斡耳朵位于伊犁河以西通往塔拉斯的路上，它下辖数十座城市。

1220 年女真皇帝的使者乌古孙受命西行拜见成吉思汗。根据他

---

[1]我在《1893—1894 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绪论中列出了蒙古史的主要史料。目前最好的参考资料仍然是前面提到的（参见第五章）道森的著作。道森主要叙述的是中国和波斯史，他很少论及中亚的蒙古人，但以后的著作就更少谈到中亚的蒙古人了。志费尼论察合台及其后裔一章的原文和法文译文，参见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捷夫列梅里版摘录。至于这一时期的中亚历史文献，除了前面提到的（第四章）贾迈勒·卡尔希的著作以外，流传到今天的只有某些保留在 15 世纪作者那里的摘录，包括：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的帖木儿史绪论（既没有被收人到珀蒂·德·拉·克鲁瓦的法文译本中，也没有被收人到 1887—1888 年的加尔各答版本中）；1426 年佚名作者编纂的蒙古人世系史（我使用的是巴黎手抄本古代波斯的藏书 67）；穆谢维 1414 年前后在波斯完成的《塔里希海拉特 Тарих-и хайрат》（手抄本保存在伦敦和牛津。我使用的是曾经收藏在亚洲博物馆的第三种手抄本｛实际上 B. B. 巴托尔德使用的是穆因·阿德金·纳坦济著作［所谓《伊斯坎杰尔的匿名著作》］的手抄本。——Ю. 布列格利｝），还有兀鲁伯的《四兀鲁思史》。最后一种著作只有最近编成的英文缩编本流传下来（参见《四兀鲁思史》，迈尔斯译本）。

在 B. B. 巴托尔德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研究这一时期七河流域历史的多卷本的成果。B. B. 巴托尔德文集第 1 卷第 5 章《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从整体上研究了成吉思汗死后最初几十年（1269 年前）的突厥斯坦史。在第 1 卷的参考文献索引中列出了一些与这一时期有关的新著作。在这些研究较晚时期察合台汗国历史的新著作中，参见斯特罗耶娃《15 世纪上半叶察合台国家游牧贵族与定居贵族的斗争》；马松《察合台汗国古钱学历史探讨》。——B. 罗莫金

[2]关于这些旅行家，参见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 1 卷，第 9－108 页。《长春真人西游记》，卡法罗夫译本。

的说法，哈剌契丹人当时剩下的已经不多，他们接受了回鹘的习俗和服饰。中国作者有时用回鹘这个术语来表示穆斯林，有时用来表示突厥人特别是畏兀儿人。此处，回鹘一词大概表示的是第一种含义。伊斯兰教势力的加强是上面所提到的伴随着蒙古征服而发生的局势演变的必然结果。七河流域的穆斯林大概比其他代表当地文明的基督徒更加好战。乌古孙把穆斯林回鹘的贪婪和残忍与那些居住在伊犁河地区的回鹘人的性情进行了对比，后者的性格比较柔弱，他们一般避免杀戮严守斋戒。

1221 年，中国道教隐士长春真人应成吉思汗之请前往西亚，他经新疆到达伊宁边区。蒙古政权的代表（达鲁花赤）与当地统治者一起治理阿尔马雷克。农民掘渠灌溉农田，头顶水罐取水。10 月 17 日，长春真人在距阿尔马雷克有 4 天路程的地方（可能离恰伦河口不远）乘船渡过伊犁河，在河的南面和山（博古特山）的北面有一座小城。穿过卡斯捷克山口之后，旅行者于月底来到一座穆斯林小城，这里下着一英尺厚的雪，但太阳出来后雪即融化了。11 月 1 日，旅行者过板桥渡过楚河，到达亚历山大岭。楚河和塔拉斯之间的地区从前是西辽所在地，这里的居民除了从事农耕外，还养蚕酿酒。果实与中国相同，疏河灌溉土地。在 1223 年返回时，长春真人在距阿尔马雷克 100 多里（30 俄里）的地方渡过楚河。他来到阿尔马雷克时，有人请他前往位于河以南的察合台的斡耳朵，但隐士因急于回家没有接受这一邀请。

长春真人的叙述表明，成吉思汗在世时他的儿子们已经得到了特殊封地。根据游牧民的观念，帝国是整个汗家族的私有财产，这个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获得这一私产的一部分。据此，成吉思汗还在他活着的时候便对自己的 3 个年长的儿子进行了分封，给每一个人一份封地（印朱），即一定数量的游牧斡耳朵（兀鲁思），后者有义务提供军队以及供养军队所需的足够土地（禹儿惕）。禹儿惕与禹儿惕之间只有一个大致的界限。最早受封的是他的长子术赤，他在 1207 年前后就从自己父亲手中得到了从色楞格河下游到额尔齐斯河之间的所谓“森

59

林民族”。[1] 拉施特·阿德金证实说，他的大斡耳朵位于额尔齐斯河畔。成吉思汗可能按照习俗的要求把自己领地最遥远的部分赐给了自己的长子，还预先把将要在西部征服的土地也划入他的封地之中。在成吉思汗死的那一年，七河流域北部、整个现在的吉尔吉斯草原[2]、花剌子模甚至马詹德兰都成了术赤禹儿惕的组成部分。察合台的禹儿惕从畏兀儿延伸到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从南阿尔泰延伸到阿姆河。窝阔台的大斡耳朵在塔尔巴哈台，叶密立河和霍博河畔，他的禹儿惕的范围并没有被标出来。[3] 小儿子拖雷没有得到封地，因为根据草原习俗，他应该继承父亲的军队和本土上的禹儿惕。被分封的3个儿子中每一个人都得到了4000名蒙古常备兵。当然除此之外，他们手中还掌握着大量的被征服民族的军队。

这样，我们看到虽然帝国幅员辽阔，但成吉思汗3个儿子的禹儿惕最初彼此之间离得很近。仅此一点已经表明，当时的封地并没有像后来的封地那样成为半独立的国家。分封给王室家族成员的土地可能只是他们的收入来源，并且这些土地仍然从属于帝国首脑当局。征服文明区域时所掠夺的财富并不交给一个王子作为私产（印朱），而是在所有王子之间进行分配。[4] 在被征服的城市中，手工业者便是这种收入的源泉，他们都由王子来处置，王子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把他们安置在哪一个城市中居住，并委派他们去做一些重要的工作。[5] 王子不能干涉税收事务，如同对整个定居居民的管理一样，这一事务由帝国首脑委派的特殊总督来管理，但这样的制度并没有坚持很久。在距帝国中心遥远的地区，大汗总督的权威不能与手中握有军队的当地王子的权威相媲美。所有的权力都逐渐转移到后者手中，帝国分裂为几个相互

---

[1]《长春真人西游记》，卡法罗夫译本，第132页。

[2]哈萨克草原。——Б. 加富罗夫

[3]志费尼对帝国领地的划分情况进行了最详细的论述（卡兹维尼版，第1卷，第31页。——Б. 加富罗夫）。

[4]最典型的例子见《元史》，比丘林译本，第260页。

[5]比较鲁布鲁克对德国武器工匠的叙述，这些工匠隶属于察合台王子布里，居住在塔拉斯。布里死后，大汗蒙哥把他们迁到了博洛塔尔谷地的普拉德城（斯密德特《红色旅行》，第34页、40页）。

彼此独立的国家。 60

在成吉思汗继承人窝阔台统治时期(1229—1241 年),帝国的统一还没有受到动摇。王室共治的原则在这一时期还被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在制定关乎整个帝国的措施时,每一个兀鲁思的首脑都要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帝国从每一个兀鲁思中指派一位王子出征。征服了新的地区之后,在大汗委任的总督那里驻有王子的全权代表。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根据王室成员之间的协议所颁布的决定[1]进行详细的研究,这些决定主要涉及赋税标准的确立、运送使者和急使所需邮路的设立以及为增加牧场的数量而对干旱草原进行灌溉(通过水井)方面的问题。

当然术赤的领地对帝国的依附性最小,术赤本人就流露出了竭力要求独立的倾向,只是由于他的死亡使他避免了与自己父亲之间的战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七河流域的部分地区也是术赤及其后裔领地的一部分。还在 1246 年,当普兰诺 · 卡尔平尼访问这一地区时,术赤长子斡儿答的大帐位于阿拉库尔湖附近。再往西一点,在前哈剌契丹人的土地上大概也包括七河流域,有术赤另一个儿子昔班的领地。[2]

成吉思汗的第二个儿子察合台作为王室中的长者和成吉思汗委派的札撒(蒙古习惯法)的维护者,在整个帝国享有极高的权威。察合台的夏宫位于伊犁河谷的库亚什(字义为“太阳”),与阿尔马雷克毗邻,就在科克山附近。冬天他在梅拉乌里克(或梅拉乌济克)-伊拉渡过,此地大概也位于伊犁河畔。察合台在库亚什附近建立了库特鲁格(幸

---

[1]比较道森《蒙古历史》,第 2 卷,第 63 页;《长春真人西游记》,卡法罗夫译本,第 158 - 159 页。

也比较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本版,第 1 卷,第 535 - 537 页。——B. 罗莫金

[2]普兰诺 · 卡尔平尼《蒙古史》,亚济科夫版,第 26 - 29 页。出版者错误地认为普兰诺 · 卡尔平尼所提到的湖就是贝加尔湖。

关于术赤长子的名字(斡儿答 Орда __斡儿都 Орду __* Орду),参见伯希和《黄金家族历史注释》,第 29 - 33 页;术赤第五个儿子的名字比较正确的读音是瑟般__希般 Сыбан __ Шибан(参见伯希和《黄金家族历史注释》,第 44 - 47 页,以及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 165 页)。——Ю. 布列格利

运)村。[1] 我们从长春真人的叙述中得知,察合台的斡耳朵在伊犁河的南面,大概他后裔的斡耳朵也位于此地,志费尼称其为乌鲁格-伊夫(或伊克)。贾迈勒·卡尔希把构成察合台领地主要部分的地区称为伊利-阿拉尔古(也会遇到形容词伊利-阿拉尔加维),其首位城市是阿尔马雷克。

察合台和中亚的穆斯林居民之间由于札撒而产生了经常性的冲突。像所有的萨满教徒一样,蒙古人推崇的是绝对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一视同仁地尊重所有宗教的僧侣,僧侣(除了犹太教的拉比之外)可以免纳任何捐税劳役。如果在帝国所有的宗教派别都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各宗教还不能和平共处的话,那么这仅仅是由于各宗教敌对派别代表彼此之间的竞争而引起的,他们都想方设法要把蒙古汗争取到自己一边,并在他们面前诋毁自己的竞争对手。在文明民族的代表中,除了少数例外,只有穆斯林(主要是塔吉克人)和回鹘人在自己祖国范围以外的管理中发挥了作用,并对大汗产生了影响。回鹘人一部分信仰基督教,一部分信仰佛教,他们是穆斯林最无情的敌人。[2] 各种宗教和文明代表之间的宗教敌对以及政治竞争在两派力量大致相当的中亚特别激烈。在伊宁边区东部,伊斯兰教当时还不是绝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3],此外在穆斯林地区以及七河流域还有大量的异教徒。比什凯克和托克马克的墓地表明在楚河谷地存在着聂斯托利教的村落。鲁布鲁克在1253年访问了一个位于七河流域北部的村落,该村落在海押立以北3法里(lieue)即13.5俄里处,这里的居民全部都是聂斯托利教徒,他们在这里拥有自己的教堂。[4] 最后在伊塞克湖畔的同名村落中,在14世纪的时候就有一座亚美尼亚修道院,据传这里保存着圣徒马太的圣骨。[5]

---

[1]比较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66页。

[2]比较拉德洛夫《论回鹘人问题》,第61页。

[3]比较《长春真人西游记》,卡法罗夫译本,第303页。

[4]斯密德特《红色旅行》,第45页。

[5]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60页。

察合台对基督徒予以庇护。马可·波罗[1]甚至引用过一个察合台自己也皈依了基督教的传说。另一方面,穆斯林也引起了他的不满,因为沙里亚[2]的一些规则与札撒的规定是不相符的。比如,在蒙古人那里是禁止进入流动的水中,这增加了穆斯林实施洗礼的难度。禁止割断死动物的咽喉也是这种情况。由此穆斯林作者认为察合台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在一首悼念察合台[3]的诗中写道:"那个所有人都因害怕他而不敢进入水中的人已经沉入(死亡的)大海。"一位同时代的人[4]证实说,没有人敢在察合台面前心平气和地说出某个穆斯林的名字。根据另一位后来作者[5]的说法,凡是有人把判处某个穆斯林死刑的消息告诉察合台,他都要奖给此人 1 巴雷什黄金(500 第纳尔,约 2000 卢布)。626/1229 年,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阿布·雅库布·优素福·塞卡基根据察合台的命令被处死,他的墓地在 16 世纪还位于特克斯河畔。[6] 62

但是我们知道在最接近察合台的人当中也有穆斯林。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是库特布·阿德金·哈巴什·阿米德,他大概出身于在蒙古帝国具有重要作用的穆斯林富商。历史学家瓦萨甫就赞美过他的富有。甚至统治王朝的代表都与他结亲。[7] 蒙古人自己把花剌子模沙赫穆罕默德的女儿嫁给了他,而另一个女儿则归察合台所有。[8] 穆斯林宗教界代表对哈巴什·阿米德的治理感到不满,著名的苏非主义者

[1]《马可·波罗游记》,尤尔版,第 1 卷,第 191 页;米纳耶夫译本,第 69 页。

[2]伊斯兰教法典。——译者

[3]志费尼引用的(卡兹维尼版,第 1 卷,第 228 页。——Б. 加富罗夫)。

[4]朱兹贾尼,拉维尔季译本,第 2 卷,第 1146 页。

[5]伊斯菲扎里,于 15 世纪末写成《赫拉特史》一书(我使用的是亚洲博物馆的手抄本,574agk[第 472 页。——Б. 加富罗夫])的作者。

伊斯菲扎里的著作于 1959—1960 年在德黑兰出版。——B. 罗莫金

[6]比较巴托尔德《1893—1894 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 71 - 72 页。贾迈勒·卡尔希说出了学者死亡的日期。

参见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本版,第 1 卷,第 542 - 544 页。——B. 罗莫金

[7]瓦萨甫《瓦萨甫史》(孟买版,第 288 页。——Б. 加富罗夫)(克尔曼的库特布·阿德金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哈巴什·阿米德)。

[8]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卡兹维尼版,第 2 卷,第 200 页。——Б. 加富罗夫)。

(神秘主义者)塞菲·阿德金·巴哈尔济在一首致全能大臣[1]的诗文中对那种偏重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轻视学识渊博生命圣洁的长者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总起来讲对世俗权力干涉宗教事务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他在诗文中写道:"当宫廷变成了敏拜楼(伊玛目的讲台)时,最好就根本不设敏拜楼。"

在察合台统治末期,有一名中国人在其宫廷中的地位得到提高,这名中国人最初在察合台的中国医生那里服务,后来在蒙古贵族霍舒克诺颜那里充当牧人。在这里他有机会展示自己对成吉思汗西征的扎实学识,他编写了一本关于成吉思汗西征的详细笔记。察合台非常欣赏他拥有这样的学识,于是把他叫到了自己身边。在察合台宫廷中见识过他的学识之后,窝阔台赐给了他维齐尔的名字。维齐尔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却睿智、勇敢、能言善辩,在会议上他比所有的人都敢于说话。有一次他呵斥察合台的妻子:"你是一个女人,此事对你无可奉告。"还有一次他自作主张处死了察合台的儿媳,被问及此事时他回答道:"怎么可以让你的儿媳胡作非为玷污(大汗家族)妻子的荣誉呢?"察合台只好对此不予追究。同时代人对维齐尔治理状况的看法可以从下面这些话当中看出来,这些话大概是他们对察合台说的:"为了你我不与任何一个人友好相处,你死后任何人也不会怜惜我。"[2]

察合台只比窝阔台多活了几个月,后者死于 1241 年 12 月。[3] 过分追求享乐但又宽厚仁爱的窝阔台善于缓和自己兄弟那种极端严厉的做法,也能缓解官员之间的倾轧,这些官员中的每一个人都试图弄死自己的竞争对手。他的继承人则完全处于这些倾轧的影响之下。一系列恶劣的事件和你死我活的争斗开始了,由于此"前往斡耳朵"常常意味着走向痛苦的死亡。不应该把这些可怕的事件仅仅归咎于蒙古人的野

[1]这首诗被收录在诗集中(布特哈涅),牛津图书馆(科德,艾略特 32)收藏了一本诗集。它的正文如同我在这里引用的其他未刊版本的正文一样,都将被收录到我的研究著作《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之中(参见《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 1 册,第 102 页,以及本版,第 1 卷,第 541 页。——Б. 加富罗夫)。

[2]拉施特·阿德金《史集》(布洛舍版,第 196 - 197 页。——Б. 加富罗夫)。

[3]贾迈勒·卡尔希认为他死于 642/1244—1245 年。

蛮。历史表明[1]，几乎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由文明民族代表之间的阴谋倾轧而引发的。蒙古人往往仅满足于出卖被判有罪的原告，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幸者的命运绝不比被蒙古人自己折磨致死者的命运好。

察合台在世时征得窝阔台的同意任命自己的孙子哈拉旭烈兀为继承人，察合台的遗孀也速伦和哈巴什·阿米德现在宣布这位王子为察合台兀鲁思的首脑。这样一来，哈巴什·阿米德在新的统治时期依然保持了自己的影响，这一新的统治时期是以处死没有治好察合台病的医生开始的，这些医生正是上面提到的维齐尔和穆斯林医生梅日德·阿德金。此外在哈拉旭烈兀的斡耳朵中，回鹘佛教徒、曾长期治理蒙古波斯领地的库尔库兹因发表了忤逆皇后也速伦的言论而被处死。

合汗（大汗）一位直至1246年仍然空着，这一年召开了忽里勒台（国会），会上宣布窝阔台的长子贵由为合汗。贵由接受的是基督教的教育，他像察合台一样仇恨伊斯兰教，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1246—1248年），基督徒在整个帝国占据了优势地位。在察合台兀鲁思，根据贵由的命令哈拉旭烈兀的统治被推翻了，与新合汗私人关系要好的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被推上汗位。根据拉施特·阿德金的说法，也速蒙哥嗜酒如命，以至于不仅不能处理国务，而且也不能处理自己斡耳朵的事务。他的妻子图卡希掌管一切。新汗登上王位导致了哈巴什·阿米德的失宠。 64

在察合台活着的时候，哈巴什·阿米德便派自己的一个儿子去照顾汗的每一个儿子，目的显然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自己及其家族的权势。他让自己的养子贝哈·阿德金·马尔吉纳尼去也速蒙哥身边。贝哈·阿德金·马尔吉纳尼是费尔干纳世袭的伊斯兰教艾尔谢赫之子，从其母亲的支系来看他出身于哈拉汗王朝。也速蒙哥因哈巴什·阿米德是哈拉旭烈兀的人所以仇视他，并且任命贝哈·阿德金为维齐尔取代了他的职位。贝哈·阿德金接受了这一委任，但却竭力减轻汗

〔1〕关于俄罗斯的历史，索洛维约夫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远古以来的俄罗斯史》，第1册，第833页）。

对哈巴什·阿米德的仇恨并挽救了他的性命。曾见过贝哈·阿德金本人的志费尼说他集宗教和世俗科学于一身,他的家是当时所有在世的杰出学者汇集的中心,在他那个时代伊斯兰科学重现了自身的价值。[1]

术赤兀鲁思的首脑拔都背弃了对贵由的誓言。1248年春,贵由率大军讨伐他。合汗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他宣称要前往自己的世袭斡耳朵叶密立河畔去恢复自己被弄坏了的身体。事先得知合汗意图的拔都自己也向东部派出了大军。但大军刚到距海押立还有7天路程的阿拉卡马克(在七河流域南部,阿拉套山附近)就得到了合汗死去的消息,于是拔都暂留阿拉卡马克,作为家族中的长者他为了解决帝位继承问题将其他王子召集到自己这里。大家都有义务服从拔都的决定,拔都选择了拖雷的长子蒙哥。这引起了窝阔台孙子们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自己的皇位继承权被剥夺了。察合台系王子绝大多数站在他们一边,也速蒙哥也包括在内。直到1251年才在喀拉和林召开了忽里勒台,会上蒙哥隆重地登上帝位。窝阔台的后裔及其支持者全副武装参加大会,打算发动有利于自己的起义。他们的图谋暴露了,未作抵抗便被扣留起来。77名达官显贵被处死。王子们被发送到遥远的地区,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在那里被秘密处死。也速仍在自己的斡耳朵,合汗派使臣到他那里向他声明说,如果他没有参与阴谋的话就立即到合汗的大帐宣誓效忠。根据贾迈勒·卡尔希的叙述,从一开始就站在蒙哥一边的哈拉旭烈兀,对自己的兄弟不里产生了影响,不里当时是察合台兀鲁思军队的首领。在也速到达蒙哥那里后,图卡希和不里立刻被扣押起来。图卡希被交给了哈拉旭烈兀,哈拉旭烈兀当着她丈夫的面对她进行了审判,命令用马蹄将她踩死。也速和不里被送到了拔都的斡耳朵,拔都处死了自己的宿敌不里,把也速放回了国,后来哈拉旭烈兀的

65

[1]比较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捷夫列梅里版摘录,第401－405页(卡兹维尼版,第1卷,第232页。——Б.加富罗夫)。

遗孀兀鲁忽乃[1]为报仇杀死了也速。[2] 蒙哥恢复了哈拉旭烈兀对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权，但他在前往自己禹儿惕的途中死去。也速蒙哥统治的崩溃使得哈巴什·阿米德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权势，哈拉旭烈兀命其说出贝哈·阿德金及其整个家族和全部财产，哈巴什·阿米德残暴地将自己的竞争对手处死。

为了彻底消灭自己的对手，蒙哥向西部派出大军，蒙哥的大军大概占领了喀拉和林与别失八里之间的辽阔地区，并与术赤系军队联合起来，术赤系军队驻扎在海押立和奥特拉尔之间的地区，由斡儿答之子和继承人洪吉兰(洪库兰)率领的术赤系军队联合起来。察合台兀鲁思所有涉嫌对发动阴谋者表示同情的军事首领都被处死了。

这样一来，帝国的统一这一次由于剪除了两个兀鲁思才得以维持，窝阔台时代由整个汗的家族进行统治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现在实行的双重政权统治。作为家族中的长者和蒙哥继承帝位的主要功臣，拔都的地位一点也不逊色于合汗本人的地位。蒙哥自己也对鲁布鲁克说："如阳光之普照四方，我的权力，还有拔都的权力，也及于四方。"[3]为了显示他与拔都之间的完全一致，合汗使用了下面的比喻："一个头颅上的两只眼睛，虽然是两个，但它们是一致的，一只眼睛把目光落在哪里，另一只眼睛也会把目光落向那里。"[4]合汗和拔都"势力范围"之间的界限在塔拉斯向东一点儿。鲁布鲁克甚至觉得在拔都的领地中大汗代表所受到的尊重比较小，而不是相反。[5] 这样，七河流域便归了合汗。直接管理察合台兀鲁思的任务交给了哈拉旭烈兀的遗孀兀鲁忽乃，在兀鲁忽乃时代哈巴什·阿米德及其儿子纳西尔·阿德金是权倾朝野的人物。根据瓦萨甫的说法[6]，兀鲁忽乃本人

---

[1]根据 B. Φ. 米诺尔斯基的观点，B. B. 巴托尔德所采用的兀鲁忽乃的写法是错误的，应该写作奥尔吉娜。——B. 罗莫金

[2]在道森那里(《蒙古历史》，第2卷，第257-271页)没有提到这些事件的细节，这些细节引自于志费尼的著作《世界征服者史》(卡兹维尼版，第2卷，第229-232页。——Б. 加富罗夫)。

[3]鲁布鲁克《鲁布鲁克东行记》，米舍里、拉伊特版，第307页。

[4]鲁布鲁克《鲁布鲁克东行记》，米舍里、拉伊特版，第361页。

[5]斯密德特《红色旅行》，第41页。

[6]瓦萨甫《瓦萨甫史》，哈梅尔版(原文，第29页。——Б. 加富罗夫)；译本，第30页。

信奉佛教,虽然她全力庇护伊斯兰教。贾迈勒·卡尔希说她是穆斯林。1254 年,她在阿尔马雷克接待了合汗的弟弟——率兵远征西亚的旭烈兀。旭烈兀的军队缓慢地穿过七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1255 年秋才抵达撒马尔罕。

在 1253 年 11 月经过七河流域的鲁布鲁克还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蒙哥统治时期该地区状况的一些记载。[1] 过伊犁河的时候,鲁布鲁克看见了被摧毁的带有黏土城墙的堡垒,废墟附近是耕地。稍远处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城市,居民都是讲波斯语的穆斯林。鲁布鲁克给这座城市起了一个拉丁名字额乞乌思 Equius。可能这座城市就是中文史料中经常提到的亦剌八里。1255 年初,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到这里的时候称之为亦兰八里。[2] 次日,鲁布鲁克穿过一段不长的山路来到了壮丽的平原上,平原上河流纵横,这些河流都发源于高山并汇入巴尔喀什湖。这里有一座小城海伊拉克(海押立),城中住着许多商人。起初在这个平原上有许多城市,但当时大部分城市都已经被鞑靼人摧毁了,优良的牧场把鞑靼人吸引到了这里。

这样一来,鲁布鲁克的叙述证明农耕文明有了某种程度的衰落,一部分从前的耕地变成了牧场。游牧的蒙古人占领七河流域北部的记载为志费尼的话所证实,他说合汗蒙哥把乌兹根德(而不是海押立)赐给了葛逻禄阿尔斯兰汗之子。

中国人常德也对伊犁河和楚河之间的七河流域的部分地区进行了描述,他是在 1259 年以合汗派往旭烈兀那里的使臣的身份路过这里的。他称这一地区为亦都,他说此地居民众多,但同时这里却遍布许多年代久远的土丘以及其他废墟。[3] 所以这里在 13 世纪大概就开始了那种导致七河流域定居文明逐渐消失的过程,众所周知这种定居文明只有到了 19 世纪才由萨尔特和俄罗斯移民重新恢复起来。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七河流域有上等的牧场,这些牧场总是能吸

---

[1]斯密德特《红色旅行》,第 42－45 页。

[2]巴托尔德《1893—1894 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 70 页。

[3]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 1 卷,第 129 页。

引游牧民族。

蒙哥死于1259年进军中国的途中。这一次的帝位之争在他的两个兄弟之间展开,1260年,蒙古帝国首次有两个候选人同时被宣布为合汗:在中国的军队宣誓效忠忽必烈;而蒙哥的幼弟阿里不哥在喀拉和林自立为合汗。察合台兀鲁思的女统治者站在阿里不哥一边。为了在察合台领地发动有利于自己的起义,忽必烈派不里之子阿比什卡王子前往那里。途中王子被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抓获并杀死。阿里不哥援引其兄长的做法派察合台的孙子拜答儿之子阿鲁忽西行。顺便提一下,根据拉施特·阿德金的说法,阿鲁忽可能还要关注由突厥斯坦向蒙古供应粮食的问题,因为忽必烈停止从中国运送粮食,首都出现了饥荒。

阿鲁忽在突厥斯坦进行了积极活动,但这并不有利于阿里不哥。他把察合台系的成员及其支持者都吸引到自己一边。我们看到为他服务的有哈巴什·阿米德之子苏莱曼·伯克。根据贾迈勒·卡尔希的说法,哈巴什·阿米德本人在1260年阿鲁忽统治之初便去世了。兀鲁忽乃去了阿里不哥那里。阿鲁忽把术赤系总督从察合台领地的西部地区赶了出去,并且甚至把像花剌子模和阿富汗北部这样一些从来也没有处于察合台家族统治下的地区都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很快他便与阿里不哥反目为仇,公开与他作对。阿里不哥当时已经被忽必烈的军队赶出蒙古撤退到叶尼塞河畔,但因中国局势混乱阻碍了忽必烈继续追击阿里不哥的行动,所以使阿里不哥能够反击阿鲁忽。1262年,阿鲁忽在塞兰湖附近击溃了阿里不哥的先头部队,但1263年春,他在伊犁河谷被打败,大概逃往东突厥斯坦。阿里不哥的军队驻扎在伊宁边区的过冬地。七河流域可能也被他们占领了,因为随阿里不哥前来的兀鲁忽乃是在阿特巴什附近的山中度过1263年的夏天的。[1]

阿里不哥的队伍在土地肥沃的伊犁河谷抢劫了大量的粮食,整个冬天都可以用小麦喂马。如此的掠夺使得这一地区发生了可怕的饥荒,也给军队本身带来了危害。1263年春,已经习惯于以小麦为饲料

〔1〕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45页。

的马匹开始生病，由于忍受不了吃牧草之苦而死去。在这种局势下，阿里不哥被自己的绝大部分军队长官所抛弃，他们不喜欢他的残暴行为。得知这一切之后，阿鲁忽向阿里不哥发起了进攻，阿里不哥派兀鲁忽乃到他那里，而自己则向忽必烈投降。兀鲁忽乃同意嫁给阿鲁忽。

忽必烈被承认是整个帝国的大汗，但这只是名义上的。波斯的旭烈兀，中亚的阿鲁忽以及术赤领地上的别儿哥（拔都之弟）实际上都是完全独立的国王，并且前两人与别儿哥公开决裂。别儿哥在中亚的同盟者是窝阔台的孙子海都。

根据他活动的成果以及穆斯林作者对他的评价来判断，海都是最杰出的蒙古统治者之一。但遗憾的是，对他的生平和执政情况我们所掌握的实际资料很少。根据贾迈勒·卡尔希的说法，他生于 1235 年前后，他的父亲合失在年轻时便死于酗酒，当时他的儿子还没有出生，所以海都是在合汗的斡耳朵中长大的。从母亲的支系来看他出身于一个起源不详的山地部落别克怜或梅克怜。拉施特·阿德金[1]谈到过别克怜人，说他们“不是蒙古人也不是回鹘人”。从外貌上看，海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真正的蒙古人。根据拉施特·阿德金的说法，他只留九绺白须。

在 1260—1264 年的混乱时期，海都在阿里不哥的军队当中。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之后，海都没有像他那样做，而是留在了中亚。他认为，他比忽必烈更有权成为帝国的主宰者，因为蒙古人中存在着一种传说，好像成吉思汗曾留下遗言：只要窝阔台还有一个后裔幸存，汗位就不能传给任何其他的人。海都没有从自己的祖父那里继承一支军队。[2] 他面临着为自己创立军事力量的任务，在这方面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从俗语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3] 海都集统治者的天赋和统帅的才干于一身，善于审时度势。他不因军

---

[1]拉施特·阿德金《史集》，贝勒津版，第 1 卷，译文，第 129 页。

[2]拉施特·阿德金《史集》，贝勒津版，第 3 卷，译文，第 146 页（布洛舍版，第 7－8 页。——Б. 加富罗夫）。

[3]瓦萨甫《瓦萨甫史》，哈梅尔版（原文，第 133 页。——Б. 加富罗夫）；译文，第 127 页。

队的利益而牺牲居民的利益，所以在他统治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酒徒的儿子和孙子与成吉思汗家族所有成员的区别大概就在于，他从来既不喝葡萄酒也不喝马奶酒。

首先海都把自己母亲的部落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别克怜人一直被视为是在山区作战的最好的士兵。此外，他还利用了阿鲁忽与别儿哥之间的战争，自告奋勇地为别儿哥效劳。别儿哥询问自己的占星术士，他们预言海都将有着远大的前程。在术赤系的帮助下，海都为自己开辟了一块不大的领地并击溃了阿鲁忽的一支军队。于是阿鲁忽派大军来攻打他，他在战斗中被打败[1]，但阿鲁忽的死却挽救了他。

阿鲁忽死于1265年底或1266年初。[2] 根据贾迈勒·卡尔希的叙述，1266年3月在阿亨格兰即安格连谷地宣布哈拉旭烈兀和兀鲁忽乃之子木八剌沙为察合台汗，他是察合台后裔中第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这样在中亚历史上首次发生了蒙古国王未经合汗任命便登上汗位的事件。忽必烈不能容忍此事，所以派察合台系的另一位王子——木八剌沙的堂兄弟八剌[3]前往突厥斯坦。八剌起初把忽必烈给他的汗诰藏了起来，以寻求避难和请求允许召集自己人的名义来到中亚。在征得木八剌沙的同意之后，八剌和他的兄弟来到了苏尔汉河谷自己世袭的禹儿惕。八剌逐渐把经常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的蒙古军队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在蒙古军队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时，木八剌沙总是站在居民一边。1266年9月，木八剌沙在苦盏附近被击溃沦为俘虏，之后八剌在乌兹根德自立为汗，并攫取了阿鲁忽和兀鲁忽乃的所

[1]只有密尔宽德谈到了这些事件(我们使用的是德黑兰石印版)(勒克瑙版，第5卷，第65页。——Б. 加富罗夫)。

[2]贾迈勒·卡尔希如是说(参见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册，第138页。——Б. 加富罗夫)；拉施特·阿德金的年表(布洛舍版，第188页。——Б. 加富罗夫)和瓦萨甫的年表(哈梅尔版，原文第29－30页；译文第30－31页。——Б. 加富罗夫)都是自相矛盾和不准确的。

[3]正确的写法是 Барак。。——Б. 加富罗夫

有财富。[1] 当合汗看到八剌不是自己手中驯服的工具时，便派军去讨伐他，在东突厥斯坦与合汗的战争中[2]他也成功地获得了这样的成就。

海都利用这些骚乱占据了七河流域和锡尔河州的东部地区。同时他与八剌之间也发生了冲突，海都维护的是深受八剌士兵抢劫之苦的居民的利益，而这些士兵进行抢劫活动是得到八剌同意的。根据一种说法（拉施特·阿德金引用了这一说法），1268年海都在术赤系首脑蒙哥帖木儿的帮助下在锡尔河打败了自己的对手，但他没有追击敌人而是建议他次年春天来参加忽里勒台和平解决问题。1269年春，在中亚的塔拉斯河畔召开了第一届忽里勒台。在海都的领导下，中亚的蒙古统治者在这里达成了协议。海都和八剌彼此互称安达——意为最亲密的友谊。明确地划分出八剌的亚伊拉克和基什拉克（夏季和冬季游牧地）。总起来讲，王子们保证生活在山区或草原，不占据耕地作为自己的牧场，除了合法的赋税和来自所属手工业者的进项之外，不得向居民收取任何其他的赋税。[3]

这样一来，在中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蒙古国，并且采取了保护居民利益的措施。关于这个国家首脑海都的住地，我们没有任何第一手资料。从他死后被葬在楚河和伊犁河之间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斡耳朵在七河流域。穆斯林作者称赞海都为人公正，称赞他给伊斯兰教以庇护。瓦萨甫[4]指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这就是海都虽然拥有一支优良的队伍，但却没有发动任何征服行动，而是只限于保卫自己的领地免受其他3个蒙古国家的觊觎。他在与后者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尤其是当他成功地在自己备受察合台王子内乱之苦的私人领地上恢复了秩序之后。八剌在1269年的忽里勒台召开之后并没有改变

[1]瓦萨甫《瓦萨甫史》，哈梅尔版（原文，第134页。——Б.加富罗夫）；译文，第128页。瓦萨甫写的日期是希吉拉历663年初，相当于1264年年底。——В.罗莫金

[2]拉施特·阿德金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论述（阿里扎杰版，原文第107－108页；阿伦茨译本，第70页；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版译本，第2卷，第13页、93页。——Б.加富罗夫）。

[3]比较道森《蒙古历史》，第3卷，第430－431页。

[4]《瓦萨甫史》，哈梅尔版（原文，第134页。——Б.加富罗夫）；译文，第128页。

自己的行为，有更多的居民在八剌死后（1271 年）到来的混乱中家破人亡，被海都扶持为兀鲁思首脑的最初几位察合台王子面对骚乱无能为力。只有当海都选拔了有才干的八剌之子都哇[1]（或杜哇）时（1282 年），局势才得以恢复。[2] 在海都继续统治的整个时期，都哇都是他忠实的同盟者，他参加了海都与其他蒙古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忽必烈军队的冲突主要是在蒙古发生的。对七河流域影响更大的是与术赤兀鲁思的冲突，主要是与以斡儿答的曾孙伯颜为首的术赤东支之间的冲突。这个所谓的“白帐”（根据其他史料——“蓝帐”）汗国的汗实际上是完全独立的，并不到金帐汗那里参加忽里勒台，虽然他们名义上承认自己是后者的臣民。伯颜的堂兄弟古卜鲁克发动了反对他的起义，并在海都和都哇的帮助下赶走了伯颜。伯颜求助于术赤系的首领脱脱（1290—1312 年），脱脱不能给他提供积极的支持，因为他自己也在忙于镇压军事首领诺盖的叛乱。但他给伯颜一道汗诰承认后者在斡儿答兀鲁思的统治地位并派使者到海都和都哇那里要求他们交出古卜鲁克。这一要求没有被履行。14 世纪伯颜与古卜鲁克及其同盟者海都和都哇的军队进行了战争。14 世纪的最初几年，他们之间发生了 18 场战役。[3] 13 世纪末伯颜派使者来到中国忽必烈的继承人铁木耳合汗的宫廷中，建议结成反对海都和都哇的联盟。他们筹划由脱脱和伯颜从西北、波斯统治者加赞汗从西南、巴达赫尚统治者从东南、中国皇帝从东部同时出兵打击他们。但铁木耳根据自己母亲的建议只是给了使者们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4]

海都按照成吉思汗的做法组建了由自己儿子领导的独立部队，晚年他将保卫自己国家边界地区安全的责任交付给他们。在与中国接壤

[1]根据瓦萨甫和蒙古文字的正字法，关于此参见道森《蒙古历史》，第 3 卷，第 588 页。

[2]贾迈勒·卡尔希如是说（希吉拉历 681 年），这已经为拉施特·阿德金和瓦萨甫的说法所证实（比较道森《蒙古历史》，第 3 卷，第 458 页），他们都谈到 674 年（1275—1276 年。——Б. 加富罗夫）被摧毁的布哈拉在 7 年后才重建。

[3]在介绍术赤家族的世系谱时拉施特·阿德金谈到了这些事件（布洛舍版，第 96 页。——Б. 加富罗夫）。

[4]比较道森《蒙古历史》，第 2 卷，第 515 页（拉施特·阿德金《史集》，布洛舍版，第 611 页。——Б. 加富罗夫）。

的边界地区由斡鲁思担任指挥；在与术赤系领地接壤的边界地区由拜克切儿担任指挥；在阿富汗由萨尔班担任指挥，那里的伊儿汗国的军队逐渐被海都和都哇的军队赶走。海都的长子和继承人察八儿在其父亲活着的时候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没有相应的资料。在楚河谷地当时有许多村落[1]，海都的女儿忽秃伦察加住在这里[2]。海都死后她负责守卫父亲的陵墓。勇敢顽强的少女亲自参加了父亲的南征北战，她不想嫁人。结果在民间流行着一种传闻，说海都对她的爱并不像父亲对女儿的爱，因此不想把她嫁给任何人。当时海都让她自己选择丈夫。虽然早先她曾向波斯加赞汗许诺只嫁给他，但公主现在却答应嫁给自己父亲的首席御前大臣，这位御前大臣是中国人。[3]

关于海都之死流传到今天的是一些相互矛盾的记载。根据拉施特·阿德金的说法，1303 年春，波斯得到消息说在海都和都哇的军队被合汗的军队打败之前不久，海都已经在一次战斗中死去，而都哇也受了重伤，并且从那时起就变成了一位不治的病人。贾迈勒·卡尔希是与这些事件同时代的中亚人，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海都死于 1301 年秋。这样看来，海都死亡的消息是一年半之后才从中亚东部传到波斯的。仅此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拉施特·阿德金所叙述的细节的可信程度。瓦萨甫所叙述的海都之死则是另外一种情形。[4] 根据他的说法，海都在与合汗军队作战时打败了后者，但后来他病了并吩咐自己的儿子斡鲁思把军队带到水源和马匹饲料充足的地方。在这次行军

---

〔1〕巴托尔德《1893—1894 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 37 页。

〔2〕亦称忽秃伦察合，参见拉施特·阿德金《史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版译本，第 2 卷，第 13 页、15 页。在半神话性质的叙述中记载了海都这位女儿的功绩，她"在鞑靼语中被称为阿吉牙尼惕，法语的意思是'明月'"，参见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米纳耶夫译本，第 315 - 317 页。——B. 罗莫金

〔3〕拉施特·阿德金《史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版译本，第 2 卷，第 15 - 16 页写道："忽秃伦察合成了豁罗剌思[部落]的某个阿卜塔忽勒的妻子。"在译文的注释中提到，某些手抄本和布洛舍版本都把阿卜塔忽勒说成是"中国人"。但正如 B. Ф. 米诺尔斯基所指出的，在布洛舍版本中只有 12 个沙赫西希丹，即"华北人"。——B. 罗莫金)。

〔4〕瓦萨甫《瓦萨甫史》(孟买版，第 450 页。——Б. 加富罗夫)。比较道森《蒙古历史》，第 2 卷，第 516 页以下。

过程中海都死去了。现在海都的主要战友都哇成了最有威望的人。瓦萨甫说，海都本人给斡鲁思留下遗嘱让他一切都服从都哇。都哇把王子们召集到海都的棺材前，说服他们承认当时并不在场的海都的长子察八儿为自己的国王，然后将海都的遗体运往他世袭的禹儿惕，埋葬在楚河和伊犁河之间的希夫雷克山上。[1] 察八儿采纳了海都的名字，根据贾迈勒·卡尔希的说法，他是1303年春天在叶密立隆重登上王位的。继位的时间之所以有所延后，大概是因为忽秃伦所属的实力派想扶持斡鲁思继位。在14世纪的最初几年，波斯流行着一些传闻，说海都之子之间的纷争已经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关于察八儿的性格我们了解得很少（根据拉施特·阿德金的描述，他的外貌像俄罗斯人或契尔克斯人）。他大概完全处于都哇的影响之下，都哇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活动几乎证明不了拉施特·阿德金关于他已经成为一个不治病人的说法。贾迈勒·卡尔希称都哇是察八儿政权的中流砥柱。海都死后所发生的骚乱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国家所面临的局势非常困难。脱脱重新提出了交出古卜鲁克的要求。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他派出了两万人前去帮助伯颜。根据拉施特·阿德金的叙述，1303年2月初，伯颜的使者来到了巴格达告知伯颜自己打算在这一年与合汗的军队联合起来攻打察八儿和都哇。海都在世时便把阻止这种同盟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拜克切儿和沙哈，以及合汗蒙哥之孙都达帖木儿和阿里不哥之子梅利克帖木儿。根据使者的说法，斡儿答兀鲁思的绝大部分掌握在伯颜手中，而不是古卜鲁克手中。但频繁的战争削弱了伯颜的军事力量，只有一部分士兵有马匹。可能，这些战争促使斡儿答兀鲁思的中心由13世纪中叶所处的七河流域北部迁往锡尔河下游。

那些年根据都哇的倡议产生了一种恢复蒙古帝国统一的想法，统一的方式是当时只能采取而且也有可能采取的形式，即联邦的形式。大概独立国家的首脑承担和平共处的义务，他们名义上承认合汗的最

〔1〕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38页。

高权威,在整个帝国都可以进行自由贸易。该计划首先向合汗提出,后
73 者完全赞成。1304 年 8 月[1],合汗的使者和察八儿、都哇的使者一起来到了波斯,在这里如同在术赤系的宫廷中一样,都哇没有遇到障碍便实现了自己的想法。签订了条约,但是由于中亚随之发生的事件[2],这一条约却没有得到履行。

1305 年,察八儿和某些察合台王子的军队在马维兰纳尔发生了冲突。察合台王子的军队被打败。都哇向察八儿派出了使者替"轻率的年轻人"道歉,用他的话来讲,这些轻率的年轻人是这场不幸事件的罪魁祸首,他建议通过仲裁法庭来解决所有的争端。这一建议被采纳了,双方都派出了中间人,他们大概齐集于塔什干。但是休战状态被王子们破坏了(其中不仅有察合台的后裔,而且有窝阔台的后裔),他们在乔克巴雷克对察八儿之弟沙哈的军队发动了进攻。沙哈看到敌人的数量庞大,便想突破他们的队伍并从后面向他们发起进攻。这时正在七河流域南部阿尔帕谷地过冬的都哇的军事首领却从另一面向他的军队发起突袭。沙哈率领残兵败将(7000 人)逃走,并和自己的兄弟拜克切儿会和。胜利者摧毁了沙哈在塔拉斯谷地的"金帐"并洗劫了附近的城市。察八儿此时在额尔齐斯河和阿尔泰山附近与合汗的军事统帅作战,是都哇说服他们采取了公开的敌对行动。由于自己军队和王子们的背叛,察八儿身边只剩了 300 名骑兵,他被迫向都哇投降,都哇亲切地接待了他并分给他一块特殊的禹儿惕。察八儿的兄弟也向胜利者表示归顺。察八儿的私人领地(印朱)被转给了拜克切儿。合汗贵由的曾孙秃苦灭得到了其曾祖的禹儿惕。海都的军队除了与梅利克帖木儿一起来到合汗那里的之外,都被分派给了秃苦灭、拜克切儿和沙哈。沙

---

[1]这一日期是由拉施特·阿德金不知名的继承人提出来的(对此人的考证,参见道森《蒙古历史》,第 1 卷,引言,第 42 页)。

B. B. 巴托尔德所说的"拉施特·阿德金不知名的继承人"指的是《史集》补写本的作者,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手抄本,D 66,页 425a－5096;大概此人就是哈菲济·阿卜鲁。——B. 罗莫金

[2]瓦萨甫对这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国家公共图书馆,手抄本,V,3、24[ПНС69。——Б. 加富罗夫],第 355 页及下一页);道森(《蒙古历史》,第 2 卷,第 519 页)对这些事件谈得很简单。

哈还被赐予了特殊的礼遇。

瓦萨甫指出，这些事件都是在同一年里发生的。他说都哇1307年死于瘫痪，而根据拉施特·阿德金继承人的说法他死于脑膜炎，他死亡的消息还在1306年的最后几天就已经传到了波斯。王子们把他的儿子宽督扶上王位，他被从巴里坤湖（实际上是巴尔斯库利，即"巴尔斯湖"）请回来，在阿尔马雷克附近的谢布昆巴拉登基。1308年他就死于尤尔都兹。[1] 他在位时王子们也发动了起义。在布里巴希（在帖木儿远征史中提到过这个地方[2]，位于锡尔河州东部或七河流域西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起义者起初占据了上风，但后来由于军队叛变又被击溃了，他们的首领、王子库尔谢比（窝阔台的后裔）在逃亡途中被杀。

74

现在不里（死于1251年）之孙塔里忽王子攫取了王位，他已经到了垂暮之年[3]，作为克尔曼公主之子，塔里忽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他的伊斯兰名字叫做希兹尔[4]。王子们对他过分袒护伊斯兰教的做法以及他所采取的反对都哇之子及其埃米尔的措施表示不满。很多人都认为都哇之子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站在他们一边的还有不里的另一个孙子乌留克以及察八儿的兄弟沙哈。根据传闻，他们的教唆者正是察八儿本人。当塔里忽召集王子们来参加集会（宴会），即忽里勒台时[5]，乌留克和沙哈拒绝前来并发动了起义。在战斗中乌留克及其儿子战死，沙哈被俘。塔里忽镇压其他起义者的军事行动也大获全胜。由于无力与汗进行公开的抗争，都哇儿子的支持者们便前来参加集会并筹划了一个杀死汗的阴谋。都哇之子怯别夜里带领300名骑手突袭汗的大帐杀死塔里忽。根据瓦萨甫的记载，此事发生于708/1308—

[1]在瓦萨甫那里没有这些记载（孟买版，第509－521页。——Б.加富罗夫）；我们是从拉施特·阿德金继承人的著作中借用这些史实的。

[2]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第2卷，第35页。

[3]瓦萨甫如是说（但可以比较拉施特·阿德金《史集》，布洛舍版，第165页。——B.米诺尔斯基）；从年代上看这不太可能。根据拉施特·阿德金最古老的手抄本，不考虑其他史料中的记载，很可能塔里忽的父亲不是不里之子，而是察合台本人之子。

[4]世系普史中引用的(《蒙古人世系史》。——B.米诺尔斯基)。

[5]关于在察合台系国家中召开集会的意义，参见伊本·巴图塔《伊本·巴图塔游记》，第3卷，第40页。

1309 年。蒙古世系普史的作者把塔里忽登上王位的时间说成是 709/1309—1310 年，把他死亡的时间说成是 710 年。

察合台兀鲁思的混乱局势唤起了察八儿重新恢复自己权力的希望。他与秃苦灭、拜克切儿和斡鲁思的儿子们联合起来进攻怯别，但却在伊犁河以南地区被击溃。察八儿征得秃苦灭的同意渡过伊犁河进入到他的领地，在这里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争执。察八儿打败了秃苦灭，洗劫了他的禹儿惕，之后向东走来到了合汗那里。秃苦灭在逃亡途中与怯别的军队遭遇，在战斗中被他们打死。国家深受内讧之苦，这些内讧也给农业和贸易带来了沉重的打击。[1] 怯别召集王子们来参加忽里

75 勒台（根据瓦萨甫的说法，在 709 年初），决定推举怯别的哥哥也先不花继承王位，当时他在东部合汗的领地上。海都的大部分领地现在都转移到了察合台系王子的手中，海都的儿子中只有沙哈得到了一份特殊的财产和一块特殊的禹儿惕。

也先不花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恢复了自己领地内部的安宁，但他统治时期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都遭到了失败，这不能不影响国家的福利发展。与冬季驻扎在霍博河畔、夏季驻扎在也孙木伦（额尔齐斯河支流之一）河畔的合汗军队边界卡伦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一场战争。[2] 战争期间，该卡伦长官将 3 个月里程的辽阔地域抢劫一空，而合汗的另一支军队则将 40 日里程的地域抢掠一空。合汗的军队甚至摧毁了也先不花本人的冬帐（在伊塞克湖附近）和夏帐（在塔拉斯附近）。也先不花最初试图与从 1312 年开始成为术赤兀鲁思首领的乌兹别克建立反对合汗的同盟，但未获成功。到了 1315 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才在共同敌

---

〔1〕瓦萨甫如是说（孟买版，第 519 页。——Б. 加富罗夫）。可能穆罕默德·海达尔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中所提到的废墟绝大多数属于这一时期（比较巴托尔德《1893—1894 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 17 页、38 页）。14 世纪上半叶的作者奥马里根据一位亲自到过这个国家的人的描述写道："突厥斯坦现在只能找到保存得或好一些或差一点儿的废墟。从远处可以看到建设得很好的村落，村落四周花草茂盛。但当你满怀可以遇到居民的希望走近村落时，你就会发现屋子里面空无一人。该地区所有的居民——游牧民根本不从事农业生产。"（奥马里，卡特尔梅尔译本节选，第 257－258 页）

〔2〕拉施特·阿德金的继承人谈到了这场战争，亚洲博物馆手抄本，a 566（D 66。——Б. 加富罗夫），第 473 页以下。

视波斯统治者乌尔柴都的基础上变得有些密切起来。[1] 在波斯由于牙撒吾儿王子的背叛，察合台军队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2]

历史学家没有说明也先不花死亡的年代，可能他死于 1318 年前后，因为根据硬币资料他的兄弟怯别在统治了 8 年之后死于 726/1326 年。曾于 1333 年到过中亚的阿拉伯旅行者伊本·巴图塔错误地把他死亡的时间说成是希吉拉历 721 年，他在这里听到了一些关于怯别的传闻。在这些传闻中，怯别被说成是一个主持正义的国君，他关心臣民的幸福并庇佑穆斯林，虽然他本人是萨满教徒。[3] 历史学家也指出怯别关注国家的福利发展。在这方面穆谢维把他与也先不花进行了对比。但怯别特别关注的几乎只是马维兰纳尔和阿富汗。他的都城纳赫舍卜从那时起得名卡尔希，即"宫殿"之意（怯别在距该城 2.5 法尔萨赫即 15 俄里的地方为自己建造了宫殿）。[4]

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怯别是寿终正寝的。伊本·巴图塔[5]则说他是被自己的兄弟塔尔麻失里[6]害死的。怯别死后塔尔麻失里登基 76 之前，是由都哇的另外两个儿子燕只吉台和笃来帖木儿进行短暂统治的时期。在燕只吉台统治时期，天主教开始在中亚顺利传播，在这里活动的是多明我会修士[7]福马·曼加佐拉。1329 年，福马回到阿维尼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派他携带一封给燕只吉台的信返回中亚担任撒马尔罕主教（因此，燕只吉台统治时期同怯别统治时期一样，在国家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马维兰纳尔），根据硬币资料判断，当时燕只吉台已经不在人世了。

笃来帖木儿在登上汗位之前可能是东部某一地区的诸侯。在中国编年史中记载说，1315 年他统治的地区遭受了旱灾，为了帮助他渡过

[1]道森《蒙古历史》，第 4 卷，第 574 页。
[2]道森《蒙古历史》，第 4 卷，第 563 页以下。
[3]伊本·巴图塔《伊本·巴图塔游记》，第 3 卷，第 31－32 页。
[4]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第 1 卷，第 95 页。
[5]《伊本·巴图塔游记》，第 3 卷，第 42 页。
[6]大概这是起源于梵语和佛教的名字——达摩神之意。——B. 米诺尔斯基
[7]莫斯海姆，第 110－111 页；附录，第 64 号。

灾荒,中国向他提供了财政援助。[1]

大概在1326年底登基的塔尔麻失里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得到了一个穆斯林名字阿拉·阿德金(伟大的信仰)。[2] 皈依伊斯兰教和忽视民族习俗又引起了蒙古人对他的反对。塔尔麻失里并没有召集王子们来参加从前每年都要举行的庆祝集会。他在阿富汗作战并率军进攻印度[3],但却完全忽视了自己国家的东部地区,在其统治的最后4年当中,他根本就没有到过阿尔马雷克和东部地区。上面所引用的关于木八剌沙和其他一些汗的资料表明,蒙古人之所以对那些极端痴迷穆斯林文明的汗表示不满,也与游牧居民与定居居民之间的经济斗争有关。1334年爆发了反对塔尔麻失里这位蒙古札撒破坏者的起义[4],起义的首领是笃来帖木儿汗之子不赞。据伊本·巴图塔证实(与谢里夫·阿德金和兀鲁伯的观点不同[5]),不赞也是一个穆斯林,但他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民族习俗。塔尔麻失里大概逃往自己国家的边疆加兹纳,但在途中被怯别汗之子——巴尔赫统治者仰吉抓获,他被交给不赞处死。

关于不赞,伊本·巴图塔说,他对臣民不公正,欺侮穆斯林,允许基督徒和犹太教徒重建自己的教堂。谢里夫·阿德金[6]和穆谢维说,他处决了许多王子和埃米尔。根据硬币判断,他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都哇的孙子、埃不该之子敞失在1334年就继承了他的汗位。敞失也不是伊斯兰教的追随者。穆谢维说他是佛教的庇护者。还在继位之前的1332年,敞失就与中国政府有联系。1332年,他把172名俄罗斯俘虏遣送到中国,为此得到了物质奖励。[7] 汗大概主要住在阿尔马雷克,

77

[1]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2卷,第14页。

[2]塔尔麻失里皈依伊斯兰教促进了与西亚贸易关系的大发展(奥马里,卡特尔梅尔译本节选,第238页)。

[3]对这次进军的叙述有些自相矛盾之处。参见马迪·胡森《穆罕默德·本·图胡拉奇的兴衰》,第100-107页。——B.米诺尔斯基

[4]伊本·巴图塔对这次起义及随后发生的事件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论述(《伊本·巴图塔游记》,第3卷,第39-43页和47-51页)。

[5]《四兀鲁思史》,迈斯尔译本,第371页。

[6]我使用的是亚洲博物馆手抄本,第568页(第393页。——Б.加富罗夫)(第167-168页)。

[7]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2卷,第81页。

在他统治时期天主教传到了这里。[1] 作为大主教被派往中国的圣芳济派修士尼古拉在敞失的宫廷中受到了款待，达官显贵卡拉斯莫和尤哈南(显然是聂斯托利派教徒)把位于阿尔马雷克附近的一座大庄园赠送给了教皇派来的主教，在此处建起了一座漂亮的教堂。我们看到，此后很快就有勃艮第主教理查、亚历山大修士方济各和雷蒙·鲁夫、西班牙牧师帕斯哈里斯、普罗旺斯信徒彼得兄弟以及亚历山大的劳伦斯来到了阿尔马雷克。他们治好了汗的病，因此获准为汗7岁的儿子施洗，他的教名是约翰。帕斯哈里斯在1338年用了5个月的时间从库尼亚乌尔根奇来到阿尔马雷克。他常常被迫停下来，因为当时这个国家发生了骚乱，在骚乱发生期间敞失被自己的兄弟杀死。根据穆谢维的记载，敞失死于夜间，杀人凶手不得而知。但帕斯哈里斯证实说杀死敞失的凶手是他的兄弟也孙帖木儿，这一说法为兀鲁伯的叙述所证实[2]，他说杀死敞失的凶手是他的兄弟也孙帖木儿。也孙帖木儿后来由于内疚而精神失常，他割掉母亲的双乳，因为是她劝说自己杀兄的。

根据聂斯托利教碑铭的记载，1338年和1339年在七河流域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鼠疫[3]，我们在帕斯哈里斯那里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记载，在历史文献中也没有提到此事。

也孙帖木儿的统治被窝阔台系王子阿里算端推翻，阿里算端是个穆斯林。在他统治时期对基督教徒进行了血腥迫害，伊斯兰平民也参与了这种迫害。已提到的所有天主教传教士都在1339年被残害致死。大概七河流域的聂斯托利派教徒也深受这次迫害之苦，尽管他们其中有些人担任重要的国家公职。[4] 可能阿里算端不仅仅肆无忌惮地迫害基督徒，穆斯林史学家也说他是一个残忍的暴君。宽督汗的孙子穆罕默德·普拉德取代了他，穆罕默德·普拉德则被牙撒吾儿之子合赞

[1]莫斯海姆，第114-115页；附录，第79-80页、92页。

[2]《四兀鲁思史》，迈斯尔译本，第372-373页。

[3]赫沃尔松《对"七河流域聂斯托利碑铭"铭文的补正》，第305页；查沃尔森《墓志铭》，第33页。

[4]赫沃尔松《对"七河流域聂斯托利碑铭"铭文的补正》，第307页；查沃尔森《墓志铭》，第53页。

78 所取代。

伊本·巴图塔没有提到这些汗中的任何一位。根据他的叙述,牙撒吾儿之子哈利尔在赫拉特国王梅利克·侯赛因的帮助下发动了反对不赞汗的起义。他的同盟者和维齐尔是铁尔梅兹人阿拉·阿尔·穆里克·胡达温德扎杰。在战斗中不赞被自己的士兵出卖给敌人并被绞死。哈利尔占领了马维兰纳尔并向阿尔马雷克进军。鞑靼人为自己选择了另外一位汗,他们反对哈利尔,但却被后者打败。哈利尔占领了阿尔马雷克,抵达中国边界并夺取了喀拉和林和别失八里。中国皇帝派军抵抗,但后来与他签订了和约。哈利尔把胡达温德扎杰和大部分军队留在阿尔马雷克,自己则返回了撒马尔罕。妒忌者成功地挑起了哈利尔对胡达温德扎杰的猜疑。哈利尔把自己的维齐尔召回,并在他返回后命令将其处死。此后哈利尔和梅利克·侯赛因之间发生了争端。哈利尔被打败并被交给赫拉特国王,后者赦免了他的死刑并赐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赡养费。当伊本·巴图塔在1347年春从印度返回经过赫拉特时,哈利尔仍然留在这里。

很难判断这一叙述中有多少真实性。根据这里叙述的事实,哈利尔与合赞并不是同一个人,在历史学家那里也并没有提到他,但743年和744年/1342—1344年带有他名字的硬币却保存了下来。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与侯赛因产生争端后又和好的人是打败合赞的突厥埃米尔加兹罕。

合赞试图恢复被内讧削弱了的汗政权的威望,他与突厥埃米尔进行了斗争,但他在这种斗争中并没有获胜。1347年他在与埃米尔加兹罕作战时阵亡。以后在马维兰纳尔的察合台汗都只是傀儡:实权完全

79 落到了突厥埃米尔手中。

7 蒙兀儿斯坦[1]

突厥埃米尔即穆斯林集团在西部的全胜，唤起国家东部的蒙古埃米尔扶持自己的汗登上王位。这些埃米尔中最强大的是播鲁只，他的领地与突厥埃米尔的领地直接相邻，现在这一地区被称为曼格兰苏别（字面意义“先锋区”），包括从喀什噶尔到库车的东突厥斯坦部分地区以及伊塞克湖以南的七河流域部分地区。

1348 年，埃米尔播鲁只把 18 岁的王子秃黑鲁帖木儿从伊宁边区经穆扎尔特山口带到阿克苏，宣称他是都哇的孙子并强迫所有的人承认他是汗。以前人们认为秃黑鲁帖木儿是一位蒙古埃米尔的儿子，现在则宣称他的母亲嫁给了都哇之子叶密立火者，王子死后，怀孕的王妃在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家中生下了秃黑鲁帖木儿。因此他被视为是后者的儿子。[2] 关于播鲁只如何找到了汗家族这一支脉的问题，还有另外 80

[1]关于这一时期的主要史料是穆罕默德·海达尔·杜格拉特的著作《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该著完成于 16 世纪中叶，不久前出版了英文译本。在 B. B. 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的著作《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二册中可以找到这一著作的大量俄文摘录。巴卑尔（我们引用的是莱顿、奥斯金所编译的他的《札记》的英文译本）和帖木儿及帖木儿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穆谢维、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哈菲济·阿卜鲁（牛津大学手抄本弗利泽书 115 页和艾略特书 422 页）以及撒马尔罕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圣彼得堡大学手抄本第 157 号）的著作都对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记载作了实质性补正。最后一种著作的某些内容是由卡特尔梅尔在法文译本中（也有一部分是原文）公布的（引言和摘录，第 14 卷，第 1 部分）。最后，还有布列特施奈德博士在《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中引用的中文史料。

能够取代 B. B. 巴托尔德在《七河流域历史概论》这一篇中对蒙兀儿斯坦史所作概述的新的研究成果，无论在 B. B. 巴托尔德在世时还是在他离世后都没有出现。但他所利用的史料中有许多已经被再版和研究。关于《巴卑尔回忆录》的新版本和译本参见本版第 1 卷书目索引，关于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哈菲济·阿卜鲁和阿卜杜勒·拉扎克著作原文的出版情况也参见那里。巴托尔德在这里没有提到的历史学家尼扎姆·阿德金·沙米的著作《帖木儿武功记》也出版了（参见托尔堡版，1937—1956）。——B. 罗莫金

[2]世系普史中如是说（参见第五章）（《蒙古人世系史》。——B. 米诺尔斯基）。

一种传说。[1]

这样一来,被蒙古人扶上汗位的王子身份的真实性就显得尤其可疑,但是这一人选却非常恰当。秃黑鲁帖木儿在1360年甚至使突厥埃米尔臣服于自己。只是在764/1362—1363年他死后他儿子也里牙思火者的军队才被赶出马维兰纳尔。秃黑鲁帖木儿被埋葬在阿尔马雷克,他的陵墓距阿利姆图8俄里,距塔兰赤[2]村落霍林麻札有1俄里,一直保存到今天。[3]

播鲁只和秃黑鲁帖木儿所创立的国家,除了包括自古以来都是文明地区的东突厥斯坦以外,还包括被游牧民族所占据的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分别延伸了七八个月路程的辽阔地区[4],也就是从额尔齐斯河和叶密立河到天山以及从巴里坤湖到费尔干纳和巴尔喀什湖的辽阔地区。巴尔喀什湖又叫库克恰坚金兹,被认为是蒙兀儿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即术赤领地之间的边界。很难说,这个国家在人种方面与前察合台领地的西部有多大的区别,也就是很难说这里的蒙古人在多大程度上受了突厥成分的影响。在日常生活方面,游牧的东部与定居的穆斯林西部之间无论如何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即使是帖木儿也不能重新恢复察合台国家的统一。人民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文明的反感远远超过其统治者。秃黑鲁帖木儿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的后继者都带有穆斯林名字,而同时他们的臣民则大部分仍然是异教徒,只有到了15世纪下半叶他们的西部邻居才认为有可能承认他们是穆斯林。[5] 在帖木儿国家和帖木儿帝国,人们用一个骂人的词詹捷[6](强

---

[1]穆罕默德·海达尔(第6页)和巴卑尔(莱顿、奥斯金译本,第2卷)称秃黑鲁帖木儿是也先不花汗之子,当然从年代上看是不可能的。

[2]塔兰赤人——革命前人们这样称呼19世纪80年代从伊犁边区迁徙到七河流域的维吾尔人。——B.罗莫金

[3]参见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65页。

[4]对这一地区的描述,参见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360页以下。

[5]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56页。

[6]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绪论,第75页。

盗)[1]来称呼蒙兀儿斯坦居民。“詹捷的国家”这一术语经常被历史学家用来表示蒙兀儿斯坦。

播鲁只死在秃黑鲁帖木儿之前。他的幼子忽歹达成为继承人。播鲁只的兄弟哈马儿丁反对秃黑鲁帖木儿的继承人也里牙思火者,也里牙思被杀。他统治的时间很短,以至于在蒙古传说中根本没有提到他的名字。[2] 哈马儿丁控制了政局并竭力铲除秃黑鲁帖木儿的所有亲属。这时征服了西察合台国家的埃米尔帖木儿利用这一混乱时期,发动了几次对蒙兀儿斯坦的征讨。根据穆谢维的说法,帖木儿还在772/1370—1371年就到达了科奇卡尔河。1375年初[3],他从塞兰抵达恰伦河。哈马儿丁的大营位于柯克捷佩山,他撤退到难以接近的别尔克伊古里扬[4]地区,该地由3条狭窄的峡谷构成,有3条大河流经此处。但是帖木儿在这里追上了他并将其击溃,之后帖木儿来到拜塔克,3位埃米尔都按照他的吩咐沿伊犁河追杀敌人。帖木儿在拜塔克逗留了53天,他的儿子只罕杰儿此时在山区追击哈马儿丁并在乌奇费尔曼(在东突厥斯坦)打败了蒙古军队。他抓获了哈马儿丁的妻子和女儿。帖木儿从拜塔克经卡拉卡斯马克山口(卡斯捷克)来到了阿特巴什,又从阿特巴什来到了阿尔帕谷地,在此处与哈马儿丁的女儿举行了婚礼,之后经亚西(贾西)山口返回乌兹根德。

〔1〕后来B. B. 巴托尔德对詹捷这一蒙古术语作了略有不同的另一种解释:意思是“流民”。比较突厥术语哥萨克。参见后面第154页和265页。也比较彼得鲁舍夫斯基《13—14世纪伊朗的农业和土地关系》,第42页注释9。——B. 罗莫金

〔2〕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23页。

〔3〕关于这次远征,参见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第1卷,第252页以下。在帖木儿远征史中提到的某些地区名称的读音远非处处都真实可靠,虽然除了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以外,我也使用了铅印版(加尔各答版)原本和亚洲博物馆的三卷手抄本原本,《胜利之书》的突厥译本(根据我收藏的手抄本)和《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译本。

〔4〕在突厥手抄本中写的是别尔克伊库兹干;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的突厥译本中(参见穆罕默德·海达尔,第41页)写的是阿尔沙尔阿塔尔。在列纳特的地图上(关于该地图参见后面卡尔梅克人一章)有两条在恰伦河向北转弯处附近注入该河的小溪叫做班加尔班贝科。

第二年也就是1376年[1]，哈马儿丁在帖木儿远征花剌子模时侵入费尔干纳，但是刚得知帖木儿逼近的消息他就撤退到阿特巴什。帖木儿在后面追击，哈马儿丁在途中组织了一次伏击，但遭到了失败并在塞基兹伊加奇[2]附近再次被击溃，他在此处受伤。帖木儿经阿塔库姆回到锡尔河畔，又从锡尔河畔回到撒马尔罕。

1377年[3]，帖木儿重新派军队讨伐哈马儿丁，帖木儿的军队追上了他并在库拉图草原将其打败。同年，帖木儿亲率另一支军队入侵七河流域，先头部队在博阿姆峡谷击溃哈马儿丁。帖木儿抵达科奇卡尔河，经奥伊纳古返回乌兹根德。

帖木儿在1383年发动了新的远征。[4] 他向七河流域派出了好几支军队。当其他队伍抵达阿塔库姆时，先头部队已经打败敌人从那里返回了。联军经伊塞克湖来到柯克捷佩山，但没有找到哈马儿丁，于是返回撒马尔罕。

所有这些失败可能都削弱了哈马儿丁的实力。他的侄子、当时统治喀什噶尔的忽歹达把秃黑鲁帖木儿之子黑的儿火者王子从哈马儿丁那里救出来，黑的儿火者在父亲死的时候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在哈马儿丁强盛时期，王子被秘密送到喀什噶尔和巴达赫尚之间的山区抚养，后来又在国家最东南部的罗布泊附近住了12年。很难说这些记载有多可靠[5]，也很难说忽歹达有没有采用像他父亲当年找到秃黑鲁帖木儿那样的方式来找到王子。但不管怎么说黑的儿火者在1389年前后

[1]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第1卷，第265页以下（加尔各答版，第1卷，第268页）。阿卜杜勒·拉扎克（大学手抄本，第69页）把这次进军说成是发生在1377年。

[2]即“八棵树”之意（或“8法尔萨赫”。——B. 米诺尔斯基）。但在所有的波斯手抄本中，在字母к前面都有一个字母н（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和穆罕默德·海达尔的书都是如此）。

[3]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第1卷，第274页（加尔各答版，第1卷，第273页）。根据阿卜杜勒·拉扎克（大学手抄本，第70页）的说法此事发生于1378年。

[4]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第1卷，第363页。

[5]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第54页）的说法，黑的儿火者生于770年（1368—1369年。——Б. 加富罗夫），也就是在秃黑鲁帖木儿死后6年。

被立为汗。

就在1389年[1]，帖木儿对蒙兀儿斯坦发动了新的远征。他从阿尔科苏经布里巴希和秋佩里克卡拉克到达奥尔纳克（或奥兹纳克、奥尔塔克）山口。继续前行到了阿特坎[2]苏里（虽然是盛夏季节，但这里依然是冰雪覆盖）、托格拉奥特拉戈、艾吉尔亚雷（马鬃）平原、乌兰查雷戈平原、恰帕尔艾吉尔（跳跃的牡马）。黑的儿火者的指挥官之一安加丘粱率领的蒙古骑兵在这里被打败。安加丘粱当时在乌连戈亚尔，当时帖木儿派出了一支先头部队与他作战。次日帖木儿的军队发现自己迷路了，但经过卡扬（或克扬）卡济回到了大路上，傍晚到达柯克萨里，第二天来到阿亚古兹河。[3] 由于帖木儿因寻找道路损失了3天时间，所以他断定敌人已经知道了他靠近的消息，并且敌人已经逃跑了，因此他兵分两路。他本人经希列、希贝尔图[4]、克伊马拉戈、库拉干和布尤尔拉古前往卡拉古丘尔（在列纳特的地图上塔尔巴哈台山的西部被称作卡拉古丘尔）。帖木儿之子乌马尔沙黑率领另一支队伍在霍博河畔追上了安加丘粱并将其击溃。安加丘粱逃到卡克马布尔吉。乌马尔沙黑返回帖木儿那里，在阿赫塔吉克图尔与他会合。此后他又经过阿拉库尔平原也称伊特伊奇梅斯（狗不喝）平原回到卡拉古丘尔。帖木儿让自己的军队在卡拉古丘尔休整并派出一支队伍到额尔齐斯河。战俘被送往撒马尔罕，而帖木儿自己则前往叶密立古丘尔，他在汗的大本营萨莱斡耳朵姆停留了下来。帖木儿从叶密立河下达命令让军队倾城出动摧毁蒙兀儿斯坦南部地区。可能所有的军队大概都集结于尤尔都兹，帖木儿自己也动身前往那里。同时，位于突厥斯坦蒙古人和乌兹别克人领地交界处的埃米尔也穿过了乌尔达班、伊犁河、休特湖（塞

〔1〕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第2卷，第35页以下。

〔2〕在《胜利之书》的突厥译本中写的是阿腾。

〔3〕该路线上第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下来。研究帖木儿的进军路线异常困难，因为谢里夫·阿德金根本没有谈到他在哪里渡过了大河如楚河和伊犁河。

〔4〕本义为"黏土地"，这是一个在蒙古人那里很常见的地理名称。

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加尔各答版，第1卷，第472页。——B.米诺尔斯基

兰）以及奇切克里克（花坛）和巴兰卡兹。在从那里前往尤尔都兹的途中他们遇到了黑的儿火者的军队，在经过2天非决定性的战斗之后军队根据协议各自撤退。帖木儿从叶密立经乌鲁格库尔（“主力部队”，显然这里是蒙古主力部队的驻扎地）、瑟奇坎达班通道（本义是“灰褐色的大门”）和昆格兹河抵达尤尔都兹，他还从这里向恰雷什（焉耆）方向追击了黑的儿火者一段距离，他派乌马尔沙黑[1]经东突厥斯坦前往费尔干纳，而他自己则在1389年8月8日迅速从大尤尔都兹抄近路返回，8月30日就已经抵达撒马尔罕，而商队得需要2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完这一程。

1390年[2]，帖木儿又一次派军队蹂躏蒙兀儿斯坦并追击逃到了额尔齐斯河的哈马儿丁。军队从塔什干来到伊塞克湖，又从伊塞克湖来到柯克捷佩山，经阿尔贾图[3]山口前往阿尔马雷克（可能指的是阿尔马特城，现在的韦尔内）[4]，还渡过了伊犁河和卡拉塔尔河，越过了伊奇尼布奇尼和乌克尔基特奇平原。当军队来到额尔齐斯河时，哈马儿丁已经从那里逃往北部的丘列斯地区，那里有许多黑貂和白鼬。在返回的途中，军队经过了阿尔通丘尔杰地区和阿特拉克湖（巴尔喀什湖）。

哈马儿丁此后可能再也没有回到蒙兀儿斯坦。根据《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中所记载的蒙古传说[5]，哈马儿丁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患了水肿，在帖木儿发动一次入侵时他在森林里失踪了。由于忙于西线的战事，帖木儿并没有妨碍黑的儿火者在蒙兀儿斯坦建立自己的

[1]乌马尔沙黑显然来到了吐鲁番（卡拉霍加，哈拉霍乔）。参见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加尔各答版，第1卷，第477页。——B. 米诺尔斯基

[2]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第2卷，第66页以下（加尔各答版，第1卷，第494页。——Б. 加富罗夫）。

[3]即阿尔沙图（字面意思是“有温泉的地方”），经常遇到的一个地理名称。

[4]阿尔马雷克（比较北吉尔吉斯的阿尔马鲁乌）和阿尔马特——“苹果的”或“苹果树的”。革命后，将韦尔内更名为阿拉木图（现在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是想恢复该城的当地旧称，但却弄巧成拙。关于阿尔马特、阿尔马雷克、阿尔马雷这些名称，参见潘图索夫《阿尔马雷克城和秃黑鲁帖木儿汗的麻札》，第171页。关于阿尔马特，也参见后面第341－342页。——B. 罗莫金

[5]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50－51页。

政权。1397 年[1]，黑的儿火者派自己的长子沙迷只罕（和平的灯塔）为使臣前往帖木儿处。帖木儿通过他向他的妹妹捷维克力阿加求婚，她被送往帖木儿那里，在他的宫廷中获得了“小夫人”[2]（基奇克汗内姆）的封号。

黑的儿死于 1399 年，他死后在他的 4 个儿子（沙迷只罕、马哈麻奥格兰、希尔阿里、沙哈只罕）之间发生了内讧。费尔干纳统治者乌马尔沙黑之子米尔扎伊斯坎杰尔利用这种内讧洗劫了东突厥斯坦。[3] 同时，他包围了阿克苏。为了从他那里赎身，居民们把城中的中国富商及其所有财产都出卖给他。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处于混乱时期，与东部之间的贸易联系依然没有中断。

关于帖木儿与黑的儿火者儿子之间的关系我们一无所知。[4] 在黑的儿死后，蒙兀儿斯坦的一部分地区大概归附了帖木儿本人。帖木儿把自己从小亚细亚带来的黑鞑靼部落迁到了伊塞克湖岸，但他们在帖木儿死后立即从这里逃走了。他把一位犯了罪的达官显贵流放到那里。帖木儿还准备进攻中国，1404 年他把蒙兀儿斯坦北部划归到塔什干总督区，塔什干总督区名义上的首领是帖木儿的幼孙兀鲁伯，把东突厥斯坦划入到费尔干纳总督区。[5]

帖木儿死后黑的儿火者的长子沙迷只罕一度想征服马维兰纳尔，为此他在 1407 年求助于中国人[6]，但 1408 年他死去了，他的弟弟马哈麻汗嗣位。他在自己统治之初便派使团前往帖木儿之子沙哈鲁那里表示归顺，但他干预了马维兰纳尔发生的骚乱，并对叛乱的埃米尔予以

---

〔1〕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第 2 卷，第 421 页、457 页。

〔2〕世系普史中如是说（《蒙古人世系史》。——B. 米诺尔斯基）。

〔3〕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第 3 卷，第 215 页以下（加尔各答版，第 2 卷，第 218 页。——Б. 加富罗夫）。穆谢维和阿卜杜勒·拉扎克认为这次进军发生于 1377 年，并说这次军事行动是由乌马尔沙黑发动的。

〔4〕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第 54 页）的说法，黑的儿火者比帖木儿活的时间长。

〔5〕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胜利之书》，珀蒂·德·拉·克鲁瓦译本，第 4 卷，第 203－204 页（加尔各答版，第 2 卷，第 633 页。——Б. 加富罗夫）。

〔6〕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 2 卷，第 239 页。

85 支持，因此1416年他失去了喀什噶尔。[1] 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说法[2]，马哈麻汗非常热衷于在自己的领地传播伊斯兰教，所有的蒙古人都必须戴头巾，凡是不服从者脑袋里就要被钉上钉子。恰特尔湖北岸著名的塔什拉巴特也是他建造的。

1416年，新任的蒙古汗沙迷只罕之子[3]那黑失只罕向沙哈鲁和中国派出了使团。中国人认为马哈麻汗死于这一年。根据阿卜杜勒·拉扎克的记载[4]，他死于1415年。1418年初，那黑失只罕就被希尔阿里[5]之子歪斯奥格兰杀死。1420年，在蒙兀儿斯坦发生了歪斯汗与希尔马哈麻奥格兰之间的内讧，世系普史称后者是沙赫只罕之子，穆罕默德·海达尔说他是马哈麻汗之子。很难判断蒙古埃米尔的首领忽歹达站在哪一边。不管怎样，他与当时作为自己父亲总督的马维兰纳尔管理者兀鲁伯有联系，可能兀鲁伯是根据他的愿望进军蒙兀儿斯坦的。但还在途中，蒙古埃米尔就来到他那里表示归顺，所以进军被取消了。[6] 同年沙哈鲁派了一个著名的使团前往中国。使者于5月初抵达蒙兀儿斯坦。由于当时在歪斯汗与希尔马哈麻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内讧，使者们担心自己的安全，在前往歪斯汗处的途中与其相遇的忽歹达还对他们进行了安慰。6月4日，使臣们渡过昆格兹河，5日见到了当地的统治者穆罕默德伯克，8日来到了尤尔都兹。20日他们得知穆罕默德伯克的儿子抢劫了歪斯汗的使者，此事迫使他们加速了自己的行程。[7] 希尔马哈麻最终逃往撒马尔罕，在那里他沦为受到礼遇的俘虏。10月他试图从那里逃跑，但未获成功。12月兀鲁伯自己将其释放。希尔马哈麻回到了蒙兀儿斯坦。1421年他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

---

[1]阿卜杜勒·拉扎克《两幸福之会合》，卡特尔梅尔译本，第296页。

[2]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58页。

[3]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记载（第57页）是他的兄弟。

[4]《两幸福之会合》，卡特尔梅尔译本，第277页。

[5]世系普史（《蒙古人世系史》。——Б.加富罗夫）（和谢里夫·阿德金）称希尔阿里是那黑失只罕的兄弟，巴卑尔和穆罕默德·海达尔说他是马哈麻汗之子。

[6]阿卜杜勒·拉扎克《两幸福之会合》，大学手抄本，第218页。

[7]阿卜杜勒·拉扎克《两幸福之会合》，卡特尔梅尔译本，第388－389页。

敌人并成为独裁统治者。[1] 由于他不屈从于兀鲁伯，因此后者在1425年发动了对七河流域的入侵。[2] 3月5日兀鲁伯的军队在阿克苏河（楚河的支流）附近击溃了蒙古军队。兀鲁伯渡过楚河和纳伦河，忽歹达前来表示归顺。5月希尔马哈麻本人在此地被打败。兀鲁伯派出追击敌人的军队追到伊犁河。兀鲁伯本人来到尤尔都兹——蒙兀儿斯坦的主要亚伊拉克[3]。在从该处返回途中，他在卡尔希获得了一块有名的“蓝石头”（柯克塔什）。据传帖木儿曾想把它偷运到撒马尔罕，但没能成功。[4] 86

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说法，希尔马哈麻是寿终正寝的。[5] 他死后政权重新转入歪斯汗手中，但1428年他便在伊塞克湖畔与萨图克汗作战时被打死，后者是在撒马尔罕加封为汗的，这里的实际统治者是兀鲁伯，兀鲁伯最终废黜了汗并把他送往蒙兀儿斯坦。[6]

在歪斯汗统治时期，蒙兀儿斯坦开始遭受来自东部的蒙古异教徒的入侵，14世纪末，在这些蒙古人中四姓（乔罗斯人、霍舒特人、托儿古特人和霍伊特人）联盟的地位得到提高。1399年，卫拉特人的首领窝阔奇哈沙加杀死了蒙古合汗额勒伯克。研究东蒙古人历史的现代史学家波科季洛夫先生[7]认为这是卫拉特人建立霸事的开始。1408年，新合汗翁台铁穆尔在别失八里登基[8]，这里通常属于蒙兀儿斯坦汗，而这时显然已经为东蒙古人所占领。马哈麻汗就曾打算征讨卫拉特人，穆斯林称卫拉特人为卡尔梅克人。中国政府应卫拉特人之请求派了一个使团前往马哈麻汗那里，目的是劝说他放弃这一打算。[9] 据中文史

---

[1]阿卜杜勒·拉扎克《两幸福之会合》，大学手抄本，第223页。

[2]阿卜杜勒·拉扎克《两幸福之会合》，大学手抄本，第230－231页。

[3]即夏季游牧地。——译者

[4]这里说的是玉石，后来用这块玉石为帖木儿做了墓碑。B. B. 巴托尔德在这里把这块石头错误地称作柯克塔什（在哈菲济·阿卜鲁的文中也是这样说的），后来他自己对这一错误进行了纠正，参见巴托尔德《帖木儿的安葬》，第31页。——Ю. 布列格利

[5]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65页。

[6]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72页。

[7]《东蒙古人史》，第15页。

[8]《东蒙古人史》，第33页。

[9]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绪论，第45页。

料记载，歪斯汗把自己的主要大帐从东突厥斯坦迁到了西部的亦剌八里，即七河流域的伊犁河畔。中国人在描述这一时期该地区的状况时，已经不再像13世纪的旅行家那样谈论这里的城市和繁荣的村庄了。15世纪七河流域的居民只有游牧民，他们住在毛毡帐篷中，吃肉饮马奶酒；他们的衣着部分像卫拉特人，部分像穆斯林。[1] 歪斯汗在伊犁河畔与当时卫拉特人的主要首领托滚之子——军队统帅也先台吉发生了多次冲突。[2] 歪斯与卡尔梅克人进行了61次战斗，其中只有1次取胜。他2次被卡尔梅克人俘虏，并违背本意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也

87 先台吉。[3]

萨图克汗没能在蒙兀儿斯坦站稳脚跟，他很快就在喀什噶尔被杀死。在此之后，蒙古埃米尔分为两派：一派推举歪斯汗的长子羽奴思继位；另一派推举他的次子也先不花继位。两位王子都还年幼。也先不花派占据了上风，羽奴思被其支持者送到马维兰纳尔兀鲁伯那里，兀鲁伯把他送往波斯。根据巴卑尔的记载[4]，这发生在1434年。年轻的也先不花在自己同部族的人当中并未享有很高的权威，在他统治的前半期每一个蒙古埃米尔在自己的区域内都是完全独立的。忽歹达之子米尔·穆罕默德沙赫在阿特巴什的统治就是如此；另一位埃米尔米尔·克里姆·别尔德在阿拉布加为自己建造了堡垒并开始从那里侵袭费尔干纳；第三位埃米尔米尔·哈克别尔德·别基切克在位于伊塞克湖中央岛屿上的克伊孙建起了要塞。他把其全家安置在这里，由于面临卡尔梅克人侵袭的危险，他自己开始进攻突厥斯坦和塞兰。[5] 忽歹达之孙赛义德·阿里从帖木儿帝国那里夺取了喀什噶尔。[6]

---

[1]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2卷，第241－242页。

[2]波科季洛夫《东蒙古人史》，第53页。

[3]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65－67页。

[4]巴卑尔（《巴卑尔回忆录》，莱顿、奥斯金译本，第2卷）说，羽奴思是在沙哈鲁之子易卜拉欣死前五六个月来到设拉子的。根据阿卜杜勒·拉扎克的记载（大学手抄本，第245页），易卜拉欣死于希吉拉历838年闪瓦鲁月（1435年5月）。

[5]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78－79页；巴托尔德《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42、49页。

[6]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75－76页。

这样一来，卡尔梅克人当时已经侵入到伊塞克湖畔，几年之后他们甚至深入到锡尔河流域。1455年也先死后，卫拉特人在东方的实力衰落下去，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史料中几乎没有提到他们。穆斯林史料还提到了也先之子阿玛散赤台吉[1]和另一位领袖乌兹帖木儿台吉。后者于1452年和1455年间[2]（根据另一种记载[3]是在1457年）在锡尔河打败了乌兹别克人。1459年底苏丹阿布·赛义德在赫拉特接见了卡尔梅克使团。[4]

更早些时候，在15世纪40年代末，也先不花恢复了自己的权力并努力以自己的仁政获得威望。对帖木儿帝国而言他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邻居，他经常入侵帖木儿帝国。最终，苏丹阿布·赛义德着手进军蒙兀儿斯坦并在阿什帕拉击溃了蒙古人。[5] 此外，他把羽奴思从波斯召来，将他派到蒙兀儿斯坦，迫使他事先放弃对马维兰纳尔的任何要求[6]（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说法，是在1456年[7]）。一些埃米尔如米尔·克里姆·别尔德和米尔·易卜拉欣（哈克别尔德的继任者）归附了羽奴思，但由于习惯于独立所以他们没有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在与汗进行的战斗中羽奴思被打败，定居于位于费尔干纳和七河流域交界处的哲台肯特城，该城是阿布·赛义德赐给他的。[8] 也先不花汗死于1462年。

88

也先不花统治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现在七河流域楚河

---

[1]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79页、91页。

[2]霍沃尔斯《蒙古历史》，第2卷，第688页；阿里斯托夫《关于突厥诸部落、部族的部落组成及其人口情况札记》，第40页。

[3]16世纪初完成的《胜利之书精选史》（亚洲博物馆手抄本，590[B 745；以及不列颠博物馆抄本目录3222。——Б. 加富罗夫]，第66页）一书的作者说，王子马赫穆德·苏丹（生于858/1454年）离开族人在卡尔梅克人那里当了3年的俘虏，在他们那里待了7年。

[4]阿卜杜勒·拉扎克《两幸福之会合》，大学手抄本，第322页。

[5]巴卑尔如是说（莱顿、奥斯金译本，第11－12页），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记载（第78页），战斗发生在塔拉斯附近。

[6]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83－84页。

[7]根据巴卑尔的说法还要稍早一些，因为羽奴思在波斯住了17至18年。

[8]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86－87页。

沿岸绝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哥萨克人[1]就是在他统治时期移居到这里的。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记载,他们有20万人之多,其首领吉列伊和贾尼伯克与乌兹别克汗阿布海尔产生了冲突,并受到也先不花的接待。[2]

也先不花死后,蒙兀儿斯坦的西部转到了羽奴思的手中。873/1468—1469年前也先不花之子朵思忒·马黑麻统治阿克苏城和城以东地区。他死后羽奴思占领了阿克苏,朵思忒·马黑麻之子克伯·速檀远走吐鲁番,又在那里统治了4年,最后他被自己的臣民杀死,首级被送给了羽奴思。

这样,在1472年前后整个国家又在羽奴思的统治之下统一起来。与其前任者相比,新汗和自己的臣民相像之处更少,所以更不受他们的欢迎。他生于818[3]或819[4](1415—1417年)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青年时代他是在波斯度过的,他在这里受到了正规的伊斯兰教育,同时跟随著名的历史学家谢里夫·阿德金·亚兹迪学习。马维兰纳尔的一位卡迪[5]希望见见这位具有"草原突厥人"外貌和举止的汗,但当他见到羽奴思汗的时候,令他感到异常惊讶的是这位汗居然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6] 自然,他不能容忍游牧生活,他毕生都尽力住在城市里,并且至少唤起自己的一部分臣民也这样做。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记载,他这样做也有宗教目的,他明白不改变生活方式他的臣民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7] 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城市生活对蒙古人而言简直比牢狱还要糟糕。为了避免被自己的臣民抛弃,汗不止一次地被迫把城市改成草原。

89

1472年,七河流域遭到了上面提到的卡尔梅克军事统帅阿玛散赤

---

[1]哈萨克人。——Б. 加富罗夫

[2]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2册,第139页。

[3]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说法是这样的,第115页。

[4]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84页。

[5]伊斯兰国家中根据沙里亚独自一人审理案件的审判官。——译者

[6]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97－98页。

[7]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56页。

台吉的入侵,后者由于国内发生骚乱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羽奴思在伊犁河畔被击溃,逃往锡尔河,在锡尔河过了冬。他在这里打败了乌兹别克汗布鲁奇·奥格兰,但次年春天他被塔什干总督俘虏。一年后总督被杀,羽奴思获释被派往蒙兀儿斯坦。此前卡尔梅克人已经撤出了该地区。[1]

还在1469年阿布·赛义德死前,羽奴思便重新发动了对帖木儿帝国的进攻,并竭力要占领费尔干纳,但未获成功。[2] 后来他对阿布·赛义德儿子(艾哈迈德米尔扎和乌马尔沙黑)之间的内讧进行了干涉,由此在1482年把塞兰并入自己的领地,1485年又把塔什干并入自己的领地。对城市生活的热爱最终战胜了他,他依然生活在马维兰纳尔的城市中,虽然他的大部分臣民都离开了他,并且承认他的次子——接受草原教育的艾哈迈德为自己的国王。埃米尔阿布·伯克尔在东突厥斯坦建立了一块独立的领地,并成功地击退了羽奴思的所有进犯。[3]

羽奴思1487年死于瘫痪,他的长子马赫穆德继位,成为国家西部地区的国王和整个国家名义上的首脑,马赫穆德生于868/1463—1464年。他与自己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会写诗,虽然写得不好。[4] 巴卑尔[5]承认他有很多优点,但对他的军事才能则完全不敢恭维。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说法来判断[6],他几乎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臣民。

马赫穆德留在马维兰纳尔,并竭尽全力地在这里拓展自己的领地,起初不无成效,但从1500年起阿布海尔的孙子、乌兹别克汗穆罕默

---

[1]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91-95页;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2册,第143页。

[2]阿卜杜勒·拉扎克《两幸福之会合》,大学手抄本,第349页。

[3]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04-114页。

[4]《巴卑尔回忆录》,莱顿、奥斯金译本,第102页。

可能他只写了一些不合韵律的突厥诗。比较《巴卑尔回忆录》,别维里什译本,第1卷,第154页。——B.米诺尔斯基

[5]《巴卑尔回忆录》,莱顿、奥斯金译本,第59页、97页。

[6]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81页。

德·昔班尼的势力开始迅速崛起。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说法[1]，汗起初支持昔班尼。1488年他把突厥斯坦让给了昔班尼，由此与哥萨克人发生了争执，在1500年又帮助他占领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但很快昔班尼便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汗，后者无力与他抗衡故而向自己的幼弟求助。

90

艾哈迈德生于870/1465—1466年，长得与自己的兄长毫无相像之处。根据他侄子巴卑尔的描述[2]，这是一位真正的草原之子：他体格强壮，是一个严厉而勇敢的战士，认为马刀胜于其他一切武器。他着蒙古服饰，他的装备及其坐骑的装备也完全符合蒙古的习俗。艾哈迈德两次打败了卡尔梅克首领台吉也先。他的功勋使卡尔梅克人感到胆怯，他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阿拉恰或阿拉奇，即"杀手"。此外，他还与发动叛乱的埃米尔作战，与反对他兄长并两次打败后者的哥萨克人作战。艾哈迈德三次打败哥萨克人，但他重新占领喀什噶尔和莎车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

得到兄长的求助信息后，艾哈迈德把自己19岁的儿子曼苏尔留在了蒙兀儿斯坦，他自己则带着另外两个儿子前往塔什干。1503年，昔班尼在阿赫西肯特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蒙古军队并俘虏了兄弟俩，但从马赫穆德手中夺取了塔什干和塞兰之后，他又把他们放回了蒙兀儿斯坦。兄弟两人一起在阿克苏度过了下一年的冬天，艾哈迈德由于瘫痪死在了那里。[3] 马赫穆德把阿克苏和蒙兀儿斯坦的东部地区给了自己的侄子，他自己移居哲台肯特。曼苏尔汗留在阿克苏，他的弟弟哈利尔·苏丹远走七河流域，到了吉尔吉斯人那里，成为这个部族的首领。[4]

---

〔1〕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18－120页。

〔2〕《巴卑尔回忆录》，莱顿、奥斯金译本，第106－112页。

〔3〕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21－123页。比较《巴卑尔回忆录》，莱顿、奥斯金译本，第124－125页；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2册，第223页。

〔4〕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81－182页。

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提到居住在他们目前故乡[1]的吉尔吉斯人（我们的卡拉吉尔吉斯人），虽然他们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可能还在10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迁居到这里。穆罕默德·海达尔[2]不承认吉尔吉斯人和蒙古人之间存在着民族差别，他认为吉尔吉斯人就是从蒙古民族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他认为他们之间产生敌对的主要原因在于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吉尔吉斯人仍然是异教徒。

哈利尔的兄弟赛义德原本与父亲一起待在马维兰纳尔（他当时13岁或14岁[3]，所以他生于1490年前后），他逃脱了乌兹别克人的囚禁之后，很快便前来投靠哈利尔。他在哲台肯特自己的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不能对他的恶政熟视无睹，所以便跑到了哥哥那里。兄弟二 91 人在一起待了4年，此时他们已经与自己的叔叔公开决裂。为了调节他们之间的关系，曼苏尔来到了蒙兀儿斯坦。他安排叔叔和侄子见面，但内讧很快又起。马赫穆德受到自己对手的严重排挤，以至于不得不返回马维兰纳尔并投靠昔班尼，根据昔班尼的命令，1508年他和自己所有的儿子一起被处死在锡尔河畔。此后在阿拉木图也就是韦尔内附近（在另一个地方说战斗发生在恰伦恰拉克即恰伦河附近），曼苏尔与自己的兄弟们进行了厮杀并打败了他们。哈利尔逃到了费尔干纳，根据该地乌兹别克统治者贾尼伯克的命令，他在这里被处死。赛义德在纳伦河附近的森林中过了几个月。在蒙古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勇敢的战士青年时期在离人烟稠密之地有一两个月路程的荒漠、高山和森林中离群索居地住上一段时间，吃着野兽的肉穿着被打死的野兽的毛皮是备受赞誉的。当时该地区备受喀什噶尔阿布·伯克尔军队入侵之扰。赛义德违背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同伴的要求前往费尔干纳，在马赫穆德死后两个月和哈利尔死前一个月他来到了那里。他也被抓了起来，但后来他逃脱了并顺利抵达喀布尔，1508年底他来到

[1]关于第一次提到七河流域和天山吉尔吉斯人的问题以及他们来到那里的时间问题，参见后面第509页、512页和513页注释。——B. 罗莫金

[2]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48页。

[3]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巴卑尔回忆录》，莱顿、奥斯金译本，第106页。

巴卑尔那里任职。[1]

阿布·伯克尔军队在七河流域的军事行动是由埃米尔韦利领导的,这些军事行动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以至于曼苏尔汗在这里待不下去了只好撤退,他带领着吉尔吉斯人到了恰雷什(焉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消灭。有一些人成功地返回了蒙兀儿斯坦。阿布·伯克尔允许他们在伊塞克湖南部游牧。[2] 统治七河流域北部的是哥萨克汗卡西姆,他死于924/1518年。他的冬季大帐设在卡拉塔尔河。1510年前后他打败了昔班尼。1512年夺取了塔拉斯和塞兰,并洗劫了塔什干附近地区。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观点,哥萨克民族当时已经有大约100万人口。根据巴卑尔的说法,卡西姆有30万军队。1513年秋天,卡西姆汗与当时在巴卑尔那里任职的赛义德在楚河会面。卡西姆当时已经过了65岁了。赛义德受到了异常隆重的接待,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忘记在草原领袖大帐中所受到礼遇。[3]

1514年赛义德离开了巴卑尔,他决定征服喀什噶尔。他带着为数不多的人(4700人)闯入七河流域的一个地区(大概穿过了图鲁加尔特

92 山口),开始了与强大的阿布·伯克尔之间的战争。虽然该举极不理智,但还是大获全胜。[4] 赛义德征服喀什噶尔和莎车的结果是完全恢复了东突厥斯坦的和平。1516年曼苏尔和赛义德在阿克苏和库车之间的阿尔巴特举行了会晤,两人完全和好。曼苏尔依然是吐鲁番和焉耆的直接统治者,是整个东突厥斯坦的最高主宰。另一个兄弟叶密立霍加[5]得到了乌什吐鲁番和阿克苏。第三个兄弟巴巴恰克·苏丹得到了巴伊和库车。这样一来,商业往来又有了安全保障。在哈密(中国)和安集延(费尔干纳)之间的辽阔地域内不向商人收取任何

---

〔1〕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25页、181-191页、222页。

〔2〕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25页、319-320页。

〔3〕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273-277页。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2册,第150-167页,第230-260页。

〔4〕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304页以下。

〔5〕很可能应该以此代替英文译本中 Aiman Khwaja 的读音(在伊斯兰手抄本中最后一个字母 л 和 н 经常被弄混)。

税费。[1]

在控制喀什噶尔的同时,赛义德又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七河流域南部。吉尔吉斯人穆罕默德在与阿布·伯克尔的战争中为汗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被树立为自己民族的领袖。还在与曼苏尔会晤之前,因饮宴无度而损害了自己健康的赛义德便应对手的要求在蒙兀儿斯坦度过了一个夏天。1516 年秋天,他为了与乌兹别克人在费尔干纳重新开战而前往七河流域。他在恰特尔湖畔与自己的兄弟巴巴恰克会面。除曼苏尔以外,所有的兄弟都在阿尔帕谷地进行了一次联合狩猎,他们在无休止的欢宴中过了冬,而且赛义德可能完全忘了自己远征的最初目的。

同时吉尔吉斯人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经常入侵突厥斯坦、塔什干和塞兰。在俘虏了昔班尼的堂兄弟——突厥斯坦统治者阿卜杜勒之后,穆罕默德将其释放并赠送给他礼物,这引发了他与赛义德之间的战争,虽然穆罕默德·海达尔在另一个地方[2]说,赛义德反对穆罕默德保卫穆斯林,是因为穆罕默德破坏穆斯林的耕地。1517 年秋,赛义德从喀什噶尔出发,叶密立霍加经萨雷格－阿特－阿忽里山口(本义为“黄马牲口槽”)从阿克苏出发,两支队伍在卡菲尔－亚雷会合,赛义德从那里穿过巴尔斯坎温河谷,叶密立霍加穿过朱卡河谷。穆罕默德的大营设在巴尔斯坎温河口附近。穆罕默德被自己的人出卖并被带往东突厥斯坦,他的马群、羊群和骆驼群都成了士兵的战利品,所有被俘的吉尔吉斯人都获得了自由。冬季到来之前,汗返回了喀什噶尔。[3]

新的征讨发生在 1522 年。穆罕默德·海达尔认为这一次汗打算阻止吉尔吉斯人对穆斯林地区的入侵活动,虽然这里也谈到了这次远征的真实原因:东突厥斯坦的牧场不能满足蒙古人畜群的需要。汗 13 岁的儿子拉希德(本名阿卜杜勒·拉希德)是军队的名义统帅。与他同行的还有已经获释并重新被任命为吉尔吉斯人长官的穆罕默德。为

[1]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 126－127 页、134 页、343 页。

[2]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 134 页。

[3]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 341－351 页。

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蒙古人在科奇卡尔河建立了常驻营地。[1] 吉尔吉斯人大部分都听命于穆罕默德,虽然他们其中有一些人逃到了国家最偏远的地区。冬天汗亲自来到了科奇卡尔河。拉希德和穆罕默德根据汗的命令到达了"蒙兀儿斯坦最遥远的边界地区",他们成功地把分散的吉尔吉斯人召集起来。此后汗每年都来科奇卡尔河待上一小段时间,以帮自己的儿子树立威望。1524 年,七河流域北部的统治者哥萨克汗塔希尔来到了正在科奇卡尔河的汗那里,他是卡西姆的侄子和第二任继承人(第一位继承人是卡西姆之子穆马什汗)。塔希尔是来寻求与蒙古人联合反对仇视自己的臣民以及乌兹别克人和诺盖人(曼格特人)的,他的臣民之所以仇视他,是因为他太残忍。在蒙古大帐中他受到了超乎他想象的隆重接待,他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拉希德。

紧接着穆罕默德再次被指责与乌兹别克人关系暧昧,他被发配到喀什噶尔,在那里一直待到赛义德去世。维护国家秩序的事情交给了历史学家穆罕默德·海达尔,他自己承认他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吉尔吉斯人大部分归附了塔希尔。1525 年夏末,汗来到了伊塞克湖畔,在这里他得到了卡尔梅克人逼近蒙兀儿斯坦边界的消息。还在更早些时候,在 1523/1524 年冬天,拉希德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反对卡尔梅克人的远征,为此他获得了宗教战士(反对异教徒的斗士)的绰号。现在汗把自己的家人留在伊塞克湖(大概留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岛屿上),他自己前去攻打卡尔梅克人,并来到了叫做卡比卡拉尔(或卡比尔卡克拉)的地方,该地距离伊塞克湖有 10 天的路程。在这里他得到了塔什干汗苏云丘克死去的消息,这使得他有可能与乌兹别克人重新开战。汗迅速返回伊塞克湖,从那里经科努尔乌列侵入费尔干纳,但大概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效便返回了蒙兀儿斯坦,回到了乌特鲁克他的家。此后不久他就返回了喀什噶尔。

在下一年的冬季,塔希尔在距离科奇卡尔河不远的地方安营扎寨,有一半吉尔吉斯人立即投靠了他。拉希德大概撤退到了阿特巴什。

---

[1]在吉尔吉斯语中的发音为科奇科尔,在乌兹别克语中的发音为库奇卡尔。——B. 罗莫金

1526 年初汗亲自来到了他那里，但是哥萨克人毫无阻碍地经整个七河流域来到了喀什和昆格兹。剩下的在科奇卡尔河和朱姆加尔河附近游牧还没有来得及归附塔希尔的吉尔吉斯人被蒙古人带往阿特巴什。他的继母，即住在喀什噶尔的羽奴思汗的女儿被派来与塔希尔进行谈判，至于谈判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赛义德汗当时在阿克赛河，得知哥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发生争执的消息后，他便出兵反对他们，他来到阿克库亚什，又从那里来到阿雷什利亚尔。接着往前走时，蒙古人遇到了一堆被吉尔吉斯人撕碎的库车巴巴恰克士兵的尸体。大概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蒙古人决定退出七河流域，只限于赶走了 10 万头吉尔吉斯绵羊，因此这次远征被人民称为“绵羊行动”（科伊切里基）。1527 年早春，塔希尔来到了阿特巴什，并把吉尔吉斯人连同留在那里的蒙古马群一起从那里带走。[1] 94

蒙古人退去后，七河流域仍然留在哥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手中。两个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并没有持续多久。还在 1526 年，塔希尔因为杀死了自己的兄弟阿卜杜勒·卡西姆，而被全体哥萨克人抛弃，但吉尔吉斯人依然效忠于他。1529 年，塔希尔又成为 2 万或者 3 万哥萨克人的首领。塔希尔死亡的时间不为人所知，根据穆罕默德·海达尔的说法，他是在贫困潦倒中死去的。他身后继位的未必是那位控制了整个哥萨克民族的汗，虽然穆罕默德·海达尔说他的兄弟布达什是塔希尔的继承人[2]。

蒙古人在七河流域的势力在赛义德的继承人拉希德（1533—1565/1566 年）统治时期一度得到恢复。[3] 为了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拉希德与马维兰纳尔的乌兹别克人缔结了同盟，由于哥萨克人进攻塔什干

---

〔1〕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 367－379 页；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 2 册，第 192－202 页。

〔2〕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 273 页、379 页、388 页；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 2 册，第 201 页、219 页。

〔3〕巴托尔德纠正说（发表在 1900 年的七河州纪念手册和贺历中）：“根据《世界历史》的记载，拉希德死于 978/1570—1571 年，他的儿子阿卜杜勒·利亚季夫继位，他 29 岁时便在与哈克·纳扎尔的战斗中身亡（他死亡的年代不详）。”。——Б. 加富罗夫

他们也与之有仇。此外,曼格特人(诺盖人)也从西北部向哥萨克人发动了进攻。在希吉拉历944年(1537年或1538年)拉希德给哥萨克人以致命的打击,在这次失败中塔希尔的兄弟图古姆汗以及37名苏丹阵亡。由于这场战役,在更偏远一些的地方都散播着一个传闻,说哥萨克民族完全被消灭了。拉希德援引赛义德的做法,把自己的儿子阿卜杜勒·利亚季夫留在了七河流域。蒙古人与乌兹别克人结成紧密的联盟继续作战。951/1544—1545年拉希德和塔什干汗瑙鲁兹·艾哈迈德 95 汗(巴拉克)在伊塞克湖畔举行了会晤。尽管如此,哥萨克人还是很快便成功地恢复了自己在七河流域的统治。阿卜杜勒·利亚季夫还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便在与卡西姆之子——哥萨克和吉尔吉斯汗哈克·纳扎尔的战斗中阵亡了。1558年前后,据詹金森证实,哥萨克人又开始威胁塔什干,吉尔吉斯人又开始威胁喀什噶尔。这两个民族完全截断了 96 中国与西亚之间的陆路贸易往来。[1]

---

〔1〕穆罕默德·海达尔《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46页、273页;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2册,第220页、274页、330-333页;奥马里,卡特尔梅尔译本节选,第228页;阿卜杜勒·拉扎克《两幸福之会合》,卡特尔梅尔译本,第487页。

8　卡尔梅克人[1]

关于16世纪下半叶蒙古人的统治彻底衰落之后七河流域的状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有一种迄今为止还没有被任何人研究的突厥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资料，这就是塞菲在990/1582年完成的著作，据我们所知，该著只有一种手抄本，这种手抄本保存在莱顿大学图书馆。[2] 根据这位作者的说法，卡尔梅克人当时在中亚继续占据着上风。他称卡尔梅克人的首领为阿勒坦汗，大概指的是土默特部落强有力的国王，当时他在中亚东部建立了一个辽阔的帝国，并在1552年征服了卫拉特人。[3] 哥萨克汗捷维克力发动了对卡尔梅克人的进攻，他是希盖的儿子和塔希尔的侄子[4]，因此哥萨克国家遭到了异教徒毁灭性的入侵。捷维克力逃往塔什干，当时塔什干的汗还是瑙鲁兹·艾哈迈德汗（他死于1556年）。捷维克力提议与他结成反对敌人的联盟，但瑙鲁兹·艾哈迈德答复说，即使有10个像他们俩这样的汗，也对付

---

〔1〕主要史料有：比丘林《从15世纪迄今的瓦剌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述评》；列纳特《地图》；温科夫斯基《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波兹涅耶夫《准噶尔卡尔梅克人史》；霍沃尔斯《蒙古历史》，第1卷。

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七河流域的历史几乎还没有被研究。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在喀什噶尔的史料中都有一定程度的介绍。Ч.Ч.瓦利哈诺夫摘录了其中有关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部分（《瓦利哈诺夫文集》，第79页以下）。也参见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和卓传》，萨拉赫丁诺娃译本摘录。中文史料中有关卡尔梅克人历史的摘录，参见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与吉尔吉斯人历史有关的关于准噶尔国家军事长官最后远征的资料汇编，参见罗莫金、孔德拉季耶夫《尝试对中国、浩罕和俄罗斯有关吉尔吉斯人的历史史料进行对比》，第128－132页；比较彼得罗夫《15—18世纪吉尔吉斯人封建关系概论》，第55－67页。——B.罗莫金

〔2〕手抄本，№917，第12页、14－16页、21－23页。在舍费尔的法文译本中已经出版了塞菲著作的节选，它是作为阿卜杜勒·克里姆·布哈里著作译本的附录公布的。

比较卡赫勒《伊斯兰教原始文献》。——B.米诺尔斯基

〔3〕霍沃尔斯《蒙古历史》，第1卷，第418页。

〔4〕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2册，第367页。

不了卡尔梅克人。

接下来,作者对吉尔吉斯人和哥萨克人进行了简明的概述。用他的话讲,吉尔吉斯人"与蒙古人同源,他们没有国王,只有被称为卡什 97 卡的伯克。他们既不是卡菲尔人也不是穆斯林,他们住在有通道的陡峭的山上。如果哪个国王率军进攻他们,他们便把自己的家迁往深山里,自己则把守这些通道不让任何人通过。他们滚动用毒药浸泡过的石头[1],让雪落到反对他们的敌军身上,他们制造的寒冷使敌人手脚无法活动。接着他们便向敌人发起进攻并将其击溃。他们不把死者埋在地下,而是把棺材放到高高的树上,让尸骨留在那里,直至腐烂消失。[2] 吉尔吉斯人的邻居是哥萨克人,他们有 20 万户,是穆斯林,信奉的是伊玛目阿扎姆派(阿布·哈尼发),他们有许多绵羊和骆驼,他们的住所在大马车上。他们用羊毛织成五颜六色的长袍,仿佛是缎子做的。这些长袍被运往布哈拉,在那里以缎袍的价格出售,这些长袍又漂亮又轻薄。他们还用那种羊毛做雨衣,羊毛一点儿都不透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羊吃的是这里的一些独特的青草"。

1594 年,捷维克力派使者来到了莫斯科,表示愿意授予沙皇费奥多尔本国国籍,在关于这个使团的卷宗中汗被称为"哥萨克和卡尔梅克国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有一些卡尔梅克家族已经臣服于他。[3] 1598 年,也就是在他去世的这一年,捷维克力占领了突厥斯坦和塔什干[4],这些城市在哥萨克人的控制下直到 1723 年。B. B. 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根据这一事实认为哥萨克人分裂为 3 个斡耳朵。[5] 突厥斯坦和塔什干在 17 世纪是哥萨克人实力的中心,但他们却逐渐被卡尔梅克人从七河流域排挤出去。卡尔梅克人在 17 世纪初

---

[1]根据一般突厥人的迷信说法,可以用这种石头呼风唤雨、招来风暴。

[2]可能作者从书面史料中借用来的这种说法(比较巴托尔德《1893—1894 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 3 页)未必适用于与他同时代的吉尔吉斯人。

[3]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 2 册,第 104 页。

[4]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 2 册,第 345 页以下。

[5]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 2 册,第 382 页以下。

"斡耳朵"这个术语在俄罗斯旧文献中用于表示哈萨克部落联合体,现在已经不再使用,而是用玉兹一词来取代它。——B. 罗莫金

入侵花剌子模[1]并抵达伏尔加河畔。[2]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乔罗斯汗哈拉胡拉力图将整个卫拉特人的联盟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尽管遭到了诸侯王公（台吉）的顽强抵抗，但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达到了目的。1634年，他的儿子巴图尔继承了王位，巴图尔的尊号是珲台吉。在他统治的时候，卫拉特人或准噶尔人（本义是“左翼”）的国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640 年，在他的斡耳朵中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甚至那些远走俄罗斯的卡尔梅克统治者也前来出席这次忽里勒台大会。[3] 在这里颁布了著名的卡尔梅克人《草原法典》。珲台吉本人的游牧区最初位于上额尔齐斯河附近，靠近斋桑湖上游。[4] 巴图尔与捷维克力的弟弟和继承人、哥萨克汗伊希姆进行了顽强的战争（时而有所胜利）。[5]

98

巴图尔死于 1653 年，他的死亡导致了卫拉特人联合体统一政权的衰落。俄罗斯史料中说他的儿子僧格是继承人，但根据波兹涅耶夫教授的研究[6]，他“从来也没有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成为卫拉特人联合体的统治者。可以认为，在巴图尔珲台吉死了六七年之后，他成为准噶尔[7]家族的统治者，但他的作用仅限于此”。有好几个王公也同时带有珲台吉的称号。巴图尔的长子塞策汗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游牧。

1671 年[8]僧格被杀，他的兄弟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从西藏返回，并很快与自己的兄长塞策汗展开了斗争，1676 年塞策汗在塔尔基隘口和塞兰湖附近被打败，可能臣服于噶尔丹。噶尔丹也像自己的前任一样与哥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作战。1681 年和 1683 年，他征讨塞兰，1683、1684 和 1685 年，他攻打吉尔吉斯人和费尔干纳人。1684 年塞兰

［1］阿布尔哈齐《突厥世系》，杰梅宗版，第 2 卷，第 296 页。

［2］韦谢洛夫斯基《通往伏尔加河之路上的卡尔梅克先遣队》，第 369 页。

［3］比丘林《从 15 世纪迄今的瓦剌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述评》，第 50 页、62 页。

［4］斯帕法里《1675 年俄国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穿越西伯利亚旅行纪》，第 19 页。

［5］韦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卡西莫国王和王子研究》，第 2 册，第 378－379 页。

［6］《准噶尔卡尔梅克人史》，第 245 页。

［7］准噶尔的，卫拉特的。——Б. 加富罗夫

［8］波兹涅耶夫教授如是说（《准噶尔卡尔梅克人史》，第 247 页）。

被他的统帅拉布坦攻下并被摧毁。[1] 据我们所知,从那时起卡尔梅克人在七河流域的统治权便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挑战,他们与哥萨克人、蒙古人和中国人进行的许多战争都与这一地区无关。据悉,噶尔丹是卡尔梅克珲台吉中第一位主要在伊犁河谷地区游牧的人,虽然有时他也在额尔齐斯河畔过冬。可能,从这一时期开始现在的伊犁和库尔卡尔-乌苏地区便成为珲台吉的私人财产。[2] 温科夫斯基证实说[3],突厥民族中只有布鲁特人(吉尔吉斯人)18世纪还在伊塞克湖畔游牧。

噶尔丹希望在自己的国家中建立君主专制制度,他迫害自己的亲属,其中之一也就是他的侄子策旺拉布坦于1678年成功地逃到了吐鲁番。1688年噶尔丹远征蒙古,策旺拉布坦就在这一年或者次年返回自己的故乡并定居于博洛塔尔谷地,他逐渐从这里控制了整个国家。[4] 噶尔丹已经无法返回自己的国家了,他在蒙古的军事行动也一败涂地,1697年他自杀身亡。[5] 噶尔丹死后,策旺拉布坦成为国家的唯一统治者,他很快就像以前他叔叔一样成为中国人的危险敌人。但他表面上却与中国人保持着和平,直到1714年。1714年,康熙皇帝颁布圣旨,历数策旺拉布坦的过失,要求珲台吉恢复被他剥夺的准噶尔王公的权力和土地,为此还召集王公们参加了有中国政府代表出席的大会。顺便提一下,"阿拉克山附近的游牧区"(阿拉套山)可能被赐给了霍伊特人,至于珲台吉本人则"只给他额尔齐斯河一角"。当然,策旺拉布坦不能同意这样的要求,于是爆发了战争。中国人非常了解卡尔梅克人国家的薄弱环节,也知道他们面临着来自哥萨克人和布鲁特人的长期威胁,所以不得不在与这些民族相接壤的领地上派驻重兵。中国使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情报,卡尔梅克人期待着中国人发动进攻,他们已经

99

[1]《准噶尔卡尔梅克人史》,第248-250页。

[2]比丘林《从15世纪迄今的瓦剌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述评》,第135页。

[3]《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第193页。

[4]波兹涅耶夫《准噶尔卡尔梅克人史》,第251-253页。

[5]比丘林《从15世纪迄今的瓦剌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述评》,第87页。

成群结队地向伊犁河下游迁移。[1]

俄罗斯政府想利用卡尔梅克人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局势说服他们加入俄国国籍。1719 年，哥萨克首领伊万·切列多夫带着这一建议来到了卡尔梅克人那里。[2] 早在 1717 年，策旺拉布坦便在穆扎尔特附近的哈尔基尔河畔与托博尔斯克贵族韦利亚诺夫进行过会晤。第二年韦利亚诺夫才在塔尔基山脚下霍尔果斯河附近珲台吉的冬季常驻大帐中与他告别。[3] 关于温科夫斯基大尉使团我们所拥有的资料更为详细。温科夫斯基于 1722 年 11 月来到了位于伊犁河以南纳伦河以东几俄里处的珲台吉大帐中，他在卡尔梅克人国王的宫廷中一直待到 1723 年 9 月，随着斡耳朵从一个地方游牧到另一个地方，一直来到了秋普河和贾尔加兰河。这个使团没有取得什么政治成果，尤其是在康熙皇帝死后(1722 年)来自中国方面的威胁减小了。1723 年，卡尔梅克人在与哥萨克人的争斗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占领了塞兰、塔什干和突厥斯坦。[4]

100

根据温科夫斯基的说法，卡尔梅克人能够调动 10 万兵马。珲台吉在自己的臣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凡事都听从宰桑即某些氏族首领的建议。他们中的主要首领——珲台吉的堂兄弟策零敦杜克在列普萨河和卡拉塔尔河畔游牧。从前，在此 30 年多年前，卡尔梅克人根本没有耕地，现在不仅被俘的布哈拉人(萨尔特)，而且许多卡尔梅克人都在从事农耕，并且耕地的数量还在逐渐扩大。在霍尔果斯河口附近有一座萨尔特人的小城。卡尔梅克人与俄罗斯人、中国人(在和平时

---

[1]马克舍耶夫《瑞典人列纳特在 1716—1733 年沦为卡尔梅克人俘虏期间绘制的准噶尔地图》，第 260－263 页。

[2]马克舍耶夫《瑞典人列纳特在 1716—1733 年沦为卡尔梅克人俘虏期间绘制的准噶尔地图》，第 3 页。

[3]马克舍耶夫《瑞典人列纳特在 1716—1733 年沦为卡尔梅克人俘虏期间绘制的准噶尔地图》，第 2 页。

[4]马克舍耶夫《瑞典人列纳特在 1716—1733 年沦为卡尔梅克人俘虏期间绘制的准噶尔地图》，第 193 页；利夫申《吉尔吉斯哥萨克人的斡耳朵及其草原概述》，第 2 册，第 69 页。

期)、唐古特人、印度以及马维兰纳尔进行贸易。[1]

1715/1716 年冬,被卡尔梅克人抓获的瑞典军士列纳特在推动卡尔梅克人取得军事和文化成就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是与 1715 年被派往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布赫戈尔茨考察队护卫队一起被卡尔梅克人抓获的。列纳特在卡尔梅克人的国家待到 1733 年,教给了他们铸造加农炮的技巧,教会了他们一些手艺,甚至在他们那里建立了印刷厂。[2] 在他回国后所绘制的准噶尔地图上[3],详细地标注了游牧人口的营帐所在地,这些营帐正如预料的那样,主要位于河上游的山脚下。在七河流域这样的营帐位于以下地区:(1)七河阿拉套山和注入巴尔喀什湖的河流上游一带;(2)阿尔滕艾梅尔和克伊本之间的地区,科克塔尔和科克捷列克之间的伊犁河以北地区;(3)克根河北岸以及恰伦河以东克特梅山北坡地区;(4)奇利克河及其支流上游;(5)秋普河畔、伊塞克湖南岸、湖西端和湖的北岸,科伊苏河和阿克苏河之间的地区;(6)大克宾河谷地[4]和楚河支流上游,直到卡拉加特。列纳特认为珲台吉的主要大帐在塔尔基山口东南部,现在的伊宁附近。

策旺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1727—1745 年)继承了他的王位。噶尔丹策零在东部也与中国人进行了战争,根据 1739 年签订的和约,他几乎失去了自己的一半领地。[5] 事实上,此后在西部他成功地使哥

101 萨克人臣服于自己,虽然后者名义上是俄罗斯臣民。[6] 有几个俄国使者因哥萨克人事务被派往噶尔丹策零那里。其中一位是乌格留莫夫

---

[1]马克舍耶夫《瑞典人列纳特在 1716—1733 年沦为卡尔梅克人俘虏期间绘制的准噶尔地图》,第 30 页、194 - 196 页。

[2]马克舍耶夫《瑞典人列纳特在 1716—1733 年沦为卡尔梅克人俘虏期间绘制的准噶尔地图》,第 5 页。

[3]实际上这是他带回的卡尔梅克人的地图,参见后面第 527 页。——B. 罗莫金

[4]琼戈克明,在现在苏联地图上是琼克明。——B. 罗莫金

[5]比丘林《从 15 世纪迄今的瓦剌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述评》,第 101 页。

[6]利夫申《吉尔吉斯哥萨克人的斡耳朵及其草原概述》,第 2 册,第 145 - 157 页。

在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卡尔梅克人向南部的天山和巴达赫尚发动了进攻。关于 1732 年对克特梅秋别的征伐,参见波塔宁《论 18 世纪与准噶尔布哈拉的商队贸易》,第 24 - 25 页;关于巴达赫尚统治者的儿子被带往伊犁河噶尔丹策零的大帐做人质的问题,参见《巴达赫尚史》,第 206 - 21a 页。——B. 罗莫金

(1732—1733 年)少校,他在 4 月和 5 月与噶尔丹策零一起从科吉格尔往伊犁河下游游牧,5 月末和整个夏季在捷梅尔里克河、克根河、卡尔卡拉河、特克斯河游牧,9 月和整个冬季直到次年 3 月末在伊犁河游牧;"开始时沿河而下,然后再逆流而上,按照惯例在科奇吉尔(科吉格尔)滞留到 5 月份"[1]。

在噶尔丹策零之后行使统治权的是他的儿子策旺多尔济(1745—1750 年)。他是被自己的兄弟喇嘛多尔济杀死的。此后,卡尔梅克人的国家陷入了混乱,在这一混乱时期执政的是噶尔丹策零的侄子阿睦尔撒纳。他在哥萨克人的帮助下占领了叶密立河两岸和额尔齐斯河上游,1754 年他臣服于中国人,请求他们帮助反对自己的敌人。1755 年,中国向西部派出了两支大军,用了 3 个月的时间,几乎兵不血刃地征服了整个卡尔梅克人的国家。就在这一年,阿睦尔撒纳发动了起义,次年起义被中国人镇压下去。阿睦尔撒纳逃到哥萨克人那里。1757 年,阿睦尔撒纳一度又出现在伊犁河地区,但大概不久又逃走了,因为哥萨克汗阿布赉想把他出卖给中国人。阿睦尔撒纳逃往俄罗斯领地,1757 年因天花死于俄国。中亚最后一个游牧帝国就这样灭亡了。1758 年,中国人再次派军前往卡尔梅克人的国家,对卡尔梅克人进行了可怕的大屠杀。[2]

众所周知,哥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在准噶尔国家衰落之后返回七河流域,他们名义上一度是中国的臣民。中国的防御线基本上与现在俄罗斯和中国领土之间的边界线相吻合。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权确立之前,哥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实际上是完全独立的。 102

[1]温科夫斯基《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第 234 页。——Б. 加富罗夫

[2]比丘林《从 15 世纪迄今的瓦剌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述评》,第 109 – 125 页。

魏源关于清政府 1757 年远征的资料以及卡梅尔克居民命运的资料,参见书中杜曼《18 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第 72 – 73 页。——В. 罗莫金

大事年表

公元前2世纪,乌孙人占领七河流域;塞种人向南迁徙。

约公元前105年中国派使团出使乌孙。

约公元前51年,乌孙领地分裂为两个国家。

公元前11年,部分乌孙人向西北迁徙。

公元前1年,乌孙国王伊秩靡来到中国首都。

公元5世纪初,乌孙人被柔然人赶出七河流域平原地区。

425年,乌孙向中国派出使团。

436年,中国向乌孙派出使团。

6世纪,突厥人征服七河流域。

581年,突厥帝国一分为二。

7世纪,玄奘旅行。出现关于七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最古老记载。

657年,中国人征服七河流域。

约740年,西突厥国家灭亡。

748年,中国人摧毁碎叶城。

751年,中国人在塔拉斯附近战败。

766年,葛逻禄人占领碎叶城。

约940年,哈拉汗王朝征服楚河谷地。

960年,七河流域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

992年,博格拉汗哈伦去世。

1017—1018年,东方游牧民族入侵七河流域。

1025年,图甘汗被赶出七河流域。

1031—1032年,卡德尔汗优素福死;阿尔斯兰汗苏莱曼即位。

1043年,吉尔吉斯(=哈萨克人。——Б.加富罗夫)草原游牧民皈

依伊斯兰教。

1056 年，阿尔斯兰汗被废黜。

1057—1058 年，博格拉汗穆罕默德去世。

1059—1074/1075 年，吐格利尔卡拉汗优素福在位。

1069 年，第一部突厥语长诗《福乐智慧》问世。

1074/1075—1102/1103 年，博格拉汗哈伦在位。

1090 年，喀什噶尔人洗劫阿特巴什。

1102 年，卡德尔汗吉布拉伊尔败亡。

1125 年，哈剌契丹人西迁。

103

约 1130 年，哈剌契丹人在东突厥斯坦战败。

1137 年，哈剌契丹人在苦盏获胜。

1141 年，哈剌契丹人在卡特旺草原获胜。

1142 年，第一位古儿汗去世。

1179—1190 年，总主教伊利亚三世在位，喀什噶尔和七河流域聂斯托利教总主教辖区设立。

1208—1209 年，屈出律到达七河流域。

1210 年，哈剌契丹人在乌兹根德和塔拉斯战败。

1211 年，蒙古人征服七河流域北部。

1212 年，古儿汗被废黜；屈出律登基。

1218 年，蒙古人征服七河流域。

1219 年，耶律楚材西行。

1220 年，乌古孙西行。

1221—1223 年，长春真人西行。

1227 年，成吉思汗去世。

1229—1241 年，窝阔台在位。

1229 年，阿布 · 雅库布 · 优素福 · 塞卡基遇害。

1242 年，察合台去世。

1242—1246 年，哈拉旭烈兀在位。

1246—1248 年，贵由在位。

1246—1251 年,也速蒙哥在位。

1246 年,普拉诺·卡尔皮尼旅行。

1248 年,拔都在七河流域。

1251—1259 年,蒙哥在位。

1251 年,察合台兀鲁思被粉碎。

1251—1260 年,兀鲁忽乃统治时期。

1253 年,鲁布鲁克旅行。

1254—1255 年,旭烈兀远征。

1255 年,海屯旅行。

1259 年,常德使团西行。

1260 年,推选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合汗。

1260—1265/1266 年,阿鲁忽在位。

1260 年,大臣哈巴什·阿米德去世。

1262 年,阿鲁忽在塞兰湖附近获胜。

1263 年,阿鲁忽在伊犁河谷战败。

1264 年,阿里不哥撤退。

1266 年,推举木八剌沙为察合台汗;八剌到来;木八剌沙战败并被废黜。

1268 年,海都在锡尔河战胜八剌。

1269 年,在塔拉斯召开忽里勒台大会。

1271 年,八剌死。

1282 年,察合台领地恢复平静。

1301 年,海都死。

1303 年,察八儿被宣布为汗;伯颜的使者前往巴格达。

1304 年,提出建立蒙古国家联邦的计划。

1305 年,察八儿与都哇之间爆发战争。

1306—1307 年,都哇死。

1308 年,宽督死。

1308—1309 年,塔里忽在位。

1310—1318 年，也先不花在位。

1315 年，也先不花与乌兹别克密切接触。

1318—1326 年，怯别汗在位。

1326 年，燕只吉台在位；天主教在中亚传播取得成就；笃来帖木儿在位。

1326—1334 年，塔尔麻失里在位。

1333 年，伊本·巴图塔旅行。

1334 年，不赞在位。

1334—1338 年，敞失在位；天主教传教士在阿尔马雷克。

1338—1339 年，七河流域爆发鼠疫。

1339 年，迫害基督徒。

1347 年，察合台汗在马维兰纳尔的统治终结。

1348—1362/1363 年，秃黑鲁帖木儿在位。

1360 年，秃黑鲁帖木儿征服马维兰纳尔。

1370—1371 年，帖木儿抵达科奇卡尔河。

1375 年，帖木儿进军七河流域。

1376 年，帖木儿发动新的远征；哈马儿丁战败。

1377 年，帖木儿发动新的远征，哈马儿丁在博阿姆峡谷战败。

1383 年，突厥埃米尔入侵。

1389—1399 年，黑的儿火者在位。

1389 年，帖木儿远征到达额尔齐斯河和尤尔都兹。

1390 年，突厥埃米尔向额尔齐斯河进军。

1397 年，帖木儿与黑的儿火者之女联姻。

1399 年，蒙兀儿斯坦发生内讧。

1399—1408 年，沙迷只罕在位。

1404 年，七河流域部分地区臣服于帖木儿。

1405 年，帖木儿死。

1407 年，沙迷只罕使团出使中国。

1408—1416 年，马哈麻汗在位。

1416—1418 年,那黑失只罕在位。

1418—1421 年,歪斯汗在位。

1420 年,蒙兀儿斯坦内讧;沙哈鲁的使者经过七河流域。

1421 年,希尔马哈麻汗登基。

1425 年,兀鲁伯入侵七河流域。

1428 年,歪斯汗在与萨图克汗的战斗中战死。

1428—1434 年,蒙兀儿斯坦内讧。

1434—1462 年,也先不花在位。

105 1434—1456 年,羽奴思汗在波斯。

1456—1462 年,羽奴思汗在哲台肯特。

1462 年,羽奴思汗在蒙兀儿斯坦西部登基。

1469 年,苏丹阿布·赛义德死。

约 1472 年,蒙兀儿斯坦在羽奴思的统治下实现统一。

1472 年,卡尔梅克人入侵七河流域。

1482 年,大部分蒙古人脱离羽奴思。

1487—1508 年,马赫穆德汗在位。

1503 年,马赫穆德汗及其兄弟艾哈迈德汗在与昔班尼的战斗中战败;艾哈迈德死。

1504—1508 年,哈利尔成为吉尔吉斯人的领袖。

1508 年,曼苏尔与其兄弟哈利尔和赛义德在阿拉木图附近鏖战。

1513 年,赛义德汗和哥萨克卡西姆汗在楚河河畔会晤。

1514 年,赛义德汗征服喀什噶尔。

1516 年,东突厥斯坦恢复安定;赛义德汗第一次远征七河流域。

1517 年,赛义德汗及其兄弟叶密立霍加征伐吉尔吉斯人穆罕默德。

1522 年,七河流域臣服于蒙古人;蒙古人在科奇卡尔河扎营。

1524 年,赛义德汗和哥萨克塔希尔汗会晤。

1525 年,卡尔梅克人入侵七河流域;赛义德汗出兵抵抗;蒙古人撤退到阿特巴什。

1526 年,蒙古人撤出七河流域;哥萨克人抛弃塔希尔汗。

1527 年,塔希尔汗在阿特巴什。

1529 年,一部分哥萨克人与塔希尔汗和解。

1533—1565/1566 年,蒙古拉希德汗在位。

1537—1538 年,蒙古拉希德汗战胜哥萨克人;蒙古人恢复对七河流域的统治。

1544—1545 年,拉希德汗与塔什干瑙鲁兹·艾哈迈德汗在伊塞克湖畔会晤。

1552 年,阿勒坦汗征服卫拉特人。

1552—1556 年,卡尔梅克人战胜哥萨克捷维克力汗。

1594 年,捷维克力汗派使团前往莫斯科。

1598 年,捷维克力汗征服突厥斯坦和塔什干;捷维克力汗死。

1634—1653 年,巴图尔珲台吉在位。

1640 年,卡尔梅克人法典颁布。

1671 年,僧格被杀。

1676 年,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打败塞策汗。

1681 年,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远征塞兰。

1683 年,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远征塞兰;攻打吉尔吉斯人和费尔干纳人。

1684—1685 年,拉布坦摧毁塞兰;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远征吉尔吉斯人和费尔干纳人。

1688 年,噶尔丹远征蒙古;策旺拉布坦返回准噶尔。 106

1697 年,噶尔丹死。

1697—1727 年,策旺拉布坦在位。

1714 年,卡尔梅克人与中国人之间爆发战争;康熙皇帝颁布诏书。

1716—1733 年,列纳特在准噶尔。

1717—1718 年,贵族韦利亚诺夫在珲台吉的宫廷中服务。

1719 年,切列多夫使团出使准噶尔。

1722 年,康熙皇帝去世。

1722—1723 年,温科夫斯基大尉使团出使准噶尔。

1723 年,卡尔梅克人征服塞兰、突厥斯坦和塔什干。

1727—1745 年,噶尔丹策零在位。

1732—1733 年,乌格留莫夫少校在珲台吉的宫廷中服务。

1739 年,卡尔梅克人与中国人订立和约。

1745—1750 年,策旺多尔济在位。

1754 年,阿睦尔撒纳臣服中国人。

1755 年,中国出兵准噶尔。

1756 年,阿睦尔撒纳起义;他逃往(哈萨克人那里)。

1757 年,阿睦尔撒纳死于托博尔斯克。

107 1758 年,中国人洗劫准噶尔;屠杀卡尔梅克人。

突厥斯坦史

——在突厥斯坦大学的讲课题纲

1 古代的突厥斯坦[1]

突厥斯坦坐落在比俄罗斯其他部分更靠南的地区，也是最早融入文明交流的地区。我们所掌握的对黑海北岸希腊城市的记载要早于对突厥斯坦的记载，但这些城市都是外国的殖民地，没有对当地的文化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在外高加索只有一些边界地区能够受到亚述文明的影响。在外高加索的民族其中包括波斯国王的臣民中，只提到了亚美尼亚人，当时亚美尼亚人主要不是居住在现代俄罗斯的领地，而是居住在波斯和土耳其。只有到庞培远征（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才获得了关于阿尔巴尼亚人和伊维尔人的最初信息。

突厥斯坦的古代居民，无论是农业民族（帕提亚人和外里海属于巴克特里亚的穆尔加布河沿岸地区的巴克特里亚人，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人和泽拉夫善河的粟特人）还是游牧民族（萨基人），都属于伊朗部族，他们同波斯人一样，是世界上第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的创立者。关于伊朗人的祖国问题仍然有争议。大部分资料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伊朗人的迁徙就如同后来突厥人的迁徙一样，是从东向西进行的，无论是东欧（黑海西徐亚人）的伊朗人，还是波斯的伊朗人，都来自于中亚。前伊朗时期波斯居民的残余在东北部早已消失，只是在西南

---

〔1〕这一著作中所研究的许多问题在《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中都有更加详细的阐述（参见后面第169页以下）。关于中亚古代和中世纪史的主要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图书目录，参见《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第1册，第506－542页；加富罗夫《塔吉克民族简史》，第501－538页；《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第2册，第403－486页；也参见本版第1卷图书索引（这里有在B.B.巴托尔德去世之后出版的关于7—15世纪中亚历史的出版物及某些东方史料译文的信息）。关于中亚的考古学著作，参见《苏联考古文献》；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考古学图书目录前面已经列出，第23页注释1。关于16—19世纪中亚历史著作索引，参见后面第163页，注释1。——B.罗莫金

部还长期保留着。大概可以推测这种居民与所谓的雅弗人即前亚[1]
110 的非闪米特语居民存在着亲缘关系，现在的格鲁吉亚人和其他一些高加索民族就是他们的残余。不久前查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一个地区即坎朱特地区还存在着雅弗语，但这一事实仍然有让人费解之处[2]，不清楚是应该把这些雅弗人视为该地区的土著居民还是将其视为来自西部的移民。

在西部波斯，伊朗人受到了拥有国家组织和文字的民族的影响，无论是在国家组织方面还是在文字方面，他们都对自己的东方同民族人产生了影响。可以指出伊朗人向前亚迁徙与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迁徙之间具有某种相同之处，罗马帝国国家联合体的思想为西部高卢的日耳曼移民即法兰克人所吸收，后来又被他们带到了东部的日耳曼。

中亚伊朗人中的花剌子模人在最初的独立文化生活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最近出现了一些证据表明后来成为伊朗人民族宗教的拜火教或马兹达教是在花剌子模人中间产生的。从希罗多德的话中（第3卷，第117页）也可以看出，在波斯君主专制国家形成之前，花剌子模在中亚发挥了最重要的政治作用。这种事实是与文明最初都产生于大河流域的下游（比较文明向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上游的发展）这一普遍的历史现象相符合的。

后来花剌子模的文明统治地位让给了巴克特里亚，这里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总督的驻地。印度文明的影响就是从这里传播开来的。

关于亚历山大·马其顿大帝东征之前的中亚，希腊人记载得很少。在大流士的波斯碑铭中只是列举了被波斯人所征服的地区，对征服这些地区的细节没有作任何叙述，也没有叙述在这些被征服地区所发生的事件（除了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以外）。但是在大流士陵墓的浮雕上却塑造了作为帝国成员的各民族其中包括中亚民族代表的形象，他

---

〔1〕即西亚、西南亚。从地理含义上看，包括外高加索、科佩特、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和伊朗、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以及利凡特。从政治含义上看，包括除阿富汗以外的近东、中东和外高加索。——译者

〔2〕布鲁沙斯基语——洪扎人和纳加尔人的语言，这种语言可能只在句法结构方面与高加索语言具有可比性。——M.米诺尔斯基

们身着自己的服装，因此我们从这里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珍贵的民族博物馆”[1]。

花剌子模人和印度人参加了薛西斯对希腊的远征。在亚历山大远征花剌子模和印度时，那里存在着独立于波斯人的统治者，由此可以看出，帝国在东方的疆界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缩小。

亚历山大的远征为我们留下了关于突厥斯坦的最早的地理资料，但仅仅是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的地理资料，并且只是这两条河中游沿岸地区的地理资料。关于这两条河的下游地区，希腊人后来也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概念，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两条河都流入里海。东部伊朗人的文明发展程度远远逊色于西部的伊朗人，在这方面粟特人还要落后于巴克特里亚人[2]，但是粟特人也有城市，虽然他们的城市规模不大：亚历山大主要夺取的是“堡垒”(erymata)，即当地地主贵族的城堡。其中一座城市的名称马拉坎德在现代的撒马尔罕保留下来。其中还谈到了巴克特里亚的稻谷文明，至于索格底亚纳种植什么作物，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能在外锡尔河流域既没有城市文明也没有农业文明。由于根据亚历山大的命令所编写的行军日记没有流传到今天，亚历山大东征史的原始资料也没有流传到今天，所以还有许多地理细节没有搞清楚。

在亚历山大及其亚洲后继者塞琉古王朝时期，突厥斯坦建立了几座新的城市——亚历山大、安条克、塞琉西亚等。一座安条克城建在外锡尔河，另外两座安条克城建在穆尔加布河上，这两座安条克城就是后来的上梅尔夫或“河上梅尔夫”(梅尔韦卢特，现在阿富汗境内的巴拉穆尔加布)和下梅尔夫或主梅尔夫。在安条克·索杰尔(公元前280—261年)时代，为了保护梅尔夫绿洲免遭游牧民族的袭击在绿洲四周建起了长墙——这是中亚最早的长墙建筑。[3] 在中亚(公元前3世纪中

[1]魏斯巴赫(《楔形碑文》)，例如浮雕，参见萨尔、赫尔茨菲德《伊朗岩石浮雕》。

[2]最近10年的考古工作证明B.B.巴托尔德低估了古代东部伊朗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B.罗莫金

[3]这些长墙的遗址是被苏联考古学家发现的，参见维亚济金《古代马尔吉亚纳四周的安条克·索杰尔长墙》。——B.罗莫金

叶)形成了独立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之后,新城市还在继续建立,索格底亚纳是这个王国的组成部分。欧克拉提德王国(公元前2世纪)被称为"千城之国"。从亚历山大开始日益活跃的与印度之间的交往极大地推动着文明的发展,当时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们把征服的目光指向了印度。

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中亚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北部,后来又征服了南部,他们还征服了印度的某些地区,这些游牧民在希腊文献中被统称为西徐亚人。也就是在公元前2世纪中亚开始与中国交往,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瓦解是世界历史上头等重要的事件,无论是西方(希腊)史料和远东(中国)史料都谈到了这一事件。

我们所了解的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7世纪中亚的所有情况,几乎都来源于中国史料。亚金夫·比丘林神父把这些中文史料汇集起来翻译成俄文(《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1852年)。对费尔干纳、现在东突厥斯坦或者中国突厥斯坦的文明区域以及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最早记载来自于中国人。像希腊人在索格底亚纳遇到了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一样,中国人在费尔干纳和东突厥斯坦也遇到了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中国人从费尔干纳引进了葡萄和苜蓿。此外,由于靠近游牧民,费尔干纳的养马业也很繁荣——那里出产一种特殊的良种马,为了获得这种马,中国人甚至发动了军事征讨。费尔干纳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打制金银器皿和铁制兵器:直至伊斯兰教占据主导地位的最初几个世纪,这些工业部门在费尔干纳依然非常繁荣。

在由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瓦解而引发的民族迁徙之前不久,有两个游牧民族来到了突厥斯坦,其中一个是七河流域伊宁边区的乌孙人,另一个是生活在阿姆河流域的绝大多数月氏人。中国人没有谈到乌孙的西部邻居和月氏的北部邻居康居人卷入这次民族迁徙的情况,也没有谈到康居人是否是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或者像自己的邻居一样是不久前才迁到此处的外来移民。现在已经证明[1],月氏(或者更准确

[1]这仍然是有争议的。——M.米诺尔斯基

的写法 юеши)就是在当地钱币和西方史料中都提到的贵慎或贵霜这一民族名称的汉语发音。该民族的一部分,即中文史料中的“小月氏”留在了东突厥斯坦和田以东地区。犹如大月氏人一样,小月氏人也被称为吐火罗人。大概,贵慎或贵霜这一术语更强调的是其政治意义,吐火罗更强调的是其民族意义。穆斯林时期所说的托哈利斯坦这一名称就来自于这个词,托哈利斯坦狭义指的是巴尔赫和巴达赫尚之间的阿富汗北部地区,广义指的是阿姆河上游整个左右支流地区。吐火罗人可能是雅利安人,在吐火罗人所居住的和田以东地区发现的佛教古文献中的文字证明了这一点。[1] 关于乌孙人和康居人的民族起源问题仍然是有争议的。中国人说他们是游牧民族,此外还提到了五小康居领地,五小康居领地大概是臣服于游牧人口的农耕地区,这些农耕地区位于塔什干、花剌子模、泽拉夫善河、卡塔库尔干和布哈拉附近以及沙赫里夏勃兹附近的卡什卡河。在5世纪之前的中文史料中没有提到撒马尔罕,这证明了希腊史料中关于马拉坎德被亚历山大摧毁的说法。大概正是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撒马尔罕附近地区在几个世纪中丧失了自己从前的影响,卡塔库尔干附近地区成了泽拉夫善河谷地文明生活的中心。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一根据希腊和中文史料所得出的结论。

公元前2世纪开辟的从中国到前亚的商路后来成为中国丝绸出口的主要路线,来自西方希腊罗马世界的玻璃和水晶也通过这条路线运往中国。犹如在东方的影响下中亚出现了金属加工业一样,在西方的影响下中亚出现了玻璃加工业。起初在阿尔萨息帕提亚王朝统治下后来在萨珊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受益最大,它总是竭力阻碍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直接往来,目的是为自己保留中间商的有利地位。在萨珊王朝时期,世界陆路和海路贸易的最重要的路线

[1]正如最近10年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了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人的语言极有可能属于东伊朗语系中的萨基语族。因此这种语言并非是所谓“吐火罗语”(独立于印欧语系的语言)的同源方言,吐火罗语的古文献是在中国突厥斯坦被发现的(参见后面第116页,注释16和17,以及巴托尔德《论粟特语和吐火罗语》;弗赖曼《吐火罗问题及其在国内学术界的解决》)。——B.罗莫金

都转到了波斯人手中。萨珊波斯的影响与希腊巴克特里亚文明的残余以及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影响的共同作用，提高了中亚伊朗人尤其是粟特人的文明水平。

这一时期中亚的政治生活是由地方统治者尤其是东突厥斯坦地方统治者彼此之间的战争以及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活动所左右的，有时除了地方政权与这些游牧民族展开斗争之外，中国人也与他们进行了斗争。5世纪突厥斯坦南部被海塔尔人[1]——拜占庭史料中的艾弗塔利特人征服，这个民族很可能也是起源于伊朗的民族，"贵霜кушаны"[2]这一名称被运用到它身上。粟特人臣服于艾弗塔利特人，他们的主要大本营位于巴达赫尚，他们向印度的迁徙以失败而告终。[3] 在6世纪的时候，有人说是在563年和567年间，艾弗塔利特人的国家被建立了游牧帝国的突厥人所征服，突厥人所建立的游牧帝国是当时所存在的游牧帝国中最辽阔的，它从中国边境一直延伸到波斯和拜占庭边境。因此关于这个帝国，除了中文史料外，我们还拥有波斯史料、希腊史料和亚美尼亚史料。在此之前游牧的伊朗人被彻底赶出了中亚。在7世纪的时候穆斯林在这里没有遇到他们。中亚定居的伊朗人、粟特人善于利用突厥帝国的幅员辽阔和强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粟特人垄断了丝绸贸易，他们的贸易利益导致了突厥人与波斯人之间的不和，也成为突厥人与拜占庭人之间互换使团的原因。与中国的贸易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撒马尔罕的东门被称为"中国门"。在通往中国的所有道路上，从最南部开始经和田和东突厥斯坦南部到罗布泊，直

[1] Haytal 是该名称的阿拉伯形式，但更准确的读音是 Habtal。——B. 米诺尔斯基

[2] 正如 B. Φ. 米诺尔斯基所认为的，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他的观点，贵霜的名称可能保留在兴都库什山这一地理术语中。把贵霜、艾弗塔利特等术语混为一谈的，还有特列维尔《亚美尼亚史料中的贵霜人、希奥尼特人和艾弗塔利特人》。——Б. 斯塔维斯基

[3] 在大规模但并不巩固的军事成就之后，印度北部一度臣服于艾弗塔利特统治者。——B. 罗莫金

至最北部，过了七河流域，都有粟特人的殖民地。[1] 公元前 2 世纪，中国人在七河流域和锡尔河东部只看到了游牧生活，而 7 世纪(629—630 年)的旅行家玄奘在这里看到的是耕种的农田和进行贸易的城市。总起来说，7 世纪的中国史料对突厥斯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状况的记载比早些时代的史料记载更为详细，这时在唐王朝的统治下(从 618 年开始)中国的外部实力达到了最高峰。中文史料谈到了卡什卡河谷地和泽拉夫善河谷地的稻米以及谷子和小麦的种植。在包括费尔干纳在内的三块领地当中，都有绵羊形的镀金宝座，在布哈拉则有骆驼形的镀金宝座，拜占庭使者在突厥汗的斡耳朵中见到过镀金宝座，宝座由四只金孔雀支撑，还看到过并不逊色于拜占庭银雕的银质动物雕塑，这证明了中文史料中的这些记载。宝座和雕塑显然不是突厥人制作的，而是由臣服于他们的中亚伊朗人雕刻的。甚至到了 10 世纪的穆斯林统治时期，在撒马尔罕的广场上还有木制的马、牛、骆驼和野兽的雕塑。在贵霜匿城附近(现在泽拉夫善河以北的卡塔库尔干县)有一座带有壁画的建筑，北墙上画的是中国皇帝，东墙上画的是印度的婆罗门和突厥汗，西墙上画的是波斯国王和罗马皇帝。

突厥人借用了中亚伊朗人的文字。567 年，到过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使者带来了用“西徐亚文字”书写的国书。写在许多铭文中的最古老的突厥字母流传到了今天，这些铭文中数量最多的是写于 732 年和 735 年的位于蒙古鄂尔浑河畔的铭文。丹麦学者 B. 汤姆森正是根据这些碑铭成功地解读了这种字母，俄罗斯学术界把这种字母和碑铭上的文字统称为“鄂尔浑文字”。没有标明日期但根据字母形状来判断属于更古老时期(大概是 7 世纪)的铭文是在叶尼塞河被发现的。在突厥斯坦奥利耶阿塔[2] 以南的塔拉斯河谷也找到了为数不多的鄂尔浑

115

---

[1] 关于粟特人的殖民活动，参见 Pelliot, *Cha icheou tou[tou] fou t'ou king*。也参见更新的著作：伯恩斯塔姆《七河流域的粟特殖民地》;《楚河谷地》，第 71 - 83 页；普列伊布莱克《粟特殖民地》; *Klyachtorniy, sord barcakar buqaraq ulys*；克利亚什托尔内《七河流域的粟特人》以及《中亚的粟特人》。——Б. 斯塔维斯基

[2] 奥利耶阿塔——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江布尔城。关于在现在吉尔吉斯塔拉斯河谷发现的古突厥铭文，参见最新出版的论文集《吉尔吉斯的新碑铭文物》。——B. 罗莫金

铭文。据证实,这种字母起源于粟特语,也就是中亚伊朗人的文字,在敦煌附近中国边墙的一座塔楼上发现的贸易文件便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古文献。更有证据表明后来产生的突厥字母即回鹘字母起源于粟特字母,回鹘人就是所谓东突厥斯坦最早的定居居民,他们起源于突厥人。我们是根据古宗教文献即公元7世纪前后的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了解粟特字母和回鹘字母的。所谓的粟特古文献都是使用同一种语言写成的,只不过带有一些方言差异,无论是语言还是方言都不能确定其产生的明确地点。[1] 文物是在东突厥斯坦出土的[2],因为那里的气候特别干旱,所以原稿得以保留下来,这些原稿是从各地带到那里的。这种语言的特点及其某些术语犹如月份的名称一样,与我们从11世纪穆斯林作者比鲁尼论粟特语的著作中所了解的情况相符合。希腊人把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称作索格底亚纳,穆斯林地理学家则只是把泽拉夫善河流域称作粟特。[3] 但是比鲁尼所论述的这种文字哪怕是作为书面用语到底向北方和东方传播到多远,还没有相应的资料。

形形色色的宗教代表人物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字母。粟特佛教徒采纳的是当地的字母,摩尼教徒和基督教徒则把自己的字母运用于当地语言当中。我们在突厥回鹘人那里也看到了佛教徒所使用的梵文字母。但是后来所有这三种宗教的代表都转而采用了同一种回鹘字母。流传到我们今天的某些摩尼教文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用摩尼字母书写的,另一种是用回鹘字母书写的。用两种著名的东突厥斯坦标准

---

〔1〕在粟特文字古文献中所表现出来的方言差异是非常小的: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与佛教文献的区别表明,粟特佛教徒保留了历史上的正字法规则,但在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中(用相应的摩尼文和叙利亚文写成),正字法与公元8—9世纪时的发音非常接近。B. A. 利夫希茨认为,正如粟特"古文字"(公元4世纪初)和穆格山文书所表明的,粟特书面语的基础是撒马尔罕方言。——B. 罗莫金

〔2〕现在的粟特文古文献是在粟特本土发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穆格山城堡发掘的文书(公元8世纪的前25年)。参见粟特文集。这些文书的全集(注音、译文和注释),参见利夫希茨《穆格山的粟特文书》;博戈柳博夫、斯米尔诺娃《粟特文书》。——Б. 斯塔维斯基

〔3〕10—12世纪的地理学家不仅把泽拉夫善河流域称作粟特,而且也把卡什卡河谷地称作粟特。——Б. 斯塔维斯基

语——北语(库车附近)和南语(和田以东)书写的文献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只有佛教文献。被德国和法国学术界误称为“吐火罗语”的北语属于印欧语系,但它既不是伊朗语也不是印度语。它属于历史上的哪一个著名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印欧语系民族大迁徙中曾占据过哪一个地方,现在还没有搞清。[1] 大概更有资格被称为“吐火罗语”的南语,从语法结构上看属于伊朗语,从词汇构成上看更接近印度语。[2]

在东突厥斯坦出土的文物中迄今没有发现成为波斯伊朗人至少是成为中央亚细亚西部伊朗人民族宗教的拜火教的遗迹。突厥斯坦的拜火教与萨珊波斯的拜火教相比具有自己的一些地方性特点,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突厥斯坦的纳骨器是用黏土制成的小型纳骨器,上面雕刻着凹凸不平的人物雕像,尸骨与肉体分离后将尸骨放入其中(土地不应被腐尸玷污)。这种纳骨器只是在俄罗斯的突厥斯坦被发现,它分布在从泽拉夫善河的卡塔库尔干到七河流域的比什凯克一带。上面的雕像无论对宗教史的研究还是对艺术史的研究都具有价值,它表明这里的艺术保留了古希腊艺术的传统,也受到了萨珊波斯艺术的影响。

关于前穆斯林时期突厥斯坦的宗教生活我们拥有一些文字资料,这些文字资料多半是记载主要城市撒马尔罕的。早在10世纪撒马尔罕就存在着拜火教、摩尼教和基督教团体,佛教还在前穆斯林时期就已经从撒马尔罕和其他地区被排挤出去了,但在伊斯兰教获胜之前它依然是托哈利斯坦(广义上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117

突厥斯坦在政治上分裂为许多小领地,其中最强大的统治者是撒马尔罕王公,他像费尔干纳王公一样,封号为伊赫希德。但伊赫希德也只是重要的地主贵族,他们也像地主贵族一样被称为德赫干。德赫干住在设防的城堡中,其残存便是在突厥斯坦许多地区都被保留下来的所谓可以住人的古墓,他们完全保留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方面,公

---

〔1〕参见前面第112页,注释7。详见《吐火罗语》文集。——Б. 斯塔维斯基

〔2〕这种语言的古文献大多数是在和田地区发现的,它是属于公元7—10世纪的语言,在学术界通常被称为和田-萨基语。这是留在中亚领土上的萨基人的语言,大概与传入到巴克特里亚的萨基-吐火罗方言相近。参见第112页注释7,也参见贝利《萨加语言》。——B. 罗莫金

元7世纪的突厥斯坦尽管取得了商业和工业上的成就,但与公元前4世纪时相比并无多大的差别。[1] 城市规模不大,中文和穆斯林文字史料以及考古发掘——古城遗址都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相当于穆斯林时期这一地区首位城市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阿布,占地范围还不到两平方俄里。在佛教盛行的托哈利斯坦城市生活则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二流城市铁尔梅兹从面积上看相当于撒马尔罕。巴尔赫,即古巴克特拉很可能要大得多。这说明在伊斯兰教占据统治地位的最初几个世纪,巴尔赫不仅在突厥斯坦的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作用,而且也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作用。

王公们对突厥汗有很强的依附性,他们有时也依附于中国皇帝。只有现在的外里海地区连同梅尔夫是萨珊波斯的组成部分。在某些地区(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冲制了与萨珊波斯一样的硬币。罗马建筑艺术的影响通过萨珊波斯显露出来,撒马尔罕的"铅槽"(朱伊阿尔济兹,джу-и-арзиз)——架设在集市屋顶下面、石拱门和城壕下面的铅制水管便证明了这一点,这种铅制水管是用来向城市供水的。

---

[1]B. B. 巴托尔德对资产阶级史学家中流行的在东方"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封建制度"的论点予以充分的重视,我们不能赞同巴托尔德的观点。也参见后面第173页(《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B. B. 巴托尔德在那里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公元前4世纪粟特的社会制度与公元7世纪的社会制度是相同的。B. B. 巴托尔德的假设表明当时对中亚古代史的研究还是薄弱的。苏联研究者认为,从公元前6至前5世纪到公元3至4世纪在中亚最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奴隶制关系,从公元4至5世纪开始奴隶制关系转变为封建关系。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后争论,参见《十月革命前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史联合学术会议资料》,第413-568页、585页。——Б. 斯塔维斯基

2 阿拉伯征服和萨曼王朝时代的突厥斯坦

阿拉伯征服是继亚历山大和塞琉古王朝之后第一次从西方入侵突厥斯坦,这次征服再次将突厥斯坦的一部分从政治上纳入中亚。阿姆河对岸的马维兰纳尔被阿拉伯人并入萨珊波斯的东疆——呼罗珊地区,马维兰纳尔的字面意思便是"河后面的地方",河对岸的地方。整个呼罗珊总督管辖区的主要城市是梅尔夫,马维兰纳尔的主要城市是撒马尔罕。总督库捷巴·伊本·穆斯里姆(705—715 年)的远征是主要的军事事件,他于 712 年夺取撒马尔罕,这是阿拉伯征服史上为数不多的不仅阿拉伯人对其的记载流传到今天,而且当地人的记载(712 年撒马尔罕王公致中国皇帝的信)也流传到了今天的历史事件之一[1]。为了反对阿拉伯人,当地统治者有时向突厥汗和中国皇帝求援。30 年代末阿拉伯人在锡尔河上打败突厥人导致了突厥游牧帝国的彻底衰落,虽然阿拉伯人没有对草原上的游牧人口进行追击。751 年在塔拉斯河谷战胜中国人决定着前亚文明——穆斯林文明或远东文明、中国文明这两种文明中哪一种文明在突厥斯坦占据统治地位的问题。阿拉伯人自己也把突厥斯坦看做是从中国皇帝手中夺取的一个地区。

阿拉伯人进军的前锋抵达喀什噶尔[2]和锡尔河的东部地区,他们所征服的土地到达了费尔干纳的东部边疆、奇尔奇克河谷和花剌子模,

---

〔1〕参见巴托尔德《阿拉伯征服中亚史论》。由于对 1932—1933 年在穆格山上发现的粟特文书以及古突厥铭文进行了研究,所以我们已经掌握了关于阿拉伯征服中亚史的新资料。参见克拉奇科夫斯卡娅、克拉奇科夫斯基《中亚的古阿拉伯文书》;弗赖曼《塔吉克斯坦穆格山粟特文书日期标注》;利夫希茨《恰奇的粟特使者》,《穆格山的两份粟特文书》,《穆格山的粟特文书》;克利亚什托尔内《中亚民族反对阿拉伯人斗争史》。也参见 O. 斯米尔诺娃《712 年撒马尔罕条约史论》。——B. 罗莫金

〔2〕阿拉伯人是否到达喀什噶尔还没有搞清。——B. 米诺尔斯基

也就是农耕区域与草原相交界的地区。为了保护奇尔奇克河谷免遭游牧民族的侵袭,公元8世纪建起了长墙。比如说撒马尔罕州即狭义的粟特就是由这种长墙来拱卫的。残留至今的土墙就是这些长墙的一些遗迹。呼罗珊总督或“埃米尔”是由哈里发或哈里发国家东部地区的最高总督任命的。大部分总督更换频繁,但他们却利用自己短暂的统治权来为自己谋取不动产,这些不动产后来便遗留给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即使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当地王公所建立的王朝也长期存在,但它们完全依附于呼罗珊埃米尔,有时在同一个地区与突厥王公并存的还有阿拉伯埃米尔。

119

8世纪中叶,呼罗珊地区爆发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了一个哈里发王朝——倭马亚王朝的衰落和另一个王朝——阿拔斯王朝的兴起。由呼罗珊人即中亚伊朗人还有后来的突厥人构成的军队是阿拔斯哈里发在东方的主要支柱。哈里发国家中央地区尤其是东部边疆地区的主要职务都由呼罗珊的达官显贵所把持。在阿拔斯王朝前几任哈里发时代,权倾朝野的巴尔马克家族也来自于巴尔赫[1],这个家族在9世纪从哈里发那里获得了管理马维兰纳尔某些地区的权力,从900年起成为整个呼罗珊地区的埃米尔,这表明呼罗珊地区与其他地区不同,具有重要价值。巴尔马克家族的祖先巴尔马克和萨曼家族的祖先萨曼胡达特,还在呼罗珊总督阿萨德统治时期便崭露头角了:725年巴尔马克受阿萨德委托重建在阿拉伯征服时期被摧毁的巴尔赫,他把阿拉伯人建造的毗邻巴尔赫的巴鲁卡纳城的居民迁到这里,这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上恐怕是唯一的一次为了重建一个前阿拉伯时代的城市而放弃穆斯林所建立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被征服者的文明战胜征服者文明的盛事正是在伊朗佛教盛行的区域发生的。在有关伊斯兰高级宗教神学校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产生的资料中所描述的是发生在这一佛

[1]这句话中显然有遗漏。这里谈的不仅是巴尔马克家族,而且还有萨曼家族(比较后面第222页)。正是萨曼家族9世纪从哈里发手中获得了马维兰纳尔某些地区的管理权,而从900年起在布哈拉统治者伊斯梅尔战胜了阿姆尔·本·列伊斯·萨法里德之后,萨曼家族开始成为整个呼罗珊地区的埃米尔。关于萨曼王朝起源的新资料,参见谢苗诺夫《萨曼王朝的起源》。——B.罗莫金

教盛行地区的事件，在有关中亚最早的一批宣传神秘主义的穆斯林——苏非派的故乡以及中亚波斯语言和文学复兴的资料中所描述的也是发生在这一佛教盛行地区的事件。另一方面，在伊斯兰时期，伊朗国家的传统也被佛教盛行地区的伊朗也就是中亚的伊朗所吸收，其代表便是巴尔马克家族和萨曼家族。强大的萨曼王朝的创始人伊斯梅尔 120 (892—907 年)在统治马维兰纳尔时期住在布哈拉而不是住在马维兰纳尔的主要城市撒马尔罕，在征服了阿姆河以南和以西地区之后，布哈拉仍然是萨曼家族居住地，结果管理前呼罗珊总督辖区的中心现在不得不迁往阿姆河对岸地区。

10 世纪是萨曼王朝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阿拉伯地理文献最丰富的时期。其主要作品收录在荷兰东方学家德·胡耶出版的《阿拉伯舆地丛书》(BGA)丛书中(8 卷本)。我们在其中找到了对穆斯林世界所有地区的详细描述，既列举和描绘了城市、河流、人工灌溉系统，也记载了贸易、工业、习俗、信仰情况乃至方言特点。因此，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萨曼王朝时代突厥斯坦生活的资料不仅与此前时代相比是相当完整的，而且就是与此后时代相比也是相当完整的。

只是由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我们才有可能推翻关于河流的干涸引起了中亚气候条件变化的理论。有关 10 世纪突厥斯坦的详细资料表明，这里文明区域和草原区域的分布情况大致与今天相当，也就是说如果发生过河流干涸的情况的话，那么它的进程也是相当缓慢的，千年的时间对此而言没有意义。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伊斯兰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对突厥斯坦而言是飞速发展的时代。公元 7 世纪的突厥斯坦与公元前 4 世纪的突厥斯坦差别不大，就其文明发展程度而言与萨珊伊朗时代也没有任何可比性。在这方面，10 世纪的突厥斯坦与古老的文明区域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了。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工业和商业都取得了成就。

阿拉伯人在突厥斯坦没有建过新的大城市，这一点与在波斯(设

拉子和库姆）和外高加索（甘贾或伊丽莎白波尔）[1]的做法不同，但是在阿拉伯统治时代从前城市的规模却明显扩大了。把文字资料与保留下来的前遗址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像梅尔夫、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这样的城市规模明显在逐渐扩大。前伊斯兰时期最初的城镇以及城堡和城郊居民区的方位还能准确地确定下来，城镇即沙赫里斯坦（梅尔夫的恰乌尔卡拉古城，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阿布古城，布哈拉城内突起的部分）；城堡即吉兹或库亨吉兹，分别为"要塞"和"老要塞"之意，昆杜兹即由此而来，城堡有时建在沙赫里斯坦的里面（如在梅尔夫和撒马尔罕），有时则是建在沙赫里斯坦的外面（如在布哈拉）；城郊居民区即外面围有城墙（梅尔夫的吉利亚金－奇利布尔奇土墙，撒马尔罕的吉瓦里基亚马特土墙，布哈拉现在的城墙）的拉巴德。

121

在首都迁到布哈拉之后，撒马尔罕仍然是突厥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工业和贸易的中心。撒马尔罕人从751年战役中被俘的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术，这是一种用破布造的纸，造纸术又逐渐从撒马尔罕传播到西方，并取代了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从前所使用的书写材料——羊皮纸和莎草纸。西方的纺织工业对波斯产生了影响，并通过波斯影响到突厥斯坦。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花剌子模所制作的纺织品根据埃及和波斯地区的城市得名法尔斯。位于撒马尔罕东北部的小城韦达尔是阿拉伯移民的聚居地，这里制造的韦达尔棉纺织品也享有盛名。由此可见，在迁往突厥斯坦的阿拉伯移民中不仅仅有为了信仰而战的士兵。很可能，来自伊朗的移民运动对城市生活和工业文明的传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粟特语言在平原突厥斯坦地区已经消失[2]，仅保留在山间小溪雅格诺布河谷地区的两种方言中，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粟特语让位给与波斯语差别不大的塔吉克语。阿拉伯人最初被称为塔济克人或塔吉克人，这一名称来自北阿拉维亚的塔伊部落。

---

〔1〕现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洛瓦巴德市。

〔2〕B. B. 巴托尔德可能过高地估计了波斯移民对波斯塔吉克语在中亚地区传播中的作用。迄今为止在史料中还没有发现对这种大规模移民的确切记载。正如 B. A. 利夫希茨所指出的，可以肯定在阿拉伯征服之前波斯语就已经在中亚地区得到传播（从呼罗珊）。粟特语此前就已经在城市中心地区消失。在农村地区粟特方言可能一直存在到蒙古征服时期。——B. 罗莫金

可能突厥人把塔吉克[1]这个词理解为“穆斯林”,即“来自穆斯林文明区域的人”,并将这个词作为一个民族学术语运用到他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即伊朗人身上,没有将阿拉伯人与塔吉克人区别开来。来源于加尔(“山”的意思)一词的山民加尔恰或加利恰[2],在语言特别是在日常生活条件方面与平原地区的居民有着极大的差异。山民所聚居的地区被称作加尔奇斯坦。10 世纪时的突厥斯坦语言至少是受教育阶层的语言,与波斯语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像鲁德基这样的突厥斯坦诗人能在波斯诗人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就表明了这一点。花剌子模人还继续讲自己的为其他伊朗人所不懂的语言,甚至在书面文书中也使用这种语言。[3] 可能这种语言后来不是被波斯语所取代,而是被突厥语所取代。头戴高高的软帽这是花剌子模制服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在北部的希瓦人和土库曼人那里被保留下来。人工灌溉地区的某些术语(阿尔纳——大水渠,亚布——小水渠)无疑残留着花剌子模语的痕迹,而这些术语也在希瓦人和土库曼人那里被保留了下来。 122

9 世纪时的马维兰纳尔还被视为是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地区,居民参加了与异教徒的圣战,那时还创立了地方宗教学校并确立了哈尼夫派的优势地位。死于 832 年的布哈拉学者阿布·哈夫斯被认为是“马维兰纳尔的学术大师”,正如他的墓志铭所写的那样。除了现在还存在的犹太社团之外,撒马尔罕在 10 世纪的时候还有拜火教和基督教社团以及规模不大的摩尼教社团。撒马尔罕的拜火教徒(穆格)可能负责维护“铅槽”以确保其运转良好,所以他们获准免纳穆斯林国家对异教徒征收的人头税。在 11 世纪的时候还提到了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的

---

[1]关于民族名称“塔吉克”起源于塔济(阿拉伯语)以及塔济(“阿拉伯”之意)和塔吉克这两个术语在运用于东部伊朗人时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某些反对巴托尔德的观点,参见博罗夫科夫《语言学札记》,第 50 – 53 页,但可比较利夫希茨的《穆格山的粟特文书》,第 87 – 88 页。——B. 罗莫金

[2]19 世纪关于加尔恰或加利恰的民族学资料,参见后面第 457 – 459 页。——B. 罗莫金

[3]在 A. A. 弗赖曼和 B. Б. 亨宁格的著作中对采用这种语言的文书进行了研究(参见弗赖曼《花剌子模语》;海宁《中部伊朗》,第 56 页以下)。比较奥兰斯基《伊朗语文学概论》,第 210 – 212 页和第 420 – 421 页(书目索引)。对公元 3 世纪末至 4 世纪初经济文书的研究情况,参见后面第 459 页注释 20。——Б. 斯塔维斯基

拜火教徒。10世纪在锡尔河以南的文明区域与饥饿草原交界的地带有一个基督教村落，在撒马尔罕以南的乌尔古特附近也有一座大基督教修道院，最近还在这里发现了叙利亚基督教铭文。但是当时基督徒的数量赶不上犹太人的数量。就是在穆斯林当中也残留着一些从前的观念和习俗。诗人鲁德基在自己的诗中完全用异教徒的观点表达了对天和地的认识，他把天和地分别比作人类之父母。10世纪中叶以前在布哈拉还有公开出售陶土雕像的，这种陶土雕像一开始是用作偶像的。农村地区直到此时还残留着双重信仰的习俗，什叶派在人民群众当中与正统伊斯兰教派并行传播。萨曼王朝埃米尔纳斯尔（914—943年）可能是出于对贵族阶级及其与之结盟的僧侣阶层的仇视，故而把一种什叶派运动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导致了他的统治被推翻。

总而言之，萨曼王朝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生活秩序在10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战胜旧的生活秩序：集市和工商业阶层聚居的城郊虽然在人数上已经超过了老沙赫里斯坦，但到处都继续沿用传统的观点认为沙赫里斯坦才是真正的“城市”。王公和地主贵族阶级的独立性让位给了前亚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集权制度。在萨曼王朝首都布哈拉的里吉斯坦广场四周有将近10个政府机关和谘议会。但在某些地区如同在花剌子模一样，仍有一些前穆斯林王朝的世袭统治者，有威望的德赫干依然存在。例如，在通科特（在安格连河谷，位于塔什干以南）就有一位强有力的德赫干，他虽然已经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但却依然能对人民产生影响。萨曼王朝援引阿拔斯哈里发的做法，建立了一支由突厥奴隶构成的近卫军，这是萨曼王朝的主要军事支柱，但是如同后来一样并没有严格划分出军队和人民之间的界限。居民仍然保留着自己从前的尚武习俗并继续携带武器。由人民群众构成了一支“宗教战士”志愿者队伍，他们像哥萨克自由民一样，在保卫穆斯林边界免遭突厥人入侵的同时也对国内的秩序构成了威胁。可以说这些队伍既是“政府的支柱也是引发政局动荡的因素”。城市生活的主要中心——撒马尔罕的居民被视为是不安定的因素，由于居民中有骚乱情绪，根据政府的命令摧毁了该城外城墙的大门。萨曼王朝也不能完全依靠自己

的突厥近卫军，尤其是在与突厥汗军队作战的时候。突厥近卫军首领和德赫干的背叛以及人民群众的消极冷漠导致萨曼王朝的国家在10世纪末被突厥人所征服，当时的人民群众可能既不支持萨曼王朝加强君主专制的做法，也不支持萨曼王朝强化官僚集权制度的做法，萨曼王朝国家之所以为突厥人所征服，其原因尤其在于近卫军和官僚的供养必须要靠扩大税收来实现。

像通常时候一样，在对文明区域发动征服运动之前，中亚蛮族便开始向受文明影响的区域渗透。与游牧民族的贸易给文明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好处，他们从游牧民族那里得到了畜牧业产品尤其是得到了肉和马匹。游牧民族更需要自己文明区域邻居的产品——粮食，特别是衣饰用品。在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进行贸易的各个地区——中国、穆斯林世界和俄罗斯的边界地区，游牧民族都是自己把牲畜赶到边境贸易地点，而不是坐等商人来到他们的草原上。除了他们所必需的商品之外，芦苇丛生的大河两岸适合于过冬之地也吸引着游牧民族。为贸易而来到冬季驻牧地的游牧民族可能会进行掠夺性的侵袭，所以采取了建造拉巴特（不要把它和拉巴德一词弄混）这样的措施来进行抵御，所谓拉巴特就是边境哥萨克自由民即宗教战士的设防住宅。萨曼王朝政府甚至把锡尔河中游的土地划给突厥移民，让他们承担义务保卫边疆免遭自己异教同族的进攻。此外，来自穆斯林突厥斯坦的商人还使遥远的[1]地区了解了穆斯林文明，他们部分地利用了此前粟特人所敷设的道路。主要的道路仍然是通往中国的道路，有一些道路由此向北通往某些游牧民族汗的大帐：从塔拉斯（现在的奥利耶阿塔）走81天便可以抵达基马克人在额尔齐斯河上的主要大帐。从吐鲁番附近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叶尼塞河上游吉尔吉斯人的驻地。根据中国史料，在10世纪上半叶穆斯林商人甚至到达过东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还有另外一条从锡尔河下游开始的道路可以通往基马克人的大帐，这个地区不是萨曼王朝的领地，但来自萨曼王朝的移民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商业殖

124

〔1〕在第一版中可能有错别字："个别的"。——Ю. 布列格利

民地，可能一部分殖民者来自锡尔河中游地区，那里的扫兰城是萨曼王朝马维兰纳尔的边界要塞，还有一部分殖民者来自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的富庶主要源于它与游牧民族的贸易，这种贸易大概在伊斯兰时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种贸易集中在花剌子模的北部地区，是与古尔干奇城（现在的库尼亚乌尔根奇）进行的，花剌子模的北部地区在10世纪是一块独立于花剌子模沙赫前穆斯林王朝的特殊领地，花剌子模沙赫的前穆斯林王朝只拥有该地区的南部。商人们把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文明从古尔干奇城带到了伏尔加河沿岸，居住在那里的伏尔加河保加利亚人成了穆斯林，而在可萨人的国家中近卫军是由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花剌子模人构成的。大概在伊斯兰教在可萨人国家中的统治地位最终确立之前，花剌子模人为可萨人服务，因为764年当可萨人进攻穆斯林在外高加索领地的时候，可萨军队的首领便是一位花剌子模人。萨曼王朝的国家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密切联系可以从下面的事件中略见一番：921—922年哈里发国家向伏尔加河流域派出了一个使团，使团没有抄近道从巴格达经高加索前往伏尔加河，而是绕远路经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前往伏尔加河。[1] 伊本·法德兰曾对该使团的活动作过记载。由于和游牧民族进行贸易有利可图，所以古尔干奇埃米尔更加努力，在10世纪末征服了花剌子模南部地区并把花剌子模沙赫的封号加到了自己王朝的身上，若干年之后，萨曼王朝在与穆斯林突厥人的战争中灭亡。

穆斯林的贸易成就当时并不总是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宗教成就。与佛教、基督教和摩尼教不同，伊斯兰教当时还不是一种用来传播的宗教，传播宗教是国家的事业，而不是个别人的事情。为了经商而旅行的穆斯林并不负有传播宗教的义务。在8世纪有用中文写的佛教、基督教和摩尼教文献，但没有伊斯兰教文献，虽然文字资料的记载表明，当时到中国来的穆斯林并不比前亚其他宗教的代表少。这样一来，为了

125

[1]选择这条路线的原因，参见后面第833页注释36（从第647－880页是《巴托尔德文集》第1卷第1册第2部分《高加索和东欧历史》，目前这部分还没有被翻译成汉语。——译者）。——Б.加富罗夫

传教而来的基督徒和摩尼教徒比穆斯林更多地利用了穆斯林在中亚的贸易成就。这两种宗教在中亚人民的传播中取得主要成就的时期都是穆斯林时期。受到伊斯兰教传播影响的主要是穆斯林世界的近邻,这是由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势力决定的。神秘主义者德尔维希僧人所进行的伊斯兰教传教活动,是独立于国家的意志之外的,他们几乎是穆斯林世界内外唯一的传教士代表。德尔维希僧团的谢赫在草原上的影响力要超过其在文明地区的影响力,但他们只满足于自己在最临近草原上的传教成就,并没有拓展自己传教旅行的范围。

根据 10 世纪上半叶地理学家的观点,伊斯兰教向东北地区传播的界限是与萨曼王朝国家的边界相吻合的。除了锡尔河地区的突厥人之外,各地的突厥人都与穆斯林相对抗,锡尔河地区的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与此同时成为萨曼王朝的臣民。位于同名的塔拉斯河上的塔拉斯是东北部的边贸地点,这里还在 893 年就已经被萨曼王朝所征服,并且“大教堂”被改成了清真寺,由此可见基督教在这里的传播要早于伊斯兰教的传播。但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的说法未必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他认为没有一个穆斯林到过比塔拉斯更远的地区,因为该城以外便是突厥葛逻禄人的游牧地。10 世纪下半叶的地理学家马克迪西描绘的则完全是另外一幅图画:在塔拉斯以东的村落中当时已经有了清真寺,就像以前的塔拉斯一样,梅尔克的教堂已经变成了清真寺,萨曼王朝的一位达官显贵在这个村落的附近建起了一座拉巴特。历史学家认为人数众多的突厥人(20 万帐)首次皈依基督教发生在 960 年,并且根本没有提到圣战的问题。大致可以断定这一事实与当时来自于呼罗珊的穆斯林学者克利马蒂居留在突厥汗的宫廷有关。关于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以及克利马蒂旅行的记载大概与10世纪末侵犯萨曼王朝国家的那个突厥汗国有关,这个汗国拥有楚河谷地的巴拉沙衮城和喀什噶尔。七河流域的南部和 126 东突厥斯坦的西北部虽然为高高的雪山所分割,但在游牧民族那里这些地区却往往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县的组成部分,因为在东突厥斯坦没有游牧民所必需的牧场。但高山可以阻

挡军队的行动，像所有其他游牧民族入侵突厥斯坦的文明区域一样，突厥人对萨曼王朝国家的侵犯也是从东北部的七河流域而不是从喀什噶尔发起的。在历史上喀什噶尔经常遭到来自费尔干纳方向的征服而不是相反。

127

3　哈拉汗王朝　塞尔柱人
哈剌契丹和花剌子模沙赫

征服萨曼王朝领地的突厥民族是在什么背景下皈依伊斯兰教的，并没有可信的传说流传下来。关于第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国王萨图克博格拉汗只有一些神话记载，至今仍有人指出这位汗的陵墓在喀什噶尔以北的一个村庄中。这些突厥人如此迅速地丧失了对自己前穆斯林时代文明往昔的全部记忆。从前穆斯林时代继承下来的回鹘字母一度继续与阿拉伯字母同时使用，后来这种字母被遗忘了。只有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它才被重新使用，蒙古人是从东突厥斯坦的非穆斯林居民那里得知这些字母的。在国务术语中特别是在汗的称号中保留着一些草原的前穆斯林时期传统的痕迹。例如，有些穆斯林汗称自己为中国皇帝（突厥语叫做塔布加奇汗或塔姆加奇汗），虽然他们的领地从未到达过中国，甚至也从未到达与中国交界的地区。但是穆斯林突厥人的文学却完全是在穆斯林文学特别是波斯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方面更早些时候突厥人对中国文学、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了解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突厥语模仿文学与其原创相比枯燥、乏味并且在人民当中很少得到传播的原因就在于此。把462/1069—1670年优素福·巴拉沙衮为喀什噶尔汗写的醒世长诗《福乐智慧》（作者说他的作品是第一部用突厥语写成的书，但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那里这样的书却有很多）与1082年完成的后来曾三次被翻译成突厥语的醒世作品《卡布斯教诲录》作一比较就足够了。波斯作者以生动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训诫并采用大量能够提升其著作趣味性的史例来充实自己的说教。在《福乐智慧》中所描绘的都是没有生命的讽喻式人物（国王是正义的化身，维齐尔是幸福的化身，维齐尔之子是智慧的化身，维齐尔的兄弟是

128 知足的化身)。迄今为止已知的《福乐智慧》的抄本为数不多[1],但是1909年在乌拉尔河口的萨莱奇克村发掘的文物(一个上面带有铭文的陶罐,铭文的内容就是《福乐智慧》几行诗文的代用语)却促使我们认为,这部作品曾经还是比较流行的,不像我们根据流传到今天的手抄本数量所推测的那样。

穆斯林突厥人对萨曼王朝国家的征服是从东北部开始的,首先被占领的是伊斯菲扎布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奇姆肯特县。992年,突厥军队首次攻入布哈拉,但同年被迫从那里撤军。根据996年的条约,萨曼王朝不得不把自己在泽拉夫善河以北的所有领地割让给突厥人,999年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也转到了突厥汗的手中。最后一位萨曼王朝的王位继承人在几次试图重新恢复自己王朝统治的努力遭到失败后死于1005年。这些突厥人的统治向东方扩展到多远,史料中并没有说明。998年,喀什噶尔阿尔斯兰汗阿里在圣战中"蒙难",现在还有人指出他死亡的地点是在扬吉-希萨尔东北部。由此可以断定,伊斯兰教传播的区域和穆斯林突厥人的统治当时到达了喀什噶尔以东不远的地区。

10和12世纪天山主峰两侧的地区还被统一于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这个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哈拉汗王朝或者伊列克汗国,但并不由同一位统治者来统治。如同所有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国家一样,哈拉汗王朝统治下的国家划分为封地,这些封地很快就转变为独立的领地,它们之间的界限经常发生变动并且彼此之间常常发生战争。到11世纪王朝首脑就连名义上的最高权力的所有象征都丧失了,治理各个城市的都是同样的彼此独立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都带有同样响亮的封号。在征服之后西突厥斯坦的统治者立即采用了伊列克的封号,大概这一封号低于汗的封号。第一位伊列克生活在费尔干纳的边境城市乌兹根德,他死后也被葬于此地,后来在突厥征服者的政权得到巩固之后,伊列克把自己的住地迁到了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撒马尔罕,11世纪在这里自立为汗。乌兹根德在萨曼王朝时代是一个相对不太大的城市,它

[1]参见前面第45页注释1。——Б.加富罗夫

相当于奥什城(现在安集延县[1]的一个村落,但仍具有商业意义)的三分之二,因而它一度成为整个马维兰纳尔统治者的住地,在伊列克迁往撒马尔罕之后,这里直至13世纪末蒙古人建成安集延之前仍然是费尔干纳统治者的住地。其中保留至今的建筑包括高9沙绳[2]的宣礼楼就是在乌兹根德的这一最辉煌的时期建造的。在宣礼楼的附近有一座麻札,也就是陵墓,根据当地的传说这里似乎是第一位伊列克乃至塞尔柱苏丹桑贾尔(死于1157年)的埋葬地,实际上后者的坟墓在梅尔夫。从墓志铭上可以看出,他是在稍晚些时候即12世纪末被埋葬的,不管怎么说由于突厥斯坦前蒙古时期的古迹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所以乌兹根德的建筑便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费尔干纳统治者大部分不依附于撒马尔罕,虽然撒马尔罕汗也觊觎整个马维兰纳尔地区的最高统治权,并且在12世纪末他们还自称为"苏丹的苏丹"。萨曼王朝的首都撒马尔罕在哈拉汗时代并不是汗的城市,虽然有些汗在那里建造了一些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阿尔斯兰汗建于1127年的宣礼楼(高52米)。

突厥人征服这个国家以及征服者所带来的分封体系对文明状况的影响相对不大,在文明发展方面并不存在断层的现象。在萨曼王朝时代可以追踪的历史过程在哈拉汗王朝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萨曼王朝国家的衰落一度抬高了地主贵族德赫干的地位。伊剌克[3]德赫干钱币的出现以及在叙述哈拉汗王朝战争时提到马维兰纳尔德赫干的特殊军队便证明了这一点,在萨曼王朝时期伊剌克德赫干是不享有占有者权力的。但很快德赫干就连其在萨曼王朝时期所保留的地位也丧失了。在有关12和13世纪政治事件的记载中甚至再也没有提到德赫干。从史料的缄默不语来判断,在保卫突厥斯坦免遭蒙古人入侵的时期已经没有那种勇武的骑兵队了。可能,德赫干参与了王室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后者的主要代表是突厥近卫军官),这种斗争在哈拉汗王朝时期要比前朝时期更加残酷。汗利用人民群众的支持来反对贵族,而

[1]现在的乌兹根德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奥什州府。——Б.加富罗夫

[2]俄罗斯旧长度单位,1沙绳相当于2.134米。——译者

[3]据一些伊斯兰作者称,伊剌克在呼罗珊尼沙普尔地区。——译者

贵族则有僧侣界的支持。根据僧侣界的决定，1095 年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撒马尔罕汗艾哈迈德被近卫军军官们废黜并处死，这一事件就特别具有典型性。城市生活、贸易和工业的进一步成就可能也导致了德赫干阶层的没落。在 11 世纪哈拉汗王朝统治时期，从征服时期开始的生活中心由老“沙赫里斯坦”向郊区转变的过程完成了，这里有集市，130 从前的城市转变为郊区，而从前的郊区则转变为城市。城市已经具备了它们保留到现在的形态，从城门到市中心有主要的街道，街道两旁是小商铺，街道的交会处则是中央圆顶的市场（恰尔苏）。我们在今天突厥斯坦的那些不是哈拉汗王朝领地的城市中也看到了这种过程，比如在梅尔夫。在布哈拉形成了自己的贵族城市共和国，其首脑是萨德尔，即来自“布尔罕家族”的宗教贵族，他们代表的是富裕阶级的利益。萨德尔的权力在 13 世纪初不是被汗废黜的，而是被一位手工业者领导的人民运动所废黜。

哈拉汗国家所发生的内讧为外部敌人所利用，因此王朝在 11 世纪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虽然它仍然存在到 13 世纪初。在萨曼王朝的国家衰落之际，其位于阿姆河以南的部分地区转到了另一个王朝手中，这个王朝此前是萨曼王朝的附庸，历史上被称为伽色尼王朝，该王朝得名于自己的主要城市加兹纳（位于现在的阿富汗喀布尔以南）。这个王朝的主要代表苏丹马赫穆德（998—1030 年）成功地击退了哈拉汗王朝对阿姆河以南地区的进攻，维持了自己对巴尔赫的统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附属于巴尔赫的现在布哈拉的东部地区臣服于自己。这样一来，他就征服了从前隶属于萨曼王朝的撒马尔罕。由于遭受另一个突厥民族土库曼人的入侵，马赫穆德的后继者被赶出了波斯和阿富汗北部地区。土库曼人从前居住在锡尔河下游地区，10 世纪的时候他们从那里向南迁移并在 11 世纪越过了阿姆河。土库曼人与萨曼王朝突厥斯坦征服者相比文明程度较低，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他们没有文字，他们的征服活动并不是在汗王朝的领导之下进行的。起初土库曼人是一群一群分散地来到波斯，后来土库曼首领塞尔柱的后裔——伯克（王公）领导的军队也来到这里。他们在波斯采纳了王的封号，开始自

称“沙赫”和“苏丹”。后一个称号(起初并不用来称呼某个统治者,而是一个表示政府权力机构的集合概念)首次被他们运用到正式场合以及硬币的铭文中,后来伽色尼王朝和哈拉汗王朝模仿了他们的做法。这些“塞尔柱突厥人”或者“突厥塞尔柱人”逐渐征服了整个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亚洲地区。在巩固了自己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地位之后,他们转而向东征服了花剌子模和锡尔河下游他们曾来自于那里的地区,并将哈拉汗王朝包括喀什噶尔汗纳入自己的最高统治之下。

131

他们创立了一种统治理念:这就是把“伊斯兰苏丹”作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最高世俗统治者,“伊斯兰苏丹”与穆斯林的宗教首领哈里发并列,而哈里发则以自己的宗教权威来给苏丹的政权披上神圣的外衣。

但是在塞尔柱苏丹的帝国中,尽管苏丹的波斯大臣尤其是著名的尼扎姆·阿尔穆里克(1092 年被杀)尽了一切努力,国家统一的原则仍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苏丹的亲属获得了管理辽阔土地的权利,他们可以转移自己的土地继承权,并且并不总是服从王朝首脑的统治。有时同时有好几个人拥有苏丹的称号。苏丹桑贾尔(1118—1157 年)在自己的兄弟巴尔恰鲁克和穆罕默德活着的时候是呼罗珊统治者,他住在东部,最常住在梅尔夫,在成为王朝的首脑之后依然如此。在西部当时还有其他的王子也拥有苏丹的封号,桑贾尔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权仅仅是象征性的,虽然他成功地镇压了他们发动公开暴乱的企图。在他的侄子苏丹马苏德(1133—1152 年)统治巴格达和西波斯时期,桑贾尔没有到过雷伊城(在德黑兰以东)以西的地区。在这种条件下“伊斯兰苏丹”不得不把对哈拉汗王朝领地的最高统治权让给新的来自远东的征服者,因而在伊斯兰教得到传播之后的突厥斯坦首次被置于非穆斯林民族的统治之下。

从 10 世纪初唐王朝衰落开始,中国的北部地区重新处于采纳了中国皇帝称号的异族王朝的统治之下。这些异族王朝中的第一个便是起源于契丹族的辽王朝(916—1125 年),一般认为这个民族属于通古斯

人,但也有证据表明契丹人属于蒙古人。[1] 辽王朝的最初几位统治者已经巩固了自己在满洲、蒙古和北部中国的统治地位,而且他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天朝帝国从契丹民族那里获得了自己的新名称,这一新名称在蒙古人和俄罗斯人那里保留至今。穆斯林和西欧人援引他们的做法只把华北地区称为克塔(希塔)或卡塔(哈塔),而对于蒙古征服前处于民族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国南部地区仍然沿用了旧的名称秦(阿拉伯人称宋)来称呼。契丹的统治对蒙古居民的民族成分(突厥人从这里被驱逐了,取代它的是蒙古人)和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条件(从前东部的祭祀方式为南部中国的祭祀方式所取代,游牧民族的住宅也发生了这方面的转变)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132

11 世纪突厥斯坦的穆斯林不得不抵御来自东方的非穆斯林民族的入侵,这些来自东方的非穆斯林民族被称为契丹人。契丹人更大规模的西迁发生在 1125 年辽国被来自满洲的其他移民——女真人征服之后。[2] 一部分契丹人或者按照穆斯林对他们的称呼哈剌契丹人(黑契丹)在前朝一位亲属的率领下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向中亚西部迁徙。1133 年 7 月,苏丹桑贾尔在给哈里发维齐尔的信中谈到近日喀什噶尔汗在喀什噶尔以东打败了几年前从"突厥斯坦极遥远的地区"来到那里的"卡菲尔人"。卡菲尔人的首领本人被俘。这里谈的是喀什噶尔统治者阿尔斯兰汗艾哈迈德打败哈剌契丹人的军队。历史学家伊本·阿尔·阿西尔认为这场战斗发生于 1128 年,可能它发生的时间还要晚几年。这样,哈剌契丹人经过东突厥斯坦的迁徙遭到了失败,然而他们经由北路穿越天山以北地区的迁徙却获得了成功。在离开自己的故乡之后哈剌契丹人首次在塔尔巴哈台安顿下来,他们在这里建造了叶密立城,叶密立城在今天的塔城附近。当时他们的人数达到了 4 万帐。第一位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的穆斯林统治者是巴拉沙衮汗,巴拉沙衮汗请求他们帮助自己反对与其作对的突厥首领。哈剌契丹人打败了汗

---

[1] 现代学者关于哈剌契丹起源及其语言的观点,参见前面第 48 页注释 2。——B. 罗莫金

[2] 比较前面第 49 页注释 4 及以下。——Б. 加富罗夫

的敌人,但却将巴拉沙衮据为已有并剥夺了当地统治者汗的封号。楚河谷地此后仍然是哈剌契丹王的住地,他自称为古儿汗。根据穆斯林作者的说法,这个词是“众汗之汗”的意思。[1] 中国史学家认为古儿汗是中国皇帝,用中国名称来称呼其中每一位皇帝的“统治年份”,把他们的王朝叫做“西辽”。据悉这是历史上唯一的为一个被从中国赶走的异族王朝保留中国皇帝封号的范例。14 世纪,中国官方称之为蒙古王朝的元王朝在蒙古人被赶出中国之后,便被认为是终止了,虽然这个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度还统治着蒙古。

古儿汗从楚河两岸逐渐征服了东突厥斯坦和西突厥斯坦的哈拉汗王朝。至于和喀什噶尔汗的战斗则没有史料记载。阿尔斯兰汗艾哈迈德之子易卜拉欣汗被称为是“殉难者”(沙希德)。可能他是在与哈剌契丹人的战斗中牺牲了。东部天山的非穆斯林地区臣服了古儿汗。撒马尔罕汗马赫穆德 1137 年在苦盏附近被哈剌契丹人击溃,但哈剌契丹人当时不知为什么没有利用自己的胜利征服马维兰纳尔。1141 年,古儿汗对马维兰纳尔的内讧进行了干预,就像当年在巴拉沙衮一样,只不过这一次他站到了突厥的军事贵族一方,因为马赫穆德汗转而求助于自己的叔叔苏丹桑贾尔。1141 年 9 月 9 日,苏丹的军队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旺草原被击溃,穆斯林大概阵亡了 3 万人。撒马尔罕汗与苏丹一起逃往呼罗珊,他的兄弟和继承人易卜拉欣成了古儿汗的纳贡者。

关于最强有力的穆斯林苏丹在与非穆斯林的战斗中战败的消息传到了当时正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穆斯林作战的十字军那里,由此引出了关于基督徒教士国王约翰的传说。[2] 根据这些传说,有一位从东方向穆斯林发起进攻的基督徒国王将到达耶路撒冷,并将在那里帮助自己同教派的人彻底打败基督教的敌人。还说他 1145 年到达了底格里斯河。实际上哈剌契丹人并不抱有广泛的征服目的,他们只满足于征服最毗邻的穆斯林的地区包括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就连

---

〔1〕比较前面第 50 页注释 9 和 10。——Б. 加富罗夫

〔2〕关于这一传说主要著作的书目索引,参见斯普雷《伊朗的蒙古人》,第 498–499 页。——B. 罗莫金

位于阿姆河右岸的铁尔梅兹也仍然掌控在塞尔柱苏丹手中。

哈剌契丹人的国家与一般类型的游牧帝国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哈剌契丹人继续过着游牧生活，但与其他游牧征服者不同的是他们更多地接受了中国文明。在他们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税收体系是中国按户征税的体系：每户收取1个第纳尔（约5卢布）。此外，在谈到第一位古儿汗时还说，他没有向任何人分封采邑，也没有把超过100个以上的人交给任何人来领导。后来我们在古儿汗的国家中没有发现分封制度存在的迹象，但是其中也不存在统一的国家管理：从前的地方性王朝到处都继续存在，他们是古儿汗的附庸，并且我们后来在蒙古统治俄罗斯的各个历史时期都看到过的所有三种类型的附庸关系都同时呈现出来。在许多地区与当地统治者并存的是古儿汗的常驻代表。在某些地区例如在花剌子模，古儿汗的代表只有收取贡赋的时候才偶尔来到这里。最终，布哈拉萨德尔在13世纪初自己把贡赋运送到了古儿汗的斡耳朵，就像后来的莫斯科王公自己把贡赋运往金帐汗国一样（12世纪中叶在布哈拉有古儿汗的总督，给他的命令是完全按照萨德尔的建议行事）。

134

在12世纪下半叶，哈剌契丹国家的疆界与苏丹桑贾尔时代相比有一些拓展。现在不仅铁尔梅兹隶属于其最高统治之下，而且巴尔赫也服从它的最高领导。但总体上看，哈剌契丹人并不热衷于继续展疆拓土，甚至也没有采取措施反对加紧备战的穆斯林附庸及其邻居[1]，后来他们举起了圣战的旗帜。随着苏丹桑贾尔的死去（1157年），塞尔柱王朝在东方的实力不复存在，此后倾向于认为中亚的“伊斯兰苏丹”首先是西波斯的塞尔柱苏丹，然后是在阿富汗强大起来的古尔王朝，最后是承自于花剌子模塞尔柱总督的花剌子模沙赫，“伊斯兰苏丹”的职责是尽可能地将穆斯林从异教徒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在花剌子模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

---

〔1〕在B. B. 巴托尔德的文中是这样写的。显然这里指的是哈拉汗王朝——哈剌契丹的附庸与塞尔柱王朝和花剌子模沙赫之间的战争。——Ю. 布列格利

期，当时这个地区是一个强大国家的核心，其统治者能够对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亚洲地区提出霸权要求。花剌子模沙赫捷克什[1]（1172—1200年）在与自己穆斯林竞争对手的斗争中占据上风，1194年在与他进行战斗时，最后一位西波斯塞尔柱苏丹吐格利尔战死。捷克什及其前辈曾多次与哈剌契丹人作战，但都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成绩。甚至捷克什的儿子和继承人穆罕默德（1200—1220年）在其统治之初与古尔王朝作战时还继续向哈剌契丹人进贡以获取他们的帮助。但他后来宣称自己是把穆斯林从异教徒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的解放者，1210年他在塔拉斯河畔击溃了哈剌契丹人的军队。虽然这一胜利并不彻底，但它仍然给苏丹带来了很高的荣誉，此后苏丹便自称"亚历山大第二"和"苏丹桑贾尔"，并且他开始幻想征服中国并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这些主宰世界的理想由于外部敌人的对抗，也由于没有得到苏丹的穆斯林居民的同情而未能实现。当时建立大国的想法在穆斯林世界从总体上看并不受欢迎。在穆斯林世界的历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政治势力的增强与贸易和文化成就之间存在着联系，就像后来在西欧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在穆斯林世界内部，政治上的分裂丝毫也没有削弱各个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巴格达那样的统一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却形成了一系列彼此竞争的都城，并且每一位地方王公都为自己笼络了一批文学和科学活动家，以便为自己的宫廷添光添彩，这种做法只是促进了文化上的繁荣。[2] 对穆斯林而言，外部世界已经不能成为军事行动的目的，但穆斯林商人和文化活动家在政府不提供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却走得比穆斯林军队要远得多。12世纪，穆斯林军事阶层的代表同时为南俄罗斯的波洛韦次汗和中国北方的满洲皇帝服务。战胜中亚穆斯林的哈剌契丹人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但穆斯林文化

[1]塔基什，可能是图基什。——B. 米诺尔斯基

[2]B. B. 巴托尔德在这里指出了在那些由于哈里发政权的衰落而获得更大独立性的国家和地区文化得到了发展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但他只是片面注意到形成了一系列首都和统治者的庇护这些促进文化发展取得成就的状况，而没有指出经济发展状况（其中不仅包括首都，而且包括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的增加），也没有指出当地传统的复兴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的情况。——B. 罗莫金

活动家在他们国王的宫廷中的活动也取得了成就。最后一位古儿汗的大臣是一位穆斯林商人马赫穆德·巴伊。穆斯林商人出入东蒙古，蒙古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甚至被他们所掌控。贸易形式是以货易货，可能这种贸易并没有因为马维兰纳尔货币体系的混乱而受到影响[1]，从11世纪到13世纪那里的迪尔亨姆（银币）是用铜来冲制的，也就是使用一种类似铜币的货币。穆斯林人工灌溉专家的活动为蒙古史诗中所塑造的神奇堤坝建造者——勇士萨尔塔克塔伊（萨尔塔克塔伊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伊朗人"，即穆斯林文化的代表）的形象提供了蓝本。

苏丹穆罕默德甚至没有赢得被他解放的突厥斯坦居民的好感。在布哈拉他站到了贵族阶级的代表一方。人民运动的首领梅利克（王公）桑贾尔被从布哈拉带到花剌子模。贵族首脑萨德尔得以返回布哈拉，但后来萨德尔也被废黜并被送往花剌子模。穆罕默德与哈拉汗王朝的关系更糟糕。驻留在撒马尔罕的花剌子模卫戍部队引起了人们如此强烈的愤怒，以至于"苏丹的苏丹"奥斯曼也完全同意自己臣民的意见，他发动起义反对自己的解放者并重新与哈剌契丹人亲近起来。穆罕默德不得不采用血腥手段镇压刚刚被他解放的居民。在哈剌契丹人的庇护下保持着自己政权的哈拉汗王朝被消灭了。七河流域巴拉沙衮

136 城的居民在塔拉斯附近的战役之后便期待着解放者的到来，他们对哈剌契丹的军队关上了大门，但穆罕默德却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城市被哈剌契丹人夺取。就在这一时期前后，来自蒙古的"鞑靼"游牧民族的军队出现在七河流域和喀什噶尔。13世纪初，蒙古发生了骚乱，结果在

137 铁木真的领导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铁木真的封号是成吉思汗。

---

〔1〕参见达维多维奇《所谓"白银危机"时期中亚的城市、手工业和货币流通》。——B.罗莫金

4　蒙古征服

成吉思汗帝国的形成不仅与某些民族和部落之间的政治斗争有关,而且还和草原贵族与人民之间的阶层斗争有关。成吉思汗是贵族阶级的代表,平民团结在他的对手札木合周围,札木合大概模仿哈剌契丹人自称古儿汗。札木合挑动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来反对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和他的拥护者是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根据蒙古传说,札木合被俘,1204/1205 年冬在成吉思汗战胜了居住在外贝加尔地区的蔑儿乞人之后被处死。但穆斯林史学家志费尼谈到某个勇士古儿汗[1]时说他离开成吉思汗来到了穆斯林那里,1220 年蒙古人占领布哈拉后他被处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札木合在蒙古的活动失败后来到突厥斯坦避难。

蒙古所发生的事件引起了"鞑靼人"向突厥斯坦草原的迁徙,"鞑靼"当时是一个表示蒙古民族名称的词。后来中国人、穆斯林以及欧洲人也用同样的词来称呼蒙古征服者。蒙古的争斗在 1208 年才结束,当时蔑儿乞人和生活在西蒙古的乃蛮人被彻底打败。他们起初向南逃亡,来到回鹘人的国家,自古就有一条商路从那里通向蒙古。此外,乃蛮人还受到了回鹘文明的影响。成吉思汗在他们的国家中接触到了回鹘文字,并在自己的人民中推行这种文字。

但是号称亦都护的回鹘首领在 1209 年开始反对逃亡者,他打败了逃亡者,也摆脱了从前所依附的哈剌契丹人,并宣布归附成吉思汗。于是乃蛮人的首领屈出律来到了哈剌契丹人的直属领地,大概是七河流域的南部。蔑儿乞人走的是更北面的线路,后来在 1216 年被成吉思汗　138

〔1〕另一种说法是戈克汗。——B.米诺尔斯基

的军队消灭于图尔盖州[1]。1211年成吉思汗的军队出现在七河流域的北部可能就与追击蔑儿乞人有关。该地的穆斯林统治者——葛逻禄的阿尔斯兰汗仿效信仰异教的回鹘亦都护的做法摆脱了哈剌契丹人归附成吉思汗。蒙古人进一步西征的成就被1211年开始的成吉思汗与统治华北地区的金王朝之间的战争延迟了几年。因此屈出律在中亚建立的国家能够存在若干年。

据某些资料记载,屈出律起初与古儿汗关系相当密切,古儿汗视他如儿子一般。也有记载说,他与苏丹穆罕默德和其他穆斯林运动代表建立了同盟。不管怎么说,他进一步的行动表明他既断绝了与古儿汗的关系,也断绝了与穆斯林的关系。古儿汗被他俘获,并且事实上已经被废黜,虽然在死前他表面上还继续享有国君的待遇,实际上屈出律则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

与穆罕默德的冲突可能是由于哈剌契丹帝国的分裂而引起的。敌对行动发生在锡尔河和喀什噶尔。又有关于从东方进攻穆斯林的消息传到了十字军那里,这一次穆斯林的敌人的确是基督徒:根据伊斯兰史料记载,屈出律和大部分乃蛮人皈依了基督教,虽然他在哈剌契丹帝国误入偶像崇拜的歧途,他可能信仰了佛教或道教。因此很自然关于教士国王约翰的传说就被安到了屈出律身上。有一个消息完全合乎情理,说伊斯兰教的首领——巴格达哈里发纳斯尔以共同反对"伊斯兰苏丹"为由亲自通过聂斯托利派主教与屈出律拉关系,因为"伊斯兰苏丹"像其前任一样要求哈里发放弃在巴格达的世俗权力以有利于苏丹。我们认为这则消息就来自于十字军的那些叙述。

屈出律在自己国家内部也与穆斯林进行了斗争。在他还视穆斯林为自己的盟友时,释放了喀什噶尔汗,他称喀什噶尔汗为自己的朋友,这位喀什噶尔汗显然是在穆斯林起义时期被古儿汗投入监狱的。在来到喀什噶尔之后,汗便被当地贵族杀死。为了给朋友报仇,屈出律连续四年将喀什噶尔地区抢掠一空,最终迫使居民屈服。

[1]在咸海以东。——B.米诺尔斯基

此后他便成了穆斯林的敌人。自从在中亚传播开始,伊斯兰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遭到迫害。伊斯兰教公开的礼拜活动被禁止,要求穆斯林或者皈依基督教或者尊奉偶像崇拜,或者至少放弃穆斯林的服饰改穿契丹服饰。某些人受到了军队留宿这样的惩罚,也就是采取了路易十四反对胡格诺派的措施。处死穆斯林神职人员和田谢赫阿拉·阿德金·穆罕默德就是这种迫害的例证之一,他被钉死在他所建造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大门上。

在最后一位古儿汗执政年代发生了暴乱。暴乱时期在当时穆斯林世界最东北部的伊宁边区形成了一块新的穆斯林领地,当时那里的主要城市是位于现在伊宁西北的阿尔马雷克,这块新领地处于匪首布扎尔的统治之下。他也与屈出律作对,像喀什噶尔汗一样,他宣布归附成吉思汗。屈出律成功地在狩猎的时候抓获并杀死了布扎尔,但是布扎尔的遗孀接管了阿尔马雷克的领导权,之后阿尔马雷克成功地坚持到成吉思汗派出的援军赶到。

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局势下,苏丹穆罕默德不能采取行动来完成自己沽名钓誉的计划,屈出律也不想到发动一次进攻性的战争来反对苏丹。穆罕默德不得不从哈拉汗王朝从前的领地中把费尔干纳及其以北和以东的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奇尔奇克河和阿雷斯河文明带割让给屈出律。穆斯林史学家说苏丹自己将这些地区抢掠一空,以免落到屈出律手中。但1221年来到这里的中国长春真人却提到他一路上见到的城市,而没有谈到有任何抢掠的痕迹。从苦盏到河口的锡尔河两岸是穆罕默德的国界,从扫兰往下游既不属于萨曼王朝也不属于哈拉汗王朝的河流地区是其国家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瑟格纳克城(现在的苏纳克库尔干遗址)及其毗连的地区,这一区域在12世纪下半叶还处于非穆斯林的钦察人的统治之下,但11世纪初伊斯兰教不仅在河的上游而且在河的下游地区都获得了完全的统治地位。穆罕默德到过锡尔河下游几次,并从那里发动了对北方的征讨行动。在1216年夏季进行的一次讨伐中,他的军队在图尔盖州与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军队遭遇,当时术赤正在追击蔑儿乞人。在与苏丹进行战斗之后,蒙古人连夜撤退。

可能双方都把这场战斗看做是一场偶然的误会，早些时候开始的两国间的和平交往并没有因这场战斗而遭到破坏。而和平交往的首倡 140 者便是苏丹，1215 年（这一年北京被蒙古人占领）或 1216 年初（这一年成吉思汗返回蒙古），成吉思汗在北京接待了苏丹的使者。历史学家只提到了这个使团来访的一个原因：梦想征服中国的苏丹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有人向他发出了警告，使者的使命就是要查明这一消息是否可靠。可以预见到还有其他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苏丹指望与成吉思汗结盟反对屈出律。此外，由于与屈出律关系破裂，常用的经东突厥斯坦前往中国的商路被切断了，成吉思汗的领地当时已经抵达七河流域的北部地区，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开通一条新的商路。的确有一支商队与使团同行，或者在使团之后不久就来到了成吉思汗那里。很遗憾，无论是使团的路线还是商队的路线都没有记载。我们甚至不知道成吉思汗在哪里接待了商队。成吉思汗在 1219 年间进军的路线使我们推测出使团行进的方向是先到七河流域的北部，然后再从那里前往额尔齐斯河，很可能 1218 年春天从蒙古到苏丹领地来的使团和商队所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当然这是成吉思汗所采取的对苏丹的回访行动。

使团由 3 位在成吉思汗那里任职的穆斯林率领。据悉，使者只是向苏丹倡导和平并建立安全的贸易关系。苏丹给他们以满意的答复，尽管他感到屈辱的是成吉思汗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也就是把他视为自己的封侯。使团离开之后不久，便有一支由 450 名清一色的穆斯林商人组成的商队来到了锡尔河以东穆罕默德领地的边界城市奥特拉尔，商人携带着 500 峰满载货物的骆驼。商人们在奥特拉尔被当做奸细扣留起来然后被处死，他们的货物被抢劫一空。只有一位赶骆驼的人逃脱之后返回蒙古。这一灾难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奥特拉尔总督以及苏丹本人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史料的记载有相互矛盾之处。不管怎样，当苏丹命令杀死来到他这里要求雪耻并引渡罪犯的成吉思汗的一位使者（根据另一种说法）或者所有 3 位使者（这一次使者不是穆斯林）时，他要自己的总督承担责任。把这些事实进行对比，表明蒙古人对突厥斯坦的征讨是苏丹所作所为的直接后果。蒙古学者所相信的

似乎是哈里发邀请蒙古人来反对苏丹的说法是无法被证实的。前面所援引的哈里发与苏丹的近邻——成吉思汗的敌人屈出律关系密切的说法要可信得多。

1218年，大概在奥特拉尔灾难之后，成吉思汗派统帅哲别诺颜去攻打屈出律。尽管屈出律仇视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的另一个敌人回鹘亦都护也组织了一支不大的队伍(300人)参加了征讨行动。蒙古统帅以宗教自由的保护者出现，他宣布每一个人都可以信奉自己父亲所信仰的宗教。这样一来，蒙古军队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七河流域南部、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屈出律的穆斯林臣民和附庸们（在后者当中有一位是费尔干纳统治者，他是巴拉沙衮人）转到了蒙古人一边，居民纷纷杀死住在他们家中的屈出律士兵。喀什噶尔人后来对历史学家志费尼说：他们感到蒙古人的到来是上帝的恩典。屈出律从喀什噶尔逃往萨雷阔勒岭[1]，在那里被追上杀死。与屈出律的措施相反，遗留下来的哈剌契丹人（可能也包括乃蛮人）与穆斯林融合并接受了穆斯林的服饰。一位异教徒统帅成功地完成了伊斯兰苏丹所无力完成的把穆斯林从卡菲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事业。

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穆罕默德很难以保卫伊斯兰世界免遭卡菲尔人入侵的名义将人民和军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从前苏丹曾以敌对行动来激起宗教代表反对哈里发。1217年，他派往巴格达的队伍由于遭受冰雪和库尔德人游击行动的打击在库尔德斯坦山区覆灭，这一事件被解释成因为发动有罪的远征而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此外，苏丹与团结在他母亲图尔干[2]可敦身边的突厥军事贵族也处于敌对状态，图尔干可敦控制着花剌子模。还在1216年苏丹就吩咐杀死图尔干可敦的拥护者——有名望的谢赫梅日德·阿德金·巴格达迪，他是现存的库布列维德尔维希僧团创始人谢赫涅什姆·阿德金·库布拉的学生。最终，在奥特拉尔对穆斯林商人的屠杀使伊斯兰苏丹丧失了与举

〔1〕根据志费尼的说法是逃往巴达赫尚。——B. 米诺尔斯基

比较本版第1卷，第470页注释3。——Б. 加富罗夫

〔2〕正确的读法是捷尔肯 Теркен；比较本版第1卷，第400页注释4。——Ю. 布列格利

世闻名的穆斯林商业代表之间团结起来的一切可能性，而成吉思汗又对这一事件采取了报复行动。把13世纪发生的事件与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事件进行对比清楚地表明：与近代欧洲历史不同，在中世纪伊斯兰历史上那些孕育了商人的民族的贸易成就和政治实力之间很少有一致之处。

成吉思汗远征苏丹国家时穆斯林商人一路伴随，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忠实盟友。当然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详细地了解当地的地理条件功劳就在于他们，战争计划的完成证明了他们所提供情报的正确性。1219年秋，有两位穆斯林统治者率领自己的军队在七河流域北部投到成吉思汗的麾下，这两位穆斯林统治者一位是葛逻禄的阿尔斯兰汗，另一位是阿尔马雷克的苏克纳克特勤。回鹘亦都护包尔奇克也率领自己的军队来到了那里。此前成吉思汗在额尔齐斯河畔度过了夏天。成吉思汗曾吩咐转告苏丹承认后者是西部的国王，而他自己是东部的国王。这种对敌人军事力量的高度重视也在他准备战争的本性中显现出来：1211年远征中国时，成吉思汗本人率领自己所有的儿子亲自出征。苏丹当然知道敌人已经逼近的消息，但他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迎击敌人。由于与自己的母亲处于敌对状态，苏丹的国家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甚至官僚集权制都被废除，作为官僚首脑的维齐尔的职权被由6名显贵构成的委员会所取代。人民并没有从这一改变中获得好处，他们认为满足1位官员还是要比满足6位官员容易。苏丹为了进行战争搜刮了一些钱财，在1年之内提前收取了3年的赋税，但这些钱并没有花在其用项上。苏丹决定在撒马尔罕及其城郊周围修建长墙，但这项工作甚至还没来得急开始。由于国王本身及其王朝极不受军队和人民的欢迎，所以妨碍了适宜的抵抗组织的出现。苏丹知道，一旦他把人数众多的军队集中在一个地区，例如集中在锡尔河一线，那么这支队伍在战胜了外来的敌人之后就会转而指向自己的国王。因此军队被分散安置在各个地区和城市。蒙古人之所以与从前游牧民族的入侵不同，他们没有与敌人进行任何旷野上的鏖战便成功地征服了突厥斯坦，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只需围攻城市，甚至一支微不足道的队伍

就能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从奥特拉尔向锡尔河上游派出的队伍总共只有5000人。

除了这支队伍以外,1219年底成吉思汗抵达奥特拉尔时还从自己的军队中抽出了两支:一支由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留下来围攻奥特拉尔;另一支由长子术赤率领向锡尔河下游进军。两支军队都在1220年4月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成吉思汗率领主力从奥特拉尔经克孜勒库姆沙漠来到努拉塔,又从努拉塔前往布哈拉和撒马尔罕。1220年2月夺取布哈拉。由此可见,之所以可能穿越沙漠是因为季节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成吉思汗穿越沙漠证明从那时起物理地质条件发生了变化,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1220年3月,成吉思汗到达撒马尔罕,他的两个儿子在占领了奥特拉尔之后也赶来与他会合。他们的军队一部分在撒马尔罕陷落后被派往苦盏,那里的蒙古人遇到了总督帖木儿梅利克的最顽强的抵抗。有20500名蒙古人和50000名俘虏参加了围城战。这些数字反映了蒙古人惯用的作战方式的特点:在攻城的时候他们驱赶俘虏也就是被抓获的附近农村居民走在自己前面,让他们充当自己的挡箭牌并强迫他们为蒙古军队修路,有时也让他们排成队伍分发给他们旗帜,以便使蒙古军队看起来比实际人数多。当帖木儿梅利克不得不撤离城市时,他乘船向锡尔河下游驶去,突破占据着河岸的蒙古军队的包围圈,然后弃船骑马逃往花剌子模。

成吉思汗在卡尔希过了夏天,秋天攻下了铁尔梅兹。1221年春天,他渡过阿姆河占领了巴尔赫,1222年10月才渡河返回。1221年,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的大军占领了花剌子模。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在同一年占领并摧毁了呼罗珊城其中包括梅尔夫。1220年派军渡过阿姆河追击苏丹穆罕默德,这支军队继续西行,1223年在卡尔卡河击溃俄罗斯人,经里海以北的草原回到成吉思汗那里,但这支队伍中的绝大部分人因陷入伏尔加河流域保加利亚人的埋伏而牺牲。

穆斯林不仅在许多地区对蒙古人进行了积极的抵抗,而且有时甚至还一度将蒙古军队赶出他们所占领的地区。1220年,帖木儿梅利克

从花剌子模发动了第一场穿越阿拉尔东岸草原的讨伐行动，将术赤的军队从距锡尔河口不远的谢赫尔肯特城（现在的占肯特遗址）赶走。1222年又从一度摆脱了蒙古统治的梅尔夫胜利进军布哈拉。但到1223年这种抵抗被彻底镇压下去，成吉思汗及其儿子们集结于锡尔河州东部的库兰巴希草原，慢慢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苏丹穆罕默德及其王朝的代表并没有积极参与所有这些事件。1220年初，苏丹派军占领了克利夫（18世纪前不像现在这样位于河的右岸，而是位于河的左岸），他大概寄希望于保卫阿姆河防线，但撒马尔罕陷落后在蒙古军队还没有到来时他便从河岸撤离。在波斯毫无目的地游荡了一阵子后，他在里海东南岸的一个岛屿上找到了避难所，1220年死在那里。苏丹逃亡的消息促使他的母亲图尔干可敦不顾成吉思汗的劝说离开花剌子模，成吉思汗知道他们母子处于敌对状态，所以他竭力争取这位母亲站到自己一边来。成吉思汗规劝说，自己只是因商人在奥特拉尔被杀一事而报复苏丹，他不会触动王后掌管的地区。图尔干可敦离开花剌子模之后带着自己的拥护者占领了马詹德兰的两座要塞。这两座要塞在1220年夏就已经失守，王朝成员中的王子全部被杀，王后和公主被俘，在战争结束后她们被送往蒙古。与苏丹一起来到避难岛屿上的有他的3个成年的儿子，在父亲死后他们来到了花剌子模。大儿子贾拉勒丁被立为苏丹，但军队中的暴乱情绪起初迫使贾拉勒丁后来又迫使他的兄弟们离开这一地区。只要王朝代表离去就能平息任何内讧行为。图尔干可敦的一位亲属被宣布为苏丹。首都古尔干奇城在经过了顽强的抵抗之后被蒙古人占领，除了被俘虏的工匠、年轻的妇女和孩子以外，驻防军和居民全被杀死。苏丹贾拉勒丁1221年与蒙古人战于阿富汗，但与成吉思汗主力的决战（11月24日）是在印度河畔展开的。决战的结果是他率领残兵败将成功地逃往印度，后来才返回并仍然在波斯和外高加索发挥着某种政治作用（在1231年前），但他既没有回到突厥斯坦也没有回到花剌子模。对贾拉勒丁的记忆完全取代了蒙古人对他父亲的记忆，他们把其所知道的关于苏丹的一切包括在奥特拉尔屠杀商队一事都记在了贾拉勒丁的身上。

中国长春真人受成吉思汗的召唤动身西行，正是由于有了长春真人的旅行，我们才能拥有目击者对蒙古杀戮之后突厥斯坦状况的叙述。长春真人 1221/1222 年在撒马尔罕过了冬，1222 年春他动身前往阿富汗成吉思汗那里，夏天重回撒马尔罕待了一段时间，秋天又回到阿富汗，同年 10 月与成吉思汗一起渡阿姆河返回。蒙古人在为其服务的工匠的帮助下使道路保持完好无损，当时的路况比现在的路况更好。在塞兰湖附近的塔尔基山口，道路在河的两岸之间来回穿行，为此架起了 48 座木桥。长春真人过楚河时走的是木桥，过塔拉斯河时走的是石桥。阿姆河上有一座浮桥。架桥和修桥由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负责。中亚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他的封地，还在其父亲在世时他就在某种程度上行使了这里的国家政权。察合台的斡耳朵在伊犁南部的伊宁边区。在阿尔马雷克，蒙古政权的代表与地方王公同时并存，这是因为伊宁边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穆斯林城市中只有撒马尔罕不在穆斯林而在哈剌契丹总督管辖之下。在撒马尔罕所采取的反对穆斯林居民的措施虽然并不基于宗教迫害，但却多多少少使人想起了屈出律的措施。 145 穆斯林只能与哈剌契丹人、中国人和唐古特人共同拥有不动产。那里有许多中国工匠，显然他们是与蒙古人一起来的。但就生活环境而言，城市仍然是纯穆斯林式的，每逢周五男人和女人便匆匆忙忙赶往清真寺，当时还允许进行聚礼。不履行这一义务甚至还会受到惩罚，由此可见基层警察机构的权力依然掌握在穆斯林手中。有人对长春真人说，在蒙古人劫掠之前城市中有 10 万多户人家，在劫掠之后只剩下了1/4。但从前的生活还在继续，集市上有许多商品。长春真人甚至觉得这里的花园比中国的花园还要好，但这里也有许多饥民，长春真人在返回撒马尔罕之后把他剩余的食品分发给了他们。城周边则有强盗在活动，这些强盗来自于破产的农民，从城里经常可以看到燃烧的火光。 146

5 成吉思汗帝国

从长春真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军事行动结束后蒙古人立即采取措施恢复被占领地区的福利生活。那种认为蒙古人似乎不懂得文明，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会把所有的土地都变成牧场的观点遭到了事实的驳斥。至少蒙古统治者不能不明白，他们从市民和地主那里获得的收入要多于从游牧民那里获得的收入。显而易见，委托蒙古人或者委托游牧民来管理文明地区会给国家收入带来损失，尤其是国家收入被视为是汗家族的公共财产。世袭财产的观念被从私法的领域引入到国家法的领域。帝国属于整个家族：每一位王子和公主都有权参与国家财富的分配，但帝国的管理是一项公共事业，并且国家管理的组织方式是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如同成吉思汗在世时一样，当家族的首领是一个其威望得到公认的人时，那么所有的问题都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在成吉思汗继承人窝阔台（1229—1241 年）统治时代，个人的管理便为大汗家族各支的代表会商决定。窝阔台既没有继承他父亲的卓越才能，也没有继承他父亲的顽强意志，但就其精神品质而言，他比其他人更能够成为那种王朝和帝国所需要的团结统一的核心。

在整个帝国都由一种全国性的权力机构来以大汗的名义行事，虽然成吉思汗在世时便给每个儿子分封了专门的封地。这方面的原则是从私法那里借用的，父亲在世时便分封长子，把自己私产即最初的财产留给小儿子。例如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就继承了蒙古和蒙古正规军的主力，其他封地的远近程度是根据儿子的年龄来决定的。因此长子术赤的封地随着帝国疆界的拓展越来越向西推进，在成吉思汗和术赤死去的那一年（两人都死于 1227 年，儿子去世的时间比父亲稍早一些）他的领地从额尔齐斯河一直延伸到“蒙古骑兵马蹄所及之处”。在中亚的文明地区中，锡尔河下游和花剌子模北部连同这一地区的都城

147

都是术赤的封地。古尔干奇,或者按照蒙古人的称呼叫做乌尔根奇,在蒙古人的劫掠之后很快就在旧址旁边的新址上重建,并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察合台的封地与术赤的封地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以及七河流域接壤。窝阔台分得的是西蒙古和塔尔巴哈台。尽管帝国幅员辽阔,但3位受封儿子的斡耳朵彼此之间还是离得很近:术赤的斡耳朵在额尔齐斯河,窝阔台的斡耳朵在塔城附近,察合台的斡耳朵在伊犁。窝阔台在被立为大汗之后不住在自己的封地(但死后他的遗体被运往那里安葬),而住在他父亲的祖地——鄂尔浑河畔的喀拉和林城,其遗址位于现在的额尔得尼召寺附近,他和他的继承人在位时聘请穆斯林和中国建筑师为其建造了宫殿,西欧和俄罗斯工匠也参加了宫殿的建造。对一个面积不大(旅行家鲁布鲁克把喀拉和林与巴黎的圣丹尼斯村进行了对比)但在短期内(喀拉和林从1260年便失去了帝国首都的地位)便出现了各种文明代表建筑杰作的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似乎将不仅仅只为中亚文明史的研究提供珍贵的资料,但最初的考古发掘尝试(1912年)却辜负了这些期望,暂时还没有进行其他的尝试。[1]

当然蒙古宫廷中的伊斯兰文明的代表大部分来自于马维兰纳尔城,这一地区在窝阔台执政时代由大汗本人委任的马赫穆德·亚拉瓦奇统治,他是花剌子模人,住在苦盏。在他统治时期的1238年布哈拉爆发了农民起义,当时布哈拉已经从1220年的劫掠中恢复过来,农民起义的矛头既指向蒙古人,也指向地方贵族。在起义被镇压之后,由于马赫穆德说情使城市免遭被惩罚的命运。还不十分清楚马赫穆德与察合台的穆斯林大臣哈巴什·阿米德之间的关系如何,一说哈巴什·阿米德生于奥特拉尔,另一说他生于克尔米涅。同马赫穆德一样,他也是一位富商。察合台是蒙古习惯法的倡导者和伊斯兰教的敌人,但有一位穆斯林文化顾问为他服务。当然,这位谋士不是他从虔诚的穆斯林中选出的。一位有威望的布哈拉谢赫塞菲·阿德金·巴哈尔济在致哈

[1]关于最近在蒙古包括喀拉和林所作的考古发掘,参见基谢廖夫《蒙古的古城》。——B.罗莫金

148 巴什·阿米德的信中激烈地指责后者对伊斯兰教庇护不够。哈巴什·阿米德甚至被认为是处死某些宗教界代表——优素福·塞卡基和马尔吉南的贝哈·阿德金的罪魁祸首。关于此人还说他被埋葬(1260 年)在他自己建造的哈纳卡中,由此可见他也修建了一些宗教建筑。

由于与察合台发生了冲突,马赫穆德·亚拉瓦奇在 1238 年以后很快就被迫离开马维兰纳尔,他被任命为北京总督,1254 年死在北京。窝阔台容忍了破坏自己权力的做法原谅了自己的兄弟。但还在窝阔台在世时,马赫穆德之子马苏德·伯克就被委任为从回鹘到花剌子模所有中亚文明区域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死前(1289 年)一直保有这一职位,尽管在这半个世纪中发生了许多变故。被认为是穆斯林敌人的窝阔台之子贵由(1246—1248 年)批准了对他的任命。他在 1251 年的政变之后依然保留了自己的权力,当时帝国的最高统治权由窝阔台后裔的手中转到了拖雷后裔的手中,并且察合台家族也因涉嫌密谋反对刚刚登上大汗宝座的拖雷长子蒙哥(1251—1259 年)而与窝阔台家族一起遭受打击。这时察合台的封地名义上由他孙子的遗孀兀鲁忽乃[1]掌管。帝国的实权由术赤和拖雷的后裔来分割。术赤之子拔都势力范围的终止之地和蒙哥势力范围的开始之处在塔拉斯河稍微往东一些的地方。在马维兰纳尔,政府权力由拔都来行使,他死后由他的兄弟别儿哥来行使,别儿哥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穆斯林宗教界站在他一边。兀鲁忽乃也是穆斯林的庇护者,有时甚至可以说她本人就是一个穆斯林。帝国的两部分都承认马苏德·伯克作为文明区域统治者的全权。1251 年他来到了回鹘人的地区,1255 年来到撒马尔罕,他在撒马尔罕宴请了正准备率军前往征服前亚的蒙哥的兄弟旭烈兀。13 世纪 50 年代他在布哈拉建造了一座大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这座宗教学校大概建在里吉斯坦,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马苏迪亚"。他在喀什噶尔也建起了这样的"马苏迪亚"。更值得注意的是,可汗的基督徒妻子——蒙哥和旭烈兀的母亲捐资在布哈拉建造的另一座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得名

[1]奥尔吉娜。——B. 米诺尔斯基

“哈尼亚”）。这两所学校每一所都有近千名学生。大概在蒙古征服之前，突厥斯坦还没有这种大型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布哈拉的“马苏迪亚”在1273年波斯蒙古人攻占城市时被毁，但后来可能被重建了，因为1289年宗教学校的建造者本人被葬在了这里。

马苏德·伯克是察合台之孙阿鲁忽的靠山，为了重新恢复自己家族在中亚的权力，阿鲁忽在13世纪60年代初期利用了拖雷儿子之间的内讧。令穆斯林尤其是令谢赫们感到伤心的是，别儿哥的总督被赶出了马维兰纳尔城。谢赫塞菲·阿德金·巴哈尔济的儿子被杀，但哈巴什·阿米德的儿子归附了阿鲁忽。在阿鲁忽时期最后一座从别儿哥手中夺回的城市是此前重新成为大贸易城市的奥特拉尔，夺取奥特拉尔所依靠的是马苏德·伯克征集来的资金。1266年，在阿鲁忽之后兀鲁忽乃之子木八剌沙成了大汗，他是一位穆斯林。他不是在通常的斡耳朵伊犁登基的，而是在靠近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安格连登基的，这一事实表明在此之前中亚的蒙古人已经开始接受了伊斯兰文明的影响。下一位汗八剌[1]也是穆斯林，他死于1271年，虽然是按照异教徒的礼仪安葬的。八剌汗也吸引马苏德·伯克为自己服务，他不得不承认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的最高统治权，海都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蒙古国家在中亚的独立地位。为了解决与国家体制相关的问题，海都在塔拉斯召集了各盟代表大会，会议决定王子住在山区和草原，不得靠近文明地区。文明地区的治理和为王子征税的工作由国家首脑海都委任的专门人员来负责，这一职责也落到了马苏德·伯克身上。在马苏德·伯克死后，他的3个儿子依次继承了这一职务：前两个儿子生活在海都统治时期（海都死于1301年），住在喀什噶尔的第三个儿子生活在海都之子和继承人察八儿时代。

由上述可见，成吉思汗帝国国家体制的基本特征在中亚起作用的时间比在被蒙古人所征服的其他国家起作用的时间更长久。在13世纪50年代，帝国还保持着统一的形态。虽然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二元

[1]更正确的拼写是 Барак。——B. 米诺尔斯基

性,但整个帝国的钱币都是以蒙哥汗的名义冲制的,即使在拔都和别儿哥的国家也是如此。蒙哥之前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在钱币上冲制蒙古汗的名字。这种钱币的大量出现可能是与此时蒙古人的赋税征收体系由窝阔台时代占优势的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有关。1260 年事件的结果是蒙古大汗变成了中国皇帝(首都从喀拉和林迁往北京),独立的蒙古国家在俄罗斯(金帐汗国)、波斯和中亚形成了。在金帐汗国和波斯迅速建立起某种统一的国家管理制度,也出现了作为其象征的国家货币,这些钱币上都刻着当地汗的名字。在中亚蒙古大汗长期是游牧民族的首脑,他并不直接管理文明地区,也没有为此而设立一个国家机关,除了钱币以外。治理整个文明地区的是汗所委任的最高统治者,此外在个别城市中还有世袭的统治者(梅利克),他们冲制了自己的钱币。历史文献、铭文以及钱币都谈到了布哈拉、奥特拉尔、沙什(塔什干)、苦盏、费尔干纳(连同主要城市乌兹根德)和塔拉斯的梅利克,甚至还谈到了阿尔马雷克的梅利克,尽管该城离汗在伊犁河的斡耳朵很近。可能在喀什噶尔没有梅利克,但那里有萨德尔,萨德尔是民政部门的首脑。阿尔马雷克的萨德尔被梅利克赶到了喀什噶尔。总而言之,贵族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的斗争在整个蒙古人统治时期一直都在继续,民主政治的代表便是萨德尔和梅利克。[1] 一位中国的丞相太傅曾一度治理过布哈拉,中亚历史上之所以存在过布哈拉的铜币上冲制着阿拉伯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铭文这种特殊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中亚要协调游牧民族与定居居民的利益比在其他蒙古国家更困难一些。蒙古人的征服并不是民族迁徙,也与寻找新的土地无关。[2] 成吉思汗的征服活动几乎对蒙古部落民族疆界的拓展没有产生任何影

---

〔1〕巴托尔德把梅利克解释为民主政治的代表是没有说服力的:不清楚他在这里所说的民主指的是什么。——B. 罗莫金

〔2〕B. B. 巴托尔德在这里只注意到蒙古和蒙古人本身,并没有考虑到蒙古部落迁徙的事实(哈萨拉人和凯塔基人),他还把蒙古人和突厥人完全区别开来。实际上许多蒙古突厥民族部落(B. B. 巴托尔德接下来谈到这些部落群体时还使用了普通名词"游牧民族"、"游牧成分"等)群体是混合在一起的。他们的大规模迁徙是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的征服直接相关的,并且他们的迁徙也伴随着对土地、牧场等的占领。对 B. B. 巴托尔德关于蒙古人迁徙规模观点的重新审视,参见彼得鲁舍夫斯基《13—14 世纪伊朗的农业和土地关系》,第 42 – 43 页。——B. 罗莫金

响。绝大多数蒙古人仍然留在蒙古,成吉思汗自己也返回了蒙古,他的继承人也生活于此。蒙古正规军的总数为12.9万人,小儿子拖雷继承了其中的10.4万人[1],还继承了蒙古。成吉思汗的其他3个儿子每人得到了4000人(其余的13000人在王朝的其他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但是蒙古人远征的结果不能不引起游牧民族从东向西的迁徙,总而言之不能不引起中亚游牧成分力量的加强。在中亚从察合台死(1242年)到海都即位(1269年)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汗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整个军事力量的游牧民族的近邻便对文明地区的生活状况产生了影响,尤其是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蒙古人侵期间已经被洗劫一空的那些地区的影响。从传教士鲁布鲁克的叙述中可以看出, 151 在几乎没有饱受战争之苦的伊犁河以北的七河流域的部分地区,许多城市在1253年前已经消失变成了牧场。中国旅行家常德1259年在楚河谷地也见到过大量的废墟。

这些资料所记载的可能是一些规模不大的城市,规模较大的城市则成功地与草原居民的压力抗衡了较长的时间。鲁布鲁克曾经过一座"萨拉秦人的"城市即穆斯林的城市金恰特(坎杰克),该城位于塔拉斯城稍北一些的大河塔拉斯河上。在伊犁河以北还有一座"相当好的城市",城中居住着"讲波斯语的萨拉秦人",再往北一些有一座"大城市"海伊拉克(海押立),鲁布鲁克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佛教徒,他们在这座穆斯林城市(该城曾经是葛逻禄阿尔斯兰汗的都城)有3座神庙。在海押立城外不远有一座只有基督徒居民和基督教堂的村庄。在此之前旅行家"很久没有见到教堂了"。由此可以看出,鲁布鲁克在经过楚河谷地的时候绕过了一个基督徒的村庄,比什凯克[2]和托克马克附近带有碑文的墓地就是这些基督徒的。在他提到的村庄所在地至今也没有发现这种基督教的古迹。欧洲人当时还没有利用经过中亚的商路。1262年从金帐汗国来到布哈拉,1265年又从布哈拉前往中国的威尼斯

[1]此处人数与后文人数不同,原书就是如此。——译者

[2]比什凯克从1925年更名为伏龙芝城,现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Б.加富罗夫

人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兄弟可能是在这些国家进行贸易的欧洲人的先驱。

13 世纪 70 年代对布哈拉而言是这座城市整个悠久历史中最灾难深重的时期。1273 年,布哈拉在波斯蒙古人入侵时遭到了毁灭性的劫掠。3 年后该城又饱经地方暴乱之苦,在此之后城市荒芜了 7 年。马苏德·伯克受海都的委托负责该城的重建工作。在海都统治时期还建起了一座新城——安集延,后来安集延直到 18 世纪初一直是费尔干纳的主要城市,由此可见建城的地点选得非常成功。安集延是中亚少有的并非国王为自己建造的城市(无论是海都还是他的后继者都不在此居住)的典型,它可能单纯就是为发展贸易而建立的。

蒙古帝国一度把远东的文明国家和前亚的文明国家统一为一个国家。在西部像花剌子模和伏尔加河流域这样的地区成为一个政治统一 152 体的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之间从前只有文化和经济联系。所有这一切大概都对国际关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另一方面在 13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汗家族的内讧又阻碍了贸易关系的巩固。当然这种内讧并没有影响中国和波斯之间的海上贸易,统治中国和波斯的是成吉思汗后裔的同一支系的代表,他们赞同彼此之间建立密切的同盟关系。中亚的蒙古国家所受的内讧之苦最为强烈,因为该国的生活状况取决于商队贸易。1304 年海都死后不久,之所以在中亚很快就向所有的蒙古国王提出了重新恢复帝国统一的建议,其原因就在于此。根据这一建议实现统一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便是在中国皇帝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之下建立国家联邦,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条约已经签署,但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因为从 1305 年起中亚的蒙古人之间又发生了内乱。霸主地位重新从窝阔台后裔的手中转到了察合台后裔的手中。从那时起形成了“察合台国家”这一术语。游牧民自称“察合台人”,他们构成了王朝的军事力量,而且这一名称一直保留到出身于察合台后裔的汗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个时代形成的中亚标准语被称作“察合台语”,在其他与蒙古征服有关的名称中没有一个能享有如此殊荣。在金帐汗国,成为民族名称的并不是术赤的名字,也不是拔都的名字,而是他们的后裔乌兹别

克(1312—1340年)的名字,他在位时期伊斯兰教及其文明的统治地位第一次在汗国巩固确立起来。

在察合台汗国,国家转变为伊斯兰教国家或者至少在文化传统和国家组织方面深受穆斯林文明影响的决定性步骤是在怯别汗(1318—1326年)统治时期完成的。在木八剌沙和八剌之后的汗当中,怯别汗第一个迁居马维兰纳尔。这一次汗选择了卡什卡河谷地纳赫舍卜城附近的地方。怯别汗在离纳赫舍卜2法尔萨赫(12至16俄里)的地方建起了宫殿,卡尔希城便得名于这座宫殿(卡尔希在蒙古语中就是"宫殿"之意)。舒卢克捷配遗址是前蒙古时代的城,火车站附近的佐哈基莫罗恩遗址是14—15世纪的城。怯别汗在察合台汗国使用了全国性的钱币,并采纳了波斯和金帐汗国的铸币体系。他冲制了第纳尔和迪尔亨姆,而且像从前一样第纳尔并不是金币而多半是银币。迪尔亨姆是更小的银币,其重量相当于1/2所洛特尼克[1]。1第纳尔等于6迪尔亨姆。在中亚这些钱币后来根据怯别汗的名字被称为怯别币。铜迪尔亨姆的消失和银本位制在中亚的恢复是在13世纪下半叶。很可能怯别汗援引波斯的做法,把国家划分为小的行政区和纳税区——土绵。在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使用的不是土绵这一术语而是奥尔秦。 153

怯别汗没有皈依伊斯兰教(这并没有妨碍后来为他建起了伊斯兰风格的陵墓),但他是一位公正的君主和穆斯林的庇护者。他的兄弟塔尔麻失里(1326—1334年)也住在卡尔希附近,塔尔麻失里则成了一位穆斯林。根据当时人的说法,这有利于和穆斯林世界的贸易。然而汗迁居到城市并与要求保持游牧生活方式的蒙古习惯法决裂也产生了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后果。从中国记载中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塔尔麻失里的兄弟笃来帖木儿与他同时执政,中国人认为笃来帖木儿是整个汗国的君王。笃来帖木儿之子不赞领导了反对塔尔麻失里的行动,后者被废黜并遭到杀害。骚乱持续了十多年之久,给七河流域的城市生活带来了最后一次打击。那个时代的作家根据旅行者的记载描述了一

[1]旧俄重量单位,相当于4.266克。——译者

副满目疮痍的国家的图画:“远处显现出一座村庄,村落建造完好,四周花草茂盛。满怀着能遇到居民的希望走近村庄,却发现屋里空无一人。国家所有的居民都是游牧民,根本不从事农耕。”14 世纪下半叶在楚河谷地已经没有城市了。在塔拉斯河还剩下一座亚内(新)城,帖木儿向那里派出了自己的总督。15 世纪这里的城市生活完全停止了,到了 16 世纪已经不能断定楚河和塔拉斯河上的独立遗址群是哪些城市的遗址了。

在骚乱期间,马维兰纳尔一度重新归附生活在东部的汗,居住在马维兰纳尔的汗也曾经打算向东进军。最终,14 世纪 40 年代在合赞汗统治时期马维兰纳尔爆发了汗与突厥氏族贵族之间的争斗。合赞汗也住在卡尔希附近,他的宫殿赞吉尔萨莱位于从该城往西走两天的地方。有一些重要的游牧家族与汗一起统治马维兰纳尔和毗邻的阿富汗的特定地区。这些家族共有 4 个,人数有 4000 人,是成吉思汗赐给察合台的。这 4 个家族分别是:苦盏的札剌亦儿氏、卡什卡河的巴尔拉斯氏、阿姆河上游地区的考钦氏和阿富汗北部的阿儿剌氏。这样一来,从前建立在大汗家族成员之间分配土地基础上的分封体系便让位给另一种分封体系,这就是在世家大族的首领之间分封土地。合赞汗试图在马维兰纳尔恢复汗的强权,结果导致了他的统治被推翻(1346 年),此后一切权力都转移到了世家大族的埃米尔手中。突厥伯克和蒙古诺颜便开始使用这种阿拉伯 - 波斯术语来表达。成为国家首脑的埃米尔被称为兀鲁思埃米尔(兀鲁思——部落、民族、国家之意),兀鲁思埃米尔只承认成吉思汗的后裔有继承汗位的权力,从他们当中扶植傀儡汗继位。这种原则也在从前察合台汗国的东部地区确立起来,那里的杜格拉特家族是主要的家族,它掌控着喀什噶尔的西部和七河流域的南部直到伊塞克湖的地区。但在汗国不同的地区埃米尔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在马维兰纳尔,从埃米尔中产生了一位像帖木儿这样的统治者,他把权力留给了自己的后代,在他们统治时期甚至不再扶植傀儡汗继位了。在喀什噶尔汗是比埃米尔更有才能的人,他们建立了汗王朝的统治,逐渐剔除了杜格拉特家族的权势并恢复了从前的分封制度,汗家族的成

员是这些封地的首脑。但是蒙古国家组织的传统在西部比在东部保留得更多,另一方面东部的游牧民更珍惜蒙古民族的传统。马维兰纳尔的游牧民只把自己称作“察合台人”,他们视自己的东部邻居为强盗流民——詹捷。在察合台汗国“察合台”和“詹捷”这两个术语是彼此对立的,其含义犹如金帐汗国的术语乌兹别克(汗的军队)和哥萨克(逃脱合法汗政权管辖的流民)一样。同时喀什噶尔和七河流域的游牧民自称蒙古人(蒙古人的民族名称,以及现在阿富汗“蒙古人”的名称,后者是保留了自己姓氏和语言的蒙古征服者的仅存后裔),而把自己西面的邻居称为卡拉乌纳斯,即杂种——血统混乱的人。

伊斯兰教思想和穆斯林法——沙里亚是与蒙古的国家传统及民族传统相对立的。但有时蒙古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也竭力利用伊斯兰教思想,皈依伊斯兰教,经常利用它来作为反对蒙古人的武器。察合台人和蒙兀儿人如同波斯和金帐汗国的蒙古国家组织的代表一样都是穆斯林。但在游牧居民的国家生活和民族生活中,宗教原则仅仅处于次要地位,因此蒙古国家的衰落可以被视为是宗教的胜利。

随着蒙古帝国的解体,在各个地区开始产生了地方性的穆斯林王朝,并且在这些王朝的钱币上不再刻有统治者的姓名,有时只冲制一些宗教俗语。其中经常遇到的便是“王国属于真主”,以此来突出神权政治思想,并否定与宗教不相关的国家组织。在花剌子模也冲制了带有这种铭文的钱币,花剌子模在14世纪60年代察合台国家解体和金帐汗国的骚乱开始之后(金帐汗国的骚乱是在1357年贾尼伯克汗死后发生的)又重新统一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这个国家处于突厥化的蒙古昆格拉特家族的统治之下。当在帖木儿统治下强大起来的察合台国家想收复花剌子模南部的时候,统治者侯赛因·苏菲回答帖木儿的使者说:“你们的国家是进行战争的区域(异教徒的领地),穆斯林的职责就是与你们战斗。”可见,在花剌子模人的眼中,察合台人不是穆斯林,而察合台人同样也把蒙兀儿俘虏卖为奴隶,认为他们也不是穆斯林。

在蒙古统治时期,商队贸易的成就对花剌子模和它的都城乌尔根奇影响最大。农耕文明的地位比前蒙古时代和现代要低得多。1333

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旅行时在从乌尔根奇到布哈拉的一路上除了恰特(现在的谢赫·阿巴斯韦利[1])以外,没有见到过一个村落。但是乌尔根奇却被描写成突厥国家中“最大、最重要、最漂亮”的城市。乌尔根奇的集市上人流拥挤、水泄不通。欧洲旅行者甚至说乌尔根奇是一个大贸易城市,所有的商品在这里都销路甚广。在蒙古人洗劫之后,城市被迅速重建,甚至就连前蒙古时代的文化传统都没有中断:12 世纪初在那里设立的唯理论神学家——穆尔太齐赖派学校继续存在到 14 世纪末。12 世纪在花剌子模和锡尔河下游就已经产生了充满虔诚穆斯林精神的突厥语文学。14 世纪,当这些地区成为金帐汗国的组成部分时,它们对突厥文学而言仍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些地区的作家是在察合台汗国作家之前出现的,虽然突厥标准语后来被称为“察合台语”。花剌子模也吸引着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后来对帖木儿国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很可能,在老乌尔根奇遗址中保留下来的 14 世纪前半期的华丽建筑物对帖木儿国家的建筑产生了影响,也对金帐汗国的城市建筑产生了影响,比如说保加尔城。至于这种影响 的详情只有在详细研究了这些花剌子模古迹特别是其中最好的古迹——秋里亚伯克哈内姆陵墓[2]之后才有可能确定。现在已经完全查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阿姆河在蒙古入侵之后再次成为通往萨雷卡梅什盆地和从这里沿乌兹博伊谷地通往里海的航道[3],这一航道的开辟对与伏尔加河和高加索的贸易往来产生了影响。在乌兹博伊河汇入里海之处有一个村庄,船只可以从这个村庄沿河上行,但乌兹博伊河上

156

[1]后来的沙巴兹,即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的一个行政区的中心,现在的比鲁尼。——Б. 加富罗夫

[2]关于乌尔根奇及其古迹,参见雅库鲍夫斯基《乌尔根奇遗址》;皮利亚夫斯基《乌尔根奇和米兹达赫干》。M. E. 马松对秋里亚伯克哈内姆陵墓建造的时间及其方位的确定提出了疑义。参见马松《库尼亚乌尔根奇所谓秋里亚伯克哈内姆陵墓的年代》,第 86 - 87 页。——Б. 斯塔维斯基

[3]对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以及更能充实 B. B. 巴托尔德观点的论据,参见后面第 725 - 727 页,也参见 B. B. 巴托尔德的著作《从古代到 17 世纪咸海和阿姆河下游的资料》。B. B. 巴托尔德的著作没有最终解答有关阿姆河和乌兹博伊河道的问题。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托尔斯托夫《追踪古花剌子模文明的足迹》,第 296 - 316 页;《阿姆河下游　萨雷卡梅什　乌兹博伊》,特别是第 5 - 34 页和第 267 - 347 页。——Б. 斯塔维斯基

高达4沙绳的瀑布妨碍了从老乌尔根奇到里海的连贯航路的形成。有资料表明,锡尔河在15世纪初并不是流入咸海,而是流入阿姆河;以此可以断定14世纪中叶锡尔河下游尚存的城市已经荒芜,虽然据我们所知这一地区既没有经受帖木儿远征之苦,也没有饱受其他军事行动的折磨。

157

6　帖木儿和帖木儿帝国

来自于巴尔拉斯家族的帖木儿出生于沙赫里夏勃兹附近，1360年当他转向一度征服马维兰纳尔的蒙兀儿汗秃黑鲁帖木儿一方时开始崭露头角，由此他当上了巴尔拉斯封地的王公。接下来他或者与蒙兀儿人结盟，或者与其他察合台埃米尔结盟来反对蒙兀儿人。1365年，有一次当察合台埃米尔包括帖木儿听任国家由蒙兀儿人摆布时，撒马尔罕的统治权转到了民族运动的首领手中。他们成功地打退了外来的敌人，但次年却因埃米尔的背信弃义而牺牲，埃米尔起初感谢他们成功地保卫了城市并表示完全信赖他们，这使他们丧失了警惕性。埃米尔在彼此之间发生冲突时也使用了这样的斗争手段，帖木儿之所以获得胜利也得益于这种行动方式。反对兀鲁思埃米尔的起义与从前反对汗的起义一样，其爆发的主要原因都在于最高统治者竭力要把自己的驻地尤其是自己的国库迁往设防的城市，以摆脱自己同族人的控制。帖木儿的前任埃米尔侯赛因也想这样做，为此他选择了巴尔赫城。帖木儿以他的叔叔阿卜杜拉为例来劝阻他，说他的叔叔曾打算把撒马尔罕作为自己的都城，结果引起了察合台人的起义。但是侯赛因并没有听从帖木儿的劝告。帖木儿的预言应验了，而不满者的首领正是帖木儿本人。侯赛因被废黜并被处死，政权于1370年转到了帖木儿手中，帖木儿在获得成功之后也立即做了与曾被他责难的前任同样的事。还在更早以前他就在沙赫里夏勃兹和卡尔希建起了堡垒，现在他在撒马尔罕为自己建立了设防的首都，并把国库设在了他建造的撒马尔罕城堡中。

处死遭废黜的侯赛因被赋予合法性，根据《古兰经》所承认的血亲复仇法，死刑由埃米尔凯胡斯拉乌来执行，因为他的兄弟10年前被侯赛因杀死。两年后局势发生了变化，血亲复仇的法律被帖木儿用来反

对凯胡斯拉乌本人,他被指责背叛了帖木儿:处决他的任务被委托给了那些有权为侯赛因报仇的人。 158

帖木儿及其拥护者就是以这样的手段竭力为自己进一步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帖木儿像自己的前任一样,从成吉思汗家族中扶持傀儡汗继承汗位并以他们的名义来掩盖自己的行为。实际上这些汗甚至连与最高权力相连的形式上的尊荣都不曾享有过。编造了一个有利于帖木儿的传闻,说似乎他的祖先根据在动荡时期多次被恢复又被遗忘的条约是成吉思汗后裔统治时期拥有无限权力的埃米尔,实际上他对此根本没有任何继承权。通过与埃米尔侯赛因遗孀——合赞汗的女儿之间的婚姻,帖木儿与汗室结亲并获得了古儿干(女婿)的封号,这一头衔使他拥有了凌驾于其他埃米尔之上的地位。帖木儿竭力利用蒙古帝国包括察合台汗国的思想和传统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察合台人是他军事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从形式上来看这支军队更像蒙古人(士兵留辫子)而不像穆斯林。帖木儿与其战友之间的关系是由军事生活方式的传统和习俗来决定的。实际上帖木儿的支柱主要是察合台人当中的巴尔拉斯人,帖木儿最顽固的敌人是札剌亦儿人,1376 年根据帖木儿的命令札剌亦儿人遭受了相当于我们所理解的军队被解散的命运:札剌亦儿人的兀鲁思被消灭,其残余被分配到各个埃米尔的队伍之中。

与蒙古的军事传统相比,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文化传统对帖木儿而言只具有次要作用,但他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为自己的行动辩白并为自己的帝国增添光彩。在突厥斯坦站在帖木儿一边的主要是以撒马尔罕的伊斯兰教艾尔谢赫和铁尔梅兹赛义德为首的穆斯林上层人士。1371 年,有一位铁尔梅兹赛义德转向了反对帖木儿的立场,但这只是一场偶然的误会,既没有对帖木儿产生任何影响,也没有对赛义德们产生任何影响。赛义德别列克就属于这个阶级,他是麦加人,从帖木儿手中得到了阿富汗的安德霍伊城作为自己的封地,后来被埋葬在帖木儿旁边。根据传说,帖木儿把某些与人民群众关系比较密切的托钵僧谢赫特别是把自己的第一位导师沙赫里夏勃兹谢赫舍姆斯·阿德金·库

拉尔和呼罗珊谢赫赛因·阿德金·泰亚巴迪看做是自己的精神支柱。但舍姆斯·阿德金在帖木儿执政之初便去世了，而赛因·阿德金在帖木儿的历史上只在1381年被提到了一次，他没有对帖木儿的行动产生任何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没有关于帖木儿与布哈拉德尔维希僧团之间有任何亲密关系的资料，虽然最有影响的一位布哈拉谢赫巴哈·阿德金·纳合西班底与帖木儿是同时代的人，他是现在依然广泛流传的纳合西班底教派的创始人。那些其祭祀礼仪与游牧居民的民族传统结合在一起的穆斯林圣徒可能对帖木儿具有特殊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帖木儿时代在其故乡沙赫里夏勃兹和首都撒马尔罕以外建造的唯一杰出建筑——突厥斯坦城的陵墓，这座陵墓建在谢赫艾哈迈德·亚谢维的墓穴之上，他是12世纪的一位突厥教育家。

159

帖木儿在其他国家热衷于宗教只是他实现政治目的的一个借口。在叙利亚他被视为是狂热的什叶派教徒，他曾在那里为蒙受屈辱的先知家族复仇。但在什叶派的马詹德兰他又因什叶派侮辱先知同伴的忌日而向什叶派复仇。他也利用这样的借口重建因波斯政治分裂而遭受破坏的秩序和稳定，波斯是帖木儿征服活动的主要对象。他南征北战的真正原因是征服者的功名心在作怪。[1] 他说“世界上所有人烟稠密的地方都不必拥有两个国王”，这句话可能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他之所以竭力想以自己惊天动地的行动——无论是作为破坏者还是作为创造者的行动来震动世界，而且认为外部影响力比巩固的成就更重要，其原因也在于这种带有几分病态的功名心。帖木儿的远征席卷了辽阔的地域——从俄罗斯的叶列茨到德里，从斯米尔纳到大尤尔都兹（库车以北），但除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外，这些远征只是毁灭性的袭击，帖木儿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自己子孙的封地。帖木儿把战利品其中包括作家和学者从各地运到自己的首都撒马尔罕，因为他们能为世界征服者的首都增光添彩。那种认为似乎帖木儿在撒马尔罕以

[1]即使是推动帖木儿进行军事远征的主观愿望也未必只可以用功名心来解释。——B.罗莫金

外的各地都是破坏者的观点是言过其实的。他在距撒马尔罕非常遥远的地区如喀布尔谷地和穆甘草原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灌溉工程。[1] 但根据帖木儿的想法，撒马尔罕应该成为世界第一城，为实现这一想法他在撒马尔罕四周建起了一系列的村落，这些村落都以穆斯林国家主要城市的名字来命名：巴格达、大马士革、米斯尔（开罗）、设拉子、苏丹尼亚。 160

帖木儿的青年时代只是进行了军事训练，他没有受过教育，甚至不识字，但他依然融入了自己宫廷的文化生活之中。他通过与学者的谈话（除了自己的母语突厥语之外，他还讲波斯语）获得了一些科学知识，并且他的历史知识曾使历史学家伊本·哈尔敦感到惊异。他能和当时最优秀的棋手对弈；建筑师建造建筑物时需要遵循帖木儿本人的艺术构思。有一些建筑物是与一定的征讨行动相联系的，例如沙赫里夏勃兹的阿克萨莱宫殿建于1380年，是由1379年从花剌子模掳来的被俘工匠建造的。现在仍以比比汉大清真寺而闻名于世的撒马尔罕大清真寺是1399年帖木儿从印度返回之后开始建造的。比比汉大清真寺也被认为是帖木儿时代的典型建筑。艺术构思宏伟的建筑物在技术方面却粗心大意，以至于在帖木儿活着的时候上面就掉石头，到那里做礼拜被认为是危险的。

在文明地区当中，花剌子模是最深受帖木儿远征之苦的地区，这里曾多次爆发反对征服者的起义。乌尔根奇城本身在1388年被夷为平地（当然清真寺、宣礼楼等除外），城中所有的居民都被迁到了撒马尔罕。1391年帖木儿决定重建城市，但只建了一个街区。帖木儿发动了几次讨伐马维兰纳尔北部和东部邻居的远征，但这些远征只是为了对以前发动侵袭行动的草原居民进行报复，也是为了减少以后遭受这种侵袭的危险。持久地绥靖草原只有在向草原地区进行殖民活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而帖木儿在世时并没有进行这样的殖民活动。只是

---

[1] B. B. 巴托尔德夸大了帖木儿在被征服国家的创造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所提到的大型灌溉工程只不过是少数情况，其作用抵不上帖木儿征服活动所带来的破坏性。——B. 罗莫金

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当他打算远征中国时，才提前设置了一些边防哨所。他在阿什帕拉河（现在锡尔河州与七河流域之间的界河）建起了一座要塞并采取措施恢复了那里的农业生产。另一座要塞建在伊塞克湖。帖木儿这些行动的成就维持的时间最短。1404 年，为了远征中国他在锡尔河上从沙赫卢希亚（该城得名于帖木儿之子的姓名，现在位于安格连河汇入锡尔河汇流点不远的沙拉基亚遗址）到扫兰一线集结重兵。但就在这次远征刚刚开始的时候，1405 年 2 月 18 日，帖木儿在奥特拉尔去世。因此还在 1405 年帖木儿帝国就放弃了伊塞克湖上的要塞，也放弃了阿什帕拉河上的哨所，与蒙兀儿人签订了条约，根据条161 约帖木儿征服的所有土地都被交还给蒙兀儿人。帖木儿的死引起了骚乱，在骚乱结束几年后，当国家的最高统治权转到了帖木儿之子沙哈鲁手中，并且沙哈鲁之子兀鲁伯成为其在撒马尔罕的代表时，阿什帕拉河又成了察合台汗国东北部的边界。后来兀鲁伯援引其祖父的做法，向蒙兀儿斯坦腹地进军（1425 年），他拜谒了帖木儿在伊塞克湖上建造的要塞，并从伊犁河谷上游运来了两大块软玉安置在帖木儿的坟墓上（兀鲁伯远征的另一个古迹是位于撒马尔罕和吉扎克之间的吉拉努京斯克峡谷铭文）。但是兀鲁伯的远征没有产生任何持久性的成果，既没有绥靖草原也没有恢复定居生活和城市生活。

在兀鲁伯统治时期（1409—1449 年，在 1446 年前是以沙哈鲁的名义来进行统治的），撒马尔罕还是一座辉煌的都城，虽然王朝的首脑沙哈鲁住在赫拉特。兀鲁伯吸引学者和艺术家到自己的宫廷中来，他建起了富丽堂皇的建筑，其中包括里吉斯坦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他在城北郊区建立了天文台，亲自进行天文观测并撰写了天文学著作。同时代的人把他这位皇位上的学者与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与沙哈鲁时代伊斯兰教占优势的赫拉特不同（沙哈鲁本人只是想成为一名穆斯林苏丹和哈里发，完全否定了成吉思汗的法律），在兀鲁伯时代的撒马尔罕还继续着从前那种文明的快乐的生活，伊斯兰教艾尔谢赫参与到这些生活当中，但人民群众及其宗教领袖——德尔维希僧人不能参与这种生活，德尔维希僧人对兀鲁伯的支

持度赶不上对帖木儿的支持度，同时他们也不像惧怕帖木儿那样惧怕兀鲁伯。还在兀鲁伯活着的时候，在他们当中也就是纳合西班底教派当中就涌现出一位政治活动家——霍加阿赫拉尔。在突厥斯坦宗教反动势力对极端考究的世俗生活和城市文明的胜利就是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在统治的下半期，不幸追随着兀鲁伯，他在沙哈鲁死后的骚乱时期所发动的失败的军事行动以及他的小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轻率使他声望扫地。政权转到了他另一个儿子阿卜杜勒·拉迪卜手中，他是一个即使杀死父兄也不会退缩的人。在阿卜杜勒·拉迪卜时代就已经开始活动的宗教反动势力在1450年一度停止活动。阿卜杜勒·拉迪卜死于军事密谋，之后兀鲁伯的侄子阿卜杜拉被阴谋家扶上帝位，他继承了自己叔叔的传统。但1451年阿卜杜拉便在与帖木儿另一位后裔的战斗中死去，后者是受霍加阿赫拉尔支持的阿布·赛义德。阿布·赛义德是在草原居民乌兹别克人的帮助下获得胜利的，乌兹别克人当时处于阿布海尔汗的领导之下，他们生活在锡尔河下游。在这里宗教反动势力在蛮夷当中找到了反对世俗文明的同盟者，就像在穆斯林世界（例如在西班牙）曾经多次发生的那样。

162

与沙哈鲁和兀鲁伯时代不同，在15世纪下半叶，学者、诗人和艺术家在赫拉特找到了比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更有利的活动条件。苏丹侯赛因在位时期（1469—1506年）外里海地区和花剌子模也归于他的统治之下，此时的赫拉特成为最辉煌的精神活动的中心。虽然赫拉特缺少突厥居民，但中亚突厥诗歌艺术最繁荣的时期却是与赫拉特联系在一起的。诗歌艺术的主要代表米尔·阿里·希尔是苏丹侯赛因的维齐尔。米尔·阿里·希尔竭力以自己的作品来证明用突厥语也可以创作出使用萨尔特语所创作的那种文学。起源于印度的萨尔特一词，最初被突厥人用来表示“商人”之意。在蒙古人时代该词起初是以萨尔塔克塔伊（сартактай）和萨尔塔乌尔（сартаул）的形式出现的，用来从总体上表示穆斯林文明的代表，主要是表示伊朗人，也就是取其塔吉克之意。到了乌兹别克人时代，随着突厥斯坦的伊朗人逐渐突厥化，人们开

始把突厥斯坦讲突厥语的定居居民称为萨尔特，以便把他们与保留伊朗语言的塔吉克人区别开来。就如同刚开始只有阿拉伯人被称为塔吉克人，而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一起被称为塔吉克人，再后来只有波斯人被称为塔吉克人一样，起初只有波斯人被称为萨尔特人，而后波斯人和突厥人一起被称为萨尔特人，再后来只有突厥人被称为萨尔特人。[1]

大概苏丹侯赛因及其战友使自己的活动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即这种活动不会引起宗教界代表的反对。但在苏丹死后又发生了寻常可见的内讧，文化活动也被外来的征服所破坏。163

[1]关于萨尔特一词的意义，参见后面第196－197页和第460－462页，也参见巴托尔德《萨尔特人 Sart》(《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第4卷)。——B.罗莫金

7　乌兹别克汗国[1]

16 世纪初阿布海尔的孙子乌兹别克汗昔班尼征服了帖木儿后裔在突厥斯坦和呼罗珊的领地，其中包括前苏丹侯赛因的国家。[2] 昔班尼 1510 年在梅尔夫与新波斯国家的缔造者沙赫伊斯梅尔的战斗中死去。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一度重新转入帖木儿的一位后裔苏丹巴卑尔之手，他的手稿是最优秀的突厥散文作品之一。但 1512 年昔班尼的侄子吾拜都拉战胜了巴卑尔，因此恢复和巩固了乌兹别克人在突厥斯坦的统治。波斯人在那个时代前后被其他乌兹别克汗赶出了花剌子模，这些乌兹别克汗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王朝。苏丹巴卑尔逃往印度，他在印度建立了一个最辉煌的穆斯林王国，按照传统这个王国也被认为是"察合台国家"，虽然其中根本没有察合台的后裔。

吾拜都拉汗（死于 1539 年）被认为是以虔诚穆斯林精神武装起来的理想统治者。在他及其继承人在位时期，政治中心逐渐由帖木儿及其后裔的前首都撒马尔罕转移到布哈拉。无论是吾拜都拉的活动，还是昔班尼王朝的主要代表阿卜杜拉汗（1559—1598 年）的活动以及 17 世纪出身于阿什塔尔哈尼王朝或贾尼王朝的汗的活动，都与布哈拉密切相连。阿卜杜拉征服了呼罗珊和花剌子模，发动了对草原腹地的远

---

〔1〕关于 16—19 世纪中亚历史的主要著作目录，参见伊万诺夫《中亚历史概论》，第 234 - 246 页。在前面第 109 页注释 1 的书目索引中没有列人的有关这个时期的新出版的史料，参见穆罕默德 · 优素福 · 穆希《穆基姆汗史》；穆罕默德 · 阿米尼 · 布哈里；阿卜杜勒 · 拉赫曼 · 塔里《阿布尔 · 法伊兹汗史》；阿布尔哈齐《土库曼世系》，科诺诺夫版；《巴达赫尚史》；穆罕默德 · 卡迪姆《纳迪尔沙赫书》，影印本；阿赫西坎季，塔吉尔贾诺夫版摘录本；瓦西菲，博尔德列夫版；阿卜杜勒 · 阿齐姆 · 萨米《曼格特诸王史》。对研究 16—18 世纪中亚历史贡献最大的是 A. A. 谢苗诺夫和 П. П. 伊万诺夫的著作，其目录索引，参见雅库鲍夫斯基《研究中亚史的史学家帕维尔 · 彼得罗维奇 · 伊万诺夫》；沃罗诺夫斯基《A. A. 谢苗诺夫学术著作目录索引》。——B. 罗莫金

〔2〕记载这一事件的最好著作是谢苗诺夫的《昔班尼汗及其对帖木儿帝国的征服》。——B. 罗莫金

164 征，并援引兀鲁伯的做法，在吉拉努京斯克峡谷留下了关于这次远征的铭文。阿卜杜拉的名字与帖木儿的名字一样，在人民的记忆中主要是和建筑师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除了的确由他们建造的工程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工程也被认为是帖木儿和阿卜杜拉建造的，比如撒马尔罕附近泽拉夫善河上的拱桥（桥是昔班尼统治时期建造的）。

从总体上看，乌兹别克人的征服没有导致文化活动的完全终止。乌兹别克汗国在花剌子模几乎过着完全野蛮的生活，而花剌子模在14世纪曾是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的地区。当在波斯生活了10年因而受教育的程度高于自己同乡的阿布尔哈齐汗（1643—1663年）打算编撰一部自己王朝的历史时，他没有找到一位能堪当此责任的人，所以不得不亲自来完成这项工作。另一方面，在泽拉夫善河地区正是在乌兹别克人时代才创作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帖木儿及其后裔时代的史学家就其出生地或活动地来看基本上全部都是波斯人）。那个时代的一些建筑比如建于1619年的撒马尔罕希尔达尔迈德赖塞并不逊色于帖木儿和兀鲁伯时代的建筑。连同巴尔赫在内的阿富汗的北部是乌兹别克汗国的组成部分，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发源于兴都库什山后的辉煌的“大莫卧儿”印度王国（巴卑尔的后裔），所以巴尔赫成为世俗文化生活的中心。17世纪40年代应邀从巴尔赫来到布哈拉的纳迪尔·穆罕默德汗因把巴尔赫的习俗带到了严格笃信宗教的布哈拉而引起了自己臣民的不满。

18世纪对整个穆斯林的亚洲而言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衰退的世纪。这一现象还没有被完全搞清楚，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自15世纪开始的由西欧人控制的海路贸易的发展以及商队贸易的衰退。[1]在突厥斯坦，乌兹别克汗国的草原邻居——西面的土库曼人和东面的哥萨克人还在16世纪就利用了乌兹别克汗国发生政治骚乱的时期。

---

〔1〕B. B. 巴托尔德指出的情况很重要，但这不是上面所提到的衰退的唯一原因。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中亚衰落种种原因的更全面阐述，参见伊万诺夫《中亚历史概论》，第6－7页，第89页。关于这一时期与中亚国家发展条件相似的其他东方国家落后的原因，参见赖斯纳《近代来临前夕东方国家落后问题探析》。——B. 罗莫金

哥萨克人是乌兹别克人的一部分，他们早在15世纪就已经脱离了民族主体因而后来也没有参加对帖木儿后裔国家的远征。后来由于误会把哥萨克人叫做吉尔吉斯人。撒马尔罕和希瓦深受18世纪骚乱之苦，花剌子模的首都早在17世纪阿姆河改道流入咸海之后便由乌尔根奇迁到了希瓦，那时距希瓦不远的新乌尔根奇还没有建立，新乌尔根奇建立后原来的贸易关系便转移到这里。而此时撒马尔罕和希瓦一度完全荒芜了。到18世纪末才多多少少成功地恢复了稳定的秩序，形成了新的汗王朝——布哈拉的曼格特王朝、希瓦的昆格拉特王朝。稍早些时候在费尔干纳形成了明格王朝，这里的伯克在19世纪采用了汗的封号，因此第三个汗国即浩罕汗国便成为与以前存在的两个乌兹别克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并列的国家，浩罕汗国得名于新王朝建立的新城市浩罕城。

19世纪，在欧洲文明的统治地位最终确立之后，突厥斯坦作为离欧洲最遥远的穆斯林亚洲部分在文明发展方面要低于其他穆斯林国家。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突厥斯坦既没有印刷厂，也不懂得石印术，但在土耳其和波斯，印刷技术很早就为人所知。我们在18世纪土耳其和波斯的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就已经看到了欧洲影响的迹象。而突厥斯坦在这方面仍然完全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只有在蒙古入侵之后恢复的金币冲制才首次证明了突厥斯坦通过波斯与西欧有着某些经济联系。

但是如果认为俄罗斯征服者在突厥斯坦所遇到的只有野蛮，在那里没有找到他们可以继续的任何文明工程，这也是错误的。在俄罗斯征服时，突厥斯坦绝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要好于此前的一百年。希瓦和撒马尔罕重新成为大城市。与16和17世纪不同，在19世纪我们看到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的文化活动比布哈拉汗国更加活跃，例如文学活动[1]（尤其是在历史编纂学领域）和建筑活动。费尔干纳第一次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核心地区，差不多整个锡尔河流域都是这个辽阔国家的组成部分。浩罕汗成功地使锡尔河东部和七河流域西

[1]关于浩罕汗国的文学，参见卡尤莫夫，*Кукон адабий мухити*。——B. 罗莫金

部的一部分草原居民臣服于自己。在几个世纪之后首次恢复了对草原地区的殖民活动，在浩罕防御工事的保护下农业也得到了恢复。在费尔干纳，城市正如俄罗斯人所见到的那样有浩罕城、安集延和新兴的城市纳曼干(在17世纪这里还是农村)，这些城市都是浩罕汗建立的。浩罕汗还利用卡拉河和纳伦河的河水修建了大型的水利工程，在费尔干纳即使是在以前突厥斯坦文明发展最辉煌的时期也未曾有过这样的水利工程。费尔干纳第一次在突厥斯坦占据了首要的经济地位，并且

166 在俄罗斯人时代也完全保持住了这一地位。现在突厥斯坦主要城市塔什干地位的提高是乌兹别克汗国时代的遗产，在阿卜杜拉汗时代塔什干的规模要比现在小得多，对突厥斯坦的文化生活而言它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突厥斯坦的未来像任何国家一样取决于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突厥斯坦的贸易地位完全依赖于铁路的发展，因为正是铁路重新使陆路贸易具有与海路贸易同等的作用。对于与远东的贸易而言，突厥斯坦过去的地位未必能够得到恢复，将来某一天建造一条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同样重要的经突厥斯坦到中国的铁路可能性不大。[2] 而关于将来的印欧大铁路以及在这条铁路运输线中突厥斯坦将占据什么地位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因此俄罗斯的突厥斯坦不仅有着自己的过去，也有着自己的将来，但是东部或者中国突厥斯坦由于自然地理原因将永远不会对铁路网有什么价值可言，它只是一个过去的国家。[3]

在以下的著作中列出了最重要的突厥斯坦考古学和历史学文献：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794页以后；该书中的(第273页以

---

[1]巴托尔德在20年代初讲课提纲中提出的这一论点表明他当时赞成大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还没有看到除资本主义道路之外的另一条发展道路。但也不排除在上述情况下B. B.巴托尔德使用“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术语时，指的是现代工业、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不涉及社会政治制度问题。——B.罗莫金

[2]现在经过东哈萨克斯坦的铁路不仅把西伯利亚与中亚连接起来，而且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连接起来。——B.罗莫金

[3]生活发生了变化，巴托尔德以夸大地理因素作用为依据的悲观推测并没有得到证实。——B.罗莫金

后)突厥斯坦历史概论;比较对该著的书评:巴托尔德《俄罗斯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会论丛》,第22卷。[1] 较新的著作有: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灌溉史论》;巴托尔德《兀鲁伯和他的时代》。[2] 169

[1]参见后面第635-642页(从625至646页是书评部分,没有翻译成汉语,原因见译者前言。——译者)。——Б.加富罗夫

[2]也参见前面第109页注释1。——Б.加富罗夫

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

绪　论

本书原打算写成一本题为《突厥斯坦的文化水平和居民需求》的小册子，篇幅为65至70印张，作为由Д. И. 穆什克托夫领导的苏联自然生产力研究常务委员会突厥斯坦部筹划出版的《突厥斯坦专题研究》的一部分。这部专题研究共分为9个专题，每一专题都委托给专家学者来撰写。在关于1919年苏联科学院阿塞拜疆分院活动的总结报告中提到，这9个专题中的3个专题已经完成，它们分别是：第一专题（В. И. 尤费列夫《突厥斯坦的种棉业》）；第二专题（В. И. 马萨利斯基《水利经济和土壤改善》）；第八专题（《突厥斯坦的国民经济》也由В. И. 马萨利斯基撰写）。委托给我的那一专题当时仅仅完成了部分工作（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已撰写完毕，搜集了关于伊斯兰时期突厥斯坦历史的资料，并且已经搞清了这一领域中的许多新事实）。整部专著原计划在1920年1月1日之前完成。在关于1924年苏联科学院阿塞拜疆分院活动的总结报告中写道："由Д. И. 穆什克托夫主编的关于突厥斯坦的专著在本报告年度已经最终完成，该专著首次全方位地展示了这一最富饶的边区，此书预计将在庆祝俄罗斯科学院成立200周年之际出版发行。"众所周知，这一打算并未实现。在被列入《苏联科学院1917—1925年出版物分类索引》的苏联自然生产力研究常务委员会的出版物目录中，只提到了В. И. 尤费列夫的著作《突厥斯坦的种棉业》（1925年，第160页）。还有两本著作正在印刷中，这两本著作原本也是作为计划出版的专著的组成部分，一本是Л. И. 普拉索洛夫的《突厥斯坦的土壤》，另一本是Б. А. 费琴科的《突厥斯坦植物概论》。[1]在关于1925年苏联科学院阿塞拜疆分院活动的总结报告中，已经不再

[1]目前两本著作均已出版。——（第一版）编辑部注

提突厥斯坦部以及关于突厥斯坦的专著了，只提在出版 Л. С. 贝格主编的专著的同时，准备出版关于突厥斯坦的图书目录，其中的一部分现在

170 已经在科学院另一委员会的刊物中刊登出来了。[1] 在 1926 年 11 月 6 日召开的苏联科学院阿塞拜疆分院全体大会会议上决定，在苏联自然生产力研究常务委员会的出版物中刊载 Д. И. 穆什克托夫的著作《突厥斯坦自然地理和地质概述》。

本书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与原计划作为一本专著的独立组成部分相比，需要作更实质性的修改。这本《突厥斯坦的文化水平和居民需求》概论就其研究任务而言，远没有种棉业概论和水利经济概论等清晰明确，作者很难不以时代和出版条件为转移，始终如一地按照一个主旨来最终完成此书的写作。此外，在目前，这样的书可能已经过时，需要对其标题及相关的部分内容作出修改。现在谈到“文化需求”只能与苏联的建设目标相联系，而本书在这方面尚嫌不足。居民的文化水平可能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我还不可能详细地了解这些变化，虽然在苏维埃制度建立后我曾有两次机会（在 1920 年和 1925 年）前往突厥斯坦。最后，全面客观地描述苏联突厥斯坦文化生活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本书所阐述的是以往也就是革命前突厥斯坦的文化生活史[2]，与当代生活及其任务没有直接关系。本书与当代生活的关系是由了解过去能给现代活动家带来多大的益处决定的。

变化和修改可能会影响内容的完整性和叙述的严整性，或许本书写作时代的沉重生活条件本身已对这两者产生了影响。我没有时间利用现在供职于列宁格勒学者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对本书进行完全修改，况且当时也没有那些手段。在这些情况下，本书能有多大裨益，并

171 无愧于其出版，将由社会评论来决定。

---

[1] 目前在国家实验农学院的刊物中已经刊载了关于突厥斯坦种棉业的图书目录，在苏联自然生产力研究常务委员会的刊物中刊登了关于突厥斯坦动物界的图书目录。——（第一版）编辑部注。

[2] B. B. 巴托尔德在《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中所研究问题的参考书目，可以参见以下综合性著作：加富罗夫《塔吉克民族简史》，第 492－538 页。《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1 卷，第 1 册，第 504－542 页；第 2 册，第 464－495 页。《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1 卷，第 2 册，第 403－486 页。《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民族》，Ⅰ，第 685－704 页；《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民族》，Ⅱ，第 699－707 页。也参见前面第 109 页注释 1 和第 163 页注释 1。——B. 罗莫金

1　前伊斯兰时期

与合并到俄罗斯的其他伊斯兰地区特别是伏尔加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不同,俄罗斯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文明早在俄罗斯民族皈依基督教之前,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并且这里的居民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就已经有过悠久的文明生活经历。我们所知道的中亚最古老的文明民族——生活在泽拉夫善河的粟特人和生活在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人属于伊朗部落。他们所生活的地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君主专制制度国家——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组成部分。大流士国王(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86年)在自己的铭文中历数臣服于他的臣民时提到了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在波斯波利斯遗址附近大流士陵墓旁的著名浮雕上,雕刻着一些支持大流士统治的部族代表,其中就有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的代表。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的军队参加了薛西斯对希腊的远征。花剌子模人阿尔塔伊克特被任命为位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海岸上的塞斯塔城的首领。

我们没有关于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的区域是什么时候、如何归并到波斯帝国的可靠资料。大概伊朗人是自东北向西南,由中亚迁入波斯的,有些民族如同后来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人一样,是彼此独立地迁徙并定居于各地的。

在这次迁徙的时候,伊朗人的文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创立一定国体的程度。只有在伊朗最西面的部族米底人和波斯人那里,由于受到文明发展水平更高的西部邻居的影响,国家生活才得到了发展。在西迁时代落后于他们并且居住在更东部地区的民族被迫臣服于波斯人可能还有在波斯人之前米底人所创立的国家组织。在这方面,似乎可以举出波斯人在伊朗历史上与法兰克人在日耳曼人历史上所发挥作用的相似之处。很有可能,中亚的伊朗人是非常勉强地臣服于波斯的

172

国家组织,就像日耳曼中部和北部的民族臣服于法兰克人的国家组织一样。亚历山大·马其顿东征的史料表明,在这个时期花剌子模不再像大流士和薛西斯时代那样,是波斯的一个行省,而是一个独立的领地。关于花剌子模人什么时候、怎样获得了独立,我们一无所知。粟特人依然是"大王"的臣民,并从高加米拉战役(公元前331年)时起便参加了对亚历山大的战争。但他们的行动却表明,他们不再支持波斯的国家组织,他们高兴看到波斯国家覆亡。粟特人支持贝斯发动的反对大流士三世的起义,而当贝斯采纳了王的封号和"阿塔薛西斯"的名称后,他们又背叛了他,并把他出卖给亚历山大。当他们确信亚历山大想永久征服前波斯帝国的统治区域时,又发动了反对亚历山大的起义。

研究亚历山大东征的历史学家们指出了中亚伊朗人的文明程度低于米底人和波斯人这一事实。巴克特里亚人和粟特人的习俗与游牧民族没有多少差别,并且居住于阿姆河以南的巴克特里亚人的文明程度要略高于自己北方的邻居。但是当时在阿姆河以北的国家中,除了建立在人工灌溉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之外(在叙述泽拉夫善河流域时指出文明的存在取决于是否有水),也存在着城市生活。泽拉夫善河粟特人的主要城市,从位置和名称(马拉坎德)上看,都接近于现代的撒马尔罕。有一种可能言过其实的资料说,这座城市的周长达到了70斯塔第。而1斯塔第的长度是多少,众说纷纭,根据一位现代学者的研究,埃拉托斯特尼所确定的1斯塔第的长度相当于157.5米,埃拉托斯特尼是研究伴随马其顿东征而来的地理文献的主要代表。这样计算的话,70斯塔第的长度就超过了11公里。后来,到阿拉伯征服之前,突厥斯坦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城市。亚历山大在锡尔河所建立的城市占地为6罗马里或者48斯塔第(7.56公里)。还有一座四周筑有特殊围墙的独立城堡。在锡尔河下游的粟特人那里还有另外一座"王的"城市,其名称现在也无从考证,也不知道,是否应该把"王的"这种

表述当做是对当地什么统治者的称呼。[1] 在其他城市中最大的要算
是锡尔河流域的一座城市，其建立者是居鲁士（公元前558—公元前530年），这座城市的希腊名字叫做基洛波里。该城大致坐落于乌拉－秋别以南的沙赫里斯坦村。马其顿人顺着夏季干涸的锡尔河支流或运河河床进入该城，接着由于缺水要塞向亚历山大投降。基洛波里是整个地区的重要城市，但其居民的数量可能远不及现在突厥斯坦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数量。城里面当时还有一部分临近城市的居民，他们是在马其顿人攻打这些城市时逃到这里来的，尽管如此，基洛波里城保卫者的人数也只有15000人。在锡尔河上的马其顿军营（大致在今天的纳乌村附近）和沙赫里斯坦村之间有5座城市，其中只有一座城市有名可考，这座城市就是最靠近亚历山大军营的加扎。人们把加扎和阿拉伯地理学家们所说的加扎克联系起来，加扎克位于由沙赫里斯坦村通往苦盏的通道上，距两地的距离几乎相等（离沙赫里斯坦村更近一些），可能是在波斯曼德苏谷地，这里现在是加赞－达拉克村[2]。

与这些城市同时并存的是一些设防的农村。贝斯就是在阿姆河以北的一个四周筑有带门城墙的小村子里被粟特人抛弃并被马其顿人俘获的，这里位于阿姆河以北，距亚历山大过河的地方有4天的路程（亚历山大很可能是在克利夫附近过的河）。还有一些在马其顿人抢掠泽拉夫善河地区时，野蛮人逃往到那里去的“堡垒”（erymata）。亚历山大与那些与众不同的“最重要的人物”（proteuontes）进行了谈判。很可能，公元前4世纪的社会制度与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在那里遇到的社会制度是一样的，居住于设防城堡中的地主贵族占据统治地位。[3]

从事农耕的粟特人与同样也是伊朗人种的游牧萨基人处于对立状

---

〔1〕有关粟特“王城”（巴赛勒亚）的唯一记载是在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当中（第4卷，5，3）。在这一记载当中，巴赛勒亚一词很可能是由于后来对词意的曲解才出现的（用它取代了地名——巴赛斯塔）。参见蒙恰茨卡娅《论索格底亚纳的“王城”或“第二首都”》。——Б. 斯塔维斯基

〔2〕关于基洛波里和加扎，现在参见涅戈马托夫《论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乌斯鲁沙纳》，第16－23页。——Б. 斯塔维斯基

〔3〕关于В. В. 巴托尔德的这一假设，参见前面第117页注释18。——Б. 斯塔维斯基

态。目前还没有关于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地域划分即农耕地带与草原地带之间界限的确切资料，甚至关于锡尔河是粟特人活动区域北部边界的观念，也仅仅是基于萨基人与亚历山大在河右岸的纳乌村附近进行了一场会战。关于农耕文明的特征记载得很少。谈到了巴克特里亚的稻米种植和穆尔加布的葡萄种类，但是关于粟特人聚居区域出产品的情况，古希腊文献中没有作任何记载。

174

古希腊的统治(从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前 2 世纪)不能不对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对城市生活产生某种影响。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塞琉古王朝以及希腊 - 巴克特里亚国王都建立了城市。塞琉古王朝几乎统治着亚历山大帝国的整个亚洲部分；希腊 - 巴克特里亚王国大约是在公元前 3 世纪中叶脱离塞琉古王朝宣布独立的，其统治地区除了巴克特里亚之外，还包括粟特人的区域，并大大向印度拓展了希腊人的疆界。在谈到亚历山大时，说他摧毁了马拉坎德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但他也建立了不少的城市，至少有 7 座。塞琉古一世(公元前 312—公元前 280 年)和他的儿子安条克一世·索杰尔(公元前 280—公元前 261 年)建立了许多名为"塞琉西亚"和"安条克"的城市，其中的一个安条克城位于锡尔河对面的西徐亚人(萨基人)聚居区。安条克尤其看中穆尔加布河沿岸，亚历山大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城市，该城通常被称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城被"野蛮人"摧毁，安条克取而代之建起了后来被称为"安条克"的"塞琉西亚"城，安条克大致就在后来的梅尔夫。该城位于整个文明绿洲的中部，绿洲四周围以长墙(长达 1500 斯塔第，即周长超过了 235 公里)。这是中亚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建筑。在伊斯兰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这些城墙的遗址还清晰可见。希腊 - 巴克特里亚最后几位国王中的一位——欧克拉提德(公元前 2 世纪)的王国，被称为"千城之国"。很遗憾，不知道他在突厥斯坦境内是否也建立了城市。

亚历山大和希腊 - 巴克特里亚国王们向印度的进军促使印度与中亚地区之间建立了比从前更密切的文化联系。亚历山大在印度河流域与波尔人作战期间第一次遇到的战象，现在在前亚地区得到广泛利用。

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提德穆斯也占有一定数量的大象,但是根据公元前206年的条约他不得不把这些大象交给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三世大帝(公元前223—公元前187年)。该条约是在安条克长期围攻欧提德穆斯的首都巴克特里亚之后签订的。有关这些谈判的叙述很有意思,明显地证实了游牧民族在中亚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欧提德穆斯威胁说,万不得已时他将召集游牧部族,这样的话就将导致所有国家的灭亡,不仅是欧提德穆斯的国家,而且还有安条克的国家。

公元前2世纪,中亚的文明区域遭到了更远处游牧民族的入侵,这是因为在中国边界上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游牧帝国,并由此而引起了一些民族由东方向西方的迁徙。这个游牧帝国是由在汉语译音中被称为胡人,而几个世纪后在欧洲以匈奴人闻名的民族创立的。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被胡人打败并被迫迁往遥远西部的民族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为乌孙和月氏。其中乌孙人占据了现在的七河流域地区,而把此前占领了萨基人故地的月氏人继续向西赶。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人在阿姆河北岸前布哈拉汗国境内找到了月氏人,他们在下一个世纪又从这里继续向南迁徙,灭亡了阿富汗和印度境内最后的希腊领地。

175

一些研究者认为,月氏的音译表达的是贵慎(单数第一格形式为куши)的民族名称,这一民族名称后来以其复数形式кушан[1]而闻名于西方。该民族也被称为托哈利(汉语音译为吐火罗)。古希腊文献当中提到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征服者们中间有托哈利人。阿姆河上游地区因托哈利人而得名为托哈利斯坦,这一名称作为一专用地理名词一直存在到伊斯兰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不过那时它的民族学起源早已被遗忘了。托哈利斯坦一词促使我们认为,托哈利这一名称是该民族的自称,后来当这个民族皈依了佛教并把一部分佛教宗教文献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之后,这种标准语言便被称为托哈利语。很可能,托哈利这一名称具有更多的民族学意义,而贵慎或者贵霜则更富有政

[1]即贵霜。——译者

治意义。托哈利语的资料表明,这个民族属于伊朗部族。[1]

迄今还没搞清楚在公元前 2 世纪占据东至艾比湖和焉耆以北地区、西至费尔干纳辽阔地域的乌孙人的起源。月氏和乌孙在自己最初的居住地布隆吉河流域(在中国甘肃省)直接毗邻。迁到突厥斯坦之后,中国人记载说在月氏和乌孙领地之间的费尔干纳西北部还有另外一个民族,只知道这个民族的汉语音译为康居。[2] 在伊朗宗教文献中遇到了康加这个名称,但它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民族学名词。康哈国位于锡尔河中游地区,即正好位于中文史料所记载的康居 176 人的居住地。[3] 同月氏人和乌孙人一样,康居人过着游牧生活,没有谈到他们是与自己的邻居同时来到了突厥斯坦,还是早在他们之前就已经生活在那里了。中国史料中所记载的另一个游牧民族——居住在康居西北部咸海和里海附近的奄蔡也是同样。中国人提到这个民族"改名"为阿兰聊,由此可见这里所谈的就是古典作家提到的亚斯人或者阿兰人,他们是伊朗民族中的一支。阿兰这个词从公元 1 世纪才开始出现在古典文献中。

中国人"通""西域"即突厥斯坦,是为了在那里寻找反对匈奴的同盟者,为此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游牧民族身上,他们认为从游牧民族那里能比从定居居民那里更快地得到他们所期待的那种帮助。然而,他们却得到了关于文明地区的相当详细的资料,这个文明地区亚历山大没有到过,而且希腊作者们也从未提及,这就是费尔干纳。在公元前 2 世纪费尔干纳已经有了近 70 座城市,也可能是村落,因为那时的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费尔干纳人只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制作金银器、打造铁制武器(如果这条资料属实的话,从中就可以得出结论:费尔干

---

[1] 对 B. B. 巴托尔德说法的纠正:"在这里应把'托哈利语'理解为'2 号语言'(和田语),而不是'1 号语言'(库车语),现在德国和法国学者认为'托哈利语'属于后者。"——Б. 加富罗夫

[2] 现在音译为 Канцзюй。——Б. 加富罗夫

[3] С. П. 托尔斯托夫对康居的这种地理定位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康居就是花剌子模。参见托尔斯托夫《古代花剌子模》,第 20 – 25 页;托尔斯托夫《追踪古花剌子模文明的足迹》,第 145 页以下;《1949—1953 年花剌子模民族考古考察团的工作》,第 72 – 73 页。但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康居位于锡尔河中游地区,这一说法更有说服力。有关康居地理位置的各种观点,参见斯塔维斯基《论贵霜国家的北部边界》,第 113 页。——Б. 斯塔维斯基

纳在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统治时代没有受到过希腊的影响)。除了种庄稼——稻米、小麦之外,费尔干纳人还栽培葡萄,种植苜蓿,他们用葡萄酿造葡萄酒。有趣的是,中国人在费尔干纳发现了一种贮藏葡萄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希腊人在格里鲁德发现的贮藏葡萄的方法一样。中国人谈到可以贮藏葡萄"数十年"不坏,希腊人谈到"无盖的树脂器皿"(大圆桶),把葡萄放在里面可以贮藏到第三代人。中国人是在费尔干纳首次熟悉葡萄栽培和苜蓿种植技术的,这样一来,费尔干纳可能就成了继印度之后第一个对中国文明产生影响的国家。当时的贵山,即卡桑是费尔干纳的主要"城市",位于该地区的北部,到阿拉伯征服时代它依然保持着这种地位。[1]

如同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和粟特人居住区的发现一样,中国人发现费尔干纳居民的生活习俗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有相似之处,费尔干纳人使用箭和矛,"谙熟骑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费尔干纳的农业文明产生不久。[2] 根据中国史料记载,这一地区居民的数量为30万人,如果认为这个数字可信的话,那么它表明与现在相比那里的人口密度不高。

费尔干纳出产一种良种马,中国人称之为"天马"[3],大概这种马即使在游牧民族那里也没有。中国皇帝从乌孙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马匹,但仍然向费尔干纳统治者索求"天马",中国和费尔干纳甚至因此而发生过军事冲突。在有关这些事件的传闻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

[1]根据中国的史料来判断,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费尔干纳(大宛)的首都可能是贰师城,贵山城(贵霜匿-卡桑)的地位可能是在晚些时候才突显的。参见伯恩斯塔姆《古代费尔干纳》,第9-19页;伯恩斯塔姆《天山中部和帕米尔-阿赖地区历史考古概论》,第217、222-230页、232-244页。——Б.斯塔维斯基

[2]关于费尔干纳古代农业的新资料,参见扎德涅普罗夫斯基《费尔干纳的古代农业文明》。——Б.斯塔维斯基

[3]又称汗血马。——译者

事,说的是中国人怎样从主要城市(卡桑)[1]里把水排走,擅长打井的"秦朝"人又是怎样来到这里的,而从前在这个城市是没有秦朝的。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在中亚如同在印度以及后来在欧洲、穆斯林世界一样,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中国的秦王朝(公元前255—公元前206年)的名称(在公元前2世纪统治中国的已经是下一个王朝汉朝了),已经成为标志着中国这个国家的地理术语。

中国人对泽拉夫善河和突厥斯坦其他地区的农业文明知之甚少。据悉在乌孙国中没有任何农业人口,然而所记载的臣服于康居的五块"小领地"毫无疑问属于农耕区域。这五"小领地"分别是:苏薤、附穆或附墨、窳匿、罽和奥鞬。[2] 正如更晚些时候的中国学者所指出的,应该把最古老的中国史料中的这些术语理解为沙赫里夏勃兹;泽拉夫善的贵霜匿[3],在卡塔库尔干附近;塔什干;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北部连同古尔干奇城(现在的库尼亚乌尔根奇)。这种解释为欧洲学术界所接受。[4] 这样一来,粟特民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在摆脱了希腊-巴克特里亚政权之后便转入游牧民族——康居人的统治之下,康居人也使花剌子模人臣服于自己,虽然康居民人自身还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还臣服于南部的月氏人和北部的胡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仍然与月氏保持密切同盟关系的康居人可能发挥了更大的政治作用。根据中国《前汉书》(公元前206—公元25年)记载,奄蔡(阿兰)人的军事力量超过了康居人的力量;《后汉书》(25—220年)则正好相反,说阿兰

---

[1]B. B. 巴托尔德在此重复了后来中国注释者的一个错误论断,把公元前2世纪的卡桑城(贵山)说成是费尔干纳(大宛)的都城。参见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4页,注释2。根据中国古代作者的说法,在提到的远征时期(公元前2世纪末期)大宛的都城是贰师城。参见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24-29页。比较丘涅尔《南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各民族中国史料集》,第122-129页。也参见俄文版第176页注释7。——Б. 斯塔维斯基

[2]后三个名称的现代音译分别为:Юйни、Цзи 和 Юецзянь。——Б. 加富罗夫

[3]即汉文史料中的屈霜尔迦、贵霜匿,亦称何国。引自耿世民译《中亚简史(外一种)》,第11页注释7。——译者

[4]在所有这些对应关系中得到广泛认同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奥鞬=古尔干奇=花剌子模。而关于其他四小王领地的地理位置尚有争论。可能它们都位于锡尔河中游地区。参见伯恩斯塔姆《天山中部和帕米尔-阿赖地区历史考古概论》,第208-216页。——Б. 斯塔维斯基

人臣服于康居人。[1] 康居人在泽拉夫善所征服领地上的主要城市不在撒马尔罕，而在卡塔－库尔干附近，这可以为希腊人关于亚历山大摧毁“马拉坎德”城的说法提供佐证。

现在成为突厥斯坦组成部分的土库曼当时处于帕提亚人的统治之下，中国史书中把帕提亚人称为安息人，阿尔萨息王朝的名称就是由这一译音（根据一些汉学家的说法，其相应象形文字的最初读音是安萨克）转化而来的。中国人知道安息比其他国家强大，这个国家与月氏和康居接壤，但却从未谈及帕提亚人与其邻居之间的军事冲突。我们只是从希腊史料中得知，帕提亚国王阿尔塔班二世在公元前 124 年与托哈利人进行了一场战争，后来就像从希腊－巴克特里亚人手中夺得了一些土地一样，安息人也从托哈利人手中夺得了一些领土。并且阿尔萨息王朝接待中国使者的方式也与这个王朝的强大实力相适应，他们派出了一支 2 万人的队伍去迎接中国使团。帕提亚人比其他民族更善于利用公元前 2 世纪开辟的由中国通往前亚的商路，他们为自己保留了充当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贸易中间人的有利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阿尔萨息王朝与罗马帝国的交往是在接待中国使团的密特里达特二世（公元前 124—公元前 87 年）统治时期开始的。帕提亚的密特里达特二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既与远东强国也与西方的世界帝国进行交往的国王。中国史料往往不是在叙述月氏人和其他人时而是在叙述帕提亚人时，才谈到阿姆河上的航运的，这一事实证明了帕提亚人获取的商业利益。帕提亚人的领地当时已经到达阿姆河流域，可能在察尔周附近。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衰落开辟了突厥斯坦历史上的新时期，按照希腊作者不完全恰当的术语，可以把这一新时期称作“印度－西徐亚时期”，希腊作者们把起源于中亚（西徐亚）并向印度进军的游牧

[1] В. В. 巴托尔德的这一论点是不准确的。不是在《前汉书》中记载说奄蔡的力量超过康居的力量，而是在《史记》中（参见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 6 页）。根据《前汉书》的记载（参见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 56 页、59 页），康居有 12 万军队，而奄蔡有 10 万军队。因此，当时奄蔡的力量赶不上康居。关于奄蔡臣服于康居的史料参见《后汉书》；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 121 页。——Б. 斯塔维斯基

民族叫做印度-西徐亚人。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史实是一些民族由北向南迁徙,与印度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且开辟了中国、前亚和欧洲之间的商路,这一商路的开辟不可能不对突厥斯坦自身的工业和贸易发展产生影响。

由北向南经过突厥斯坦文明区域的民族迁徙,往往仅仅是更经常性的、更大规模的游牧民族经过草原由东向西的迁徙所引发的后果。远非所有出现在中亚草原的游牧部落都从那里向南迁移,而且这种向南迁移的政治影响相对并不很大。最初几批中国使团在阿姆河北岸遇到了月氏人的主要斡耳朵,后来月氏统治者又居住于阿富汗和印度。他们北方的邻居——康居人的大本营从早期中国文献所记载的居住地费尔干纳以北的地区迁到了沙赫里夏勃兹地区,在中国晋朝(265—419年)统治时期康居人还居住在这里。但是月氏人与康居人领地的界限大概一如从前。沙赫里夏勃兹地区还在公元前2世纪时就依附于康居。[1] 阿姆河以北的地区,也就是前布哈拉汗国的东部地区,在月氏人征服阿富汗和印度的一些地区之后,依然处于月氏人的统治之下,因为它与月氏在费尔干纳南部的领地接壤。公元前1世纪,康居人与其东北方的邻居乌孙人之间发生了战争。康居人将3000名匈奴人编入自己的军队,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战胜乌孙人,因此匈奴的敌人和乌孙的同盟者中国在公元前36年发动了一次对康居国的远征,消灭了匈奴人。后来康居人仍然是中国人的敌人,公元1世纪末他们向喀什统治者提供军事援助反对中国统帅班超。

匈奴的大部继续穿过中亚草原向西迁徙,在1世纪末到达欧洲的

180

东部边界。根据中国人的证实,如果匈奴人是6世纪出现的突厥人的祖先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他们游牧区的西部边缘是在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之间。托勒密只知道伏尔加河的芬兰名称叫“拉”河,乌拉尔河的

---

[1] B. B. 巴托尔德的这一论点尚有争议,因为该论点的依据仅仅是假设康居的一个领地——苏薤与沙赫里夏勃兹是同一个地区。参见前面第177页注释11。——Б. 斯塔维斯基

突厥名称叫达伊克斯河(亚伊克河)。[1] 有一部分匈奴人留在吉尔吉斯草原,中国人把这些在4世纪和5世纪还居住在乌孙北部国家中的匈奴人叫做悦般人,悦般人的文明水平要高于其他的游牧民族。在中国人对他们的记载中,我们首次遇到了关于能呼风唤雨的占星家的传说,在对15世纪及其之前中亚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我们也遇到了这种神话主题(巫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毒石也就是软玉石的作用)。目前还没有悦般人向南迁徙的直接资料,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古典作家和伊朗宗教经典(《阿维斯塔》)中提到的希奥尼特人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到达波斯边界的希奥尼特人,在4世纪和5世纪时而作为波斯的敌人时而又作为波斯与罗马人争斗的同盟者被提到。悦般人可能受到来自东亚的敌对民族的排挤,逐渐向南迁移,中国人把这个民族称为柔然,或者蠕蠕。柔然人向遥远的西部展疆拓土,同时他们把乌孙人从七河流域的平原地区赶进了山里。在柔然人的压力下,公元5世纪还发生了一次民族南迁运动,希腊人把这个民族称为艾弗塔利特人或阿布捷尔人,中国人称之为嚈哒[2],后来阿拉伯人称其为海塔尔人。可能由于政治性的原因,匈奴的称呼被运用到这个民族身上。经常遇到的"白匈奴"这一术语表明,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艾弗塔利特人与匈奴并不是同一个民族。很有可能艾弗塔利特人起源于留在东方的与月氏同部族的人。5世纪,罗马史学家普里斯克依据其国王寄多罗的名字把艾弗塔利特人称为"寄多罗匈奴人",而在中国历史文书中则把寄多罗说成是月氏人的首领,因此贵霜这一名称被古典作家推广应用到了艾弗塔利特人身上。和月氏人一样,艾弗塔利特人也看中了阿姆河两岸地区,他们建都于巴达赫尚,从这里向南把自己的领地扩张到喀布尔河和印度河。544年,他们被印度王公联盟击溃。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和希腊人及罗马人一样,把艾弗塔利特人叫做匈奴人(胡人)。中国人称康居人是臣服于艾弗塔利特人的民族。从希腊的史料中可以发

---

〔1〕现在叶利尼茨基的专著《古人关于北方国家的学识》研究了托勒密及其他古希腊作者对东欧、高加索和中亚的地理认知。——Б. 斯塔维斯基

〔2〕正确的拼写是 яда。——Ю. 布列格利

现，粟特人在563年和567年之间艾弗塔利特人的国家灭亡之前，也曾181 臣服于艾弗塔利特人，此后又成为获胜的突厥人的臣民。[1]

大约在6世纪中叶，突厥人取代了蒙古的柔然人，建立了前蒙古时期所有游牧帝国中最强大的帝国。在6世纪的时候，突厥军队同时在拜占庭、波斯和中国边界作战，但从国家的层面来看，突厥帝国还没有像后来的成吉思汗帝国那样，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统一国家。帝国的创立者是兄弟二人，但他们事实上是彼此独立的，在他们之后帝国迅速分裂为几个国家。虽然已经征服了一些文明地区，并将突厥出生的王公安置在其中的某些地区，但与月氏人和艾弗塔利特人相反，中亚的突厥人却依然留在草原上，留在前乌孙人的领地上。在突厥最强盛的时期，大约在630年前后，他们的统治像从前艾弗塔利特人的统治一样，延伸到印度河流域。突厥游牧帝国与萨珊王朝统治下的伊朗国家的分界线是阿姆河。对伊朗人而言，阿姆河以外的地区就是突厥斯坦即土耳其斯坦本部，也就是“突厥人的国家”。突厥人在中亚的统治地位是被中国人推翻的。在与中国军队作战遭受了一系列失败之后，从前突厥在中亚的所有领地包括突厥斯坦的文明区域在内，名义上都变成了中国的附属地。[2] 7世纪末，在突厥斯坦又出现了一些彼此独立的突厥可汗，但在这一时期继希腊人之后来自西方的第一次征服已经开始了，这就是阿拉伯人的征服，8世纪阿拉伯人既完全战胜了突厥人，也完全战胜了中国人。

一些民族向印度的迁徙不可能不使他们与印度文明发生亲密接触，这种接触的主要结果就是佛教的广泛传播。据悉，在月氏人入侵时期，佛教既没有传播到阿姆河以北的地区，也没有传播到阿姆河以南的地区。希腊人是在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第一次接触到佛教的。希腊人所创造的佛教艺术被称为犍陀罗艺术，得名于犍陀罗，犍陀罗位于喀布尔河下游地区，后来处于月氏人和艾弗塔利特人的统治之下。就像人

---

〔1〕现在有关希奥尼特人和艾弗塔利特人的问题，参见吉斯曼《希奥尼特人－嚈哒人》；伊诺奇《民族》。比较《苏联历史概论（3—9世纪）》，第338－353页。——Б.斯塔维斯基

〔2〕关于突厥人的详情，参见前面第31页以下。——Б.斯塔维斯基

们所认为的那样，月氏人在政治上的强大促使这种艺术连同印度的一种文字（佉卢文）[1]以及印度方言一起在中亚得到广泛传播，后者成为从和田到罗布泊地区的官方文牍用语。关于佛教在月氏人中传播的最早记载，讲的是公元2年月氏使者来到中国口头宣讲佛经的事，但这个故事却被收录在相对较晚的史料中（3世纪末或4世纪初），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后来佛教徒把佛教发展的主要成就归功于月氏的迦腻色伽国王，但迦腻色伽王统治的时代迄今仍存在着争议。到目前为止，在中亚发现的最早的佛教文献属于公元269年，而佛教建筑（已经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却出现于更早些时候，在佛教建筑中发现了灭亡于220年的中国汉朝的钱币。《后汉书》中仅仅谈到了印度的佛教。概而言之，中国人对突厥斯坦居民的宗教信仰知之甚少，对撒马尔罕佛教的早期记载出现于7世纪初，而这时佛教已经开始受到起源于西亚的宗教的排挤。630年，朝圣者玄奘在撒马尔罕看到了两座佛寺，但两座佛寺都空无一人。在突厥斯坦的其他地区也没有佛教徒，除了阿姆河两岸从前月氏人的直属领地之外，这里的佛教可能只是受到了伊斯兰教的排挤。[2] 在艾弗塔利特人的主要城市里有许多佛寺和方尖塔，但艾弗塔利特人自身却并不是佛教徒。据悉，从艾弗塔利特人手中夺取了突厥斯坦统治权的突厥人根本就没有接触到佛教宣传。至于他们与印度的交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影响了他们的农业文明，这个问题还完全没有搞清楚。5世纪的记载首次谈到了卡什卡河和泽拉夫善河的稻米种植，但很可能它出现的时间更早。棉花种植技术从中亚传到了中国，但是只有在描绘现在中国突厥斯坦地区时才谈到它。关于现在成为突厥斯坦共和国组成部分的那些地区在前伊斯兰时期的棉花种植情况，我们没有任何资料。

182

公元前2世纪开辟的远东和近东国家之间的商路，可能对突厥斯

---

〔1〕卡洛什基。——Б. 加富罗夫

〔2〕苏联考古学家在中亚各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结果发现这里大概有10座佛教遗迹。参见克兹拉索夫《1953—1954年对阿克别希姆古城的考古研究》；贾布林《阿克别希姆古城的第二座佛寺》；布拉托娃－莱温娜《库瓦的佛寺》。——Б. 斯塔维斯基

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反映这些交往的第一种文物资料就是用中亚伊朗的一种方言书写的公文文件,这批公文文件属于公元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由旅行家施泰因在布隆吉河流域183 发现的,当时这里是通往罗布泊方向的长城的终点。[1] 这些文件的语言与在中亚发现的更晚时期(7 世纪)的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宗教文献文物的语言相近。在学术界这种语言被称为"粟特语",它得名于11世纪穆斯林学者比鲁尼所论述的前伊斯兰时期突厥斯坦的两种标准语之一。比鲁尼对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的历法进行了记载,粟特人历法的术语与中亚出土的古文献术语相吻合。迄今为止这些古文献的出土地只有中国的突厥斯坦地区。[2] 已故法国伊朗学家哥提欧认为,粟特语广泛流行于从撒马尔罕到中国的所有广大地区。关于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本土粟特人即泽拉夫善河两岸的居民在罗布泊沿岸和天山山脉东部盆地建立殖民地的情况,我们既拥有中文资料,也拥有伊斯兰资料。[3]

最古老的粟特文书中的字母属于闪语字母,准确地说属于阿拉米语字母,这些字母由前亚经波斯逐渐传到东方。这种文字由伊朗诸部族的文字转变为突厥人的文字。我们已知有日期可考的最古老的突厥文文献是 8 世纪突厥汗的铭文,这些铭文是在蒙古被发现的。有理由认为某些没有标注日期的铭文属于公元 7 世纪。有人论证,这些铭文上文字的最初形态就是我们已知的阿拉米活字当中的阿尔萨息硬币上的文字。[4] 这一点可由中国史料所记载的帕提亚人在中国与前亚贸易关系史上的作用来证实。人们发现古突厥文字和古粟特文字之间也有相似之处,但仅仅是相似而已,这种相似说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从时间上看后产生的突厥文字,也就是大致在 8 世纪和 9 世纪流行的所

---

[1]正如 B. 亨宁格所断定的那样,这里所谈的文件属于公元 4 世纪初。参见海宁《古粟特书信的日期》。——Б. 斯塔维斯基

[2]关于在粟特本土发现的粟特文古文献,参见前面第 115 页注释 14。——Б. 斯塔维斯基

[3]关于粟特人建立殖民地的情况,参见前面第 114 页注释 11。——Б. 斯塔维斯基

[4]目前公元前 1 世纪用阿拉米文字书写的尼萨经济文书已经被发现并得到了研究,参见季亚科诺夫 – 利夫希茨《尼萨文书》其中有关问题的书目索引。——B. 罗莫金

谓回鹘文字与粟特字母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阿拉米活字在中亚伊朗人和突厥人当中的传播，如同从前腓尼基活字在地中海沿岸和印度洋沿岸广泛传播一样，当然是与贸易联系的发展有关。后来采用哪一种字母也取决于宗教宣传，然而无论是佛教徒带来的印度字母，摩尼教徒的斜体阿拉米活字，还是叙利亚－基督徒最初通用的文字（福音体文字），抑或是叙利亚－聂斯托利教派和雅各派的宗教字母，都不能取代并非由宗教宣传而产生的粟特－回鹘文字，这种文字在记录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宗教经典的过程中得到了运用。只是在许多世纪之后这种文字在西部才被阿拉伯字母所取代，在东部为藏文所取代。从蒙文和满文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找到很久之前曾经有过贸易联系的最后一丝踪迹，满洲人认为自己的文字起源于蒙文，而蒙文起源于回鹘文，回鹘文则源于粟特语。粟特人及其穆斯林后代萨尔特人在中亚商路沿线的文化活动并不逊色于腓尼基人在海洋商路沿线的文化活动。已故 B. П. 纳利夫金认为，萨尔特人由于“不善移动”而没有成为“中亚的腓尼基人”，形成这一观点的原因是错误地把这个民族的现代生活特征当成了其过去的历史。

184

在中亚历史上出现了主要的商路逐渐由南向北转移的现象，从中国人在公元前 2 世纪开辟的由罗布泊附近到和田、叶尔羌，再穿越山岭到达阿富汗的商路（在此之前中国商品是经印度进入中亚的），转移到现在的西伯利亚铁路。与此相适应，某些民族参与这种贸易的程度也随之变化。

在前伊斯兰时期的最后几个世纪，东西方商队贸易中间人的角色逐渐由伊朗人和阿富汗人转变为粟特人和更北边的民族。从中国运出的主要产品是丝绸。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是从东汉时期开始（25—220 年）的，西汉（公元前 206—25 年）的史书还没有提及此事。可以看出帕提亚人在竭力保持自己中间商的地位，不让中国和罗马帝国发生直接的贸易联系，看来这种努力获得了成功。我们从公元 1 世纪初的希腊史料中得知，经过帕提亚帝国的丝绸之路之东段的终点，位于现在的坎大哈附近，这里同时也是汉朝史家们所描绘的从中国通往西域诸

185 国的“南部商路”之终点。托勒密(2 世纪)记载说罗马帝国与中国有直接的贸易联系,这种情况大概发生于公元 1 世纪末,那时中国人一度成功地把自己的领地推进到帕米尔。托勒密所依据的是其前辈提尔的马林的著作,而马林也是援引了他从马其顿商人马埃斯(他的拉丁名字叫梯蒂亚努斯)那里所得到的札记。马埃斯好像曾派自己的商队到中国去贩运丝绸,正是根据他们的叙述,他才勾画出他们所经过的路线。托勒密得到一种印象:马林本人并不相信商人们的记叙。的确有理由认为,马埃斯的商队根据他们从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那里打听来的情况,为自己的主人杜撰了一条似乎是他们自己经过的路线。中国总是把到来的商队当做“使团”,赋予这种“使团”重大意义,官修《后汉书》不大可能对来自他们称之为“大秦”的罗马帝国使团闭口不谈。其中谈到在 166 年,罗马皇帝的“使者”经印度和安南来到中国,虽然这些商人带来的都是印度出产的商品,其商品没有一样来自罗马帝国。显然,这里说的是商人,这些商人的最初目的地只是印度,他们到达印度之后利用这里有利的条件前往中国。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海上贸易成就正好就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这些成就的表现便是佛教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可见,如果马埃斯的商队利用了有利的政治条件(中国军队成功地把中国的边界推进到遥远的西部),那么在官修史书中也会有关于“该使团”的记载。不管怎样,政治事件可能对中国与马埃斯商队所到达的那些地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容易搜集到资料。

马埃斯商队所描绘的路线与公元初期的路线存在着一些差异。原来的路线是通往“河上的安条克”,即穆尔加布河上游的梅尔韦卢特,从这里向南通往赫拉特和坎大哈,而今他们所说的路线是通往马尔吉亚纳的安条克,即梅尔夫,从这里向东南通向巴克特拉(巴尔赫),又从巴克特拉向北经过卡梅德人的山地国家,卡梅德人属于萨基人。来自索格底亚纳的道路与来自巴克特拉的道路在这个山地国家会合,继续往前穿过峡谷,在峡谷尽头连接平原之处,矗立着一座石塔,托勒密记载说在与这座石塔处于同一纬度,但经度还要向东偏 5 度的地方有一个通往塞尔人(中国人)国家的“出发地点”(hormeterion)。

“卡梅德人”的国家，当然就是伊斯兰地理学家所说的库梅德，中国旅行家称其为拘谜陀国。穆斯林认为这个地区位于卡拉特下游的瓦赫什河。其组成部分可能包括达尔瓦兹[1]和巴达赫尚北部地区，因为据中国人证实，他们是在从胡塔尔（位于喷赤河和瓦赫什河之间）前往舒格南的路上经过库梅德的。大概在1世纪从巴克特拉前往库梅德要经过胡塔尔。托勒密所说的阿姆河沿岸最东边的城市霍尔比辛纳指的就是这里，它可能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说的位于库利亚布南面一些的胡尔布克是同一个地方。一般认为“石塔”矗立于达拉乌特－库尔干附近，在从山区进入阿赖谷地的入口处。“通往塞尔人国家的出发地点”显然已经是在中国突厥斯坦境内了。

186

根据托勒密的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时粟特人在对华贸易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他谈到来自索格底亚纳的商队在阿姆河上游山区加入到来自巴克特拉的商队之中。但是希腊人并不知道从梅尔夫经察尔周、撒马尔罕、费尔干纳的直线以及更北面的道路，虽然《前汉书》既记载了南线的商路，也了解从喀什噶尔到费尔干纳以及从费尔干纳到康居人和阿兰人的“北路”。[2] 托勒密对中亚城市及其地理位置的概念是极其模糊的，他不是把“马拉坎德”放在索格底亚纳，而是放在巴克特里亚，并且是放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蓝氏城以南。托勒密把蓝氏城和巴克特拉区别开来，认为蓝氏城在北纬44度附近，巴克特里亚的首都在北纬41度附近，马拉坎德在北纬39度附近。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这样精确地确定撒马尔罕的纬度被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与时而发表的观点相反，这未必说明有人在撒马尔罕进行了天文观测，况且当时在撒马尔罕是否存在过城市这一事实本身还是令人怀疑的。

从“塞尔人国家”运出的商品除了丝绸之外，还有铁，普林尼（公元1世纪）认为中国的铁是最好的。在中国的影响下，费尔干纳出现了武器制造业及金属加工业，而这些工业部门在伊斯兰占据统治地位的最

---

〔1〕布哈拉汗国最东南部的省份，位于喷赤河两岸。——译者

〔2〕对古希腊和中国作者关于从中亚到中国古代商路记载的详细研究，详见曼德尔施塔姆《帕米尔和帕米尔地区历史地理概论资料》，第26－85页（及其书目索引）。——Б. 斯塔维斯基

初几个世纪依然存在。与西部的贸易奠定了中亚玻璃工业的基础,无论是出土文物还是中国的史料都证实了这一点。《后汉书》中提到来自罗马帝国的物品中有“彩色玻璃”。从5世纪开始的更晚些时候的史料谈到了月氏国家的玻璃制造情况,并且说这种玻璃的“光泽度要超过来自西方国家的玻璃”。对中亚更北部地区的玻璃制造情况中国人没有提及。

关于丝绸贸易和在这种贸易影响下所产生的中亚、西亚养蚕业状187 况,资料非常匮乏。语言学家证实,斯拉夫语中的“丝”不可能来自于希腊语中的“塞勒斯”(serikon),但有可能这两个词都发源于同一个来自某种东方语言中的丝的名称。这种语言学上的事实表明存在着从中国经中亚草原再到东欧的商路。最初的可靠文字证明材料属于5世纪。自东向西的民族迁徙促使这条商路走向活跃,因为西迁的游牧民族时而会与其留在东方的同部族人进行联系。例如,有资料记载说在5世纪常有一些来自于征服了阿兰人的匈奴国家的商人(也就是欧洲的匈奴人)到北梁王朝来旅行,北梁王朝也起源于匈奴人,其都城位于现在的甘肃省兰州市。再往南一些,在黄河沿岸现在的陕西省和河南省,是另一个异族王朝的领地,这就是与北梁敌对的元魏或称北魏。在5世纪30年代有9位统治者的使者到过这一地区,其中有8位可以单独说出姓名来:3个游牧民族——阿兰人(显然,指的是匈奴王或其附庸)、悦般人、乌孙人的国王;喀什噶尔以东中国突厥斯坦地区的统治者。现代突厥斯坦的文明区域没有参与这种使团的出使活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俄罗斯东部开始的商路是从这些区域以北经过的,穿越了吉尔吉斯草原[1]和七河流域地区。而元魏王朝则通过更南面的道路与波斯往来,尽管这种往来关系的唯一证明是据说皇帝对和田统治者不满,借口是(可能柔然人)袭击了携带着波斯国王的礼物(驯服的大象和其他贵重物品)从波斯返回时被扣留在这里的中国使团。

关于波斯使团到达中国的最初记载属于6世纪。当时波斯在萨珊

---

[1]哈萨克草原。——Б.加富罗夫

王朝(3—7世纪)统治下经历了一个政治生活中最辉煌的时期,波斯人无论在政治斗争中还是在经济竞争中都战胜了罗马人。罗马帝国的势力被逐出里海地区,这必然会对其商队贸易产生影响,帝国港口与印度之间的直接海上联系也被中断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全部海上贸易都转入波斯人之手。所有这一切都为文明之统治权由欧洲民族转入前亚民族,并最终开始伊斯兰时代奠定了基础。

188

萨珊波斯对中亚文明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传播的途径,与其说可以根据稀有的文字史料来确定,毋宁说可以根据出土文物(带有萨珊波斯硬币和类似萨珊波斯盘子之类物品的宝藏)来确定。而且中国官方史书对突厥斯坦文明区域的记载也表明,突厥斯坦文明区域在这些世纪的生活是与以前不一样的。从5世纪开始中国对突厥斯坦的记载越来越详细,在汉语译音中引用了一些我们后来在穆斯林地理学家那里发现的用于表示锡尔河流域、泽拉夫善河流域、卡什卡河流域以及阿姆河流域的地理名称。鲁斯塔克,即穆斯林时期的州,当时是一些独立的公国。虽然这些公国的规模都不大,但7世纪中国对其统治者宫殿和首都的记载表明,这些公国都拥有巨额的财富。中文史料中谈到黄金御座、黄金神像等等。也论及了农业文明的发展状况,关于塔什干地区种植黍和小麦的最早记载也是在中文史料之中(没有提及泽拉夫善河流域以北地区的稻米种植情况)。此外,还有关于矿藏的资料,有意思的是对于现在依然著名的卡什卡河上红盐(石盐)矿层的记载。在某些情况下,中国人把当地出产的产品说成是外来的商品。例如,谈到5世纪花剌子模地区的琥珀开采。这一记载表明,当时可能存在着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里海的商路,在9世纪之前这条商路的意义远远超过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商路。吐鲁番统治者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有拜占庭种狗和玄狐毛皮,这证明商队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

在这些独立的公国之中,泽拉夫善河流域的公国以其政治和经济

[1]关于这一时期中亚国际关系史的新资料,参见斯塔维斯基《论5—8世纪中叶中亚的国际联系》。——Б. 斯塔维斯基

意义而显得鹤立鸡群。公元5世纪在亚历山大时代之后首次重新提到了撒马尔罕城，但它还不是整个地区的主要城市。可能当时居于首位的是位于泽拉夫善河以南离撒马尔罕不远的迈穆尔公国和里夫达德城（据伊斯兰史料记载，从撒马尔罕到里夫达德总共只有1法尔萨赫，也就是6至7俄里）。穆斯林时期在里夫达德城里有"粟特伊赫希德"即整个粟特人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城堡。迈穆尔东北部与苏特鲁沙纳（这一地区大致相当于苦盏和吉扎克之间的地区，但很可能当时犹如穆斯林时期一样，泽拉夫善河上游是苏特鲁沙纳的组成部分）[1]接壤，西南部与沙赫里夏勃兹接壤。关于迈穆尔的政治意义可以由一个事实来证明：5世纪（451年）只从迈穆尔派出了一个前往中国的使团。穆斯林地理学家们早已知道，瓦拉戈谢尔村（"水坝之源"，现在的拉巴吉霍加）最初是迈穆尔的组成部分，灌溉泽拉夫善河以南地区的一些主要运河，其中包括撒马尔罕及其周围地区赖以生存的达尔加姆运河，都发源于此。迈穆尔之所以在泽拉夫善河流域的其他公国中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据说7世纪初的时候，迈穆尔臣服于撒马尔罕王公，除了泽拉夫善河沿岸地区以外，后者还把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扩展到卡什卡河流域，甚至扩张到阿姆河以南和以西的某些地区，如安德霍伊和察尔周。在阿拉伯征服时期，撒马尔罕统治者也拥有"粟特伊赫希德"的封号。[2]

撒马尔罕政治地位的提高可能得益于粟特人在贸易和文化上的成就，这些成就可以由希腊、中国和阿拉伯的文字资料以及出土文物来证

---

〔1〕苏联学者的著作其中包括对塔吉克斯坦穆格山发现的粟特文书的研究，以及泽拉夫善河上游地区考古发掘的结果都证明，这些地区在7—8世纪不是苏特鲁沙纳（乌斯鲁沙纳）的组成部分，而是与泽拉夫善谷地中部的粟特领地相毗连的。参见斯塔维斯基《农业人口开垦泽拉夫善河上游山区的主要阶段》，第44-46页、49页。——Б. 斯塔维斯基

〔2〕В. В. 巴托尔德在研究中国和伊斯兰作者关于迈穆尔的史料时出了一些差错。451年（更准确地说是452年）（参见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165页）的使团是由米国统治者派往中国的，把米国等同于迈穆尔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作者仅仅是在叙述7世纪初的事件时，才首次提到米国、米莫和米莫赫的领地迈穆尔。对目前已知的所有文字史料进行分析，表明巴托尔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不能说5—6世纪迈穆尔的地位高于撒马尔罕。参见斯塔维斯基《关于泽拉夫善河谷地上游地区的历史资料》。——Б. 斯塔维斯基

明。关于粟特人是中国与前亚之间陆路贸易主要中间人的最早记载来自于希腊人。其中谈到粟特人在他们地区的统治权由艾弗塔利特人转入突厥人手中之后(突厥人在563年和567年之间战胜了艾弗塔利特人),试图立即寻找销售中国丝绸的市场,起初他们在波斯寻找市场,在这种尝试失败后,他们又到拜占庭寻找市场。看来这是粟特人与西方国家建立贸易联系的最初尝试,他们惊奇地发现无论波斯还是拜占庭当时都有自己的养蚕业。粟特商人和突厥使者于567年底来到君士坦丁堡。顺便提一下,拜占庭使团回访的时候经过粟特地区,然而在有 190 关这次回访的记载中,他们既没有谈到整个这个地区,也没有谈到这个地区的某些城市及其居民。[1]

晚些时候的叙述——中国隋炀帝(605—617年)使者裴矩的报告更明确地指出撒马尔罕地区是一个活跃的商业活动集中地,"所有居民都是精明的商人。小孩子满5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识字,当他能阅读的时候,便开始让他学习做生意。大多数居民都非常重视利润"。另一位在630年路过中亚的中国佛教朝圣者玄奘的讲述则证明,与从前的几个世纪相比,这里的城市生活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以前在七河地区的楚河谷地只有游牧民族生活于此,现在这里有了城市,城里聚集着来自各个王国的商人。我们根据伊斯兰史料得知这座城市的名字是碎叶城。在碎叶城以西还有数十座城市,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领导者,他们彼此各不相属,但却都臣属于突厥人。也谈到在其中的一座城市塔拉斯(穆斯林称为塔拉兹)有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商人",塔拉斯大致就在今天的奥利耶阿塔[2]。玄奘把沙赫里夏勃兹以南从楚河到铁门的整个区域连成一体,并称其为窣利,通常认为窣利就是窣利克一词的中国对音,窣利克是粟特人民族名称的方言变形形态。窣利克一词的形态转变为梵文和藏文,并与东部和南部的方言也就是所谓粟特语的特点相适应(这一术语下面还要谈到),在这里最初的齿音为流音

[1]对这些使团资料的详尽梳理,参见皮古列夫斯卡娅《拜占庭外交和5—7世纪的丝绸贸易》,第209-214页;她的《拜占庭通往印度之路》,第204-211页。——Б.斯塔维斯基

[2]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江布尔市。——Б.加富罗夫

辅音所取代，而在北部和西部方言中却保留下来。

如果这种解释正确的话，那么中亚城市生活的发展就是与粟特人在这里的殖民活动密切相关的，犹如近代的浩罕汗国时代一样，他们的穆斯林后裔在草原上建立了一系列这样的居民点，直至近期人们还把他们的后裔称作萨尔特人。粟特人的这种殖民活动完全可以由另外的资料来加以证明。在敦煌发现的中国文献谈到 7 世纪的时候，在罗布泊以南地区建立了 4 个粟特人的城市，这些城市一直存在到 8 世纪。一位 10 世纪末的波斯地理学家认为，在现在的吐鲁番地区有 5 个属于粟特人的“别戈特勤村落”（别戈特勤是突厥王公的封号），这里居住着 191 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和萨比（佛教徒或摩尼教徒）。根据后者可以看出，这些村落是在粟特人接受伊斯兰教之前建立的。

这位作者谈到了一个位于七河流域北部的村落，说它除了有自己本地的（突厥）名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粟特语”的名称。玄奘的话证明了撒马尔罕作为文明中心的价值，他说撒马尔罕居民的“道德和礼仪规则堪称其邻人的榜样”。与中国的贸易对撒马尔罕有什么样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略见一番，在阿拉伯征服时代撒马尔罕的东门被称为“中国门”。泽拉夫善河谷地居民的贸易活动并不仅仅集中于撒马尔罕，在布哈拉地区也有这种繁荣的贸易城市，佩肯德就是一个“商人之城”，用伊斯兰作者的话来说，城里的居民与中国人做生意，甚至从事海上贸易。

现在的卡塔库尔干附近地区在 7 世纪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这里曾是贵霜匿城所在地，并且在撒马尔罕重建之前这里也曾是泽拉夫善河谷地文明生活的中心。中国人对贵霜匿一座建筑物的描写很有意思，说这座建筑物的北墙上用颜料画着中国皇帝，东墙上画着突厥和印度统治者，西墙上画着波斯和罗马皇帝。大概在其他任何国家没有这种在同一座建筑物上画着罗马、波斯、中亚、中国和印度皇帝画像的城市。

之所以在中国境内发现了大量宗教——佛教、基督教和摩尼教文献文物，是因为粟特人的贸易和殖民活动，这些古文献的所属年代不早于 7 世纪，并且是用那种被伊斯兰作者称为“粟特语”的伊朗方言书写

的。我们把对粟特历法的记载归功于11世纪的学者比鲁尼,我们在考古发掘发现的古文献残片中找到了这些月份的名称及其语言学形式。因为迄今为止只在中国境内找到这些残片,所以形成了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粟特语言"实际上是从撒马尔罕到中国这一地带所有伊朗人的语言。但很可能由于前述原因,粟特语成为现在中国突厥斯坦伊朗人的标准语,就像后来在伊斯兰时代,波斯语成为中亚伊朗人的标准语一样。只有在泽拉夫善河流域的雅格诺布河谷至今还存在着一种在语法结构和词汇构成方面与"粟特标准语"接近的方言,虽然这种方言并非粟特语的直接后裔。某些伊朗学家建议把雅格诺布方言称为新粟特语, 192 因为它与"粟特"古文献语言的关系,如同现代新波斯语与中世纪波斯语(从亚历山大时代到伊斯兰时代的波斯语)的关系一样。[1]

如果从这些关于粟特人贸易和文化活动的资料中得出结论,说公元7世纪突厥斯坦的生活与亚历山大时代截然不同,这一时期突厥斯坦城市的规模及其商业价值即便没有超过现在的城市,至少也并不逊色于它们,那么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无论是中国、阿拉伯的文字材料,还是考古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即使像撒马尔罕、布哈拉和佩肯德这样一些公元7世纪的城市生活中心,也无法与现代突厥斯坦边区的主要城市相比拟。阿弗拉西阿布古城相当于7世纪整个这一地区的首位城市撒马尔罕,占地面积不到2平方俄里;当时在布哈拉只有城堡以东突起的广场才算是城市,这个广场只是现代城市的一小部分;老佩肯德城墙的周长是678沙绳。在费尔干纳和奇尔奇克河谷这些文明区域当中,其主要城镇的规模也是如此。根据中国史料记载,相当于现在的塔什干州的察赤地区的主要城市周长总共只有10里(1里相当于当时的1/3俄里),费尔干纳的主要城市卡桑周长仅为4里。中国人对卡桑的记载可以由穆格-库尔干古城的规模来印证,穆格-库尔干古城可能就相当于前伊斯兰时期的卡桑或者相当于它的卫城,它由3个小广场

〔1〕关于雅格诺布语言,参见利夫希茨和皮萨尔契科为安德烈耶夫、佩谢列娃所著《雅格诺布文》一书所写的编辑序言,第5-10页;也参见其中所列博戈柳博夫和其他研究者的著作。——Б.斯塔维斯基

组成(这3个小广场分别为500平方沙绳、2000平方沙绳和3200平方沙绳)。很自然,前伊斯兰时期城市生活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在公元7世纪如同公元前4世纪一样,统治权属于住在设防城堡中的地主贵族阶级,并且这个贵族阶级无须像从前那样顾及强大的专制政权。地方王公只是最重要的贵族地主。同一个专有名词——德赫干既可以用于称呼地主阶级的代表,也可以用于称呼伊朗和突厥裔王朝的地方王公。

所有这一切都在阿拉伯征服之后逐渐发生了变化,阿拉伯人的征服起初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直至9世纪才完成。突厥斯坦与前亚文明世界特别是与波斯的联系更加紧密。正是在9世纪,中亚地区的政权193 转入波斯穆斯林萨曼家族手中,萨曼家族起源于巴尔赫[1],起初统治着撒马尔罕、恰奇(塔什干)和费尔干纳,后来又控制了布哈拉,并将王朝的都城迁到布哈拉。阿富汗北部和呼罗珊,有时也包括波斯其他地区,都处于萨曼王朝的统治之下。作为标准语的粟特方言已经为波斯方言所取代,生活于10世纪布哈拉萨曼王朝的诗人是新波斯文学的创立者。11世纪花剌子模人还在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其他伊朗人不懂这种方言,它的消亡可能只是由于花剌子模的逐渐突厥化而引起194 的。[2]

---

[1]有关萨曼王朝起源于中亚(塔尼克)的新观点和新资料,参见谢苗诺夫《论萨曼王朝的起源问题》。——B.罗莫金

[2]参见前面第122页,注释8。——Б.加富罗夫

2　伊斯兰时期的突厥斯坦

萨曼王朝对突厥斯坦的统治持续到了10世纪末。由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我们才拥有了关于这一时期国家状态的详细资料,而关于这个时期之前或之后的时代我们都没有这样的资料。在这一时代到来之前,把前伊斯兰时代的突厥斯坦与前亚其他地区区别开来的日常生活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当时突厥斯坦的生活在很多方面与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波斯相似。10世纪时这种新旧转化的过程无论是在突厥斯坦,还是在波斯都没来得及完成,对突厥斯坦、波斯和所有穆斯林国家而言,这一过程的前后发展阶段及其实现的程度有时是同步的。9世纪通用标准语在波斯和突厥斯坦形成之前,出现了用地方方言创作诗歌的尝试。一位布哈拉历史学家谈到了一些用布哈拉方言所写的诗歌,其中讴歌了一位阿拉伯统帅对布哈拉王后的爱情。9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为我们保留了两首中亚诗人创作的诗,其中提到了撒马尔罕和沙什(恰奇),暗示了一些我们尚不知道的历史事件。阿拉伯语在国家公文处理和文学作品中逐渐让位给波斯语,但在神学典籍中仍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在这方面突厥斯坦是在10世纪开始奠定波斯语言文学基础的。撒马尔罕学者根据突厥斯坦宗教界的倡议和萨曼政府的命令,用阿拉伯语编写的教义问答又依照这位萨曼王朝统治者的吩咐被翻译成波斯语。[1] 这样一来在宗教界的赞许下,巴格达学者塔巴里对《古兰经》所作的重要注释也由阿拉　195

〔1〕指的是阿布尔·卡西姆·伊斯哈克·伊本·穆罕默德·萨马尔坎季(死于342/953—954年)的著作。可能这部著作的写作时间是320/932年。参见Л.斯米尔诺娃《"锡斯坦历史"中的语言》,绪论第7页和注释6;附录第141页。——B.罗莫金

伯文翻译成波斯文[1]，当时在呼罗珊还出现了研究这一神学领域即塔费西尔（对古兰经的注释）的波斯语原创著作。但是从总体上看，阿拉伯语无论在波斯还是在突厥斯坦此后仍然是神学文献中所采用的语言。

10世纪之后，阿拉伯征服者与当地居民相互融合的过程无论在波斯，还是在突厥斯坦都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10世纪的突厥斯坦，已经不存在像波斯的库姆城那种阿拉伯人占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城市了。阿拉伯居民的聚居地是位于撒马尔罕以北地区的韦达尔村，该村现在已经不存在，但当时曾具有一定的工业价值：这里生产的棉织物甚至在伊拉克，即在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地区的古巴比伦帝国也很受推崇。一位阿拉伯作者的话具有典型性，他说在他生活的时代从前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但是根据这"不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关于从前的知识。这个村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在12世纪，这里还依然相当繁荣，有堡垒、公共清真寺和宣礼楼。在靠近撒马尔罕的地方有一个哈尔旦克村，870年哈提斯（关于先知及其箴言的传说）的作者，布哈拉人穆罕默德·伊本·伊斯梅尔·布哈里在这里去世并埋葬于此。这本在布哈拉写成的著作，现在几乎依然被逊尼派穆斯林视为是仅次于《古兰经》的解决信仰问题的最权威的资料。12世纪，这里建有一座带有哈提斯作者陵墓的"拉巴特"（关于这些建筑下面还要谈），作者的陵墓保存至今，据此现在该地的村庄被称为"霍加伊斯梅尔"（在民间传说中，布拉里本人的名字不知为什么被他父亲的名字所取代）。在主要城市中阿拉伯居民占有一定的比例。712年布哈拉城投降时，居民们把自己一半的房屋和财产让给了阿拉伯人，保留下一些关于在阿拉伯部落之间分配城市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记载，10世纪时，这里的某些大门、街道、清真寺等往往以这些阿拉伯部落来命名（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房屋"坐落在堡垒以东的街区）。至于

---

[1]根据萨曼王朝埃米尔曼苏尔·本·努赫（961—976年）的命令，塔巴里的《塔弗西尔》（对古兰经的注释）及其大部头的历史著作从阿拉伯文被翻译成波斯文。——B.罗莫金

这些阿拉伯人的后裔当时在语言和生活方式方面与其他居民有多少差别，我们一无所知。上面援引的关于韦达尔村的资料表明，在突厥斯坦的阿拉伯移民中间，除了军人之外，还有手工业者即纺织业的代表。在布哈拉有一个作坊制造的地毯和纺织品当时享有盛名，这个作坊位于靠近堡垒东门的街区，“阿拉伯人的房屋”主要位于这里。据某种史料记载，撒马尔罕的伊赫希德可能和所有的居民一起完全放弃了城市，将其让给了阿拉伯人。然而，从其居民的构成来看，撒马尔罕却并没有变成阿拉伯人的城市。当时在撒马尔罕城郊库萨玛·伊本·阿巴斯陵墓附近的一个地方（现在的阿弗拉西阿布古城）就是以一个阿拉伯部落的名称来命名的，库萨姆·伊本·阿巴斯是先知的堂弟，有关他来到突厥斯坦的情况只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史料，这些史料中有一部分明显地具有神话传说的性质。突厥斯坦的阿拉伯人后来的命运如何呢？这方面的史料异常缺乏。[1] 1897 年统计确定的数字极不可靠，未必可信。根据 1901 年塔什干出版的游览指南，撒马尔罕州大约有 2 万阿拉伯人，据普查操阿拉伯语的只有 10 人，其中 7 人住在彭吉肯特市，与此相反，在占领期阿拉伯人涌入相对数量肯定要少的锡尔河州，操阿拉伯语的人数则为 634 人。前布哈拉汗国的阿拉伯人至今还保留着自己的部落名称，顺便提一下，在达尔瓦兹边界雅赫苏河谷的阿拉伯人中间有古莱西部落的代表，古莱西人起先住在布哈拉城，但已不再使用自己的语言，而讲乌兹别克语。他们与其他居民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他们制作的羊毛地毯和被子上面绘有图案，通常在纺织品的装饰图案中会保留一些能透视居民起源的痕迹，而这些居民往往都已经丧失了自己从前所使用的语言。

196

早在公元 3 世纪，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邻居就用紧邻他们的塔伊部落的名称来称呼所有的阿拉伯人。这一大概发塔日克音 тажик 的名称从波斯传入中亚和中国（汉语音译为大食 даши）。在 5 世纪的波斯文献中这个词是以“塔济”这一新的形式出现的，其意为“阿拉伯，阿

〔1〕参见温尼科夫《苏联的阿拉伯人》。——B. 罗莫金

拉伯的"以及"穆斯林,穆斯林的"。[1] 在伊斯兰教产生的最初几个世纪,这些概念之间还没有什么区别,史学家塔巴里在叙述728年伊斯兰教的成就时,援引布哈拉德赫干的话说所有的人都成了"阿拉伯人"。在11世纪,也可能更早些时候,中亚的突厥人开始使用塔日克这一民族学名称来表示他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即伊朗人所属的那个民族,在突厥语的发音中塔日克就是塔吉克。"塔吉克语"既不同于突厥语,也不同于阿拉伯语。可能"塔特"一词就起源于塔日克这一术语,人们现在这样称呼突厥斯坦的定居居民即土库曼人。在11世纪的突厥文献中也会遇到萨尔特人一词,但却不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而只

197 是一个普通名词,其意思为"商人"。在突厥佛教文献中遇到的"萨尔特贝 сартбау"一词,是对梵文 sarthavaha 或 sarthabaha(商队首领)一词的歪曲,可能正是根据所谓语言学的理解,突厥人把这个词转变为"萨尔特巴希",意为"萨尔特人的首领",从这里又形成了表示"商人"之意的"萨尔特"一词。蒙古人在13世纪使用了由这个词的词根构成的萨尔塔克和萨尔塔乌尔一词,其意思是"塔吉克人"和"穆斯林",并且他们不仅把伊朗人称为"萨尔塔克",而且也把突厥穆斯林称为"萨尔塔克"。突厥化的突厥斯坦蒙古人的后裔在15世纪末使用萨尔特一词来表示"塔吉克人",他们把萨尔特人的语言和文献与突厥人的语言和文献区别开来。16世纪初,征服了突厥斯坦的乌兹别克草原居民开始把所有不同于"乌兹别克人"的定居居民,包括伊朗人和讲突厥语的人都称作"萨尔特人"。后来,当突厥语成为大多数定居居民语言的时候,萨尔特一词便开始在文献中(例如,在浩罕史学家的文献中)使用,有时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用来称呼那些与塔吉克人即保留了自己语言的伊朗人不同的讲突厥语的城里人或农村居民。从日常生活特征来看,萨尔特作为典型的市民和农民,现在与绝大多数都转向定居生活的乌兹别克人并没有什么区别,而是与"哥萨克人"有区别。因而,萨尔特一词也经历了与"塔吉克"一词一样的演变过程:人们开始只是把阿

[1]比较前面第121页注释6。——Б.加富罗夫

拉伯人称为塔吉克人，后来又把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伊朗人称为塔吉克人，最后仅仅把伊朗人称为塔吉克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萨尔特一词也是同样：起初只把伊朗人称为萨尔特人，后来又把定居的伊朗人和突厥人称为萨尔特人，再后来仅把定居的突厥人称为萨尔特人，他们构成了定居居民中的绝大部分。大概在某些地区，比如在布哈拉，人们现在不是根据语言来区别萨尔特人和塔吉克人，而是根据日常生活特征来区分两者，萨尔特这一术语主要用于表示城市居民，而塔吉克主要用于表示农村居民。[1] 有时人们用塔吉克这一名称而不是用萨尔特来称呼山地居民——加里查。[2] 加里查一词在前蒙古时期的文献中总是被写成加尔恰（гарча），它由 гар“山”一词而来（该词的方言形式是 гарч）。10 世纪，穆尔加布河上游（阿富汗境内）地区是一个独特的区域，人们主要把这个独特的区域称为加尔奇斯坦（阿拉伯人称之为加尔希斯坦，他们通常用 ш 代替 ч），即山民的地区。但至少在 12 世纪的时候也谈到了“撒马尔罕的加尔奇斯坦”，显然应该把这一名称理解为泽拉夫善河上游及其支流地区。我们在文献中没有找到对加尔恰和加尔奇斯坦这些术语的准确定义。13 世纪初的地理学家雅库特认为只有赫拉特以东、古尔以西、加兹纳以北和梅尔韦卢特以南地区才是“加尔什”或“加尔希斯坦”，虽然根据 12 世纪作者萨曼尼的说法雅库特本人在另一个地方也谈到了撒马尔罕的加尔奇斯坦。 198

在阿拉伯征服时代，伊朗人和突厥人之间的民族界限、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文明界限，以及穆斯林帝国与“异教徒地区”之间的政治界限是大致吻合的。非突厥族的游牧居民在阿拉伯征服之前已经被赶出了草原。在伊斯兰时期，人们继续使用“托哈利斯坦”这一地理术语，但却不知道该词的起源，对吐火罗这个民族也一无所知。在阿拉伯征服史上还提到了海塔尔民族（艾弗塔利特人），但只是在叙及阿富汗境内或突厥斯坦最南部铁尔梅兹附近发生的事件时，才谈到它。另一

---

〔1〕关于萨尔特这一术语的详情，参见巴托尔德《萨尔特人》（《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第 4 卷）。——B. 罗莫金

〔2〕关于加里查/加尔恰这一术语的详情，参见下文，第 457 – 459 页。——B. 罗莫金

方面，在突厥斯坦的文明区域也存在过突厥人的王朝，但是讲突厥语的定居居民可能还没有出现。最近数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即使在现今中国突厥斯坦境内，也只有库车以东的居民才是操本民族语言的突厥人。

阿拉伯征服者不得不既同当地的突厥王朝打交道，又同草原上的突厥人打交道，甚至还要同草原强国打交道。草原强国的代表——“可汗”的地位与罗马“皇帝”（恺撒）和波斯“国王”（库思老）相当。737年和739年，阿拉伯人在锡尔河所取得的胜利导致了现在突厥斯坦共和国境内汗国的灭亡。草原分裂为几个领地，但却并没有服从阿拉伯总督的统治，这些阿拉伯总督只是采取措施保卫文明区域免受草原居民的袭扰。同西方罗马的石灰墙和东方中国的长城一样，突厥斯坦的土堤长墙大概也是为了抵御类似的侵袭而筑起的一道屏障。[1]此类最完美的建筑建于萨曼王朝时代。迄今还保留着用烧制的黑砖建造的长墙遗址，根据史料记载，这段长墙5世纪建于里海以东和朱尔占河以北地区，而另一段用同样材料所建造的长墙，坐落在马詹德兰东部边陲由海到山一线，它显然是在波斯国王们被迫放弃朱尔占河防线以后建造的。历史学家塔巴里甚至谈到过用切削的石材所建造的长墙，但是没有发现能够证实这一记载的长墙遗址，他很有可能是把这些长墙和拱卫杰尔宾特通道的长墙弄混了。与杰尔宾特长墙不同，据悉伊斯兰时期在里海以东修建的长墙已经不存在了。也没有对公元前3世纪为保卫梅尔夫绿洲所建造的长墙进行维修的资料，这些长墙在10世纪的时候只剩下了一些遗迹。在阿拉伯统治时期的8世纪下半叶，在布哈拉城文明带的四周以及奇尔奇克文明带以北从锡尔河到山脉之间，差不多同时修筑了长墙。这两个地区的长墙遗址一直保留到今天，并且布哈拉长墙的遗址已经得到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它们是一种带有

199

[1]关于呼罗珊和马维兰纳尔长城在与游牧民族斗争中的作用，参见雅库鲍夫斯基《8—19世纪土库曼民族和土库曼斯坦历史概论》，第35-39页。也参见穆罕默多夫，*Мудофаа иншоотлари*。——B. 罗莫金

用砖坯建造的警卫工事的土堤。[1] 据史料记载,这些布哈拉长墙是按照前伊斯兰时期保卫撒马尔罕州的长墙的样式建造的。在1786年关于清真寺不动产的文件中提到了这种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太婆堤"(坎贝尔－吉瓦尔)的土堤遗址,当时正在划定撒马尔罕西北部秀坎奇村的北部界线,圣穆赫里斯－阿塔的陵墓就位于该村。[2] 840年,撒马尔罕统治者努赫·伊本·阿萨德征服了伊斯菲扎布,即阿雷斯河文明地区之后,也在那里修筑了长墙。根据流传到今天的关于这一建筑的唯一资料,这些长墙只能保卫那些离伊斯菲扎布城(可能位于今天的塞兰市)最近的地方。这一史料中还谈到在"该城居民的葡萄园及其耕地"四周建墙的事,但这种墙可能已经销声匿迹了。[3] 874—907年,布哈拉统治者萨曼王朝的伊斯梅尔第一个放弃了长墙的修筑和维护。据史家记载,他的豪言壮语是:"我活着,我就是布哈拉地区的城墙。"无论是布哈拉的长墙,还是奇尔奇克附近的长墙,都被人民称为"太婆堤"(坎贝尔－吉瓦尔),并且并非只有突厥斯坦的长堤被称为"太婆堤",从前用来保卫埃及文明地带的长墙遗址也被称为"老太婆墙"(хаит ал-аджуз)。后来,很少在城市和村落四周修建长墙了。俄罗斯征服者只遇到过一个这种类型的建筑,这就是"沙尔城(沙赫里夏勃兹)和基塔布城以及其他几个基什拉克和库尔干恰(小堡垒)"四周的城墙。[4]

200

与这些长土堤不同,阿拉伯时期的城墙主要不是用于军事目的,而是用于警察目的。居民们在陈述布哈拉城四周修筑城墙(这项工程于849年或850年竣工)的必要性时说:"我们的城市需要城墙,以便在夜

[1]关于布哈拉绿洲长城的资料目录,参见纳尔沙西《布哈拉史》,弗赖译本,第127－128页注释146。——B.罗莫金

[2]维亚特金《撒马尔罕省历史地理学资料》,第50页及索引。

[3]1925年夏,M. E. 马松在距塞兰村中心7.5公里处发现了一段围墙的遗址,这可能是保卫伊斯菲扎布城郊城墙的一部分。参见马松《老塞兰》,第38－39和第40－41的表格。——B.罗莫金

[4]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502页。甚至不能充分肯定这些长墙确实存在。

关于沙赫里夏勃兹和基塔布四周的(契姆)城墙,参见马松、普加琴科娃《帖木儿和兀鲁伯时代的沙赫里夏勃兹》,第29－30页。——Ю.布列格利

间关闭城门,使城市免遭小偷和强盗的袭扰。”现代的城墙也被赋予了这种意义。写到此,笔者想起了从一些突厥老人那里听到的抱怨,他们说:“在俄国人统治时代拆除了夜间可以关闭城门的城墙,也废除了太阳落山后不许上街的禁令,但此后居民们夜里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安心地睡觉了。”在产生于前亚的那种类型的城市中,城墙的对内警卫目的更容易得到实现,正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阿拉伯时代(其典型例子是大马士革——第一个哈里发王朝的首都),因为阿拉伯部落的分裂以及习惯于在被征服或新建造的城市中拨给每一个部落一个特定的地方,所以人们不仅在整个城市的四周建造了带有城门的城墙,而且甚至在独立的街区四周也建立了城墙。波斯现在还有这种类型的城市,例如哈马丹城,根据一个俄国旅行者的说法:“街区之间被夜间上锁的大门隔开。城市四周没有连在一起的独立围墙,但是通往出城大街上的城门夜间也被锁上。”根据蒙古入侵前几个世纪的一些有关梅尔夫的资料来判断,这种类型的城市在与波斯联系最密切的外里海州也存在过。我们还没有掌握在其他突厥斯坦城市的独立街区四周也建有围墙的明确史料,但布哈拉除外,资料已经表明布哈拉城是由一些彼此独立的阿拉伯部落来分割的。

除了最初的城市居留地沙赫里斯坦外,城郊拉巴德即附属于城市的辽阔地区也是由布哈拉城墙所环绕的城市的组成部分。城墙本身也被称为拉巴德,并且波斯作者也采用了这一阿拉伯术语。后来,当10世纪还存在的沙赫里斯坦的城墙和大门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当前伊斯兰时期的城市居留地丧失自己“城市”的主要意义,而伊斯兰时代扩充的街区已经不再被认为是郊区的时候,布哈拉的拉巴德墙依然是城墙。在某些其他情况下,由拉巴德墙所围起来的空间对于狭义的城市而言是过大了,这样的城墙不能履行自己的政治使命。因此,在伊斯兰时期出现的街区代替沙赫里斯坦成为“城市”的时候,从前的拉巴德只有不大的一部分被认为是这样的“城市”,四周围以特殊的城墙。例如,在梅尔夫现在以吉利亚金－奇利布尔奇的名称而闻名的土堤遗迹就相当于10世纪的拉巴德墙,土堤所围起来的空间占地面积为40平方俄里;

201

恰乌尔卡拉古城相当于沙赫里斯坦;苏丹卡拉古城(面积约为4平方俄里)相当于在11世纪才最终成为公认的"城市"并在四周围以特殊城墙的郊区。撒马尔罕的拉巴德黏土墙绵延40俄里,圈占土地面积接近10000俄亩,这种黏土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吉瓦里基亚马特,或者在南部地区,被称为吉瓦里昆达兰格(最后一个名称与突厥—蒙古词昆达兰有关,其意为"大帐","汗的大本营",也可能指的是蒙古时期位于城墙附近的一个地方)。12世纪,只有沙赫里斯坦即阿弗拉西阿布以南大致相当于现在土著撒马尔罕或"亚洲"撒马尔罕的地区才被认为是"城市"。很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拉巴德墙与布哈拉城墙不同,它们的建造并不是为了内部警卫,而是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关于梅尔夫拉巴德建造的原因没有记载,撒马尔罕拉巴德是希吉拉历134年即751或752年由担任呼罗珊总督的阿布·穆斯里姆(倭马亚王朝的推翻者和新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缔造者)在镇压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起义后直接建造的。根据某些资料,阿布·穆斯里姆只是重新恢复了前伊斯兰时期的建筑工程,这种建筑工程有时应归功于亚历山大大帝,并且亚历山大似乎希望"在各国王之间发生敌对军事行动以及处于战争状态时,该城城郊的居民能在城墙里面集合,与城里的居民联合起来,互相帮助,保障自己的安全"。拉巴吉加济扬村(字面的意思是"为信仰而战的斗士村")这一名字本身就表明了撒马尔罕城墙的军事作用,靠近乔潘-阿塔山西面山脚下城墙东北端的村落,现在依然叫这个名字。就像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宗教战士"不仅对外敌而言是一个危险因素,而且对萨曼国家的内部稳定而言也是一个危险因素。此外,按照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的说法,这一时期的撒马尔罕被认为是暴乱之源,他的记载属于埃米尔曼苏尔统治时期(961—976年),并且属于他统治的上半期。伊本·豪卡尔在943年开始自己的旅行(他在这一年从巴格达出发),于973年完成了自己的著作,该著写作的最后几年他是在西部度过的。969年,他从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地区到了西部地区,这一年他到过朱尔占河畔,就在同一年他又最后一次来到了底格里斯河的摩苏尔,972年他去了西西里岛。在伊本·豪卡尔时代,撒马

尔罕的城墙上已经没有了上锁的城门,由于城市发生暴乱,撒马尔罕当
202 局命令把城门拆掉了。

为了进行圣战,如同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边疆地区一样,在突厥斯坦除了城墙和土堤之外,还建造了里巴特 рибат(正确的阿拉伯语发音是这样的)或者拉巴特 рабат(这个词在突厥斯坦的发音就是如此,不要把它和拉巴德弄混)。根据 12 世纪一位作者的解释,所谓拉巴特就是"拴马的地方"(此为该专有名词的词源学起源)。拉巴特是供宗教战士(为信仰而战的斗士)使用的,因为他们在边界据点安顿下来之后,"要在那里与敌人面对面地生活,粉碎他们的阴谋并击退他们对穆斯林的进攻"。因此就其用途来看,里巴特或拉巴特相当于我们的哥萨克村镇,但其外表的样式却不同,因为它们不是用来安顿常驻移民及其家庭的,而是骑兵部队的营房。里巴特这个词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动词形式(〈рабата〉,可能其意思是"在里巴特中战斗")在《古兰经》中也会遇到,但从字里行间看不出是否只谈到了用于安置骑兵部队或者只是为他们而建造的特殊房屋。有一些人在解释《古兰经》的时候甚至竭力证明(违背《古兰经》的精确含义,第 8 章第 62 页——里巴特阿尔哈伊尔 рибатал-хайл,"战马的里巴特")里巴特在先知时代的战争中还不曾使用,《古兰经》中所谈的不是圣战而是祈祷和苦修,就像后来苦行僧的"里巴特"可以与宗教战士的"里巴特"相提并论一样。一位埃及历史学家认为,这些里巴特中的住户以自己的祈祷来使国家免于灾难,如同军用里巴特中的住户用武器来挽救国家一样。按照这位历史学家的说法,在基督教世界中修道代替了从前的"殉道",即受难。穆斯林和基督徒一般都把那些为信仰而献出生命的人称作"殉教者"(阿拉伯语中的沙希德一词就其词源意义而言与希腊语中的"殉难者"或英语中"殉难者"完全相符),但是对穆斯林来说,根据其说教的特点,这种"殉道"不是被动的受难,而是积极的斗争,并且不仅仅是与外部敌人的斗争。早在伊斯兰历 1 世纪的时候,人们就打着为信仰而战的旗帜发动起义反对不虔诚和不公正的统治者。在这种背景下,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团体和战斗团体之间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思想上的联

系，这种思想上的联系在基督教历史上的体现便是宗教骑士团。在希吉拉历 2 世纪，从撒哈拉南部与苏丹交界地区的一个由宗教献身者所建立的“拉巴特”中，产生了阿尔莫拉维（穆拉比特 мурабит，即生活在拉巴特中的人）王朝，这个王朝曾经征服了北非和西班牙。现在非洲一些已经不再具备军事意义的宗教团体的成员仍然被称为穆拉比特（法语叫做marabouts）。在突厥斯坦和波斯，拉巴特和其他用途的建筑彼此接近有时是由建筑物的布局和构造相似而引起的。研究伊斯兰建筑的史学家指出了汗（旅馆，商队旅舍）与迈德赖塞（高等学校）之间的相似性，拉巴特和哈纳卡——托钵僧的住处都是那种兵营型的建筑，并且房间位于院子四周。由征服者所带来的拉巴特要塞的样式与早先存在的招待朝圣者的房屋和寺院的样式非常相像，以至于两者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密切联系，影响了人们对拉巴特这一术语的使用。可能在有些情况下也用现成的建筑物来当拉巴特，就像把从前宗教公社的神殿变成穆斯林清真寺一样，尤其是建造拉巴特被认为同建造清真寺一样符合神意。顺便提一下，出身于巴尔马克家族（著名的阿拉伯大臣世家，被哈伦·阿尔·拉希德罢黜）的法兹尔·伊本·叶海亚被认为是清真寺和拉巴特的建立者，他在 8 世纪末曾一度担任呼罗珊总督。

具有军事价值的拉巴特当然主要建立在与草原毗连的地区，比如说在布哈拉地区，地处从布哈拉通往梅尔夫大路上的商业城市佩肯德就是这种边界据点。根据布哈拉历史学家的说法，240 年（公元 854—855 年）前在佩肯德周围有 1000 多个拉巴特，“这个数量相当于同等数量的布哈拉村庄，每个村的村民都在自己的村中建起拉巴特，将人员派往拉巴特，并向他们提供生活资料。冬天当异教徒来袭击时，每村都有很多人来到自己的拉巴特中，为宗教而战”。不用说，与此类事件有关的拉巴特在 9 世纪中叶就已经停止了自己的活动。10 世纪末的地理学家马克迪西还看到过在佩肯德“大约有 1000 个”拉巴特，其中一部分住有居民，另外一部分已经空了。到了 12 世纪，无论是拉巴特还是佩肯德城本身（只有为数不多的土库曼人在此居住）都已经成为废墟。造访此地的作者听说这里有 3000 座拉巴特，它们都是为诵读《古兰

经》而建的。这样一来，布哈拉历史学家曾明确谈到过的拉巴特的军事意义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1000 个拉巴特”的说法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供为数不多的人使用的每一个独立的建筑被称为拉巴特。在其他某些情况下，拉巴特指的是边界要塞，其四周建有围墙，有时建有几层围墙，这种边界要塞的规模相当于一座小城。例如，费拉瓦拉巴特或季希斯坦拉巴特就是如此。费拉瓦拉巴特即现在的克孜勒阿尔瓦特城（克孜勒的本义是拉巴特，即“红色拉巴特”），而季希斯坦拉巴特即现在的马什哈德·伊·米斯里扬遗址，这是一座占地120俄亩的小城，带有用烧制黑砖建造的城墙。季希斯坦的遗址一直保存到今天，它属于 13 世纪初期，在 10 世纪末的时候这座拉巴特已经没有围墙了，因为根据政府的命令它的围墙被摧毁了。

204

10 世纪在撒马尔罕的“宗教斗士拉巴特”中，当地学者阿布·曼苏尔·马图里迪和阿布尔·卡西姆·萨马尔坎季见到过希兹尔（传说中的先知，伊斯兰教的戒律与祭祀希兹尔有关），他教给其中一人神学，教给另一人哲学。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拉巴特（它的名称证实了它的最初使命）当时也用于其他目的。有些时候，拉巴特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进行宗教祭祀活动或传教活动而建造的。比如，8 世纪的梅尔夫学者和修行者阿卜杜拉——穆巴列克之子，在研究哈提斯（穆罕默德言行录）和非赫（教法）的两大对立宗教派别的代表中都享有威望，他在梅尔夫为每一个教派都建立了一座拉巴特。在《古兰经》中提到的与祭祀前伊斯兰时代先知有关的拉巴特已经被发现。例如，位于阿姆河南岸克利夫附近的祖尔卡涅因拉巴特即亚历山大·马其顿拉巴特（《古兰经》第 18 章，第 82 页以下），河北岸的祖尔基夫里拉巴特（《古兰经》第 21 章，第 85 页；第 38 章，第 48 页）。祖尔基夫里的祭祀活动后来由克利夫迁到了铁尔梅兹，18 世纪的作者认为“光芒四射的祖尔基夫里先知陵墓”就位于此地阿姆河中间的岛屿上。该岛因此而得名阿拉尔－佩伊加姆别尔（先知岛）；19 世纪，它被称为奥尔塔－阿拉尔，也就是中心岛。已故的 И. Т. 波斯拉夫斯基 1895 年听说，在阿拉尔－

佩伊加姆别尔有一座庞大的古老建筑物,似乎有点像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当地谢赫长期在此居住,穆斯林有时也到这里朝圣。[1] 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现在这座"古老"的建筑已经为新的建筑所取代。谢赫现在是否依然住在岛上我还不能确定。10 世纪,在祖尔卡涅因拉巴特中有一座清真寺。至今还流传着一则关于亚历山大的神话,说在克利夫附近有一条河,河流流经之处埋葬着征服者"及其所有的财富",但"谁也不知道,伊斯坎杰尔(亚历山大)的陵墓到底在哪里,阿拉赫将只向全世界的新征服者披露这一秘密"。

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从前当地的圣地被用于伊斯兰教的祭祀活动。虽然亚历山大是在克利夫附近渡过了阿姆河,马其顿的军营就驻扎在河的南岸,但未必有理由把这个传说看成是自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在突厥斯坦流传下来的一些传说的反应。这些传说至今也没有得到证实。总之,在中世纪的时候伊斯坎杰尔湖[2] 并不叫这个名字。在 13 世纪之前还没有关于巴达赫尚和其他当地的王公是由亚历山大所生的传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有关亚历山大的说法赋予了他生命起源的意义,据说这种生命之本源自于圣天。阿姆河被认为是可以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相媲美的四大圣河之一,因此该河后来得名杰伊洪(吉洪)。祖尔卡涅因拉巴特在底格里斯河源附近,当然杰伊洪河上的拉巴特也叫做祖尔卡涅因。在阿姆河右岸的法拉勃也有一些"相当大的拉巴特",其中有一座是萨曼王朝统治者纳斯尔·伊本·艾哈迈德(914—943 年)建立的,他打算在这里宴请朝圣者,也就是作为接待朝圣者或商队的客栈。12 世纪,突厥统治者阿尔斯兰汗在布哈拉的伊斯基什克特村"为外国人"所建造的要塞,很可能也是一个商队旅舍。

我们只有关于利用从前的建筑物做清真寺使之适应伊斯兰祭祀活动的直接资料,比如,布哈拉(在城堡里)和撒马尔罕(在沙赫里斯坦,

[1]波斯拉夫斯基《论铁尔梅兹遗址》,第 95 页。

[2]塔吉克斯坦的高山湖泊,位于范山山脉吉萨尔峰北坡。其意为亚历山大湖,据说亚历山大曾率军队到达这里,伊斯坎杰尔在塔吉克语中的意思是亚历山大,库尔在塔吉克语中的意思是湖泊。——译者

与城堡并排）早期的大清真寺最初就是用来供奉偶像的神殿（布特哈涅）。在前亚地区，大清真寺不仅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是国务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在那里设有国库，可以进行审判、决定公共事务，教师也可以在这里授课等等。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指出了前亚和东部伊朗地区在这方面存在的差别，在呼罗珊、马维兰纳尔、锡斯坦和吉巴里（波斯中部，古米太）的清真寺中，人数最多的是赫拉特清真寺，其次是巴尔赫清真寺，再次是锡斯坦清真寺（锡斯坦的主要城市泽连赤的清真寺，现在是纳吉阿里堡垒）。法吉赫（伊斯兰教法学家）只集中在这三座清真寺中，总起来讲，这里常常是人头攒动，就如同在叙利亚及其边界地区一样。但在这一边区的其他清真寺中，只有星期五也就是举行聚礼时才聚满了人。后来在其他一些清真寺中也可以授课，比如，在梅尔夫大清真寺中有一位学者用波斯语来讲解非赫（教法），这位学者在1153年古兹突厥人屠城时被杀。突厥斯坦和波斯东部地区的所有居民除了礼拜之外很少需要清真寺，因为他们有专门的建筑用来授课以及进行宗教祭祀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

为了搞清楚前伊斯兰时期突厥斯坦用于举办宗教和社会活动的建筑物的种类，必须要对文字史料以及语言学、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进行系统的研究。必须要把来自于所谓粟特文的稀有资料与丰富的伊斯兰学者的资料进行比较，没有这种比较就很难判断伊斯兰学者们所使用的术语在多大程度上与当地的专有名词相符合。在伊斯兰时代，即使出身于突厥斯坦的学者也使用阿拉伯语或者通用波斯标准语进行写作，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使用波斯术语，而不管这些术语是否为当地居民所了解。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他们才使用个别粟特词、布哈拉词和花剌子模词等。可能在当地的方言中至今依然保存着其中的某些词汇，但是这些当地术语现在只存在于灌溉领域当中。在某些情况下，有些起源于伊朗但已经被当地伊朗人遗忘的词汇也存在于突厥方言中。考古发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突厥地主贵族住宅（所谓“活墓”，在德赫干的作用保持最长久的安格连谷地，这种“活墓”特别多）以及当地葬礼（在撒马尔罕到奥利耶阿塔之间发掘的所谓纳骨器）

206

的资料[1]，但是至今也没有找到足以阐释这种资料的相应的文献史料（我们甚至不清楚，突厥斯坦各个地区的当地居民是应该怎样称呼设防堡垒和纳骨器的）。对花剌子模的研究在民族学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至今还保留着某些日常生活习俗，如采用田庄经济、使用原始大马车，这些从前都是整个突厥斯坦居民所特有的东西。花剌子模日常生活特征与山地塔吉克人和喀什人生活习俗的相像就证明了这一点。10世纪，地理学家们所描述的花剌子模人的某些外在生活特征，如头戴高高的帽子，一直保留到今天。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花剌子模人绝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其他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但在四周被沙漠包围的花剌子模，如同在四面环海的英吉利一样，却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外来的生活特征也会显示出特殊的生命力。

在某些波斯词典中哈涅即"房屋"的含义是"私人住宅"，它与萨莱 сарай 即"旅馆，公共建筑"一词是相对立的。诗人库德西的诗句是这样说的："不要让别人进入房屋，不要把房屋叫做萨莱。"人们通常把皇宫、办公地点、旅馆（商队旅舍）、贸易场所以及仓储库（俄语中"棚子"一词的意义就是从这里引申而来的）称作萨莱，它是与哈涅不同的公共建筑。清真寺中的独立建筑也被称为萨莱或米扬萨莱 Миян-сарай（这个词是与米扬即"中等"一词合并而来的）；萨莱可以用来授课。在撒马尔罕有一座萨莱，叫做贾乌扎尼亚或贾乌扎尼扬，关于它流传着一种迷信说法，说凡是在这里学习科学知识的人都会成为虔诚而有学问的人。后来人们把这个建筑叫做"贾乌扎尼亚清真寺"或"贾乌扎尼亚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一般认为该清真寺坐落于现在的撒马尔罕城中，在希尔达尔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以东。萨莱可以是设防城堡的一

207

[1]随着新出土文物的出现，在B.B.巴托尔德之后关于中亚纳骨器的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文献。比如，较早的著作可参见维亚济金《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沙乌兹州卡拉里基尔1号古城的纳骨器》；斯塔维斯基等《彭吉肯特的墓地》。最近出版的著作有：连姆别尔《古代塔拉兹的墓地》；叶尔绍夫《对巴伊拉姆－阿里城地区纳骨器墓地进行考古研究的某些结论》；斯塔维斯基《比亚－乃蛮的纳骨器》；拉波波尔特《论1951年发现的巴尔特姆盘上的图像》。——B.罗莫金

部分,就像王公或上层地主贵族代表的住宅一样。在阿拉伯人那里,这种堡垒是用从拉丁语中借来的词汇卡斯尔 касp(castellum 或 kastron 是由拉丁词汇 castra 构成的希腊语单数形式)来表示的,而不是用阿拉伯语中的希森 хисн 或希萨尔 хисар 来表示的,在波斯语中与卡斯尔 касp 相对应的词汇是卡赫 ках,或更多时候是基奥什克 кешк。卡赫可能是一种比基奥什克规模更大的建筑物,人们主要把有统治权的邦君的住宅称作卡赫,例如布哈拉统治者——布哈尔胡达特在布哈拉卫城[1]和拉米坦附近瓦拉赫沙村的城堡,布哈拉胡达特的对手——瓦尔丹纳统治者瓦尔丹胡达特的城堡(后来的瓦尔丹津村,已被沙丘埋没),伊斯兰时代萨赫里·伊本·艾哈迈德·达古尼(9 世纪)在伊斯基什克特村建造的宫殿以及突厥汗舍姆斯·阿尔·穆里克(9 世纪)在布哈拉南部郊区建立的宫殿。在后一种情况下,卡赫建在四周有围墙的禁区(突厥语称作库鲁卡 курука)内,围墙长度为 1 英里(大约为 2 俄里)。布哈拉卫城中的卡赫依靠七根石柱而建,就像大熊星座上的七星。在这个卡赫里有一座"专做后宫和国库的萨莱",可能是其中的独立组成部分。关于瓦拉赫什卡赫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一位布哈尔胡达特被杀死在这个卡赫他自己的基奥什克中。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基奥什克理解为卡赫中的一座建筑物。有意思的是,萨曼王朝统治者伊斯梅尔(874—907年)建议当地居民把这个卡赫改造成了一座大清真寺。小型堡垒,可能还有现在阿富汗山村里的塔楼,被称为基奥什克。[2] 据说在铁尔梅兹发生过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之后获胜的阿拉伯首领用被杀死的敌人的头颅建立了两座"基奥什克",这一叙述更清楚地说明了"塔楼"的意义。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记载,738 年有两座分别用黄金和白银建造的"卡斯尔 касp"连同其他礼物一起都被献给了阿

208

〔1〕布哈尔胡达特的基奥什克位于"里吉斯坦卫城的大门旁"(纳尔沙西《布哈拉史》,舍费尔版,第 63 页)。

〔2〕与梅尔夫地区波尔苏-卡拉要塞以西的基奥什克相比较,后者是一个"坚固的四角塔楼,其四周已经被沙土深埋"(萨莫伊洛维奇《梅尔夫回忆录》,单行本,第 7 页,注释 41);在阿里汗诺夫(《梅尔夫绿洲及通往绿洲的道路》,第 94 页)那里写的是"科秀克";在地图上(其中包括在阿里汗诺夫小册子中的地图上)写的是"米纳拉"(宣礼楼,塔楼)。

拉伯总督，很有可能这两座“卡斯尔 каср”也被称为“基奥什克 кешк”。但是，只有当基奥什克指大地主的设防住宅时，它才相当于阿拉伯人所说的卡斯尔 каср。例如，被阿拉伯首领阿赫纳夫所征服的穆尔加布河上的“要塞”（希森 хисн），此后便得名阿赫纳夫城堡（卡斯尔 каср），其中的鲁斯塔克（整个村落）开始被称为“阿赫纳夫鲁斯塔克”。阿拉伯的卡斯尔 каср 在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的著作中被翻译成基奥什克 кешк。布哈拉商人的住宅也叫做基奥什克 кешк，他们不愿把自己在沙赫里斯坦的一半房产让给阿拉伯人，而是宁愿完全离开沙赫里斯坦到一个新地方，到现在城市的西北部安家。在这里出现了700多座城堡（基奥什克 кешк），并且在每一座城堡的四周都有仆人（恰基尔）以及从属领主的房屋。在每一座堡垒的大门旁都辟出一块地用以修建花园（布斯坦 бустан）和草坪（撒赫拉 сахра），每一位主人都在大门上雕刻着自己崇拜的“偶像”（布特 бут）。在8世纪中叶，“700座堡垒”按照人口数量来计算，超过了沙赫里斯坦。在描述国王和达官贵人的住宅时，花园（布斯坦 бустан）常常被当做萨莱或基奥什克的附属物，就像在阿拉伯文中被阿拉伯人所接受的布斯坦这一波斯词汇本身可以与卡斯尔相提并论一样。有时也使用巴戈 баг[1] 一词来表示花园，但往往是在强调花园中的鲜花及其香味儿时使用布斯坦一词，而在强调硕果累累的树木时则使用巴戈。巴戈也作为萨莱的附属物被提及，有时与布斯坦一起使用。例如，在描述萨曼王朝宫廷所在地——布哈拉的朱伊姆里扬时，就说这里有“萨莱，花园（巴戈 баг），小树林（切缅 чемен）和花圃（布斯坦 бустан）”。那时人们都希望在萨莱四周有巴戈环绕，这样的花园被称作恰尔巴戈 чарбаг（直译就是“四个花园”），如，在谈到伽色尼王朝苏丹马苏德（1030—1040年）的一位大臣布·纳斯尔时，说他在尼沙普尔有一座三面环绕花园的萨莱，他还想再添置一些地以便拥有一座“带有恰尔巴戈的萨莱”（后来恰尔巴戈 чарбаг 一词用于其他意义。如，在伊斯法罕人们把城中两边都栽满了杨树的主林荫

[1]在雅库特的地理辞典中，巴戈和布斯坦是同义词（《地理辞典》，Ⅰ，第677页）。

路叫做恰尔巴戈)。种植了树木的巴戈比布斯坦大,它相当于古代的帕尔捷斯пардес——私人住宅的树木围墙以及国王和达官显贵的公209 园(公园里豢养着野兽用于警卫)。从关于亚历山大·马其顿远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突厥斯坦曾经存在过这样的公园。相应的词汇从古波斯语转变为希腊语和某些闪族语,在希腊人和闪米特人那里,它用来表示乐园,这一含义直至今天依然保留在某些语言当中(法语paradis)。在穆斯林时期,这个词无论是在波斯还是在突厥斯坦的现实语言都不使用了。在文献中会遇到这个词的纯书面语的形式费尔达乌斯 фирдаус,只表示"天堂"的意思。

以上所援引的有关"阿赫纳夫城堡"的词汇表明,卡赫 Kax 或基奥什克 кешк 的所有者有时也拥有整个鲁斯塔克,也就是几个村落。在城堡中常住的地主贵族代表只占据一个村落,就像在波斯流传的关于似乎创立了德赫干制度的神奇国王梅努切赫尔的传说一样,根据这一传说,他"为每一个村庄任命了一位德赫干,使村中的居民成为他的仆人和奴隶,让他们身着屈辱的衣服,命令他们听从德赫干的吩咐"。我们看到,仆人恰基尔 чакир 的房屋位于领主城堡的四周。历史文献表明,应该把恰基尔 чакир 理解为邦君和达官显贵所拥有的军队。在前伊斯兰时代,一位最强有力的地方统治者——撒马尔罕伊赫希德的军队就是由恰基尔 чакир 构成的。某些阿拉伯总督也模仿突厥贵族,为自己建立了一支由恰基尔或按照阿拉伯发音叫沙基尔 шакир 组成的军队。在城堡四周也有其他"臣民"的房屋。在一份也是有关布哈拉的文献中,把德赫干的克迪维尔 кедиверы 与其"仆人"相提并论。克迪维尔这一术语由伊朗词汇克德 Кед(克特 кет)或克迪 кеде 构成,表示的是比哈涅 хане 更广义的"房屋"。哈涅,就像阿拉伯的拜特 бейт 一样,是一种狭义的独立住房;而克德 Кед 或克迪 кеде 被阿拉伯人转述为达尔,在这个概念中,除了一家之主的私人住宅之外,还包括他那些已经独立单过的儿子们及其他亲属们的住房、库房等等,并且所有这些建筑物都位于一个共同围墙之中。花剌子模词汇卡特 кат 也被列入

这份史料当中,在花剌子模[1]人们把草原上四周有围墙的(或者土堤)的地方叫做卡特 кат,虽然这里什么都没有(如今在突厥斯坦这样的老堡垒遗址被称为图尔特库尔 турткуль)。克迪维尔 Кедиверы 是克德 Кед 中的成员和住户,克德的首领称作克德胡达 кедхуда(克特胡达 кетхуда),字面含义为"克德的主人"之意。这一称号是由传奇国王——梅努切赫尔的祖父费里顿创立的。对家庭及子孙具有统治权的概念首次与克德胡达 кедхуда 的概念相联系。在伊斯兰时期,人们把一个完美的克德胡达кедхуда想象为殷勤的主人。就此而言,国王可以被称为是"世界的克德胡达 кедхуда"。但克德胡达这一概念不仅仅 210 与权力和财产的概念相联系:根据私有者所赋予的全权来履行主人义务的人,即管家(домоуправитель),也是克德胡达。在国务术语中,军督下辖的民政长官、统帅下辖的负责军队粮食和装备供应的军需官等等都可以被称作克德胡达。土库曼人至今还在使用克德胡达这一术语最接近原意的含义,把自己的族长称为克德胡达。[2]

10 世纪的地理学家们在描写突厥斯坦时,引用了大量由 Кед 和 кет 构成的名称,并且这些在穆尔加布地区还没有遇到过的名称经常出现在泽拉夫善河地区,在锡尔河流域特别是在安格连和奇尔奇克地区更是大量涌现。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在写到伊剌克地区即安格连谷地的文明地带时,提到了 14 个城市和村庄的名称,其中有 7 个名称是由克特一词 Кет 构成的;在写到恰奇地区即奇尔奇克河的文明地带时提到了 27 个名称,其中 14 个是由克特一词构成的。从这些名称中我们发现,城市和乡村往往使用同一个名称,就如同在《古兰经》里像麦加这样的大城市也被称为"乡村"(卡里阿)一样。由于波斯标准语的

---

[1]第一版本有错误:"在呼罗珊"。——Ю. 布列格利

[2]把克德胡达叫做族长的例子是:谢苗诺夫《1881—1885 年合并自由土库曼简史》,第 31 页。根据阿里汗诺夫的说法(《梅尔夫绿洲及通往绿洲的道路》,第 30 页),在梅尔夫负责管理某些河道(每一条河道都带有他所属的那个宗族支系的名称)的族长被称为克德胡达,但他们与百姓的其他事务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族长有 100 人。

关于 19 世纪土库曼人使用克德胡达这一术语的情况,参见布列格利《19 世纪花剌子模的土库曼人》第 123 – 125 页及该书的索引。——B. 罗莫金

广泛传播,肯特 кент 和克特 кет 这样的词汇已经被基赫 дих 所取代。费尔干纳的东部边区是在萨曼王朝时被合并到费尔干纳的,这里产生了7个村庄,由此而得名赫夫特基赫("7个村庄"之意)。基赫 Дих 一词已经不再用来表示城市了。例如,在谈及佩肯德的居民时,说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把佩肯德叫做"基赫 дих"(农村),因为他们认为承认佩肯德是与布哈拉一样的"城市"很有意义。看来,只有在城市里而不是在乡村里才能看出城市本身即沙赫里斯坦或沙里斯坦与库亨吉兹 кухен-диз(字面意思是"老要塞")城堡的不同,复合词昆杜兹 кундуз 就是由后者产生的。但是布哈拉历史学家在描写乡村时也会提到"沙赫里斯坦"和"昆杜兹"。已经被当地伊朗居民忘弃的肯特 Кент 一词转变为突厥方言。随着游牧的突厥人向定居的转变,在突厥斯坦甚至在山区塔吉克人那里都普遍使用的最初用来表示"过冬之地"的基什拉克 кышлак 一词,也开始转变为"村庄"的意思,虽然在16世纪末"乡村(基赫)的居民"与"过冬地(基什拉克 кышлак)的居民"是有区别的。花剌子模[1]和喀什噶尔[2]直至今天还在用肯特 кент 这个词来表示

211 "乡村"之意。

被称为"拜火祠"(阿捷什克迪[3] атешкеде 或阿捷什哈涅 атешхане)和"神庙"(布特克迪 буткеде 或布特哈涅 бутхане)的异教徒寺院,一般是用由克迪 кеде 和哈涅 хане 合成的术语来表示的。第一个术语当然是与拜火教有关的,很有可能在伊斯兰征服之前,拜火教是绝大多数居民信仰的宗教,虽然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也得到了传播。我们无法描述当地拜火教寺院的情况, 也没有发现任何这类建筑的遗

---

[1]库恩《从希瓦到昆格勒》,第203页。

[2]科尔尼洛夫《喀什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第277页。

对 B. B. 巴托尔德说法的纠正:"表示'乡村'的'肯特 кент'一词在布哈拉也使用,它被认为是一个乌兹别克词,而不是塔吉克词(《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的领土与居民》,第1册,第66页)。"——Б. 加富罗夫

[3]拜火教徒的祭祀场所。——译者

址。[1] 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在伊斯兰征服时期突厥斯坦拜火教寺院与古代的四角烽火塔楼有多大的区别，这种四角烽火塔楼是在帕萨尔加德和波斯波利斯遗址附近被发现的，并以“卡巴查拉阿斯特拉（卡巴伊捷尔杜什特）而著称，也不知道这种拜火教寺院与较后时期出现的八角圆顶建筑如伊斯法罕附近的“阿捷什克迪 атешкеде”有什么区别。突厥斯坦的拜火教团体在10和11世纪依然存在，并且它们在阿拉伯史料中被称为马竺斯（маджус，拜火教徒之意），在波斯史料中被称为穆格（муг）。谈到了布哈拉的穆格和撒马尔罕的穆格团体，不再向异教徒征收人头税，而是让他们承担义务维护并修理向沙赫里斯坦供水的铅制输水管道。根据比鲁尼的说法，在11世纪的花剌子模只剩下了“一些马竺斯的残余势力，他们已经不热衷于自己的信仰，而只满足于了解其外在的宗教仪式，不再探究它的本质和精神”。至于拜火教的残余何时消失，我们还没有资料。突厥斯坦人民迄今仍认为许多遗址是“穆格”的，而另一个流传于波斯的术语格布尔 гебр（异教徒恰乌尔 гяур[2] 一词是由格布尔 гебр 而不是由卡菲尔[3] кафир 构成的），在突厥斯坦可能只为土库曼人和希瓦人所知。前伊斯兰时期产生的堡垒，只有在土库曼[4]和花剌子模[5]才被称为“格布尔 гебр”或“恰乌尔 гяур”堡垒；在突厥斯坦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锡尔河流域，还有关于穆格的“要塞”和“房屋”的记载。奥什城中的“穆格克迪大门”这一名称 212

[1]最近十年间，在中亚发现了许多前伊斯兰时期用于祭祀的建筑，并对其进行了研究。可以非常准确地判断出其中的佛教和基督教建筑物，对其他建筑的界定，比如认为彭吉肯特的教堂是拜火祠的观点，还没有得到公认。最近研究这一问题的综合性著作是：沃罗宁娜《前伊斯兰时期中亚的祭祀建筑》（带有大量书目索引）。——Б. 斯塔维斯基

[2]突厥斯坦人对非穆斯林的蔑称。——译者

[3]意为无信仰的人。——译者

[4]比较著名的梅尔夫古城恰乌尔卡拉，在弗雷泽尔那里称 Gubr-Kila；比较茹科夫斯基《外里海边区的古迹 老梅尔夫遗址》，第95页。

[5]例如在霍哲利附近的恰乌尔卡拉；库恩《从希瓦到昆格勒》，第217页。在沙赫谢涅姆遗址以南10俄里的阿姆河的一条老河床上，还有一个恰乌尔卡拉。看来，在突厥斯坦其他地区的地名录中，格布尔一词 гебр 可能只是15世纪存在的卡塔库尔干县加布里斯坦村的名称，但现在该村已经不存在（维亚特金《撒马尔罕省历史地理学资料》，第49页，这里给出的译文是“格布尔即拜火教徒的宿营地”）。

表明,穆格这个术语在10世纪的突厥斯坦还在使用。而穆格克迪 мугкеде 作为普通名词在文献中已经看不到了,我们在最新的地名录中(15世纪)遇到这个词时,它指的是泽拉夫善河彭吉肯特附近的一个地名,并且研究撒马尔罕州历史地理的学者 B. Л. 维亚特金[1]把它翻译成"拜火祠",也就是把它理解为阿捷什克迪 атешкеде 或阿捷什哈涅 атешхане。15世纪在彭吉肯特和加布里斯坦是否还存在拜火教徒,或者这些名称仅仅是表明这些地方居民从前的宗教信仰,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在突厥斯坦被称作"穆格祠"的已经不再是拜火教寺院,而是所谓的"巨型"建筑物[2],即"石堤",一位研究突厥斯坦的著名考古学家称其为"陵墓"[3]。下葬这个词的本义即将尸体埋入地下是为拜火教所禁止的,死者整个尸体的处理都要通过某些仪式,为此修建了一些设施。一位俄罗斯研究者[4]证实说,卡塔 ката(在尸体运往寂寞塔前临时存放尸体之地),寂寞塔 дахма(摆放尸体以供禽犬啄食之处)和纳乌斯 наус("保存洁净尸骨之处"或称"存骨处")是有区别的。在寂寞塔中经过一年风吹雨淋和禽兽啄食而脱离尸肉之后的遗骸,被认为是清洁的,需要保存在一个"狗、狐、狼无法到达,而且密不透雨"的地方。纳乌斯就是希腊语中的 naos,即"神殿",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的意思是"至圣殿",在《古兰经》中被表述为米哈拉布,在阿拉伯基督徒那里米哈拉布有"圣坛"之意(在穆罕默德时代,清真寺里还没有米哈拉布)。在萨珊王朝时期和伊斯兰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拜火教徒的纳乌斯表示的是墓上建筑物,它是逝者尸骨最终的安息地。波斯拜火教徒在一年中固定的一天,"把吃的摆放在死者的纳乌斯里,把喝的摆放在房顶上,他们确信,死者的灵魂在这些日子里离开受到奖赏

---

〔1〕《撒马尔罕省历史地理学资料》,第25页。

〔2〕关于这些建筑物,参见鲁达诺夫斯基《费尔干纳的巨型建筑物》,第234页,这里提到"哈乃伊穆格";也参见 M. 安德烈耶夫《突厥斯坦重要的考古地区》,第21页以下;伊诺斯特兰采夫《论古代伊朗的殡葬习俗及其建筑》,第117页;韦谢洛夫斯基《突厥斯坦边区库尔干札记》,第221页,这里提到穆克霍乃;吉尔吉斯语穆格腾乌伊,参见杰特贝斯巴耶夫《"穆格"一词、库尔干和石俑》,第29页。

〔3〕韦谢洛夫斯基《突厥斯坦边区库尔干札记》,第221页。

〔4〕伊诺斯特兰采夫《论古代伊朗殡葬习俗对其建筑》。

或惩罚的地方，筋疲力尽、饥渴难忍地来到家里；他们用一些药用植物把自己的房子熏黄，使死者因这种气味而感到愉悦”。这位作者在谈到粟特人时说，他们在固定的日子里“哀悼自己死去的祖先，向他们哭诉，轻割自己的脸，并像波斯人那样用吃喝贡品来供奉亡灵”；至于花剌子模人，他们也“像波斯人一样，在纳乌斯里供奉吃食，以飨死者的灵魂”。因此在花剌子模人那里也有纳乌斯。从历史学家塔巴里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纳乌斯在粟特人那里也存在，根据他的记载，阿拉伯总督于722年或723年命令在列宾占城(位于现卡塔库尔干城西面一点)附近处死被俘的当地首领，将其尸体钉在纳乌斯上，并以课罚款来威胁居民，不允许他们将尸体放下来。在叙述希吉拉历112年或113年(730—732年)凯什(沙赫里夏勃兹)与撒马尔罕之间发生的战事时谈到，有4个阿拉伯士兵曾在纳乌斯中藏身。由此可以断定：纳乌斯是一种规模很大的建筑物。可能人们把“纳骨器”，即装有死者尸骨的方形或者椭圆形的陶土骨灰盒放入其中，这些陶土骨灰盒是在突厥斯坦被发现的，但在专家们对出土地点进行检查之前，这些文物没有一件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纳骨器用各种图案、人体形状和雕塑画来装饰，这种纳骨器迄今为止在突厥斯坦以外的任何地区都没有发现，这表明突厥斯坦的拜火教徒比其他任何地区的拜火教徒都更加重视对死者尸骨的保存。现在，无论是在突厥斯坦还是在伊朗，纳乌斯这个词都没有流传下来，但奇怪的是，只有在闪米特人的阿拉维亚用这个词表示一种外形很像突厥斯坦“穆格祠”的建筑。我们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能够说明，“穆格祠”实际上就是纳乌斯，就是用来存放纳骨器的地方。

人们尽可能地根据某些记载，把“拜火祠”和“神庙”区别开来，认为后一个名词很可能指的是佛寺。纳尔沙西对随同中国公主从中国运到布哈拉拉米坦村的“神龛”的描述很有特点。这位纳尔沙西在描述马哈清真寺附近的神像交易情形时，认为这种在伊斯兰布哈拉保留下来的残余习俗产生于“布哈拉居民还是偶像崇拜者”的时代；当时王宫就位于以后建起清真寺的地方，国王亲自出面鼓励神像交易。后来，“这个地方成了拜火祠，在有集市的这一天，人们便聚集于此，进入拜

火祠，举行拜火仪式。这座拜火祠一直保留到伊斯兰时代，当穆斯林势力壮大之后，便在这里建立了那座清真寺"[1]。看来，从这一叙述中也可以看出偶像崇拜与火焰崇拜之间的不同。塔巴里在谈到布哈拉的塔瓦维斯村时说，在这个村子里有"拜火祠和神庙"，他所说的神也就是偶像；在这种情况下，拜火祠与"偶像崇拜者"的寺庙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纳尔沙西在谈到"穆格城堡"时说，在每一座城堡的大门上都雕刻着主人所崇拜的"偶像"，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拜火教徒"也有"偶像"。所以突厥斯坦的"神庙"，比如说后来转变为清真寺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寺庙，是否的确属于佛教徒和非拜火教徒，这一点还有争议。除此之外，一种宗教也能够对另一种宗教产生影响。13 世纪的史学家朱维尼的话就表明了这一点，他说布哈尔（бухар）这个词"在拜火教徒语言中"的意思是"科学集会"，而"在维吾尔和中国偶像崇拜者的语言中"则被用来表示安放其"偶像"的寺庙。梵文中的维哈拉指的是印度的佛教僧院，这种僧院起初并不是由专门的建筑构成，而是由许多在悬崖中凿成的山洞构成。[2] 在新印度语和波斯语中，这个词被写成

214

[1]从帕米尔和帕米尔附近地区到印度，"拜火祠"的残余与清真寺长期并存，在某些部落和民族那里拜火祠依然保留着自己原有的名称。根据 19—20 世纪初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断定，到了近代它们是作为具有公社性质的建筑保留下来的，如男人聚会的场所、公共就餐的地方等等。关于布哈拉东部的"阿洛乌霍纳"（字面意义是"拜火祠"），参见阿兰达连科《达尔瓦兹和卡拉特》，第 310 页；M. 安德烈耶夫《论塔吉克人的民族特点》，第 163 – 165 页；孔道罗夫《雅格诺布人的父系家族公社及公社房屋》；基斯利亚科夫《山区塔吉克人的原始共产主义遗迹》，第 115 – 119 页；基斯利亚科夫《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布哈拉汗国定居农村居民中的父权制封建关系》，第 160 页。关于阿富汗吉尔扎伊部落的"阿捷什哈涅"，参见穆罕默德・哈亚特汗《阿富汗及其居民》，普利斯特利译本，第 68 页、175 页。关于杜拉尼人的"米赫曼哈涅"，也参见上书，第 175 页；关于尤素福扎伊人的"胡吉拉"，参见贝娄《总报告》，第 201 页以下；詹姆斯《报告》，第 41 页；考诺里《批注》，第 928 页。比较关于塔吉克人的"米赫曼哈涅"和雅格诺勃人"希吉拉"的资料：孔道罗夫《雅格诺布人民族学的某些资料》，第 106 – 107 页。——B. 罗莫金

[2]奥尔维持《印度文学简史》，第 72 页是这样说的。根据 Д. Н. 阿努钦对 P. 皮舍利《佛的生平与学说》一书译本（第 219 页）所做的附注，维哈拉起初是由树枝或篱笆搭成的简陋小窝棚，这些小窝棚用黏土涂抹，用来作为供僧人使用的修道小屋。但后来开始用石头建造并带有拱门，并把它们连成许多排。比较皮舍利教授在上书（第 51 页）谈到维哈拉时所阐述的观点，他说维哈拉就是"茅舍或隐蔽的棚子"，佛和自己的弟子们在这里"度过雨季"；后期印度的维哈拉从一开始也是为了应对雨季而建的，它们"往往被收拾整齐，配备了一切设施，例如有洗热水澡的浴盆和用来散步的带篷长廊"（第 165 页）。

贝哈尔 бехар。迄今为止人们仍然这样称呼印度贝纳勒斯以东的恒河沿岸地区,贝纳勒斯是佛教的发源地,僧院尤其多。纳缚贝哈尔,即“新贝哈尔”在伊朗非常有名,它位于巴尔赫南部郊区,被某些阿拉伯作者描写成是“偶像崇拜者”的建筑,他们的信仰与喀布尔统治者以及印度和中国皇帝的信仰相同,但另外一些作者却认为巴尔赫的纳缚贝哈尔是“拜火祠”。7 世纪,到过巴尔赫的中国朝圣者玄奘的话证明这座建筑物的确是佛教僧院,大约在 630 年,玄奘称纳缚贝哈尔为“新僧伽蓝”。僧院位于城东南,僧院的北面是一座高高的窣堵波,这里存放着舍利,南面是维哈拉,维哈拉是“远方幅凑,高才类聚”之处,这里有许多具有极高神性的人。这样看来,维哈拉与僧伽蓝或狭义的僧房是有区别的,人们一般把学者探讨信仰问题、创建修行功勋的地方理解为维哈拉。僧加尔 Санджар(僧伽蓝)和僧加尔斯坦 санджаристан 这些词与贝哈尔 бехар(维哈拉)一起转变为波斯语。在词典中僧加尔 санджар 被解释为“陷入痴迷状态的人”,僧加尔斯坦 санджаристан 被解释为“哈纳卡(寺院,对该词的解释见后面)和人达到痴迷状态并伴随音乐起舞的地方”。可能僧加尔费干村及其周边地方的名称与 санджар 一词有关,僧加尔费干就是后来的津吉尔巴格,它位于撒马尔罕东南。这一名称的最后一部分可能是法格 фаг 或巴格 баг——“上帝”一词,它在伊朗世界中表示的是神,主要是低级的神,但有时也表示高级的神。伊斯兰教拒绝接受这个名称,认为这个名称属于偶像崇拜的范畴,虽然在基督教文献用它来表示基督教唯一的神——“上帝”。在异教徒时代,巴格 баг 或法格 фаг(方言也写做缚格 фуг)与胡达 худа(或当地胡达特)一词相似,在伊朗和伊朗的中亚地区也表示“皇帝”之意,这是由于自亚历山大·马其顿时代开始皇权被神化的结果。譬如在花剌子模,由法格 фаг 合成的术语表示的是皇帝从夏季居留地迁到冬季居留地。中国天神的名字也被翻译成这个词,中国皇帝作为“天子”被称为巴格普尔 багпур 或法格缚尔 фагфур(普尔即“儿子”),并且后者有时在词典中被当成是“费尔干纳词”(据推测它可能还可以发帕格普尔 пагпур 的音;波斯字母 п 经常被转写成

215

阿拉伯字母 ф)。

迄今为止只有在中亚的突厥佛经中才把维哈拉和僧伽蓝这两个术语并列使用。僧伽蓝 Сангарама 一词被突厥人改写为僧加拉姆 сангарам,维哈拉 вихара 则被改写成瓦哈尔 вахар 或更常见的是瓦尔哈尔 вархар,伊斯兰、阿拉伯和波斯作者写的是法尔哈尔 фархар。比鲁尼把贝哈尔 бехар 或法尔哈尔 фархар 的概念与萨满的概念联系起来,在呼罗珊人们把"布达斯缚",即佛教徒(从梵文 cramana"隐士"而来)的追随者称为萨满。比鲁尼说,在靠近印度的呼罗珊边缘地区可以看到"他们的足迹,他们偶像的贝哈尔 бехар 或他们的法尔哈尔 фархар"。10 世纪末,一位不知名的波斯地理学家在谈到西藏库尔桑格城时说,"那里有规模庞大的神庙,人们把这种神庙叫做大法尔哈尔"[1]。欧洲伊朗学家认为,粟特的法尔哈尔相当于伊朗南部的贝哈尔 бехар,但是,贝哈尔 бехар 这个词至少在伊斯兰时代已经传到了突厥斯坦,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纳缚贝哈尔"门这个名称就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拉的"纳缚贝哈尔"门就其地理位置而言,相当于现在的"麻札尔斯基",麻札尔斯基得名于 14 世纪布哈拉主要圣徒巴哈·阿德金·纳合西班底的"麻札"或陵墓。门的名称来源于"贝哈尔","贝哈尔"可能是印度的僧院,因为巴哈·阿德金出生的那个村庄从前被称为"印度人城堡"(卡斯里辛杜万)。据伊斯兰作者所知,"萨满教"在突厥斯坦的传播要早于摩尼教,但 10 世纪在撒马尔罕也有了摩尼教团体,而中国朝圣者玄奘在阿拉伯征服前不久经过突厥斯坦时只在"铁门"(现在的布兹加尔山口)以南的地方发现了佛教僧院,铁门被视为是附属于撒马尔罕的地区与托哈利斯坦或附属于巴尔赫的地区之间的分界线。可能 12 世纪作者萨曼尼对瓦什吉尔德城(现在的法伊扎巴德,位于卡菲尔尼甘河和瓦赫什河之间)周边地区的记载都与佛教和佛教经典有关,在瓦什吉尔德城里保存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古

---

[1]《世界境域志》,第 16 页 6;米诺尔斯基译本,第 94 页。根据米诺尔斯基的说法,"库尔桑格(乌桑格)在西藏。这里有规模庞大的神庙。人们把这(地方?)叫做大法尔哈尔"。——B. 罗莫金

迹和已被解读的写进书中的伊斯兰统治时代初期的字母”。

在起源于前亚地区的宗教中,公元3世纪产生的摩尼教与突厥斯坦的关系特别密切。具有典型性的是,摩尼教徒把星期几的粟特名称传入中国,而基督徒则把其波斯名称传入中国。据传说,出生于巴比伦的摩尼还亲自来到呼罗珊、印度和中国旅行。在他被判处死刑后,他的信徒们被迫离开波斯王的领地,迁往外阿姆河地区。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以后,他们得以重返波斯和巴比伦,但是在8世纪从哈里发马赫迪(775—785年)统治时代开始,他们又遭到了伊斯兰政府的血腥迫害,再一次背井离乡远走东方,他们最后的和最终的迁徙是在哈里发穆克塔迪尔(908—932年)统治时期。根据比鲁尼的说法,在他生活的时代(11世纪)在撒马尔罕的伊斯兰领地上只剩下一个摩尼教团体,这里的摩尼教徒被称为“萨比”,这是一个在《古兰经》中遇到的术语,后来被穆斯林运用于除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和拜火教徒之外的所有宗教,人们便用这个术语来称呼他们。根据10世纪末文献目录学著作《书目》的作者——安涅迪姆记载,撒马尔罕当时总共有500名摩尼教徒。10世纪末波斯一位佚名地理学家认为,在撒马尔罕有一个摩尼教徒的哈纳卡,这里的摩尼教徒被称为尼戈沙克нигошак。哈纳卡就是波斯语哈涅即“房屋”一词的粟特形式,可能后来人们用这个被穆斯林德尔维希僧人借用来的词汇称呼前伊斯兰时期粟特佛教和摩尼教隐士的僧房。尼戈沙克本义为“听众”,这个术语的拉丁译文是auditor,在摩尼教徒那里尼戈沙克表示的是与僧徒不同的信徒,以至于在提到与“哈纳卡”有关的“尼戈沙克”时会引起某种误会。与佛教一样,摩尼教的僧徒和信徒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僧徒全身心地投入救赎,因此他们都不能从事任何体力劳动,而宗教对信徒则没有提出苛刻的要求,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来供养僧徒。但是后来在摩尼教徒当中兴起了一场

否定私有财产和家庭生活，并对所有人都实行同样要求的运动。[1] 这一运动的倡导者是伊朗的马兹达克，他生活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与摩尼一样，他禁止吃荤，但他并不主张建立由放弃私有财产和性生活的人建立个别的团体，而是要求所有的人放弃他们在某一领域的一切特殊权利。他认为恢复所有人在占有财物和女人方面的平等权利是必须的，认为破坏这种平等权利便会产生嫉妒、仇恨和贪婪这些恶魔。马兹达克的学说在伊朗赢得了众多的信徒，特别是深受社会下层的欢迎。国王卡瓦德(488—531年)自己就成了马兹达克的拥护者，正因为如此，这些共产主义的思想才得以实践[2]；但在528年，王储即未来的国王库思老·阿努希尔万掀起了一场对马兹达克教徒的血腥迫害运动。同摩尼教徒一样，马兹达克教徒也逃往中亚地区，他们在撒马尔罕、伊剌克和恰奇成功地传播了自己的学说。摩尼教和马兹达克教的思想对伊斯兰教什叶派和伊斯玛仪派的教义产生了影响。在这些运动的领袖当中，突厥斯坦的木坎纳取得了特殊的成就，他生活在8世纪下半叶，自称是上帝的化身，是旧约全书中的先知——耶稣、穆罕默德和阿布·穆斯里姆的继承人。在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该运动被哈里发马赫迪的军队镇压下去，但木坎纳的信徒作为一个秘密教派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布哈拉的农村和安格连地区存在了很长时间，这一教派被称为“白衣派”。[3] 穆斯林作者认为“白衣派”与津吉克即摩尼教徒比较接近。纳尔沙西在谈到“白衣派”时说，在他们那里妇女是共有的，一个人可以去找别人的妻子，当他在这个女人那里逗留的时候便在屋门上留一个记号，就像马兹达克教徒在这种时候要在门上挂顶帽子一样。

218

[1]巴托尔德关于马兹达克教徒“完全否定家庭生活”的论点是有争议的。即使马兹达克教徒就有关“共妻”问题所倡导的一切都是事实，也应该把他们的“共妻”理解为是对伊朗上层居民一夫多妻制的抗议，它反映了马兹达克教徒要求重返古老的、氏族婚姻和财产占有关系的愿望。关于历史学家对马兹达克教徒“共妻”制的各种观点，参见M.季亚科诺夫《古代伊朗历史概论》，第410–411页，注释153。——B.罗莫金

[2]“共产主义思想”这一术语适用于马兹达克教和中世纪其他民族的平均主义运动，现在已经不为苏联学者所使用。——B.罗莫金

[3]关于这一运动，参见艾尼《伊谢尼·木坎纳》；雅库鲍夫斯基《木坎纳起义》；Moscati, *Studi storici*；萨迪奇《运动》，第163–186页。——B.罗莫金

每一个村子都有一位来自居民群众的首领,за которым признавалось jus primae noctis。"白衣派"不做乃玛孜,没有洗礼,也不遵守斋戒,但他们自称是穆斯林。

摩尼教徒无论在基督教世界还是在伊斯兰世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公开信奉自己的宗教,这一点足以说明为什么对摩尼教外在宗教仪式的记载非常匮乏。根据安修者奥古兹丁的说法,摩尼教徒既不尊重教堂,也不尊重神坛,教团中的每一个独立的成员都是神堂。因此法国的摩尼教徒(11 和 12 世纪的卡特里派或阿尔比教派)不在教堂中集会,而是在地窖和其他地下室里召集会议,有时也在私人住宅和技工学校里集会。另一方面,伊斯兰作者在谈到东方(呼罗珊)摩尼教徒用于祈祷的建筑时,也使用了表示基督教堂的术语比阿一词。从新发现的摩尼教古文献中能够得到某些关于东方摩尼教徒宗教仪式的资料。例如,一份来自中国的文献表明,摩尼教的寺院中有 5 个厅,它们分别用于:(1)存放圣书和图画;(2)斋戒和讲法;(3)祭祀和忏悔;(4)授课;(5)安置生病的教徒。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摩尼教寺院与佛教僧院以及基督教修道院不同,它不是宿舍,没有供摩尼教徒长期居住的僧房。僧徒聚在寺院中只是为了做祈祷和切磋自己的信仰,也为了能够共同进餐,但除了病人之外,都在其他地方过夜,最常见的就是在信徒那里过夜。吐鲁番地区的考古发掘证实摩尼教有自己的小教堂,在文献中提到了一些用于举行斋戒的特殊的建筑物,叫做恰伊丹。这一术语,像许多其他术语一样,是摩尼教徒从佛教徒那里借用来的,它相当于印度的洞庙(聚会厅),这样的集会在印度最初是在"山洞里举行,这些山洞的墙壁都用削出来的神像来装饰",后来建立了特殊的寺院。[1] 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佛教徒借用了摩尼教的术语。例如,突厥和后来蒙古的佛教在摩尼教的影响下,用伊朗奥尔穆兹德神(蒙古人的胡尔穆斯塔腾格里神)的名字代替了印度因陀罗神的名字。经书的名称——诺姆也由摩尼教徒传给了佛教徒。与印度窣堵波相对应的蒙

[1]皮舍利《佛的生平与传说》,第 220 页。

古苏布尔干,就是伊朗的苏普尔干(супурган 本义是"完美之屋"),苏普尔干是摩尼教徒用来存放尸体的地方。从文献中可以看出,摩尼教徒的尸体停放在这里的时候穿着衣服,但不放入棺木中,也不入土。粟特的摩尼教文献属于7世纪以后,7世纪末摩尼教传入中国,8世纪便出现了中文的摩尼教文献,并且中国摩尼教徒所使用的术语(如星期几的名称)明显地受了粟特语的影响。中国境内的突厥人是在8世纪下半叶开始熟悉摩尼教的。摩尼教在某些突厥国家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还在10世纪的时候,一位信奉摩尼教的突厥汗曾在萨曼王朝面前袒护自己的撒马尔罕教友。至于3到7世纪和10世纪以后中亚摩尼教的命运如何,我们没有任何资料。

关于基督徒的命运我们知道的几乎也很少。与摩尼教一样,基督教首先传给了突厥斯坦的伊朗人,而后又由闪米特人的前亚经波斯传给突厥人。摩尼教徒把自己起源于阿拉米语的文字运用于伊朗和突厥语音标中去。根据一位穆斯林作者的说法,"马维兰纳尔和撒马尔罕人"用这种文字书写"经书",并把这种文字称作"教文"。这样运用的结果是产生了叙利亚基督徒的文字,这种文字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德萨,这里是叙利亚基督教文学的故乡。后来,叙利亚教会分裂成3种宗教——默基特派(东正教)、聂斯托利派和雅各派,这3种宗教中的每一种都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其中的聂斯托利派在5世纪末为波斯教会所接受,自然在中亚地区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但聂斯托利派并不是突厥斯坦唯一的基督教派。根据比鲁尼的说法,在梅尔夫有默基特派的"米特兰"(都主教),这位作者还谈到了花剌子模的默基特派。有趣的是,在一则叙述关于712年穆斯林征服花剌子模的史料中谈到,花剌子模统治者(花剌子模沙赫)召来了"自己的国王(附属的邦君)、书籍专家和德赫干",文献中使用了哈布尔 хабр 一词,其复数形式为阿赫巴尔 ахбар。哈布尔 хабр 就是犹太人的哈伯尔 хабер 和叙利亚人的哈布罗 хабро——"别人,同阶层的人,同志"。犹太和基督教学者可能这样称呼自己的同事。学术界经常使用这一词汇,受此影响它开始被"学者圈子,学术团体成员"之外的人所使用,就类似现在的一些非社

会主义政党的人使用(带着嘲笑的口吻,在阿拉伯人那里没有这种口吻,因为他们不了解被其借用来的词汇的准确意义)德文的"同志"和俄文的"同志"来称呼"社会主义者"一样。在阿拉伯文献中,最常见的是用阿赫巴尔 ax6ap 一词来表示犹太学者,在犹太米什纳书严格遵守纯正宗教礼仪规则的哈伯尔 xa6ep,是与普通人不同的。在《古兰经》第 5 章中,把哈伯尔和拉比相提并论,可能,这两个词合起来,泛指一切犹太学者(萨布卢科夫的译文是"拉比和书籍专家")。在第 9 章中,犹太人和基督徒受到了指责,因为他们选择了哈伯尔和修道士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选择上帝做自己的主人。看来,犹太人尊重哈伯尔受到了责难,基督徒(萨布卢科夫的译文是"书籍专家和苦行者")尊重修道士遭到了责难。有一种观点认为[1],在关于征服花剌子模的叙述中所说的是犹太教的拉比,虽然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在中世纪或现代的花剌子模城市中存在犹太教团体的资料。我们也不应该把一份讲述"犹太女人之子纳尔塞"创立花剌子模城的史料,看做是花剌子模存在犹太教团体的"间接证明",尽管这种观点已经在报刊上发表。因为这里所谈的是有关波斯王子——萨珊国王伊嗣埃一世(399—420 年)之子的事情,伊嗣埃一世确实是娶了一位犹太女人为妻。纳尔塞在自己的兄长巴赫拉姆·古尔(420—438 年)在位期间,担任呼罗珊总督,不能说他在花剌子模找到了与自己母亲持同一信仰的人,也不能说他把犹太教徒带到了那里。现在"布哈拉的犹太人",除了分布在布哈拉之外,也居住在撒马尔罕以及突厥斯坦的其他一些城市中,但在"希瓦可能根本没有犹太人"[2]。10 世纪伊朗东部地区(呼罗珊和马维兰纳尔)的犹太人多于基督徒。地理学上的名称表明在阿富汗的北部地区存在着人数众多的犹太教团体,只要列举迈马涅的耶胡城和巴尔赫的"犹太门"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地理学术语没有表明在花剌子模存在

[1]伊诺斯特兰采夫《希瓦绿洲前穆斯林时期的祭祀》,第 294 页。

[2]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 412 页。比较穆拉维约夫《1819 和 1820 年近卫军总参谋部大尉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土库曼和希瓦之行》,第 2 册,第 30 页。那里写道:"在希瓦自古以来就有接受了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定居。"

犹太人。花剌子模作者比鲁尼引用了关于犹太人及其纪年等方面的资料，特别是文字史料，但他在谈到基督教历法的时候提到了“花剌子模的基督徒”。所以更有可能的是，在叙述征服花剌子模的事件时，说的是基督教学者，哈布尔和阿赫巴尔这些术语也被运用于他们。例如，塔巴里说，背教者朱利安下令“摧毁教堂、杀死主教和基督教哈布尔”[1]。12世纪末，著名的穆斯林学者法赫尔·阿德金·拉济在花剌子模见过一个基督徒，但是根据这一叙述不能断定，这个基督徒是否是当地的常住居民。

221

10世纪时，在饥饿草原以北和锡尔河以南有一个基督教村落（这个村子可能就位于现在的乌鲁贝地区），在撒马尔罕以南和现在的乌尔古特西北有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并且在提到这座修道院时使用了乌木尔 умр（叙利亚词汇）这一术语，乌木尔即坐落于人烟稠密之地的修道院，它与建在远离居民区的修道院捷尔 дейр（比较俄罗斯的“小修道院”）是不同的，虽然“捷尔 дейр”和“乌木尔 умр”之间的这种差别并不总是被遵循。在10世纪60年代到过这里的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曾经描述过撒马尔罕的修道院。他在这座修道院的修士房中见到了一些伊拉克（巴比伦）基督徒，这里气候宜人、景色优美，堪称世外桃源，正是这些吸引他们来到了此地。在修道院里便可以将粟特大部分地区的风光尽收眼底。修道院拥有自己的不动产。

《新约圣经》的粟特译本流传至今，并且这些经文是使用另外一种文字（基督徒所使用的叙利亚文）和另一种与摩尼教方言不同的粟特方言书写的。据证实，摩尼文的典型特征是用流音辅音代替了齿音（例如，以 сулик 代替 согд），这种特征是与南部和东部方言相一致的，基督教经文的语言学特征则与北部和西部方言相一致。至于能够用来证明这一语言学结论的粟特摩尼教徒和基督徒地理分布的资料，暂时还没有获得。[2] 在叙利亚教会所辖各教区的名册中提到了中亚城市

---

[1]塔巴里《诸先知与诸王的历史》，内耳德克译本，第6页：“主教和基督教牧师”。

[2]比较前面第115页，注释13。——Б. 加富罗夫

的一些主教，但在叙利亚文献所记载的活动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位突厥斯坦人，除了一些梅尔夫的聂斯托利派主教以外，如：6 世纪的主教费奥多尔，7 世纪的主教伊利亚，以及 8 世纪末的都主教约瑟夫。9 世纪，梅尔夫也产生了一些作家，如伊萨——叙利亚词典的作者，伊绍达德——新约圣经详解的作者。可以断定，梅尔夫聂斯托利派主教的住地位于流经现在苏丹卡拉城的马詹运河下游。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在突厥斯坦（除了梅尔夫以外）存在过教会学校或其他基督教学校。

随着伊斯兰时代最初几个世纪突厥斯坦和其他伊朗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突厥斯坦人及其近邻积极参与了文化工作。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极东地区，不仅深受前亚文明区域的影响，而且它自己也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文明特点产生了影响。从西到东，除了伊斯兰教的传播之外，222 波斯标准语以及萨珊波斯的传统也得到了传播。有关萨珊王朝的传说现在已经与前萨珊国家境外的地区密切相关，甚至巴尔赫的纳缚贝哈尔有时也被称作是“库思老（萨珊国王）的建筑”。在教育领域，长期以来我们还看到在波斯和突厥斯坦用同一个波斯术语——达比里斯坦 дабиристан 来表示初级学校、识字学校。很有可能，这一被皈依了穆斯林的伊朗人从拜火教那里借用来的术语，从波斯传到了突厥斯坦，当时波斯的文字发展水平和人民的识字程度极有可能高于突厥斯坦。在高等教育、科学和艺术领域，由于希腊－巴克特里亚国家、佛教和摩尼教的传统，起初伊朗世界的东部对西部的影响更大，而不是相反。在伊斯兰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像巴尔赫（古巴克特拉）这样的文化中心的影响特别明显，而后来巴尔赫则几乎失去了任何意义。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的大臣们所建立的巴尔马克王朝和中亚统治者建立的萨曼王朝不是从萨珊波斯的城市中产生的，而是从巴尔赫的城市中产生的，伊朗文明在穆斯林世界的复兴与这两个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印度的佛寺中不仅研究信仰问题，而且研究哲学问题和精密科学问题，正因为如此，巴尔赫人、梅尔夫人、花剌子模人和其他伊朗东部地区出生的人，才能对哈里发曼苏尔（754—775 年）及其包括马蒙在内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阿拉伯人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所取得的最初成就产生影响，尤其

是他们使阿拉伯人了解了印度的数学。有一本古老的阿拉伯数学著作一直流传到今天，其作者是与哈里发马蒙同时代的穆罕默德·伊本·穆萨，他是花剌子模人，他的绰号阿尔霍列兹米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从这个绰号中又形成了“对数”一词[1]。欧洲人不仅根据这位学者的著作首次了解了对数[2]的概念，而且了解了代数学，穆罕默德·伊本·穆萨在欧洲被认为是文艺复兴以前代数学领域的最高权威，并且代数学在欧洲有一个阿拉伯的名称，虽然它的基本原理是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借鉴来的。伊朗东部的学者被吸引到哈里发的宫廷中来，是因为“呼罗珊人”参加了推翻倭马亚王朝并将政权交给阿拔斯王朝的斗争。“呼罗珊人”长期成为哈里发在军事方面和国家管理机构中的主要依靠力量。伊朗东部地区出生的人甚至在哈里发国家的那些没有波斯居民的地域也被委以最重要的职务。例如，一位来自萨曼王朝的人在827年被任命为埃及亚历山大的统治者。在精密科学领域，伊朗世界的东部也给了当时的西部一切可能给予的影响。来到巴格达的学者们不再返回自己的故乡，也没有把学生留在那里。

223

后来的情况是，一些有知识的中亚统治者将一些学者吸引到自己的宫廷中来，其中包括精密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这些学者中的大部分人是来自巴格达和伊朗西部的侨民。当时出现了一些出生于中亚的学者，他们将自己的知识归功于来自西部的学者，或者他们亲自到西部学习。在这些人当中就包括最伟大的伊斯兰学者比鲁尼，他生活在11世纪，是花剌子模人，像许多其他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一样，比鲁尼受到有知识的花剌子模沙赫马蒙(死于1017年)的庇护。然而这些人的活动也并没有使当地建立起科学的传统。在突厥斯坦建立起来的仅仅是神学校。有时在巴格达和西部波斯地区，我们可以看到研究文学和世俗教育的对象是与“记录哈提斯”(与宗教有关的传说)相对立的，教授世俗科学的学校也是与高级神学校相对立的，而我们在突厥斯坦没有

[1]算法。——Б.加富罗夫

[2]印度人的数字计数法和代数学。对数的概念是中世纪晚期欧洲数学家研究出来的。——В.罗莫金

看到过这样的事例。也有人指出，在艺术领域东部伊朗地区对前亚的影响更深远、更长久。中国绘画艺术对伊斯兰世界的极东地区产生的影响最大，中国写生画家的艺术成为波斯人的俗语，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这种影响。就连摩尼也享有著名画家的美誉，他好像在中国学会了绘画。基督教作家和伊斯兰教作家都谈到摩尼教手抄本关注于用细密画[1]来做装饰。最近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带有插图的摩尼教手稿，可以使我们得出更明确的关于摩尼教绘画艺术起源的结论（人们认为摩尼教的绘画艺术是伊朗、印度和“蒙古”成分[2]即大概中国成分的融合），也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摩尼教绘画艺术对伊斯兰艺术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晚些时候被蒙古征服者带到突厥斯坦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东亚因素影响的差别。突厥斯坦在这方面对前亚的影响持续了多久，我们从苏丹巴耶塞特二世（1481—1512 年）统治时期乌兹别克出生的巨匠巴巴·纳卡什首次把写生绘画艺术带到土耳其这一事实当中看出来。[3]

突厥斯坦的神学代表人物也到过巴格达和其他城市求学，但他们通常会返回故乡，在那里以口头授课和书面著作的形式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当地的传统建立起来了，其中除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共有的特征之外，还表现出地方性的特点。总起来讲，伊斯兰的神学教育，虽然几乎全部使用阿拉伯语来进行，但如同伊斯兰教育的其他领域一样，也深受更文明的异教徒和异族人的影响，特别是叙利亚人和伊朗人的影响。波斯词汇乌斯塔德 устад（教师）转变成了阿拉伯语，并且无论是在科学文献还是神学文献中都经常可以遇到这个词。此外，除了教师和导师之外，人们还用这个词来称呼教授学生艺术或者技艺的“行家”以及统治者有权威的顾问。在后一种情况下，该波斯词汇甚至成为像埃及这样的阿拉伯区域的国务活动术语。在艺术和技艺领域，与乌斯塔德相对应的词汇是沙吉尔德（学生），该词很少被运用到科学 224

〔1〕手抄本中用水粉、水彩等颜料绘的插图、字头装饰及横眉装饰。——译者

〔2〕库奈如是说，《慕尼黑伊斯兰艺术成就展》，第 188 页。

〔3〕雅克布《东方要素》，第 65 页。

知识教育领域中来，通常用叙利亚词蒂尔米兹来表示这一含义。

我们非常了解叙利亚高级神学院的情况。[1] 这所学校在伊斯兰时代还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也有一些在穆斯林建立的城市里开办新的基督教学校的事例，比如：在832年，巴格达就开办了一所学校。但是，基督教学校对伊斯兰学校的影响很小；希腊语词汇"学校"()σχολή)，既转变成叙利亚语，也转变为西欧的语言，并为阿拉伯基督徒所接受(其词形是伊斯库尔)，但这一词汇并没有为阿拉伯穆斯林所接受。在伊斯兰学校的教学职位中，只有阅读教师这一职位是穆斯林学校从叙利亚基督教学校那里借用来的，叙利亚语称作马克列扬 макреян，阿拉伯语称作穆克里 мукри。在穆斯林的学校中穆克里 мукри，即现在突厥斯坦的卡雷 кары[2] 是真正教师穆达里斯(мударрисе)的助教，助教没有专门的薪金。在必须要有助教(一般来说这是一个无用的职位)的地方，这一职位被委托给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在现在突厥斯坦的学校中，助教坐在教师的对面，他成绩最优异，书读得比其他人好。做过简短的祈祷，用指尖划过脸部之后，教师便建议朗读正在学习的书。助教读一个句子然后停顿下来，老师便开始对

225 已经读过句子的含义和语法关系进行讲解。[3] 高级学校中教学的概念是用闪米特语的词根 дрш(犹太人和叙利亚人)或 дрс(阿拉伯人)来表示的，阿拉伯术语达尔斯 дарс(讲座，授课)，达尔斯哈涅 дарсхане(教室)，迈德赖塞 медресе(授课的地方，高级学校)，达里斯 дарис 或穆达里斯 мударрис(教师，教授)都是由此而来的。现在流行的迈德赖塞 медресе 这个术语在10世纪之前的文献中还没有出现，10世纪时它可能仅在东部地区被使用，只有到了11世纪下半叶，这个词才流传到西部。同一词根的米德拉斯 мидрас 一词产生得要早一些，在词典中对它的解释是"诵读《古兰经》的地方"。在犹太语中，和这个词相对应的

[1] A. 季亚科诺夫《3—6世纪古代教会高级神学院的种类》。

[2] 卡雷 Кары 和穆克里 мукри 都是词根相同的阿拉伯词汇；卡雷 кары(кари。——Б. 加富罗夫)的字面含义是"读书人"，穆克里 мукри 的字面意思是"强迫读书"。

[3] 引自论文，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马德拉塞》，第16页。

词是米德拉什 мидраш(教学,解释教法),由此产生了贝哈姆米德拉什一词 бет-хам-мидраш(教学用的房屋),学校;在叙利亚语中与米德拉斯相对应的词是马德拉舍 мадраше,意思是“学唱诗歌,颂歌”。有理由认为,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就已经知道米德拉斯 мидрас 一词了。9 世纪的作者伊本·萨德引用了一条史料说,“阿布尔·哈里斯,他们的主教、书籍专家(哈布尔 хабр)、伊玛目和他们的萨希布－米德拉斯”从位于也门的基督教城市内基兰来到了麦地那先知那里;德国学者译作主教、犹太教经师(但谈的是基督徒),伊玛目和校长。[1]

塔巴里将关于穆罕默德时代的传说写进了自己对《古兰经》进行注释的著作中,在这些传说中也谈到了犹太人在麦地那的贝特米德拉斯。我没有见到过将米德拉斯 мидрас 视为是伊斯兰教机构的资料,经常被论及的是举办讲座(塔德里斯 тадрис)和为此而举行的集会(迈吉利斯塔德里斯 меджлис-тадрис),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清真寺举行,有时也在私人住宅中举行。10 世纪末的地理学家马克迪西阐述了学者为宣传自己的著作而采取的两种手段:他们或者长期在自己那里举办“讲座集会”(迈吉利斯塔德里斯 меджлис-тадрис),并竭力吸引外国人参加这种集会,以便这些学生日后能四处传播自己老师的名声;或者他们把自己的著作交给某个知名人士。获得了声望的学者在到达某个大城市时,有可能将听众吸引到自己周围。例如,穆尔太齐赖派领袖阿布尔·卡西姆·卡比(生于巴尔赫,但却属于巴格达的穆尔太齐赖派,死于 931 年)来到涅谢夫(纳赫舍卜,在现在的卡尔希附近)时就是这样,他住在一个拉巴特中,有人给他安排了一间教室用于“授课”(伊穆拉 имла 是一个常用来代替塔德里斯 тадрис 一词并指出教学特点的术语)。除了为个别学者安排教室之外,10 世纪的时候还要关注教学的连续性,在一些大清真寺中设置一些固定学习班(类似现在前亚许多清真寺包括克尔白清真寺中所附设的神学系)或一些特殊的学校——迈德赖塞。从时间上看,第一次提到迈德赖塞的事件就是 937 年布哈 226

---

[1] 参见 Wellhausen, *Skizzen und Vorarbeiten*, Ⅳ, S. 19.

拉发生的火灾。在这场火灾中被烧毁的建筑物中,有一座是位于城北的"法尔杰卡迈德赖塞"。马克迪西谈到了马维兰纳尔的迈德赖塞、伊玛目和谢赫,也谈到了尼沙普尔"精致的迈德赖塞"和梅尔夫的迈德赖塞,在这些迈德赖塞中每一位教师都有薪水。从最后这句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当时与私人迈德赖塞并存的还有受到国家财政支持的迈德赖塞。显然,存在着一些受私人资助的由异端教派掌控的迈德赖塞。例如,在撒马尔罕由谢赫阿布·曼苏尔·马图里迪和阿布尔·卡西姆·萨马尔坎季领导的穆尔太齐赖派和凯拉姆派异端就拥有17所迈德赖塞,官方正统教派与之进行了斗争。编撰教义问答手册并在人民中间传播,这是萨曼王朝政府所采取的反对异端的一种措施,但是萨曼王朝并没有像11世纪下半叶波斯所做的那样,通过创办大量受政府辖制的迈德赖塞来推广正统教派。如同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迈德赖塞同僧侣的寺院一样,在伊斯兰世界最初不是由统治者创办的,而是由反对派创办的。

在11世纪初伽色尼王朝取代萨曼王朝之际,出现了根据政府的直接命令建立一些迈德赖塞的最初记载,这些迈德赖塞也是对其记载一直留存至今的最早的宗教学校。迈德赖塞附属于苏丹马赫穆德(998—1030年)在其第12次进军印度(1018—1019年)之后在加兹纳建立的大清真寺。据说,"有一所规模宏大的迈德赖塞被合并到清真寺中,在这所迈德赖塞中,从地面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以往伊玛目(杰出学者)论述古今人士学识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作为战利品从国王的宝库(图书馆)里运来的,它们来自于伊朗和世界各地"。"主持讲座、研究神学的法学家和首都的学者轮流来到"迈德赖塞中,"并且他们中的贫困者可以得到丰厚的薪水和现成的食品,不必为此而烦心"。那位作者(历史学家乌特比)对马赫穆德的兄弟纳斯尔在尼沙普尔所建立的迈德赖塞进行了描述,纳斯尔担任呼罗珊总督,他是一位忠实的哈尼夫派信徒。他命令在尼沙普尔"卡迪阿布尔·阿拉·萨义德·伊本·穆罕默德的房屋旁"为该教派的学者们建立一所迈德赖塞,他"出资建造了这座建筑物,规定了那些到此处寻求庇护者和开办讲座者的

收入,吩咐在迈德赖塞的庭院中传授科学知识。迈德赖塞是一座纪念性的建筑,它记载了纳斯尔在早餐和晚餐时举行学术活动的历史,因而晚上和早上是为这座宗教学校增添光彩的时刻”。那个时代还有其他一些迈德赖塞也被提到,乌特比谈到了尼沙普尔的“萨布尼迈德赖塞”,他说那里保存着一册解释《古兰经》的大部头合著,这部著作是由根据锡斯坦统治者哈拉夫(943—1003年)的命令召集来的学者们编著的,共花费了2万第纳尔(10万多卢布)。另一位伽色尼王朝的历史学家贝哈基谈到,在马赫穆德第16次远征印度归来之后(1025年),很快就任命学者布·萨迪克·捷巴尼担任胡塔良地区(后来的库利亚布州)的卡迪,并且他补充说在这个州有二十多所拥有寺院不动产的迈德赖塞。显然,这些拥有寺院不动产的迈德赖塞是国有的或者是得到国家承认的,它们对卡迪的依附性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隶属于巴尔赫的地区有大量的迈德赖塞这一事实,使得我们推测宗教学校与佛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在出版物中已经指出[1]了突厥斯坦迈德赖塞日常生活习俗与暹罗维哈拉日常生活习俗具有以下相似之处:(1)必须诵读戒律;(2)禁欲和严禁妇女进入;在不独身的穆斯林那里,结了婚的学生只能每周在迈德赖塞外过夜一次;(3)宗教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能管理它的收入,所有的钱物事宜都由专门委托的世俗人士(迈德赖塞中的穆泰瓦里)负责处理;(4)必须做到四大皆空。在这些日常生活习俗特征中,第一条和第二条对基督教修道院也同样适用,但第三条和第四条则从本质上把迈德赖塞和维哈拉与基督教修道院区别开来。除了佛教的直接影响之外,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教还受到了与佛教关系密切的摩尼教的影响,在伊朗的东部地区尤其如此。那时的迈德赖塞中是否像现在的佛寺一样,存在着住房,或者像摩尼教寺院那样,人们只是为了共同阅读圣书和讨论宗教问题而来到这里,历史学家的表述并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不管怎样在伊斯兰世界里,如同在基督教世界、佛教和摩尼教世界一样,自我牺牲精神(苦行 зухд)与学

227

[1]卡尔梅科夫《中亚考古学的基本问题》,第99页。

问(илм)都是集于一身的,只是到了后来,作为封闭学校的迈德赖塞与作为德尔维希僧住所的哈纳卡之间才有了区别。

早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人就知道基督教修道士,他们对修道士的了解多于对司祭的了解。在《古兰经》中基督教的司祭是用叙利亚词来表示的,这一叙利亚词由希腊文"神甫"пресвитер(本义为"年长的")翻译而来,但当时有一个用来表示修道士的纯阿拉伯词拉希布 рахиб(复数形式是 рухбан),形动词是 рахаба,即"畏惧"之意,"畏惧"(上帝)者是与"好色之徒"(公开犯下罪恶的人法锡克 фасик)相对立的。捷尔萨 Терса 一词(在波斯中部地区为捷尔萨克 терсак)是由同义波斯动词 терсиден(畏惧)构成的,在波斯人们用这个词来称呼所有的基督教徒,由于波斯教会对基督教在阿拉伯人中的传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此有可能阿拉伯词是从波斯语中翻译而来的。但是在阿拉维亚与修道士这一概念有联系的并不是修道院,而是单个隐士的僧房,这种僧房也可用阿拉伯词萨乌马 саума'а 来表示,有人论证说,这个词的词根含义是"高高的,有尖顶的建筑物"。在伊斯兰世界中,萨乌马 саума'а 这个词后来有时用于表示"宣礼楼",譬如,12 世纪的旅行家伊本·朱拜尔谈到了麦地那先知清真寺中的 3 个萨乌马。但萨乌马又与塔楼不同,根据伊本·朱拜尔的说法,在麦地那的宣礼楼中,只有东边靠近朝拜方向指示牌基布拉的一座宣礼楼外形与萨乌马相同,其他两个规模稍小一些的萨乌马外形与塔楼(布尔赤 бурдж)相似。在附属于大清真寺(例如大马士革清真寺)的宣礼楼中,有时伊斯兰苦修者也为自己设置一些修道室,可能萨乌马 саума'а 这一术语被运用于宣礼楼的原因就在于此。萨乌马 саума'а 一词在《古兰经》中只遇到一次,而且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它是在谈到各种宗教寺院(在萨布卢科夫的译文中翻译为"修道院")的一节中(第 22 章第 41 页)被提到的。至于是否指的是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异教徒修道者的修道室,《古兰经》注释者的观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阿拉伯语中修道院里单个修道士的住所是用外来的叙利亚词汇来表示的,就像俄文中"僧房"一词是由拉丁文(cella)经希腊文(kellion)转化而来的一样,叙

228

利亚人这样称呼寄宿高等学校中的独立房间，穆斯林这样称呼胡吉拉 худжра（阿拉伯词汇，在穆罕默德时代它既被用于表示独立的小屋，也被用来表示较大建筑物中的房间）。无论在有关基督徒的记载中，还是在有关穆斯林的记载中，我都没有遇到过使用萨乌马 саума'а 来表示这种含义的情况，虽然用阿拉伯词汇萨瓦米 савами 也能表示一栋大建筑物中的许许多多相同的房间；底格里斯河畔萨马拉的“僧房城堡”（卡斯拉斯萨瓦米 каcрас-савами）就是如此，它由许多带有拱顶的地窖似房间构成，其遗址现在被称为卡斯拉尔阿什克（恋人堡）。在伊斯兰时代的突厥斯坦，人们把可能具有类似现在奇利亚哈涅功能的住宅或单个僧侣的住所理解为萨乌马。比如，纳尔沙西谈到了一位布哈拉伊玛目阿布·哈夫斯，他是布哈拉一所学术学校的创办者，死于 832 年，纳尔沙西说：“他是一位僧侣，也是一位学者。正是由于有了他，布哈拉才成为伊斯兰式的穹顶城市，布哈拉的居民才能成为有学问的人，科学才能在那里得到传播。”阿布·哈夫斯的房屋在世纪中期[1]已经不存在了，但其遗址（废墟）现在还清晰可见，“房屋中的萨乌马”也保存了下来。在埋葬阿布·哈夫斯的库尔干附近，也发现了“清真寺和萨乌马”。萨乌马一词如今在现实语言（在标准语中，甚至在 19 世纪的著作中也可以遇到[2]）中恐怕已不再使用，但从前这个词却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3]，虽然这种观点未必可信，该观点认为蒙古语（在突厥文中也使用）中的叙迈 сюмэ 与阿拉伯词汇有关，所谓叙迈 сюмэ 就是“佛教徒的小庙或祈祷大殿”，其中也包括“那些僧侣并不在其中常住的寺庙，僧侣们在草原各地云游，只在过节时或者在规定的大呼拉尔日（祈祷日）才聚集在自己的寺院”[4]。

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早期代表是一些受到个别崇拜者尊崇的苦修者，这些崇拜者往往会成为他们的学生和他们事业的继承者。在叙述

[1]第一版写的是：“在中世纪”（显然是错误的）。——Ю. 布列格利

[2]比较阿布塔希尔霍加《撒马尔罕的古迹和穆斯林圣地概论》，维亚特金译本，第 250 页。

[3]华尔特《东方土耳其的文献》，第 218 页。

[4]波兹涅耶夫《蒙古佛寺和佛教僧侣生活习俗以及后者与民众关系概论》，第 1 页及以下。

这些神秘主义者的事迹时,真实的情况明显地被传说中的细节所掩盖,常常发生弄错时代的现象,特别是在论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时尤其如此。有关早期神秘主义者的所有传说都可以使我们断定,除了基督教城市和修道院的影响以外,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这种影响尤其明显,还有伊朗东部城市巴尔赫的影响,在这里首先得到繁荣的是佛教。早期的神秘主义者之一易卜拉欣·伊本·阿德哈姆就出生于巴尔赫,他大约死于回历160年(776—777年)。神话传说称他是巴尔赫之"王",像佛祖释迦牟尼一样,为了潜心修炼,他舍弃了世俗间的一切。踏上归隐之路后,易卜拉欣就离开了巴尔赫,并且根据关于他的传记资料可以看出,他再也没有返回自己的故乡。虽然早在11世纪的谢赫阿布·赛义德时代,就有人指认在呼罗珊尼沙普尔附近的山里有一个山洞是这位圣人的修道室(萨乌马),但他作为一名隐士的所有功绩都是在麦加和其他前亚地区建立的。据一些史料记载他死后被埋葬在幼发拉底河的苏拉城,据另外一些史料记载他被埋葬在一座拜占庭堡垒中或地中海的一个岛屿上。但他在巴尔赫有一批继承者,其中居于第一位的就是舍基克·巴尔希,相传他在麦加见到过易卜拉欣。舍基克的生平活动与巴尔赫和东部地区的联系比易卜拉欣与巴尔赫和东部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在关于他的传说中,除了说他曾前往西部旅行,在西部的巴格达曾拜见过哈里发哈伦·阿尔·拉希德(786—809年)以外,还说他曾前往东部旅行。在过隐居生活之前,他是一位商人,那时他便到过"突厥斯坦",在那里拜访了"供奉偶像的庙宇"并与身着红衣的佛教僧侣进行过交谈。后来他在撒马尔罕搞了一个"国会"。在巴尔赫他参加了抵御卡菲尔人进攻保卫城市的战斗,810年他在库兰(如今锡尔河流域的塔尔特[1],在亚历山大山脉[2]以北)会战中阵亡。哈基姆·阿萨姆(聋子)[3]是舍基克的学生,死于237/851—852年,他

〔1〕现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卢戈沃耶居民点。——Б.加富罗夫

〔2〕现在的名称是吉尔吉斯山脉。——Б.加富罗夫

〔3〕有人说他是装聋,以便不让一位在同他谈话时信口开河的老太太发窘,此后为了不让老太太知道他是在装聋,在与所有其他人交谈时继续伪装了15年,直至老太太去世。

是“巴尔赫的主要谢赫之一”。哈基姆的学生艾哈迈德·希兹鲁亚死于240/854—855年,他娶了巴尔赫埃米尔的女儿为妻,并收了1000名弟子,他们全都能“在水中行走,在空中飞翔”。穆罕默德·伊本·法兹尔是艾哈迈德在巴尔赫的学生,他被驱逐出巴尔赫,后来生活在撒马尔罕,于319/931年死在那里;一般认为撒马尔罕学者阿布·曼苏尔·马图里迪(死于333/944—945年或335/946—947年)和阿布尔·卡西姆·萨马尔坎季(死于953年)是他的学生,虽然人们同时称艾哈迈德·希兹鲁亚的另外一位“朋友”阿布·伯克尔·瓦拉克(死于290/903年)是阿布尔·卡西姆·萨马尔坎季的导师。然而,传说却把生活在巴尔赫的阿布·伯克尔·瓦拉克说成是铁尔梅兹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的学生和助手,后者生活在自己的故乡铁尔梅兹城,死后也葬在那里,铁尔梅兹有一块墓碑,上面记载着他死亡的时间是255/869年。与艾哈迈德·希兹鲁亚有交往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是目前已经不存在的德尔维希僧团哈基米的创始人。哈基米是11世纪苏非派史学家朱拉比所列举的12个神秘主义教派之一。在这12个教派中还有一个产生于中亚现在也已经不存在的教派,这就是谢亚里派(сейяри),谢亚里派得名于其创立者阿布尔·阿巴斯·谢亚里(死于342/953—954年或344/955—956年)。这个教派在涅萨城(现在阿斯哈巴德附近的巴吉尔村,现在的波尔托拉茨克[1])和梅尔夫城有两个团体,有一种在这两个团体之间讨论各种问题的通信集,作者有幸在梅尔夫见到了这个集子。朱拉比强调说,在所有的苏非派代表中,只有谢亚里派保持了自己最初的学说,因为在涅萨城和梅尔夫城中一直都有一些注重保持学派创始人最初理论纯洁性的领袖。但是关于这一学派的自身起源问题以及10世纪前梅尔夫神秘主义教派的命运问题,我们拥有的资料还少于关于巴尔赫教派代表的资料。两位古代苏非派代表都出身于梅尔夫,他们是富扎伊尔·伊本·伊亚兹(死于187/803年)

[1]现在的阿什哈巴德。在巴吉尔村的东郊有一座老尼萨城(古安息国首都的遗址),而在巴吉尔村的西郊则是新尼萨城,这是中世纪城市的遗址,B.B.巴托尔德所指的正是这里。参见马松《巴吉尔村的尼萨古城及其研究》。——B.罗莫金

和阿卜杜拉·伊本·穆巴列克(死于181/797年)。前者起初是活动于梅尔夫和阿比韦尔德之间的强盗首领,但他作为一名苦修者的所有活动都是在前亚地区展开的。他在麦加与哈伦·阿尔·拉希德见过面,甚至与自己的同乡阿卜杜拉·伊本·穆巴列克可能也只是在西部见的面。11世纪的波斯大臣尼扎姆·阿尔·穆里克认为下面的一段名言出自富扎伊尔·伊本·伊亚兹:"如果我的祈祷能起作用,那我只为正义的苏丹而祈祷,因为(上帝的)奴隶的顺遂和世界的繁荣是与他的顺遂相连的。"阿卜杜拉·伊本·穆巴列克的活动对自己的故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他在那里的两个对立教派的学者中间都享有盛名,他为这两个教派建立了拉巴特。但是这位修道者在返回梅尔夫之后又再次来到了西方并移居麦加,可能他再也没有从这里回过故乡。尽管已经有了阿卜杜拉·伊本·穆巴列克的活动,阿布尔·阿巴斯·谢亚里依然被认为是"第一个在梅尔夫传播上帝真理的人"。谢亚里的直接导师是阿布·伯克尔·瓦西季(死于320/932年以后),他是从西部来到梅尔夫的,虽然根据某些资料他出生于费尔干纳。谢亚里葬在梅尔夫,他的陵墓成了祭祀的对象。现在无论是这位修道者的陵墓还是他的纪念碑都已经不存在了。

阿布·伯克尔·瓦西季和其他在呼罗珊(现在的土库曼当时也被划归到呼罗珊)活动的修道者们都是巴格达苏非主义者朱涅德(死于298/910—911年)的学生。朱涅德被认为是神秘主义教派清醒派的代表,但是我们在追随他的苏非主义者中间,看到了一种类似德尔维希僧人舞蹈的现象。在巴格达对迷恋摩尼教异端的指责引起了人们对朱涅德及其巴格达同事们的反对,据说,当时出现了一些"唱歌、跳舞、讲异教徒的语言、整日沉湎于娱乐(塔玛莎 тамаша)、躲在地窖中并在那里交谈"的人。在呼罗珊朱涅德追随者的敌人是当时得到广泛传播的凯拉姆派的代表,虽然凯拉姆派自身不仅不反对苦行修道,反而大力提倡苦行精神的传播,并在从耶路撒冷到前布哈拉汗国的整个地域内建立了许多寺院。

伊斯兰教苦行修道精神的产生是与或积极或消极的政治反对派密

切相关的,所谓消极也就是拒绝与当局进行任何接触。各种不同派别 232 的代表——正统宗教信仰的拥护者和异教徒在各自宗教观的影响下,成了现存秩序的敌人。在这方面后来的神秘主义派堪称是所有 4 个正统派创始人的同路人,这 4 个正统派别分别为:马利克派、哈尼夫派、沙菲仪派、罕百里派。所有信教者结成了两条斗争战线——反对有罪的国家和反对有罪的异端,这两种斗争联盟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除了与宗教敌人进行的共同斗争之外,各宗教派别的代表人物彼此之间也展开了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并不拒绝野蛮势力代表、合法当局的代表以及入侵者和强盗的帮助,只要这种帮助能使一个教派战胜另一个教派。在类似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中,要确定用空谈来进行宣传和用实干来进行宣传之间的区别,比研究中世纪基督教史上的同类问题还要困难。有一种观点认为,像高加索的穆里德派或非洲的德尔维希派这样的政治运动已经“偏离了真正的苏非主义这一和平探求真主的宗教”,如同“基督教好战的高级神职人员那种竭力擅权的做法”已经“完全背离了基督教的基本理想”一样,这种观点未必能有相应的史料依据。[1] 有史可考的苏非派的第一个团体是阿布·阿卜杜勒·拉赫曼·苏非的信徒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建立的,他们为履行宗教命令而与政府进行了斗争,816 年当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外来人攻占亚历山大时,他们向其提供了军事援助。苏非派后来对 4 个正统教派中最狂热和最富有战斗精神派别的创立者——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罕百勒(780—855 年)予以深切的悼念,他的家族出生于梅尔夫,他对自己祖先的故乡一直怀有眷恋之情。埋葬在梅尔夫的布列达是先知的随从之一,他引用了穆罕默德的一句名言,赞美梅尔夫是一座因祖尔卡涅因而有根基的、神圣的城市。伊本·罕百勒的嫡系弟子易卜拉欣·阿尔·哈尔比是一名苦行僧,他死于 285/898 年;后来许多苏非派的泰斗加入了罕百里学派,如卡迪里派的创始人、12 世纪的阿卜杜勒·卡迪尔·吉利亚尼。在早期的苏非派中,舍基克·巴尔希的弟子伊本·阿布·

〔1〕谢苗诺夫《穆斯林神秘主义者》,第 111 页及下一页。

阿希姆·安·纳比勒(死于287/900年)是更狂热的扎希尔教派的拥护者,这一教派主张严格按照《古兰经》行事,不允许有任何偏差。[1]对《古兰经》中谈到安拉脸和手以及其他器官的一些地方进行字面上的理解,就会产生真主具有人形的观点和神人同形的异端思想,人们一般都指责罕百里学派和扎希尔教派就是这样的异端。对一切新事物的极端仇视使得它们与早期伊斯兰教的政治派别之一——哈瓦利吉派关系密切。哈瓦利吉派在中亚的避难所锡斯坦同时也是"宗教斗士"的中心和富有战斗精神的正统派凯拉姆派创始人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凯拉姆的故乡,原因就在于此。根据研究伊斯兰教派的史学家沙赫里斯塔尼的评论,穆罕默德·伊本·凯拉姆获得了苦行僧的美誉,但是他没有掌握大量的书本知识,他编写的书是一种捏合了其他各种教派理论的杂乱无章的混合体。他的学说在呼罗珊的普通人民中,特别是阿富汗西部地区即古尔(格里鲁德河和希利门德河的上游)和加尔奇(穆尔加布河上游)地区的山民中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在他的一本名为《根据上帝的表述死后[2]所受的惩罚》的书中有一些表达方式被指责宣传了神人同形说。伊本·凯拉姆在巴尔赫、梅尔夫、赫拉特和尼沙普尔听过讲座,到麦加进行过朝圣,他在麦加待了5年,返回尼沙普尔后根据统治者穆罕默德·伊本·塔希尔(862—873年)的命令他被长期监禁。865年他离开尼沙普尔迁居耶路撒冷,869年或870年病死在耶路撒冷。凯拉姆教派后来与耶路撒冷保持着联系,10世纪末他们在那里还有哈纳卡。可能耶路撒冷是凯拉姆教派传播的最西部据点。凯拉姆派自己确认他们在马格里布(北非)的哈纳卡达到了700所,但地理学家马克迪西在引用这一资料时却说他们的观点是不真实的,他论证说那里连一个凯拉姆派的哈纳卡都没有。根据15世纪作者马克里济的说法,耶路撒冷的凯拉姆派信徒曾经达到了2万人(?),他

233

[1]有关这一教派的详情,参见B.P.罗森男爵的论文《希吉拉历6世纪波斯公文语言的范例》,第173页。

[2]这里说的是天使奈吉尔和蒙卡尔在死者被埋葬后立即根据穆斯林的信仰,在坟墓中对有罪的人进行审讯和惩罚。

们“醉心于崇拜真主和苦行修道”，在东部区域他们的人数“多得都数不过来”[1]。在谢赫阿布·赛义德的传记中（参见下面），尼沙普尔凯拉姆教派信徒的数量也被确定为2万人。马克迪西说，凯拉姆教派在中亚的费尔干纳、胡塔尔、古兹加南有一些哈纳卡，在梅尔韦卢特有一个哈纳卡，在撒马尔罕也有一个哈纳卡。在马克迪西同一著作的另一种版本里谈及这一主题时，使用的不是哈纳卡，而是迈德赖塞这个词的单数和复数形式。尼沙普尔是凯拉姆教派的中心，呼罗珊凯拉姆教派的“谢赫和伊玛目”阿布·雅库布·伊斯哈克·伊本·马姆沙德就住在这里，他死于993年，是一位勤勉的苦行修士和能言善辩的传道者，他成功地传播了伊斯兰的宗教信仰。他曾劝说5000名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男男女女的拜火教徒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可以他的一段布道词为例，他在布道中建议自己的听众到麦地那去打听先知及其同时代人和继承人的宫殿和花园，打听先知女儿法蒂玛的饰品和宝石，并补充说：“你们在那里将找不到任何类似的东西，你们将会明白，你们在追求今生的幸福时已经误入歧途。”他的儿子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哈克继承了他的事业。凯拉姆教派在他生活的时代由于伽色尼苏丹马赫穆德（998—1030年）的庇护，一度成为受政府支持的派别，当时突厥斯坦的一部分，也就是土库曼和前布哈拉汗国的东部地区成为伽色尼苏丹马赫穆德的领地。1006年，当尼沙普尔一度转入中亚突厥征服者手中后，由于突厥征服者害怕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哈克对居民的影响，所以将传道者带走。他成功地逃了出来，这大大增加了苏丹对深受敌人之害的传道者的好感。阿布·伯克尔成了苏丹迫害什叶派异端的得力助手。他身着苦行修道者的毛织外衣（苏甫），同时又成为尼沙普尔的长官（列伊斯）。他的战友从被指责为异端的人那里收取贿赂，对他们而言处理异端的过程就是其进款的源泉。阿布·伯克尔的影响由于他和另外一位宗教代表人物之间的冲突而受到了动摇。尼沙普尔一位很有学问的卡迪阿布尔·阿拉·赛义

234

〔1〕梅德尼科夫《从阿拉伯征服到十字军东征的巴勒斯坦》，第2卷，第667页。

德·伊本·穆罕默德是苏丹两个儿子穆罕默德和马苏德的老师,他在1012年从麦加朝圣返回后,指责凯拉姆教派宣扬神人同形说。为了报复卡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阿布·伯克尔指控他赞成穆尔太齐赖派的思想。卡迪被送往住在加兹纳的首席卡迪处受审,控告者也被传到那里,由于哈尼夫派学者(可能法官自己也属于这一教派)——苏丹的兄弟和呼罗珊总督纳斯尔的庇护,他被宣布无罪释放。但返回尼沙普尔后赛义德从此远离政事,只有在履行宗教义务和办讲座时才离开家门。而阿布·伯克尔的影响仍在继续加强,他的教派继续利用处置异端的过程来图谋对手的财产、毁坏他们的声誉,但这最终又引起了众怒。苏丹在经过长期的动摇之后不得不罢黜了自己的宠臣。阿布·伯克尔被剥夺了财产,他的追随者也被送往要塞监禁起来。现在政府自己提出了那条笃信宗教的人士所坚持的原则,这就是苦行修道者不能担任高级官职,总之不能追求世俗利益。苏丹马赫穆德的正史作者乌特比就是这样叙述的。从其他一些史料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苦行修道者的失宠,还是他们与宗教神学人士之间的敌对都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阿布·赛义德·梅赫尼(967—1049年)是从朱涅德追随者当中产生的苏非派谢赫,根据他的后代和传记作者的叙述,他在尼沙普尔既受到了阿布·伯克尔的迫害,也受到了卡迪赛义德的迫害,他们在这方面行动完全一致。有一封被凯拉姆教派信徒送往加兹纳的告密信是这样写的:"从梅赫涅来了一个自称是苏非派的人,他在这里举行集会,集会时他在读经坛上诵读诗篇而不是解释《古兰经》,也不援引哈提斯。他经常追求豪华,举办音乐会,年轻人则跳舞,吃甜点、烤鸡和各种水果。他自称是苦行修道者,然而这并不是苦行修道者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苏非派所具有的特征。人民立刻就被他吸引了过去,并开始误入歧途了。在绝大多数普通人中间产生了骚动情绪。如果不采取措施,骚乱很快就会发展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苏丹指派两个主要教派沙非仪派和哈尼夫派的伊玛目来调查这一事件。阿布·伯克尔和赛义德准备对苏非派进行血腥镇压,并且他们事前就为自己的胜利感到欣喜万分,但谢赫阿布·赛义德用实例向他们俩证明,他知道他们内心所有的秘密,此后

235

他们便撤销了自己的控告并表示了悔意。阿布·伯克尔吩咐转告谢赫,自己粉碎了一支反对他的军事力量,其主力包括:阿布·伯克尔·伊本·伊斯哈克·凯拉米及其2万信徒,卡迪赛义德及其3万信徒,苏丹及其10万名支持者和750头大象。史学家贝哈基在叙述1030年新苏丹马苏德进入尼沙普尔城时说他对卡迪赛义德和阿布·伯克尔都同样恩宠。

阿布·赛义德传记作者的记载表明,不仅什叶派异端遭到了来自狂热正统派的迫害,而且像阿布·赛义德那种持有正统沙菲仪教派观点的苏非派也遭到了他们的迫害。这一史料还谈到了当时苏非派在已经转入突厥人之手的马维兰纳尔所遭受的迫害。在谢赫阿布·赛义德生活的时代,“当博格拉汗想把马维兰纳尔的苏非派一网打尽时”,一些谢赫从这一地区秘密地逃到了梅尔夫。伊本·阿尔·阿西尔的史料论述了博格拉汗时代的宗教迫害,他认为这场迫害发生在436/1044—1045年,但只说什叶派是这一迫害的受害者。根据该史料记载,来自埃及的密使成功地劝说人民宣誓效忠法蒂玛哈里发穆斯坦绥尔,汗表面上装作站在他们一边,使他们丧失警惕,之后便在首都对什叶派进行了屠杀,同时还向其他城市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从阿布·赛义德的传记中可以看到,突厥汗和苏丹马赫穆德一样,不仅把什叶派当做异端对其进行了迫害,而且也把正统的苏非派当做异端进行迫害。把苏非派视为异端可能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第二,是因为他们与教条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有联系。当时教条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战斗。尽管他们为宗教信仰而与自由主义思想家进行了斗争,但在追逐字义的狂热者眼中他们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因为任何企图用理性的论据革新宗教学说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偏离神圣经文的字面意义。我们看到像德尔维希僧人跳舞唱歌这样的现象违反了正统伊斯兰教的传统,这些现象我们甚至在以朱涅德及其学派为代表的“清醒派”苏非主义修道院中也遇到过。这些修道院的生活在其他方面与凯拉姆派修道院的生活有多大的差别,我们还不能确定,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凯拉姆派修道院的内部

制度。有关哈纳卡中的生活情况的资料我们主要是在谢赫们的传记中找到的。凯拉姆教派的文献已经遗失了,可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们从谢赫阿布·赛义德·梅赫尼的传记中了解到了他生活过的或者带领自己信徒到过的那些哈纳卡的某些情况。

哈纳卡主要不是用来安置常住居民的,而是用来安置客人的。在尼沙普尔阿布·赛义德的哈纳卡中有120个苏非派信徒,其中40人是常住居民,80人是朝圣者。在15世纪的文献中谈到了哈乃卡希穆萨菲尔佩纳赫 Ханеках-и мусафирпенах(哈纳卡,朝圣者的寄居处),这一表述说明哈纳卡应该是后来安置朝圣者的房屋。哈纳卡中的独立修道室是用扎维亚 завия 这一术语来表示的,哈纳卡中主谢赫的萨乌马也被论及,但看不出这最后一个术语能够被运用于每一个修道室。"清真寺的房屋"(месджид-хане)也是哈纳卡的一部分。可能谢赫可以携带自己的妻子在这种寺院的修道室中停留和居住。据载,谢赫阿布尔·哈桑·哈拉坎尼(死于1033年)之子就是在其年轻的妻子被送到他那里的当天夜里被抓住杀死的。凶手把年轻人的头颅扔到他父亲修道室(萨乌马 саума'а)的门前。当呼唤晨祷的声音传来时,阿布尔·哈桑走出修道室,撞到了人头并喊来自己的妻子,也就是年轻人的母亲,让她拿一盏灯过来。大约在那个时期谢赫阿布·赛义德·梅赫尼来到了阿布尔·哈桑的哈纳卡,有人为他建造了一座特殊的房屋(哈涅 хане),让他能在里面给自己布置一个修道室(扎维亚 завия)。谢赫阿布·赛义德的这次旅行便是由他的一位妻子陪伴的,谢赫阿布尔·哈桑每天早晨都来到门前问候他们并询问阿布·赛义德妻子的健康情况。

谢赫阿布·赛义德的传记作者指出了朱涅德学派的苏非主义和沙菲仪教派两者之间在传播方面的联系。虽然他毫无疑问地敌视哈尼夫教派及其创始人阿布·哈尼夫,但他依然坚持认为所有的谢赫及沙菲仪之后的走神秘主义"道路"(塔里卡特 тарикат)的代表人物都持沙菲仪教派的观点,甚至那些从前尊奉其他教派的人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后也都皈依了该教派。他认为沙菲仪教派神学家的主要功绩是在反对

穆尔太齐赖派"新制度"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说出了4位学者的名字,这4位学者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现在土库曼和呼罗珊北部从费拉瓦(现在克孜勒阿尔瓦特)到塞拉赫斯相对不大的区域内。这些学者之一法吉赫阿布·阿里·扎希尔·伊本·艾哈迈德·塞拉赫斯是阿布·赛义德的老师,死于389/999年;另一位学者是沙菲仪教派神学家阿布·伯克尔·阿尔·卡法尔,阿布·赛义德也听过他的课,他的活动区域在梅尔夫,死于417/1026年。从这些日期中可以看出,沙菲仪教派传入突厥斯坦某些地区的时间要早于传入呼罗珊北部地区的时间。比如,沙什(塔什干)的沙菲仪教派传播者是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卡法尔,他死于366/976—977年。尽管某些神学家竭力要使这4个正统教派——哈尼夫派、沙菲仪派、马利克派、罕百里派处于一种现在公认的平等地位,但各教派代表人物之间的冲突,有时是流血冲突依然持续了几个世纪。尤其是其他教派激烈地反对沙菲仪教派。各教派之间在宗教仪式上和对教义的解释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上层社会人士加入了沙菲仪教派,而当时哈尼夫教派和其他教派则更接近劳动群众的朴素信仰,这种朴素的信仰不允许对宗教教义进行任何推论,因为尽管无论哪一种教义学的理论体系目的都在于捍卫宗教命令,但它也是与神圣经文的直接意义不相容的。我们以正统教义学的创立者沙菲仪教派的阿沙里为例,沙菲仪教派总是竭力证明,他们像其他教派一样甚至像最极端的教派一样,是从字面上理解宗教命令并严格遵守宗教命令的,但没有人相信他们。此外,某些沙菲仪教派学者对宗教教义的推论甚至走得比正统的教义学更远。甚至有人指责塔什干的卡法尔倾向于穆尔太齐赖派。谢赫阿布·赛义德与更具自由主义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阿布·阿里·伊本·森纳(阿维森纳)关系要好,在正统派的眼中这位阿布·阿里·伊本·森纳是一个不虔诚的思想家。由于"基本原理"也就是教义学与形成宗教"支派"的具体宗教命令之间缺乏联系,所以一个信徒在教义学问题上可能成为穆尔太齐赖派异端,同时在具体宗教命令问题上则附和一个正统教派。例如,有人在谈到著名的国务活动家马韦尔迪(死于1058年)时说,他"在派系上属于沙菲仪教

派，在基本原理上属于穆尔太齐赖教派”。13世纪初，在突厥斯坦那一沙菲仪教派受到官方庇护的地区，同时也是一个穆尔太齐赖教派占统治地位的地区，这一点很有典型性。学者阿布·穆达尔·马赫穆德·达比（死于1113年）把穆尔太齐赖派思想从伊斯法罕带到了这里，在14世纪末帖木儿时代花剌子模还有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而当时在其他穆斯林地区早已没有这一派的学者了。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穆尔太齐赖派在花剌子模曾享有这样的权力，即不赞成他们思想的学者很难在那里生存，就像从前正统派代表人物不能忍受在自己中间存在穆尔太齐赖派异端一样。如同在整个突厥斯坦一样，在花剌子模得到最广泛传播的正统派是哈尼夫教派。只有希瓦的居民属于沙菲仪教派，但政府的首脑却是沙菲仪教派的信徒。1199年被处死的维齐尔尼扎姆·阿尔·穆里克·马苏德是梅尔夫沙菲仪教派清真寺的建立者；死于1220年蒙古人侵时期的大臣希哈布·阿德金·希瓦吉在古尔干奇城的沙菲仪教派大清真寺中建立了一座“空前绝后”的图书馆。在梅尔夫，由于沙菲仪教派清真寺过于富丽堂皇因而引起了骚乱，这座建筑在罕百里教派首领——伊斯兰教艾尔谢赫的教唆下被平民摧毁，因这一过错他们后来被处以巨额罚金。

238

在尊奉哈尼夫教派的萨曼王朝统治时期，沙菲仪派信徒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在萨曼王朝统治的国家衰落之后，王朝的一个后裔纳西尔·阿德·道利亚·阿布尔·哈桑·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住在呼罗珊的主要城市尼沙普尔，大概由于自己出身显赫并拥有财富，所以他在那里影响很大，但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影响。根据当地学者的请求，他从雷伊城请来了一位正在那里与异端展开斗争的学者伊本·福列克。在尼沙普尔有人在伊本·阿尔·哈桑·布申吉的哈纳卡中为他布置了房屋和迈德赖塞，但有人在突厥伽色尼王朝的代表——苏丹马赫穆德面前告发这位异端的敌人在传播异端学说，于是穆罕默德先知的使命连同他的生命一起结束了，他被传到加兹纳受审。他虽然成功地证明自己无罪，但在返回尼沙普尔的途中还是被自己的敌人毒死了（1015年）。在11世纪下半叶，正统的哈尼夫派神学被塞尔柱突厥的

苏丹赶到了西部地区。阿沙里学派的教义学也和异端一起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正如历史学家们所说，这种迫害在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1063—1072年)统治时代停止了，在他统治时期，他的沙菲仪教派维齐尔尼扎姆·阿尔·穆里克在大城市中为自己教派的学者建立了许多迈德赖塞，但是用尼扎姆·阿尔·穆里克自己的话来说，阿尔普·阿尔斯兰也是一位狂热的哈尼夫派信徒，是沙菲仪教派的敌人，他常常表示对自己大臣的不满，说他的大臣不是自己所赞成的教派的信徒。 239

3 突厥斯坦和突厥人

从列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政权从伊朗人向突厥人的转移是伴随着宗教事务中严厉制度和不容异说倾向的加强而实现的。总起来说，在突厥斯坦，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及与此相关的人口构成，决定着这里的政治危机通常会导致文化上的反动。反动因素，特别是宗教事务中的反动因素，更能赢得文化程度落后的山民和草原牧民的支持，而不是赢得保存着自己的军事素养并能在危机爆发时利用这些优势夺取政权的城市和平原地区居民的支持。就此而论，突厥人在中亚发挥的作用在很多方面类似柏柏尔人在北非和西班牙所发挥的作用。

对中亚的文明区域而言，与突厥游牧部落的贸易总是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对游牧民族而言，这些贸易联系比对文明区域的居民更为必要。游牧人口对供给他们衣物的文明工业产品的依赖程度要大于文明区域居民对草原畜牧产品的依赖程度。所以，各地的游牧人口都是自己赶着牲畜到与文明区域的交界地区去出卖这些产品，而不是等着让这些区域的商人来到草原购买牲畜、肉、羊毛等等。但是文明区域的居民在与游民人口的贸易中获利更大。早在10世纪的时候就像现在一样，穆斯林突厥斯坦从自己的游牧邻居那里获得了马匹和大量的肉类，其价格往往比在其他条件下购买这些产品更为低廉。边境哨所由大量骑兵来保卫。在靠近塔什干的地区和费尔干纳，每一个男子拥有100至500匹马。关于肉类的价格，在毗邻草原的锡尔河地区，1个迪尔亨姆（约相当于25戈比）可以买到4米那（6俄磅多）脱骨净肉。后来肉类的价格有时还要便宜一些，但这个时候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比较低，相应地，所有物品的价格都有所下降。此外，突厥人还从畜牧产品中获得皮革，他们主要把皮革运往恰奇（塔什干地区）。更北面的边境城市伊斯菲扎布（塞兰，在奇姆肯特以东）是主要的奴隶市场。突

厥奴隶的输入当然是由于草原上某些突厥部族之间的战争而引起的。此外，斯拉夫奴隶主要被运到花剌子模，从整体上看那里是伊斯兰世界与现在欧俄之间进行贸易的集中地。珍贵的皮毛也被运到这里。突厥人用自己的商品换来布匹，如恰奇的棉布、花剌子模的棉布和毛织品、撒马尔罕的丝绸。此外，在伊斯菲扎布还有一个棉织品集市。当地工业产品在草原上的销售得到了保障，促进了福利的发展。有人在谈到花剌子模居民时说，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得益于和突厥人的贸易。与粟特贸易不同的是，花剌子模贸易可能主要是在伊斯兰时期获得了发展。为可萨可汗服役的花剌子模军队完全由穆斯林组成。伊斯兰教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利亚人国家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与花剌子模的贸易成就密切相关的。从总体上来看，突厥斯坦文明在西北部影响的扩大是与伊斯兰教的传播密切相关的，至于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以及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传播之前的前伊斯兰时期，突厥斯坦的宗教传播情况我们没有任何资料。突厥斯坦人在锡尔河下游地区建立了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居民也只有穆斯林。其中有两个殖民地的位置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是詹德（希什特－卡拉遗址，位于图马尔－乌特库尔地区，在锡尔河以西距佩罗夫斯克 25 至 30 俄里），另一个是新村（占肯特遗址，在位于锡尔河岸的希瓦城堡占卡拉以南 4 至 6 俄里处，卡扎林斯克下游 22 俄里处）。[1] 这些城市并不隶属于萨曼国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它们的建立是穆斯林贸易大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穆斯林武力征服的结果。城市的权力掌握在当地的突厥人手中。在和平时期，人们沿着锡尔河把粮食从突厥斯坦运到新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城市周围的种植规模不足以供养城里的居民。当不能由锡尔河运送粮食时，居民们便从那里获得食品。这些城市是否仅仅是贸易殖民地，或者如果不是的话，从事贸易的居民与农业和工业居民的关系如何，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没有资料。关于居民的起源我们也一无所知，只 241

〔1〕根据 C. П. 托尔斯托夫的说法，有人认为占卡拉遗址就是詹德（托尔斯托夫《追踪古花剌子模文明的足迹》，第 60－61 页）。——Ю. 布列格利

能推测,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来自于花剌子模。这种情况的唯一史料来源就是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的著作,但他只是指出了从新村到花剌子模的距离(10昼夜的行程)以及到法拉勃或奥特拉尔的距离(20天的行程)。

我们看到在萨曼王朝时代,在粟特人已经为穆斯林开辟了道路的东北方,除了伊斯兰文明的影响之外,穆斯林帝国也用武力拓展了疆界。在东北部的最稳固的成就是在王朝最初几位统治者执政时代取得的。840年努赫·伊本·阿萨德征服伊斯菲扎布和893年伊斯梅尔·伊本·艾哈迈德征服塔拉斯(现在的奥利耶阿塔)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在后一个事件发生时,城市里的"主要教堂"转变为清真寺。一直到包括塔拉斯在内的整个地区都成了伊斯菲扎布州的组成部分,伊斯菲扎布州在萨曼王朝时期仍然由一个特殊的突厥王朝来管理。统治者甚至不必向萨曼王朝国库缴纳任何赋税,但是伊斯兰教的地位巩固地确立起来,那里为"宗教斗士"建立了许多"拉巴特"。履行圣战的义务可能成为伊斯菲扎布州免纳任何财税的理由。塔拉斯(阿拉伯人写成塔拉兹)[1]在10世纪时依然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边界据点。根据伊本·豪卡尔的说法,塔拉斯是"突厥穆斯林进行贸易的地方"。穆斯林没有到过比塔拉斯更远的地方,那里只有葛逻禄游牧民的大帐篷。在塔拉斯以西通往边境城市的路上,也有一片行程2天的空地,除了拉巴特以外那里没有任何建筑物,也没有任何耕地。但是,塔拉斯河沿岸不仅表面上已经被归并到伊斯兰世界,而且当地的矿产资源也为穆斯林所开采。在塔拉斯山有一座不大的城市舍利吉和几个村庄,那里蕴涵着银矿资源,可能这里的银矿能够与安格连谷地的矿产资源(几年前刚被当地的考察者发现)相媲美,早在阿拔斯王朝时代这里就有一座铸币厂。至少,10世纪末的地理学家在历数国家财富时就谈到从舍利吉运

---

〔1〕梅南德尔·普罗捷克托尔提到在6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之前为塔拉斯(FHG,4,228)。在中世纪后期,与塔拉斯这一形式同时并存的还有突厥文献中提到的塔拉什(阿布尔哈齐《土库曼世系》,科诺诺夫版,第45页,参见索引);相似的形式有"塔拉什"和"塔拉沙",这是俄文史料中提到的名称(参见《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资料》,第266页)。——B. 罗莫金

出白银，而根本没有提及安格连的矿藏。塔拉斯山银矿的意义（据悉迄今为止，再也没有发现这样的银矿）[1]，可以从下面这一事实中看出 242 来：当时在舍利吉这座小城中有大量的外国人。据记载（当然是明显夸大的数据）仅伊斯法罕人就达到 1 万人。尽管有大量的临时居民，舍利吉也没有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12 世纪的作者谈到它时只是说它是“一个像一座小城市的村镇”。在苦盏西北 40 俄里处的坎塞谷地出产铅银矿，现在这里被认为是突厥斯坦铅银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2]，当时可能还不为人所知。10 世纪上半叶，在塔拉斯有一个依附于萨曼王朝的特殊的“德赫干”。到了 10 世纪下半叶，萨曼王朝政府的影响可能已经延伸到了塔拉斯以西的地区：萨曼王朝近卫军的代表之一法伊克（他出生在西班牙，可能是一个参加了萨曼王朝近卫军的被购买来的奴隶）是埃米尔曼苏尔（961—976 年）的近臣，他在曼苏尔的继承人统治时代拥有显赫的地位，死于 999 年，他在马什哈德建立了一座华丽的清真寺，在梅尔克郊区也建立了拉巴特。此外，据说这座城市的大清真寺就像塔拉斯的大清真寺一样，起初是教堂。外塔拉斯及其以东地区对穆斯林的意义在于这里地处通往中国的商路上。还谈不上这些地区对穆斯林有什么专门的经济利益。我们也不知道，10 世纪萨曼国家从费尔干纳扩展疆界仅仅是为了军事目的还是另有其他的打算，乌兹根德[3]附近的一块地方就是萨曼国家从这里的突厥人手中夺取的。有道路从锡尔河下游地区和塔拉斯通往居住在更北方的游牧部族，也就是通往居住在额尔齐斯河的基马克人，人们用盐来换取基马克人的珍稀野兽皮毛。在中国突厥斯坦的城市既有道路通向北部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尔吉斯人那里，也有道路通往南部的西藏，从这两个民族那里获得的主要货物是麝香。

与穆斯林和中国人的交往不可能不对突厥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影

---

[1]关于这些矿藏，参见马松《调查塔拉斯河谷采矿工业史之行的成果》；伊万诺夫《中亚采矿业发展简史》；布勃诺娃《中世纪精巧的拉巴德》；布勃诺娃《中亚白银冶炼业简史》以及《9—11 世纪中亚的灰吹炼银法》。——Б. 斯塔维斯基

[2]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 177 页。

[3]现在的乌兹根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奥什州的中心。——Б. 加富罗夫

响,虽然在10世纪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一个突厥部族能完全摆脱游牧生活。那些生活在从伊斯兰世界通往中国商路沿线的突厥部族,即葛逻禄人(波斯史料写的是哈尔鲁赫人而不是葛逻禄人)和托库兹-奥古兹人的文明水平相对而言达到了最高程度。从费尔干纳穆斯林属地的边界到葛逻禄人领土的东部疆界有30多天的行程。葛逻禄人也是锡尔河流域穆斯林的邻居。除了梅尔克之外,往更西面的库兰村即现在的塔尔特也是葛逻禄人的属地。葛逻禄人的属地被认为是突厥斯坦地区人口最密集和最富庶的地区。在葛逻禄人当中,除了狩猎人口和游牧人口之外,也有农耕人口,有乡村和城市,与其他突厥人不同的是葛逻禄人身材高大,容颜俊美。葛逻禄人的东部邻居——托库兹-奥古兹人那里也有许多城市,通往中国道路上的其余地区属于他们。毫无疑问,中华帝国这些邻居们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定居生活。用一位阿拉伯作者的话来说,那里的行政管理要优于其他所有突厥人的地区,但他们中间也有游牧人口。托库兹-奥古兹人有一个分支与绝大多数托库兹-奥古兹人不同,他们被称为样磨人(发动侵袭的队伍),样磨人夺取了葛逻禄人的一部分包括喀什噶尔城在内的领地。样磨人在文明程度上要低于葛逻禄人,据说他们的耕地不多,主要财富是马和绵羊。这个民族的特点是勇猛善战。七河流域其他突厥人——炽俟人(葛逻禄侨民)及其西邻图赫锡人或突骑施人的文明程度大致也是如此,伊塞克湖的东北岸地区属于炽俟人。炽俟人的“城市和乡村数量不多”,他们在图赫锡人地区也有几个村庄。

243

北部和西北部突厥人的文明程度要低一些。基马克人只有一座城市。基马克人最西部的分支——钦察人的野蛮程度超过了这一民族的其余部分。吉尔吉斯人的任何一支都没有城市,也没有乡村。生活在锡尔河下游和里海、伏尔加河以西的古兹人也没有任何城市。[1] 但是,伊斯兰文明对这些民族有着吸引力。虽然基马克人(在额尔齐斯

---

〔1〕C. П. 托尔斯托夫与 B. B. 巴托尔德观点不同,他认为谷兹人有一些规模很大的设防的常住居民点——“城市”。关于此参见后面第560页,注释10。——B. 罗莫金

河)和吉尔吉斯人(在叶尼塞河上游)的主要大本营距离遥远,但这两个民族的游牧区在10世纪下半叶都紧紧地向伊斯兰世界的边界靠拢。在锡尔河沿岸与扫兰城毗连的地区,除了古兹人以外还有基马克人。吉尔吉斯人拥有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就是今天中国突厥斯坦的乌什吐鲁番,吉尔吉斯人与喀什噶尔的样磨人毗邻。毫无疑问,古兹人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的主体,他们归附了萨曼王朝政府,并在锡尔河流域获得了土地,他们有义务保卫这块边疆土地免遭其他突厥人的攻击。河左岸的休特肯德城是他们的主要聚居区,其遗址至今依然存在。除了商业目的和侵袭之外,游牧人口还在边界的文明区寻找适合的过冬之地,他们有时向国王和总督提出相应的请求。游牧人口向过冬地迁 244 移时常常进行抢掠,这迫使当地政府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

虽然在与突厥人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萨曼王朝也不得不安于这种状况:其中游流经几个伊斯兰区域的锡尔河的上游和下游不属于伊斯兰世界的范畴。对于突厥人伊斯兰教违反了《古兰经》与异教徒作战直至使他们"屈服"的命令。在与突厥人接壤的边界地区,伊斯兰教由进攻转入防御,先知本人(他未必知道还存在突厥人)有一句名言:"当突厥人让你们'平静'生活的时候,就要让突厥人'平静'地生活。"伊斯兰教在一些民族当中没有使用武力宣传,而是通过劝说取得了成功,突厥人就是最初这些民族中的一个。有关这种宗教宣传的进程以及如何逐渐清除宣传道路上的障碍方面的资料匮乏。现有的资料表明,突厥人最初觉得伊斯兰教是一种不适合游牧民族的宗教:哈里发希沙姆(724—743年)的使者建议突厥汗皈依伊斯兰教,他从突厥汗那里似乎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在突厥人当中既没有理发师、皮鞋匠,也没有裁缝,如果他们成为穆斯林并履行伊斯兰教宗教命令的话,他们将以什么为生呢?"

但是我们知道8世纪时,有一些还不太符合游牧民族尚武生活方式的宗教在突厥人中获得了成功,突厥语的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文学作品流传到了今天,其中有一些毫无疑问是属于8世纪的,而最

早的突厥语伊斯兰教文学资料则属于11世纪。[1] 在9世纪一位回鹘汗立起的碑铭中提到回鹘突厥人于762年皈依了摩尼教，并且新宗教的传道者希望“把习俗野蛮、充满流血牺牲的国家变成一个蔬菜遍地的国家；把遍布杀戮的国家变成一个唤人向善的王国”。9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者证实，皈依摩尼教似乎对托库兹-奥古兹人的军事素质产生了影响，他们在宣传忍耐与和平的宗教的影响下已经失去了自己好战斗勇的习性，但是他们像从前一样统治着葛逻禄人，虽然后者在“数量上超过他们一倍”。但是我们知道，根据另外的例子，民族的性格特征对宗教的影响要大于宗教对民族性格特征的影响，宣传和平和博爱的宗教被好战的民族接受以后就会变成宣传战争的宗教。在这方面摩尼教也不例外。回鹘汗——摩尼教徒，就利用自己强大的武力来保卫与其同教派者免受中国政府的压迫。托库兹-奥古兹汗既在中国统治者面前维护与自己同教派者的利益，也在突厥斯坦统治者面前维护与自己同教派者的利益。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撒马尔罕是唯一的一个摩尼教在那里没遭受迫害的地方。萨曼王朝政府想除掉这个摩尼教徒最后的避难所，但是在托库兹-奥古兹汗的压力下放弃了自己的打算，托库兹-奥古兹汗威胁说要对居住在他领地上的穆斯林进行报复，这些穆斯林的数量要大大超过居住在萨曼王朝领地上的摩尼教徒的数量。大概这里指的是来到此处的穆斯林商人，而不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汗的臣民。可能商人并不从事传教活动，所以穆斯林的商业成就并不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宗教成就。8世纪，不仅有突厥语而且还有汉语的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但还没有进行过利用这种语言来记载伊斯兰教文献的任何尝试。伊斯兰教的历史学家们多次提到葛逻禄王公

245

---

[1]从语言上判断，1914年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所得到的对《古兰经》所作的突厥文注释，属于更早些时候（瓦利多夫《布哈拉汗国手抄本汇编》，第249页）。在手抄本中，既没有说明该注释编写的时间，也没有指出编写的地点和作者的姓名。关于这一著作参见我的文章：“Ein Denkmal”。

关于这种突厥语塔弗西尔的目录（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手抄本，第197页）和著作的日期标注，参见德米特里耶娃《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最古老的突厥语古文献手抄本》，第37-38页。对这一塔弗西尔的词汇研究，参见博罗夫科夫《12—13世纪中亚塔弗西尔中的词汇》（其中的文献，参见第3页注释2）。——B. 罗莫金

甚至西藏统治者皈依了伊斯兰教，但这些叙述并不可靠。我们也不知道拥有巴拉沙衮城（在七河流域楚河谷地）和喀什噶尔城的伊斯兰突厥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这个伊斯兰突厥国家后来成功地消灭了萨曼王朝；也不知道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是如何取得胜利的，毫无疑问，在伊斯兰教之前这里曾流传着其他文明的宗教。

我们只有这个汗家族的第一位代表皈依伊斯兰教的传说资料，他的陵墓至今还在喀什噶尔以北的阿尔特什村，并且一种最古老的传说说这位汗死于955年。好像在他祖父的时代，萨曼王朝征服了伊斯菲扎布（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历史事件发生于840年），传说把伊斯兰教在突厥民族中所取得的最初成就与这一事件联系起来。史学家伊本·阿尔·阿西尔谈到，在960年有人数众多的突厥人（达到20万帐）皈依了伊斯兰教。10世纪唯一的伊斯兰神学家的活动就属于这一时期，我们知道这位神学家来到了突厥人那里，他就是呼罗珊人阿布尔·哈桑·穆罕默德·伊本·苏菲扬·克利马蒂，他从事法学（非赫）和教义学研究，于340/951—952年离开尼沙普尔，在布哈拉住了几年，从这里来到了“众汗之汗”的宫廷，350/961年死在那里。由于这种年代的吻合，我们可以推测克利马蒂的活动与伊本·阿尔·阿西尔所叙述的事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活动的任何细节，也不知道来自于伊斯菲扎布及与其相邻村庄的神学家们活动的结果，其中的一位就是阿布尔·哈桑·赛义德·伊本·哈基姆·乌斯巴尼克蒂，他在380/990年前不久到过突厥人的国家。 246

毫无疑问，在10世纪末占据了突厥斯坦文明区域的突厥穆斯林是10世纪地理学家们所提到的七河流域的突厥民族之一。波斯维齐尔尼扎姆·阿尔·穆里克在谈到自己的苏丹梅利克沙赫远征撒马尔罕和乌兹根德（1089—1090年）时，把炽俟人和马维兰纳尔的居民说成是当地的居民。根据伊本·阿尔·阿西尔的说法，撒马尔罕汗的军队就是由炽俟人组成的。不管怎样，征服者是从东北方的伊斯菲扎布来的。步入文明的马维兰纳尔的第一位突厥汗及其直接继承者都住在边界城市乌兹根德，只有后来的汗才把自己的住地迁到国家人口众多的城市

撒马尔罕。

此后,乌兹根德依然是费尔干纳州的主要城市,并且直至13世纪下半叶一直保存着这种地位。在乌兹根德保存下来的最好的中世纪建筑就属于这一时期,即12世纪。

总之,从马维兰纳尔的突厥汗时代,或者用俄罗斯学者的称呼从哈拉汗王朝的突厥汗时代起,地面上所保存的古迹的数量远远多于萨曼王朝时代。萨曼王朝时代没有完美的有时间可考的建筑物,关于某些建筑物如布哈拉所谓的伊斯梅尔·萨曼陵墓产生于萨曼王朝的观点,只是当地的一种传说而已。[1] 在其他情况下,10世纪的建筑纪念物只有在考古发掘时才能被发现,譬如在撒马尔罕附近阿弗拉西阿布的一座建筑物是笔者1904年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的,人们认为这是一座宣礼楼的底座。除了乌兹根德的建筑物(其中著名的是高达25俄尺的宣礼楼)以外,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布哈拉的一座高52米的宣礼楼以及布哈拉以东梅利克草原上的"国王拉巴特"(拉巴吉梅利克 Рабат-и Мелик)都属于哈拉汗王朝时代,前者是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在1127年建造的,后者则是舍姆斯·阿尔·穆里克·纳斯尔汗在471/1078—247 1079年建造的。看来,这位汗在从撒马尔罕通往苦盏的路上(在吉扎克以北不远)建立的拉巴特没有保存到今天,但在16世纪时还存在着。库尼亚-乌尔根奇的一座宣礼楼与哈拉汗王朝没有关系,但却属于这个时代,在它的底座上找到了雕刻在灰暗石板上的铭文,根据这一铭文的记载,这座宣礼楼建于401/1010—1011年。季希斯坦拉巴特(现在土库曼的马什哈德·伊·米斯里扬遗址)中的大清真寺是蒙古人侵之前时代的建筑,根据保存下来的铭文,这座大清真寺是苏丹穆罕默德·伊本·捷克什(1200—1220年)建立的,梅尔夫的苏丹桑贾尔陵墓(他死于1157年)也属于这个时代。最后,在突厥斯坦边界以外但

[1]现在这一建筑与萨曼王朝之间的关系已经被确认。参见列姆佩尔《乌兹别克斯坦的建筑装饰》,第148-152页及第579页注释42、43。关于萨曼王朝时代的古迹,参见沃罗宁娜《萨曼王朝时代中亚建筑评述》;普加琴科娃《阿拉巴塔陵墓(9—10世纪马维兰纳尔建筑简史)》。——Б.斯塔维斯基

靠近边界的朱尔占河上有一座最古老的穆斯林波斯时代的建筑古迹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建于 397/1006—1007 年的卡布斯塔。

不应该说萨曼王朝时代建筑物的消失是由于蒙古入侵时期所发生的破坏造成的，因为在这一草原上深受这种破坏之苦的应该是哈拉汗王朝时代的建筑物。更有价值的事实是：在 11 世纪和稍晚些时候，随着城市生活的发展，人们在搞建设时使用的木质材料越来越少。房屋密布的布哈拉在 10 世纪的时候被认为是一座有发生火灾危险的城市，这表明木质建筑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甚至大清真寺宣礼楼的顶部也是用木材建造的。宣礼楼 1068 年毁于两位王位候选人为争夺继承权而进行争斗之时，当时清真寺所在地遭到了从城堡上投掷的燃烧物的袭击，后来这座宣礼楼被烧制的砖头建造起的新宣礼楼所取代。把前蒙古时代最后几个世纪的梅尔夫与更早些时候的古城（恰乌尔卡拉古城）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用砖建造的建筑物要多于从前。有时在修建城墙时也使用烧制的砖头。在一些不大的城市中，城墙有时全部都是用烧制的砖头建造的（例如，季希斯坦拉巴特的城墙就是这样的）。1165 年，布哈拉用烧制的砖头建造了城墙的地基，为此使用了从城堡和塔楼的地基上拆下来的材料，这些城堡和塔楼是不久前即 1144 年在敌人入侵时被摧毁的。

从这些事实中可见，突厥人对国家的征服并没有阻止文明自然演进的进程，不管这种征服对文明生活的普遍条件而言后果如何。当然政权转移到草原民族手中这一事实本身不可能不发生影响。在这方面，10 世纪末对整个突厥斯坦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那时起，一些征服者被另一些征服者所取代，但是政权再也没有转移到土著的伊朗人手中。与文明的伊朗失去政治联系，应该具有不良的后果。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突厥斯坦已经不习惯于萨曼王朝那种试图建立起国家集权的思想。11 世纪，在前亚确立了统治地位的塞尔柱突厥 248 王朝统治下，这种思想一度取得了某些成就。突厥斯坦的哈拉汗王朝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游牧国家，国家被分成几个封邑，这些封邑很快便演变为独立的领地，虽然与哈拉汗王朝一起来的突厥人其文明水平要高

于和塞尔柱王朝一起来到波斯的土库曼人。除了突厥人的君主——可汗至上的观念以外,伊朗“万王之王”(“众汗之汗”和“苏丹的苏丹”这样的尊号显示了这一点)的观念以及中国的皇权思想也对他们的国家理想产生了影响。虽然他们的领地上没有任何中国居民,但哈拉汗王朝依然采用了塔布加奇汗或塔姆加奇汗的封号,突厥人用这一封号来称呼中国皇帝(在哈拉汗王朝的钱币上可以见到这种尊号,其阿拉伯译文是梅利克·阿斯汗,意为“中国皇帝”)。但是这些封号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权力。在中亚重建强大国家政权的唯一成功的尝试是在花剌子模进行的,这一地区从11世纪初期被与突厥斯坦的其他地区分离出来,过着与波斯一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前面援引的花剌子模存在唯理论神学家学校的事实证明花剌子模存在特殊的文化生活条件)。只有花剌子模的统治者能够尝试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由塞尔柱王朝创立的“伊斯兰苏丹”是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最高世俗统治者哈里发拥有同等地位的思想。这种努力遭到了巴格达哈里发的顽强抵抗,后者利用塞尔柱力量的衰败重新恢复了自己的世俗权力。在蒙古入侵之前,哈里发和苏丹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蒙古人的入侵先摧毁了苏丹的统治,之后摧毁了哈里发的统治。

蒙古入侵就其后果而言是一场从东亚向西而行的最大规模的征服运动,在此之前也发生过一系列规模较小但也影响到突厥斯坦政治生活的征服运动。在征服萨曼王朝之前发生过伊斯兰教对突厥人的文化征服,因此征服萨曼王朝并没有对同时代的人产生我们习惯于把它与异族入侵联系起来的那种影响。萨曼王朝组织人民抵抗征服者的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一贯效忠哈里发的萨曼王朝自身促进了建立统一的伊斯兰世界思想的传播,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之前曾成功地排除了民族主义和地方爱国主义的影响。居民服从劝导自己的精神领袖,他们使居民相信在那些形形色色的伊斯兰统治者只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斗争的地方,人们没有理由为了两种政权中的一方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特别是在这种场合下,当征服者的行为从宗教要求的观点来看并没有引起任何非难的时候。对此,一位同时代的人补充说:“这是汗王朝取

249

得胜利、萨曼王朝溃逃及其统治被推翻的主要原因之一。汗王朝的代表踏入布哈拉,他们表现得很好,对待臣民很仁慈。”贵族阶级的代表更不倾向于支持建立国家集权的政府,他们从一开始就与征服者达成了协议。

但是,地主贵族阶级打错了算盘,在王朝衰落的直接影响下,他们仅仅在短时期内能从出现的局势中捞取好处。经过这短暂的停顿之后,在萨曼王朝时代已经开始的德赫干阶层没落的过程又继续起来,并在哈拉汗王朝时代结束。在11世纪初,德赫干还被当做英勇的骑兵队而提及,到了13世纪在叙述与蒙古入侵有关的战役时,德赫干已经不再被提及了。我们没有关于德赫干衰落过程的资料,也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加速。有可能与封邑体系相连的骚乱引起了地产的贬值,但在此类现象中只有一个事实是有文字可考的,这就是布哈拉城市土地价格的跌落。随着德赫干阶层的衰落,大地产在突厥斯坦几乎完全消失了。在各突厥王朝统治时期,直至近代的乌兹别克统治时期,这里如同其他被突厥人征服的伊斯兰国家一样,实行的是一种类似采邑的体系,但是像各地一样,赏赐的东西不再是土地而是地租。服兵役的人从固定的地段得到收入作为报酬,他们居住在汗宫廷所在的首都,已经不再参与对那些从其中得到收入供自己支配的农村的管理,甚至不再参与土地的经营。

城市大概并没有由于突厥人统治地位的确立而遭受不幸,可能像在中世纪的欧洲一样,随着政治骚动而来的混乱会使居民从乡村流入城市。主要城市撒马尔罕没能保持住其在10世纪时带有城郊的规模,但它依然是一座大城市,直至最近在突厥斯坦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城市。据在蒙古入侵之后直接到过撒马尔罕的中国长春真人的说法,这时城中总共有2.5万户人家,但在蒙古入侵之前居民的总数是现在的4倍,也就是大约有10万户人家,或将近50万的人口。11世纪甚至13世纪的旅行家们所描写的撒马尔罕是一座拥有富庶的集市和大图书馆的城市。如同在波斯一样,在突厥斯坦11世纪时,城市的类型最终确立下来,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变化,有集市的街道

250

把城市从西向东、从南向北划分开来，在各条街道的交会处是带有集市的广场和中央圆顶的建筑（恰尔苏 чарсу）。

在蒙古统治时代之前，我们在突厥斯坦的历史上没有看到表明城市生活衰退的事实。在发生战役时有城市被毁坏的情况。除此之外，由于局部原因的影响，城市可能转变成乡村，而乡村也能够转变为城市。费尔干纳的马尔吉南10世纪时曾经是一个小城，12世纪成为"著名的城市"，但10世纪时比马尔吉南大得多的城市里什坦，却变成了"马尔吉南郊区的农村"。可能在主要城市的生活中产生了一些一般而言伴随着城市生活的增长而出现的现象。在主要的生活区域泽拉夫善谷地，重要城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与政权的关系取决于政府所在地。在萨曼王朝时期，布哈拉的居民被认为是政府统治的支柱，撒马尔罕（如同后来19世纪一样，历史又重演了）则是暴乱分子的集中地。哈拉汗王朝时期则恰好相反，它所依靠的是撒马尔罕的居民，而汗政权在布哈拉有时根本不被承认。12世纪，布哈拉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家族——"布尔罕家族"（这个家族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有一个绰号叫做布尔罕·阿德金，即"信仰的理由"），列伊斯（首领）[1]和布哈拉哈尼夫派的哈提卜（大清真寺中的传道者）都出身于这个家族，他们拥有响亮的萨德尔－只罕（世界支柱）的封号和大量物质财富。那个时代的诗人们把这些带着头巾的"伊玛目"与头顶"桂冠"的埃米尔（世俗统治者）相提并论。在12世纪的布哈拉，有时会由撒马尔罕汗建造一些建筑物，有时萨德尔－只罕又成了政权的唯一代表。我们没有掌握伴随这种动荡而来的争斗的资料，但是事实是很明显的，所有的萨德尔，除了第一位以外，都被认为是"受难者"，也就是都死于非命。13世纪初，萨德尔－杰罕布尔罕·阿德金·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直接向中亚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异教徒哈剌契丹的皇帝表示了顺从之意，这就意味着他完全摆脱了撒马尔罕汗的控制。关于萨德尔拥有巨额财富的

---

[1]列伊斯的概念当时还没有和警察权联系在一起，那时拥有警察权的是另外一种官员，叫做穆赫塔希布。

记载促使我们认为，他们所代表的富裕市民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下面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汗的政权被推翻之后爆发了反对萨德尔的人民运动，这一运动的领袖是一个出身于手工业阶层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卖盾牌的，不仅萨德尔遭到了驱逐和追捕，而且整个"体面阶层的人士"也遭到了驱逐和追捕。"戴头巾的人"，即伊斯兰学术界的代表跑到突厥斯坦异教徒统治者的斡耳朵去诉苦，他们得到了必要的公文，但由于此时哈剌契丹帝国随之覆灭，他们没能够利用这些公文。 251

在撒马尔罕，汗依靠人民群众与宗教界和突厥军事贵族阶层进行了斗争，就像后来的乌兹别克统治者经常依靠"萨尔特"与乌兹别克的世家大族进行斗争一样。对汗政权最沉重的打击发生在1095年，当时被突厥首领废黜的艾哈迈德汗因宣扬异端罪而被宗教界判处死刑。在撒马尔罕，汗深受人民爱戴，任何起义都没能获得成功，为了把汗骗出首都，策动阴谋者怂恿一位费尔干纳军事首领发动起义，汗前往镇压叛乱者，在进军途中被自己军队的叛乱首领抓获。汗与突厥首领和宗教界的斗争持续到12世纪。在汗政权的敌人当中还有撒马尔罕的列伊斯，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撒马尔罕事件爆发的原因至少一部分是与布哈拉事件爆发的原因相同的。撒马尔罕哈拉汗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奥斯曼汗受到人民的爱戴，他在1212年被花剌子模沙赫穆罕默德推翻并被处死。

参加这种政治斗争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高级僧侣阶层在生活方式方面与起源于前亚的德尔维希僧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后者在12世纪传入突厥斯坦并对人民生活产生了比从前德尔维希僧团更深远的影响。在突厥斯坦，如同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甚至摩洛哥一样，阿卜杜勒·卡迪尔·吉利亚尼（1166年死于巴格达）的追随者——卡迪里派的德尔维希僧团至今依然在传播，阿卜杜勒·卡迪尔·吉利亚尼是一个道德论传播者，他竭力通过提出更严格的道德要求来振兴德尔维希学派，在宗教教义学方面他遵循严格的正统派信仰。年长于他的同时代人哈马丹的优素福（死于1140年，被埋葬在梅尔夫郊区）也持这种教派的观点，阿卜杜勒·卡迪尔接受他的忠告在1127年第一次决定进行公开

布道。优素福是中世纪中亚德尔维希学派的创始人，许多在花剌子模享有盛誉并且对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传播产生影响的谢赫，如哈基姆·阿塔、苏莱曼·巴克尔加尼[1]和赛义德·阿塔都属于这个学派。 252 涅什姆·阿德金·库布拉是至今依然在花剌子模流传的库布列维僧团的创始人。12 世纪的艾哈迈德·亚谢维是突厥斯坦城（该城的旧称是亚西）的圣者，他的突厥语诗歌在中亚的突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塔什干圣者谢赫·安塔乌尔（也就是哈文迪·图胡尔——纯洁的先生）[2]，以及后来的布哈拉圣者巴哈·阿德金·纳合西班底（与帖木儿同时代的人）及其追随者是纳合西班底教派的创始人。该教派不单单在突厥斯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著名的霍加阿赫拉尔也是他的追随者之一，起初他是塔什干德尔维希僧团的首领（他出生在塔什干州巴古斯坦村），后来又成了撒马尔罕德尔维希僧团的首领。除了后者之外，这些谢赫中没有一位和政府发生过冲突。只有涅什姆·阿德金·库布拉的学生梅日德·阿德金·巴格达迪是根据花剌子模沙赫穆罕默德的命令被处死的，大概这是因为他与花剌子模沙赫的母亲达成了协议，花剌子模沙赫的母亲是充满叛乱情绪的突厥近卫军的首领。在德尔维希僧团的传说中，蒙古人的入侵就是上天对这次杀害事件的惩罚。

有关谢赫艾哈迈德·亚谢维及其学生的资料证明，中亚的德尔维希僧团在向草原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起了作用，就像现在德尔维希派的代表伊尚在游牧民中比在定居居民中拥有更多的追随者一样。以下关于草原居民在 960 年以后大批皈依伊斯兰教的资料来自于 1043 年那位历史学家伊本·阿尔·阿西尔的记载，他当时谈论的是一个人数不是很多的民族（总共只有 1 万帐左右），这个民族冬季居住在与七河流域楚河谷地相毗邻的地区，夏季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保加利亚人国家附近的草原上。但是，现在的吉尔吉斯[3]草原最终归附伊斯兰世界则要晚得多。13 世纪初，花剌子模的伊斯兰统治者可能还与居住在锡

[1]比较扎列曼《关于哈基姆·阿塔的传说》。

[2]关于此人，参见谢苗诺夫《塔什干的谢赫·哈文迪·图胡尔》。

[3]哈萨克。——Б. 加富罗夫

尔河流域和图尔盖州的非穆斯林钦察人打过仗，锡尔河流域的萨加纳克城或苏格纳克城（现在的苏纳克库尔干遗址）是他们的聚居地。

在突厥斯坦的文明区域，来自草原的移民可能在当地文明的影响下转变为定居人口，并且由于人数众多他们不仅保留了自己的语言，而且还在土著居民中传播了自己的语言。边区开始了逐渐突厥化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停止。大概塔什干是第一个用突厥名称取代了从前伊朗名称的城市，11世纪塔什干的名称取代了10世纪地理学家所提到的宾克特的名称。早在蒙古入侵之前，在泽拉夫善（卡拉库利）和花剌子模就遇到过突厥起源的地理名称，如同在泽拉夫善谷地一样，在花剌子模当地的伊朗方言不是被波斯方言所取代而是被突厥方言所取代。这一过程可能到 13 世纪蒙古人统治时代才结束。 253

中亚伊斯兰文明的载体仍然是萨尔特人，16 世纪以前这一术语在民族学的意义上指的是伊朗人。这个词本身起源于印度，最初的意义是"商人"，但是蒙古人使用这个词的萨尔塔克 сартак，萨尔塔克塔伊 сартактай（带有用于表示男性的后缀）和萨尔塔古尔 сартагул 形式，主要不是用来说明其民族和语言特征，而是用以说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特征。所以成吉思汗把统治七河流域北部的阿尔斯兰汗的葛逻禄王公称作"萨尔塔克塔伊"。一些流传到杭爱山脉的蒙古神话讲的是勇士萨尔塔克塔伊的故事，他建造了神奇的水坝以及类似的设施，这些传说是萨尔特人文明的反映。关于伊斯兰商人进入蒙古的最早记载属于 924 年，契丹帝国的创始人阿保机[1]（916—927 年）在这一年造访了鄂尔浑河上的喀拉和林，并在那里接待了大食"使团"，也就是阿拉伯或者伊斯兰使团（众所周知，中国人总是把商队的到来当做是使团的到来）。七河流域北部和伊宁边区一些大城市的形成是与伊斯兰文明的成就有关的，据伊斯兰和中国史料判断，那里从前没有城市生活。关于该地区城市的第一批可靠资料属于 13 世纪，1253 年圣芳济派修士鲁布鲁克经讲波斯语的穆斯林人口稠密的城市前往伊犁河以北地

〔1〕第一版印的是："Абао ки"，可能印错了。——Б. 加富罗夫

区。由于并不热衷于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穆斯林商人作为文明的代表甚至在征服了伊斯兰地区的异教徒统治者的宫廷中也拥有显赫的地位。突厥穆斯林多次成功地击退了“不信教”的游牧部落从东方的入侵，但在12世纪，契丹人成功地使七河流域和中国突厥斯坦的统治者臣服于自己。契丹人起源于蒙古[1]，被穆斯林称为“黑契丹”（哈剌契丹），他们是被通古斯民族赶出中国（中国的名称便来自于他们）北部的。1137年契丹人在苦盏击溃了撒马尔罕汗的军队，1141年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旺草原击溃了强大的塞尔柱苏丹桑贾尔，此后中亚的伊斯兰统治者直至13世纪初都是哈剌契丹最高统治者“古儿汗”的附庸。哈剌契丹人带来了他们从前在自己的故乡所掌握的中国文化并在其征服的区域中实行了中国按户征税的制度（每户征收1第纳尔，也就是1个金币，大致相当于5卢布）。但这个国家却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最后一位古儿汗的维齐尔是个穆斯林商人，叫马赫穆德·巴伊。13世纪初，穆斯林商人甚至操纵了蒙古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还在成吉思汗从东部蒙古出兵之前，在他的斡耳朵中就有穆斯林商人。

哈剌契丹国家的衰落部分是由于被成吉思汗从蒙古驱逐的乃蛮人的迁徙而引起的，部分是由于反对异教徒统治的穆斯林起义而引起的。这次穆斯林起义的首领是花剌子模沙赫穆罕默德。胜利者彼此之间又因瓜分战利品而展开争斗，此外，穆罕默德又引起了被他解放的突厥斯坦穆斯林对自己的反对，被迫于1212年用血腥手段镇压了由撒马尔罕汗奥斯曼完全按照自己人民的意愿发动的反对花剌子模人的起义。根据伊斯兰史料记载，花剌子模沙赫被迫把外锡尔河的一些地区让给了乃蛮屈出律，并且他事先将这些地区焚掠一空，然后带领居民随自己迁往西南部。可能这则史料有所夸张，至少1221年11月路过这里的中国长春真人提到塞兰城以及在塞兰城和锡尔河岸之间的两座城市时，没有谈到那里有任何被焚掠一空的痕迹。

统治七河流域和锡尔河部分地区以及喀什噶尔几年的乃蛮屈出

---

〔1〕参见前面第48页，注释2。——B.罗莫金

律,像自己的绝大多数人民一样,是一个基督徒。在哈剌契丹帝国,他误入偶像崇拜的歧途,可能成了一名佛教徒。在他统治时期,中亚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迫害伊斯兰教的运动,至少在东突厥斯坦地区是如此。他在和田处死了一位首席伊玛目,并完全禁止穆斯林的公共礼拜活动,穆斯林被命令穿上哈剌契丹的服装,他还在穆斯林家里安置士兵监督这一命令的执行。很显然,虽然从前哈剌契丹的穆斯林臣民彼此之间不和睦,但新统治者依然认为伊斯兰教是对自己国家的威胁,他害怕他们会为了信仰而发动反对他统治的起义,就像从前发动反对古儿汗统治的起义一样。自然,屈出律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居民(据13世纪的记载,当时伊斯兰教占优势的区域是从伊宁边区的东部边界开始的)就像迎接解放者那样迎接1218年成吉思汗派出的军队,他们杀光了屈出律安置在居民家里的士兵,并协助蒙古人迅速取得了胜利。

255

还需要关注突厥斯坦历史上在前蒙古时期最后几个世纪出现的一种现象,历史学家们没有论及这种现象,我们只能根据流传到今天的文物资料来作出分析,这就是货币体系的紊乱。11世纪,在突厥斯坦开始的白银危机[1]逐渐蔓延到整个亚洲的伊斯兰世界,这一进程是随着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即使不是在政治上)成为伊斯兰亚洲的组成部分开始的。人们冲制铜币来代替从前的银币迪尔亨姆,铜币也被称作"迪尔亨姆"。由此可见,它们应该具备流通硬币的功能。在前亚,铜迪尔亨姆冲制得较晚,结束得较早,在蒙古入侵之前那里的迪尔亨姆还是用白银冲制的。在中亚,铜迪尔亨姆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仍继续冲制,只是到了13世纪下半叶才逐渐恢复银本位制。除了铜币之外,从11世纪起还开始冲制金币第纳尔,但在10世纪的萨曼王朝国家承自前蒙古时期的银本位制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只有银币被视为是货币,黄金只是商品,也就是按照重量定价。因此,在从前拜

[1]关于在所谓白银危机时期(11—13世纪)中亚城市的货币流通和经济生活情况,参见达维多维奇《所谓"白银危机"时期中亚的城市、手工业和货币流通》。——B.罗莫金

占庭帝国的区域内，拜占庭的金本位制继续占统治地位。在冲制金币或银币的时候，预先规定1第纳尔相当于20迪尔亨姆，黄金与白银的实际比率在各个时期是各不相同的。波斯和前亚银本位体制转变为金本位制对同时代的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尚且不知。不管怎么说，11世纪和稍晚些时候在这些地区冲制的第纳尔，其重量和成色都逊色于哈里发和埃及的第纳尔，都不能像埃及法蒂玛王朝的第纳尔那样，成为与拜占庭索里德一样的世界性货币。货币体系的紊乱大概并没有影响对外贸易的规模，当时对外贸易已经覆盖到越来越广阔的地区，并对那些与前亚文明有往来关系的民族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比如，伏尔加河上的保加尔城，在10世纪时其实还是游牧民族的大本营，在蒙古人统治时代则变成了一座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石头城。当然，贸易的性质大概发生了变化，贸易越来越变成易货贸易，但在11世纪初期之前，就像出土文物所显示的那样，在俄罗斯仍有大量的东方银币。

突厥斯坦王公在被他们占领的地区内当然要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他们的宫廷里有波斯诗人，而且他们自己也写波斯诗歌。在突厥斯坦的主要文明区域，我们没有发现在前蒙古时期有任何使用突厥语创作文学作品的尝试，像艾哈迈德・亚谢维的诗歌和苏莱曼・巴克尔加尼的格言这样的作品都属于伊斯兰传教士文学，它是伊斯兰教传播者为突厥普通百姓创作的，没有受到任何官方的影响和支持。在蒙古入侵时期，有人为最后一位花剌子模沙赫贾拉勒丁（其实他在花剌子模也没有行使过统治权）创造了突厥语语法，当然可以把此视为是对这位王所属民族的某种关注。在喀什噶尔还在11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位出生在七河流域的人用突厥语创作了一部说教长诗——《福乐智慧》，但这与突厥民族那些主要充满了波斯道德水准和笃信伊斯兰教精神的历史传说没有任何关系。直到最近这部长诗只有两种抄本为世人所知：一种是15世纪的赫拉特抄本，后来流传到君士坦丁堡，欧洲人在这里结识了这一抄本；另一种是凯伊尔抄本。最近在纳曼干又发现了第三种抄本。1909年，在乌拉尔河的萨莱奇克发现了一个上面带有铭文的陶土罐，其中就有引自《福乐智慧》的诗句，由此可见，这部长

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传播比我们根据数量有限的抄本所想象的传播程度要广泛得多。虽然伊朗文明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但是突厥斯坦统治者仍然没有丧失与自己同民族的人及其语言之间的联系，哈拉汗王朝的代表直至其统治的最后时刻依然带有突厥封号，此外，在官方术语中，在“苏丹的苏丹”这一封号中，甚至在“维齐尔”（大臣）这个词中还加上了突厥形容词乌鲁格（伟大的）。 257

4 蒙古人的统治

征服突厥斯坦的蒙古人在13世纪还是异教徒,他们以人做祭品,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文明水平比10世纪时的哈拉汗王朝还要低得多。蒙古人的入侵伴随着城市的破坏和可怕的毁灭,但蒙古军队的行动并非是我们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以及此后时期所看到的那种文明衰退的主要原因。城市和整个区域从军事破坏中恢复的速度比较快。我们知道这样一些例子,有一些城市因进行过顽强抵抗,因杀害了蒙古王子或使臣而遭到特别惨重的破坏,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但这些城市后来又复兴起来并存在了几个世纪,而在那些居民自愿归顺征服者从而使其城市免遭入侵的地方,城市生活经过数十年之后则完全衰落了。征服时期在锡尔河下游的城市中苏格纳克城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因为杀害了蒙古使者,那里的居民全被杀光,但是在14世纪上半叶,这个城市又重新开始冲制硬币,苏格纳克城也存在到17世纪,而当时这一地区那些在征服时期遭受破坏较少的其他城市却早已荒废了。另一方面,七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东部的城市根本没有遭受征服之苦,蒙古人在那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所以没有一座城市遭到破坏。但在13世纪50年代,也就是在蒙古人到来30年之后,一些城市趋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游牧民族牧场的扩大。[1] 14世纪,伊犁河、楚河谷地、楚河和塔拉斯河之间的城市以及塔拉斯河上的城市也完全衰落了。16世纪,它们只剩下一片遗址,并且那时有些城市的准确位置已经不为人所知了,也说不

258

[1]B. B. 巴托尔德在此客观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游牧民族经常性的征服包括蒙古人的征服所导致的繁荣的绿洲变成草原和城市的灭亡,与其说是征服时期所发生的破坏的直接结果,毋宁说是由于后来的经济原因造成的。对此卡尔·马克思概括性地指出,对游牧民族而言,"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12卷,第1册,第188页)。——B. 罗莫金

出哪一个遗址对应的是哪一座城市。如果由于政治骚乱和从总体上看缺乏强有力政权的保护,城市居民不能有效地反对抢掠者[1],那么相邻游牧民族经常性的入侵给城市物质生活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要大于强有力征服者的到来所造成的后果,虽然他们从数量上实力上看都是微不足道的。后来在毗邻草原的土库曼文明区域中,城市生活的消亡正是由于这种游牧民族慢慢地占据统治地位的过程而引起的,这一过程直至18世纪才结束,那里并没发生轰动一时的征服行动。所以,文明的衰落主要不是由蒙古征服时期的破坏导致的,而是由于伴随着蒙古人入侵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迁徙以及中亚建立强有力国家政权的努力遭到失败而造成的。

蒙古帝国的形成并不像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那样伴随着民族迁徙。[2] 绝大多数的蒙古人民在蒙古帝国形成后留在了蒙古,成吉思汗本人也返回了蒙古,他的继承人在那里的鄂尔浑河为自己建立了首都。帝国被视为是整个大汗家族的私有财产,成吉思汗作为家族的首领,就像主人一样来支配整个帝国,他在世时便把征服来的土地分封给自己年长的儿子,把自己主要的禹儿惕也就是蒙古本土作为遗产留给了小儿子。同时他的小儿子还得到人数为10.1万人的蒙古正规军,这支军队的总人数为12.9万人。只给他那些受封的儿子留下为数不多的军队,其中与突厥斯坦有关系的两个大点的儿子术赤和察合台(Чагатай)分别得到了4000人的军队。封地的远近是与王子的年龄相当的,由此长子术赤的封地随着蒙古人所征服土地的扩张不断地向西移动,在西部"蒙古骑兵的马蹄所到达"的所有土地都是他的封地。术赤的大本营(斡耳朵)在额尔齐斯河,虽然根据某些史料记载,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更靠近西面的钦察人(波洛韦次人)的国家度过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萨雷苏河流域现在阿克摩林斯克州和图尔盖州的交界处

---

〔1〕在B.B.巴托尔德的这一论断中对蒙古征服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传统的资产阶级史学所宣传的关于游牧民族只是抢掠者的观点不符合历史真相,B.B.巴托尔德论断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B.罗莫金

〔2〕比较前面第150页,注释5。——Б.加富罗夫

发现了他的陵墓。察合台的斡耳朵在伊犁河以南的伊宁边区,他的继承人皈依了伊斯兰文明,逐渐把自己的居住地迁移到锡尔河流域和更往西的泽拉夫善河、卡什卡河及阿姆河流域。无论是术赤、窝阔台,还是他们的继承人都没有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的国家。成吉思汗并没有留下关于明确划分封地界限的命令,关于术赤和察合台支系的主要代表对这两支其他后裔的权力,以及整个帝国的首脑大汗对大汗家族成员的权力都规定得很少。无论是在戴克里先之后的罗马帝国,还是在蒙古帝国,我们都看到建设统一帝国的思想是与同时并存几个最高统治者的局面混合在一起,所不同的是在蒙古人那里这种秩序源自于氏族私有制的思想。家族及其财产构成一个整体。一个人如果他的权威得到了所有人的公认,他就可以管理公共财产,就像成吉思汗在世时那样,或者由家族几位代表及其全权代表组成的会议也可以管理公共财产,就像在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统治时代(1229—1241 年)那样。不管封地位于何处,作为帝国主要财源的文明区域的统治者都是由这个人或这个会议任命的。这些统治者虽然获得了最高统治者所授予的全权,但他们也应该对当地的王子们有所顾忌。随着家族团结的削弱,经常有机会控制地方军事力量的当地王子的权威逐渐超过了地处遥远的大汗的权威。当地王子们的大本营变成了国家的首都,有时他们承认大汗(从 13 世纪 60 年代起,他们把自己的住地由蒙古迁移到中国)拥有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最高权力,虽然这种承认只是表面上的,有时他们又否认这一点。

帝国统一受到削弱的最初信号还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经出现,他当时打算组织军队讨伐在自己的领地内过于一意孤行的术赤。但由于传来了术赤死亡的消息,所以停止了进军的准备工作,术赤是在他父亲去世(1227 年)的前半年去世的。术赤封地的最高权力转移到他的次子拔都手中,拔都和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达成了协议。向俄罗斯和西欧进军是整个帝国的事业,不仅术赤的后代参与了这一事业,而且整个汗家族所有支系的代表也都参与了这一事业。在参与这次远征的王子中间发生了争执,这一次窝阔台的公正防止了一场两败俱伤的内

讧,他站在拔都一方反对自己的儿子贵由。在贵由短暂的统治时期 260
(1246—1248 年)发生了贵由的西征和拔都的东征,显然这两次征讨都带有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敌对意图。贵由大概在军事冲突发生之前死在了乌伦古河附近的地方,拔都及其军队当时正驻扎在伊犁河谷。在拔都的影响下最高权力转到了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这一支的手中,发动政变的这一派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便成功地镇压了自己的敌人——察合台和窝阔台的后裔。王子们在蒙古被逮捕,1251 年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受审,被指控犯有密谋串通罪。巧妙地分割了占据着从奥特拉尔附近的锡尔河直至七河流域北部的术赤后裔的军队,以及占据从鄂尔浑河上的喀拉和林直至东突厥斯坦古城的拖雷后裔的军队,这迫使其余的中亚王子们没经抵抗便乖乖地驯服。实际上帝国现在有两个人在发号施令,一个是拖雷之子大汗蒙哥,另一个是拔都和继他之后他的弟弟别儿哥,虽然在西部的钱币上冲制的是蒙哥的名字。帝国统一的思想在外部事务中得以体现,如同这一时期在征服前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1260 年,帝国的统一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在蒙哥的两个弟弟之间爆发了争夺王位的武力冲突,其中一位在蒙古自立为王,另一位宣布在中国自立为王,两人都竭力要使中亚臣服于自己,并把察合台系王子们派到那里,察合台系王子成功地在中亚巩固了蒙古的国家政权,当然这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察合台系王子们不得不把最高权力让给窝阔台的孙子海都,1269 年海都在塔拉斯河畔召集盟会,宣布在中亚建立一个特别的蒙古国家,这个蒙古国家通常与在中国、波斯和东欧形成的其他 3 个蒙古国家处于敌对状态。

在 14 世纪初,海都的儿子和继承人察八儿被察合台的后裔都哇推翻,此后察合台一词便成为标志中亚蒙古国家的正式术语。构成“察合台”国家军事力量的游牧民族根据王朝祖先的名称被称为察合台人。后来在帖木儿及其后继者的国家中最终形成的中亚突厥标准语也被称为“察合台”语。成吉思汗其他的儿子没有一个身后能在人民的记忆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可能在术赤后裔的领地中,前蒙古时期

的遗产钦察一词作为一个地理和政治术语还在继续使用。后来在这些领地东部地区形成的一个突厥游牧民族根据术赤后裔中一位汗的名字，把自己称为"乌兹别克人"，正是在这位汗在位时期最终确立了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1] 关于察合台国家与其邻居之间边界的第一份资料是1331年的一幅中国地图。在这幅地图上把连同达尔干城和恰特城在内的花剌子模南部(带有老乌尔根奇城的北部属于术赤后裔的领地)，包括锡尔河两岸直到奥特拉尔，也包括俄罗斯(除土库曼以外)突厥斯坦的其他文明地区以及连同伊宁边区至卢克春在内的中国突厥斯坦的其他文明区域，都划归察合台汗国。库木尔城或哈密城是中国的领地。

261

在14世纪初以前虽然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变革，但中亚文明地区的管理权依然掌握在同一个来自于花剌子模的穆斯林家族手中，该家族是这一地区的商人。有资料表明，马赫穆德·亚拉瓦奇和他的儿子马苏德·伯克只是在蒙古人征服花剌子模后也就是1221年才为成吉思汗服务的。更合乎情理的是马赫穆德·亚拉瓦奇就是那位早在1218年就作为成吉思汗的使者到过花剌子模沙赫穆罕默德那里的花剌子模人马赫穆德(亚拉瓦奇这个词在突厥语中的意思就是使者)。甚至很有可能马赫穆德·亚拉瓦奇与哈剌契丹最后一位古儿汗的大臣马赫穆德·巴伊是同一个人。在蒙古征服之后，马赫穆德·亚拉瓦奇一度管理过马维兰纳尔，住在苦盏。很有可能在苦盏附近峡谷的峭壁上以"埃米尔马苏德"的名义雕刻的铭文(上面的日期为624年萨法尔月，1227年1—2月)就是他儿子马苏德的。察合台强行把马赫穆德从他的领地赶走，他弟弟窝阔台皇帝的最高权力由此而受到损害。考虑到在成吉思汗和术赤死后察合台作为家族中长者的影响，窝阔台满足于兄长的正式道歉，并把自己的总督调往北京任职，1254年他死于北京

---

〔1〕现在都认为，乌兹别克这一民族名称的起源还没有最终查明。这一名称起源于金帐汗乌兹别克的名字只是一种假设，是否正确还有待研究(参见谢苗诺夫《论昔班尼汗乌兹别克人的起源及其构成》，第9页和第35－36页)。关于大概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被称为乌兹别克人的突厥部落，参见《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第1册，第373－375页.——B.罗莫金

任所。马赫穆德的儿子马苏德·伯克代表大汗管理中亚的文明区域，从中国突厥斯坦的古城到花剌子模的地区都归他管辖。在窝阔台统治末期被统治者任命的马苏德·伯克，在1251年政变之后拖雷和术赤后裔统治的双头政治时代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权力。在他的管理下，处于大汗蒙哥管辖范围的地区与拔都及其之后他弟弟别儿哥的领地连成一体。60年代，试图在中亚建立一个独立蒙古国的察合台系王子们首先 262 批准了对这位马苏德·伯克的任命，之后在1269年完成这一使命的海都也批准了这一任命。马苏德·伯克1289年死于布哈拉，他被埋葬在他在该城所建立的迈德赖塞中。他死后他的3个儿子挨个担任了统治者，其中最后一位是在702/1302—1303年任职的，住在喀什噶尔，这已经是海都的继承人察八儿的统治时期了。

1269年的盟会决定采取措施保卫文明地区免受游牧民的侵犯。汗家族每一位成员都可以从乡村的耕地和城市手工工场的进款中获得自己的一份收入，这一权利不受任何人的挑战。只是要竭力达到这样的目的，即收入给王子，但他们却不能干涉这些收入的征收工作，也就是不能参与对文明区域的管理，只满足于在山区和草原消夏和过冬，不到耕地去。还在14世纪初期便推行了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全面管理整个文明地区的首领是一位穆斯林商人，他是由国家首脑任命的。此外在某些地区和城市还有自己的自治统治者，他们出身于前蒙古时期的世袭王公家族（梅利克）或高级贵族阶层（萨德尔）。甚至在最靠近察合台诸王子斡耳朵的伊宁边区也继续由住在阿尔马雷克城（在伊宁西北）的当地世袭王朝来行使统治权。根据海都和察合台王子的首领都哇的命令建立了安集延城。这显而易见地证明，中亚蒙古国最高当局采取了支持城市生活的措施。这些新建城市的生活与从前城市的生活有多少差别，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15世纪末，安集延与绝大多数费尔干纳城市的区别在于突厥语在这里占据优势地位。不管怎么说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选择得非常成功，因为安集延成了费尔干纳的首位城市，并且一直把这一地位保持到18世纪。14世纪初，七河流域的城市生活还没有消失，例如巴拉沙衮城还存在，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措

施扶持尚存城市和重建已经消失的城市。

14世纪的到来终结了这个在中亚文明史上比较幸运的时代：如果金帐汗不是满足于收取贡赋，而是迁移到俄罗斯公国境内定居的话，那么突厥斯坦也会遭受与俄罗斯同样的命运。伊斯兰文明早已对中亚的汗产生了吸引力。一度在1266年执政的察合台的曾孙木八剌沙就是一位穆斯林。有代表性的是，这位王子不是在那些较少接触到文明的区域被宣布为察合台系首领，而是在突厥斯坦的主要区域之一安格连河畔被宣布为察合台系首领的，而察合台及其绝大多数继承人的斡耳263 朵都位于那些较少接触到文明的地区。夺取了木八剌沙王位的木八剌沙的继承人——八剌[1]汗在主要的穆斯林区域之一即恰甘尼安（苏尔汉谷地）拥有世袭领地，但他只是在自己生命的晚期——1270/1271年冬才在塔什干皈依了伊斯兰教。此后在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察合台汗再也没有尝试过把自己的住地设在马维兰纳尔。只有怯别汗（1318—1326年）看中了卡什卡河谷地，1220年成吉思汗曾在这里度夏，后来蒙古军队首领的大营也曾设在此处。怯别汗为自己建造了宫殿，卡尔希（卡尔希是蒙古人从回鹘人那里借用来的词汇，意思是宫殿）城——从前的纳赫舍卜或涅谢夫（阿拉伯人的叫法）便因此而得名。现代卡尔希以南的佐哈基莫罗恩遗址相当于14世纪时的城市，怯别汗建造的宫殿就位于距该城2法尔萨赫即大约12俄里处。位于现代卡尔希城西北部16俄里处的舒卢克捷配遗址相当于前蒙古时期的纳赫舍卜。历史学家们称赞怯别汗是一位正义的国王，是穆斯林的庇护者，虽然他自己还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但是很有可能我们在帖木儿时代所看到的那种生活制度是从他统治时期起开始实行的，这种制度与14世纪初的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地方自治为国家集权所取代，国家集权的外在表现就是以汗的名义冲制了全国性的货币，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以当地梅利克的名义冲制货币。推行了从前在波斯的蒙古人那里实行的银本位制。以前金币的名称第纳尔为面值大的银币所采用，1

[1]巴拉克。——Б. 加富罗夫

个银币相当于6个小面值的货币(迪尔亨姆)。1迪尔亨姆的重量是1/3所洛特尼克,1第纳尔的重量是2所洛特尼克。在帖木儿时代这些货币以怯别汗的名字被称为怯别币。但是集权制还没有被运用于管理当中,权力依然掌握在地方世袭统治者手中,所不同的是外来的突厥蒙古家族首领取代了土著的梅利克和萨德尔。迁徙到文明国家并为自己建造了宫殿之后,汗与草原传统断绝了联系,这自然在游牧民中引起了动荡的情绪。为了安抚不满情绪并争取主要家族代表站到自己一边,汗大概说服他们仿效他那样安置自己的生活,并使他们明白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是有利的。在察合台汗国如同在后来的乌兹别克汗国一样出现了一种新的与以前有着本质区别的封邑制度,原因就在于此。在这种新的封邑制度下,封地不再分封给汗家族的代表,而是分封给构成国家军事力量的主要突厥蒙古家族。像成吉思汗的其他儿子(除拖雷以外)一样,察合台也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得到了4000名本土的蒙古兵。一个千人队的首领来自于巴尔拉斯部落,另一个千人队的首领来自于札剌亦儿部落,另外两个千人队起源于哪个部落,拉施特·阿德金没能搞清楚,他是论及这种分封的唯一史料的作者。14世纪中叶,马维兰纳尔的封地就属于札剌亦儿和巴尔拉斯家族,并且札剌亦儿家族的封地在锡尔河流域,包括主要城市苦盏;巴尔拉斯家族的封地在卡什卡河流域,包括首位城市沙赫里夏勃兹。还提及了另外两个家族,很有可能这两个家族就起源于察合台另外两个千人队的首领。这两个家族就是位于阿姆河北部的前布哈拉汗国东部地区的考钦氏,和位于阿姆河南部的阿儿剌氏。

264

怯别汗及其继承人的行为引起了跟随汗迁徙到马维兰纳尔的家族和部分留在国家东部的游牧民之间的离心倾向,怯别汗继承人中的塔尔麻失里汗(1326—1334年)就是一位穆斯林,他最终确立了伊斯兰教在中亚蒙古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结果引起了暴乱,塔尔麻失里汗的统治被推翻,汗的住地重新迁移到东部近10年。这些暴乱可能给七河流域和锡尔河东部地区的城市生活以彻底的打击。国家陷入这样一种状态,时人和目击者对这种状态进行了直观的描述:“远远看到了建造考

究的村落，村落四周鲜花盛开绿意盎然。满以为能遇到住户，但走到近处看到的却是空荡荡的房屋。国家的所有居民都是游牧民，根本不从事农耕。”

14 世纪 40 年代，我们在马维兰纳尔重新看到了察合台汗。其中的一位哈利尔是出身于汗家族的德尔维希，他先与穆斯林上流社会的代表——铁尔梅兹的赛义德结成同盟反对蒙古人，后又与他们分道扬镳。哈利尔的兄弟合赞汗以怯别汗为榜样，在卡尔希附近离城稍远的地方（在城的西面，离城有 2 天的路程）为自己建造了宫殿。但在这之后，汗很快便被定居在马维兰纳尔的世家大族的首领们发动的起义所推翻。大约同时，杜格拉特家族的首领崛起于察合台汗国的东部，其家族的封地包括喀什噶尔和伊塞克湖以南七河流域的部分地区。无论是马维兰纳尔世家大族的首领，还是杜格拉特的伯克都扶植傀儡汗继位。无论是来自西部还是来自东部的试图重新把前察合台汗国的领地统一起来的努力都没有取得巩固的成果，甚至帖木儿也没能使东部地区臣服于自己。

265

定居于马维兰纳尔的世家大族认为自己是国家思想的载体，构成马维兰纳尔军事阶层的游牧民即使在出身于察合台后裔的汗连傀儡汗都当不上时依然称自己为察合台人。察合台人把自己即真正汗的军队与东部地区的游牧民詹捷对立起来，詹捷是一个蒙古术语，相当于突厥哥萨克，意思是与国家、家族和部族断绝了联系的类似强盗的自由流民。东部地区的游牧民则认为自己才是蒙古游牧传统的忠实维护者，他们把自己称为蒙古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作蒙兀儿斯坦。察合台人在他们的眼中是卡拉乌纳斯，即杂种——血统混乱的乌合之众，就如同后来希瓦汗国的乌兹别克人把布哈拉埃米尔的士兵叫做塔吉克人一样。

这样，察合台人和蒙古人从国家和民族或日常生活这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都是草原传统的捍卫者。但当然某些察合台人可能在更大程度上竭力表现出与草原文化不同的特点，更重视伊斯兰教的国家思想和伊斯兰文化，并且城里人和农村人、上层社会和人民群众对伊斯兰理想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在帖木儿及其后继者史中可以对所有这些成

分的活动进行相当清楚的研究。在帖木儿年轻时代，蒙兀儿汗秃黑鲁帖木儿利用察合台汗国家族内部的纷争，一度使马维兰纳尔臣服于自己。察合台首领在与蒙兀儿人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并逃亡引发了突厥斯坦主要城市撒马尔罕的民主运动，政权曾一度转入能够击退蒙兀儿人[1]入侵的大学生和工人之手。察合台首领们借此机会返回马维兰纳尔。民主运动不是被公开镇压的，而是被阴谋镇压的。运动的领导人被告知，政府十分赞成他们的行动并完全信任他们。这使运动的领导人放松了警惕，他们被引诱到察合台阵营中来，最终遭到镇压。就在同时，花剌子模利用术赤和察合台国家解体之机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政治独立，由突厥化的昆格拉特家族建立了一个地方王朝。这个王朝的代表所依靠的不是游牧传统，而是伊斯兰教的思想。货币上冲制的不是当地统治者的名字而是“权力属于真主”的字样，以此来强调伊斯兰教的神权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证明拒绝臣服察合台人是正确的，因为察合台人并不被认为是真正的穆斯林，就像察合台人自身不认为蒙兀儿人是穆斯林一样。察合台人自身很快便受到了伊斯兰文明以及与此相连的伊斯兰理想的影响，他们的主要埃米尔或扶植傀儡汗继位但实际上控制着国家的伯克们一个接一个地在城市为自己建立据点并在它的四周建上城墙。他们的对手往往利用这一点，以游牧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来反对他们，但是一旦起义获得成功，他们也效法被其推翻的前任。崛起于巴尔拉斯家族的帖木儿就是这样做的，他首先在卡什卡河谷地的沙赫里夏勃兹和卡尔希城中建立了堡垒，在自己的独裁统治确立之后他又在撒马尔罕建立了堡垒。帖木儿依靠察合台的军事力量，但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巴尔拉斯家族，清除了与他敌对的家族。他废除了那种主要的察合台家族拥有封地的封邑制度，重新恢复了只在统治家族的代表中实行分封的制度，并且一般来说只有费尔干纳才是突厥斯坦的特殊封地，不受撒马尔罕的管辖。帖木儿依然忠于草原国家的

266

〔1〕关于1365年撒马尔罕的谢尔别达运动，参见巴托尔德《1365年撒马尔罕的民族运动》。——B.罗莫金

思想,并扶持傀儡汗继位。有一则关于他的神话,似乎说这种权力来自于他在成吉思汗及其早期继承人时代的祖先们。同时帖木儿竭力把文明的居民,特别是其中的上层和宗教代表中那些就其自身的作用而言相当于12—14世纪萨德尔的那些人,吸引到自己一边。他所有征服活动的矛头都指向了文明的前亚地区。只有在那里他才采取了巩固自己政权的措施并把封地分封给自己的家庭成员。他向草原地区的进军仅仅具有侵扰的性质,只是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由于打算远征中国,他才决定在蒙兀儿斯坦设立那样的封地。帖木儿竭力让自己在建筑和灌溉工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活动如同他的毁灭性行动一样使同时代的人感到震惊。帖木儿对伊斯兰城市文明的向往清晰地表现在他在撒马尔罕周围建立了一些用前亚和埃及主要城市命名的村落:苏丹尼亚、设拉子、巴格达、大马士革、米斯尔(开罗)。

帖木儿的死亡(1405年)中断了他在中亚所推行的政治计划,其中包括进军中国的计划,但在帖木儿后代的统治下,马维兰纳尔和波斯某些地区的统一仍然继续存在了数十年。在其中的某些统治者执政时代,特别是在帖木儿的儿子沙哈鲁统治时代,伊斯兰教的国家思想取得了对草原思想的绝对优势。沙哈鲁尽可能地想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和"伊斯兰教的苏丹",这位"伊斯兰教的苏丹"是受真主本人之托为了穆斯林的福祉、为了执行宗教命令而统治穆斯林的,并且在末日审判时他要为此承担责任。这样的理想更贴近人民大众,而不是更贴近有文化的社会阶层,其中包括人民群众难以理解的抽象神学的代表人物。苦行修道的神学家,即从12世纪开始在突厥斯坦确立自己地位的正统派德尔维希派就是这一理想的代言人。从纳合西班底教派中产生了一位精力充沛的政治活动家——霍加阿赫拉尔,他的活动对突厥斯坦后来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位被城市文明的拥护者称为"乡村谢赫"的人,与不完全符合宗教命令的文明生活进行了斗争,这种文明生活是由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在被他引进到撒马尔罕的学者以及当地抽象神学代表人物的推动下推广起来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霍加阿赫拉尔从帖木儿的后裔中推举了另外一位汗位继承人,这位

267

继承人在草原乌兹别克人的帮助下成功地夺取了胜利，当时草原乌兹别克人在锡尔河下游最终站稳了脚跟。1469 年之后，突厥斯坦再也没能在同一王公的治理下与波斯的一些地区统一起来，这导致了文明的大衰落。赫拉特取代撒马尔罕成为文明活动的集中地。甚至当时模仿波斯诗歌创作了“察合台”诗歌的最有才华的诗人也住在赫拉特，虽然呼罗珊很少有讲突厥语的市民。兀鲁伯在撒马尔罕建立的天文台在他死后也立即停止了活动。关于突厥斯坦经济状况的资料证明：与前蒙古时期相比，这里的经济已经急剧地衰退了。例如，在谈到费尔干纳时说“在管理很好的情况下”费尔干纳的收入仅仅够供养一支 3000 至 4000 人的军队。既没有提到金属加工工业，也没有提到石煤的开采。在帖木儿死后，花剌子模重新从撒马尔罕获得了独立治理权，并且当时成为赫拉特领地的组成部分，那里的文明活动条件要好一些。但花剌子模深受草原乌兹别克人入侵之苦，分裂为一些独立公国的帖木儿帝国已经无力反击草原乌兹别克人的侵略。

268

5　乌兹别克汗国

16世纪乌兹别克人最终在突厥斯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1510年，第一位征服马维兰纳尔和花剌子模的征服者昔班尼汗在与波斯人的斗争中丧生，由此而引起了政权的一度中断，此后便形成了两个划分为封地的乌兹别克国家，一个在马维兰纳尔，主要城市是撒马尔罕；另一个在花剌子模，主要城市起初是老乌尔根奇。在这两个国家中，国家生活的基础都是草原传统，国家被认为是整个汗家族的私有财产，汗家族的成员都被称为苏丹，其中一位家族的首领被宣布为"汗"。家族中的长者对汗国拥有优先权，但这一原则时而也会遭到破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情况，这就是当某一位汗在位的时候，那些最强有力的苏丹也会采纳汗的封号。那时在马维兰纳尔占统治地位的封邑制度与14和15世纪罗斯的封邑制度最为相像。国家被分割为几个大公国，而这些大公国同样也被划分为更小的封邑。最小封邑中的王公随着自己年长亲属的死去可以转变为更大封邑的王公。撒马尔罕主要是汗的城市，就像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是大公的城市一样。但被全体乌兹别克人国王所宣布的领主并不总到撒马尔罕去，有时他发现留在自己从前的领地对自己更为有利，在那里他拥有充足的并且更可靠的力量。撒马尔罕首都的地位并不妨碍汗有时住在巴尔赫、塔什干，特别是住在布哈拉，就像在俄罗斯甚至当弗拉基米尔仍然是大公的城市时，俄罗斯的大公们也能住在特维尔，特别是住在莫斯科。以汗的名义冲制了通行全国的货币。突厥斯坦首都的地位逐渐转移到了布哈拉，还在16世纪的时候，那些最强大有力的乌兹别克汗便把自己的名字与布哈拉联系起来。

在布哈拉，游牧国家的军事制度并没有像在花剌子模那样给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打上深刻的印记。波斯语的文学创作工作在继续进

行,在乌兹别克人统治时代,中亚的历史文献数量和质量都高于从前几个世纪,突厥语的翻译文学和模仿文学的创作工作其中包括历史文学的创作也在继续进行。不仅游牧强国的思想对国王产生了影响,而且伊斯兰的国家思想也对国王产生了影响。乌兹别克统治的创始人昔班尼在自己冲制的货币上就自称"仁慈的哈里发,时代的伊玛目"。竭力以宗教法——沙里亚的精神来治理国家就与这一思想有关,这种努力使国王与人民群众及其思想代表——德尔维希僧的关系比国王与上层社会的关系更紧密。从这一观点来看,吾拜都拉汗(从1512年开始统治布哈拉,1533年成为所有乌兹别克人的首领,死于1539年)是一位富有虔诚穆斯林精神的理想统治者。国家体制仍然是游牧国家的体制,但其中宗教代表与世袭游牧民首领一样,也拥有荣耀的地位。例如,在新君登基时保留了一种从蒙古人那里继承来的在毛毡上将其抬起的异教徒仪式,但在履行这种仪式的时候也有德尔维希谢赫参加。然而,经常性的暴乱和王公之间为争夺封地而进行的斗争,使得某些统治者不可能实现做一个关心自己臣民福利并保护他们免遭任何敌人侵害的正直而强有力的君主的理想。阿卜杜拉汗(统治布哈拉,实际上从1557年开始成为乌兹别克人的首领,1583年被宣布为汗,死于1598年)的统治是唯一的一个例外,他不仅成功地将马维兰纳尔的所有乌兹别克公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且还把花剌子模和呼罗珊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虽然是通过极端残忍的方式,他成功地把军人的荣耀与国家组织者的荣耀结合起来。他采取了恢复和改善货币体系、灌溉工程以及公益建筑等方面的措施。现在所有那些有点名气的建筑物遗址在民间传说中都是与帖木儿的名字或阿卜杜拉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阿卜杜拉汗建设国家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巩固的成果。他建立的国家在他死后立即就四分五裂了。昔班尼家族的统治结束之后政权转到了新王朝——阿什塔尔哈尼王朝或贾尼王朝手中。在阿什塔尔哈尼王朝统治初期,我们看到的封邑制度与从前一样,国家是在汗家族的成员中进行分封的。在论及新王朝的创立者贾·穆罕默德汗所实行的分封

国家的做法时，只提到他把国家分为包括撒马尔罕在内的6块封地，撒马尔罕由汗自己领有。其余的5块封地分别是布哈拉、萨加尔志（在撒马尔罕西北部，现在的大村落亚内库尔干以西大约4俄里处）、乌 270 拉－秋别、沙赫里夏勃兹和胡扎尔。列举的这些封地清楚地表明，由于昔班尼王朝的灭亡，汗国的领地缩小到了何种程度。北部和东部地区领土的丧失是由16世纪开始恢复的草原居民向文明区域的迁移而引起的。早在乌兹别克汗阿布海尔（1428—1468年）统治末期，发动了反对这位汗的暴动并迁往东部地区的游牧居民便被称为“哥萨克”，这个最早用来表示强盗似的自由流民的词语，逐渐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名称。尽管有这样的名称，但哥萨克既没有抛弃草原国家的传统，也没有放弃成吉思汗后裔的权利。无论是在乌兹别克人中间，还是在哥萨克中间，成吉思汗的后裔都被称作“苏丹”，但是我们在草原上看到的不是某些王朝，而是众多的苏丹阶层，这些苏丹称自己为“贵族”，并把自己与“非贵族出身者”——人民大众对立起来。时而在哥萨克中间也出现了强有力的汗，他们有时能够成功地使哥萨克的东方邻居——吉尔吉斯人（后来以卡拉吉尔吉斯人的名字而著名）臣服于自己，但无论是哥萨克还是吉尔吉斯人都没有成功地获得巩固的政治统一，对游牧居民而言这只有在对文明国家进行广泛征服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哥萨克汗只能使文明突厥斯坦的边缘地带臣服于自己，并且为了这些地区他不得不经常与乌兹别克汗作战，有时是与当地的居民作战，这些居民的首领往往由霍加阶层的代表来充当，关于他们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哥萨克和吉尔吉斯人在自己的草原牧区[1]受到了卡尔梅克人的排挤，卡尔梅克人在17世纪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游牧国家，这是中亚历史上最后一个强大的游牧国家。卡尔梅克人的征服活动曾波及突厥斯坦，塔

〔1〕“草原牧区”的表述方式对哈萨克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但用于16—17世纪的吉尔吉斯人就未必恰当了。那时吉尔吉斯人像后来一样，生活在山区和天山山麓，他们不是在草原牧场而是在山区牧场放牧。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位阿卜杜勒·阿齐兹汗时代的萨德尔所写的著作《巴达亚特塔瓦里赫 Бадаи ат-таварих》中，对吉尔吉斯的称呼进行了解释，这种解释使我们推测，无论如何，17世纪时吉尔吉斯这一术语在中亚都是用来表示“山民”的。详情参见后面第510页，注释26。——B. 罗莫金

什干从 1723 年开始一度臣服于他们。

后来人们在回忆 17 世纪时某些汗包括阿卜杜勒·阿济兹汗(1645—1680 年)的统治时说这一时期是强权、有序和繁荣的时期。政府的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布哈拉,有时布哈拉的汗会成功地征服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但总起来看这些地区有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阿卜杜拉汗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权力愈来愈从汗的手中转移到乌兹别克家族的首领手中。以阿塔雷克为首的这一军事贵族阶级的代表,常常利用汗家族的成员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与这种统治者的斗争迫使一些汗在世时便把汗位让给自己的继承人。某些阿塔雷克拥有巨额财富,他们身后都留下了大量建筑遗址,就连汗也逊色于他们。出身于锡尔河下游地区阿尔钦家族的阿塔雷克亚兰图什比就是这样的,他在 12 岁的时候就到金·穆罕默德汗那里任职去了。他拨出的款项价值相当于国库的拨款,每一年他都从印度、坎大哈、呼罗珊,从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和哥萨克首领那里,从喀什噶尔汗甚至从西藏得到珍贵的礼物。他把所有这些财富都用于供养军队和大兴土木。正由于积聚了军事力量,所以他才能三次进军征服了塔什干和突厥斯坦,而阿卜杜拉汗是在第七次远征之后才到达同样的目的,并且得到的只是一个被抢掠一空的地区。在亚兰图什比的建筑中特别突出的是撒马尔罕的希尔达尔迈德赖塞和蒂利亚卡里迈德赖塞,它们并不逊色于中亚一些强有力的统治者所建造的建筑物。这些 17 世纪时的建筑表明,突厥斯坦文明此时还没有完全衰落。这一时期的文学著作也证明文明工作还在继续。编撰了大量有关历史和伊斯兰教法方面的著作,如果说这说明不了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创造,那么它起码表明人们已经对前人的著作有了基本的了解。最具有代表性的事实是 17 世纪布哈拉的一位学者能够对逍遥派哲学家和斯多葛学派哲学家进行论述了。

随着阿什塔尔哈尼王朝的衰落,国家迎来了更为沉重的时代。游牧家族的首领成了世袭封邑的王公,这些游牧家族的首领出身于汗的地方长官。像 14 世纪一样,在某些家族之间分封封邑的制度取代了在

汗家族成员之间分封封邑的制度。一些相邻而又强大有力的家族之间的敌对有时会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给国家的福祉带来实质性的危害。特别是卡尔希的曼格特家族和沙赫里夏勃兹的克涅格斯家族之间的敌对根深蒂固。这些哈基姆和伯克（吉尔吉斯语[1]的发音为比伊）中的许多人事实上既不臣服于汗，也不臣服于阿塔雷克。此外，哥萨克利用这些暴动时期进行侵扰。在突厥斯坦所有的城市中，撒马尔罕是饱经18世纪暴乱之苦最甚的城市。1722年，克涅格斯家族的首领易卜拉欣比伊起来反对阿布尔·法伊兹汗，并扶植另一位汗位继承人列杰卜登上汗位，他出身于“图兰”大概即哥萨克苏丹，哥萨克加入到僭位者的军队中来，参加了与布哈拉政府的斗争，并打着这一旗号对国家进行了掠夺。从前帖木儿的首都完全被洗劫一空，当1740年纳迪尔沙赫进军时，撒马尔罕除了一座大约有1000户居民的城堡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居民了。1752年，阿塔雷克（1756年接受汗位）穆罕默德·拉希姆采取了重建城市的措施，将装满粮食的口袋运送到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当时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学生了。

但是对整个突厥斯坦而言，撒马尔罕的命运并不具有代表性，18世纪布哈拉汗国的危机对居民福祉和城市生活的影响要小于希瓦汗国危机的影响。1740年，汗国自愿臣服于纳迪尔沙赫，从而免于一场军事破坏。据我们所知，在汗国的首都布哈拉危机既没有对城市的规模也没有对居民的数量产生任何影响。还谈不上这里的城市生活像14世纪时七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的东部地区一样已经完全消失了。当地的伯克和哈基姆甚至建立了新的城市，其中某些城市如泽拉夫善河的卡塔库尔干和阿姆河流域的希拉巴德，后来都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16世纪花剌子模的文明与马维兰纳尔的文明相比发生了更实质性的衰退，这是由于乌兹别克人的入侵引起的。13世纪这一地区从蒙古人的入侵中恢复元气的过程要比马维兰纳尔慢。主要城市乌尔根奇（现在的老乌尔根奇）在蒙古入侵之后便很快恢复起来，并成为一个比

---

〔1〕哈萨克和吉尔吉斯。——Б. 加富罗夫

从前更大的贸易中心，但在蒙古入侵100多年之后，当阿拉伯人伊本·巴图塔旅行的时候，在乌尔根奇和布哈拉文明地带之间除了恰特之外连一个居民点都没有。14世纪末，花剌子模和它的首都经历了帖木儿入侵之苦，他强行把学者和艺术家迁到撒马尔罕。1388年城市遭到了彻底的破坏，1391年决定重建城市，但这个决定仅限于恢复城市的一个街区。15世纪，花剌子模经历了几次从帖木儿帝国转到乌兹别克汗之手，又从乌兹别克汗手中转到帖木儿帝国之手的过程。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原有的农业人口的数量。希瓦汗和历史学家阿布尔哈齐把土著的萨尔特人与外来的乌兹别克人对立起来，但主要是作为市民的乌尔根奇和其他某些大城市的居民特别是希瓦和哈扎拉斯普的居民与外来的乌兹别克人对立起来。从阿布尔哈齐的话中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乌尔根奇附近从事农耕的只有作为军人阶层的乌兹别克人。在16世纪中期，乌尔根奇依然是一座大城市，但在16世纪70年代却遭受了一场自然灾害的致命打击，这便是阿姆河改道。流经老乌尔根奇的支流干涸了，1645年在汗国的南部为城里的居民建立了一个新乌尔根奇，它承继了老乌尔根奇的商业地位，迄今为止乌尔根奇依然是"汗国最重要的商业批发中心，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和富商的聚居地"[1]。然而，这一时期花剌子模居民的商业活动大大逊色于布哈拉人。俄罗斯人以及仿效俄罗斯人的西欧人开始使用"布哈拉人"这一术语来表示"中亚的市民即商人"。这个术语还流传到在政治生活方面与布哈拉毫无共同之处的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开始被称为"小布哈拉"。只有到了19世纪，才根据英国研究者的倡议，用"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这些术语取代了"大布哈拉"和"小布哈拉"的称呼。老花剌子模被称为乌尔根奇汗国，或在首都南迁到希瓦之后被称为希瓦汗国，这里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正如乌兹别克汗统治时代建造的宏伟灌溉工程所表明的那样，在这方面乌兹别克人没有破坏原有的文明传承。甚至内部发生的暴乱大概对农业的影响也小于对商业的影

273

---

〔1〕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754页。

响,国家被分割为小块的封地,每一块封地上的王公都竭力对过境商品课以重税,这些都给商业带来了实质性的危害。甚至经过希瓦领地到布哈拉汗国或其他统治者那里的使者也要深受这些苛捐杂税之苦。文明因素及文职因素的地位与军事阶层和宗教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在举行庄严的接待仪式时主要的文职官员维齐尔(后来被称为梅赫捷尔)和库什别吉必须站立,而那些担任军事职务和宗教职务的人则可以坐着。如同在布哈拉一样,在宗教界的代表中德尔维希僧团的谢赫影响力最大,其中的一位是谢赫赛义德·阿塔的后裔,他在波斯人征服花剌子模后劝说居民起来反对波斯的统治,并请来了乌兹别克王公。这位谢赫的另一位后裔在1622年附和了阿拉卜·穆罕默德的儿子们,他们起来反对自己的父亲,而且像在布哈拉一样,这些王子们只是乌兹别克世家大族手中的工具。宗教界的代表,特别是德尔维希僧团的代表,总起来看曾不止一次地站在贵族阶级一边参与了汗和乌兹别克军事贵族阶层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花剌子模进行得比布哈拉汗国还要残酷。阿拉卜·穆罕默德的长子和继承人伊斯芬迪亚尔汗1623年在土库曼人的帮助下对乌兹别克人进行了大屠杀。为了对此进行报复,1645年在阿布尔哈齐汗统治之初,就发动了对土库曼人的大屠杀。这样的事件不可能不伤风败俗。与布哈拉汗国不同,17世纪在花剌子模没有任何文学创作活动。由于在自己的臣民中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委以历史学家重任的人,阿布尔哈齐汗不得不亲自担当起了撰写本朝历史的重任。阿布尔哈齐汗本人之所以拥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是因为他曾在波斯生活了10年。波斯文化对他的影响表现在:汗打算把自己用突厥语编撰的历史著作翻译成波斯语。阿布尔哈齐汗的继承人阿努沙汗(1663—1687年)甚至还受到了波斯国家思想的影响。在占领马什哈德之后,他采用了沙赫的称号,这一事件所留下的印记便是汗建立了沙哈巴德(字面含义为“沙赫的建筑”)堡垒,并且1681年在堡垒中开凿了沙哈巴德干渠。所有这些工程所追求的都仅仅是功利主义的目的。在希瓦汗国, 无论是16世纪,还是17、18世纪都没有兴

274

建具有艺术特色的建筑物。[1]

在18世纪，希瓦汗国不得不经历了又一次比布哈拉汗国还要严重的危机。随着阿努沙汗的死去王朝的统治中断了，政权很快转移到相当于布哈拉阿塔雷克的伊纳克[2]手中。他们常常从吉尔吉斯[3]草原请来成吉思汗的后裔，并扶植他们做傀儡汗，很快又将其更换掉。布哈拉历史学家阿卜杜勒·克里姆把这种惯例称作“打汗牌”。1740年在纳迪尔沙赫入侵时，与布哈拉不同的是，汗国对波斯征服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根据纳迪尔沙赫的命令，伊里巴尔斯汗与20名乌兹别克首领一起被处死。在纳迪尔沙赫之后，无序状态依然如故。在此之前希瓦汗国如同布哈拉汗国一样将国家划分为封邑在主要的家族之间进行分封，这些家族的首领们因而成为世袭的哈基姆。在希瓦汗国，氏族制度的思想比布哈拉汗国还要根深蒂固，这表现在不仅像在布哈拉那样一些不大的村庄带有氏族的名称，而且就连一些大城市也是这样（昆格拉特、曼格特、钦察、努库兹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显然，每一个家族在向定居生活转变的过程中仍然把自己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没有分散为小村落。如同在布哈拉汗国一样，这样的封邑制度导致了汗国的政治分裂。在阿拉尔，即阿姆河三角洲及其主要城市昆格拉特，通常会有自己的汗，这些汗并不依附于希瓦。昆格拉特最后的一次起义，就立了一位特殊的汗，这次起义爆发于1858—1859年。除了乌兹别克人内部的叛乱，国家还经常遭受土库曼人，特别是约穆特人[4]的侵扰。与约穆特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最近一个时期。约穆特人甚至利用爆发战争和革命这样的事件来对希瓦汗国进行

275

[1]在希瓦汗国的历史上被提到的有阿拉卜·穆罕默德汗（1602—1623年）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和几座在埃连克汗（1689—1694年）时代建造的建筑物。

[2]汗的近臣。——译者

[3]哈萨克。——Б.加富罗夫

[4]В.В.巴托尔德把希瓦汗国与土库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归结为约穆特人的侵扰，这种说法是极端片面的。在1855—1867年爆发了花剌子模土库曼人反对汗政权压迫的起义，有理由认为这是19世纪中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参见布列格利《19世纪花剌子模的土库曼人》，第197-228页。——В.罗莫金

新的掠夺。[1] 希瓦史学家在谈到18世纪下半叶初期国家的状况时说,"农村和耕地变成了树林和灌木丛,湖泊变成了芦苇潭"[2]。甚至在主要城市中也谈不上维持了像在布哈拉那种程度的福利状况。希瓦所有的建筑物都衰败不堪了,居民的数量缩减到40个家庭,有些资料说只剩下15个家庭。有时总共只有3至4个人参加星期五的祈祷。[3]

18世纪对整个穆斯林世界而言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在阿富汗人占领伊斯法罕(1722年)之后,特别是在纳迪尔沙赫被杀(1747年)和克里姆汗死后(1779年),波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充满暴动和混乱的时期。而在欧洲则恰好相反,18世纪是一个最终确立了欧洲文明的优势地位并为欧洲人在整个世界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的进步和改革的时期。欧洲的经济生活不能不对与之有贸易往来的伊斯兰世界产生影响。就在18世纪这样的黑暗时期,波斯和中亚在蒙古人侵之后首次重新开始冲制金币并且使之进入了流通体系,这可以解释为由于巴西露天矿场的发现和开采欧洲的黄金数量增加了。甚至阿卜杜拉汗的货币改革也只限于改进银坚加[4]。18世纪金币梯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以至于在文献中遇到许多在确定商品的价格时用梯拉结算的例子,特别是在进行批发贸易、确定赋税的数额和计算寺院不动产收入等等情况时,更是用梯拉进行结算。

尽管内部发生动乱,但18世纪的费尔干纳和塔什干仍堪称是借助于对外贸易而发展福利事业的典范。在费尔干纳,哥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斗争的结果是在17世纪末政权一度转入地方显贵阶层霍加的手中,他们伪称自己是先知和当地圣徒的后裔。在中世纪霍加作为

---

[1]B. B. 巴托尔德指的是与朱奈德汗相关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参见《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第2册,第384页。——B. 罗莫金

[2]穆尼斯《花剌子模史》,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手抄本,第571页,л. 85a。在伊万诺夫的译本中是这样写的:"所有的可耕土地,以及村庄和湖泊都变成了茂密的芦苇丛和树林。"(《土库曼人和土库曼史资料》,Ⅱ,第337页)——B. 罗莫金

[3]穆尼斯《花剌子模史》,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手抄本,第571页,л. 85a。《土库曼人和土库曼史资料》,Ⅱ,第337页。

[4]即银币。——译者

一个阶层不起什么政治作用。现在他们则依据书面世系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但这些谱系却明显地带有伪造的印记。在乌兹别克时期，霍加在整个突厥斯坦包括在希瓦汗国都构成了一个封闭的阶层，这个阶层把自己与人民群众尖锐地对立起来。与霍加相对立的普通人被称为卡拉朱，这个词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从总体上来讲表示所有与汗家族相对立的臣民。霍加自身可以娶霍加的女儿和卡拉朱的女儿为妻，两者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却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卡拉朱，因为这种婚姻所产生的后裔，无论他们的父系出身如何，都可以获得先知后裔赛义德的所有权力。成为赛义德的荣耀是如此珍贵，以至于霍加很不愿意通过这种婚姻的方式让外人成为这个阶层中的一员，在19世纪甚至国王也不得不通过强制的手段娶出身霍加的姑娘为妻，以便未来的国王能称自己为“赛义德”。19世纪在这一时期的所有3个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刚刚建立的浩罕汗国中，许多国王所带有的“赛义德”的称号都是这样得来的。

在费尔干纳，霍加攫取政权可能不无相邻的喀什噶尔所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在那里政权早已由出身于察合台系的汗手中转到了霍加手中，这些霍加是谢赫马赫杜米·阿扎姆的后裔，马赫杜米·阿扎姆生于费尔干纳的卡桑村，死后葬在撒马尔罕的达赫比德村。17世纪末，统治费尔干纳的霍加的住地位于锡尔河以北的恰达克村。大约在1710年，他们被乌兹别克明[1]部落的首领沙哈鲁·比伊推翻，他在中世纪的浩罕村建立了浩罕城（后来这一毫无疑问被应用到口语中的名称被正确的标准语形式 Хоканд 所取代）。后来到了19世纪，沙哈鲁的后裔把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几乎整个锡尔河流域和锡尔河州草原的部分地区，甚至到七河流域。他们能够利用其他地区的收入在费尔干纳兴修建筑物和宏大的灌溉工程。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凿了引自卡拉河和纳伦河的水渠，而从前即使在萨曼王朝时代，这些地区也只能靠由锡尔河北部和南部支流引来的渠水进行灌溉。在浩罕汗统治时代所修建的

[1]明格。——Б. 加富罗夫

运河,就其灌溉面积而言在突厥斯坦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甚至在俄277罗斯统治时期也没有兴建过任何能与其相媲美的工程。但是还在18世纪,当明部落的代表仅仅统治费尔干纳和苦盏,还没有接受汗位的时候,我们就能观察到某些表明居民经济发展状况的事实。除了伯克的首都浩罕之外,在该地区的北部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大城市——纳曼干,17世纪时这里只是阿赫西附近的一个村子,到了18世纪则被列为费尔干纳的城市之一。[1] 在农村工业领域中,在中国的影响下养蚕业经过长期的中断之后又重新复兴。因此,早在18世纪就已经奠定了费尔干纳在突厥斯坦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直至革命前费尔干纳一直保持着这种地位。

塔什干的霍加是在1709年前夕被提到的,他们被视为是与哥萨克汗一样的人,在自己城市中拥有权力。他们向布哈拉汗乌贝杜拉通报卡尔梅克人活动的情况,并从这位汗那里得到公函、荣誉服装和礼物。1723年,塔什干可能被卡尔梅克人征服,但此后前哥萨克汗朱尔巴斯作为卡尔梅克珲台吉的封侯继续管理塔什干,他大约死于1740年。1747年在塔什干还提到了哈基姆巴哈杜尔·伯克,他可能是乌兹别克人,似乎与霍加处于敌对状态。1749年他被杀死,此后塔什干霍加抢劫了他亲属的财产。由于死者是卡尔梅克珲台吉的封侯和盟友,所以死者的兄弟便向卡尔梅克人求援,并从卡尔梅克人那里获得了军队,他成功地占领了塔什干。努尔和萨加尔志的乌兹别克人跑到塔什干的卡尔梅克人那里寻求保护,他们控诉布哈拉阿塔雷克穆罕默德·拉希姆的行为。为了调查这些控诉,一个卡尔梅克使团被派往布哈拉派,但使团来到布哈拉后却成功地在卡尔梅克人和布哈拉政府之间达成了谅解。在1755年之后,被中国人征服的卡尔梅克国家的衰落加剧了吉尔吉斯[2]草原上的暴乱,引起了哥萨克人和萨尔特人之间的大屠杀。直

---

[1]早在1696年官方文献中就提到了阿赫西肯特省;据中国史料记载,在1758—1759年纳曼干州是费尔干纳的四州之一(另外三州是安集延州、马尔格兰州和浩罕州[瓦利多夫《18世纪费尔干纳史的某些资料》,第112和114页])。

[2]哈萨克。——Б.加富罗夫

到1780年前后,当地的一位霍加尤努斯才成功地确立了自己在塔什干的统治,他是当地圣者谢赫·安塔乌尔(14世纪的谢赫·哈文迪·图胡尔)的后裔。尤努斯最初只是舍伊汉塔乌尔区的一个哈基姆,并与另外3个区的哈基姆进行了斗争。据传他认为自己取胜的原因在于他拥有唯一的一门大炮,这门大炮是他用从居民手里夺取的铜器铸造的。他与哥萨克作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18世纪末将自己的统治向北推进到突厥斯坦和奇姆肯特(此前不久这里才成为城市)。以前这一地区的中心是塞兰,此后这一地位则让给了奇姆肯特,现在的塞兰是一个小村庄,而在1735年这里曾是一座"不小的城市"。但打败哥萨克的胜利者在与浩罕乌兹别克人进行的斗争中却遭到了失败。在1810年前他死后不久,塔什干很快就完全被浩罕人所征服[1]。1800年到过塔什干的布尔纳舍夫和波斯佩洛夫所叙述的是尤努斯统治后期的情况。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塔什干刚刚经历的内部动乱和与哥萨克的斗争并没有妨碍它成为一个比中世纪时还要大的城市。据布尔纳舍夫和波斯佩洛夫推断,当时在塔什干达到了1万户家庭和4万名男性居民。在浩罕汗的统治下,塔什干成为一个更大的贸易中心和人口更多的城市。据A. K. 海因斯统计,在19世纪下半叶初期塔什干有2万户家庭和15万居民。这位海因斯还提到了位于城市以南通往奇纳兹路上的诺盖-库尔干村,就像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它是由诺盖人建立的村庄,在突厥斯坦人们把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称作诺盖人。根据1866年经过诺盖-库尔干(村庄在路的左侧)的П. И. 帕希诺的说法,这个村庄以出产马铃薯而闻名,"是整个这个地区唯一培育马铃薯的地方"[2]。在农业区域栽培马铃薯现在也被认为是受欧洲文明影响的最具实质性的特征之一。所以,旅行者所指出的事实虽然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却证明早在俄罗斯人征服之前鞑靼人在向自己的突厥斯坦同族人和同一信仰的人传播欧洲文明方面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278

〔1〕这一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不能确定。对有关浩罕人占领塔什干事件的史料记载所进行的对比,参见伊万诺夫《哈萨克人和浩罕汗国》。——B. 罗莫金

〔2〕帕什诺《1866年的突厥斯坦边区——旅行见闻》,第98页。

在18世纪末突厥斯坦的秩序和福祉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这是因为在布哈拉、希瓦和浩罕形成了3个汗王朝,就如同在波斯社会秩序和福祉的恢复是由于建都于德黑兰的卡扎尔王朝的产生一样。在突厥斯坦的所有3个汗王朝中接受汗位的统治者都并非出身于成吉思汗家族的男性,因此他们的国家思想是与从蒙古人那里继承来的游牧民族的君主专制思想相抵触的。在接受汗位之前所有这3个事实上攫取了政权的王朝的统治者都认为需要像帖木儿那样,以傀儡汗或假想的汗(在浩罕)的名义发号施令。传统的力量是这样强大,以至于在布哈拉和希瓦,当接受了汗位的新王朝的最初代表死后,他们的继承人便安于

279 接受更微薄的封号,并重新回到从成吉思汗的后裔中辅佐傀儡汗继承汗位的习俗中来。只是在经过这一明显说明政府自身的社会地位摇摆不定的过渡时期之后,才最终确立了事务的新秩序。

新王朝的代表首次接受汗位发生在1756年的布哈拉。从父亲和祖父那里继承了阿塔雷克称号的穆罕默德·拉希姆在此之前,像游牧民的其他首领一样,是乌兹别克人的伯克和塔吉克人的埃米尔,在阿什塔尔哈尼王朝最后的代表——阿布尔·法伊兹(1747年)和他的儿子阿卜杜勒·木明(1748年)的统治灭亡之后,花剌子模的沙赫·帖木儿·苏丹之子吾拜都拉和阿布尔哈齐先后被他扶植到汗位上充当傀儡,阿布尔哈齐很可能也与阿什塔尔哈尼朝没有血缘关系。布哈拉宗教界在1756年秋就提出了宣布穆罕默德·拉希姆本人为汗的问题,此前穆罕默德·拉希姆娶了阿布尔·法伊兹汗的女儿为妻。但是阿塔雷克宣称,问题应该通过召开全民集会来解决,全民集会召开了,出席会议的除了乌兹别克的达官显贵、军队的长官和官员的头目,还有大法官、赛义德,甚至来自“手工业者和臣民”中的杰出代表。在举行典礼的时候,新继位的汗坐在毛毡上被抬起来,这是昔班尼王朝时代的习俗。当着赛义德、卡迪和霍加的面把汗所坐的毛毡举起来,但在阿什塔尔哈尼王朝时期出席这种仪式的只有4个主要的乌兹别克家族的伯克。我们可以认为这一事实表明了曼格特王朝未来政治的方向。然而无论是穆罕默德·拉希姆汗,还是他的叔叔和继任者达尼亚尔·比伊都不是沙

里亚的热衷者，就像后来的布哈拉埃米尔一样。曼格特王朝的一位历史学家——布哈拉的穆罕默德·雅库布在谈到穆罕默德·拉希姆时说，汗的确没把禁止做的事情与允许做的事情区别开来，也并非他所有的活动都符合沙里亚的规定，但他需要的钱财比他的继任者要少，而且他给了自己的臣民更多的恩典。这位历史学家说达尼亚尔·比伊也享有慷慨仁爱的统治者的盛誉，虽然他对国务活动特别是财政事务懂得很少。所有这一切事务他都要咨询乌列木，没有他们的话他"寸步难行"，但同时在他统治时期，许多改革还在继续推行，苛捐杂税也在继续征收，这些苛捐杂税直至他统治末期才被废除。达尼亚尔没有仿效前任的做法，他没有接受汗的称号，只是满足于阿塔雷克的称呼。在他统治时期，阿布尔哈齐又被宣布为汗，以他的名义冲制了货币。达尼亚尔的继承人沙赫·穆拉德也没有接受汗位，而是称自己为埃米尔，这其中不仅包含采纳这一封号的突厥伯克所理解的含义，而且也包含哈里发封号埃米尔阿尔木明（穆斯林权威）的含义。沙赫·穆拉德因热衷于沙里亚、极端笃信宗教而得到了"纯洁无邪的埃米尔"（амир масум）的称号。在达尼亚尔·比伊在世时，沙赫·穆拉德在这方面就表现得与自己的父亲和兄弟截然不同，他加入了德尔维希僧团并拜谢赫萨法尔为师。起初谢赫拒绝接收他这个暴君的儿子，并要求他在集市上干一些有失体面的工作以此来表示忏悔和与自己亲属的习俗断绝关系。沙赫·穆拉德顺从了这一要求，由此激怒了父亲。根据穆罕默德·雅库布的叙述，向来说话生硬态度粗暴的达尼亚尔·比伊责骂他干涉了管理事务，痛斥他的兄弟们生活放荡。但是老阿塔雷克不得不答应了自己笃信宗教的儿子的请求，穆罕默德·雅库布所说的在阿塔雷克统治末期"改革"被废除的原因就在于此。 280

还在达尼亚尔·比伊统治时期，沙赫·穆拉德便打着维护沙里亚的旗号，处死了自己父亲的主要谋臣——库什别吉道列特·比伊（他出身于奴隶，这个奴隶在穆罕默德·拉希姆统治时期就当上了大臣）和总卡迪，其罪名是接受了波斯的习俗——抽水烟袋。沙赫·穆拉德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达尼亚尔不得不指定他作为自己的继承

人。以前沙赫·穆拉德担任撒马尔罕的哈基姆,他曾采取措施恢复了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在自己执政时期(1785—1800年)他重建了泽拉夫善河、阿姆河和卡什卡河的灌溉系统。穆罕默德·雅库布甚至认为他关注被他本人破坏的梅尔夫的重建工作,但这似乎没有根据。另一位布哈拉历史学家阿卜杜勒·克里姆仅仅谈到了沙赫·穆拉德为被他俘虏到布哈拉的城市居民所做的善事(沙赫·穆拉德还在1785年自己统治之初便发动了对梅尔夫的第一次进军,尽管达尼亚尔·比伊是梅尔夫统治者拜拉姆·阿里汗的朋友并称他为自己的儿子)。梅尔夫人似乎对自己的状况十分满足,他们由什叶派变成了虔诚的逊尼派并给新祖国带来了一些此前没有的"发明和技能"。大概这就是18世纪末布哈拉在波斯影响下(如同浩罕在中国影响下)重新恢复的养蚕业。沙赫·穆拉德说过,除了宗教法以外,他不承认其他的法律,他无论在哪些方面都不同于自己的前任,他只把"虔诚的哈里发"作为自己的榜样,仅用那些被穆斯林教法认为是唯一合法的收入吉济亚税——从异教徒那里征收来的赋税(在布哈拉汗国是从犹太教徒那里征收的)来

281

抵偿自己私人的开支。这种赋税是《古兰经》规定的唯一的税收。但是无论是在虔诚的埃米尔沙赫·穆拉德统治时期,还是在他更虔诚的儿子及继承人海达尔(1800—1826年)统治时期,都没有完全抛弃草原国家的传统。沙赫·穆拉德娶了穆罕默德·拉希姆的遗孀即阿布尔·法伊兹汗的女儿为妻,因此这场婚姻所生的埃米尔海达尔便成了成吉思汗的后裔,如同他在自己一方印章上的铭文所表明的那样,他认为这一点有着与出身于先知和享有赛义德称号同样的意义。在另一方印章的铭文中海达尔被称为是"蒙难汗"阿布尔·法伊兹的继承人,尽管杀害这位汗是曼格特王朝的事情。沙赫·穆拉德在统治初期免除了布哈拉居民的"阿雷克和萨雷克",即根据家庭人数征收的赋税,并赐予他们"塔尔汗证书"。由此可见,即使这位沙里亚的热衷者也认为需要援引草原法的准则而不是单靠沙里亚的规定来证明自己措施的正确性。根据沙赫·穆拉德的命令在撒马尔罕地区修造的灌溉工程有利于乌兹别克人,他们可能占有了在以前发生暴乱的时期被原有的塔吉克居民

抛弃的土地。根据 B. Л. 维亚特金的研究[1]，现在我们在泽拉夫善谷地所遇到的那些"为数众多的突厥名称""主要都产生于最近的 100 年"。沙赫·穆拉德的灌溉工程加速了农耕的塔吉克人被转向定居的游牧的乌兹别克人排挤的进程，这一进程是随着乌兹别克人统治地位确立而开始的：在向定居生活转变的过程中，游牧民族还没有放弃自己的氏族划分，由此"乌兹别克人氏族和宗族的名称常常转变为那些老的或者新建的居留地的名称，在这些居留地中安置的是某一个氏族或宗族的新住户"[2]，但是大量带有同一氏族或家族名称的小村庄的存在，显而易见地表明在布哈拉汗国与在希瓦汗国不同，一个氏族中的游牧民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转变为定居居民的，而不是整个氏族一起转变为定居居民的。在布哈拉汗国那些被称为州的大城市中，没有一个带有氏族的称号，而在希瓦汗国中却有 3 个这样的城市——曼格特、钦察和昆格拉特。

尽管讲求公正，但对财务账一窍不通的虔诚的埃米尔没能妨碍自己的总督们依靠居民发财致富。虽然埃米尔敷设了灌溉工程，但军需仍然得不到满足，这使埃米尔感到很苦恼，他表示希望在将来某个时候能够成功地夺取马什哈德，在自己的战士中间分配这个什叶派圣地的财富。在进军期间，他以宴席来款待军队和人民，而这位埃米尔自己则不享受这种待遇，只吃最简单的食物。 282

尽管表面上很虔诚，但在沙赫·穆拉德的继承人埃米尔海达尔（1800—1826 年）这位以自己的名义冲制货币的最后一位布哈拉统治者统治时期，国家管理和国民经济中的阴暗面还是急剧地暴露出来。从他死亡开始直至汗国灭亡，货币都是以"已故埃米尔海达尔"的名义冲制的。根据穆罕默德·雅库布的说法，埃米尔海达尔的收入是他父亲的两倍，但他的开支还是比他的收入多一倍。官僚的数量达到了 1000人，除了驻扎在撒马尔罕、米延卡尔和卡尔希的队伍以外，军队的

[1]《撒马尔罕省历史地理学资料》，第 15 页。

[2]《撒马尔罕省历史地理学资料》，第 16 页。——Б. 加富罗夫

数量达到了12000人。此外，还有500名每月收入100至300坚加的毛拉，最后在开斋节时还要发给曼格特家族的官员30至100坚加。在缩减由1819年暴乱而引起的开支期间，这最后一笔款项被取消了。5年之后它又被重新恢复，只是数额略为减少。大家都一样，每人一个梯拉，也就是哈内科夫[1]计算的21个坚加。在这5年期间，埃米尔不得不债台高筑，被迫减少每个月的薪水，有时根本不支付薪水。

埃米尔海达尔留给一位欧洲旅行者的印象不像是一位君主，倒更像是一位僧侣。这位埃米尔不仅是一位狂热的教徒，而且还是一位精通沙里亚的理论家，他自己开办讲座，在这些讲座上听众能达到500人。但他的生活方式不像他的父亲，他不仅宴请他人，而且自己也是个美食家。他更多地沉湎于后宫享乐，经常更换他的4个法定妻子，每个月他都要给自己的妻妾们搞一个新花样，这引起了乌兹别克人的不满。在财政事务方面，埃米尔的虔诚仅仅表现在他自己不保存钱财，在得到钱后立即便把它们交给自己的管家。在战争和平息叛乱期间，埃米尔既不吝惜杀害自己的近亲，也不吝惜进行大屠杀。作为一个统治者，埃米尔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他的高官们不得不经常亲身体验这一点。顺便提一下，根据穆罕默德·雅库布的说法，库什别吉穆罕默德·哈基姆·比伊（他从父亲乌特库尔·比伊那里继承了库什别吉的称号，他的父亲如同其封号所标明的那样，出身于乌兹别克贵族）的才干表现在，他甚至从没让这样一位统治者发过怒，从没有失过宠，也从没有离过职。另一位历史学家阿卜杜勒·克里姆说，在海达尔统治时期整个国家的管理事宜都掌握在库什别吉手中，海达尔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

283

国家开支的增加部分是由于这一时期在突厥斯坦形成了两个新的汗国。事实上早已独立于布哈拉的希瓦和浩罕，现在成了自立为汗的统治者的首都。埃米尔海达尔被迫与这两个汗国进行了战争。

18世纪希瓦汗国在“打汗牌”的影响下，居民几乎完全不再臣服于

---

[1]《布哈拉汗国概要》，第114页。

自己的君主,只有个别伯克一度成功地建立过多少有些力度的政权。比其他汗在位时间更长的加伊普汗(1747—1757 年)试图恢复汗政权地位的努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成功地消灭了乌兹别克贵族首领阿塔雷克胡拉兹伯克(来自曼格特家族),起初整个政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根据汗的命令与胡拉兹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他的 10 名亲属和 60 名其他的曼格特家族的人。但是,当他决定不加区别地从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居民中征收他所必须征收的款项时,据希瓦史学家确定这笔款项数额为 4 万梯拉(约 16 万卢布),却遭到了完全的失败,甚至不得不放弃自己国家的疆界。根据布哈拉历史学家的说法,"那一地区的居民从来都没有顺从地履行过当局不公正的钱财要求"。从古尔连到哈扎拉斯普,各个城市和乡村的居民都发动起义并杀死了税务征收官。汗和自己的父亲逃往草原,后者是在此前不久带领 6000 人的军队来帮助自己儿子的。汗自己的武装力量似乎达到了 6 万人,但在与人民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他显然指望不上这支军队。在希瓦,加伊普·阿卜杜勒的兄弟被扶上了汗位,他的突厥名字叫做卡拉巴伊,叛乱者向布哈拉汗穆罕默德·拉希姆求援,另一方也同意接受他的调停。这次暴动以布哈拉人帖木儿·加齐汗登上汗位而告终。在他统治时期,乌兹别克家族的领导权在 1763 年转移到出身于昆格拉特家族的新伊纳克穆罕默德·埃明手中。1764 年汗被杀死,汗位为其他傀儡汗所取代。虽然杀死了布哈拉人,但约穆特人发动的新的暴动和起义仍然迫使穆罕默德·埃明逃到布哈拉,那里的阿塔雷克达尼亚尔·比伊同意给他帮助。由此穆罕默德·埃明在 1770 年成功地彻底打败了约穆特人。希瓦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是希瓦汗国获得新生的开端,希瓦汗国在此前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几乎连首都都要被居民完全抛弃。 284

根据布哈拉历史学家的说法,穆罕默德·埃明·比伊在达尼亚尔·比伊活着的时候一般对他比较尊重,并能与他和平相处。1791 年穆罕默德·埃明为他的儿子阿瓦兹·比伊所取代,他执政到 1804 年。同年阿瓦兹·比伊之子及其继承人伊尔土泽尔不顾乌兹别克主要达官显贵——维吾尔家族首领阿塔雷克伯克·普拉德的劝告,决定放弃扶

植傀儡汗登基的传统,自立为汗。在这之后阿塔雷克很快便被汗处死,他的亲属们在经过一次徒劳的起义尝试后逃到了布哈拉,他们在布哈拉埃米尔海达尔的宫廷中寻求避难。汗和作为乌兹别克世袭贵族主要代表的维吾尔人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下一位汗即穆罕默德·拉希姆汗(1806—1825年)统治时期。他邀请了这个家族的60位显要人物并背信弃义地将他们杀死在希瓦城堡中。[1] 伊尔土泽尔意识到自己的出身与其他乌兹别克人没有什么不同,没有继承汗位的权力,为了给自己的出身增色添彩,他决定娶一位乌尔根奇赛义德阿赫塔霍加的女儿为妻,霍加得知等待着他的命运之后,连忙把女儿嫁给了自己的侄子,但是汗强行把她从年轻的丈夫身边抢走,纳入自己的后宫。布哈拉历史学家阿卜杜勒·克里姆认为,这一招致了霍加诅咒的行动是导致伊尔土泽尔在随后不久(1806年)发生的与布哈拉人的战争中丧生的原因。他的兄弟和继承人穆罕默德·拉希姆起初恢复了傀儡汗阿布尔哈齐的汗位,随后在1806年底自己接受了汗的称号并巩固了自己的王朝。伊尔土泽尔汗想冲制货币,他打算在货币上把自己称作是"花剌子模沙赫的继承人",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穆罕默德·拉希姆汗是希瓦第一个在冲制的货币上甚至是金币上刻上了自己名字的汗,虽然上面的铭文比较简单。他不止一次地侵扰呼罗珊地区,绝大多数取得了成功。1821年他重开与布哈拉的战争,战争在他死前不久以1825年和平条约的缔结而告结束。1822年梅尔夫的土库曼人宣布脱离布哈拉埃米尔的统治并转向了希瓦汗国一边。和平条约巩固了希瓦汗对土库曼的统治,由梅尔夫和土库曼而引发的希瓦与布哈拉之间的战争在1842年才再次爆发,并且这一次土库曼人成了布哈拉人的同盟者,甚至在希瓦和布哈拉之间的和约签订后(1845年),他们还继续为捍卫自己的独立反对希瓦汗的统治而进行斗争。在这场战争

---

[1] 比较丹尼列夫斯基对伊尔土泽尔和穆罕默德·拉希姆统治的论述(《希瓦汗国概论》,第91页)。首先,"铲除了出身最显赫"的游牧民首领"及其许多追随者";其次,"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他实行了血腥政策并完成了叶利捷泽尔所开创的事业,采取阴谋和武力手段消灭了企图恢复从前制度的整个乌兹别克势力集团"。

中最大的插曲是1855年穆罕默德·埃明汗在与塞拉赫斯的土库曼人作战时被杀。汗的头颅被送给了波斯沙赫。在波斯远征梅尔夫失败5年之后,土库曼人的首领库舒特汗给希瓦汗送来了礼物和20%的战利品。 285

在与邻居进行的战争中,以及在镇压威胁汗政权的暴乱者和危险分子的过程中,汗的行为极其残忍,但尽管如此,19世纪的希瓦诸汗与16世纪的花剌子模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发展文化的努力,在这方面他们可能胜过布哈拉埃米尔。王朝的创立者伊尔土泽尔虽然统治的时间很短,但已经为官方的历史编纂学奠定了基础。年轻的读书人和诗人希尔·穆罕默德(生于1778年,作为诗人他拥有穆尼斯的绰号)受命编纂一部花剌子模史。在伊尔土泽尔死前(1806年),著作已经编纂到希尔加齐汗(在俄罗斯历史上因在1717年背信弃义地消灭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的军队而闻名)统治时期。穆罕默德·拉希姆汗(1806—1825年)委托他续写这部著作,该书的内容一直写到1812年,但在这之后编纂工作停止了,因为作者受命完成另一项工作,这就是把密尔宽德(15世纪)所著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巨著由波斯语翻译成突厥语。在穆罕默德·拉希姆在世时,穆尼斯翻译完了第1卷并着手翻译第2卷,在阿拉·库尔[1](1825—1842年)统治时期他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但他1829年死于瘟疫,还没有完成第2卷的翻译工作。1255/1839—1840年穆尼斯的侄子,担任米拉布[2]、笔名为阿格希[3]的穆罕默德·里扎受阿拉·库尔之命继续编纂穆尼斯的花剌子模史。在阿拉·库尔去世之前,他已经写完了穆罕默德·拉希姆统治时代的历史,并开始编写阿拉·库尔本人执政时期的历史,在汗去世前他已经写到1827年。新继位的汗拉希姆·库尔也赏识他,并让他继续完成这项工作。据阿格希的说法,拉希姆·库尔还是王子的时候便喜

[1]19世纪许多俄罗斯作者都提到希瓦汗的名字阿拉·库尔,以及拉希姆·库尔和拉赫曼·库尔,但在东方史料中,其中包括在公文中和货币上只提到阿拉·库里,拉希姆·库里和拉赫曼·库里这样一些名字。——Ю.布列格利

[2]即水利官。——译者

[3]在B.B.巴托尔德那里写的都是奥格希。——B.罗莫金

欢历史。阿格希一生经历了好几位汗的统治，他编写了他经历过的每一位汗的统治史。拉希姆·库尔汗（1842—1846年）的统治史具有同时代人对其耳闻目睹的事件进行记载的性质，也就是说更像大事记和日记，而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因为这部分历史是在汗在世的时候编写的。这位阿格希还编写了穆罕默德·拉希姆·巴哈杜尔汗的历史，他的统治时期为1864—1872年。无论穆尼斯和阿格希的著作作为286 文献和历史学著作有多少不足，这部著作就其叙事的详尽程度以及占有的实际资料的数量而言，远远超过了流传到我们今天的一切有关布哈拉和浩罕汗国历史的著作。[1]

希瓦汗发展文化的努力并不局限于文学和历史学领域，他们还着手兴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在这方面他们的历史学家们把其与荒废了梅尔夫灌溉系统的曼格特家族对立起来。此外，他们还大兴土木，其中有一些建筑甚至给欧洲旅行者留下了印象，比如伊纳克拉赫曼·库尔在哈扎拉斯普的宫殿以及穆罕默德·埃明（1846—1855年）在希瓦的宣礼楼。[2] 可能，这些建筑物的建造者所拥有的艺术品位比与他们同时代的布哈拉和浩罕统治者的艺术品位更高。

浩罕汗国的历史尤其是年表迄今为止也没有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的历史及年表清晰，虽然关于浩罕汗国的历史已经有了一种用第一手资料编写的俄文著作，而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迄今为止尚没有一

[1]对穆尼斯和阿格希著作的评论，参见伊万诺夫《土库曼历史文献——19世纪穆尼斯和阿格希的希瓦编年史》。——Ю.布列格利

[2]阿尼奇科夫《哈扎拉斯普的宫殿》第9页以下错误地把建筑者说成是拉希姆·库尔（1842—1846年）；卡尔梅科夫《希瓦》第69页提出哈扎拉斯普的宫殿是伊纳克拉赫曼·库尔建造的。拉赫曼·库尔是阿拉·库尔汗的兄弟。阿格希提到他曾在1825年和1827年远征呼罗珊。丹尼列夫斯基（《希瓦汗国概论》，第111页）也称哈扎拉斯普的宫殿是伊纳克拉赫曼·库尔的住宅。丹尼列夫斯基说，这位伊纳克在哈扎拉斯普用石头建造了一座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其中有些地方是用琉璃砖装饰的”。穆尼斯说，伊尔土泽尔汗在阿卜杜拉汗曾经停留的哈扎拉斯普附近的库兰奇建立了一座城堡。关于穆罕默德·埃明的宣礼楼，还参见卡尔梅科夫《希瓦》，第59页。

部这样的历史著作。[1] 遗憾的是这部著作的已故作者 B.П.纳利夫金没有给我们作一个史料述评，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这些史料中包含着如此多的模糊和矛盾之处，特别是关于汗继位和死亡的时间。迄今为止，也没有对一些定期刊物上刊载的零散的编年史资料以及汗诰的日期等等进行整理和研究。

浩罕汗国的创始人阿利姆汗可能是在 1213/1798—1799 年继承了父亲纳尔布塔·比伊的职位，纳尔布塔·比伊从 1774 年[2]开始担任费尔干纳的伯克。起初他像自己的前任一样，以假想的汗的名义发布汗诰。他在哪一年采用了汗的称号，这一点无法确定[3]，他死亡的时间也无法确定。根据某些资料记载，他统治到 1817 年[4]，但根据另一些史料记载他的兄弟和继承人奥马尔汗死于 1822 年，这一点可能是无

287

〔1〕纳利夫金《浩罕汗国简史》。在纳利夫金的书出版之后，仅仅有一些关于浩罕汗国某些历史问题的论文发表。在伊万诺夫的著作中对浩罕汗国的历史作了最好的综述。参见伊万诺夫《中亚历史概论》，第 178－213 页。——B.罗莫金

〔2〕这里援引的纳尔布塔统治开始的时间 1774 年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它所依据的仅仅是一份汗诰，瓦利多夫可能就是根据这一日期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说纳尔布塔的前任伊尔达纳比伊在 1188/1774 年还在世（参见瓦利多夫《18 世纪费尔干纳史的某些资料》）。但是，根据中国史料记载，伊尔达纳比伊死于 1770 年（参见克拉普罗特《亚洲杂志》，第 1 卷，第 83 页）。巴托尔德在《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上发表的关于浩罕一文中采纳了这一日期，浩罕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这一日期。根据安萨卜阿斯·萨拉丁的说法（塔什干手稿，№1314），伊尔达纳比伊死于希吉拉历 1182 年（1768—1769 年）（这是由殷勤的阿齐兹·卡尤莫夫告知的）。穆什里夫（第 51 页 a）指出纳尔布塔死于希吉拉历 1215 年（1800—1801 年），他断定纳尔布塔的统治持续了 30 年，从此可以看出，纳尔布塔的统治开始于 1185/1771—1772 年。这一切都使我们有理由断定伊尔达纳死亡的时间和纳尔布塔开始执政的时间大致是在 1770 年。——B.罗莫金

〔3〕舍费尔在他出版的布哈拉阿卜杜勒·克里姆著作的封面上印了一枚希吉拉历 1216 年（1801—1802 年）的印章，在这枚印章上，阿利姆不仅自称为汗，而且也把自己的父亲纳尔布塔称为汗。

〔4〕纳利夫金采用的时间明显是错误的，由于对 1222/1807—1808 年以纳尔布塔名义颁布的卡拉斯坎麻札汗诰计算时间的某种误解（纳利夫金《浩罕汗国简史》，第 75 页），他认为这位统治者那时还活着。因此，他把阿利姆汗的死亡日期推迟了 6 至 7 年，而实际上他的死亡的时间是 1810 或 1811 年。——B.罗莫金

可争议的[1]，他是在自己统治的第12年死去的[2]。像布哈拉统治者一样，浩罕统治者也称自己为埃米尔。在1225/1810年的汗诰中，阿利姆汗不是被称为汗，而是被称为埃米尔。奥马尔汗像诗人那样使用了“埃米尔”的诨号。在历史著作中有时把两位汗作为“浩罕的埃米尔”以便与“布哈拉的埃米尔”相比较。但在奥马尔汗死后费尔干纳统治者可能最终采用的是汗的封号，而不是埃米尔的封号。

新汗国的国家任务在阿利姆汗时已经被完全确定下来，阿利姆汗不仅成功地把在纳尔布塔死后已经分裂的费尔干纳重新置于自己的统288 治之下，而且还征服了塔什干和奇姆肯特。在奥马尔汗统治时期，浩罕政府沿着锡尔河顺流而下一直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突厥斯坦以及更远的地区。此外，浩罕人还卓有成效地努力使锡尔河东部的草原居民地区和七河流域的部分地区臣服于自己。浩罕汗国沿锡尔河和亚历山大岭的北坡建起了堡垒。农民和商人与堡垒毗邻而居，在14世纪的事件之后，农村生活以及一部分城市生活首次得到恢复。

在七河流域，浩罕军队甚至曾向山区方向进军，在伊犁河谷采取军事行动，俄国人在乌尊阿加奇的胜利(1860年)遏止了这些要求。在锡尔河流域[3]浩罕人对吉尔吉斯[4]草原的要求甚至导致了他们与俄罗斯人的冲突，而早些时候则导致了他们与希瓦人的冲突，希瓦人认为锡

---

[1]如同穆罕默德·哈基姆汗所说(л.4976)，奥马尔汗死于希吉拉历1237年4月20日拂晓(1822年1月14日)。——В.罗莫金

[2]也就是说奥马尔汗统治开始和阿利姆汗死亡时间都是1810年，这是与基本史料中的佐证以及稍晚些时候的浩罕作者的说法相一致的。1812—1813年到过中亚的米尔·伊泽杜拉指出，阿利姆汗“两年前”被杀(米尔·伊泽杜拉，汉德森译本，第51页)，也就是在1810或1811年被杀。阿卜杜勒·克里姆·布哈里(Ⅰ，99)确实引用过更早一些的时间——希吉拉历1224年(1809—1810年)，但后来的浩罕历史学家们，其中包括与奥马尔汗同时代的穆罕默德·哈基姆汗都赞成希吉拉历1225年(1810年)的说法。[参见穆罕默德·哈基姆汗，л.226a；阿瓦兹·穆罕默德，л.1356；尼亚兹·穆罕默德《费尔干纳统治者史》，86(表年诗)。]但是由于史料中还存在着一些矛盾之处，所以1810年这一日期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这一时间目前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也有人认为阿利姆汗死亡的时间是1809年(参见伊万诺夫《哈萨克人和浩罕汗国》)或1811年。卡尤莫夫《18—19世纪浩罕文学界》，第7页、13页、30页。——В.罗莫金

[3]从阿克清真寺往下游走还有一座浩罕城堡——科什库尔干，河流继续流经“俄罗斯境内达300多俄里”(马克舍耶夫《咸海概论》，第54页)。

[4]哈萨克。——Б.加富罗夫

尔河下游地区是自己国家的领地。所有臣服于浩罕汗的吉尔吉斯人[1]都隶属于塔什干总督,他管理着广大的地区并带有伯克利亚尔伯克(伯克的伯克)的称号。

与布哈拉人的冲突是由于争夺乌拉-秋别和吉扎克而引起的。此外,从阿利姆汗开始浩罕汗就竭力要征服已经成为布哈拉汗国东部领土的卡拉特和达尔瓦兹。最后,浩罕人还支持发动起义的喀什噶尔穆斯林反对中国,并竭力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这里,中国政府甚至一度承认了浩罕汗向喀什噶尔居民征收赋税的权力。为了进军,阿利姆汗需要资金,他便对居民横征暴敛。同时他还竭力用主要由卡拉特山民组成的常备军来取代乌兹别克军事贵族。[2] 人民给汗起了一个与他的名字押韵的绰号——扎里姆(暴君)。除了与乌兹别克贵族阶层进行斗争外,汗还与宗教界特别是德尔维希僧进行了斗争,他力图用强行手段迫使德尔维希僧从事有益的劳动。宗教界对汗的态度可以从历史学家的叙述中明显地看出来,汗似乎准备好了材料要在浩罕建造清真寺和迈德赖塞,但伊尚穆罕默德·雅库布·阿洪德认为不能用不公正地搜刮来的钱财建造慈善机构,在这一论据的影响下他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堆积起来的砖头被汗用来建造新的乌耳朵(斡耳朵。——译者)。大清真寺是由阿利姆的兄弟和继承人奥马尔汗修建的,与自己的前任不同,他被认为是一位虔诚的君主。权力转交给奥马尔汗本身就是由乌兹别克首领挑起的,他们在汗远征吉尔吉斯人[3]的时候在塔什干发

289

[1]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仅包括"所有臣服于浩罕汗的哈萨克人",而且还包括相当一部分定居于楚河谷地以及吉尔吉斯北部其他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南部的居民以及毗邻费尔干纳谷地的居民、阿赖河地区的居民,可能还有天山中部地区的居民都不隶属于塔什干伯克利亚尔伯克。在马拉汗统治时期(1858—1862年),正如史料所表明的,"管理吉尔吉斯人的"阿利姆伯克与塔什干统治者卡纳特沙·帕尔瓦纳齐一样都是浩罕汗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卜杜勒·马吉德《浩罕汗国旅行报告》,12)。关于浩罕汗国吉尔吉斯人的资料,参见乌先巴耶夫《浩罕汗国时期吉尔吉斯人的社会经济关系》。——B.罗莫金

[2]大概B.B.巴托尔德的根据是尼亚兹·穆罕默德的记载,其中谈到阿利姆汗组织了两支军队。其中一支是由卡拉特人、瓦希奥奇人、舒格南人以及巴达赫尚人等组成的,另一支是由邀请来的伊朗人、赤特拉尔人以及来自贡特的士兵组成(尼亚兹·穆罕默德《费尔干纳统治者史》,第42-44页)。——B.罗莫金

[3]哈萨克人。——Б.加富罗夫

动了反对汗的起义。阿利姆汗被几乎所有的臣民所抛弃，在回浩罕的路上被起义者追上杀死。

如果说新汗国的政治任务是在其缔造者统治时代已经确立的话，那么文化工作的开创则是在其继承人时代。无论在奥马尔汗时代，还是在他的继承人时代，乃至于在像奥马尔残忍的儿子穆罕默德·阿里或玛达里(1822—1842年)这样的统治者的时代，都曾大兴土木，并修建了灌溉工程。浩罕大迈德赖塞的建造和汗渠的敷设都是与玛达里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运河的源头在塔什干以南地区的托伊秋别村上游。除了建筑物和灌溉工程以外，在奥马尔汗时代还开始编写了大量的文学著作。编著了当时75位浩罕诗人的诗集，实际上有更多作家(101位)的代表作被收入到集子中来，其中就包括汗本人的作品在内。在浩罕没有像希瓦那样的官方历史编纂学，但浩罕不仅编著了几种彼此独立的关于地方史的大部头资料汇编，而且还编著了关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历史的资料汇编。虽然汗国与外部敌人的斗争没有停息，而且由萨尔特居民与钦察乌兹别克家族之间的争斗而引起的内部骚动也愈演愈烈，但即使在胡德亚尔汗(1845—1858，1862—1863和1865—1875年)的不幸统治时期，所有三个领域的文化工作都依然在继续，这三个领域分别是：建筑事业、灌溉工程以及大部头历史著作的编纂。有关后者的信息收集在几种专门的著作中。在胡德亚尔汗时代的建筑中特别闻名的是他在浩罕的宫殿(乌耳朵)，这座宫殿用五颜六色的琉璃瓦罩面，虽然这些琉璃瓦给有艺术品位的人留下了模仿帖木儿和帖木儿帝国时代建筑的印象。费尔干纳运河主干线中的一条——乌鲁格纳尔运河就是在胡德亚尔汗统治时期开凿的。工程开始于1868年，持续了3年，虽然每一年只连续施工2个月。有4000人参加了工程的修建。[1]在浩罕汗国时代费尔干纳一向在突厥斯坦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占据着它此前从未有过的杰出的地位，并且它一直把这种地位保留到了俄罗

290

[1]米登多夫《费尔干纳盆地概论》，附录第21页。奥斯特罗乌莫夫认为(《颂胡德亚尔汗》，第194页)工程没有完工。

斯统治时期。在汗统治时代实物财产超越货币财产占据优势地位，汗的绝大部分收入是实物（谷物和米）而不是货币。货币赋税是用梯拉（金币）来计算的。名为“塔纳普”的赋税按户征收，并且像12世纪哈剌契丹统治时期一样，在塔什干每户收取一个金币（梯拉），虽然赋税的数额是根据某种当户数总共只有3000户时的旧统计清册来确定的，当户数增加到20000户的时候，依然按照这一数量（3000梯拉）来征收。在俄国人统治时期，种棉业和养蚕业的发展使得大量资金流入费尔干纳。物价比突厥斯坦其他地区更高，这引发了某种经济危机，可能也引起了居民群众的不满，他们依据老传统总是认为食品“价格低廉”（阿尔赞雷克）是地区繁荣和“稳定”（京齐里克）的主要象征。但是，从总体上看，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共同的经济利益在费尔干纳创造了一种比在其他地区，譬如比落后的撒马尔罕（那里的整个经济生活依然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更适合于土著居民与俄罗斯人在共同发展文化工作的基础上彼此接近的条件。在费尔干纳那些在汗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城市依然保留着自身的作用。从前汗的首都浩罕就其居民数量（11.3万人）而言是突厥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而俄国人建立的城市斯科别列夫（新马尔格兰，现在的费尔干纳），即费尔干纳州州长的治所总共有1.2万人。

可能，布哈拉埃米尔把自己在俄罗斯统治时期的作用归结为旧的传统。尽管布哈拉汗国的幅员比不上浩罕汗国，但是布哈拉埃米尔却是3个主要突厥斯坦统治者中唯一一位努力确立自己对整个突厥斯坦统治地位的人。在布哈拉，汗与贵族之间残酷斗争的爆发要晚于希瓦和浩罕，只有到了埃米尔纳斯鲁拉（1827—1860年）时，才竭力有意识地削弱乌兹别克家族的权势。他剥夺了他父亲统治时代权倾朝野的库什别吉哈基姆的权力，之后又将其处死，出生于大不里士的波斯人阿卜达斯·萨米特（可能是阿卜达斯·萨马德）取代了出身于乌兹别克显贵家族的大臣，成为地位仅次于埃尔米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封号更为谦虚，叫做“助手”（纳伊布，наиб）。在“铲除布哈拉封建主义”（哈内科夫语）的事业中，土库曼人拉赫曼·别尔德是埃米尔的另一位助手。

291

在平息了内部的敌人之后,埃米尔开始致力于对外征服活动。1842 年他成功地征服了浩罕,残忍的玛达里汗和他的儿子被处死,此后埃米尔开始进行与希瓦的战争,但却很少获得胜利,战争以 1845 年和约的签订而告终。无论是纳斯鲁拉还是他的继承人穆扎法尔(1860—1885年)都没能成功地保持住对浩罕的统治权。1863 年穆扎法尔穿过整个费尔干纳到达喀什噶尔边界,他没能完全战胜钦察人肃清整个地区,并且他根据钦察人的愿望,把胡德亚尔汗带到了布哈拉。1865 年他再次占领了浩罕,但他再一次确信,他无法在那里站稳脚跟,于是重新恢复了胡德亚尔汗的汗位并返回了布哈拉,他还把宗教界的主要代表迁出浩罕,运走了那里所有的大炮和武器。布哈拉埃米尔也对浩罕北部提出了领土要求。脱离了浩罕汗国并承认埃米尔纳斯鲁拉对自己统治权的塔什干和突厥斯坦的总督,还在 1845 年就曾成功地发动了对希瓦霍加尼亚兹要塞的进攻。1865 年穆扎法尔派遣伊斯坎杰尔伯克到塔什干担任哈基姆,他在切尔尼亚耶夫攻城期间担任城市的首脑,城市陷落之后他逃往布哈拉,在那里被埃米尔处死。

与其他汗国相比,布哈拉汗国是在不太沉重也不太屈辱的形式下归附俄罗斯的。只是与布哈拉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1873 年),而浩罕汗国则被完全消灭,希瓦汗也被迫承认自己是"全俄罗斯皇帝的恭顺仆人"。后来还承认布哈拉埃米尔"汗殿下"的尊号,而希瓦汗起初获得的是"殿下"的尊号(这两种称号取代了俄罗斯在与中亚领地交往中起初所使用的"亲王殿下 высокостепенство"的称号)。后来也称希瓦汗为"殿下"。布哈拉埃米尔可以直接与突厥斯坦总督,之后又直接与彼得堡接洽,而与希瓦汗之间的联系则是通过阿姆河军事区的长官来进行的。布哈拉埃米尔特殊地位的形成,除了受历史传统的影响以外,也受征服史上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影响。虽然埃米尔几次被打败,并失去了自己的大部分领土,但俄罗斯军队从未进入他的首都。丧失的领土由归并到布哈拉的吉萨尔边区和其他地区来补偿,这些地区现在构成了汗国的东部,而希瓦从未获得任何领土来补偿其在1873年的损失,当时俄国夺取了希瓦汗国从锡尔河到阿姆河的整个东部地区。19

世纪 80 年代，希瓦政府希望利用俄罗斯在土库曼取得的成就来恢复希瓦对穆尔加布的统治地位，可能这一计划在塔什干获得了同情，但由于阿什哈巴德和梯弗里斯当局的坚持，也由于土库曼人自身的愿望，希瓦的要求最终被拒绝，整个土库曼都被直接归并到俄罗斯。

在两个保存下来的汗国中无论是在俄罗斯征服之前，还是在俄罗斯统治时期，希瓦都表现出了比布哈拉更强的发展文化的倾向，尽管有铁路通过布哈拉汗国，而希瓦汗国没有铁路。希瓦汗国更关心地方交通的发展。由于有大量的桥梁，希瓦公路运输的条件甚至比费尔干纳更为有利，而在布哈拉汗国的东部地区根本没有马车运输，货物只有通过驮运的方式来运输。至于文学创作活动，19 世纪在布哈拉汗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沙里亚，其他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几乎都受到完全的压制。在历史学领域突出的只有一部还在海达尔统治初期就已经编撰的著作。布哈拉那些拥有固定寺院不动产收入的图书馆，还在纳斯鲁拉时代就已经完全破产，埃米尔本人的图书馆不对俄罗斯学者开放，图书馆自身是一种消极的存在。同时可以断定的是，图书馆中的珍贵手稿不断地被窃取并被卖给境外公共图书馆代理人，只是在政治代办处的协助下才成功地将一些手稿运到了彼得堡。另一方面，由于穆罕默德·拉希姆的关注，希瓦汗国宫廷图书馆的藏书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一位俄罗斯研究者获准自由进入这个图书馆。[1]

293

〔1〕B. B. 巴托尔德指的是 A. H. 萨莫伊洛维奇，他 1908 年到过希瓦，参观了希瓦汗的图书馆和宫廷石印品。A. H. 萨莫伊洛维奇未发表的关于藏书和石印品的报告保存在他的档案中（国家公共图书馆手稿部，Ф. 671. on. 1，№. 145）。——Ю. 布列格利

6　俄罗斯统治时期的定居生活和游牧生活

突厥斯坦与西伯利亚不同,俄罗斯政府在突厥斯坦完全有可能实行自己的政策。国家疆界向西伯利亚的扩张是与人民群众的自发活动相连的,一般来说人烟稀少的新土地是被那些寻找土地的先驱者占领的,政府当局和军队只是在此之后才出现在这里,才在被征服的地区发现事实上已经确立起来的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并不得不对这种生活方式予以尊重。1603年,哥萨克首领涅柴带领亚伊克河流域的哥萨克侵扰老乌尔根奇差不多是向突厥斯坦进行这种活动的唯一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以失败而告终,并且再也没有进行过。人口比较稠密、文明水平相对比较高的突厥斯坦不能以西伯利亚那样的方式并入俄罗斯。占领突厥斯坦是根据政府当局的命令来进行的,被占领地区及其居民的命运也是由政府当局来主宰的。政府政策的不连续性和多变性不是由于在实现政府创举的时候受到了任何外来的阻碍,而是由于政府自身的摇摆不定造成的,这种摇摆不定的根源在于政府对突厥斯坦的现代生活及其过去的历史还缺乏足够的了解。

俄罗斯当局对吉尔吉斯[1]汗统治自己臣民的能力估计过高,认为汗加入俄国国籍能够保证其臣民的驯服性,因而倾向于扶持汗政权。第一位这样的俄罗斯臣民就是小帐汗阿布海尔,他把俄国人在奥里河口建立的要塞看成是在草原发生暴乱的情况下可以在这里寻求避难的地方。汗希望俄罗斯人能够永久确定他在其家族中的优势地位。后来俄国人确信,汗做出的承诺丝毫也不能保障吉尔吉斯人[2]的驯服性,

〔1〕哈萨克。——Б.加富罗夫

〔2〕哈萨克人。——Б.加富罗夫

甚至不能保障俄罗斯商队的安全，就是汗本人也没有赋予自己的承诺以任何意义。汗的誓言没有使他的继承人承担任何义务，所以小帐汗多次建议俄国授予自己俄罗斯国籍。就国籍问题与俄罗斯签订的条约并没有妨碍他们与中国和中亚统治者也签订同样的条约。汗的尊严被逐渐削弱了，但是根据 1822 年条例的规定，政权依然掌握在草原贵族——苏丹，即成吉思汗后裔的手中。只是根据 1868 年 10 月 21 日在乌拉尔、图尔盖、阿克摩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实行的暂行条例，“贵族”的统治地位才被取消，并实行了无视贵族任何特权的全民选举制度。消灭“贵族”的特权促进了氏族制度[1]的解体。如同在一部最优秀的关于吉尔吉斯人法律生活习俗的著作中所指出的[2]，“富人和酋长是氏族思想的载体。除了自己直系祖先的名字、自己的世系和辈分之外，穷人对远房支系亲属的情况一无所知”。政府在 1867 年批准突厥斯坦州的第一个（暂行）条例时，竭力要达到削弱氏族制度基础的目的，因此在将吉尔吉斯[3]领土划分为乡的时候，“尽可能地将各个家族之间的界线名称打乱”。1886 年 6 月 12 日的条例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游牧地区的乡现在已经不是根据家族来命名，而是根据过冬地的天然界线名称来命名。在俄罗斯学术文献中，对与氏族制度的基础进行这种斗争到底有多大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赞成进行这种斗争的观点认为这是由“大氏族在一个始祖统治下联合起来在政治上”具有的危险性所决定的。此外，认为“旧传统的消失”，甚至“旧的历史名称”的消失有利于巩固俄罗斯的统治地位。[4]

294

另外，笔者在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还听到一种论据，说没有氏族制度的解体就没有吉尔吉斯人向农耕和定居生活的转变。游牧生活与氏

---

〔1〕哈萨克人同吉尔吉斯人、卡拉卡尔帕克人以及其他中亚民族一样，仅仅保留了氏族（也就是原始社会）制度的残余。B. B. 巴托尔德在这里使用“氏族制度”这一术语，主要是指在游牧民中保留了氏族部落组织和父系社会的残余。比较以下巴托尔德自己引用的关于在哈萨克人那里存在着不平等社会现象的资料。——B. 罗莫金

〔2〕格罗杰科夫《锡尔河州的吉尔吉斯人和卡拉吉尔吉斯人》，第 12 页以下。书评：韦谢洛夫斯基，载《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会论丛》，第 5 卷。

〔3〕哈萨克。——Б. 加富罗夫

〔4〕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 3 卷，第 343 页。

族制度之间的联系的确不容置疑。没有能力游牧的穷人是最早转向定居生活的人，他们被称为札塔克(джатаки，字面意义为“躺着的人”。中世纪使用的术语奥图拉克отурак“坐着的人”更符合俄文“定居的”

295 一词)。游牧的能力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具有代表性的是，在乡选举中起重要作用的富豪被称为阿特卡姆纳尔 аткамнар，即“骑马的人”。在谈到一位阿特卡姆纳尔时有一句吉尔吉斯语是这样表述的：“玛玛阿克的牲畜多得可以游牧。”[1]随着向定居生活的转变和农耕文明的发展，氏族的划分逐渐消失了，从前那些与游牧人口或半游牧人口尚武生活习俗相关的神话和诗歌也被遗忘了。在俄罗斯征服时期，在土库曼人那里盛行的即使不是游牧生活习俗(土库曼人都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至少也是氏族制度和尚武倾向，而在俄罗斯的统治下土库曼人逐渐失去了对过去的记忆，在俄罗斯时代他们在外里海地区种植棉花，这取代了他们以前从事的抢掠活动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2] 在梅尔夫绿洲，一位俄罗斯突厥学家在 20 世纪初也就是绿洲归并到俄罗斯总共只有 20 年之后就发现这里的民族语文学已经完全衰落，他遗憾地对自己的谈伴说：“看来，棉花已经把你们脑海中的所有神话和诗歌都赶走了。”[3]关于俄罗斯统治时代游牧生活习俗衰落的情况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这一过程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1867 年突厥斯坦的游牧居民占总人口的 84%，到 1875 年这一比例缩减到 57%，而到了 1877 年在合并了费尔干纳之后，又缩减到 47%[4]，到了革命前夕，人们认为游牧人口总共占突厥斯坦农村人口的 30% 左右。[5] 另一个问题是，游牧生活方式的解体以及与此相连的畜牧业的衰落到底在多大

---

[1]季瓦耶夫《民族学资料》，第 17 页。

[2]在 1890—1896 年《外里海州概述》一书中指出，在俄罗斯人统治前尚不存在的种棉业，现在可以给居民带来 30 万卢布的年收入。从 1902 年到 1913 年在外里海州，种植棉花的土地的数量从 10300 俄亩增加到 41500 亩，也就是增加了 3 倍(《亚洲俄罗斯》，第 2 卷，第 277 页)。

[3]萨莫伊洛维奇《三个土库曼神话》，第 119 页。——Б. 加富罗夫

[4]科斯坚科《突厥斯坦边区》，第 1 卷，第 335 页。马克舍耶夫在 1868 年合并撒马尔罕之前确定突厥斯坦总督区的居民人数按照整数计算有 100 万人，其中定居人口 30 万人，游牧人口 70 多万人。

[5]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 352 页。革命后的统计数据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比较巴拉舍夫《突厥斯坦经济地理简论》。

程度上符合突厥斯坦和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利益。突厥斯坦的定居居民以往总是从自己邻居的游牧经济中获得利益，他们以比其他条件下更低廉的价格购买畜牧产品。一些俄罗斯官方的代表如佩罗夫斯基（1833—1842 年，第二次是在 1851—1857 年）认为吉尔吉斯[1]的畜牧业对俄罗斯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甚至采取强行措施反对吉尔吉斯人转向农业生产。其他一些人像卡捷宁（1857—1860 年）则相反，他们鼓励从事农业生产，认为游牧民转向定居是绥靖草原的必要条件，农耕的发展则是转向定居生活的必要条件。吉尔吉斯农耕业的发展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突厥斯坦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从游牧民牲畜头数减少、肉类价格上涨、当地马群品种退化这样一些事实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危害要大得多，为保护树木和原始灌木丛而采取的措施，特别是为保护河流两岸所谓吐加依森林中的树木和灌木丛而采取的措施，也使得牲畜的总头数减少了。需要指出的是“放牧牲畜给幼林尤其是给其幼芽带来的危害是不可修复的”，精心保护“山林以及草原上和吐加依林中的灌木丛”是必要的[2]，但同时畜牧业衰落所造成的损失也大大超过了国家经营由护林员所保护的吐加依森林所获得的收益[3]。再者，转向定居生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游牧民族丧失自己的民族性格，不是促进了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与俄罗斯人的融合，而是促进了他们和与其有着同样血统同样宗教信仰的萨尔特人和鞑靼人的融合，使得更纯粹的突厥方言和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被人为创作的带有许多阿拉伯和波斯词汇以及整个穆斯林世界经院哲学知识的标准语所代替，这种经院哲学知识的作用仅仅是使俄罗斯和欧洲文明难以在这里植根。

296

297

---

〔1〕哈萨克。——Б. 加富罗夫

〔2〕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 517 页。

〔3〕雷科申注意到了由于禁止在林场放牧而给畜牧业甚至给定居的畜牧业带来的危害（《定居的畜牧工人》，《撒马尔罕报》，1904 年，№95）。文中也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游牧民转向定居生活是不可能保护畜牧业的。雷科申在另一个地方（《恰普库鲁克乡》，第 170 页及下一页）谈到必须要在苦盏县恰普库鲁克乡马尔古姆村设立学校，以便“在萨尔特的死板知识渗入这里并站稳脚跟之前，使恰普库鲁克乡可爱的吉尔吉斯居民能有机会学习俄语”。

7 学校

与中世纪的突厥斯坦不同,19世纪的突厥斯坦属于伊斯兰世界中最落后的国家。但是布哈拉却保持了自己从前神学教育中心的荣耀,并且不仅吸引来了突厥斯坦地区的学生,而且吸引来了伏尔加河沿岸的学生。此外,由于在曼格特家族统治时期经济繁荣普遍恢复,18世纪中断的撒马尔罕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生活又得以重新恢复,虽然没有达到从前那种辉煌的程度。最后,由于资金流入费尔干纳,浩罕汗在浩罕和安集延建立了一些规模庞大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布哈拉与直接合并到俄罗斯的那些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为1868年的划界而产生困难,只是在抽取布哈拉汗国境内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财产收入,用于突厥斯坦总督管辖区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或相反抽取突厥斯坦总督管辖区内宗教学校的财产收入用于布哈拉汗国境内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1869年,由于不允许撒马尔罕霍加阿赫拉尔麻札的穆泰瓦里从位于卡尔希州的财产中获得收入,此后俄罗斯当局也禁止布哈拉机构从自己位于俄罗斯境内的财产中获取收入。但是,撒马尔罕的2所主要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蒂利亚卡里和希尔达尔(它们的收入超过其他所有16所撒马尔罕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收入的总和)[1],由于自己的穆泰瓦里向布哈拉埃米尔提出了特殊请求,所以被允许在汗国的领地内获取其应得的收入。

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备者K.П.冯·考夫曼主张建立一种忽视伊斯兰教宗教界和伊斯兰机构其中包括教学机构的体系。俄国中心地区的伊斯兰首领奥伦堡穆福提(众所周知,他居住在乌法)试图利用俄罗斯

[1]所有这18所宗教学校的名单,见维尔斯基《关于泽拉夫善河地区的资料》,第116页;与维亚特金的著作(《论撒马尔罕州的寺院不动产》,第103页)一样,书中列举的数据是38000坚加。前面(第114页)说有19所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

的军事成就来使突厥斯坦的穆斯林臣服于自己,但遭到了失败。根据 298
考夫曼的命令,穆福提派来发号施令的毛拉被赶出了突厥斯坦。考夫曼也终止了在其前任时代开始的与当地穆斯林机构的官方接触。在塔什干居民通过翻译别克丘林呈交给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的呈文中,提出了承认他们的总卡迪(卡迪卡延)拥有与俄国奥伦堡穆福提同等权利的希望。切尔尼亚耶夫发布官方命令任命一个曾在汗那里担任卡迪卡延的人就任这一职位。伊斯兰教艾尔谢赫的职位(卡迪卡延的长兄担任了这一职务)也被保留下来。在考夫曼时代,这两个职位都被撤销了。从那时起,在突厥斯坦只剩下一些彼此地位平等的卡迪(在塔什干这种卡迪有 4 人,每个城区 1 人),没有总卡迪。

根据 M. A. 捷连季耶夫的说法,考夫曼"否定了任何想在这里筹办伊斯兰教固定机构的各种尝试,那些现存的机构则听凭他们自己挣扎着存在下去,正如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他们得不到俄罗斯官方的任何支持"[1]。

同样的原则也被他运用到学校中去。他认为当国家根据时代精神和国家需要设立兼招俄罗斯人和土著人的学校时,当地的教会学校便将自行消失。[2] 由政府所设立的这类学校不带有任何宗教特性,也不侵犯穆斯林的宗教信仰。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夫曼组建了一个 3 人委员会,这 3 个人分别是:总督办公厅特别事务处事务员 M. И. 布罗多夫斯基(主席,农学家),特别委任的官员 A. Л. 库恩(东方学家)和骑兵大尉 M. A. 捷连季耶夫。委员会的工作持续到 1873 年,尽管委员会在 1871 年就已经制定出教学事务的规划方案。在创办学校时所关注的不仅是使某些最有才能的土著人掌握俄罗斯文化,而且还要在"异族群众中"传播俄罗斯

[1]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 3 卷,第 271 页。

[2]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 338 页。"打算筹建一系列土著人和俄国人兼招的学校,并采取措施消除狂热的伊斯兰定居居民对游牧民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保存下来的伊斯兰学校得不到政府任何庇护,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应该逐渐丧失自己的宗教和政治意义。"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下半期之前,俄罗斯官方几乎完全没有干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内部生活(克伦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的迈德赖塞》,第 25 页)。

文化。“由于吉尔吉斯人和萨尔特人在道德水准和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所以认为必须要在吉尔吉斯居民生活的地区也就是草原地区开办另外一些层次低于城市和乡村的学校。方案规划了下列几种学校：(1)塔什干男子中学，根据普遍教育的原则，异族孩子可以进入该校读书。后来又规定土著居民的子女必修一门古代语言而不是两门。(2)三年制初级师范学校，教授土著语言，其中招收20名公费生。(3)师范学校附属示范学校，招收50名自费生，其中俄罗斯学生20名，土著学生30名。(4)县民族学校，设有四年制普通教育班和手工艺技能培训班，既招收俄罗斯学生，也招收土著萨尔特学生，但其中有20名吉尔吉斯学生，他们是未来草原学校的教师，学校只为异族子女开设土著语言课程。(5)吉尔吉斯初级识字学校，只教授俄语和吉尔吉斯语的读写和算术。如同县立学校一样，在识字学校中也打算使用俄文音标教授土著语言。

299

方案几经修改之后在1875年5月17日(公历5月29日)[1]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并逐渐得以实施。有一些为土著人开办的学校还在方案批准之前已经创立，并且这些学校是以考夫曼的想法作为办学基础的，考夫曼的思想就是必须在学校中进行“那种根据当地情况以后保证能有可靠收入的手艺和技能教育”，并且必须招收女孩上学。还在总督区设立之前，在佩罗夫斯克(从1863年起)和卡扎林斯克(从1865年底起，设有星期日女子学校)就已经存在一些为吉尔吉斯人开办的学校(俄罗斯孩子在这里只是走读生，而吉尔吉斯学生是寄宿生，寄宿生的编制有时还不满)。在总督区设立后，1870年在撒马尔罕为土著人开办了第一所俄罗斯学校(A. Л. 库恩当时在撒马尔罕供职于泽拉夫善州长官阿布拉莫夫将军处，负责研究寺院不动产事务)。学校是“为了满足泽拉夫善州和撒马尔罕城土著居民让子女学习俄语的愿望”而

[1]根据1875年5月17日的法律，所有的土著学校都要服从俄罗斯国民学校督学的监督，但是这种监督没能实现。督学一职本身只是在总督罗森巴赫时代才设立，也就是1884年以后才设立的。

开办的。[1] 在塔什干到了1871年才开办了一所“设有男女生兼招手工业班的三年制民族学校”。此外,1875年还在奇姆肯特利用当地神甫沃兹涅先斯基的资金建立了一所带有女生部的民族学校。所有这些学校在1876年都被纳入总督下辖的学部管理,而到了1878年,在突厥斯坦根据1872年5月31日最高当局批准的条例而创立的两年制市立学校开办后,它们便都被改造成这样的学校。 300

最早的一批吉尔吉斯学校辜负了寄予它们的希望,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评论说:“这些学校既没有培养出一位俄罗斯化的人,也没有培养出一位有学问的吉尔吉斯人。”[2]委员会关于萨尔特人比吉尔吉斯人更善于掌握俄罗斯文明的观点也没有得到证实,С. М. 格拉梅尼茨基[3]评论道:“与萨尔特人相比,更大量的吉尔吉斯人进入学制更长、教学大纲内容更多的学校,例如进入市立学校、师范学校和中学。”最后,这位活动家还评论说,“尝试在土著居民群众中推行一种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准备的教育”还为时过早。[4]

另一个问题是,不成功的原因是否仅仅是由于居民对领会欧洲文明没有做好准备呢?或者是因为学校的创办者不了解边区及其居民的需求呢?“没有准备”的情况应该是逐年在减少,而同时在官方学校中土著学生的数量有时不是逐年增加,而是逐年减少。在塔什干中学,到1883年1月1日土著学生的数量达到了最高点,在男子中学的286名学生中有20名土著男生(7%),女子学校的333名学生有10名土著女生(3%)。到1896年1月1日,男子中学的327名学生中只有10名土著男生(3%),女子中学的377名学生中只有8名土著女生(2%)。根据1909年的资料[5],男子中学中的穆斯林学生大约占2%,女子中学中的穆斯林学生只占1%。后来在费尔干纳州和撒马尔罕州创建的中学中,土著学生的数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在新马尔格兰(斯科别列夫,

[1]1874年学校里有一名教师,39名男生(没有女生)。

[2]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269页。

[3]《突厥斯坦边区民族教育发展概论》,第9页。

[4]《突厥斯坦边区民族教育发展概论》,第8页。

[5]多布罗斯梅斯罗夫《塔什干的过去和现在》,第224页、226页、231页及以下。

现在的费尔干纳）男子中学，截至 1905 年 1 月 1 日，在 209 名学生中有 6 名穆斯林学生（3%），到 1912 年 1 月 1 日，在 229 名学生中有 7 名土著学生（也是 3%），在女子中学里穆斯林女生所占的数量分别是：229 名学生中有 1 名（低于 0.5%），365 名中有 5 名（低于 1.5%）。还在 1879 年俄罗斯当局就希望吸引当地土著学生进入中学学习。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指出，1879 年 6 月 1 日塔什干和韦尔内初级中学为在这里学习准备升入该校的异族学生和俄罗斯学生设立了特殊的异族学生寓所（俄罗斯学生10人，异族学生15人）。塔什干的异族学生寓所后

301 来被移交给师范学校，在这之后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很快便被取消了（按照多布罗斯梅斯罗夫的说法[1]，师范学校异族学生寓所存在的时间是从 1886 年到 1895 年，并且其中一部分学生是在中学就读，另一些学生在师范学校就读。在寓所关闭之后，他们便改由国家奖学金供养）。在师范学校存在的前 25 年（1879—1904 年），共有 415 人在这里学习，其中吉尔吉斯人 54 名（占 13%）和其他土著人 13 名（萨尔特人、鞑靼人和土库曼人）（占 3%）。在 415 名学生中有 245 人毕业，在这个数字中土著学生占多大的比例，在我能得到的资料中没有指出相应的数据。1880 年师范学校中的学生数量急剧增加（截至 1880 年 1 月 1 日有 19 人，其中有 2 名是土著学生。到 1881 年 1 月 1 日增加到 39 人，其中有 7 名土著学生），在 1886 年学生数量急剧减少（截至 1886 年 1 月 1 日有 61 人，其中 9 名土著学生，到 1887 年 1 月 1 日减少到 31 人，其中有 5 名土著学生）。不管怎么说，由于师范学校从总体上看培养的学生数量包括土著学生在内[2]微不足道，所以它没有完成 А. Л. 库恩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所提出的任务："通过在异族居民中推广俄罗斯

---

[1]多布罗斯梅斯罗夫《塔什干的过去和现在》，第 230 页。

[2]与奥斯特罗乌莫夫饶有趣味的报告相比较（《突厥斯坦边区土著人教育观的波动》，第 142 页），报告指出师范学校起初使用俄文字母教授吉尔吉斯（哈萨克。——Б. 加富罗夫）语，为此教员 Я. Я. 卢特什在 1883 年编写了一个文选读本（比较对其音标的否定评论，见梅利奥兰斯基《哥萨克 - 吉尔吉斯语简明语法》，第 1 册，第 5 页）。同一年开始教授萨尔特语，1885 年开始教授波斯语。吉尔吉斯语的教授被停止了，虽然有一批吉尔吉斯学生（哈萨克。——Б. 加富罗夫）进入师范学校，他们入校后学习"萨尔特语和波斯语的伊斯兰文献"，这巩固了伊斯兰书面文学对吉尔吉斯学生的影响。

教育来促进他们(sic)和俄罗斯民族的亲善。”

在这方面寄予市立学校许多期望。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在1879年就已经指出了一个可喜的事实[1]:土著人表现出了对俄罗斯学校的信任,土著子女进入寄宿学校,有学生其中也包括成年人来参观学校,“生活本身使其意识到必须要研究俄罗斯文字和俄罗斯语言”。在奇姆肯特女子学校甚至有两位萨尔特小姑娘在学习。让土著人和俄罗斯人在一起接受教育对双方都有好处:“土著人可以通过此尽快地与自己的俄罗斯同学亲近起来并掌握俄语口语;俄罗斯学生也可以通过此与土著人亲近起来并不再对他们抱有偏见。双方都能忘掉种族纠纷,彼此不再不信任。”

新旧学校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对待教授土著文法和伊斯兰教义的态度。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评论说:“根据对1872年5月31日最高当局批准的关于市立学校条例第13条的附注,寄宿生不学习伊斯兰教文字和伊斯兰教宗教课程。”授课用俄语进行,教师“只有在向土著学生解释他们所不明白的语句时”才使用突厥方言。但是只是取消了穆斯林学生的宗教课程,从总体上看承认宗教课是必修的公共课的一部分,并且信仰东正教的孩子要学习宗教课程。原先允许对穆斯林学生进行宗教教育,当时主持学校事务的官员格鲁兹季在1863年为佩罗夫斯克学校订购了20册鞑靼识字课本和10册赫夫恰克(古兰经选编)。1868年考夫曼造访佩罗夫斯克,他完全允许在给信仰东正教的学生讲授神学时由毛拉给穆斯林学生讲授“相应的课程”,他甚至把相应的任务交给当地的一位毛拉,肩负该使命的毛拉每年有100卢布的薪水。 302

〔1〕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109页以下。

与此相反[1]，А.Л.库恩在1879年8月30日师范学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则坦白地说俄罗斯学校不能教授“那种与本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不一致的宗教教义，尤其是不能教授那种与基督教精神相对立的学说。家长有权自行对其子女进行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原则的教育”。最后一个原则完全违背了穆斯林国家的传统，在穆斯林国家一直把宗教教育视为是学校的职责。俄罗斯学校很难指望得到土著人特别是酷爱宗教的萨尔特人的信任，因为这些学校对神甫开放而对毛拉关闭，在这些学校里土著孩子必须穿上与俄罗斯孩子一样的校服。在最初的几年，塔什干学校吸收来的土著孩子的数量比后来要多。1886年1月1日前招收的土著孩子数量最多：628名学生中土著学生有215名，占了34%。到1896年1月1日，市立学校中的土著学生为138名，学生总数为878名，也就是占了15.7%。佩罗夫斯克学校从锡尔河州的县城学校中招收的土著学生最少，1911年这里的117名学生中总共只有6名吉尔吉斯人和1名鞑靼人，虽然学校的学生宿舍可以容纳40人，而且其中的2/3是为吉尔吉斯人提供的。1910年突厥斯坦市立学校中的土著学生最多，82名学生中有28名（23个吉尔吉斯人，4个萨尔特人和1名鞑靼人）是土著学生（占了34%）。突厥斯坦城中俄罗斯居民的数量与土著人相比完全是微不足道的。根据1897年的普查，在11253名居民中总共只有312名俄罗斯人（占2.8%）。

303

后来当着手开办俄罗斯土著学校的时候，政府自己放弃了在国立学校中伊斯兰教义不能成为教学课程的原则。开办这种学校的倡议开始于考夫曼时代，并且其首倡者是塔什干商人赛义德·阿齐姆，还在汗统治时代他就与俄罗斯人做生意。1859年他从塔什干赎回了一名俄

[1]考夫曼对伊斯兰教和反伊斯兰教宣传的态度总起来讲是缺乏连续性的。虽然他对鞑靼人的“草原传教活动”持否定态度（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12页），但他又废除了反对这种现象的措施，所以草原传教活动在他统治时期取得了成就（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271页）。虽然他不允许在突厥斯坦传播基督教（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43页以下），但1873年他却请求大臣托尔斯泰伯爵派像Н.И.伊利明斯基这样的东正教捍卫者到突厥斯坦建立师范学校，此后喀山神学院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在突厥斯坦创建国民教育机构的活动（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7页；多布罗斯梅斯罗夫《锡尔河州的城市》，第92页以下）。

国俘虏,如圣旨所言1866年在亚历山大二世逃脱4月4日的暗杀之际,他建立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清真寺”,1867年上面提到的圣旨赐予他世袭荣誉公民的称号。[1] 但是,赛义德·阿齐姆·巴伊的思想(Н.П.奥斯特罗乌莫夫认为[2],这种思想是由当地的一位官员灌输给他的)与后来所实行的方案很少有共同之处。塔什干商人建议对塔什干的一所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伊尚库尔)[3]进行改革,在学校中教授俄罗斯公文、俄国法律、算术和手工艺,同时仍然讲授沙里亚。打算把俄罗斯公文运用到土著语言中去,可能指的并不是教授俄罗斯语言和文学。虽然这一计划违反了原则,不应该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赋予土著旧学校新的生命力,但赛义德·阿齐姆·巴伊的思想还是得到了地方当局的赞成。[4] 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委员会制定了具体细节、编制了预算,同时打算“编写一种由一些最简单的故事组成的阅读文选,文选采用当地方言但标有俄语注音”。地方行政当局曾就从东方语言系引进大学生到筹划建立的学校中任教的问题与圣彼得堡学区督学进行过接触。正如А.И.多布罗斯梅斯罗夫在一本关于塔什干的书中所说,这一方案没有实现的原因未必仅仅在于“完全缺乏教员”。 304

俄罗斯土著学校的真正创办开始于总督罗森巴赫时期(1884—1889年)。与以前观点不同的是,现在“为了俄罗斯伊斯兰学校能够获

---

[1]根据斯凯列尔的说法(斯凯列尔《突厥斯坦》,第1卷,第100页),赛义德·阿齐姆·巴伊是获得这一称号的第二个塔什干人。第一个人是阿利姆·哈吉·尤努索夫,他是来自平扎的鞑靼人,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不久移居塔什干。

[2]《萨尔特人》,第三版,第100页。

[3]伊尚·库里·达德哈是伯克利亚尔伯吉之子,1840年前后他在舍伊汉塔乌尔陵墓附近建立了一座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比较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马德拉塞》,第9页。在突厥斯坦城也有一所伊尚库尔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比较多布罗斯梅斯罗夫《锡尔河州的城市》,第134页,在这里这所伊尚库尔被称为“达特哈”,并且它被认为是属于“大约100年前”的建筑(也就是19世纪初的建筑)。

[4]切尔尼亚耶夫时期(1882—1884年)产生的方案同样也得到了赞许,但同样也没有实现。为研究这一方案成立了一个“主要由土著人”构成的委员会。在所设计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中打算开设俄语、历史、地理等课程。预计学校的开支来自于纳扎尔比伊寺院不动产,这些不动产则来自于被没收并被移交给突厥斯坦慈善协会支配的伯克利亚尔伯吉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克伦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的迈德赖塞》,第36页)。关于1835年前后成立的伯克利亚尔伯吉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比较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马德拉塞》,第8页。

得成功”承认“在学校里必须由毛拉给土著学生开设伊斯兰教课程”[1]。1884年罗森巴赫召集的“秘密”委员会像从前一样赞成在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课程中增加普通科目。此后这一方案按照总督的愿望被创建俄罗斯土著学校的方案所取代。[2] 主要打算在那些居民极不可能了解俄语的地方开办学校,如农村和偏僻的城区。草原上的学校大概甚至有“可能毫无困难地随着阿乌尔定期改换游牧地而迁移”。这一打算落空了,从1888年起学校开始从农村迁移到“那些土著居民直接与俄罗斯人接触的城市”[3]。

学校的外形看起来大概就像“异族人家居生活中极为简陋的仓库”。也不一定必须如此。1873年在俄罗斯城区开办的鞑靼学校(从1895年起按照新方式对教学进行了改革)大概也并没有因为其“逐渐采用欧式”陈设而遭受损失。[4] 在课堂上主要注意力放在让学生实际掌握俄语方面。除此之外,还打算让学生了解一些俄语文法和算术方面的基础知识。

第一所俄罗斯土著学校,或按当时人们的称呼叫做土著学生教区

[1]1886年9月30日罗森巴赫通告。奥斯特罗乌莫夫《萨尔特人》,第3版,第178页。

[2]纳利夫金《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102页及下一页。

[3]格拉梅尼茨基《突厥斯坦边区民族教育发展概论》,第8页。

[4]多布罗斯梅斯罗夫《塔什干的过去和现在》,第203页。1910年学校有100名学生,而俄罗斯土著学校(1902年开办)总共有60名学生。

学校,是1884年12月19日[1]在赛义德·阿齐姆之子赛义德·加尼家里开办的(赛义德·加尼和自己的兄弟都跟着他父亲请来的教师学习俄语)。虽然学校是在一位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了欧洲生活方式的富裕萨尔特人家里开办的,但是人们为了避免不熟悉环境的土著人感到发窘,也故意没有在学校里摆放任何课桌板凳。孩子们(39个男孩儿)"手捧书本坐在铺开的地毯和棉被上"。B.П.纳利夫金被任命为这所学校的教师,他差不多是俄罗斯人中最优秀的萨尔特语和萨尔特生活方式专家,纳利夫金曾携妻带子在那乃村(在费尔干纳州,纳曼干县)住过几年,并且他们生活的外部陈设"完全是萨尔特式的"。正因如此纳利夫金(夫妇)写了一本非常优秀的关于萨尔特人生活方式的书,该书1886年在喀山出版,书名是《费尔干纳定居土著居民妇女生活习俗概论》,其谦逊的书名所展示的远不如书本身的内容丰富多彩。已故H.И.韦谢洛夫斯基向来是一位对突厥斯坦活动家的著作评论极为苛刻的评论家,而他评价说这本著作"不仅使读者大体上了解了妇女的生活方式,而且了解了费尔干纳以及整个中亚所有定居伊斯兰居民"的生活方式。[2]

B.П.纳利夫金的教育活动(在俄罗斯土著学校和师范学校)一直持续到1890年他被任命为国民学校督学时为止,并且当时他还受命"监督锡尔河州、费尔干纳州和撒马尔罕州的土著学校,研究这些学校的教学状况"。在80年代,他出版了一些优秀的教科书(1898年《萨尔特语实用教程》被收入其中,1900年不太适合需要的《波斯语实用教

[1]博布罗夫尼科夫说"在1884年前俄罗斯土著学校开办得很少,可能不到10所"(《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10页),这是完全错误的。那时一所也没有。萨塔尔汗·阿卜杜勒加法罗夫在自己的自传中(奥斯特罗乌莫夫《萨尔特人》,第3版,第140页)提到1874年在奇姆肯特开设了一所俄罗斯学校,学校里的俄文教师是吉尔吉斯人哈桑诺夫,伊斯兰文法课教师是萨塔尔汗,他把这所学校称为是"边区第一所俄罗斯土著学校"。奥斯特罗乌莫夫(《萨尔特人》,第173页)在谈到这所学校时,说它"并没有留下什么显著的印记",并把1884年12月在塔什干开办的学校称作是"第一所有组织的俄罗斯土著学校"。多布罗斯梅斯罗夫在叙述奇姆肯特的学校发展情况时(《锡尔河州的城市》,第195页)没有提到1874年的学校,他说奇姆肯特的第一所俄罗斯土著学校创办于1887年,第二所创办于1910年。

[2]韦谢洛夫斯基《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会论丛》,第1卷,第319页。

程》也被收入其中)。一直到革命后他很快便悲惨地死去,他后来的生活,向我们展现的是一幅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上通常有的社会不会利用自己成员特殊知识和天赋的画面,是一幅活动家自身没有能力找到自

306 己人生道路的图画。在学校总监 Ф. М. 克伦斯基[1]根据纳利夫金的工作报告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之后不久,纳利夫金很快便辞去了教育部门的职务,之后他在行政部门工作,在费尔干纳州长助理的职位上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他参加了社会主义政党,并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担任突厥斯坦俄罗斯居民的代表。在杜马中他没有运用自己对突厥斯坦的独特了解为边区谋福利,而是讲了一些反对俄罗斯司法活动家的毫无根据的侮辱性的话。[2] 1917 年的事件又使他复出,在经历了沉重的打击后他自杀身亡。还在 1898 年作者就为进一步直接研究当地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了极好的准备,他把自己的时间消耗在深入研究《伊斯兰教和摩西律法》这样一个徒劳的课题上,并得出了更加有争议性的结论——"为了十分清楚地理解中亚穆斯林居民的各种生活现象的实质"通晓塔木德是"绝对必要的"。另外一个天才的自修者 А. Н. 维什涅戈尔斯基的命运更具悲剧色彩,他为一本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关于当地习惯法的著作搜集了资料。在此之前,这位彼得堡历史语文学研究所的毕业生、突厥斯坦师范学校的教师到过印度和澳大利亚旅行,他研究了多种语言——萨尔特语、吉尔吉斯语和波斯语。1886 年锡尔河州州长 Н. И. 格罗杰科夫(后来担任总督)委托他按照纳利夫金编写的提纲搜集有关吉尔吉斯习惯法的资料。维什涅戈尔斯基在草

---

[1]1917 年事件中崭露头角的政治活动家的父亲。

[2]В. П. 纳利夫金是作为一个持有社会主义信仰的人进入杜马的。他虽然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但在杜马中却以一个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团。В. И. 列宁 1907 年在就杜马中的派别和党团的成分及阶级性问题进行辩论时,是这样描写 В. П. 纳利夫金的(他把纳利夫金的名字与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德国物理学家阿龙斯和资本家辛格尔的名字并列写在一起):"……辛格尔、阿龙斯、纳利夫金这样的人只是表现了个人从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而已。"(В. И. 列宁《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全集,第 15 卷,莫斯科,1961 年,第 221 页)。纳利夫金在杜马的发言中对沙皇殖民主义的行政机构进行了揭露,В. В. 巴托尔德在此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评价这一演说的。纳利夫金作为一个持有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和一个著名东方学家的悲剧在于,他在 1917 年的事件中担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驻突厥斯坦的委员,成为革命的敌人阵营中的一员。——В. 罗莫金

原待了7个月并搜集到了材料,他所搜集的材料基本上就是 Н. И. 格罗杰科夫所著《锡尔河州的吉尔吉斯人和卡拉吉尔吉斯人》(塔什干,1889年)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韦谢洛夫斯基教授公正地评论说:“在塔什干出现这样的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十分可喜”的。[1] 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土著人法律生活方面的丰富资料,这些资料直接源自于土著人民的口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原原本本的表述。当然,在这第一次尝试中,并不能把所有与吉尔吉斯习惯法有关的问题都搞清楚,但是 Н. И. 韦谢洛夫斯基公正地评论说:让人感到惊奇的只是“维什涅戈尔斯基先生在这样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做了如此多的事情”。剩下的只是期望研究者本人以及其他人能够利用这次尝试在该领域展开进一步的工作,但是这一期望没有实现。维什涅戈尔斯基没有继续自己的工作,他也没有后继者。在书出版4年之后,我见到了他,那时他住在一座土著城市中,与土著人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他没有成家),是伊斯兰文明的狂热崇拜者,他特别推崇苏非派,他不想和任何俄罗斯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并因自己为完成格罗杰科夫交代的任务而不得不在轻信的游牧民中充当类似间谍(贾苏斯)的角色而强烈自责。有人告诉我,几年之后他从一个遥远的地方移居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他开始仇视萨尔特人,就像当初迷恋他们一样,他不再与萨尔特人有任何交往。由于自己的性格他不能适应任何工作,几乎在赤贫中死去。

1886年6月20日,在第一所学校事实上已经设立一年半之后,最高当局下发指示允许开办“俄罗斯土著文法学校”。[2] 在此期间,1885年又设立了3所“俄罗斯土著教区学校”,这3所学校都设在锡尔河州。1886年,在最高当局允许之后,立刻又开办了14所学校。如同后来俄罗斯人所承认的那样,许多学校一开始是用一些花钱雇来的穷人的孩子来补充生员不足的。为了雇佣“一些穷人出身的冒牌学生来顶

307

[1]韦谢洛夫斯基《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会论丛》,第5卷,第122页。

[2]国务会议的意见被批准。这里谈的是关于“在费尔干纳州和突厥斯坦边区其他地区为土著子女开办18所俄罗斯初级小学”的事情。

替真正有势力的萨尔特子孙”甚至还设立了一种特殊的不公开的货币税，这种货币税被称作“什科尔普里”。[1] 根据1891年颁布的总督弗列夫斯基男爵公告中的说法，几年之后这种现象已经“销声匿迹成为

308 传闻”了。[2] 但是到1911年1月1日数量达到89所的俄罗斯土著学校活动的成绩并不尽如人意。一位俄罗斯活动家M. M. 维尔斯基可能有点夸张地说：“从（撒马尔罕）州俄罗斯土著学校和纯粹俄罗斯学校的高墙里没有培养出一个能正确读俄语的土著人，更不用说用俄文书写了。”[3] M. M. 维尔斯基认为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仅仅在于学校本身的数量不够。按照他的观点，不能责怪学生，因为学校“被学习的土著学生挤得过满”。另一方面，在《1910年费尔干纳州统计概览》（第181页以下）中坦白说“俄罗斯土著学校不受欢迎，成效不显著”，主要是因为“穆斯林居民的固执和因循守旧[4]，并且土著居民出于自己极端功利主义的本性，往往只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来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没有看到孩子在俄罗斯土著学校中接受教育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同时又考虑到家里缺少了一个劳动力，因为学校的功课要持续四年，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刚刚学会一点俄文的阅读、书写和口语便离开了学校”。但是，在《概览》中也坦率承认“远不是所有学校的教师队伍都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其中也指出现在学校数量的不足“已经引起教育机构的特别关注，毕业学生的数量明显增加了”。这样一来，移民局出版的《亚洲俄罗斯》[5]在谈及俄罗斯土著学校时说，“这些学校的教学情况仍然使人寄予很多希望，现在对它们进行彻底改造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随之发生的事件使政府没能着手这项工作。

---

〔1〕奥斯特罗乌莫夫《萨尔特人》，第3版，第180页以下。根据纳利夫金的说法（《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109页），这种事情还在1887年就已被塔什干县立学校稽查出来，但被总督（罗森巴赫）给压了下去。

〔2〕然而1898年在韦尔涅萨基县为塔兰赤孩子开办的俄罗斯学校中，这一现象又死灰复燃（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215页）。

〔3〕维尔斯基《1897年普查时的撒马尔罕州》，第344页。

〔4〕也比较E. T. 斯米尔诺夫的论文《高加索的德尔维希僧团》，第70页，文中说：“我们认为，肩负人们厚望的俄罗斯土著学校之所以成效不大，其原因主要在于伊尚。”

〔5〕《亚洲俄罗斯》，第1卷，第257页。

除了主要来源于突厥斯坦师范学校毕业生的教师自身教育和修养水平不足之外，俄罗斯学校以及泛而言之俄罗斯文明难以取得成就的原因还在于，担心用土著语言传授给土著人太多的知识并由此而确立当地文学的地位、巩固当地文明的特点将不利于他们的俄罗斯化。在其存在的第二个十年，俄罗斯土著学校坚定地贯彻了一个原则，这就是在俄语班里就只能用俄语授课，孩子们只能借助于俄语才能获得“必需的知识和修养”，在土著班里除了学习“土著文法和由土著毛拉主讲的伊斯兰教义学原理”之外，不再设置任何其他课程。

1905 年，土著人自己提出了在塔什干土著聚居区开办学校以便让俄罗斯土著学校的毕业生能在这里继续深造的问题。这一请求的结果是当年在塔什干设立了第一所[1]两年制的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二年级(第二年的)课程包括算术、历史、地理和自然，但所有这些课程都是用俄语来讲授的。在土著班里这时只打算“继续研究土著文法和伊斯兰教义学原理”。土著教师自行对授课内容进行了某些改革，赛义德·拉苏利·赛义德·阿齐佐夫按照发声学编写了学习文法知识的识字课本(Устад-и аввал，字面意思是“第一任教师”)。另一位教师阿里·阿斯卡尔·加里宁编写的文选读本则是这种识字课本的继续，阿里·阿斯卡尔·加里宁毕业于师范学校，他著有一系列“关于自然和俄罗斯地理、关于突厥斯坦边区、关于俄罗斯的居民和首都”，甚至还有“关于俄罗斯国家历史”方面的论文。

根据 1905 年由国民教育大臣格拉佐夫在彼得堡召集的委员会的意见，在学校中应该给孩子们留出更大的学习母语的空间，这一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伊利明斯基体系的影响。但同年底锡尔河州国立学校校长 C. M. 格拉梅尼茨基对这一意见提出了反对，他断言“当地土著方言”由于自己的“特点”不能成为“教育体系”的基础，用鞑靼语来取代这些方言又背离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因此只有俄语才能成为教

[1]在 1912 年仍然是唯一的一所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比较博布罗夫尼科夫《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 23 页以下。

学活动的语言。由于事情已经按照这一精神做了，所以任何的"破坏"，即使是按照委员会构想的精神来进行调整，也只能是有害无利。[1]

然而，就在1905年这位С. М. 格拉梅尼茨基坦白承认，俄罗斯土著学校毕业生的数量与居民群众的数量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们在传播"全人类文明"方面的影响力不大，为实现这一目的即使不是在学校里也必须在出版物中利用土著语言，必须用这些语言出版"有益的书籍和小册子"，既包括译文也包括原文，如果俄罗斯人不着手进行这一事业的话，"其任务和目的都远不符合整个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鞑靼人的出版物"就将去完成这项工作。格拉梅尼茨基的预言很快便在某种程度上被证实了，因为其他许多俄罗斯活动家都认为土著文学的发展就像土著学校的发展一样，只能阻碍未来"俄罗斯化"的进程。从这种观点出发有些东西受到了许多人的谴责，例如1906年由Н. С. 雷科申出版的索洛维约夫的俄罗斯历史教程萨尔特语译本。

310

К. П. 冯·考夫曼就曾激烈地否定鞑靼人在草原上的传教活动和殖民活动。1896年，И. В. 阿尼奇科夫（当时任卡扎林斯克调解法官助理）对鞑靼人在草原上充当伊斯兰教传播者和经济剥削者的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评价。他得出结论说，作为鞑靼人在传教和经商活动中的竞争者[2]，萨尔特人仍然给草原注入了"某种文明"，他们使游牧民了解了"亚洲农耕文明的经验"，而当时鞑靼人，特别是城里人，依然只从事掠夺性的经营活动，只依靠"贸易和清真寺的赢利"维持生活。对以前伊斯兰文明的某种片面和偏激的评价是与这一观点相关的。作者本人指出，鞑靼人在"修养和生活方式方面与俄罗斯人最为接近"。他认为

---

[1]所有这些都是根据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的文章《伊斯兰礼拜寺小学和突厥斯坦边区的俄罗斯土著学校》。布季洛维奇委员会制定的原则在1906年3月31日被批准，但是1907年设立在塔什干的委员会认为这些原则不符合当地的条件（博布罗夫尼科夫《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3页及下一页）。

[2]鞑靼人其他的竞争对手是犹太人。比较多布罗斯梅斯罗夫《锡尔河州的城市》，第126页及下一页。作者在这里谈到，"鞑靼人在贸易活动中没有经受住与犹太人的竞争"（关于突厥斯坦城一章；突厥斯坦城有498个犹太人）。

伊斯兰教在草原上充当了反文明的角色，正是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吉尔吉斯人[1]的“习惯法逐渐让位给了以封闭妇女为第一要务并将妇女包裹在恰德拉中的沙里亚”。当然，他的这种评论只适用于萨尔特人，而不适用于鞑靼人。那时在卡扎林斯克的鞑靼人学校中已经采用新的语音方式来授课了，以至于鞑靼人在引导穆斯林了解欧洲教学方式方面、在使他们了解欧洲文明方面，都成了俄罗斯人的竞争对手，这种竞争逐渐升级，但只是在竞争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之后，才引起了俄罗斯人的关注。《1908 年费尔干纳州统计概览》中的叙述最有代表性，其中谈到在本概览中“首次搜集”了关于采用新式教学手段的礼拜寺小学的资料，虽然“费尔干纳州早在10至12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学校[2]，并且“其推行者差不多主要是从俄罗斯内地各省来到这里的鞑靼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学校的教师”[3]。 311

由此，鞑靼人在突厥斯坦创办的采用新式教学手段的礼拜寺小学出现于俄罗斯土著学校数量增长最快的那个十年，即 1896—1906 年，1896 年俄罗斯土著学校有 28 所，到了 1906 年已经急剧增加到 83 所，而到 1911 年只增加到 89 所。[4] 鞑靼人的礼拜寺小学当然不是建立在农村，而是建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这里主要是鞑靼移民的聚居区。可能在这些中心地带鞑靼人的学校比俄罗斯学校取得了更大的成就。1910 年塔什干有 8 所俄罗斯土著学校和 16 所新式礼拜寺小学[5]，1911 年浩罕有 2 所俄罗斯土著学校 162 名学生，有 8 所新式礼拜寺小

[1]哈萨克人。——Б. 加富罗夫

[2]博布罗夫尼科夫(《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 80 页)认为，中亚的新式礼拜寺小学是 1905—1906 年由卡扎林斯克的鞑靼人开办的。格拉梅尼茨基(《悬而未决的问题》)认为突厥斯坦边区这些礼拜寺小学是在 1908 年出现的，他在 1909 年写道：1907 年在突厥斯坦还没有一座这样的礼拜寺小学。奥斯特罗乌莫夫当时(《心平气和地》)写道，据他所知新式礼拜寺小学“并不是从去年才开始在边区各地出现的”。

[3]1886 年 6 月 12 日的条例对鞑靼人的权利进行了限制，根据这一条例凡是持非基督教信仰的人都被禁止拥有土地(第 262 条；比较“1904 年突厥斯坦历法”条例的内容)。

[4]这一数字出自 M. A. 博布罗夫尼科夫的论文《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 24 页。

[5]共有男子礼拜寺小校 137 所，以至于新式礼拜寺小学占了总数的 11.7%(多布罗斯梅斯罗夫《塔什干的过去和现在》，第 224 页)。

学530名学生。还没有对突厥斯坦鞑靼学校逐渐增加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统计资料比如说费尔干纳州的统计资料矛盾百出,以至于使人对其准确性产生了怀疑。根据1908年费尔干纳州的统计概览,有30所新式礼拜寺小学1306名学生(其中浩罕有12所607名学生),1910年共有12所(其中浩罕有5所[1],没有说明学生数量),1911年有11所707名学生(其中浩罕8所530名学生)。特别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学校的数量会迅速减少,为什么之后在浩罕这类学校的数量又增多了。

312 鞑靼人的新式礼拜寺小学不能不对当地的居民产生影响。正如А.И.多布罗斯梅斯罗夫在1910年所指出的,在突厥斯坦城的30所礼拜寺小学中,从1900年起正确地按照新方式开展教学活动的只有一所鞑靼人担任教师的学校,但是有2所礼拜寺小学(显然是土著学校,因为城里的鞑靼人很少)逐渐开始采用新方法。在卡扎林斯克采用新教学方式的除了在1903年鞑靼人的学校之外,还有当时已经存在了"6至7年"的吉尔吉斯学校,也就是说这所吉尔吉斯学校约创建于1903年,学校中的教师是吉尔吉斯人。

这样一来,鞑靼人的新式礼拜寺小学在产生几年后就开始对土著人的学校产生影响,而1892年一位内行人士则证实:"俄罗斯统治的27年对当地的土著学校而言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新的良好的秩序没有涉及任何一所学校,哪怕是一缕微弱的光线也没有透到一所学校中

---

[1]根据国家杜马成员马克苏多夫的文章(发表在1910年10月15日的《突厥斯坦》杂志上),浩罕有16所新式礼拜寺小学,塔什干有20所。在1910年和1911年费尔干纳州统计概览中完全没有提及从1911年1月1日起根据俄罗斯行政部门的命令关闭浩罕鞑靼礼拜寺小学的事件(博布罗夫尼科夫《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77页以下)。博布罗夫尼科夫说(《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80页),"这些礼拜寺小学关闭之后,新的学校出现得很慢,原因在于萨尔特教师缺乏训练,并且根据当地教师的评论,他们往往只是机械地模仿鞑靼教师,但是上面提到的行政措施并不能阻止新式礼拜寺小学的推广,只是暂时延缓了其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这一行政措施又引发了萨尔特语教科书的出版,这种教科书的出版应该对未来具有重大的意义"。1911年在突厥斯坦重新颁布了新的规章,新原则从7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这些原则礼拜寺小学的教师应该与学生属于同一民族(萨尔特人不能教吉尔吉斯人,鞑靼人不能教萨尔特人),新礼拜寺小学开办时,应该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供"详细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目录"(博布罗夫尼科夫《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61页)。

来。”[1]后来俄罗斯教师的数量少得可怜，以至于有时需要委托穆斯林来管理俄罗斯土著学校。[2]

除了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以外，高加索的鞑靼人（阿塞拜疆人）也对萨尔特人的文学产生了影响，他们在 1888 年通往撒马尔罕的铁路开通以后，与大量其他阿塞拜疆居民一起涌入突厥斯坦，这条铁路在 1898 年延伸到塔什干和安集延。在从奥伦堡通往塔什干的铁路通车后，高加索和波斯的移民又涌入锡尔河流域的北部。[3]

可能高加索鞑靼人以及一部分喀山鞑靼人影响（但他们的影响较小）的主要表现是在萨尔特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戏剧。关于萨尔特人戏剧的最早一批报道出现于 1912 年，1916 年 A. H. 萨莫伊洛维奇[4]专门写了一篇研究萨尔特人戏剧的文章。在这些戏剧中某些剧本的语言正如所料想的那样，并没有摆脱鞑靼主义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正是在戏剧作品中才首次尝试把“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萨尔特口语方言而不是把产生于中世纪的矫揉造作的标准语运用到书面语中。这种根本没有俄罗斯人直接参与的出乎意料的方式，为实现许多东方学家都力图达到的那种目的奠定了基础。这些东方学家有一些人像伊利明斯基，立足于与伊斯兰教进行传教斗争；另一些人像拉德洛夫则立足于为保持民族语言的纯洁性、民族思想和民族情感的清新性而斗争。

在每日进步刊中并没有关注语言的纯洁性问题，在从前的体制下这种出版物在塔什干总共存在了两年（1906—1908 年），并且完全掌握在伏尔加河沿岸的鞑靼人手中。报纸所使用的语言在多布罗斯梅斯罗夫的书中[5]被称为是“半通不通的萨尔特语”。以前在塔什干只出版

---

[1]克伦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的迈德赖塞》，第 40 页。

[2]根据“1904 年突厥斯坦历法”，在 55 所俄罗斯土著学校中有 13 所这样的学校，其中有 1 所位于撒马尔罕城。

[3]多布罗斯梅斯罗夫《锡尔河州的城市》，第 80 页（论佩罗夫斯克）和第 127 页（论突厥斯坦城）。

[4]《戏剧文学》。

[5]《塔什干的过去和现在》，第 294 页。

一种官方报纸《突厥斯坦本地报》，它是在1870年与《突厥斯坦公报》同时创刊的，当时构想它的主要使命是服务于"突厥斯坦边区的土著官员，使他们了解当地行政部门的指示，并在他们中间传播有益的知识，主要是历史和地理知识"[1]。从1883年到1917年报纸的主编是H.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他的同事是土著学者，当地一位语言学家和土著居民生活方式专家[2]公正地评论说，报纸是用远不同于口语的"书面语"发行的。编辑本人把该报对土著人的意义与18世纪初官方《公报》对当时俄罗斯人的意义相提并论，这一比较大致是公正的。编辑的一番话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以至于从1906年起，当"带有极端倾向"并蓄意破坏突厥斯坦穆斯林生活"古老基础"的"鞑靼人的报纸"出现以后，该报在土著读者中的发行量开始增加。编辑在自己的报纸中往往"辟出专栏让土著居民自己来解答那些问题"，有时他自己也会"从俄罗斯国家的角度出发，对极端的鞑靼人报纸进行实质性的反驳"。[3]

对1905年以后俄罗斯当局与穆斯林的关系而言，最后一个事实从大体上讲是具有典型性的。在革命脚步已经临近的可怕征兆影响下，"保持安静而不行动"的原则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想法。老的穆斯林学校和从总体上看持守旧观念的伊斯兰教，不仅显示出比考夫曼和第一批俄罗斯突厥斯坦活动家所料想的更强的生命力，而且还由于其所坚持的保守主义原则而在俄罗斯人中间找到了同盟者。

考夫曼和他的支持者都期待着土著人自己能明白俄罗斯学校更符合时代的精神，并且会认为俄罗斯学校比伊斯兰学校好。虽然俄罗斯土著学校存在着缺陷，虽然土著人有着宗教的偏见，这些期望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实现了。1894年，我曾有缘与一位年轻的萨尔特人进行了交谈，他既学完了礼拜寺小学的课程，也学完了俄罗斯土著学校的课程。我问他更喜欢哪一种学校，他给了我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1]奥斯特罗乌莫夫《萨尔特人》，第3版，第157页。

[2]雷科申《土著语言知识》，第87页。

[3]奥斯特罗乌莫夫《萨尔特人》，第3版，第172页。

答复："我不知道，礼拜寺小学就好像在另一个世界，但我更喜欢现实世界中的俄罗斯学校。"有人认为除了教学大纲陈旧以外，穆斯林学校走向衰亡的原因还在于政权转移到了宗教信仰不同的政府手中，因此学校不能指望得到国家的资金支持了。如果有时断言，伊斯兰教只能作为官方宗教而存在，没有国家的支持它必然要走向灭亡[1]，那么已经无人过问的陈腐的穆斯林学校的灭亡就更加毫无疑义了。学校生存的主要来源是接受捐赠给它们的寺院不动产——土地财产收入、城市店铺的收入等。根据考夫曼关于突厥斯坦边区(1881年)管理工作报告中的说法，他"不再承认和批准增加寺院不动产的新捐赠，此举甚至和1867年临时条例的字面意义有所抵触"[2]。学校能够成功保留下来的远不是以前全部的寺院不动产。我们看到，19世纪80年代在切尔尼亚耶夫时代就发生过剥夺一所塔什干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寺院不动产并将其转交给俄罗斯慈善协会的事件。H. A. 博布罗夫尼科夫曾把撒马尔罕州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陷入特别可怜境地的原因说成是这里的"寺院不动产被没收充公了"[3]。但是在这个州可能并没有发生没收寺院不动产充公的事情，寺院不动产只是被移交给俄罗斯行政部门管理，并且这还是70年代发生的事情。[4] H.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在谈到浩罕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时说，批准给它们的"并不是全部的寺院不动产，这成了穆达里斯(教师)和穆泰瓦里(督学)抱怨俄罗斯行政机构不够公正的借口"[5]。从总体上看，行政部门可能只有在涉及寺院不动产及其管理的问题时才对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事务进行干涉，并没有对宗教学校的教学活动

314

---

[1]比较 Э. 雷纳恩在1862年所说的话(在法兰西学院犹太语、迦勒底语和叙利亚语班开班典礼上的致辞。——Б. 加富罗夫)。雷诺《闪米特人》(第22页)："当人们把伊斯兰教变为自由的宗教和个人宗教的时候，它就不可能作为官方宗教存在下去。"

[2]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271页。

[3]博布罗夫尼科夫《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86页。

[4]纳利夫金《突厥斯坦边区被征服前后的寺院不动产状况》，第28页。

[5]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马德拉塞》，第11页。这里(第4页及下一页)提到了撒马尔罕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寺院不动产。比较纳利夫金等人的著作《撒马尔罕州穆斯林宗教界现状和活动、各种宗教机构及土著居民教育机构要述——兼论其过去》，第46页及下一页。

进行积极的干涉，虽然 H.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认为，在 1905 年 10 月 17 日最高宣言关于俄罗斯公民权利平等的规定颁布之后，"突厥斯坦边区的土著学校与俄罗斯学校享有同样的接受国民教育部关注的权利"，并且"这种关注应该不单单是表现在外在的监督和像迄今仍实行的那种例行公事般的工作汇报方面，而是表现在对教学事务本身的领导"。1905 年成立的 A. C. 布季洛维奇的委员会提议，为实现这一目的设立"穆斯林学校督学"一职，H.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评论说，督学"只有懂得阿拉伯语和当地语言"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1] H. A. 博布罗夫尼科夫在 1913 年写道，必须要在塔什干设立编制特殊的学区管理局，并且在学区中应该"从学识渊博的有威望的东方学家中挑出 4 位担任巡回督学，领导区督学并指导学术和教学工作"[2]。实际上一切都仅限于对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管理事宜及其寺院不动产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既不需要扎实的业务知识，也不需要一种经认真研究制定出来并随之贯彻推行的体系。

克伦斯基在论文中说，这种干涉开始于 1890 年的下半年。[3] 从 1891 年起建立了由社会选拔穆达里斯，由俄罗斯教务主管部门批准也就是由学校校长根据督学的签署意见批准的制度。[4] 1894 年制定了"突厥斯坦边区土著马德拉塞大穆达里斯须知"[5]，并且大穆达里斯对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拥有全权。根据须知第三条"小穆达里斯、穆泰瓦里和毛拉必须执行大穆达里斯的一切合理要求"。这就违背了旧秩序，按照旧秩序穆泰瓦里不依赖于穆达里斯，只有穆泰瓦里才能管理经

---

〔1〕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马德拉塞》，第 29 页。

〔2〕博布罗夫尼科夫《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 89 页。

〔3〕克伦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的迈德赖塞》，第 25 页。当时查明宗教学校财产的工作已经开始(纳利夫金《突厥斯坦边区被征服前后的寺院不动产状况》，第 47 页)，这项工作耗费了 3 年的时间(1890 年 6 月至 1893 年)。比较纳利夫金等人的著作《撒马尔罕州穆斯林宗教界现状和活动、各种宗教机构及土著居民教育机构要述——兼论其过去》，第 46 页。

〔4〕克伦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的迈德赖塞》，第 42 页以下。

〔5〕由 H.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马德拉塞》，第 39 页以下)和 H. A. 博布罗夫尼科夫(《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 82 页以下)引用，从前为 B. П. 纳利夫金所引用(《突厥斯坦边区被征服前后的寺院不动产状况》，第 53 页以下)。

济事务。穆泰瓦里侵吞公共财产有时会迫使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大学生(毛拉)诉诸当局,其中包括俄罗斯当局。现在已经禁止大学生绕过大穆达里斯直接向督学提出这样的请求。H. A. 博布罗夫尼科夫把这个须知称作是没有对生活产生任何影响的“官样文章的复文”,是“为了使大穆达里斯的权威接近于俄罗斯学校校长的权威而进行的一次软弱的和不成功的尝试”。不管怎样,须知并没有阻止侵吞寺院不动产的行为。H.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 1905 年在自己写给布季洛维奇委员会的报告中说“随着俄罗斯的统治在思想意识上陷入停滞(这种停滞早已在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也很快在物质上陷入贫困状态”。H. A. 博布罗夫尼科夫认为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不在于缺少政府方面的支持,而在于社会的冷漠。根据 H. A. 博布罗夫尼科夫的观点,突厥斯坦的穆斯林没有自己独立的出版物,完全“依靠外来文学主要是鞑靼文学的滋养。而鞑靼文学中又充斥着新式的思想,以至于不可能期待着从读书的穆斯林当中涌现出一位能为已经遭到历史谴责的机构提供捐助的人”[1]。 316

H. A. 博布罗夫尼科夫指出,土著居民其中包括农村居民的福利状况有了巨大的改善,在穆斯林中出现了许多“富人和大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他的观点,如果社会依然同情从前那种类型的穆斯林学校的话,它们不可能找不到资金的支持。但是突厥斯坦通 B. П. 纳利夫金指出了一个事实,费尔干纳种棉业的成就促进了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学生数量的增加。根据大穆达里斯和穆泰瓦里的说法,在浩罕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中学生的数量从没达到像 19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那样的规模。[2] 根据精确的数据来追踪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和在俄罗斯统治时期的旧式礼拜寺小学发展或衰落的进程是极其重要的。但很遗憾文献上所援引的各个年代的数据其中包括官方报告和概

[1]博布罗夫尼科夫《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 88 页。

[2]纳利夫金《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 130 页。只有在俄罗斯统治的初期,当居民对突如其来的是否履行宗教要求的自由权感兴趣的时候,“伊尚的作用和威望,以及明显被架空的马德拉塞的作用和威望才在所有人的眼中衰落、消失”(博布罗夫尼科夫《俄罗斯土著中等专业学校、礼拜寺小学和中亚的迈德赖塞》,第 87 页)。

览中所援引的数据出入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数据只能说明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包括官方信息是不准确的，不可能根据这些数据得出任何结论。统计概览的编写者有时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在1911年费尔干纳州概览中就标出了与1910年统计数据的某种差别，但同时又说“学校数量和其中学生人数出现这些变化，主要是因为呈报上来的信息不够准确”，虽然在根据同样不可靠的数据编写的1902年撒马尔罕州概览中，已经确认了“土著学校数量减少”这一事实，并认为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爆发了蝗灾，人们把大量资金用于与这一古老的农业敌人进行斗争，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得居民的经济来源限于枯竭”。根据1876年的资料，塔什干总共有11所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根据1910年的资料有22所，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俄罗斯统治时代，突厥斯坦边区主要城市中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根据1892年的资料记载，费尔干纳有120所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根据1896年概览总共有200所，其中121所在城市，79所在县里），根据国家教育部的报告截至1911年1月1日共有204所。根据1876年资料记载，撒马尔罕有18所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根据1893年“参考手册”有23所，到1899年底共有14所，1912年又达到19所。在1902年概览出版以前，从来没有谈到过吉扎克和吉扎克县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在1902年的概览中首次提到在这个县有1所宗教学校（在1908年的概览中也提到了），1912年吉扎克本身已经有了3所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在吉扎克县有1所。在苦盏城中有许多宗教学校，而学生的数量与学校的数量并不相符。根据1893年的资料记载，这里有47所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1912年有40所。在苦盏县，不算苦盏城和乌拉－秋别城，根据1893年的资料有14所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到1899年共有7所，1912年共有16所。截至1911年1月1日，在突厥斯坦边区3个主要的地区共有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328所（其中31所在锡尔河州，204所在费尔干纳州，93所在撒马尔罕州，撒马尔罕州

317

在90年代初有65所)。[1] 按照纳利夫金的说法,1900年有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313所学生7502人。

看来,这些数据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在俄罗斯统治时期(至少从70年代开始),还是在革命爆发的前夜,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数量从总体上看都没有明显地减少。可能还产生了一些新的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例如,1912年A.И.多布罗斯梅斯罗夫[2]记载说,"30年前"也就是80年代初由突厥斯坦萨尔特人艾哈迈德·巴伊在突厥斯坦创立了一所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H.A.博布罗夫尼科夫可能夸大了鞑靼人的进步出版物对土著居民的影响。与这种影响的积极方面并存的还有明显的消极影响,有些进步分子担心突厥斯坦的国家自治将使整个边区落入守旧者的手中并消灭所有的进步事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3]

俄罗斯保守主义和守旧的伊斯兰教的联合完全改变了从前对旧式伊斯兰学校的态度。可能1876年"俄罗斯在东方的作用面临着重要的高层次的任务,这就是打破伊斯兰教的思想束缚,使土著人融入人类的生活"[4]。1907年[5],穆斯林学校被与古老的俄罗斯基督教学校相提并论,承认宗教学校的课程"是很严肃的、适应了人民生活实际需要的课程",只是需要逐步地、谨慎地在宗教学校的课程中融入一些"现代知识的成分",并不需要对其进行根本的改变。

318

随着革命的胜利,学校领域中的保守主义倾向如同所有其他领域

---

[1]纳利夫金等《撒马尔罕州穆斯林宗教界现状和活动、各种宗教机构及土著居民教育机构要述——兼论其过去》,第46页。根据H.П.奥斯特罗乌莫夫提供的资料,截止到1913年1月1日,在边区的5个地区共有376所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其中在3个主要的地区有308所,宗教学校中有超过2/3的学生分布在费尔干纳地区。

[2]《锡尔河州的城市》,第134页。也见奥斯特罗乌莫夫《伊斯兰教学》,第183页(1878年在浩罕开办的卡塔霍加·伊尚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和第215页(1905年和1908年在撒马尔罕开办的塔什伯克·巴伊和巴吉·沙玛尔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

[3]比较我的文章《欧洲科学和未来突厥斯坦的俄罗斯学校》。

[4]Г.,《论中亚穆斯林的学校教育》,文章是由克伦斯基引用的(《突厥斯坦边区的迈德赖塞》,第35页以下)。以前Л.科斯坚科在《突厥斯坦边区》中转载的时候没有注明史料出处(第1卷,第370页以下)。

[5]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马德拉塞》,尤其是第20页、28页、30页。

319 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样，让位给了其他还没有取得明确成果的倾向。[1]

---

[1]1919—1920 年当 B. B. 巴托尔德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在苏维埃的突厥斯坦虽然由于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依然建立了新的用母语授课的苏维埃学校（参见卡雷－尼亚佐夫《苏联乌兹别克文化史概论》，第 134－142 页，第 147－148 页）。为了从当地民族中培养苏维埃教师，还在许多城市中举办了短期师范培训班。1920 年在塔什干开办了中亚历史上第一所以 K. A. 季米里亚泽夫命名的高等师范学院，在这一年年底被改为刚刚创立的突厥斯坦国立大学（创建该校的法令是由 B. И. 列宁在 1920 年 9 月 7 日签署的）师范系（卡雷－尼亚佐夫《苏联乌兹别克文化史概论》，第 178 页）。B. B. 巴托尔德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亲身参加了突厥斯坦的文化建设工作，他对这些事实了如指掌。但是可能受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虽然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却依然对苏维埃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代表人物观点的影响，他在这里对文化领域的变革宁愿采取模棱两可的表述，甚至没有提到这些变革。至于这些变化在中亚苏维埃共和国民族文化建设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在《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问世之前许多是 B. B. 巴托尔德清楚的，并且在 1927 年出版的版本中巴托尔德依然保留了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写作这本著作（1919—1920 年）的那个时代印迹的说法，这看起来明显是落后于时代的，这是因为作者在对第一版进行修订时不想涉及当代的问题（参见前面第 170 页）。——B. 罗莫金

8 俄罗斯的移民运动

突厥斯坦生活制度的改变是与欧俄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的，这种移民运动是俄罗斯征服的必然结果。有计划的殖民是不存在的，就像不存在始终如一的征服政策一样。在彻底征服突厥斯坦边区之前，关于在边区殖民以及推行殖民政策的资料都是极其匮乏的。

除了雅伊克河流域的哥萨克首领涅柴在1603年对老乌尔根奇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侵袭以外，在突厥斯坦没有像在西伯利亚那样发生过哥萨克流民的独立征服运动。但是如同在亚洲的许多地区一样，政府把在突厥斯坦建立的哥萨克村落看做是巩固帝国边界的俄罗斯政权的最后手段。像在各处一样，这一措施遭到了失败。经验表明，哥萨克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已经过时，不适合用于殖民目的。

哥萨克向突厥斯坦的移民运动，是从两个方向进行的：西北方，由奥伦堡和乌拉尔的军队进行；东北方，由西伯利亚军队进行。锡尔河上的哥萨克村落是由于开辟锡尔河航线的计划而于1849年开始形成的，当时有25个哥萨克家庭搬到了早在1847年就已经建立的赖姆斯堡垒附近，距锡尔河口60俄里。给殖民者划分份地破坏了吉尔吉斯人[1]的土地权，这引起了他们的愤怒，甚至激起他们向一号堡垒（后来的卡扎林斯克）发动了武装进攻（1856年）。在1858年才达成协议。引起吉尔吉斯人不满的原因还在于：俄罗斯人由于没有经验而破坏了灌溉设施。

除了奥伦堡的哥萨克以外，从1875年开始乌拉尔的哥萨克也出现在锡尔河，但他们不是军事殖民者，而是因为拒绝服从当局、拒绝服从普遍兵役制的法律而被流放到这里的流放犯。乌拉尔人在突厥斯坦拒 320

〔1〕哈萨克人。——Б. 加富罗夫

绝服从地方当局的命令,并且没有接受将他们划为卡扎林斯克城市民的建议,但是他们却在那里非常稳定地定居下来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他们主要从事捕鱼业,在20世纪初捕鱼业完全掌控在他们手中。在这方面他们对边区的经济生活产生了无可争议的影响。1901年,研究边区问题的行家И. И. 盖尔写道:"只有随着被流放的乌拉尔哥萨克定居卡扎林斯克城,锡尔河口和咸海水域的捕鱼业才活跃起来。"[1]只是在1905年奥伦堡—塔什干铁路开通之后,当"咸海"车站设立并且在距离该车站1.5俄里的地方出现了咸海城村落之后,乌拉尔人才把这第一的位置给了采用更完善捕鱼方法的外来人。

在里海东岸的哥萨克村落也成为渔村。无论是在锡尔河还是在里海都没有出现新的哥萨克军队,从前哥萨克军队在乌拉尔的驻防线一如从前。

哥萨克从西伯利亚向七河流域[2]的移动产生了其他成果。有两个西伯利亚哥萨克团(9团和10团)在七河流域进行殖民活动。殖民活动的起点是1847年建立了谢尔吉奥波里斯卡娅镇和科帕尔斯卡娅镇(后来的谢尔吉奥波里城和科帕尔城)。移民是强制进行的。同时为了安置移民,强行夺取了吉尔吉斯人[3]的灌溉土地。哥萨克都分得

---

[1]盖尔《突厥斯坦指南》,第191页。关于阿姆河三角洲的乌拉尔人,参见布洛姆奎斯特《"乌拉尔人"当中的民族学著作》。——В. 罗莫金

[2]后来设立的七河州的北部到伊犁河地区起初被称为"七河边区"。"外伊犁边区"不同于七河边区。俄文名称是从在中世纪的伊斯兰地理学(总起来讲,伊斯兰地理学对伊犁河以北地区了解得很少)中没有遇到过吉尔吉斯语哲台苏(七条河)一词翻译而来的。在卡拉吉尔吉斯的玛纳斯史诗的一个版本中遇到过这一名称(《瓦利哈诺夫文集》,第218页)。根据俄罗斯旅行家A. 弗兰加利(1851年)的说法(见《1849年和1851年吉尔吉斯草原东部的地质旅行》,第2册,第6页。——Б. 加富罗夫),这七条河分别是:阿亚古兹河、列普萨河、阿克苏河、比延河、科克苏河(可能应该是克孜勒阿加齐河)、卡拉塔尔河和伊犁河。按照A. K. 海因斯的说法(《吉尔吉斯概论》,第243页),这七条河是:列普萨河、巴斯坎河、萨尔坎河、阿克苏河、比延河、卡拉塔尔河和科克苏河,因为七条河的渡口都在巴尔喀什湖也就是巴尔喀什－阿拉库尔低地和阿拉套之间。可能,这七条河应该是:列普萨河、巴斯坎河、阿克苏河、比延河、克孜勒阿加齐河、卡拉塔尔河和科克苏河。根据Г. Н. 波塔宁的观点(《西北蒙古概论》,第4分册,第740页),吉尔吉斯人把"南准噶尔"称作哲台苏,意为"七条河流经的安乐之土"。不管怎么说,七河都是指伊犁河以北地区,虽然斯凯列尔(《突厥斯坦》,第1卷,第150页),还把伊犁河也列入七河之中(其他六条是:列普萨河、巴斯坎河、阿克苏河、萨尔坎河、卡拉塔尔河和科克苏河)。

[3]哈萨克人。——Б. 加富罗夫

了大量的土地,在科帕尔斯卡娅镇每一名男性可以得到土地100俄亩。 321
1867年,当成立七河特别州[1](以前征服的直至伊犁河的地区,甚至“外伊犁河边区”被并到1854年成立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将1865—1867年存在的前突厥斯坦州的一部分并入七河地区)并将其划入突厥斯坦总督辖区时,同时组建了由14个镇和新村共有男女人口14413人组成的七河流域哥萨克军。七河州的军督被认为是派任的哥萨克军长官,突厥斯坦总督也被认为是派任的哥萨克军长官。

第一任总督К.П.冯·考夫曼就已经对哥萨克殖民的成就感到失望,可能正是因为此决定停止西伯利亚哥萨克强行移民的活动。但是,七河地区哥萨克的数量在继续增长,有时农业移民也被计入到哥萨克中。[2] 也有新的西伯利亚哥萨克自愿移民的情况,例如,在1882年和1883年来了几个家庭,定居于霍尔果斯河,这里位于重新与中国划定的边界线附近。由此而形成了新的市镇和村落。在19世纪末共有11个市镇(列普辛县的谢尔吉奥波里斯卡娅、乌尔贾尔斯卡娅、列普辛斯卡娅、萨尔坎斯卡娅,科帕尔县的科帕尔斯卡娅、科克苏伊斯卡娅,贾尔肯特县的戈卢别夫斯卡娅,韦尔涅萨基县的纳杰日金斯卡娅、苏菲斯卡娅、大阿尔马金斯卡娅和小阿尔马金斯卡娅[3])和17个村落。军事居民(包括男女在内)的人口在1899年有29323人,1906年有34468人。在该州南部的两个县比什凯克和普尔热瓦利斯克[4](卡拉科尔)既没有市镇,也没有村落。

哥萨克村福利生活的基础并不是劳动和耕作,而是占有大量份地。哥萨克把自己大量的土地租给吉尔吉斯人和俄罗斯人耕种,出租土地

[1]阿亚古兹州早在1831年已经成立,当时把俄国人在“七河上”的行动通知了中国人(Н.孔申《阿亚古兹州的设立》,第33页)。

[2]按照科斯坚科的说法(《突厥斯坦边区》,第1卷,第387页),地方政权用各种优惠政策激励农民加入到哥萨克的阵营中来,但是愿意这样做的农民很少。

[3]在七河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还援引了卡斯克连斯卡娅镇的名称。

[4]根据这份工作报告,在普尔热瓦利斯克县设立了尼古拉耶夫斯卡娅镇(第60页)。可能,这个镇和卡斯克连斯卡娅镇都产生于1899年以后,按照马萨利斯基书中的说法(《突厥斯坦边区》,第324页),1908年同1899年一样,有30个镇和村而不是28个,1911年哥萨克村庄和新居民点共有32个。

的租金足够他们生活之用。他们是吉尔吉斯人所必需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地位使之可以压迫土著居民。[1] 甚至在地方当局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哥萨克份地过多必须要降低份地标准的问题。1895年3月3日获批的大臣委员会的条例提出了"研究哥萨克实际的和无可争议的占地状况，并确定应该把一俄亩水浇地当做多少自然灌溉地"的问题。[2] 但是在革命前，一切都依然如旧。1913年，立法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不仅不承认七河流域哥萨克军所占据的土地过多，反而甚至认为他们所占的土地还不够(60多万俄亩，比这一地区的全部已耕土地还多一倍)。法案打算制定一个平均每名男性可以获得30俄亩份地的标准，但此外每座教堂还可以分得300俄亩的土地，还有数量相当于全部份地一半的军用储备地[3]，也就是说平均每名男性获得的土地不是30俄亩，而是45俄亩。17000名男子共需要土地765000俄亩。

起初，与政府的意志相反，七河流域也成了其利益有时难以与哥萨克利益相调和的农业殖民的主要场所。1868年，当第一批农民(来自沃罗涅日省，共有242户)来到七河流域的时候，由于没有闲置的土地，只好将他们划归韦尔内市，使之成为韦尔内市市民。他们不得不从与韦尔内相邻市镇上的哥萨克手中租种土地。1890年，突厥斯坦总督制定并通过了移民规则，并拟定给每名男子30俄亩土地，后来这种份地被大大减少了(减少到7.7俄亩)。七河流域实行的是与突厥斯坦其他地区不同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游牧民的土地被认为是国有的，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支配除游牧民自有牧场以外的土地。

[1]这里的"吉尔吉斯人"和"土著居民"指的是哈萨克人——科帕尔县、列普辛县、贾尔肯特县和韦尔涅萨基县土生土长的居民，可能还包括19世纪80年代从伊犁边区迁到七河流域的回鹘人(塔兰赤人)。哥萨克作为一个特权军事阶层，享有很多优惠政策，但并不是所有的哥萨克都一样。哥萨克中的上层人物把土地租给哈萨克人，利用雇农劳动并残酷地剥削当地的居民，而哥萨克中的贫民则依附于哥萨克上层人物，并且也要遭受他们的剥削。参见《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第403页。——B.罗莫金

[2]《七河州概要》，1899年，第6页。

[3]别索诺夫《亚洲俄罗斯的哥萨克和哥萨克土地》，第388页。

这种占领土地和组成村镇的方式自然引起了与吉尔吉斯人[1]的冲突。在1882年前，当七河流域一度被从突厥斯坦分出去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29个农业村镇，居民达到15000人。

从1882年到1898年，七河流域成为新成立的草原总督的辖区。虽然第一位草原总督是支持移民的前七河州长Г.А.科尔帕科夫斯基， 323 但政府在这一时期并没有采取措施发展移民事业，而是对农民向这一区域的殖民活动进行了限制。1889年7月3日，关于禁止移民的法律被推广到了七河流域。在1891年爆发灾荒时，草原总督区根据内务大臣的命令也不允许移民。最终在1895年农民的殖民活动被暂时终止，直到弄清了当时按照计划进行的哥萨克土地情况调查的结果。在这期间村庄的数量几乎没有增加（1899年共有30个村庄），但是人口的数量（1899年有38022人）却急剧增加了。大量自发的移民（1700户）是在1892年到来的。[2]

从1899年开始，七河流域又重新划归突厥斯坦总督管辖。20世纪初农民的殖民活动明显增加，这是因为政府政策中的俄罗斯化趋势得到了加强。[3] 政府现在竭力促进农民向七河流域的迁移。1906年，在七河流域设立了第一个移民区。截至1908年1月1日，只有41个农民村，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那些与哥萨克殖民活动无关的县里：比什凯克县（15个）、普尔热瓦利斯克县（10个）。到1911年，新村的数量增加到原来的3倍（123个）。这样一来，甚至在整个亚洲唯一的一块远在南部的哥萨克领地的凸起部，哥萨克居民不仅没有占据绝大多数，

---

[1]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人居住在七河州南部的两个县——比什凯克县和普尔热瓦利斯克县以及奥利耶阿塔县的部分地区，后来这些县都成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组成部分。——B.罗莫金

[2]由于1891—1892年俄国爆发了饥荒，"自发的"移民不能从沙皇当局那里获得份地，他们不得不从富裕的哥萨克手中租赁土地，还有一部分这样的移民是从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巴伊手中租赁土地的。——B.罗莫金

[3]B.B.巴托尔德把农民殖民活动的增长仅仅解释为是沙皇政府推行了强化俄罗斯化的政策，而没有注意到俄罗斯的社会条件。土地危机和20世纪初席卷俄罗斯的农民骚动使沙皇政府和俄国地主感到震惊。沙皇当局企图通过将农民迁移到边区来寻找出路。1904年成立了移民局，管理一切与移民有关的事务。——B.罗莫金

反而在俄罗斯人中只占了少数。从1893年到1912年在七河州被分配给移民的熟地和生地的数量(2513000俄亩)超过了同期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州(2307000俄亩),虽然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移民的数量超过了七河州移民的数量(两者分别为101400人和87000人)。1911年七河州的俄罗斯人仍然只占居民总数的1/8左右。

具有典型性的是,虽然吸引来了大量新的农业移民,但是在俄罗斯统治时期七河州没有修建过任何灌溉工程。曾经有过建造这种工程的规划,尤其是在楚河地区,但实际上却没有实施。[1] 这一点表明,俄罗斯的殖民活动不能不对当地的农业产生负面影响。在1899年的州工作报告中,似乎谈到吉尔吉斯人[2]在俄罗斯统治之前几乎没有从事过农耕,然而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拜访过卡拉吉尔吉斯人的科学院院士拉德洛夫却认为,他们的土地耕作和灌溉得比吉尔吉斯哥萨克人的土地还要精细。[3] 在革命爆发前夕,曾打算剥夺卡拉吉尔吉斯人的所有土地作为对他们参加1916年骚乱的惩罚。

在没有哥萨克垦殖区的锡尔河流域,农民的殖民活动则与土著人发生了矛盾。吉尔吉斯人将第一批俄罗斯移民家庭出现在锡尔河下游地区视为是对自己权益的损害。双方的争执在1858年由奥伦堡总督卡捷宁出面平息,并且在俄罗斯移民和吉尔吉斯人的土地之间划定了界限,同时"还以总督的名义告知吉尔吉斯人[4]将不再征用他们的土地分配给移民"[5]。后来与七河流域不同,在锡尔河流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认为草原的土地属于吉尔吉斯人,只有征得吉尔吉斯人的同

324

[1]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在十月革命前不仅对楚河谷地的土地灌溉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查工作,而且也开始了在楚河上的建设工程(修建了丘梅什河大坝、通到格奥尔基耶夫斯科耶村的运河,以及楚河水泥厂以便保证进一步的施工)。的确,这仅仅是开始。在楚河谷地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是后来在苏维埃政府时期完成的。——B. 罗莫金

[2]显然如同以后的叙述一样,B. B. 巴托尔德这里所说的吉尔吉斯人指的既是哈萨克人又是吉尔吉斯人(当时被称为卡拉吉尔吉斯人)。——B. 罗莫金

[3]根据拉德洛夫的说法,1869年从楚河到图兰吉尔河的伊塞克湖西北岸,到处都是吉尔吉斯人(也就是卡拉吉尔吉斯人)的耕地,在阿克苏河以东的湖岸上也有这样的耕地(鲁道夫《离开西伯利亚》,第1卷,第120页)。

[4]哈萨克人。——Б. 加富罗夫

[5]多布罗斯梅斯罗夫《锡尔河州的城市》,第54页。

意才能将这些土地用于移民新村。只是到了1910年,关于草原土地国有的条例才传播到突厥斯坦的本土包括锡尔河流域。实际上问题是根据行政机构的命令来解决的,所以要求获得吉尔吉斯人的同意,并没有妨碍大量俄罗斯村落的形成。

在卡扎林斯克县最早建立了俄罗斯政权,所以移民也最早出现在这里,但后来认为这里土壤的质量(盐碱地)和灌溉系统的糟糕状况都不利于耕种。在佩罗夫斯克县土壤条件比较有利,但是锡尔河的泛滥往往也会引起一些大的波动,这里的灌溉条件也面临着困难。由此这里的殖民活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甚至不得不废弃了两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村落——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建于1861年)和阿斯特拉罕斯基。在奇姆肯特县和奥利耶阿塔县殖民的效果更好一些。特别是在奥利耶阿塔县,还在1869年就已经决定将多余的移民从七河流域迁到这里。但是这里的第一个村庄是在1875年才建立的,这就是米哈伊洛夫卡,后来又有2个村庄——恰达瓦尔和德米特里耶夫卡被合并到这里。恰达瓦尔的村址选得最为成功,这个地方相当于帖木儿的阿什帕拉。在19世纪90年代的初期,恰达瓦尔被公认为是这一地区"土壤肥沃、村民富足和居住环境优雅"的第一村[1],虽然根据对恰达瓦尔作出上述评价的这位研究移民生活方式的行家的观点,在阿斯帕林斯卡娅乡的吉尔吉斯人和恰达瓦尔村之间划分水域的时候,恰达瓦尔人吃了亏。[2] 截至1890年还有10个村庄被归并到这3个村庄中来[3],其中主要的有梅尔克(建于1885年),早在7世纪这里就曾经有过一个小城。这个村庄也是浩罕汗统治时期萨尔特人的主要殖民据点之一。梅尔克集市的地位仅次于奥利耶阿塔集市。在俄罗斯村庄中,梅尔克的"土壤质量"是最好的。正如已经预料到的那样,由于俄罗斯人与萨尔特人居住的地方是如此临近,所以不可能不因为水源的问题而引起争

[1]盖尔《饥荒和1891年锡尔河州的殖民》,第17页。

[2]盖尔《锡尔河州的农业殖民活动》,第290页。

[3]根据目录(盖尔《锡尔河州的农业殖民活动》,第246页),但其中漏掉了早在1882年就已建立的戈洛瓦切夫卡(盖尔《突厥斯坦指南》,第222页)。

执，虽然这些争执“都得到调解，也没有超出两个民族土地所有者家庭之间纠纷的范畴”。

除了俄罗斯人之外，在奥利耶阿塔县也出现了来自伏尔加河的德国殖民者——门诺派教徒，他们不想服兵役，所以在1880年来到了塔什干。他们建立了5个村庄，并且其中的一个——奥尔洛夫卡是由从前这一教派的追随者建立的，他们愿意服兵役并因此而被赶出了自己的村社。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村落是在中世纪村庄或游牧营地的废墟上建立的。纯粹的门诺派教徒的村落就建在这种地方。一些俄罗斯人从门诺派教徒那里借鉴来了比俄罗斯犁更轻便、更好用的德国犁。

奇姆肯特县的4个村庄建于19世纪80年代（1887—1889年）。差不多同一时期（1881—1891年）在库拉明县或塔什干县也建立了6个村庄，其中有3个村庄后来在区域疆界发生变化后，被并入到撒马尔罕州。在这些村庄中最早产生的（1881年）尼科利斯科耶坐落于距塔什干总共只有6俄里的地方，更像是市郊（现在它与塔什干之间基本上是道路密布），而不像乡村。塔什干县与其他县相比，新村的建立更多地得益于灌溉工程。特罗伊茨基村（距塔什干25俄里）就建在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亲王刚刚开凿的（1883—1885年）伊斯坎杰尔渠（引自奇尔奇克河）上。在4140俄亩灌溉地中有1340俄亩被划归村庄，其余的土地由参加工程建设的土著人占有。从总体上看，塔什干附近的灌溉工程与殖民的目的相反，是有利于土著居民的。还在1871年，就对扎赫渠的老水道进行了清理，这一举措使7万俄亩的土地恢复了生机。清理扎赫渠的工程是第一任总督考夫曼时代唯一的一项成功的灌溉工程。在他统治时代还有一系列不成功的开凿新运河的尝试，这些尝试都给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这些规划中主要的一些都与灌溉饥饿草原有关，而且这些规划都源于一个错误的设想，这就是认为这个草原总有一天会灌渠纵横、人烟稠密。考夫曼运河（1872—1879年）的建设就是这样的工程。1883年在切尔尼亚耶夫任总督时期，在佩罗夫斯克附近开工的工程也很不成功：毫无益处地淹没了大约3万俄亩的土地，30年之后俄罗斯灌溉专家写道：“现在被提到第一位的不是引

326

水灌溉的问题,而是排干被淹没的珍贵土地上的积水问题。”[1]

1885年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亲王重新恢复了饥饿草原上的工程。亲王这些工程的特点在于它们只利用土著人的技术手段来施工,没有俄罗斯专家的参与。第一条运河“由于利用布哈拉方式来施工”,因而得名布哈拉渠。比第一条运河更成功的第二条运河是“用希瓦方法”开凿的,所以得名希瓦渠,只是到了后来才更名为“尼古拉一世皇帝水渠”[2]。随着工程的开工建设,在运河沿线出现了一些主要由开凿运河的工人建立的俄罗斯村落。从1885年到1891年,总共建立了5个村落,其中有4个一直存在到今天。最老的一个村落扎波罗日斯基在1897年开始走向衰落,并最终在1899年被放弃。锡尔河对岸的达利韦尔津斯卡娅与饥饿草原相连,河水在这里改变方向,由西流向北。在现代为了安置移民也曾打算在那里修建灌溉工程,但是在1886年格罗杰科夫任州长的时候在这里建立了斯列坚斯克村,移民们愿意从早已存在的达利韦尔津渠引水灌溉。该村坐落的地方被认为是“极其富足的地方”[3]。

327

无论是饥饿草原城,还是达利韦尔津斯卡娅草原对由于1891年饥荒而引起的席卷了整个突厥斯坦的最大规模的移民风潮都没有发挥作用,当时除了有一些新农户进入老村庄之外,又出现了20多个新村。根据И. И. 盖尔的说法,在奇姆肯特县有11个,在塔什干县有6个,在奥利耶阿塔县有4个。[4] 在奇姆肯特县建立新村的主要区域是在老奥特拉尔附近,这里修建了一些灌溉工程,即使没有开凿新阿雷克[5],也修复了一些旧阿雷克。在塔什干县则利用了修复的或者从本质上讲

[1]斯科尔尼亚科夫《亚洲俄罗斯的人工灌溉》,第248页。

[2]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350页。斯科尔尼亚科夫(《亚洲俄罗斯的人工灌溉》,第248页)可能认为,布哈拉渠的名称来自于一个传说:曾经存在着一个“引来锡尔河水灌溉布哈拉”的灌溉工程,亲王想恢复这项工程。也比较卡拉瓦耶夫《饥饿草原的今昔》,第10页和第17页。

[3]卡拉瓦耶夫的说法(《饥饿草原的今昔》,第123页)。

[4]可能在奥利耶阿塔建立了5个新村:4个在塔拉斯(罗夫诺耶、格罗兹诺耶、格罗杰科沃和克柳切沃耶),1个在楚河(斯捷普诺耶)。比较盖尔《突厥斯坦指南》,第224页。

[5]阿雷克即灌溉渠。——译者

就像已经确定的那样是重新开凿的汗渠，在渠上建立了3个新村——切尔尼亚耶夫斯科耶、康斯坦丁诺夫斯科耶和考夫曼斯科耶，其中的一个（康斯坦丁诺夫斯科耶）是为来自萨拉托夫省的德国人建立的。莫罗勘派信徒建起了一个村落（老贝拿克特地区的锡帕尔斯科耶，或沙赫卢希亚）。异教徒（莫罗勘派信徒、洗礼派信徒、自称是东正教信徒的鞭身教徒）在1896—1897年也被亲王安置在饥饿草原的上沃伦斯基村、下沃伦斯基村和近卫骑兵村。

1891—1892年移民本能地向突厥斯坦最大的河流——阿姆河的迁徙未能如愿以偿。行政机构声明说，阿姆河军事区根本没有空闲的适合俄罗斯移民的土地，并作出了"不仅不允许移民进入阿姆河地区，而且也不允许能工巧匠进入阿姆河地区"的命令。[1]

这样一来，这个每平方俄里居民密度只有2人，耕种面积占总面积1%，而且有一条大河流经的地方被排除在移民区域之外。曾经从流经这个地区的大河中开凿了一条运河（加夫霍尔），这条运河现在完全可以对整个荒无人烟的地区进行灌溉。对阿姆河地区历史的不了解还表现在后来拟订的灌溉方案中。在1890年破坏了希瓦的汉本德水坝和塔什布古特水坝并让河水流入萨雷卡梅什盆地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亲王谈到："要使辽阔干旱的突厥斯坦荒漠恢复生机，这里在阿拉伯人统治时代曾经生机勃勃，并且有一个繁盛的花剌子模王国。"[2]实际上，河流流经老乌尔根奇以下对花剌子模的生活从没有产生重要的作用，包括在阿姆河流到萨雷卡梅什又从那里折回流经乌兹博伊的那个时代。后来又认为可以灌溉阿姆河左岸20万俄亩的土地，这些土地主要在老乌尔根奇以下干旱的河床区，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以下右岸只有2万俄亩。[3] 这后一个方案看来也是由于不了解加夫霍尔运河的资料才制订的。1905年提出了用阿姆河水灌溉516000俄亩梅尔夫县土地的宏伟方案，该方案的拥护者完全错误地认为在中世

328

〔1〕盖尔《饥荒和1891年锡尔河州的殖民》，第16页。

〔2〕弗拉基米罗夫《最近时期阿姆河三角洲的变迁》，第392页。

〔3〕马萨利斯基《种棉业、国有土地的灌溉和私人企业》，第88页。

纪曾利用阿姆河水来浇灌梅尔夫绿洲。

所有这些创举暂时还都是一些构想，灌溉工程主要集中在饥饿草原，并且这些工程无论是对灌溉面积而言，还是对俄罗斯殖民和发展种棉业的成就而言，都收效甚微，发展种棉业是20世纪在突厥斯坦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1913年竣工的罗曼诺夫运河(尼古拉一世皇帝水渠被纳入到该运河系统之中)的开凿被认为是“中亚灌溉领域中第一个国家级大工程”。但是这条运河只能灌溉8415.8俄亩土地。饥饿草原上俄罗斯新村的数量达到了11个，其中有4个没有可以灌溉的份地。在种棉业方面起初对达利韦尔津斯卡娅草原的斯列坚斯克村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人们认为这个村是“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极好典范”：在这个村庄存在的最初几年，用于种植棉花的土地达到600俄亩，并且种棉业的发展得到了“大雅罗斯拉夫斯卡娅纺织厂”的支持(该工厂为了发展种棉业在突厥斯坦收购了土地，并且安集延县的安德烈耶夫斯基农庄被认为是公司最成功的种植园)。但由于遭受蝗灾，斯列坚斯克的种棉业很快便停止了，只是到了1910年才重新恢复。根据1914年的调查，总播种面积为1700俄亩，其中棉花的种植面积只有454俄亩。从总体上看，在饥饿草原的所有新村中只有2个村大量种植了棉花：在1906年建立的斯帕斯科耶村(早在1890年建立的杜霍夫斯科伊村被并入其中)总播种面积为1839俄亩，其中棉花播种面积为1100俄亩[1]，在1913年建立的大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村总播种面积为1248俄亩，其中棉花播种面积为975俄亩。如果在划定耕地和灌溉工程之间的界限时不发生某些错误的话，斯帕斯基村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由于产生了这些错误从1907年到1914年302个家庭中有49个家庭(占16.2%)放弃了自己的产业。在建立大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村时便成功地避免了类似的错误，正如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大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村的建立结束了“从前向饥饿草原移民的无序状态”，并开始

329

[1]根据1912年的资料，总共为450俄亩，占了总播种面积的26.5%(克尼泽、尤费列夫《种棉业》，第286页)。

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在大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村棉花播种面积的扩大，原因在于斯帕斯基村的棉花种植者为了种植棉花而租种了新住户的土地。

在外里海州修造灌溉工程的规划是与寄希望于扩大棉花播种面积密切相关的。根据1887年8月6日发布的命令在老梅尔夫遗址附近建立的穆尔加布皇家庄园是政府行为的集中体现，这里曾经是哈里发马蒙的庄园。这个庄园中的灌溉工程与亲王的工程完全相反，采用的不是土著的灌溉方式而是欧洲的灌溉方式，修建了突厥斯坦第一批水库。人们往往赋予这种新设施以重大意义，然而穆尔加布灌溉工程的败笔正表现在这方面，因为在修建水库的时候没有成功地预见到淤泥阻塞的情况，因而也就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土著灌溉工程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缺乏排水网络，这一不足完全没有被注意到，由于缺乏排水网络结果导致沼泽地面积增加、瘟疫盛行。因此外国专家往往并不像俄罗斯专家那样对穆尔加布的灌溉工程予以赞誉，他们认为灌溉的成果完全不能抵补修造工程的支出。[1]

但在1910年皇家庄园中毕竟有16000俄亩播种土地得到了灌溉，其中一半(8000俄亩)种植的是棉花。1911年打算把播种面积增加到25000俄亩。我不知道这一计划是否得到了实现。根据E. E. 斯科尔尼亚科夫的说法，在庄园中除了土著人之外，有4000多俄罗斯人，他们形成了3个村镇。[2] 但是从其他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在外里海州特别是在穆尔加布庄园中本打算主要依靠土著农民的双手来发展种棉业，并不打算吸引俄罗斯农民。可能庄园的建立者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好像“俄罗斯移民在自己的故乡已经习惯于种植谷物，他们不擅长棉花种植，尤其是在迁到新居住地之后的最初几年”[3]，这一观点在《亚洲俄罗斯》一书中已经被推翻。根据1910年的资料，庄园有11000名土

[1]马哈切克《俄罗斯突厥斯坦地方志》，第302页。

[2]斯科尔尼亚科夫《亚洲俄罗斯的人工灌溉》，第251页。这里把梅尔夫的“古迹”说成是“新时代科学技术所创造奇迹的默默见证人”。

[3]克尼泽、尤费列夫《种棉业》，第286页。

著人和3000名东正教徒，但可能在后者当中几乎没有庄稼人，因为在庄园的所有土地中俄罗斯人的土地只有200至300俄亩。人们寄希望于借助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中亚民族代表人物的帮助来发展土库曼人的种棉业。1890年为了发展种植业从七河流域请来了塔兰赤人，他们后来留在外里海州，人数有几百人。1893年为了教给土库曼人种植棉花的技术，又从撒马尔罕请来了经验丰富的萨尔特技师。 330

外里海州俄罗斯新村的数量增长很快，第一个村落出现于1889年，过了4年在战争结束后，在巴哈尔靳站或中世纪的杜伦城地界出现了格尔马布（后来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到1896年已经有了10个新村，其中一个是位于塞拉赫斯东南（根据盖尔的说法，在谢拉赫斯东南25俄里，根据马萨利斯基的说法在塞拉赫斯东南11俄里）捷詹河上的克列斯托沃耶，这是为来自萨拉托夫省的德国人建立的；另一个新村萨拉托夫斯科耶（也在格尔马布）也是为那些德国人和莫罗勘派教徒建立的。到1909年新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7个，但是其中总共只有5000名居民，这个数字与290000名土库曼居民相比是微不足道。在总人数中有超过1/4的人（1500人）居住在2个小俄罗斯村——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和波尔塔夫斯基，这2个小俄罗斯村坐落在位于阿富汗边界的中亚铁路穆尔加布支线终点站库什卡附近。上面提到的德国人殖民村克列斯托沃耶也是人数比较多的村落（有48个农户）。大部分村庄集中在阿斯哈巴德县，该县位于与波斯交界的科佩特达戈山区。斯科别列夫斯基只谈到了其中的一个村庄，他说在这个村庄中有200俄亩土地用于种植棉花。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按照与波斯签订的协议，流向俄罗斯境内的河水不能用于灌溉波斯境内的土地。当然边境波斯村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毫无保障。

吸引大量俄罗斯移民到外里海州的必要条件就是能够对新土地进行灌溉。外里海州数量不多的可耕土地属于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19世纪末那里每平方俄里有247人，接近于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根据1890年统计，每平方公里有208人）。

由于同样的原因，不能大规模地向撒马尔罕州（除了被合并到这

里的苦盏县和饥饿草原及达利韦尔津斯卡娅草原之外)和费尔干纳州进行移民。到1911年泽拉夫善总共只有1个俄罗斯村落——费奥多罗夫斯基村,该村位于从前隶属于撒马尔罕的卡塔-库尔干县。《撒马尔罕州概览》中有关费奥多罗夫斯基新村的资料没有说明这里特殊的福利情况。在1902年这里共有100户人家307人,有400俄亩水浇地和355俄亩非水浇地。有310俄亩土地已经耕种,其中63俄亩种了棉花。1908年,这里共有105户人家297人,水浇地280俄亩,非水浇地890俄亩,有580俄亩土地已经耕种,其中90俄亩种植了棉花。当然必须像对待当地的其他统计资料一样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数据。

331

在费尔干纳州第一个新村波克罗夫斯基1893年建在奥什县的非灌溉土地上,移民们得到的是库尔沙布河上被土著人抛弃的灌溉地,当时灌溉渠的源头被泛滥的河水冲垮,后来由地方财政出钱重新为俄罗斯人建好。[1] 1901年该县形成了一个不大的新村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其他3个小村庄是在1908年之后产生的,所以第一个新村波克罗夫斯基后来仍然是该县唯一一个富饶的和俄罗斯人口众多的村落(1911年这里共有2277人)。有一部分可灌溉的土地由俄罗斯新村占有,1911年在奥什县农民的土地上种植了30俄亩棉花。

在19世纪90年代的移民潮爆发期间,1897年在纳曼干县形成了乌斯片斯基村,它位于该县东北的山麓中,在卡桑和那乃东北部。之所以建立这个村,是因为1897年在奇尔奇克河源头之一的恰特卡尔山谷安置来自基辅省移民的尝试遭到了失败。继续往东北在1907年自发地形成了克特梅秋别村,有15户人家(69人),1908年新村首次登记注册的时候住户达到53家(319人),1911年有住户65家(460人)。在纳曼干县没有出现其他新村。这2个新村对种植谷物主要是小麦都有特别的意义。

在安集延县也辟出一些靠山的地方用于组建移民村。到1901年(从1897年开始)组成了3个新村:尼古拉耶夫斯基(也是由于在恰特

[1]《费尔干纳州概览》,1899年,第78页。

卡尔山谷中安置移民遭到了失败)、布拉戈维申斯基和斯帕斯基。从1904年起,安集延县成为向库加尔、亚辛和乌兹根3个州自发移民的主要地区。其中乌兹根被认为是混合型州,而另外2个则是纯粹的游牧州,虽然实际上这里的土著人已经转入定居生活。1908年在这里进行登记注册的时候,除了以前存在的3个新村之外,又出现了8个新村,与以前3个新村不同的是,它们都带着当地的土著名称。亚辛和乌兹根的5个新村都是沿亚辛河及其支流孔杜尔甘河和扎尔格尔河而建的,并且只把宅旁园地安置于灌溉区内。农民可能后来利用这些地方来种植一点棉花,1911年种植的棉花总共只有5俄亩。因而总共形成了11个新村。1908年又产生了第12个——扬吉阿雷克村(从其名字中可以看出该村位于灌溉地上),村中居民很少。这个新村当时没有登记注册,因而在后来的概览中再也没被提到。

332

马尔格兰县(从1907年起称斯科别列夫县)的俄罗斯村具有特殊的地位,该村是在因参加1898年起义而被摧毁的一些土著人村庄的土地上建立的。在另外一个地方给迁出的土著人拨出一小块土地,组成了马尔哈马特村(仁慈),从前的明秋别州就是由此而得到了一个新名(起义的领袖来自明秋别村)。因此这个俄罗斯村落(顺便提一下,恰特卡尔山谷最后剩余的移民被迁到了这里),立即在距沙里汗－萨伊大水渠不远的棉花种植区的最中心地带获得了大量的灌溉土地。从1908年起,俄罗斯村的居民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

在费尔干纳州人口最多的浩罕县,完全没有建立俄罗斯村落。俄罗斯村镇居民总数大约为10000人,这在该州200万居民中总共只占0.5%。

处于向定居生活过渡阶段的游牧民受俄罗斯农民文明的影响比较大。在七河流域的比什凯克县甚至出现了一个“带有俄式房屋和街道,四周栽种了树木”的吉尔吉斯村落(塔什－秋别[1]。顺便提一下,

〔1〕捷连季耶夫在自己的书中叙述了1897年塔什－秋别村建立的历史。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383页以下。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农业殖民比哥萨克殖民对土著人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更大)。农业殖民的热烈拥护者 И. И. 盖尔在 1893 年强调指出了两个“俄罗斯殖民活动对土著人具有开化作用的明显事实”,这就是大镰刀的使用和细毛绵羊饲养业的引入。[1] 把大镰刀介绍给土著人特别是吉尔吉斯人,这的确是俄罗斯农民毋庸置疑的功绩。马萨利斯基证实说吉尔吉斯人对大镰刀的需求量很大,由于这种“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边区还不知道”的工具的使用,吉尔吉斯人开始储备过冬的干草。在有些地方萨尔特人也用大镰刀来收割苜蓿。[2] 至于细毛绵羊饲养业,可以说是北高加索“一些人所进行的企业活动”把它引进到突厥斯坦的,农民特别是奇姆肯特县的农民也效仿了他们的做法。[3] 根据盖尔的说法,出现了“奇姆肯特土著居民对美利奴羊毛的需求”,但是据悉,细毛绵羊饲养业并没有在土著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333

在俄罗斯人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当中,马铃薯的种植得到了传播。马萨利斯基在自己的著作中说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中亚根本没有马铃薯[4],这一说法并不十分准确。鞑靼人曾经在塔什干周围种植过马铃薯。[5] 但是只有在俄罗斯统治时代,在俄罗斯人的影响下,土著居民才开始种植马铃薯。马萨利斯基说,在费尔干纳州(纳曼干县)的阿尔马兹村每年种植马铃薯达到 300 俄亩。1911 年概览提供的资料表明,

---

[1]盖尔《论锡尔河州的俄罗斯村落》,第 173 页。

[2]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 438 页。吉尔吉斯人把大镰刀称作“俄罗斯镰刀”(乌卢斯乌拉克),参见波克罗夫斯基、斯托戈夫《1909 年马尔格兰县阿赖河的阿乌尔村社》,第 138 页(在拉德洛夫的《突厥方言词典试编》中没有这一术语)。书中引用了恰普卡一词,根据拉德洛夫《突厥方言词典试编》,恰普卡(贴列乌特词)就是加尔卢舍克人的“大镰刀”(应该是“镰刀”,die Sichel)。大镰刀根据拉德洛夫的《突厥方言词典试编》(第 1 卷,第 1651 页)就是巴什基尔人的恰尔戈乌拉克。在阿尔泰人和贴列乌特人那里恰尔戈即“大镰刀”(应该是“镰刀”,die Sichel)。根据 1899 年的俄吉(哈萨克。——Б. 加富罗夫)词典,大镰刀是沙尔戈奥拉克,比较拉德洛夫对沙尔戈奥拉克的解释,第 4 卷,第 965 页。根据这些语言学资料来判断,大镰刀可能是从巴什基里亚传入吉尔吉斯(哈萨克。——Б. 加富罗夫)草原北部的。

[3]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 501 页。

[4]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 469 页。

[5]根据纳利夫金的说法(《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 10 页),在俄罗斯征服之前突厥斯坦大约有 5000 名鞑靼人。

在纳曼干县种植马铃薯的土著人和私人土地有297俄亩，种植马铃薯的农民土地只有10俄亩。对整个费尔干纳州而言，相应的数据分别为853和166(其中有134俄亩在安集延县)俄亩。在撒马尔罕县，根据1908年的资料显示，定居的土著人种植马铃薯379俄亩。在七河州种植马铃薯的规模更大，这里的塔兰赤人和东干人从俄罗斯人那里学会了种植马铃薯。马铃薯并没有作为一种食物而在土著人中得到传播。

在其他的农作物中，“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中亚几乎完全不知道”燕麦。[1] 马萨利斯基只是谈到了俄罗斯居民种植燕麦的情况。根据其他资料，在七河州除了俄罗斯人种植燕麦之外，塔兰赤人、东干人和吉尔吉斯人也种植燕麦。1899年概览中的资料表明，吉尔吉斯人种植的燕麦超过了农民和哥萨克所种植燕麦的总和。吉尔吉斯人同其他土著民族一样，大概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就已经知道燕麦了。[2] 可能，燕麦的种植只是被俄罗斯人推广到了比从前更往南的地区。[3] 334

还可以列举其他一些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突厥斯坦尚不存在的农业领域(工业果树栽培业、葡萄酒酿造业、甜菜种植业、乳制品加工业)[4]，但是这些领域一部分是由政府提倡的，与农业殖民活动无关，还有一部分并没有在土著人中流行起来(像乳制品业[5])。

除了通过俄罗斯人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之外，19世纪下半叶土著人还通过喀什噶尔和伊宁边区的移民受到了远东文明的影响，这些移民是因为政治原因而离开自己祖国的。人数最多的是七河州的塔兰赤

---

[1]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450页。

[2]土著词汇苏拉和苏鲁即“燕麦”的广泛流传就证明了这一点。比较拉德洛夫《突厥方言词典试编》，第4卷，第772－775页。

[3]比较盖尔对塔什干县特罗伊茨村农民的描述：“顺便提一下，在塔什干县广泛种植燕麦是他们的创举”(盖尔《锡尔河州的农业殖民活动》，第311页)。

[4]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558页。

[5]养蜂业也是如此，马萨利斯基说(1913年)(《突厥斯坦边区》，第508－509页。——Б.加富罗夫)，养蜂业“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在一些地方的土著人当中得到推广”。在俄罗斯人征服时期，只是在塔什干县的布里奇穆拉山村才有规模不大的养蜂业(波斯佩洛夫《关于卡塔库尔干县养蜂业的通信》，第65页)。

需要指出的是，布里奇穆拉地区在19—20世纪是塔吉克人最北部的居住地点。——B.罗莫金

人(约为83000人),他们与喀什噶尔的萨尔特人同属一个民族[1],他们与后者的差别仅在于名称不同(塔兰赤人就是18世纪被中国从喀什噶尔迁到伊宁边区的喀什噶尔萨尔特人的后裔)。在俄罗斯人统治时期,塔兰赤人甚至参与了发展城市生活的活动,他们是贾尔肯特县城的主要居民(总人数25000人,塔兰赤人为16000人),该县城是俄罗斯人1882年在从前伊宁边区的领土上建立的,根据1881年的条约,这块领土归俄罗斯所有,被合并到七河州(在贾尔肯特共有4500名俄罗斯人)。[2] 人数略少(总共有20600人)但经济生活更富裕的另一些移民是来自前中国领地[3]的东干人,他们操中国语言穿中国服饰,信仰伊斯兰教。东干人也被安置在七河州,他们对这里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根据1899年《七河州概览》[4],在东干人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只能从锡尔河州和伊宁边区进口稻米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东干人首次在这里种植大米,很快七河州不仅不需要外来大米了,而且自己还能向临近地区出口大米。塔兰赤人和吉尔吉斯人从东干人那里学会了种植 335 稻米的技术。[5] 东干人也对城市中的穆斯林产生了影响:东干人的帽 336 子甚至在塔什干本地的萨尔特人当中流行起来。[6]

---

[1]也就是说塔兰赤人就是畏兀儿人,但是“塔兰赤”的名称只用于表示七河流域的畏兀儿人,他们是19世纪80年代从伊犁地区迁到七河流域的移民。关于这一点,参见卡比罗夫《伊犁畏兀儿人向七河流域的迁徙》。——B.罗莫金

[2]图尔恰尼诺夫《亚洲俄罗斯的城市》,第334页。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768页。

[3]一部分来自伊宁边区,另一部分来自山西省(他们从这个省迁到了比什凯克县卡拉库努兹村)。比较B.齐布兹金和A.什马科夫的文章《七河州比什凯克县卡拉库努兹村东干人生活札记》。

[4]《七河州概览》,1899年,第12页。——Б.加富罗夫

[5]还可以比较波亚尔科夫《东干人起义的最后片段》,第73页以下。还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东干人的大米就已经从比什凯克运往“突厥斯坦和斯捷普诺伊边区的所有城市”(参见И.捷连季耶夫《比什凯克资料》,第22页)。

[6]比如比较插图:施瓦茨《突厥斯坦》,第301页。斯凯列尔多少夸大了远东在物质文明领域中的优势,他认为(《突厥斯坦》,第2卷,第389页)对俄罗斯人而言把突厥斯坦变成一个有利可图地区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国移民敞开那里的大门。

9 城市生活

除了发展农业损害了畜牧业之外，俄罗斯征服的后果还有城市生活的大发展。[1] 但是，城市甚至在俄罗斯统治时期建立的城市，从居民的构成上看绝大多数也并没有成为纯粹的俄罗斯城市。在突厥斯坦的本土即锡尔河、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地区，俄罗斯人将新的俄罗斯城区绝大多数并入到老城市之中，新俄罗斯城区后来成为与“土著的”或“亚洲的”城区相对立的部分，并与之共同组成了一个城市。只有在征服费尔干纳之后，为了建立州府才选择了一块与土著城市相邻（大约相距 12 俄里）的地方建城，而不是在与土著城市并排的地方建城，并且这个地方不是与该州的主要城市浩罕相邻，而是与稍次的城市马尔格兰相邻。所以从 1907 年开始被称为斯科别列夫（现在的费尔干纳）的“新马尔格兰”从居民的构成上看是一座俄罗斯城市（1911 年 11000 名居民中有 7000 名俄罗斯人）。这一地点的选择并不是立即就确定下来的，曾经打算把另一块靠近老马尔格兰位于老马尔格兰和亚尔－麻札尔村之间的地方作为斯科别列夫。放弃传统做法——在主要的土著城市旁边建立州首府——这是由卫生条件引发的。浩罕城中不利的卫生条件促使当局放弃了与从前州和汗国的首府并排建立俄罗斯行政中心的想法。[2] 斯科别列夫“拥有健康的饮水，在突厥斯坦的所有城市中自然条件最为优越”。[3] 但是在报刊中也表达了一丝遗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城市被建在了偏离从前生活中心的地方，所以只成

〔1〕根据马克舍耶夫的观点（《突厥斯坦边区的地理学、民族学和统计学资料》，第 35 页），“突厥斯坦边区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经济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他“只是把那些根据新情况俄罗斯行政机构迄今仍在那里存在的地方”称为城市。

〔2〕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 701 页。

〔3〕图尔恰尼诺夫《亚洲俄罗斯的城市》，第 325 页。

为一个"纯粹的行政中心,居民主要是国家的公务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同时安集延城和浩罕城的俄罗斯城区坐落在与同名土著城市直接相连的地方,成为拥有成熟(尤其是在浩罕城)社会生活的大商贸区"。但在卫生条件方面,斯科别列夫所占据的地方似乎要更好一些。[1] 虽然马萨利斯基认为费尔干纳州府的位置选得非常成功(城市"从生活条件来看在突厥斯坦即使不是位居第一的话,至少也是前几位"),但他仍然承认"斯科别列夫的工商业生活发展得比较薄弱"。[2] 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费尔干纳这个在突厥斯坦经济生活中占据首位的州中,俄罗斯人所建立的俄罗斯居民占绝大多数的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工商业价值,而当时在那些工商业生活集中的主要城市像浩罕、纳曼干和安集延中,俄罗斯人的数量与土著人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在其中的每一个城市中(在浩罕城是从 1885 年开始的)都有与土著人城区并列的俄罗斯人城区(根据 1911 年的资料,浩罕城中东正教徒和穆斯林的人数分别为 5220 人和 111390 人,在纳曼干二者的人数分别为 1157 人和 77139 人,在安集延分别为 3700 人和 76543 人)。当然不应该从中得出结论说俄罗斯在费尔干纳的商业、工业和技术领域的代表没有对土著人的生活产生影响。除了城市以外,俄罗斯人还渗透到农村。甚至在连一个俄罗斯村落也没有的浩罕县,在 1911 年也有了 1649 名东正教徒(除城市以外),在斯科别列夫县有 3589 名东正教徒。在斯科别列夫县的"种棉业和棉花贸易中心"阿萨克村,"居民自己(土著人)"在 1908 年还"开始尝试按照欧洲的样式建立坚固而有价值的灌溉工程——水闸,这种水闸是用烧制的砖头在混凝土底座上建造的,水闸上按着铁闸门",这一水闸位于伊萨 - 奥里亚渠源头附近,伊萨 - 奥里亚渠发源于沙里汗 - 萨伊。[3]

在撒马尔罕州只是出现了附属于老城市(撒马尔罕、苦盏、乌拉 - 秋别、吉扎克和卡塔库尔干)的"俄罗斯城区",虽然在一个城市——吉

[1]《费尔干纳州统计概览》,1907 年,第 9 页。

[2]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 706 页。

[3]《费尔干纳州统计概览》,1908 年,第 23 页。

扎克中俄罗斯城区（起初是克柳切沃耶堡）与土著城区相距3俄里。只有撒马尔罕俄罗斯城区的规模多少要大一些，根据1908年的资料，这里总共有11654名东正教徒（居民总数为80706人），在该州所有其他的城市中东正教徒合起来总共只有2080人（这些城市的总人口数为84138人）。

338

在锡尔河州俄罗斯人恢复了14世纪已经消失的（除了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苏格纳克以外）锡尔河下游的城市生活。但是在这些城市中，卡扎林斯克（起初被称作卡扎拉）和佩罗夫斯克，俄罗斯人仅仅占了居民人口的一半，并且这一成果还只是不久之前在敷设了铁路之后才取得的。根据1897年的普查，在卡扎林斯克只有2610名俄罗斯人，而这里的总人口为7585人，佩罗夫斯克的总人口为5508人，俄罗斯人只有742人。小城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后来的图尔特库尔）依然是一座纯粹的俄罗斯小城（居民人口不到3000），它是1873年进军希瓦之后组建的阿姆河军事区的行政中心。城市（开始是一座小堡垒）建在距离大村落舒拉汉5俄里、据军事区经济中心琴拜村243俄里的地方，琴拜村在1910年居民的数量（大约为4000人）超过了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琴拜区被认为是该军事区的粮仓。[1]

无论在俄罗斯征服之前，还是在俄罗斯征服之后（特别是在征服之后），塔什干在锡尔河州都处于一种完全特殊的地位。[2] 由于缺乏准确的统计资料我们还不能确定塔什干是否是浩罕汗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就是说不能确定它的居民数量是否超过了浩罕。[3] 不管怎么说，当时锡尔河州的城市就连最间接的比较都经受不起。在俄罗斯统治时期，塔什干不仅成为突厥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成为整个亚洲

---

〔1〕弗拉基米罗夫《最近时期阿姆河三角洲的变迁》，第391页。

〔2〕关于塔什干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发展中亚与俄罗斯经济、政治关系中发挥的贸易和政治作用，现在可以参见霍吉耶夫的著作《塔什干城在发展中亚与俄罗斯经济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关于俄罗斯征服之后塔什干的历史，参见阿扎达耶夫《19世纪下半叶的塔什干》，瓦哈博夫《三次革命时期的塔什干》。——B.罗莫金

〔3〕根据1865年翻译家比丘林搜集的资料，塔什干和浩罕的居民数量是一样的，都有10万人。根据1866年底民事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塔什干有8万居民（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281页以下）。

俄罗斯人口最多的城市。就居民数量来看,俄罗斯城区大大逊色于土著城区,但俄罗斯居民的数量依然逐渐达到了5万人。在整个边区还找不到另外一座拥有这么多俄罗斯居民的城市。所以在塔什干欧洲人所理解的社会生活的发展程度要比其他城市高得多,土著人也部分地被吸引到了社会生活中来,尤其是随着1870年6月16日颁布的城市条例在经过一些修改于1877年被推广到塔什干以后,情况更是如此。根据把这一被运用到塔什干的条例原则,2/3的议员由俄罗斯城区选举产生,1/3由"亚洲城区"选举产生,并且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有相应城区的常住居民才拥有被选举权。这种不平等其实不是民族的不平等,而是地域的不平等。迁到"亚洲城区"的俄罗斯人其选举权和被

339 选举权都是与土著人平等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条规则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运用。需要指出的是,塔什干城市杜马的这种成分构成决定了城市的资金几乎主要被用于改善俄罗斯城区的市政设施。在确定市参议会成员的时候,起作用的不是地域原则而是民族原则,虽然规则的第一稿(1877年8月总督命令)是按照保护土著人权利的含义来制定的:"在市参议会中总参议员的1/3必须从懂俄语的土著人中选出",也就是说曾经决定,土著人在市参议会中所占的席位不少于1/3。在立法机构所批准的(国务会议的意见于12月5日获批)规则的最后文本中,甚至不承认懂俄语是选择土著参议会成员的绝对必要条件:"参议会成员总数的1/3要从土著人中选出,并且主要是从那些懂俄语的土著人中选出。"通常参议会成员有6人,其中2人是土著人。在1910—1914年会期,6名参议会成员中只有1位土著人马克苏特·霍加·阿塔·帕德沙·霍加耶夫,他已经在杜马中工作了8个会期。在第一个会期,从土著区的常住居民中选出了24名议员(三级中每一级平均为8人),其中有20名萨尔特人,2名穆斯林官员(其中1位是总督的翻译)和2名鞑靼人。

这种代表权对土著人而言甚至是了解欧洲社会团体的最好学校,如果这一条例能够运用到其他土著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突厥斯坦城市的话,它无疑将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在这些城市中,俄罗斯城区的

居民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不可能按照塔什干的方式来组织城市管理机构。甚至有10万人口的浩罕城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其“城市经济管理机构”的状况,大概也只相当于1870—1877年塔什干的水平。在考夫曼之后突厥斯坦行政当局不仅不认为必须促进城市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反而将不依附于根据1886年6月12日条例而设立的俄罗斯法院机构的塔什干城市杜马的存在视为是对自己权威的破坏。在总督弗列夫斯基男爵统治时期(1889—1898年)又提出了撤销塔什干城市杜马的问题,或者至少要以1892年关于将法院置于行政机构控制之下的条例取代1870年的更自由主义的条例,或者最低限度也要按照俄罗斯内地的方式实行有关地方长官的条例。还提出必须要废除俄罗斯当局所实行的暂行代理土著法官——卡迪(定居居民)和比伊(游牧居民)职务的选举制度。尽管行政机构一再坚持,但这些方案仍然没有一项得以实施。甚至塔什干杜马的秘书在1912年庆祝城市自治实行35周年之际指出:塔什干“现在是帝国唯一一座仍在实行1870年城市条例的城市”。 340

突厥斯坦的所有精神生活比其他任何一个边陲地区都更集中在一个城市中。从塔什干到突厥斯坦的其他地方被认为是到“外省去”,甚至连出版物也使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出版物构成了塔什干的一个特色。在其他城市中创办报纸的尝试并没有取得持久性的成果(撒马尔罕和后来费尔干纳的城市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可以夸耀的成果,虽然这些成果也是不持久的):塔什干不仅能够发行报纸(尽管存在着极端不利的书刊检查制度以及其他限制条件),而且可以出版杂志(老实说,后者往往没能长期保障自身的存在),也组建了相当多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小组。但是所有这些社会生活都集中在俄罗斯城区,没有认真做过任何让土著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尝试。就连官方报纸《突厥斯坦本地报》的编辑都认为“几乎不可能有出身于土著人的同事,因为他们不懂得刊物的规则,在自己的通讯中也不能抛开个人的意图”[1],虽然这

[1]奥斯特罗乌莫夫《萨尔特人》,第3版,第171页。

位编辑实际上也使用了土著人撰写的稿件。鞑靼人代替俄罗斯人承担起了培育类似欧洲学校这样的欧式社会团体的职责。在1906年和1908年间出版的鞑靼报纸根据当局的命令被查封了。鞑靼人的新式学校只是因为一个必须使教师与学生来自同一民族的空前命令而一度陷入瘫痪。要找到与穆斯林慈善团体或者简称穆斯林团体进行斗争的合法根据更困难一些。实际上,鞑靼人创办这些团体不是为了慈善目的,而是为了穆斯林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能够取得成果。用B.A.戈尔德列夫斯基的话来说,"这是将松散的穆斯林力量集中起来的基层单位"。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代表认为一切能够促进"俄罗斯穆斯林居民独立"的事务都是不受欢迎的,其中包括"互助组织和专门的慈善协会,以及为穆斯林开办的阅览室"[1]。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俄罗斯人自身的行为大大促进了穆斯林的"独立",也促使鞑靼人的活动取得了成果。因为俄罗斯人很少重视在土著人能够接受的基础上在突厥斯坦城市的俄罗斯区和土著区之间建立联系。塔什干的穆斯林慈善团体从1909年开始活动,无疑这个团体是在鞑靼人的影响下产生的,虽然它的主席是当地的一位富商赛义德·卡里姆·赛义德·阿齐姆巴耶夫,他父亲及其儿子赛义德·卡里姆、赛义德·加尼和女婿阿里夫·霍加都是俄罗斯影响和俄罗斯学校的拥护者。[2]

341

在俄罗斯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锡尔河州的每一座城市(突厥斯坦、奇姆肯特、奥利耶阿塔)中都产生了俄罗斯城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革命爆发前的行政区划正是那座从居民数量来看位居该州第二位的突厥斯坦城(居民达2万人),被认为是一个非县城的或非县行政中心的县辖城市。可能这是因为其中的俄罗斯居民比其他两座城市还要少。最初打算在库拉明县和塔什干县建立一个特别的县城,因为塔什干应该成为一个特别的市行政区,它拥有一套独立于县的管理机构。1867年马克舍耶夫认为,托伊秋别会成为塔什干县的县城,当时这里

[1]奥斯特罗乌莫夫《古兰经与进步》,第246页以下。

[2]奥斯特罗乌莫夫《萨尔特人》,第1版,第1册,第63页以下。

是一个拥有2000农户的村庄。事实上在1886年条例实施之前，库拉明县长的住地在奎柳克，但是这里却没有成为一个市区，当时依然是一个“不大的乡村”，虽然县长房屋的四周围有宽广的花园，看起来像一座宫殿。[1]

在七河州和外里海州俄罗斯人只找到了以前城市的遗址。甚至在19世纪建于楚河谷地及在纳伦河两岸的浩罕要塞附近，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也只是形成了一些村庄，其中最大的是比什凯克(约有1000农户)。吉尔吉斯人对萨尔特人殖民活动的仇视程度，可以从下面这一点看出来，在浩罕要塞衰落和萨尔特人离去之后，吉尔吉斯人“将萨尔特人的村落视为田野，把他们的村落变成了游牧场，以至于这些村落现在已经消失的踪迹皆无了”[2]。然而，更持久的、对吉尔吉斯人而言更不希望的俄罗斯人的殖民取代了萨尔特人的殖民。1867年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在隶属于该总督区的伊犁河以南地区形成了两个县：韦尔涅萨基县和托克马克县。1854年建造的韦尔诺耶要塞被改造成韦尔内市，这是刚刚成立的七河州的首府。土著人把阿拉木图的名称用到了新城市上，自古以来出大克宾河(楚河的支流)峡谷的伊犁河流域，湖泊(阿尔马金卡湖)和流向伊犁河支流卡斯克连河的小河(大小阿尔马金卡河)这整个地区都被称作阿拉木图。老村落的遗址位于城市的西南，在大阿尔马金卡河峡谷对面。萨尔特人很早就努力利用俄罗斯人在七河流域的主张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1862年，B. B. 拉德洛夫在科帕尔见到了大量的穆斯林商人，在他们中间塔什干的萨尔特人占了多数，甚至谢米帕拉金鞑靼人也比他们少得多。[3] 当然，萨尔特人找到了通往韦尔内的道路，这里早在1871年就已经有565名萨尔特人，多于吉尔吉斯人[4](403人)。但是这里占据多数的居民仍然是俄罗斯人，1911年这里的总人口为35000多人，其中俄罗斯人为26000

342

[1]斯凯列尔《突厥斯坦》，第1卷，第325页。

[2]塔雷津《比什凯克县》，第36页。

[3]鲁道夫《离开西伯利亚》，第1卷，第114页。

[4]哈萨克人。——Б. 加富罗夫

人。由于在韦尔内俄罗斯居民占据多数,所以在设立突厥斯坦教区的时候这座城市被选为高级僧侣的住地。也有人断言,总督考夫曼是传教活动的反对者,他既不希望在塔什干看到高级僧侣,也不希望看到宪兵(只是到了1907年底塔什干才出现暗探局)。1885年在伊塞克湖北岸库尔梅克金峡谷对面距离老堡垒不远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传教士修道院(斯维亚托特罗伊茨基修道院),该修道院拥有大量地产(2274.5俄亩),但僧侣并不多(1902年有9名修道士和2名见习修道士;据1909年的资料,见习修道士大约有15人)。这个修道院的出现是突厥斯坦的一种特殊现象,这可能与主教住在韦尔内有关。当然,无论是高级僧侣的讲坛还是修道院都没有对土著人的文化生活产生任何影响,虽然修道院里的养蜂业取得了某些成就。[1] 塔什干市自治局后来认为主教住在韦尔内多少损害了自己城市作为首府的权利,所以提出了把主教迁往塔什干的问题,并承诺出巨资为高级僧侣建造房屋。

七河流域西南县的管理局起初集中在托克马克。拉德洛夫认为这一建城的位置选得极其糟糕。从前的浩罕要塞依山而建,地理位置有益于健康,而俄罗斯的托克马克则建在楚河岸上,位于沼泽地中间。[2] 后来县管理局搬迁到了1878年在浩罕要塞附近建立的比什凯克城,由此该县被更名为比什凯克县。托克马克由一个县城变成了贸易市镇。比什凯克在1897年有6163名居民,其中俄罗斯人有2563人,也就是不到一半。1910年前后大约有14000人,其中有8000多名俄罗斯人。从库尔干和从前其他遗址的地理位置,其中包括聂斯托利教墓

343

地的地理位置上可以看出,中世纪时期的生活区域主要集中在比现在比什凯克和托克马克更往南的地区,这些生活区域之间的道路都是依山而建的。

伊塞克湖东南的卡拉科尔城建在与城市同名的卡拉科尔河岸上,它是一座非常新的城市,H. M. 普尔热瓦利斯基死后,被改名为普尔热

[1]1910年前后打算在修道院为吉尔吉斯孩子开办一所带有传教目的的寄宿学校。显然这一方案没有实现。

[2]鲁道夫《离开西伯利亚》,第1卷,第119页以下。

瓦利斯克。拉德洛夫说刚开始曾打算把城市建在更往东一些的阿克苏河岸上。1869 年当拉德洛夫来到这里的时候,城市被建在了卡拉科尔河上,当时只是刚开始建造第一批房屋,官员住在帐幕中,士兵住在帐篷里。1868 年在马克舍耶夫著作中"阿克苏城"被称作是"伊塞克湖县"的主要据点,在距城 8 俄里处的卡拉科尔河上有一座"鞑靼人的村庄"。在罗曼诺夫斯基著作(1867 年)所附的地图上[1]只是标出了"阿克苏堡"的位置,而没有标出卡拉科尔的位置。还在 70 年代(在贝勒津百科辞典中)卡拉科尔就被称作是伊塞克湖县的县辖市或者"驻扎军队的边境据点"。在 70 年代末期这里有居民 2777 人(根据贝勒津词典为 4201 人),到 1910 年居民达到 15000 人,其中俄罗斯人达到 6000 人。

这样一来,俄罗斯的征服消灭了七河流域的萨尔特农业殖民地,但也促进了萨尔特市民和商人村落的发展。[2] 由于俄罗斯颁布了关于非基督教徒的法律,因此穆斯林对城市自治工作的参与和其人数相比要少得多,该法律在欧俄地区用于反对犹太教徒但也被运用到穆斯林身上。韦尔内从 1879 年开始经市长、杜马和参议会同意,实行了城市条例。在七河流域的 5 座县城中,根据 1892 年与市长达成的条例建立了简易的社会事务管理局。1902 年在 5 座县城中只在科帕尔有一名穆斯林担任了市长助理(1904 年成为市长),在韦尔内和所有这 5 座县城中穆斯林是城市保护孤儿法院的成员。

外里海州的情况与七河州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在俄罗斯人统治时期这里产生的城市更少一些。除了州首府阿斯哈巴德之外,还产生了 2 座县城:克拉斯诺沃茨克和梅尔夫。在 2 个地域辽阔的县——曼格什拉克县和捷詹县当中根本没有城市。曼格什拉克县的管理中心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要塞仅仅被官方承认是一座城市。州首府阿斯哈巴德建

[1]突厥斯坦军区地图,上面标有驻扎中亚的边防部队。该地图被附在罗曼诺夫斯基的书中,见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B. 罗莫金

[2]纳利夫金谈到了在俄罗斯绥靖草原的影响下,萨尔特人贸易事务获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 89 页及下一页)。

于 1881 年,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在出版物中指出了一个事实,阿斯哈巴德“发展得比其他一些突厥斯坦城市要快,其中包括塔什干”。344 根据 1897 年的普查,这里已有居民 19426 人。1890 年塔什干的俄罗斯城区在建立 25 年之后,居民人数(不包括军人)大大减少(12981 人)。甚至从外里海铁路吸引了大量货源的奥伦堡—塔什干铁路建成之后,也没有影响阿斯哈巴德的发展。截至 1911 年,居民的数量达到了 44000 人,但是其中俄罗斯人总共只有 9000 人,也就是只占了 1/5 多一点。阿斯哈巴德发展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外高加索和波斯侨民的涌入。由于整个州居民数量的增长(23.5%)超过了东正教徒和旧礼仪派教徒数量的增长(13.5%),对于整个外里海州而言,从 1897 年普查以后到 1911 年前,东正教居民所占的百分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 8.9% 降到了 8.1%)。根据 1897 年的普查,外里海州俄罗斯人的数量超过外来的异族人(33273 : 31488 人),尽管超过的数量极其有限。截止到 1911 年,外来异族人的数量几乎比俄罗斯人多 25%(50152 : 4167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波斯侨民的涌入,其数量从 1897 年以来差不多增长了两倍(24350 : 8600)。本地的异族人也就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土库曼人的数量,在 1897 年普查的时候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1432 人)。

与其他突厥斯坦城市的知识分子相比,阿斯哈巴德的知识分子更成功地与塔什干知识分子展开了竞争。他们顺利又出色地办起了图书馆和博物馆,并且早于撒马尔罕为图书馆和博物馆建起了专门的建筑(革命前在塔什干没有这样的建筑物)。他们出版了报纸和杂志,创立了学术团体等等。对阿斯哈巴德而言,存在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非常奇怪的现象,这就是在俄罗斯居民数量很少的情况下,当地的力量呈现出四分五裂的趋势。这里出版了 2 种私人报纸(其中的一种得到了资助)——《外里海州观察》和《阿斯哈巴德》。1902 年曾试图创办 2 个任务相近的学术团体——“外里海州研究者协会”和“外里海州考古和历史爱好者小组”。无论哪一个团体都没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大约 10 年之后当时已经是战争时期,小组试图重新恢复自己的活动,并出版了

3册自己的学术活动记录。1903年《外里海州观察》曾尝试出版波斯语报纸，但未获成功，该报还刊载了"用波斯语发表的文章的译文"，实际上这篇俄罗斯文章是原文，波斯文稿是一篇蹩脚的俄文译稿。

外里海州的另一座大城市是创建于1884年的梅尔夫，在梅尔夫俄罗斯居民也只占了1/3多一点（总人口16000人，俄罗斯人5500人；根据1897年普查，居民人口只有8553人）。该城具有一定的商业意义，但当然对精神生活没有什么价值。之所以在人口相对比较多的阿斯哈巴德（居民数量超过了韦尔内）也没有实行城市自治，可能是因为异族人占据了多数。

在突厥斯坦社会生活的中心塔什干，最容易追踪到俄罗斯城市生活对土著人的影响，虽然第一位掌握了俄语（从鞑靼军官叶尼科耶夫那里学会的）的萨尔特知识分子萨塔尔汗（实际上是阿卜达斯·萨塔尔·霍加）·阿卜杜勒加法罗夫起初生活在奇姆肯特，并在那里担任突厥斯坦第一所俄罗斯土著学校（1874—1876年）的教师。这位萨塔尔汗曾在1876年与另外3名土著人一起来到彼得堡参加国际东方学家会议，这3位土著人分别为：萨尔特人穆罕默德·库洛夫，他是一位来自塔什干的族长；乌兹别克人朱拉伯克，他曾是基塔布的统治者，后来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将军，甚至在退休后仍然身着俄罗斯将军制服，俄语说得很好（1906年在塔什干附近卡拉苏渠上自家的庄园中被杀）；吉尔吉斯人尼亚佐夫。自从突厥斯坦有了铁路之后，这些旅行便经常进行，尽管突厥斯坦铁路的建设速度比料想的要慢得多。很长一段时间（1888—1899年）里海的铁路只能通到撒马尔罕，与边区首府塔什干之间只有邮路相连。只是到了20世纪才决定要经过奥伦堡建设一条连接突厥斯坦和欧俄的大铁路。把这条铁路和西伯利亚连接起来的任务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1] 七河流域和奥利耶阿塔县，除了其西部边界地区的狭长地带之外，直至最近依然在铁路网之外。通往撒马尔罕铁

[1]该任务在1927—1930年由于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突尔克西伯）的修建而得以完成。——B.罗莫金

路的敷设开始把西欧的旅游者吸引到那里。

在这之后很快萨尔特人就找到了通往西欧的道路。1900年塔什干商人塔吉·穆罕默德·伊萨·穆罕默多夫前往巴黎参加了巴黎展览会，又从巴黎来到了伦敦。1902年Н.П.奥斯特罗乌莫夫在车厢里遇到了一位从巴黎、维也纳和柏林旅行归来的纳曼干商人。纳利夫金证实说，从那时起从前萨尔特人“好静”的习性开始让位于截然相反的本性。纳利夫金认为这种“好静”的习性是萨尔特民族的本性，并把其从19世纪推导到过去，这是毫无根据的，但我们在这里也不必对此加以论证。

与俄罗斯人关系密切并学会说俄语的土著人，主要掌握了俄罗斯生活方式的外在方面，大部分人模仿的是俄罗斯生活方式的不良方面，学会了过轻浮的生活、饮酒。甚至学者、宗教代表也是如此，比如说穆福提，后来的卡迪萨塔尔汗。纳利夫金说[1]，“受人尊敬的土著”阶层是用俄罗斯奖章和其他奖赏打造出来的，这个阶层往往并不总是自己民族的最优秀的代表。拥有一座大型图书馆并读过许多历史著作的朱拉伯克不无根据地（在与我的谈话中）把俄罗斯的管理和蒙古人的管理进行了比较。他说在俄罗斯统治时期，如同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一样，一些恶劣的人利用虚伪的忠诚成功地欺骗了异族征服者，并在他们的庇护下排挤了自己的同胞。土库曼人的氏族领袖（кетхуды），虽然没有任何官方权力，对俄罗斯事务也总是袖手旁观，但却常常比那些通过贿赂和俄罗斯人庇护的方式而被选拔到行政或司法职位上来的人更享有本民族人民的尊敬。在俄罗斯统治时期，在草原上甚至形成了类似金融贵族的阶层（阿特卡姆纳尔，即骑士），他们取代了从前的氏族贵族。在城市中当然主要是富人享有了贸易额扩大所带来的成果。在费尔干纳，在土著农民和俄罗斯棉花收购商之间出现了一个巴伊阶层，即富人阶层。在塔什干商业界出现了一些从前所没有的资本家。一位研

[1]《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72页以下。书中说（第91页）萨塔尔罕是一个“迷失了自我又不依附于他人的背叛者”。对这些人可以用乔昆德（“改信基督教者”；在拉德洛夫的《突厥方言词典试编》中没有这个词，其词源也没弄清楚）这个外号来称呼。

究边区问题的行家说，在塔什干人们以前“认为拥有1万至1.5万卢布的人就是大富豪；现在（文章写于1903年）要想在萨尔特人中成为知名的富人，至少必须拥有50万卢布”。在这篇文章[1]以及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关于萨尔特人的著作中都谈到了在俄罗斯影响下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富有家庭外部环境的变化：安上了临街的窗户，客厅摆上了家具，有时还布置了欧式的主人书房等等。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指出塔什干俄罗斯城区阿里夫·霍加的房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认为这座房屋的外表就是两个民族相互接近的标志。房屋的一半不仅内部而且外表都是按照俄罗斯房屋的样式建造的；在为女眷留出的另一半房屋中略微表现出一点俄罗斯的影响，这里没有安设临街的窗户，虽然已经预留出了窗户的位置。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认为“时机一到，就会把这些窗户打通，虽然可能不是马上，不是突然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不会完全按照房屋正面预留下来的尺寸”[2]。

要想说明俄罗斯人对整个城市生活而不是对某些人生活发生影响的程度，最好先弄清土著城市所发生的外在变化。这个问题当地出版物涉及得比较少。甚至在像Н. С. 雷科申这样研究土著塔什干行家的文章中，也只是说这里的“街道弯曲狭窄错综混乱悉如从前”，没有提到把城市分割开来的几条主要的集市大街已经被大大拓宽了，这主要不是城市自治管理局发挥的作用，而是根据行政机构的命令来完成的，因为城市自治管理局对土著城区关注得比较少。行政机构并不是只在塔什干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比如，在撒马尔罕80年代初，城市北部塔什干大道和集市之间的街道就已经被拓宽了，并且当时还必须要把昔班尼王朝汗的陵墓迁到一个新的地方，经过与“权威土著人士”协商，俄罗斯政府完成了陵墓的搬迁工作。有时在处理类似的改造工程问题时甚至不得不由官方出面征询沙里亚代表们的意见。1886年，当人们对改建集市能否触犯建在寺院不动产土地上的小商铺利益产生疑虑

347

〔1〕雷科申《俄罗斯人与突厥人亲近的成果》。

〔2〕奥斯特罗乌莫夫《萨尔特人》，第1版，第1册，第67页。

时，塔什干的俄罗斯市长就是这样做的。自然，拓宽和矫直集市大街是通过占用临近的几条胡同来进行的，城市的布局由此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根据维亚特金的研究，在1868年的撒马尔罕"街道的分布，甚至二级街道的分布"同昔班尼王朝早期的状况"完全一样"。此外，还逐渐拆除了各处的黏土城墙。欧洲认为这一举措中断了与中世纪城市传统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进步现象，也是整顿城市的必要条件。但在塔什干我从一位土著老人那里听到的却是这样的反映，他说在每到夜间便关闭城门的城墙消失之后，夜里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安稳地睡觉了。

俄罗斯政府一开始倾向于让土著人掌管塔什干土著城区的警察监督机构，甚至1886年的条例也只限于将选举出来的阿克萨卡尔（族长）更名为主任，并且让大阿克萨卡尔担任警察局局长，领导土著警务人员。由于出乎俄罗斯当局的意料爆发了一场霍乱暴动，并且能够断定（在法庭上这是没有证据的），群众运动是在两位号召进行圣战的伊尚领导下发动的，所以1892年对条例进行了修改，这种修改不是为了保障城市公用事业，而是为了监督居民的政治情绪。此后族长的警察职能被剥夺，并被转交给拥有两位警官和两位警官助理的俄罗斯警察局局长。在生活中，土著城区的警察局局长通常被称为市长助理，土著人像称呼县长一样，称其为哈基姆。无论是在土著城区，还是在俄罗斯城区，警员大部分都由土著人担任。

348 顺便提一下，城市供水是塔什干城市管理局所操心的问题。对灌溉工程的监督完全掌握在土著阿雷克－阿克萨卡尔[1]手中。还在1909年时，市长Н. Г. 马利茨基在一份书面报告中只表达了一个希望：吸引"掌握欧洲水利工程技术的工程师专家参与这一事务"。在照明的问题上最明显地体现了城区之间的不平等。在城市自治实行以前，土著城区连一盏路灯都没有，在1887年底之前整个城市有路灯606盏，土著城区只占100盏。1905年采用的煤油白热路灯几乎全都安设

[1]即管理水渠的族长。——译者

在俄罗斯城区，截至 1907 年 1 月 1 日这里的煤油白热路灯有 207 盏，而当时整个城市的煤油白热路灯只有 208 盏，截止到 1909 年 1 月 1 日在总数为 321 盏的路灯中，俄罗斯城区占了 297 盏（土著城区的所有 24 盏路灯都安设在舍伊汉塔乌尔大街，这是由俄罗斯城区通往土著集市的主要道路），到这一年年底，在总数为 376 盏的路灯中，俄罗斯城区占了 319 盏。

对突厥斯坦土著城区而言，在 1894 年才设立的邮政电报局（邮政分局在 1892 年就已经开办）具有重大意义。邮政电报局的业务使我们有可能对土著城区与俄罗斯城区的生活进行某种比较。1909 年，土著城区收到了 24204 期报纸，其中有 2/3 是穆斯林报纸[1]，俄罗斯城区收到了 849520 期报纸。在土著城区邮政局的储蓄所中，每年有 100 名存款人，储蓄额为 0.3 至 0.5 万卢布，在俄罗斯城区每年有 650 名存款人，储蓄额达到了 16.5 万卢布。但是在土著城区每年卖出的印花纸和期票数额在 2 万到 2.5 万卢布之间，而在俄罗斯城区只是在 0.5 万到 1.2 万卢布之间。

为了吸引土著城区的土著居民群众加入到俄罗斯的精神生活中来，有时会举办民族朗诵会。这是塔什干“民族朗诵委员会”（从 1898 年起）和撒马尔罕“民族朗诵小组”的任务之一。1901 年 3 月 18 日，在老（17 世纪）撒马尔罕的希尔达尔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举办了一场这样的朗诵会，会场上放着幻灯片，并且年轻的毛拉马赫穆德在能容纳四五千人的讲堂里朗诵了 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人靠什么活着》（有可能用俄文阅读的萨塔尔罕酷爱托尔斯泰的作品）。在塔什干只有到了 1899 年 2 月才在俄罗斯城区（在男子中学的教学楼中）进行了“利用公共讲座的形式向土著人介绍欧洲科学知识的首次尝试”，当时讲解的是 С. М. 格拉梅尼茨基（国立学校学监）所写的一本介绍欧洲积极学术活动所取得的最主要成果的小册子。对突

[1]根据纳利夫金的说法（《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 124 页）用波斯语出版的印度泛伊斯兰主义机关报《哈布里 · 阿尔马金》（《牢固的联系》）在中亚得到了传播。

厥斯坦而言，这些朗诵会是一种新事物，它们与中世纪文化生活中那些

349 以自己的辩论术而著称的学者们的演讲最为相像，有时这些学者是站在露天地里对人数众多的听众进行布道的，在听众当中既有国王、显贵，也有群众。但是据我们所知，在最近几个世纪突厥斯坦已经没有这种布道者了，除了礼拜以外，也没有各个阶层都参加的集会了。显贵阶层的代表不会面对群众讲话，而群众要想得到训言则由梅达赫来提供，梅达赫是赞美穆斯林圣人特别是阿里的街头布道者，群众要想娱乐一下，就去看由街头演员表演的木偶戏（没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所知道的那种幻灯片）。由人表演的木偶戏通常在拉马丹月[1]晚上演出，每当冬季的斋月来临时，也有许多俄罗斯人来观看演出。但是据我所知，在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对它们进行详细的研究。[2] 同时，它们对话剧文学萌芽的作用也是毫无疑问的，如同在俄罗斯统治下社会生活史资料所显示的，这种话剧文学是后来在受到外来影响的萨尔特人那里产生的。萨尔特人的话剧艺术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在演员中有一些能在汗的宫廷中演出的拿手演员，如曾一度受到胡德亚尔汗欢迎的扎基尔·贾恩[3]。

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甚至俄罗斯州长和县长也来观看演出，后来可能根据当局的要求，这种情况被禁止了。那时我有幸认识了（1893/1894 年冬天）一位在木偶剧中深受爱戴的主人公，这就是巴特尔申博士，他是一名出身于鞑靼人的城市医生，这是一位在土著人中宣传欧洲文明的功绩卓著的传播者。毫无疑问，这些戏剧显示了其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土著语言文献的语言学意义，是与晦涩的土著语书面语体相对

350 立的形式。

---

〔1〕即斋月。——译者

〔2〕A. Л. 特罗伊茨卡娅对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乌兹别克民族戏剧史进行了研究（参见她的著作《乌兹别克斯坦民族戏剧和马戏简史》、《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戏剧》）。关于塔吉克人的民族戏剧史（根据库利亚布州资料编写）参见努尔贾诺夫《塔吉克民族戏剧》。——B. 罗莫金

〔3〕关于此人，参见奥斯特罗乌莫夫《萨尔特人》，第 3 版，第 73 页以下。

10 土著人和俄罗斯政权

俄罗斯当局从征服的最初几年开始就关注当地的社会舆论并努力争取在当地社会舆论界代表的支持下实行自己的措施。[1] 奥伦堡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1865年10月29日向塔什干居民发表的通告就是这种关注的最初表现形式之一，通告中说塔什干应该在俄罗斯的庇护下组成一个独立国家，应该委托突厥斯坦州州长切尔尼亚耶夫制订一个管理塔什干的方案。还在更早些时候以塔什干居民的名义草拟了一封致总督的贺信（贺信于9月18日被呈递上去），信中塔什干放弃了从自己当中推选长官的权力，并请求将从伊塞克湖到咸海连同锡尔河边界地带在内的突厥斯坦州的管理权托付给州长切尔尼亚耶夫，他有权任命"扎卡奇[2]、库尔巴希[3]、阿克萨卡尔等公职人员"，但是根据沙里亚，事情要提交卡迪卡延也就是总卡迪来决定，所以请求经州长切尔尼亚耶夫批准委托总卡迪来任命卡迪、乌列木、穆福提、列伊斯、穆捷瓦里和伊玛目。[4] 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5]认为在这个方案中"卡迪卡延的权力比州长还要大"，最后的修正案表明他的观点未必正确。草案中援引了奥伦堡穆福提在俄罗斯享有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它是

---

[1] В. В. 巴托尔德在这里所说的"当地的社会舆论"，应该是指在当地居民中占统治地位的上层的意见，沙皇政府关注他们的目的是在商界以及部分当地显贵等的代表中为自己寻找同盟者和支柱。——В. 罗莫金

[2] 即收税官。——译者

[3] 即百人队长。——译者

[4] 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178页。——Б. 加富罗夫

[5]《塔什干城最后的谢赫乌里－伊斯兰和卡迪卡延艾伊·霍加、哈基姆·霍加兄弟》，第23页。比较捷连季耶夫的观点："穆斯林神父统治整个边区，而俄罗斯军队只去维护这位至圣的安宁。"（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328页）

351 在鞑靼翻译的影响下拟定的。[1] 可能，其中还提出了除“根据沙里亚”向居民收取年“实物和货币收入”的1/10之外，不再向居民征收任何赋税的要求。实际上，在浩罕汗国时代实行的是另外一套税收体系：塔什干人按照某种老普查登记表由3000户家庭缴税，然而事实上居民的户数已经达到了20000户[2]，也就是说征收的正是“塔什干市内的庭院税”，而这正是居民们认为不符合沙里亚的规定所以请求不要征收的税。

在土著人的贺信中根本没有谈到更换卡迪卡延职务程序的问题。显然，当时认为在征服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将会得到俄罗斯政府的认可，其继承人也将根据州长的命令来委任，就像从前根据汗的汗诰来任命一样。事实上这样的职务经常由父亲传给儿子，所以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时代也会发生，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的确，切尔尼亚耶夫发布命令批准了哈基姆·霍加的卡迪卡延职务，哈基姆·霍加是早些时候(1281/1864—1865年)根据浩罕汗赛义德·穆罕默德·苏丹的汗诰被委任担任这一职务的。命令也批准了对一份专门名单中(该名单没有被附在所发布的命令中)所开列的一些人的职务任命，并且授权卡迪卡延给他们发布书面委任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让卡迪、乌列木等都服从于卡迪卡延也是俄罗斯政府的愿望。[3] 命令由突厥语公布并附有俄文译文，这就冲破了当地的传统：塔什干的官方公文用语都是波斯语，尽管在这个城市中占优势地位的是突厥语，曾几何时就连汗的汗诰都是用波斯语颁布的，除了“汗(某某)是我们的语言”之外。赛义德·穆罕默德·苏丹汗任命哈基姆·霍加的诏书就是用波斯文起草的。

---

[1]比较捷连季耶夫对赛义德·阿齐姆·巴伊作用的描写(《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327页)，他写道，在赛义德·阿齐姆·巴伊的影响下，土著人在一张空白纸上盖了印章，“然后贺信的内容被写在纸上，而居民并不知道贺词的内容是什么”。

[2]马克舍耶夫说(《突厥斯坦边区的地理学、民族学和统计学资料》，第35页)，“在塔什干城中一开始有30000多户人家，后来大约有16000户，而现在(1868年)，如同来自那里的人们所描写的，住户差不多比后一个数据减少了一半”。

[3]更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凯列尔(《突厥斯坦》，第1卷，第115-116页，脚注1)所援引的一份也是以切尔尼亚耶夫名义起草的由他在萨法尔月6日(新历7月1日/旧历6月19日)签署的突厥文公告，公告中命令居民要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一切规定，否则要受到通常的惩罚。

哈基姆·霍加的兄长艾伊·霍加(在占领塔什干时他已经70岁了,他弟弟50岁)曾担任塔什干的伊斯兰教艾尔谢赫职务。他是在1862年被胡德亚尔汗委任担任这一职务的,并于次年由赛义德·穆罕默德·苏丹汗发布的汗诰所批准。从第一份公文中可以看出,塔什干的伊斯兰教艾尔谢赫一职是与管理寺院不动产相关的,并且所有的穆泰瓦里都服从于他。关于保留伊斯兰教艾尔谢赫职务的问题以及这一职务与卡迪卡延的关系问题,在土著人的贺信中只字未提,虽然贺信中谈到了寺院不动产是不可侵犯的。也没有关于俄罗斯政府批准伊斯兰教艾尔谢赫任命的文件,只是在艾伊·霍加的曾孙那里保留了一个克雷扎诺夫斯基1865年9月26日用俄文和突厥文签署的关于奖励"突厥斯坦州塔什干伊斯兰教艾尔谢赫"(没说姓名)的证书,其中说由于对俄罗斯政府的忠诚,所以奖给他一个里面镀金的白银糖罐。同时伊斯兰教艾尔谢赫和卡迪卡延的敌人就是俄罗斯政府的敌人。艾伊·霍加和哈基姆·霍加的父亲纳尔·霍加在俄罗斯人到来前几年爆发的人民起义中被杀,这次起义的首领是鲁斯塔姆·伯克·卡扎克巴耶夫,鲁斯塔姆的兄弟萨里赫·伯克·卡扎克巴耶夫是霍加阿赫拉尔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的穆达里斯[1],在与俄罗斯人进行斗争之时他曾集资武装民兵,为此在俄罗斯人占领塔什干之后他被切尔尼亚耶夫流放到西伯利亚。

352

除了切尔尼亚耶夫以外,"塔什干及其城郊地区居民管理局(突厥文本中没有加上强调符号的词)民族参事"(突厥文本中写的是"官员")格鲁兹季也签署了批准对卡迪卡延任命的命令,因此,在城市的民事局中也委派了俄罗斯官员。这可能丝毫也没有降低切尔尼亚耶夫本人的名望,他去巡查土著城市和拜访当地土著富豪其中包括艾伊·霍加和哈基姆·霍加的时候,从不搞一些隆重的欢迎仪式,也不携带警卫。在艾伊·霍加曾孙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这种拜访的时候,他的副官都是按照东方的习俗向人群中洒下一把

[1]即教师。——译者

银币。这最后一个的细节已经为目击者 П. И. 帕希诺的叙述所证实，他说在切尔尼亚耶夫去城里旅行的时候，他的私人副官哈尔杰耶夫总是随身带着钱用于施舍。已经提到的富商赛义德·阿齐姆·巴伊就曾有幸享受过切尔尼亚耶夫的施舍，由于他曾参加下诺夫哥罗德交易会，所以他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对俄罗斯有了很好的了解，后来他成了俄罗斯的世袭荣誉公民。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切尔尼亚耶夫喝的是马奶酒，吃的是马肉香肠。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切尔尼亚耶夫本人在土著人中很受欢迎。当时俄罗斯人和布哈拉埃米尔之间正面临着最后的斗争。许多土著学者，比如说那时生活在奇姆肯特的萨塔尔汗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埃米尔摆脱异教徒的控制。但是对那些已经因为与俄罗斯人亲近而损害了自己名誉的塔什干"享有荣誉的土著人"而言，是不希望埃米尔到来的。1866年，有传闻说埃米尔率领十万军队正靠近锡尔河，与此同时塔什干也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切尔尼亚耶夫要被召回彼得堡，1866 年 3 月 25 日新州长到来并接替了他的职位，次日新州长便到驻扎在奇纳兹的军队中去了，3 月 27 日接管了切尔尼亚耶夫的指挥部。切尔尼亚耶夫返回塔什干并于 31 日离开那里。享有荣誉的土著人请求切尔尼亚耶夫不要离开他们，特别是在面临着埃米尔军队威胁的时候，土著人甚至用波斯语（由此可见，他们的确是按照个人的意愿写的，而不是受了翻译的影响）草拟了一封致沙皇的信请求将切尔尼亚耶夫留下。

353

新州长罗曼诺夫斯基在致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自己"无论是对履行公务和对这里公务人员的看法，还是对整个突厥斯坦州事务的看法"都与切尔尼亚耶夫州长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他在突厥斯坦任职的时间很短（1866 年 3 月来到这里，同年 12 月离开），所以他和其前任之间的分歧还没有来得及在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由于这一原因，罗曼诺夫斯基不可能在土著人的记忆中留下什么印象，虽然在他任上取得了对布哈拉军队作战的最初的决定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清楚地向土著人表明这个敌人对俄罗斯构不成威胁。"一位年过半百的享有荣誉的土著人"在与 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交谈时，将

考夫曼所有的前任——克雷扎诺夫斯基、切尔尼亚耶夫和罗曼诺夫斯基连成一个整体来评论,说他们都是"忠厚善良的人",在他们统治时期土著人仍旧像从前一样生活,不知道俄罗斯法律。因此后来考夫曼自己写道,在他之前俄罗斯人没有对土著人的生活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赋税、法院、警察局和捐税都悉如从前,都是自古就保存下来的。"但是,在罗曼诺夫斯基治理时期,还是采取了一个实质性的新举措:用按阿尔及利亚和高加索方式建立起来的集体机构——梅赫克梅代替了卡迪的个人法庭,只不过由于这一新举措很快被废除所以便被遗忘了。俄罗斯人认为,在阿拉伯人那里曾经有过梅赫克梅,它是"随着文明的传播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但是它遭到了来自穆斯林宗教界的反对,在伊斯兰教最终战胜了文明之后梅赫克梅便被卡迪的个人法庭所取代。关于卡迪与梅赫克梅之间斗争的观点未必能被历史事实所证实,梅赫克梅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进行司法裁决的地方",而不管是否是由大法官卡迪一人作出决定,还是有其他人参加。[1] 罗曼诺夫斯基不信任塔什干的卡迪卡延并认为其行为具有挑衅性,他"采用治标的措施,用指令、训诫"等手段来让卡迪卡延变得更谦虚,使后者"更少干涉居民的管理事务,使他们对州长的态度由傲慢转变为殷勤"。州长希望通过设立一个在进行审判的时候"有民选代表参加,有政府官员出席"的机构来进一步削弱他的权威。打算实行的新举措是通过"有影响的人物"和州长本人的翻译通知土著人的。在谈判开始2个月之后着手新法院的创建工作,新法院隆重的开办典礼是1866年8月中旬在其开始运作大约3周后举行的,当时恰逢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到来之际。7月11日[2] 土著人致信罗曼诺夫斯基,信中对他打算"创办梅赫克梅,受理居民的一切请求并按照我们沙里亚的规定裁决事务"表示感谢。罗曼诺夫斯基把这土著人对他态度的转变解释为是

354

[1]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没有使用过梅赫克梅一词,但是19世纪80年代在佩罗夫斯基县和奥利耶阿塔县人们开始把"比伊用来接受和处理申诉的地方或帐篷"称作梅赫克梅(格罗杰科夫《锡尔河州的吉尔吉斯人和卡拉吉尔吉斯人》,第180页)。

[2]比较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89和90页。附录63和64写的6月5日和11日是错误的,应该是7月5日和11日。

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成就,这大概是公正的:他说在此之前土著人甚至策划了一个阴谋,约定了时间和行动方式。"只是由于塔什干居民事务管理局长"谢罗夫"及时采取了措施",阴谋才未获成功。从罗曼诺夫斯基公布的谢罗夫的情报中可以看出,"行动的方式"不是由土著密谋者约定的,而是埃尔米在信中吩咐的,此信3月9日夜里由密使送来。在一些忠诚人士的帮助下(显然他们是当地的穆斯林)对送信的密使进行了"秘密而灵活的监视,以至于他没来得及把信的内容通知任何人",在凌晨时便被捕了。根据翻译这封埃米尔信件的帕希诺的说法,不管谢罗夫怎样努力,密使都只是声称他应该"把这封信交给居民,而没说究竟是要交给谁"。所以很难说罗曼诺夫斯基所说的似乎宗教界的代表"意识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与布哈拉的接触中声望完全受到了伤害"这番话的根据是什么。[1]

根据草案,梅赫克梅中有1名卡迪和3名顾问,他们应该取代从前的4位卡迪和他们的穆福提。其他3位卡迪虽然没有司法权力,但他们却保留着自己的头衔并且"有时被州长召集起来用于咨询"。其余 355 的城市公职人员:阿克萨卡尔、泽卡奇、列伊斯等都保留不变。3名顾问中有1名高级顾问,2名低级顾问,他们都由"人民"选举产生,这种"人民"的角色是由200名受人尊敬的塔什干人扮演的。这200人被赋予了从自己中间以及从他们非常了解的其他人当中选举顾问的权力。梅赫克梅的主席由俄罗斯人——民事管理局局长来担任。他也是梅赫克梅吉尔吉斯特别部的主席,这个特别部由3位"游牧居民比伊"组成,其中1位是高级比伊,另2位是低级比伊,不设卡迪的常任委员。梅赫克梅的所有成员都有薪水,萨尔特人高级委员的薪水(2400卢布)

[1]可能罗曼诺夫斯基是暗示(《中亚问题札记》,第47页)密谋没有成功"当然不是由于塔什干宗教界的反对",但这种暗示没有多少根据。根据韦谢洛夫斯基教授公布的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Б. 加富罗夫)的叙述(韦谢洛夫斯基《吉尔吉斯人对俄罗斯人在突厥斯坦边区征服活动的叙述》)只能断定,卡迪卡延哈基姆·霍加和伊尚阿布尔·卡西姆成为1865年5月9日(阿利姆库尔溃败)和6月7日(克拉耶夫斯基的进攻遭到失败)期间前往布哈拉请求埃米尔援助的代表团的成员。关于这个代表团在切尔尼亚耶夫6月11日和7月7日的报告中谈到了(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159页和164页),前浩罕的比什凯克要塞司令阿塔伯格也参加了这个代表团。

高于卡迪(1200 卢布),萨尔特人低级委员的薪水是每人 900 卢布,高级比伊的薪水是 500 卢布,低级比伊的薪水是 250 卢布。草案没有指出比伊的选举程序。

按照罗曼诺夫斯基的说法,在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到来并为梅赫克梅举行隆重的建成典礼时(1866 年 8 月),来自突厥斯坦其他地区的客人请求总督"也赐给他们类似梅赫克梅这样的机构"。总督本人向居民们声称,他认为梅赫克梅是罗曼诺夫斯基的功绩,这一功绩"就如同伊尔贾尔胜利一样重要"。然而,梅赫克梅总共只存在了半年时间,也就是说在罗曼诺夫斯基离职之后 2 个月它就终止了自己的活动。[1] 在 А.И. 多布罗斯梅斯罗夫 1911 年撰写塔什干史的时候,在塔什干没有"保留下来任何"关于梅赫克梅的"书面文献资料"。梅赫克梅不仅是一个司法机构,而且它还参与了分摊赋税的工作。根据克雷扎诺夫斯基在 1866 年 8 月提供的资料,梅赫克梅曾力争消除在赋税征收中的所有不正确的做法,因为它"完全意识到依靠穷人来增加富人的财富是不公正的,也是有害的"[2]。

在罗曼诺夫斯基任职期间,在突厥斯坦出现了用面包和食盐迎接上级的俄罗斯习俗。7 月 5 日,罗曼诺夫斯基本人在苦盏就受到了这样的欢迎,8 月 17 日克雷扎诺夫斯基在塔什干也受到了这样的欢迎。并且欢迎克雷扎诺夫斯基时,土著人在贺词中说这是"一种在俄罗斯自古就已经存在的民族习俗"[3](相反按照东方的世界观,盐是人民和军队接受统治者恩惠的象征。反对统治者的起义是"不接受盐的")。在这份贺词中还表达了对建立梅赫克梅以及在梅赫克梅中将"按照我们的宗教原则和民族习惯"来解决问题的感激之情[4],同时还表示希

---

[1]从多布罗斯梅斯罗夫在另一个地方的叙述中(多布罗斯梅斯罗夫《塔什干的过去和现在》,第 500 页)可以看出梅赫克梅存在的时间要长一点。1867 年 7 月,唯一参加梅赫克梅的卡迪去世了,居民不想为他挑选继承人,并请求重新任命 4 位卡迪,但是后来由于当局的坚持他们让步了,挑选出 1 名卡迪,这位卡迪手下配置了 4 位阿格利亚姆。

[2]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 275 页。

[3](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 268 页。——Б. 加富罗夫)

[4]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 268 页。——Б. 加富罗夫

356 望边区能完全归并俄罗斯，这一点已经被完成了。有人在其他场合献上了贺词，胡德亚尔汗的使节除了随身携带着自己汗的信件之外，甚至还随身携带着上面盖着6位显贵印章的浩罕居民的信。

俄罗斯夺取苦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当时乌兹别克汗国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在出版物上曾指出伊尔贾尔胜利之后俄罗斯人向这座城市推进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战争是与布哈拉进行的，而苦盏属于浩罕汗。但是实际上边界并未划定，正如后来胡德亚尔汗本人在致罗曼诺夫斯基的信中所说，在与俄罗斯人进行战争时，布哈拉埃米尔只能从苦盏派出自己的军队并留下一座空城。[1] 在同一封信中还谈道，胡德亚尔汗在这场战争进行时集中了35000人的军队来“保卫自己的边界”[2]，但是如果伊尔贾尔的会战以埃米尔的胜利而结束的话，那么浩罕汗也会派自己的军队反对俄罗斯人。汗没有利用布哈拉军队离开苦盏之际占领这座城市，保卫苦盏的浩罕军队投入战斗并不是根据他的命令，这一点他已经进行了澄清（罗曼诺夫斯基也相信了他）。在苦盏陷落后汗向俄罗斯人的胜利表示了祝贺。总起来说，罗曼诺夫斯基使人相信，1866年胡德亚尔汗针对俄罗斯的所有行动都是友好的，但他列举的事实却具有相反的性质——当然这些事都是以汗的名义行动的那些人干的。以威胁的手段要求普斯肯特居民向汗缴纳泽卡特[3]，禁止他们“带着自己的国籍到俄罗斯人那里去”。更具有典型性的是，来自沙赫里夏勃兹的人在1866年秋请求俄罗斯继续进攻布哈拉并答应给他们以援助，但是1868年沙赫里夏勃兹人利用俄罗斯进军布哈拉的时机袭击了被俄罗斯人占领的撒马尔罕。根据斯凯列尔的说法[4]，1868年朱拉伯克和巴巴伯克向考夫曼提议结成反对埃米尔的同盟，但是当考夫曼派撒马尔罕卡迪凯末尔·阿德金到他们那里要求他们去撒马尔罕的

[1]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256页。——Б.加富罗夫

[2]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256页。——Б.加富罗夫

[3]即天课。——译者

[4]《突厥斯坦》，第1卷，第244页。

时候,他们却转向了埃米尔一边。或许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要求。[1] 卡迪本人在自己的札记中叙述了这次旅行的经历,但他没有谈到交给他的使命。

罗曼诺夫斯基最具有代表性的行动,就是竭力削弱布哈拉埃米尔和穆斯林宗教界的影响(在罗曼诺夫斯基和考夫曼任职期间,俄罗斯人使用自古以来在与中亚统治者交往中所使用的"阁下"的称号来称呼埃米尔,但是切尔尼亚耶夫称埃米尔为"殿下",不过在突厥语译文中,可能都是同一个术语)。后来这些行动为考夫曼所模仿。在其他方面,罗曼诺夫斯基时期实行的仍然是与切尔尼亚耶夫时期一样的"军民管理"规则,这些规则是根据 1865 年 8 月 6 日关于成立突厥斯坦州的法令制定的。虽然罗曼诺夫斯基在任期间,平稳而有序地实现了"由优惠税向赋税"的转变,罗曼诺夫斯基也赋予这一事实以重大的意义,但是赋税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接受任命之前,罗曼诺夫斯基曾与克雷扎诺夫斯基一起到过突厥斯坦,用他本人的话来讲,关于如何治理穆斯林国家的问题,他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观点。1867 年,他在彼得堡和克雷扎诺夫斯基、切尔尼亚耶夫一起参加了讨论关于突厥斯坦边区治理草案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重要的决议(除了克雷扎诺夫斯基以外,全票通过)[2] 是通过了关于组建一个独立于奥伦堡的专门突厥斯坦总督区的决议,该总督区是根据 1867 年 7 月 11 日最高命令成立的。在这之前的几个月,4 月 14 日,罗曼诺夫斯基发布了"致突厥斯坦州军队的命令",其中通告说他已经留任州长职务。7 月 14 日,考夫曼被任命为突厥斯坦总督,在此之前他只是因曾在高加索军队服役 13 年(1843—1856 年)而对东方

[1] 从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 1 卷,第 423 页)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沙赫里夏勃兹人还在考夫曼占领撒马尔罕之前,也就是在凯末尔·阿德金被派去他们那里之前就已经威胁了撒马尔罕。

[2] 根据斯凯列尔的观点(《突厥斯坦》,第 2 卷,第 204 页),后来的生活表明,克雷扎诺夫斯基是正确的,他认为不应该在一个被荒漠与俄罗斯其他地方隔开的地区设立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这破坏了吉尔吉斯草原管理机构的统一。

有一些了解[1]，而且除了一度管理过（1865—1866年）西北边区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行政工作经验，但是考夫曼却成功地成为一名“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据悉他身后无论在俄罗斯人中还是在土著人中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考夫曼1867年秋天首先来到奥伦堡，他在这里和克雷扎诺夫斯基一起与布哈拉签署了和平条约，他没有沿着通常的路线从奥伦堡前往锡尔河口，而是从奥伦堡向东走，经七河流域进入托付给他的总督区地界。谢尔吉奥波利斯基哥萨克分队指挥员是第一个迎接这位总督的人。考夫曼进入塔什干的隆重入城仪式在11月7日举行，这种氛围土著人还从来没有见到过。100名手持出鞘马刀的哥萨克随护着将军。358 根据卡迪毛希丁的说法，他把自己的印象转告给了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居民们被这种豪华的场面震动了。他们说：“这就是真正斡鲁思到来的时刻。”在其他场合考夫曼也用这种外在的光环来装点自己的权力。在接见使者等人的时候，他特别把那本所谓的“金书”摆在明面上，“金书”是一件用金子撰写的华丽公文，在金色的锦缎封面上有亚历山大二世授予总督全权的题词。考夫曼在土著人的眼中俨然成了“半个沙皇”（亚雷姆-帕德沙）。

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认为：“不能因为讲究采取这种隆重的外在形式就谴责故人，这种隆重的外在形式在俄罗斯治理突厥斯坦的最初时期是必要的。”但是我还是听到了一些议论，说土著人更喜欢崇尚简朴、平易近人的切尔尼亚耶夫。他们把100名哥萨克看做是护卫队，认为这是对居民的不信任。权力的外在光环并没有妨碍土著人对主要长官不成功的活动作出苛刻的评价。早在1878年2月，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就从自己的萨尔特同事那里听说了通古兹渠（“猪渠”）的名称，这是土著人给考夫曼在饥饿草原上所建造的失败的运河所起的名字。[2] 要证明在安集延起义后杜霍夫斯科伊任总督时期（1898—1900

---

〔1〕考夫曼在那里学会说一些突厥语（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77页。）

〔2〕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40页。。——Б. 加富罗夫

年)一度恢复这种奢华的场面也是必要的,则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在杜霍夫斯科伊巡视费尔干纳的时候,土著人被迫成群地跪在总督车队经过之地表示欢迎。

罗曼诺夫斯基离开突厥斯坦的时候坚信他所委任的俄罗斯长官和公务人员都会恪尽职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有被委任到"民事管理岗位上"的土著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政府赐予的权力不应成为发财手段"的思想。[1] 但另一方面考夫曼的传记作者后来在描述1867年突厥斯坦的状况时却写道:"营私舞弊现象大量存在,当地居民对俄罗斯行政机构普遍不信任和仇视,这就是当时突厥斯坦的情况。"[2]考夫曼11月7日接受土著人面包和盐的时候,曾保证一旦他从旅途的劳累中安顿下来,马上就邀请他们到自己这里来与他们攀谈。但是年底他必须巡察军队,所以到了1868年1月考夫曼才招呼土著人到自己这里来,并对他们发表了一个施政演说。在施政演说中他宣布,土著人将享有自己选举阿雷克-阿克萨卡尔、阿克萨卡尔和卡迪的权力,这些人任期3年,任期满后全体人员都可以改选,改选事宜由总督决定。只有征得诉讼双方的同意,才能将案件提交俄罗斯法庭审理。居民应该自己决定当选的行政机构人员的薪水。居民或者能决定法官的薪水,或者能够按常规从当事人(卡迪雷克)那里抽取报酬付给法官。在汗时代起就征收的赋税中只收取3种:哈拉志(地亩捐),税额为收成的1/10;塔纳普(花园、菜园、瓜园税,以及三叶草和棉花种植税);泽卡特(买卖税,税额为周转资金的1/40)。赋税的征收工作委托给了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公民所组成的"经济管理局。

为了将所有这些承诺付诸实施成立了一个由14名官员和40名土著人参加的筹备委员会,又由他们构成了4个委员会分会赴各地展开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基础是总督的施政演说,这份演说同样也是以1867年彼得堡制订的管理突厥斯坦草案为依据的,草案不具法律效

[1]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103页。——Б.加富罗夫

[2]谢苗诺夫《突厥斯坦边区的征服者和筹建者侍从将军冯·考夫曼》,第10页。——Б.加富罗夫

力，为了不限制总督的权力，如果地方条件需要，总督有权"根据草案酌量"处理，也可以背离草案的规定。但是土著人提出的关于在拟定实行的新举措中有某些内容"不符合他们源远流长的历史所形成的神圣生活制度和沙里亚"的所有意见，都因违反了施政演说中的指示而遭到否定，背离施政演说是不可能的。不言而喻，萨尔特人如同委员会分会中的俄罗斯委员所证明的那样，"对委托给他们的事务根本漠不关心"。无论是考夫曼，还是他的继任者都没能成功地创建一个得到土著人自身高度评价的民事管理局，也没有创建一套只满足于国家发给的薪金、不追求苛捐杂税和公债的俄罗斯行政机构。

俄罗斯政权和广大突厥居民之间的障碍仍然是"受人尊敬的土著人"阶层。在俄罗斯统治时期氏族贵族和服务贵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影响，但是教育贵族和金融贵族却完全保留着自己的地位。从罗曼诺夫斯基和考夫曼开始，俄罗斯政府的代表就对支持毛拉的代表毫无兴趣。当考夫曼携以Г. А. 科尔帕科夫斯基为首的俄罗斯行政机构官员来到韦尔内时，鞑靼毛拉请求接见，考夫曼告诉科尔帕科夫斯基说，他不能同时接见国家公务人员和毛拉，只能单独接见毛拉和鞑靼代表团。当萨塔尔汗脱掉俄罗斯官员的制服换上卡迪的长袍时，俄罗斯行政机构的代表也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像对待非国家公职人员一样对待他。

考夫曼时期撤销了卡迪卡延这一职务，但这种改革是逐渐进行的，这部分是因为卡迪卡延自身没有表现出任何"穆斯林的宗教狂热情绪"，所以使俄罗斯当局找不到反对他们的借口。塔什干卡迪卡延哈基姆·霍加甚至能够博得考夫曼的好感，至少哈基姆·霍加的儿子，卡迪毛希丁（正确的写法是 Мухьи-д-дин）说，考夫曼曾当着他的面对阿布拉莫夫将军谈起过哈基姆·霍加，他说："这是一个卓越的人，这个人除了上帝以外，谁都不怕。"哈基姆·霍加在 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来到塔什干前也就是在 1877 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毛希丁[1]

[1]斯凯列尔在 1873 年谈论过卡迪和前卡迪卡延的儿子毛希丁（他错误地写成了 Mukaned-din）（斯凯列尔《突厥斯坦》，第 1 卷，第 166 页）。

只是担任了塔什干一个区(锡卜扎尔斯卡娅区)的卡迪职务,还在考夫曼时期他已经被推举担任这一职务并且常常连任,只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1902 年)选举结果才对他不利。毛希丁·霍加赢得了俄罗斯当局的好感。在提到一些表示忠君的贺信和来访的代表团时经常提到他的名字。他的次子和三子在俄罗斯土著学校学习,其中次子马赫穆德汗甚至在中学学习,但是没有毕业。总督 H. A. 伊万诺夫向毛希丁表达了对他父亲去世的"惋惜之情,并希望他们也能像他父亲一样既受到本民族人民的尊敬,也受到俄罗斯人民的尊敬"。

可能,随着毛希丁的辞世他的家族也丧失了自己的地位,毛希丁"留下了一个没有安顿好的大家庭,家里的经营活动也无人过问",他的儿子们"还没有做好独立从事经济活动的准备"。马赫穆德汗学习过俄罗斯中学的课程,之后可能在家里研究伊斯兰教知识,所以"他在俄罗斯学术界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也没有获得专业的伊斯兰教知识"。但是在 1915 年庆祝占领塔什干 50 周年之际,马赫穆德汗依然成为锡卜扎尔斯卡亚区的卡迪。由此可见,虽然卡迪一职的更换实行的是选举制度,但是在俄罗斯人统治时期依然承认这一职务的世袭权利,并且对世袭权利的认可有时还决定着选举的结果,当然,也不总是这样。马尔格兰的卡迪贾恩·霍加给我看了一份各个不同时期的统治者颁发给他祖先的卡迪委任状,并抱怨说在俄罗斯人来了之后这种状况改变了。

哈基姆·霍加和他的后裔并非是唯一高度忠实于俄罗斯政府的卡迪的典范,他们为了迎合俄罗斯人甚至放弃了穆斯林在教育方面的独特性。撒马尔罕卡迪卡凯末尔·阿德金在攻克撒马尔罕的时候收到了考夫曼奖给的一枚银质奖章,他拒绝把它戴在外面,而是将它揣在怀里,开始时他被批准担任自己的职务,但过了几年之后,他的职务被废黜了。在写给俄罗斯当局的申诉书中[1],他强调了自己对俄罗斯政府的贡献,提醒说他教会了自己的儿子们说俄语。在伊宁边区尤其严格

[1]斯凯列尔(《突厥斯坦》,第 1 卷,第 242 页)提到了卡迪卡延凯末尔·阿德金没有公开发表的札记。手稿现保存于科学院亚洲博物馆。

地遵循着避免一切能够引起类似“支持、保护伊斯兰教知识和关注”穆斯林宗教界代表的原则，由于存在着将边区归还中国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甚至认为应该维护中国的宗教信仰和中国的文字，并使之恢复穆斯林起义之前的状态。但是即使如此，1873 年在穆斯林宗教界的促进下还是成立了俄中塔兰赤学校，而且穆斯林宗教界还使“家庭中的父亲们相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宗教界的首脑卡迪卡延的有利影响”。1876 年，考夫曼在决定惩罚因对斯科别列夫不够尊敬而被其逮捕的浩罕伊斯兰教艾尔谢赫和卡迪卡延时，并非没有产生过动摇，他当时致电科尔帕科夫斯基说：“完全排除他们的影响，不委派任何人担任他们的职务，这样好吗？”当时的局势使他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伊斯兰教艾尔谢赫和卡迪卡延已经被放逐到沃洛格达省，而且他们还没有继承人。在 1866 年包围苦盏期间，当地的卡迪卡延是“主和派”代表，但是占上风的却是“主战派”代表，他是当地的一位富商阿克萨卡尔霍加·埃明。[1]

361

如同与宗教界的斗争一样，与金融贵族的斗争也没有成为俄罗斯政府的纲领，但是实际上富商的支持有时甚至并不符合俄罗斯首脑的意愿。赛义德·阿齐姆·巴伊像我们所看到的，被认为是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事业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尤其如此。而考夫曼仍然在 1877 年 1 月底对 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说：“土著人现在已经做好了学习的准备，但赛义德·阿齐姆·巴伊对此进行了干涉，对这个人要非常小心，因为他四处插手什么都想说了算。”[2] 考夫曼甚至认为在毛希丁与受到州长助理艾勒支持的赛义德·阿齐姆·巴伊的冲突中应该站在卡迪毛希丁一方。赛义德·阿齐姆·巴伊 1866 年当选为梅赫克梅的高级顾问，但是后来“因为煽动人民起来反对 В. Р. 谢罗夫的民事管理局”而被解职。他的继承人伊斯哈克·巴伊也

[1] 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 218 页以下。

[2] 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 321 页。——Б. 加富罗夫

"因为越权和受贿"而被解职。[1] 无论俄罗斯行政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动，赛义德·阿齐姆·巴伊以及他之后他的儿子赛义德·加尼和赛义德·卡里姆，他的女婿阿里夫·霍加，都保持了自己的地位。赛义德·加尼在1906年自荐为国家杜马的候选人，并获得了多数票。赛义德·加尼两次被选入城市杜马，他的兄弟赛义德·卡里姆在1910年已经是第七次公开当选。

362

费尔干纳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在生产者和需求者之间创造了一个新兴的中间商阶级。像突厥斯坦其他地区一样，在种棉业发展之前费尔干纳的主要高利贷者是来自印度的移民，他们放出小额贷款，收取高达20周25%的利息（每16个坚加收取4坚加利息，20周偿清每周利息1坚加）。萨尔特高利贷者收取的利息要稍微低一些（借款4梯拉1年收取5梯拉，5梯拉1年收取6梯拉，也就是年利率为25%或20%）。除此之外，他们还从事谷物生意，有时甚至在城市里提供典当服务。所有这些都是由个人进行的，还没有产生金融机构的需要。[2] 从19世纪90年开始，随着棉花种植业的发展，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与从前那种陈腐简单的经济生活彻底断绝关系还是在20世纪。在1901年的官方概览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说"因为在州内现存的几乎全都是小土地所有制，并且土地是在大量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所以棉花种植业的收益在居民中的分配是相当平均的"[3]。与这种官方论断不同的是，在1901年盖尔出版的书中却谈到"居民暂时并不认为棉花种植业给*他们自身*带来了特别的好处（斜体字是原著中加的）"[4]。在19世纪90年代居民就已经开始负债了，只是1899年棉花的丰收"帮助居民多少还清了一些急债"。在1903年的概览中利益分配不均的事实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证实：富起来的不是农业人口，而是土著人中的高利贷者和采购棉花的中间商。居民每年的债务"仅据官方统计"就达到了

---

[1]多布罗斯梅斯罗夫《塔什干的过去和现在》，第500页。斯凯列尔也谈到了赛义德·阿齐姆·巴伊的狡猾行为以及土著人对他的仇视（《突厥斯坦》，第1卷，第98页以下）。

[2]纳利夫金、纳利夫金娜《费尔干纳定居土著居民妇女生活习俗概论》，第38页。

[3]《费尔干纳年鉴》，第1卷，1902年，第11页。——Б. 加富罗夫

[4]盖尔《突厥斯坦指南》，第235页。——Б. 加富罗夫

1300万卢布，"收取的不公开"利息"全年达100到200万卢布，因此承认成立一个官方的低廉畅通的信贷机构是必要的，已经就此提交了相应的报告"[1]。这些话后来被遗忘了，只是在1911年的概览中又援引了1905年概览中的话，说"小额贷款的问题早已成为迫切的问题，这一问题急需解决"[2]。截至1911年，缺乏小额贷款已经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州的生活，出现了这样一些事实，比如说"因为债务而卖掉土地，土地集中在更富有的人手中，形成了失去土地的无产阶级"，总起来说

363 "土著居民的经济生活已经陷入深度混乱之中"[3]。这些事实(由于美国棉花的普及和工业的发展经济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由此在土著人中产生了丧失土地的无产阶级)[4]在1910年的概览中就已经作为犯罪率提高的原因之一被提了出来。在《费尔干纳州概览》中没有引用说明这种现象的数字。纳利夫金所指出的费尔干纳农民大部分都耕种别人土地这一事实可能早在俄罗斯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土地的减少是与城市生活的发展有关的，在离城市最近的基什拉克中，居民大部分只拥有庄园地，距离城市越远，拥有耕种份地的房主的比例越高，但是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在其中根本没有无土地者的基什拉克，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失土地的人的总数无疑在增加"[5]。而我们所理解的大地产也不存在，个人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在100平方沙绳和200至250俄亩之间变化，超过200俄亩的地段是少有的。在纳曼干县有一户占地达到1000俄亩的人家，但是每年只耕种其中的1/5。地主与工人(对分制佃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传统的，收割者来自很远的地方，工作结束后就离开，不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夏末或者秋初他们回来领工钱，但是在纳利夫金在基什拉克度过的将近6年中，没有发生过一起欺

---

[1]《费尔干纳年鉴》，第3卷，1904年，第18页。——Б.加富罗夫

[2]《费尔干纳州统计概览》，1911年，第45页(引自《费尔干纳州统计概览》，1905年，第50页)。——Б.加富罗夫

[3]《费尔干纳州统计概览》，1911年，第45页。——Б.加富罗夫

[4]Г.波克罗夫斯基《费尔干纳州居民犯罪率》，第159页。——Б.加富罗夫

[5]根据1899年《费尔干纳州概览》(第106页)，在总数为135万的农村人口中仍有110万人拥有土地。1909年在沙里汗乡90个典当自己土地的人中，有50人完全或部分失去了土地。

诈现象。

不能指望高利贷者和中间商也有这样的良知。棉花种植业的发展把俄罗斯资本家引到了费尔干纳,这些资本家主要是来自莫斯科和罗兹,但是俄罗斯资本家很少能够成功地绕开中间商而直接与土著工人打交道,就像俄罗斯政府不能与土著居民群众直接打交道一样。只是在最初几年,棉花被卖给了莫斯科和罗兹厂商的办事处,后来当地贸易商行取代了它们的地位。在种植棉花有利可图的影响下,俄罗斯人曾经试图创建俄罗斯大地产,但却遭到了失败,当时产生的大部分农户都停止了自己的事业,用马萨利斯基的话说:"现在(1910 年以后),在整个州大概也没有 20 户成功地经营了自己事业的俄罗斯人家。"[1] 轧棉厂的迅速出现说明了大工业的产生,在 1880 年轧棉厂只有 2 家,1890 年有 21 家,1900 年有 93 家,到了 1911 年达到 160 家。1900 年以后轧棉厂数量的增加并不是由棉花种植区域的扩大而引起的,早在 1900 年前这种扩大已经达到了极限,并从那时起开始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变动,种植棉花的土地数量时而减少时而扩大。1908 年的概览如同 1900 年的概览一样,谈到大约有 1/3 的灌溉土地用于种植棉花,主要依靠从撒马尔罕州的进口来满足对棉花的需求。种植美国棉花的土地数量差不多也是一样的(1900 年为 174026 俄亩,1908 年为 177954 俄亩),同时工厂的数量由 93 家增加到 142 家,也就是增加了 50%。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工厂才能直接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购买棉花。还在 1898 年的概览中就已经指出存在着中间商,棉花收购"是通过土著人在市场上或者在工厂里"进行的,各种公司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小商人阶层,公司要在棉花采摘之前就向他们支付定金"[2],中间商挨村向土地所有者分发定金,按照未来的市场价与他们就棉花的价格进行讨价还价。土地所有者收取了定金之后,由于期待着涨价或者由于棉花遭受了风灾、沙尘灾和雨灾,有时也没有采摘已经成熟的棉花。根据盖尔的说法,这

364

[1]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 420 页。——Б. 加富罗夫

[2]《费尔干纳州概览》,1898 年,第 45 页。——Б. 加富罗夫

些中间商被称为贾利亚布(贩卖奴隶者),在官方的概览中没有这个术语。在纳曼干县中间商被称作奇斯塔奇或阿尔巴克什(马车夫)。[1]他们就如同1911年概览中所说的,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年定金的8%。[2] 有时在他们和居民之间还存在着更小的代理人。奇斯塔奇明显的不诚实行为有时还表现在,他们从土地所有者手中收购棉花的价格要高于卖给公司的价格,余下的差额由称重时缺斤少两来弥补,居民不得不容忍这种行为。奇斯塔奇中的一些人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并成功地和创造了他们的公司展开了竞争。公司则有期票做自己的保障,此外它们还承办土著人的契据——瓦锡卡(不动产抵押契约),可能期票和契约都进入金融市场,并且从同一种人那里要收取两种契据的费用,也就是加倍收费。除棉花以外,某些其他的产品,如茧和干杏也由公司和工厂收购,不进入集市进行交易。除了受奇斯塔奇的奴役之外,居民有时还受其他高利贷者的盘剥,尤其是在棉花收成不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与谷物的收成相比,棉花的收成由于受气象情况的影响更缺少保障)。最贫穷的阶级会求助于最坏的高利贷者——印度人,他们收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息。萨尔特富农和巴伊提供的借款利率要低一些,甚至不高于纳利夫金时代的利率,基什拉克小商人会向他们申请借款。无论是当时还是30年后的1911年,巴伊都收取"20%或更多一些的利息"[3]。这样一来,因欠债而出售土地的现象并不能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土地从一些人手中转到另一些人手中,但并没有形成有利于大地产集中到一些人手中的有利条件。在1910年前,突厥斯坦包括费尔干纳如同俄罗斯征服时代一样,依然是"典型的小土地所有制的地区"。在其余地区居民受巴伊的奴役当然也对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沉重的影响。从1889年开始运营的贷款银行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益处,1907年开办了第一家浩罕信

365

[1]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突出的是阿尔巴克什这一术语所具有的狭义的独特的地方意义,这种意义在研究该问题时期的纳曼干县具有典型性。在中亚阿尔巴克什这个词从总体上说一般用来表示通常的意义——"马车夫"、"运输工"。——B.罗莫金

[2]《费尔干纳州统计概览》,1911年,第65页。——Б.加富罗夫

[3]扬科夫斯基《纳曼干县贸易概论》,第66页。——Б.加富罗夫

贷社，但只有到了1911年才开始“根据1904年6月7日的法令加紧发展费尔干纳州的信贷机构网络”。[1] 到1912年1月1日，已经有了6家信贷社，1913年初在整个突厥斯坦有各种类型的信贷机构265家。

俄罗斯的征服对军人阶层和官宦阶层而言后果是最为不利的。在征服的最初几年曾打算创办吉尔吉斯[2]警察局，但这个警察局就像后来的土库曼警察局一样没有成功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俄罗斯军队的大门也并没有对土著伯克关闭，但是只有少数人进入俄罗斯军中，如朱拉伯克和巴巴伯克。也有个别任命土著人担任俄罗斯文职官员的情况。浩罕大使米尔扎[3]哈基姆在1869年被奖给一枚安娜二级镶钻石勋章，并获准入宫觐见，后来他得到乌米多夫的姓氏，成为四等文官。1868年土著人奥马尔·梅尔吉马诺夫担任了库拉明县（塔什干县）县长的低级助理，1878年因参与不法土地交易而被交付法院，并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但是旧时代的另一位官员米尔扎艾哈迈德的命运更具代表性，他曾经（1853—1858年）治理塔什干，因自己的残暴统治而引起了吉尔吉斯人[4]的起义，但他认为自己在恢复现在的奥利耶阿塔县的灌溉工程和文明方面功勋卓著，所以期待着突厥斯坦的新统治者承认他的功勋并予以褒奖，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他的自传是1895年应韦谢洛夫斯基教授之请由2个人根据他的口述完成的（他本人不识字）。他在自己自传的最后写上了这样几句话：“现在我已经66岁了，我有8个儿子和1个女儿。大儿子26岁，女儿只有1岁。家里人口很多，我的生活非常贫寒，因为年事已高我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孩子们也没有养成劳动的习惯。”这样一来，米尔扎艾哈迈德和他的孩子们没能适应新的情况，他的小儿子乌尔加克在浩罕从事棉花贸易。

俄罗斯人解决土地问题、税务问题以及部分与此相关的当地行政机构问题的方式对于从前的服务贵族而言也是不利的。考夫曼的施政

[1]扬科夫斯基《纳曼干县贸易概论》，第47页。——Б. 加富罗夫

[2]哈萨克。——Б. 加富罗夫

[3]即亲王。——译者

[4]哈萨克人。——Б. 加富罗夫

演说是建立在上面提到的关于突厥斯坦管理条例草案基础之上的,该草案是1867年由"草原委员会"(1865年被派到突厥斯坦)根据当地行政机构和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的方案拟定的。多布罗斯梅斯罗夫认为A.K.海因斯是该条例的主要草拟人,他在此之前曾写过一部研究著作《浩罕统治时期的塔什干》,所以他比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更了解突厥斯坦。在考夫曼被委任为总督的当日,A.K.海因斯也被委任为他的办公室主任,他必须要把条例草案以及施政演说中规定的原则付诸实施。根据海因斯的说法,在浩罕统治时代塔什干四区中的每一个区的首脑都是一个由居民选举经伯克批准的千夫长(敏巴希)。个别街区(马哈利亚)的首领是由千夫长任命的百夫长(尤兹巴希),百夫长也被称为图瓦奇(根据俄罗斯正字法是托沃奇 товочи 或托夫戈奇 товгочи,原始形式是图加奇 тугачи)。在中世纪,在蒙古统治时期和帖木儿统治时期,这是最高级别的军官,后来旗手和军事通信员也被称为托沃奇。城市里警察局的首脑是库尔巴希,库尔巴希手下有44个米尔沙布,每10个米尔沙布设1个首领,共有4个首领,他们被称作百夫长(尤兹巴希)。司法权掌握在4个由汗或者伯克任命的卡迪手中。在条例草案(第76节)关于"土著警察权和守备队"的规定中并没有将他们的权力列举出来,只是说他们要听从"市长的指挥"。库尔巴希一职(在1865年塔什干人的贺信中就已经提到这一职务)在草案中没有被提及。从总体上看,俄罗斯人从前在吉尔吉斯人[1]那里所采用的自治术语对草案的术语产生了影响。在吉尔吉斯[2]草原所推行的制度与在突厥斯坦所推行的制度相同,原因在于1868年10月21日批准的"乌拉尔州、图尔盖州、阿克摩林斯克州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州临时管理条例"就是由拟定1867年条例草案的草原委员会拟定的。城市个别区(确定这种区或街区数量的权力在军督,但实际上依然保留了从前把塔什干划分为4个区的传统)的敏巴希被"阿克萨卡尔"所代替,并且阿克萨卡尔

367

[1]哈萨克人。——Б.加富罗夫

[2]哈萨克。——Б.加富罗夫

可能拥有"相当于吉尔吉斯乡长的权力"(阿克萨卡尔,波斯语中写作拉希谢菲德 риш-и сефид——"白胡子"之意,在突厥斯坦自古就存在,但实际上指的是那些并没有明确法律权力只是因为年长、富有、从前有过功勋而受到尊重的人)。塔什干的阿克萨卡尔由选举产生,任期3年,实行的是两级选举制,选举由城里有选举权的房主来完成,根据州长的决定,一定数量的家庭即每10至50户家庭推举1位有选举权的代表。就像1867年暂行条例中的规定一样,50这个数字是由委员会确定的,因此有选举权的代表被称为"五十人会"(伊利克-巴希),这些伊利克-巴希选举卡迪并分配各个地段应纳的赋税。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居民对建立这一机构完全是漠不关心的,在进行普查的时候,"不仅某些房主被隐藏不报,而且整条街道都被隐藏起来不予上报"[1]。但是1868年所确定的适用于任何土著公职人员选拔的基本原则(任期3年,每50个房主有1名选民)为1886年的条例所批准,这些基本原则在革命前一直都在实行。1886年的条例只是采用了俄罗斯术语,并且把"阿克萨卡尔"与括号中的"班长"一词并列起来,定居居民的"卡迪"和游牧居民的"比伊"被"人民法官"的术语所取代。

然而俄罗斯政府很快便放弃了1868年所建立的赋税体系。起初曾经打算保留哈拉志、塔纳普和泽卡特,这些赋税在海因斯草拟的条例中被称为是汗时代的3种(合法)赋税,它们与数额不定的任意妄为的"汗的横征暴敛"是不同的。[2] 还在1869年就决定要用一种土地税代替哈拉志和塔纳普,当年在塔什干和锡尔河州已经开始实行新的税收政策。海因斯在这一年离开了塔什干,他的职务由另一个对此事没有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戈姆津)来接任,但是他的离去未必与考夫曼的新政有关。考夫曼和海因斯之间的分歧与"采取的强硬措施"有关,但强硬措施的拥护者不是考夫曼,而是海因斯。根据捷连季耶夫的著

---

[1]多布罗斯梅斯罗夫《塔什干的过去和现在》,第98页。——Б.加富罗夫

[2]海因斯《浩罕统治时期塔什干的管理(兼评中亚城市的行政管理特点)》,第480页以下,第491页。——Б.加富罗夫

作[1],考夫曼的决定是由土著收税官——谢尔克尔和阿姆利亚克达尔的舞弊行为所引起的。在汗统治时代,塔什干由伯克任命的谢尔克尔(谢尔卡尔,全城有1个)负责征收赋税,他手下有24名米拉布,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关于应收税款数量的资料。敏巴希及其下属图甘奇负责监督赋税的征收。可能阿姆利亚克达尔是农村的赋税征收人。在布哈拉汗国阿姆利亚克达尔斯特沃是州下面的一级行政单位,俄罗斯人把伯克等同于州长,把阿姆利亚克达尔等同于县长。但同时没有注意到盖尔查明的一个事实,这就是阿姆利亚克达尔没有行政权力,只是负责确定收成的数量核定税收的额度。在俄罗斯的行政术语中谢尔克尔和阿姆利亚克达尔这些词并没有使用很久,米拉布只被赋予其最初的监督水利工程的义务(мир-аб——水利官),也就是监督灌溉渠,他服从阿雷克-阿克萨卡尔以及图甘奇(从图甘"水坝"一词而来)的领导:根据1887年《突厥斯坦边区临时灌溉规则》,水利专家是塔什干和库拉明县水利灌溉的负责人,他手下有35位阿雷克-阿克萨卡尔(塔什干5名,30个乡每个乡1名),3名图甘奇(2名在塔什干,1名在县里)和59名米拉布。在水利灌溉事务被移交给城市杜马掌管之后(1887年),图甘奇和米拉布被保留了下来。征收统一土地税的事宜委托给了经济管理局。在任期的第一个3年从每个区中选拔5人进入塔什干经济管理局,以后每个区选拔3人。赋税是通过伊利克-巴希来进行分配的,并且位于灌溉渠沿线的某些地段的阿明(字面意思是"代理人")还是他们和纳税人之间的中间人。在县里几个乡设立一个经济管理局,1877年乡一级的经济管理局被撤销,它们的职责被移交给州管理局和县管理局。1886年的条例使用了"国家土地税"(税额为平均总收入的1/10)这一术语,并且规定了更加复杂的计算税额、分摊税款和征收税款的方法,委托塔什干税务局来领导所有这些事务。

考夫曼的土地问题措施以1886年条例的形式获得了立法批准,这些措施急剧地断绝了与当地传统之间的联系,用捷连季耶夫的话

[1]《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324页。——Б.加富罗夫

来说，就是打击了“敌视我们的土地贵族”。在汗国如同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一样，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不必缴纳私人领地税的制度（米尔基胡里哈里斯 мильк-и хурр-и халис，经常缩写为米尔科 мильк），这种私人领地是因服兵役而由国王奖给的。俄罗斯研究者把米尔科的土地与阿姆利亚克的土地对立起来，虽然第二个词只是第一个词的复数形式：这个词的单数表示的是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复数表示的是一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即表示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国家财产但却由耕种它的土地所有者无限期继承使用的土地，土地所有者有权出售自己的土地（有时这种权利要受到有利于邻居的某种限制），也就是说实际上这种土地是土地所有者的私有财产。米尔科的主人属于服务贵族，这个阶层比其他阶层更深受考夫曼命令之苦，直到在立法程序中解决问题以前，从米尔科土地上征收的赋税是与阿姆利亚克一样的。1875年，在泽拉夫善地区生活过的一位俄罗斯研究者带着几分诧异地指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土地所有者非常平静地接受了新措施，这可能是因为在实行新措施的同时从总体上降低了所有的土地税。1873 年制定的土地法中就包含了取消米尔科的内容，但由于 3 位大臣的反对，当时这一土地法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它的个别条款部分地被总督的命令所采用，这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如 1873 年泽拉夫善地区被彻底归并到俄国，远征希瓦也是在这一年，此后阿姆河以东希瓦汗国的部分地区也转归俄国，1876 年消灭了浩罕汗国。根据捷连季耶夫的说法[1]，1873 年方案所提出的土地体制“除了费尔干纳以外，在哪里都未被采用”（费尔干纳是在 1876 年实行的），但是从什卡普斯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该条例在费尔干纳实施之前，已经在阿姆河军事区被采用，对此一些有关该草案本身的资料已经叙及。在大土地所有者中只有马特 · 尼亚兹的权利获得了考夫曼的批准，根据什卡普斯基的说法，他的领地由 3095 塔纳普也就是 1160.625 俄亩土地构成，而捷连季耶夫说他的领地由 1210 俄亩土地构成。捷连季耶夫认为马特 · 尼亚兹

[1]《征服中亚史》，第 3 卷，第 323 页。

是“因为 1873 年为俄罗斯政府效力”而获得了这片土地。什卡普斯基则认为马特·尼亚兹之所以获得这片土地是“对剥夺他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城堡垒附近土地的一种补偿”[1]。马特·尼亚兹的土地大部分由亚雷姆奇即佃农来耕种，他们可以获取收成的一半作为劳动的报酬。1877 年，在阿姆河军事区工作的筹备委员会巩固了亚雷姆奇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只承认马特·尼亚兹本人对132塔纳普（大约 370 50 俄亩）土地的所有权，这些“是他直接使用的土地”，马特·尼亚兹对其他土地所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被拒绝了。也没有给浩罕汗的家族和费尔干纳的浩罕达官显贵留下任何土地。这里的筹备和测量工作是在 1876—1881 年间进行的。纳利夫金就已经指出，在费尔干纳除了已经没有任何社会影响的汗家族的直系后裔之外，既没有贵族，也没有什么特权阶层。霍加、先知和 4 位虔诚哈里发的后裔也都失去了他们在汗统治时代所享有的税收优惠权。1899 年，胡德亚尔汗的 2 个儿子和 2 个孙子及其子女晋升为俄罗斯世袭贵族，但是他们在突厥斯坦可能没有大地产。

对待所谓的寺院不动产（其实应写为 вакфными）特别是泽拉夫善地区和阿姆河军事区的寺院不动产，俄罗斯当局的态度也几乎是非常坚决的。在阿姆河军事区可能从寺院不动产的总收入中拨出“部分补助金用于维护在人民中最享有威望的清真寺和圣陵”。什卡普斯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说：“这样的补贴金是必要的，但却没有，因为它们没有被拨出来。”[2]正如捷连季耶夫所指出的[3]，在这些情况下，考夫曼的行动“不仅没有引起任何灾难性的后果，而且甚至连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人民依然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些现实。但是后来在 1898 年安集延起义的时候却责难俄罗斯人取消了寺院不动产。寺院不动产这一概念，不仅包括捐赠给清真寺、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等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现代欧洲法中所谓的“家庭转分遗产”，即被继承

---

〔1〕什卡普斯基《阿姆河概论　阿姆河下游的土地问题》，第 137 页。——Б. 加富罗夫
〔2〕什卡普斯基《阿姆河概论　阿姆河下游的土地问题》，第 151 页。——Б. 加富罗夫
〔3〕《征服中亚史》，第 3 卷，第 291 页。

人留下遗嘱将其财产永远遗留给自己后裔不允许出售给别人的财产。1873年的草案承认这两种类型的寺院不动产，但是只打算依法确认机构和个人对那些直接由他们使用、没有被其他人和村社居住的土地的所有权，其余的土地“应该被认作是国家财产，并且依法确定正在使用这些土地的居民的使用权”，给“从前的主人”以一定的报酬。1886年的条例只是免除了那些无人居住的寺院不动产的国家土地税，“这些不动产的所有收入都用于清真寺或宗教学校或社会救济事业”。条例重申了1873年草案确立的原则：有人居住的寺院不动产的土地仍然是事实上使用它们的农村村社的领地，这些土地由政府负责收税，政府把清真寺、宗教学校或其他机构有权获得的那一部分税款（款额相当于过去哈拉志和塔纳普税的总和或者是被认可的寺院不动产证书所确定的那一部分）转给它们。自然这种制度为营私舞弊和纠纷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正如B.П.纳利夫金所阐明的，有人居住的寺院不动产的问题引起了同样的纠纷，它差不多也是按照与以前一样的办法来解决的，差别只在于赋税不是由国家征收而是由实行包税制的机构自己来征收。在费尔干纳这样的制度在1894—1895年被彻底废止。

371

考夫曼关于废除泽卡特以经营税也就是贸易和手工业许可证税来取代它的命令（1874年）引起了土著人更大的不满。新措施对政府是不利的，1875年国库收取的经营税只相当于上一年征收的泽卡特税进款的46%。此外，居民也并没有像接受取消米尔科和寺院不动产那样心平气和地接受废除泽卡特的措施。罗斯季斯拉沃夫评论说：“必须要组建一个侦查委员会来平息各地此起彼伏的骚乱。”[1]废除泽卡特也是1898年安集延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随着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国家经营税的进项大大增加了（1899年费尔干纳的经营税进项为207560卢布67戈比，1911年为405715卢布16戈比），但与土地税收入相比始终是微不足道的。

[1]罗斯季斯拉沃夫《土地所有制的种类和突厥斯坦边区的土地问题概论》，第367页。——Б.加富罗夫

在汗统治时代征自游牧人口的牲畜税也被称作泽卡特。在这方面沙里亚是与草原习惯法相矛盾的，泽卡特的税率为2.5%，而习惯法所规定的牲畜税（科普丘尔）的税率为1%。当俄罗斯人根据习惯法（在1822年草原条例生效的条件下）来征收汗的赋税时，臣服于俄罗斯比臣服于穆斯林汗对游牧人口更为有利，有时汗所征收的赋税税率为1%，也与泽卡特的名称不符。塔什干统治者尤努斯霍加1798年对吉尔吉斯人征收的赋税税率为每100头牡绵羊抽取1头。[1] 瓦利哈诺夫说，七河流域的卡拉吉尔吉斯人向汗缴纳的"泽卡特为100匹马缴纳1匹"[2]。由于很难确定牲畜的实际数量，1868年临时条例规定以"基比特税"[3]代替牲畜税（每"基比特"[4]也就是每一处游牧民族的住所，征收3卢布），基比特税被推广到突厥斯坦，在革命前一直向被认为是游牧民族的居民征收这种税。1886年条例规定这种税的税率为每1基比特缴纳4卢布，基比特的计算，就像1868年的草原临时条例所设想的那样，应该是每3年进行1次。1868年条例比1886年条例更详细地谈到要由选举产生的乡代表大会"按阿乌尔[5]，按这些阿乌尔的收入情况"来分配赋税的比例，只有"在收入相同的条件下，才按基比特"来分摊，也谈到要"按每1个基比特主人的收入情况来在他们中间分配所规定的税额"。在1886年条例中没有提到要对某些阿乌尔与某些房主的收入状况进行比较。虽然每3年要重新确定1次基比特税的数量，但是游牧民向定居生活转变的进程根本没有对相应的数据产生影响。例如，在费尔干纳数据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很难对1896年到1898年（80394卢布67戈比，77588卢布，74860卢布）统计数据连续降低以及1899年（92916卢布）统计数据急剧增加的原因作出解释，尤其是根据官方概览所有这4年的赋税都不存在欠缴税款的现象。1903

372

〔1〕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88页。

〔2〕瓦利哈诺夫《瓦利哈诺夫文集》，第75页。

〔3〕即帐篷税。——译者

〔4〕基比特本义是"长凳"的意思。早在11世纪的突厥阿拉伯词汇中就用基比特这个词来表示长凳。就像башка这个词（从баш"头"而来）一样，俄罗斯人借用了它的第三格形式。

〔5〕即山村。——译者

年基比特税为97624卢布，虽然这一年牲畜遭受了疫情的袭击(根据循环纪年，这一年是兔年，按照吉尔吉斯人的迷信说法，兔年总是不幸的年份)。此后直至1910年没有对费尔干纳基比特税的数量进行过统计，它本身被包含在土地税当中。1908年从前2个游牧乡(安集延县的瑙克茨卡娅乡和马尔格兰县或斯科别列夫县奈曼斯卡娅乡)被列入定居乡显示了游牧民转向定居生活的过程。这2个乡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吉尔吉斯人(前者吉尔吉斯人占94%，后者占96%)。但是在1910年基比特税为116524卢布，并且还有4496卢布的欠税，这些欠款差不多纳曼干县(2016卢布)和斯科别列夫县(2116卢布)各占一半，剩下不多的一点儿(364卢布)是安集延县的欠款。根据1911年的概览赋税额为114624卢布，并且指出存在巨额(34501卢布)欠缴税款，这些欠缴税款全部都是安集延县的欠款。在这份概览中还引用了有关游牧居民数量的资料，全州有34114基比特游牧民，269531户定居农村(非城市)居民。纳曼干县的相应数据(8695基比特和55599户)表明这里的游牧民人口更多一些。在纳利夫金时代这里的游牧民有3000基比特，定居农户为13500户，也就是2个基比特对应9个农户。但是1911年的概览中对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的划分被认为是“人为的”，坦白地说“费尔干纳州现在几乎没有游牧民”[1]，他们与定居人口之间的全部差别都在于缴纳基比特税而不缴纳国家土地税，并且“游牧民”十分稳定地定居在土地上之后还要同时缴纳两种税的“情况是常有的事”。也有一些地区只从“假牧民”那里征收基比特税，而不强令他们缴纳任何土地收入税。“马尔格兰阿赖河”也就是被并入马尔格兰县(斯科别列夫县)的阿赖山谷西部地区的研究者在1909年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Г. В. 波克罗夫斯基和 Н. И. 斯托戈夫的卓越研究成果被运用到了1911年的概览中[2]，他们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使我们对突厥斯坦的这个被遗忘的偏远的地区有所了解，当时在这块长

[1]在《费尔干纳州统计概览》中大概也是这样说的。《费尔干纳州统计概览》，1907年，第142页。

[2]波克罗夫斯基、斯托戈夫《1909年马尔格兰县阿赖河的阿乌尔村社》。——Б. 加富罗夫

100俄里宽60俄里的土地上总共有3800人。氏族制度在这里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全部势力,氏族酋长即比伊就其地位而言是头号人物。马尔格兰阿赖河被分割并入了好几个乡,完整地留在阿赖河地区的只有奈曼斯卡娅乡的两个阿乌尔公社,这里阿乌尔村长(阿明)的选举是根据比伊的指示由五十人会进行的,比伊的地位远远超过有选举权的代表。人民法官(卡迪,不是根据习惯法而是根据沙里亚来进行审判)和乡长不住在阿赖河,而是住在费尔干纳谷地。与氏族比伊同样对人民具有重大影响的是伊尚马德·乌马尔·哈利发,其俗称为阿克伊尚(白伊尚)。在他的影响下1908年吉尔吉斯人义务维护了由坚金兹巴伊山口通往斯科别列夫的道路。为了纪念伊尚,在由这个山口到达拉乌特-库尔干过冬地半路上的拉巴特被命名为伊尚拉巴特。

也有一个事实说明了费尔干纳游牧经济的衰退,这就是在1910年概览中所指出的在费尔干纳州牲畜的总头数中只有1/3属于牧民,平均每个牧民分摊到的大型有角牲畜不到1/4头,在41%的小型牲畜中,甚至定居居民拥有的马匹数量也是牧民的4倍。

从前中亚的军事成员——游牧民的贫困化是与军事和官宦阶层的衰落密切相关的,自然这一阶层的代表以及与他们密切相关的草原伊尚是俄罗斯政权的主要敌人,在1898年安集延起义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1] 但是,同样的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也表明俄罗斯政权不能指望那些从俄罗斯管理中获利最大的社会成员代表,包括:卡迪、城市伊尚以及其他世俗政权不能干涉其活动的沙里亚的代表;还包括由于俄罗斯人开辟了最好的、更安全的道路而扩大了自己贸易额的富商;还有选举产生的土著行政机构代表。1898年的事件被描述为一次由一小撮极端狂妄的人谋划的一次冒险行动,然而就是起义的公开参加者当中也有一些像担任乡长的毛拉加伊普和富商阿塔伯格·巴巴贾诺

374

[1]大概从官宦阶层中产生了一个反对派,纳利夫金可能列举了这个在19世纪90年代初产生的反对派的宣言。下面的语句尤其具有代表性:"现在乡里的管理者就住在汗统治时代根据伊斯兰教规章治理人民的高贵比伊和哈基姆所居住的乌耳朵中,这些人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由异教徒从地位卑贱的人中提拔起来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纳利夫金《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142页以下)

夫这样的人。当时一些在突厥斯坦工作并与突厥人有交往的人向我证实说，塔什干和撒马尔罕的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一阴谋，在伊尚发布公开宣言前的一段时间，土著人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在伊尚遭到失败后，这些人又在一些表忠心的贺信上签了名，并捐款抚恤那些死亡士兵的家庭等。在 1892 年塔什干霍乱暴动期间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时像卡迪毛希丁和伊尚阿布尔·卡西姆这些人的行动一度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他们此前一直是以忠诚的言辞和声明而有别于土著人的。[1]

突厥斯坦的犹太人作为中亚穆斯林国家中唯一的异教徒（除了少数印度高利贷者以外）是土著居民中最有理由欢迎俄罗斯人到来的居民。俄罗斯的征服把他们从那种在穆斯林统治下他们不得不容忍的法律和社会不平等之中解救出来。拉德洛夫认为许多世纪以来在欧洲一直与基督徒敌对的犹太人，在亚洲竟然把基督徒视为自己的朋友和保护者，这简直就是令人诧异的命运的捉弄。有人说（穆拉维约夫的叙述，还没有得到证实）在希瓦汗国犹太人由于受到穆斯林的压迫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应该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否则的话那些被迫改信其他宗教的新入教者的后裔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后就会重新恢复自己从前的信仰。拉德洛夫曾在撒马尔罕犹太街区的一位阿克萨卡尔那里做客，这是一位富人，他在俄罗斯人来到前几年曾到过德国。从这里可以看出，布哈拉的犹太人尽管处于屈辱的地位，但是在穆斯林统治之下他们却积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几乎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商人阶层。大概当时在埃米尔的穆斯林臣民中还没有一个人到过西欧。据悉，在阿尔及利亚处于基督徒统治下的土著犹太人获得了被土著穆斯林所放弃的权利，当然这在俄罗斯不可能发生，而且突厥斯坦的犹太人也没能成功地保持与穆斯林同等的权力。1886 年条例把“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突厥斯坦边区的犹太人”也划入土著人

---

〔1〕对上面提到的“反对派”而言，伊尚是为人民树立了榜样的“神圣的蒙难者”（参见 1902 年安集延地震后编写的宣告。纳利夫金《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 142 页以下）。

之列，他们与穆斯林拥有同等的权力。“那些出生在与突厥斯坦边区接壤的中亚国家（布哈拉汗国就属于这样的国家）的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相比享有某些优惠权益。他们可以像其他非基督徒、非土著人一样，在突厥斯坦购置不动产，但是只能在“关于犹太人、外国臣民在帝国购置不动产综合决议”所规定的范围内购买。也发生过从塔什干和锡尔河地区其他城市中驱逐布哈拉犹太人的情况，后来在突厥斯坦为中亚犹太人建立了犹太人居住区，塔什干不在其列。当然没有采取任何反对穆斯林哪怕是来自布哈拉汗国的穆斯林进入塔什干的措施。

376

11 管理方式的欧洲化和土著人

造访过突厥斯坦的西欧东方学家,甚至对俄罗斯人抱有敌视态度的西欧东方学家,不能不注意到俄罗斯管理方式与东方管理方式(穆斯林和中国管理方式)相比所具有的优越性。这些优点并不能总是为当地居民所承认。在吉尔吉斯[1]民歌中有一篇告上帝书:"请把我们从俄罗斯的审判中拯救出来。"(урустын суттан сакпа)对突厥斯坦的征服发生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代,但是在俄罗斯的亚洲部分长期实行的是改革前的制度(有陪审员的审判只有到了1909年才在西西伯利亚和斯捷普诺伊边区实行,根本没有涉及突厥斯坦)。塔什干历史学家认为,那里的"俄罗斯法庭起初并不比萨尔特人的法庭好"。早在征服之前土著人就已经知道法律这个词和俄罗斯人关于法律的概念。希瓦汗国史书中谈到希瓦使者舒克鲁拉1861年启程回国前曾在君士坦丁堡与俄罗斯领事和英国领事(巴利奥斯是从威尼斯时代就存在于突厥语中的词)就商品销售问题进行了谈判,领事们的答复是:"根据我们的法律(бизлярнин закунымызда)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损害。"[2]浩罕历史学家毛拉尼亚兹·穆罕默德认为突厥斯坦城周围的游牧民归附俄罗斯人是由于毛拉阿利姆库尔行为过于残暴而导致的,关于此有一首诗歌:"要知道,信教和不信教并不是维系政权的必要手段,公平和公正对维系政权而言才是必不可少的。不信教但行为公正要比虽信教但行为残暴的国王能更好地维护世间的安定。"[3]俄罗斯政府常常认为土著人只看重政权的力量,所以夸大了保持政权外在权威的意义,

〔1〕首先指的是哈萨克民歌。——B. 罗莫金

〔2〕阿格希《花剌子模史》,第593页a。在该手稿中写的词是бальос(باليوز)。——B. 罗莫金

〔3〕尼亚兹·穆罕默德《费尔干纳统治者史》,第267页。——Б. 加富罗夫

377 忽视了为政权罩上公正光环的重要价值。1877 年陆军大臣米柳京在就查明锡尔河州州长戈洛瓦乔夫[1]营私舞弊问题给考夫曼的信中写道，君主赞成考夫曼的意见，决定不把戈洛瓦乔夫交付法庭审判，"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会使边区尽人皆知州长官因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而受到了审判"。尽管考夫曼本人是无可指责的，尽管他的意图是良好的，但仍有人责备他不善于为自己选拔助手，过于姑息那些辜负了人们信赖的人，这种指责看起来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可能这里除了共同关心俄罗斯政权的权威性以外，也与考夫曼本人过于贪恋自己所拥有的几乎无限权力有关，与此相连人们对像七河州州长和筹备者 Г. А. 科尔帕科夫斯基这样的称职助手也持怀疑和不友好的态度。马萨利斯基说科尔帕科夫斯基"直至今天仍活在韦尔内和整个边区人们的心中"。斯凯列尔说科尔帕科夫斯基懂得吉尔吉斯语，酷爱骑术，因此吉尔吉斯人称他为"铁骑人"，说他能使人注意到七河州行政机构与塔什干官僚之间的差别。[2] 这样在考夫曼的坚持下从塔什干召回了财政部的代表 Н. Ф. 彼得罗夫斯基，他后来成为吉尔斯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和驻喀什噶尔的领事。为了疏远那些"其自身的行为不能成为土著人表率"的人，州长和办公室主任还肩负着这样的职责(根据 1868 年 11 月 29 日命令)，即向总督提供一份由他们"亲笔写的对总督手下所有官员的秘密考评语"，但这并不能证明对人的了解是准确无误的。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引用了一些所谓"受人尊敬的土著人"对考夫曼的一些具有代表性和饶有趣味的描述，但是能够据此判断考夫曼时期土著人对俄罗斯政权态度的资料迄今还没有公布。吉尔吉斯人哈里巴伊为韦谢洛夫斯基教授编写的叙事集大概没有什么价值。戈洛瓦乔夫和其他许多直接统治居民的人的行为促使我们推测，1881 年在考夫曼活动末期土著人没有理由像 1867 年那样尊重俄罗斯政权。考夫曼在自己的工作报告中只是列举了土著人信赖俄罗斯政权的一个证据：这

---

[1]参见纳利夫金对他的评论(《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 92 页)，其中提到"总督对他的包庇和沙皇对他的姑息"。

[2]斯凯列尔《突厥斯坦》，第 2 卷，第 149 页以下。

就是从东方邻国——中国、喀什噶尔、希瓦、布哈拉、浩罕以及阿富汗的部分地区向俄罗斯移民的风潮。据官方统计，仅仅迁徙到锡尔河州和泽拉夫善地区的移民就达到了30万人。可能，这不是由于在俄罗斯统治下突厥斯坦获得了繁荣发展，而是由于当时与俄罗斯相邻的国家都发生了骚乱。那种平静而安全的情景1878年给科学院院士米登多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情形完全是在不久前俄罗斯武装力量所取得的成就的影响下形成的，由此也决定着只要一小股俄罗斯武装力量就能够使所有的土著居民唯命是从。这种祥和安宁情形的转变不是由于管理体系的变更造成的，而是由于时间多少磨光了人们对70年代事件的记忆，并在某种程度上激昂了土著人的勇气。 378

1882年，由于考夫曼继承人切尔尼亚耶夫的坚持，成立了由彼得罗夫斯基参加的吉尔斯的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报告被认为是体系变更的开端。吉尔斯的委员会指出了在考夫曼时期俄罗斯当局的一系列营私舞弊行为，但却得出结论说土著人对俄罗斯人到处都是友善的，或者至少不是敌对的，边区是安定的，可以以民治管理代替军事管理。吉尔斯委员会的报告仅仅为1884年成立的由伊格纳季耶夫将军任主席的委员会提供了资料，然而切尔尼亚耶夫自己在采取某些废除考夫曼命令的行动时却援引了吉尔斯委员会的决议。有人指责切尔尼亚耶夫过于信任土著人，多布罗斯梅斯罗夫说他在1883年发布了组建只由萨尔特人构成的警卫队，并使塔什干俄罗斯城区警察局听命于市长的低级助理也就是一位萨尔特人的命令。由于锡尔河州州长格罗杰科夫和市长普京采夫的反对，这一命令没能实行（这两人都是1883年在切尔尼亚耶夫已经主政的时代被任命担任自己职务的）。在捷连季耶夫的书中说，切尔尼亚耶夫在市长K. M. 马克西莫维奇离职并被交付法庭审判之后，由于接任他职务的候选人经常不在而委任了一位萨尔特人担任市长的职务。无论是在多布罗斯梅斯罗夫的书中，还是在关于城市自治实行35周年（1877—1912年）的报告中，对此都只字未提。市长的职务只是在1884年马克西莫维奇被彻底解职之后才有人接任，不过当时接任他职务的E. B. 科热夫尼科夫还恢复了自己副市长的职

务并且一直留任该职到1898年。尽管切尔尼亚耶夫进行了这些任命，但他大概在土著人中还是失去了自己毫无疑问在1865—1866年曾经享有的那种声誉，当时他被称作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行政管理人”[1]。天文学家施瓦茨确认说，切尔尼亚耶夫在任期间既失去了土著人的尊敬也失去了俄罗斯居民的尊敬，以至于他离开塔什干时为他送别的只有一片诅咒之声。

379 新总督罗森巴赫参加了伊格纳季耶夫委员会的工作，所以他在1884年5月24日自己的前任离职3个月后才抵达塔什干。同年他根据委员会决议的精神实行了新的土著行政职务选举原则，这些原则的精神可以归结为加强对选举的监督：打算由人民推举出4位乡行政职务候选人，3位卡迪候选人和2位比伊候选人，政府将从这些候选人中批准任命它认为最优秀的人。此外还延长了选举的期限（由5年取代了3年）。这些原则没有写入1886年条例的定稿之中，1886年的条例依然保留着从前的候选人数量（2人）和3年的选举期。罗森巴赫参加了定稿的审议工作，为此他来到了彼得堡，在这里待了5个月（1885年11月—1886年4月），用捷连季耶夫的话来说，罗森巴赫“非常荣幸地看到，最终的结果是几乎他所有的提议都得到了认可，这种荣幸是很少有的”。

1886年条例引起了边区俄罗斯行政机构成员及强权拥护者的极大不满。首先，按照捷连季耶夫的说法，总督不再是独裁者，因为成立了一个附属于总督的理事会，该理事会只由当地管理机构中的高级官员构成，实际上总督的权力并不受这个理事会的限制，因为“凡是与边区公共管理有关的事宜，理事会的结论仅仅具有咨询作用”。设立州法庭、州检察长暨独立于总督的司法机构也引起了极大的不满。1894年总督弗列夫斯基男爵认为这引起了行政机构权威的衰落，这种衰落

[1]斯凯列尔《突厥斯坦》，第2卷，第210页。斯凯列尔完全附和了切尔尼亚耶夫对考夫曼体系的批评意见（在他的报纸《俄罗斯世界》中）。斯凯列尔以这种同情的语气谈到了“切尔尼亚耶夫似的人”，说他们还在考夫曼时期就在撒马尔罕工作，与塔什干官员不同的是他们特别关心居民的福利生活（《突厥斯坦》，第1卷，第266页）。当时的泽拉夫善地区长官阿布拉莫夫也被认为是切尔尼亚耶夫似的人。

表现在发生了一些从前不可能有的"公开不尊重和不服从地方政府"的事情。访问突厥斯坦的英国人认为把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开来是俄罗斯统治突厥斯坦与英国统治印度的不同之处，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已经存在的两权分离随着总督边本廷克勋爵时代（1833—1835 年）的来临而被取消。有一种观点认为 1886 年条例的作者"急于把在民族、地理、经济、生活习俗和政治条件方面都有很大特殊性的边区的整个管理体系都纳入全帝国的规范之中"。1890 年韦谢洛夫斯基教授把以前的许多活动家离开边区（后来又有一部分人返回来）与"在边区建立了极端复杂的、至少对土著人而言是不合时宜的新制度"联系在一起。1891 年到过突厥斯坦的旅行家 E. Л. 马尔科夫转述了"一位很有威望的有可能全面研究过土著人生活习俗的塔什干俄罗斯居民"的话来评价新司法制度实行所引起的后果："罗森巴赫搞的所有这一套东西，都是想立即把欧洲搬到我们的吉尔吉斯。" 380

实际上当人身和财产犯罪进入俄罗斯调解法庭或州法庭时，便会受到这些法庭更加严厉的惩罚，在这方面新司法制度的实行与其说是促进了边区安全的巩固，毋宁说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政府的威望降低可能另有原因，首先一个事实就在于考夫曼的继承人中没有一个拥有他那样的个人品质，无论是在俄罗斯的军人、官员和居民中，还是在土著人中都没有他那样的威望。[1] 在罗森巴赫时期土著人对俄罗斯当局的命令所持的反对态度是以非常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形式在考夫曼时代是难以想象的，虽然那些受人尊敬的土著人仍然赞美俄罗斯人及其行动。1886 年在庆祝占领塔什干一周年的时候（6 月 15 日），卡迪毛希丁对罗森巴赫将军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值此一周年之际土著人感到欣慰的是"城市被占后承认我们有信仰自己的宗教即伊斯兰教的权力，保留了根据沙里亚设立的民族法庭；到处都处在安定祥

〔1〕当然主要的原因不在于某个沙皇行政官员的个人品质，而是在于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阶级分化、德赫干失去土地（关于费尔干纳的这种情况巴托尔德自己也谈到了，参加前面第 362－363 页）以及由于资本主义渗透而引起的剥削的增加，导致当地劳动群众掀起了日益激烈的反对沙皇专制主义民族压迫和殖民压迫的斗争。当地商界和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与俄罗斯资本家的竞争导致了矛盾的激化，这种激化也表现在民族意识的发展等方面。——B. 罗莫金

和之中，当局关心人民的生活；也赐予了我们城市自治权。所有这一切都保障我们能过上自由安定的生活，商业、工业和农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1888年7月俄罗斯教堂袯除仪式和在俄罗斯时代重建的霍加阿赫拉尔清真寺落成典礼同时举行的时候，这位卡迪对俄罗斯政权更加赞美，他认为把这两种仪式安排在一起举行明显地证明了政府对两种宗教采取的是一视同仁的态度，并表达了土著居民对俄罗斯君主、381 总督、州长格罗杰科夫和市长普京采夫的感激之情。

根据州长格罗杰科夫的倡议，这个时期还开始进行了向俄罗斯人介绍游牧民习惯法和诉讼程序的工作。最初打算通过县长来搜集相关的资料，但1884年搞到的资料是“由蹩脚的翻译”搜集整理的，所以被认为毫无价值可言。前面提到的A. H. 维什涅戈尔斯基1886年在草原出差7个月却取得了另外的成果。他毕业于彼得堡的历史语文学研究所，在突厥斯坦通过自学掌握了东方语言（吉尔吉斯语、萨尔特语和波斯语）。这种根据B. П. 纳利夫金编写的提纲搜集的极好的资料为格罗杰科夫撰写《锡尔河州的吉尔吉斯人和卡拉吉尔吉斯人》奠定了基础。在俄罗斯公职人员中只有卡扎林斯克县的县长助理E. A. 亚历山德罗夫对这一工作感兴趣，他是一位来自“科克切塔夫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很好地掌握了吉尔吉斯语，而且非常了解吉尔吉斯人的生活习俗”。格罗杰科夫在前言中指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与俄罗斯当局的愿望相反，“自从我们绥靖中亚以来”，伊斯兰教“在游牧民中的说教能力被布哈拉、撒马尔罕、浩罕和塔什干的伊尚们大大加强了”。他还指出寄托于1867年条例的希望没有实现，受贿行为广泛发展，比伊处于从属于乡管理者的地位。条例和民族惯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根据民族惯例当事人双方可以找任何一位比伊，而根据1867年条例只能由军都批准任命的比伊来裁决。并且，如果当事人双方不同意仲裁法庭的判决，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那么原告应该从被告所在的乡里选择比伊。“仲裁法庭”这种表达方式是从俄罗斯人那里借用来的（тритески сот），这个词在吉尔吉斯人那里具有特殊的含义，“那种在比伊审判前由当事人双方签立字据选择一位或几位比伊并同意他们的判决结果”

的裁决方式被称作是仲裁。这样的判决不能上诉。当地的活动家(俄罗斯)认为吉尔吉斯民族法庭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庭,应该为俄罗斯法庭所取代,吉尔吉斯人自身对自己的法庭也持否定态度,并为此而编了一段俗语:"如果用石头打猫头鹰,猫头鹰就会摔死;如果用猫头鹰去打石头,猫头鹰也会摔死。"(也就是说弱者总是受害者,如论他是原告还是被告)但大概同时也只是出现了一种用伊斯兰教法庭取代习惯法法庭——阿达特或赞戈的倾向,虽然吉尔吉斯人知道习惯法更合乎俄罗斯人的愿望。对吉尔吉斯人本身而言只有一种沙里亚的要求不能为他们所接受,这就是使妇女过隐居生活。当某些吉尔吉斯人想把萨尔特人的习惯引入自己的家庭时,另一些吉尔吉斯人便援引赞戈继续靠近他们的妻子。没有出现试图用俄罗斯法律取代阿达特的倾向,虽然在佩罗夫斯克县与"根据阿达特"和"根据沙里亚"这些词同时出现的还有"根据法律"这样的词汇,并且吉尔吉斯人感到在判决中援引法律具有更大的力量。对民族法庭判决的婚姻事务不满意可以向县长上诉。一些不愿意服从游牧民习俗的人有时会采取这种手段,根据游牧民的习俗寡妇第一位丈夫的亲属(首先是他的兄弟)是她的合法未婚夫。出现这类事情时,俄罗斯行政机构允许寡妇自己选择再嫁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以沙里亚取代阿达特的目的得以实现。 382

1886 年条例既没有给民族法庭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也没有给诉讼程序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自由选举比伊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是由被告的居住地来确定的,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根据案发地来确定。条例甚至取消了县长向寡妇和少女提供独立身份证的权力,这就更加强了丈夫的亲属对妇女的控制权。E. A. 亚历山德罗夫在 1887 年写道,与俄罗斯立法意图不同的是,"迄今为止氏族制度的基础也没有受到明显的削弱",1899 年 И. В. 阿尼奇科夫[1]也重申了这一观点。随着尚武习俗的终止,大的氏族集团丧失了自己从前的影响,但小的氏族单位却并非如此。

[1]《吉尔吉斯人向俄罗斯法庭宣誓》,第 42 页。——Б. 加富罗夫

另一方面，И. В. 阿尼奇科夫指出吉尔吉斯人不仅对自己的法庭不满，而且也“力求从俄罗斯法庭中寻求正义和保护”，吉尔吉斯人民似乎完全信赖俄罗斯法庭。作者认为吉尔吉斯人竭力“把各种可以由当事人自己了结的绑架牲口案都变成抢劫或盗窃案”，证明“他们无论如何都要争取由俄罗斯法庭来审理自己的案件”。遗憾的是，在 И. В. 阿尼奇科夫的文中没有说明吉尔吉斯人是否经常行使 1886 年条例赋予他们的在当事人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诉诸俄罗斯法庭的权力。按照 Н. С. 雷科申的说法，萨尔特人从来也没有行使过这种权力，尽管卡迪的法庭存在着种种弊端。[1]

罗森巴赫的后继者弗列夫斯基男爵（1889—1898 年）则竭力强化行政机构的权威，人们认为行政机构受到削弱造成了土著人的“肆意妄为”，有时不仅俄罗斯人对此产生抱怨，而且外来的穆斯林也对此心生不满。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引用了 1898 年一位鞑靼人就此作出的评论。1892年给市长普京采夫带来了打击的霍乱暴动，在弗列夫斯基看来是一个可怕的征兆。他认为使法庭从属于行政机构并取消城市自治，这是提高最高行政当局权威的必要手段。后来他也提出了把地方长官条例应用到突厥斯坦的问题。但是这些努力一项也没有实现，1892 年暴动的唯一后果便是以俄罗斯警察局局长取代大阿克萨卡尔担任塔什干土著居民区的警察局最高长官职务。大阿克萨卡尔一职被取消。突厥斯坦自治管理局保留了自己的权力，但罗森巴赫恢复了考夫曼时代实行的市长与市首长两种职务合二为一的制度，在考夫曼之后这种制度曾被科尔帕科夫斯基和切尔尼亚耶夫所取消。这种状况从 1884 年一直持续到 1905 年。

383

1898 年的安集延起义是一个更令人忧虑的信号。起义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新总督杜霍夫斯科伊（1898—1900 年）恢复了总督出巡时奢侈豪华的排场。此外，还扩大了总督对土著行政机构官员和民族审判

---

〔1〕按照纳利夫金的说法（《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 126 页），一方希望把案件移交给俄罗斯法庭的情况是有的，但“虽然有过错却富有的另一方通常宁愿诉诸民族法庭”。

员的控制权。总督被授予了自行决定在所有需要加强守卫的地方延期进行土著行政机构人员选举的权力。[1] 他有权根据军督的提议解除那些“其道德品质与审判员称号不相符”的民族审判员的职务，因为“这些与审判员称号不符的道德品质已经使他们失去了作为审判员所必须享有的信赖和尊重”。另一方面，1898 年发生的事件也没有阻止俄罗斯司法机构的进一步发展。1899 年 5 月 14 日在突厥斯坦实行了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司法章程，虽然有某些限制的规定。

1898 年的事件尤其给漠视伊斯兰教的原则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一原则曾是考夫曼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反对这一原则的 B. П. 纳利夫金指出：我们在费尔干纳“一直漠视到安集延事件爆发时为止”。俄罗斯当局开始干涉穆斯林学校的生活，搜集出版了《伊斯兰教资料》。最后这项工作虽然引起了当地（俄罗斯的）最优秀的穆斯林宗教和文化行家的兴趣，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是一些肤浅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编写或翻译过来的。H. C. 雷科申的7卷本著作《锡尔河州统计资料集》中的文章是一个例外，这部著作有可能使人们直接了解当地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学术著作获得成功的条件之一是在塔什干展开切合实际的出版工作，但这一条件没能实现。统计委员会的刊物是官方刊物当中刊登学术论文的最好地方。还在 1866 年罗曼诺夫斯基设立的附属于突厥斯坦州军区司令部的统计委员会在 1868 年考夫曼时期隶属于行政机构管辖，后来在 1887 年为附设于州管理局的统计委员会所取代。委员会的成员起初搜集用于在首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资料，70 年代突厥斯坦委员会出版了《突厥斯坦边区统计资料》，但却是在彼得堡发行的。1887 年在彼得堡也出版了锡尔河州统计委员会的第一份出版物，这就是由 E. T. 斯米尔诺夫编写的《锡尔河州概要》。从 1888 年起委员会开始在塔什干出版自己的刊物。更晚些时候出版了《撒马尔罕州参考手册》（1893

384

[1] 整个突厥斯坦都处于加强守卫的状态，所以 1898 年后“不再根据居民的选举结果”来任命乡长，而是“由行政机构来推选”乡长（纳利夫金《从前和现在的土著人》，第 137 页）。

年)、《七河州备忘手册》(1897 年)和《费尔干纳州年鉴》(1902 年)。由于最高行政机构首脑更换,用于委员会出版事务的资金时而拨付,时而被拖延好多年。在塔什干 1896 年出版的私人杂志《中亚通报》和 1910、1911 年出版的《中亚》也没能长期存在。杂志包含了某些珍贵的资料,但对当地的社会尤其是对土著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1906 年总督苏鲍季奇(1905—1906 年)再次提出了俄罗斯政权的代表必须要不通过翻译直接与土著人交流的问题,也就是要通晓他们语言的问题。当然,对突厥斯坦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从 70 年代开始俄罗斯当局就出版了教科书、自修课本和词典(M. A. 捷连季耶夫的语法和文选)等等,还组织授课、举办培训班,这些课程也好培训班也好从考夫曼和罗森巴赫时开始就受到了总督的称赞。在苏鲍季奇(1901—1904 年)时代到来之前不久担任总督的是 H. A. 伊万诺夫,他是征服活动的参与者,担任过一系列行政职务并身体力行地开始研究当地的语言。他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向居民们宣称,总督将讲萨尔特语和吉尔吉斯语,不需要翻译。但是通过举办培训班来为边区培养懂得东方语言的干部人才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H. C. 雷科申对 1886 年和 1887 年 B. П. 纳利夫金系列讲座的评论具有代表性。[1] 他说主讲人“仅仅从塔什干就召集来了50名学员”,学员们“对主讲人出色的引人入胜的讲授赞叹不已”,但是到期末的时候只剩下了两个“炮兵中尉,一位在军队中服役,另一位在行政机构服务”。由于苏鲍季奇在任的时间很短,这一次一切活动仅限于召集了一个委员会和出版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编辑成一本专门的文集,其中收入了 1906 年发表的一些阐述同一问题的文章。[2] 文集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具有代表性的东西。例如,1894 年我从一位七河流域县长那里听说的观点在 1905 年就遭到了驳斥,这种观点认为长官直接用民族语言与他们交流会降低政权的威望。

385

---

[1]雷科申《了解语言的奖赏》。——Б. 加富罗夫

[2]《关于研究土著语言问题资料汇编》,塔什干,1905 年。——Б. 加富罗夫

当时这种威望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受到了威胁，对日战争的失败以及俄国国内发生的革命运动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总督苏鲍季奇因纵容工人而被罢免，并获得了红色将军的名声，这一名声与他的过去一点也不相符(1900 年他曾因驱赶中国人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泅渡到阿穆尔河中国一岸而出名)，甚至与他在突厥斯坦的行动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在突厥斯坦当政时期那些懂土著人语言和习俗的人曾享有威望，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

当时突厥斯坦的革命运动，如同俄罗斯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一样遭到了镇压，其结果就是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尤其是在费尔干纳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条件不稳定因而造成了犯罪率的上升。1878 年，米登多夫曾对刚刚被征服的边区所出现的几乎不可思议的平静状态感到诧异。还在 1901 年，曾有人指出费尔干纳地区的民族道德水准(道德水准多少表现在犯罪率上)是相当高的，在 175 万居民中总共只发生了 27 起匪盗案和 26 起抢劫案。1910 年费尔干纳的犯罪率比俄罗斯帝国的平均犯罪率高出一倍，在 1911 年的概览中犯罪率急剧上升又是与解放运动的发展紧密相连的。1908 年概览中所援引的数字的确表明 1905 年所发生的盗匪和抢劫案件的数量(163)与 1904 年相比(74)已经急剧增加了。1909 年(460)与 1908 年(173)相比犯罪率上升得更快，其原因就很难解释了。[1] 1909 年的数字达到了最高峰，以后几年犯罪率有所下降，由此可以认为“在解放运动期间急剧高涨的犯罪率开始步入正常轨道”。盗窃犯和抢劫犯几乎都是土著人，就是常常被指责将强盗行为带到了突厥斯坦的高加索人也很少从事这种犯罪活动。犯罪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土著人普遍的酗酒行为。但如果从犯罪总数来看，则费尔干纳外来人口的犯罪率远远超过了外来人口与土著人口的数量比例。根据 1910 年概览，在费尔干纳的罪犯当中有 75% 是突厥斯坦的土著人，5% 为高加索人，20% 为欧俄出生的人和外

386

[1]巴托尔德没有看到刑事惯犯的行为和劳动群众行为之间的差别，虽然劳动群众的行为具有“匪盗的性质”，但他们主要是反对社会压迫和殖民压迫，因此在解释他所列举的 1909 年“匪盗和抢劫案增加”的事实时陷入了死胡同。——B. 罗莫金

国人。也是根据这份概览,在费尔干纳的居民中97.86%为土著的穆斯林,其他居民总共只占2.14%,其中亚美尼亚人和其他高加索民族共有1723人,也就是不到0.1%。

战争和革命爆发前的最后几年制定了文化创作规划,但这些规划由于条件恶劣、完成规划的方式不对,最终也由于对现有能力的数量和质量评价过高而没能实现。

1908—1909年在枢密官帕连伯爵领导下进行的监察工作重新提出了整顿民族法院和建立防止法官独断专行的保障体系的问题。编纂沙里亚使之在突厥斯坦通行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方式。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早在格罗杰科夫任州长的时代,他就不仅关注根据习惯法进行裁决的问题,而且也关注根据沙里亚进行裁决的问题。但是格罗杰科夫没有就地对法规及其运用进行研究,就像研究习惯法阿达特时所做的那样,而是仅限于翻译18世纪末英印的管理文献,当时根据英印总督黑斯廷斯(1773—1785年)的命令,古利亚姆-叶海亚在其他一些学者的帮助下于1190/1776年把伊斯兰教法的经典著作——突厥斯坦人布尔罕·阿德金·马尔吉纳尼(12世纪)的《希大亚》翻译成波斯文。1791年汉密尔顿又根据波斯译本将其翻译成英文缩写本。后来在印度既出版了波斯文译本也出版了阿拉伯文原本。格罗杰科夫的俄文译本是从英译本翻译过来并于1893年出版的。此时格罗杰科夫已经退休。当地俄罗斯活动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涉及伊斯兰教法问题时,常常引用格罗杰科夫的《希大亚》。1905年的版本一售而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它们对现实生活有用。在谈到突厥斯坦实行的地方长官制度时,曾打算让地方长官以《希大亚》为主要准则来对民族法院的行动进行监督。布尔罕·阿德金·马尔吉纳尼的后裔长期继任撒马尔罕的伊斯兰教艾尔谢赫,毫无疑问他的著作对当地法院的实践活动产生了某些影响[1],但这一问题没有得到研究,帕连伯爵的委员会也没有涉足

387

〔1〕根据维尔森的观点,另一位与布尔罕·阿德金·马尔吉纳尼是同时代人和同乡(也出生在费尔干纳)的作者的著作在印度的权威不亚于希达亚,这部著作便是卡济罕的法律判决书汇编。

这一问题。委员会忽视了格罗杰科夫的《希大亚》,也没有关注突厥斯坦卡迪判决书的原稿汇编,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印法律书籍即 1903 年再版的维尔森著作中最新披露的文献上,维尔森是剑桥大学英印法的主讲人。在这部著作中汇集了所有的英印伊斯兰教法,包括历次引言和详细的引文。因为印度穆斯林像突厥斯坦穆斯林一样都尊奉哈尼夫教派,所以印度的实践可以运用于突厥斯坦。可以从书中摘录翻译一些教条式的规则,无需加注释和引文,然后再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译文的内容进行某些修改,为此根据枢密官所交代的任务“按照一份专门的提纲对边疆 3 个主要区域当地居民的法律生活习俗进行了研究”。遗憾的是,出版物对这一最重要最有趣的工作几乎没有进行任何详细的介绍。在这方面 1908—1909 年的工作远不如 1886 年。我们没有得到有关土著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法律观的参考文献,也就是说维什涅戈尔斯基所搜集的资料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我们没有得到。只是对俄罗斯译本的条文进行了修订,这个俄罗斯文本被翻译成萨尔特语并被推荐给 1909 年 5 月召开的有俄罗斯和土著伊斯兰教法专家参加的代表大会。[1] 由于代表大会开的时间短暂(5 月 21—28 日),在会上对法律问题的讨论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于是决定由专家通过书面的形式对当时用萨尔特文和俄文打印出来的法典草案进行修订和补充。草案应该作为“补充和修订伊斯兰教法汇编使其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生活和法学要求”的基础,在对草案内容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之后,曾经打算把这些反馈意见整理得井井有条单独出版。按照英印的方式以也曾采用过沙里亚相应条款的欧洲法院来代替土著法院的规划势必会导致伊斯兰教法典的编纂。法典没有被公布,草案也没能实现。关于这一草案的传闻充斥在出版物中,在代表伊斯兰教头面人物喉舌的鞑靼报纸上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388

随着 A. B. 克里沃舍因的土地规划和耕作总局的活动日益活跃,尽

---

[1]参见 B. B. 巴托尔德对这一出版物的评论:《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会论丛》,第 19 卷,第 191－197 页。——Ю. 布列格利

可能更多地利用边区发展农业生产便成为在战前最后几年突厥斯坦经济问题中摆在第一位的问题。采取了扩大灌溉面积和棉花播种面积等一系列措施。在为此而把俄罗斯人和土著人的知识结合起来、把欧洲的技术和当地经验结合起来这些方面做的就太少了。事务未来的组织规划并不总是建立在对现有规范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一位俄罗斯活动家马萨利斯基的坦白说法具有典型性,他说土壤改良部把突厥斯坦水利法草案送到了立法机构,虽然"在中亚已经确立的用水规则"还"没有得到深入研究甚至没有被整合在一起"。土著人可能已经不信任俄罗斯人的倡议,因为他们的倡议总是与建立新俄罗斯村落的规划相连的,而这些规划本身不仅出自于土壤改良部,而且出自于移民局,从1906年开始移民局在突厥斯坦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在塔什干建立的"锡尔河地区移民管理局"在撒马尔罕州和饥饿草原也起作用。根据当地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它"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负面作用",它的业务"多半都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然而,移民局在研究当地的土地使用情况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成果就是出版了多卷本的尚有待于得到学术利用和评论的资料。

1913年在俄罗斯统治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出版了一部突厥斯坦概述,该著的作者最终承认:"我们至今对土著穆斯林居民的内部生活习俗及其由长期的伊斯兰教统治而形成的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还了解不多。"[1]当然已经认识到必须对这一不足之处进行弥补。1909年新任总督A.B.萨姆索诺夫提出了关于"对边区进行全面科学系统考察"的问题。根据下一年公布的通告和提纲,除了要研究生活中那些可以用统计数据表示其结果的方面之外,还要研究"各种不同居民的民族类型,他们的宗教生活、法律观念、道德和习俗",也要研究其政治史和文化史。在提纲中居民概述一章分3个主要部分来进行:(1)统计综述;(2)边区的人类学特征;(3)边区的民族学特征。宗教不知为什么被划到了人类学之中,第二个部分又被分为2个方面:①语言,②宗教。值

389

[1]马萨利斯基《突厥斯坦边区》,第560页。——Б.加富罗夫

得注意的是,曾经打算把附属的汗国布哈拉和希瓦也囊括到概述之中。在会议召开期间,一位与会者提出必须要在布哈拉设立一个统计委员会。这一次事情没有太偏离会议和草案的精神。在塔什干出版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有时图书的出版得到了边区总长官甚至得到了中央政府代表(陆军大臣)所提供的资金资助,但是由于一些人的倡议,有时候图书的出版也没有受到提纲和组织的制约,所以与边区的实际需要没有什么关系。尤其具有典型性的是4卷本的论《伊斯兰教体系》的出版,这部著作没有利用现代欧洲的学术资料,也没有摆脱传教士论战的影响。[1]

在纪念占领塔什干50周年之际,《突厥斯坦本地报》的编辑——毛拉阿利姆完成了其突厥斯坦历史概论[2]一书的写作,他在书的结尾列举了俄罗斯统治所带来的益处。当然,他并没有对俄罗斯的统治作出真诚和全面的评价,但是他在书中指出了应该对俄罗斯人统治之下边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予以关注,因而此书仍然不失其价值。用他的话来说,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草原上很少有农业,到离塔什干更远一些的地方去耕种土地这是一件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吉尔吉斯[3]秋里亚利用统治者的软弱,抢夺农民的马、牛和农作物,有时甚至把他们杀死。贸易状况则更糟糕。有一些商人把棉花、带核的杏干、胡桃、葡萄干等商品贩运到奥伦堡和特罗伊茨克,为此往往100到200人在一个头目率领下组成一个商队,在返程途中吉尔吉斯秋里亚有时打着征收泽卡特的旗号掠夺他们所携带的一部分俄国货物,有时则进行公开的抢劫。拥有1000梯拉(大约4000卢布)资本的富商几乎没有。大街上没有一座桥梁,没有一盏路灯,灌溉渠上也没有桥,由于肮脏和黑暗,人们在冬天足不出户,城市像个废墟。现在突厥斯坦草原上一片安宁,俄罗斯文化管理机构通过邮局、电报局和铁路把中亚与知识和文明的世界联系

[1]B. B. 巴托尔德指的是茨韦特科夫的《伊斯兰教体系》。关于这本书,参见巴托尔德的书评:《国民教育部杂志》,1914年第3期。——Ю. 布列格利

[2]关于此书,参见伊万诺夫《中亚历史概论》,第232页。——Ю. 布列格利

[3]哈萨克。——Б. 加富罗夫

起来。安宁和安全得到了保障,那些从前连人数众多的商队都不能走的地方,现在就连单身的行人都能走了。突厥斯坦商品销路不错,水

390 果、羊毛、皮革、棉花、丝绸和其他货物以很高的价格从突厥斯坦运往到俄罗斯内地,资金开始像潮水一样由俄罗斯流向突厥斯坦。居民的财富增加到原来的10倍甚至更多,穷人的工资收入以及地价都大大提高了。有2000到3000万卢布向国库缴纳的土地税和营业执照税从突厥斯坦流入俄罗斯。为了支持突厥斯坦的文化事业,每年俄罗斯要拨款4000万到5000万卢布。在伊斯兰统治时期,像奇尔奇克河、锡尔河、阿姆河这样的河流是很难渡过的,现在在这些河上已经架起了铁桥。从塔什干到相距30至40俄里的托伊秋别,从前由于沼泽和芦苇遍布需要走1天甚至2天才能到达,而现在只需3至4小时即可。到一些遥远的城市去,从前骑马或坐马车需要6个月的时间,而现在乘车只需要6天,电报联系仅需6分钟。在城市里面乘电车或汽车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既便宜又快捷。在突厥斯坦所有的城市和县城中都有各种工厂——轧棉厂、榨油厂、火柴厂、通心粉厂、锯木厂、炼铁厂。穆斯林也开始创办自己的工厂并且从工厂中获利颇丰。还出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事物,如唱机、照相馆、摄影机、留声机。以前的照明器为电灯所取代。新发明不仅使人受益,而且使动物受益。但是作者也提醒自己的读者,如果不受教育的话他们将会失去物质财富,穆斯林将受到有文化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排挤,如同10名训练有素的武装士兵轻而易举就能迫使100个训练无术、手无寸铁的人抱头鼠窜一样,也如同在伊斯兰时代穆斯林产品遭到俄罗斯工厂产品的排挤一样。穆斯林最有成就的教授和讲师不了解地理学,不知道他们庭院之外发生了什么事,这说明了穆斯林受教育水平之低下。由此我们想起了一首诗:"对任何一种需要不大一点儿地方的蠕虫而言,大地和天空都是一样的。"没有宗教知识不能抵达天上王国,同样没有世俗知识也不能获得人间的财富。所有的文明民族都拥有像我们那样的宗教学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有我们所没有的世俗学校。的确,在穆斯林中间迫切要求接受教育的愿望增强了:30年前在塔什干城只有1所俄罗斯穆斯林学校,并且其中

几乎没有学生，现在已经有 8 所俄罗斯土著学校，而且这些学校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突厥斯坦最后一任总督库罗帕特金属于那种很早就了解并热爱突厥斯坦的活动家，早在考夫曼时代他就曾在这里服役（1868年他参加了攻占撒马尔罕的行动）。还在 1897 年库罗帕特金就曾在阿斯哈巴德 391 与一些英国旅行者就俄罗斯政府的任务问题交换过自己的观点。根据他的说法，从突厥斯坦通过铁路和电报与欧俄地区连接起来之日起，就不能再谈论像切尔尼亚耶夫、斯科别列夫和考夫曼时代那种地方当局的全权问题了。政府不抱任何征服目的，将只关注维护和平、安定和各个阶层居民的福利。合并其他的领土应该只有在问题经过精心讨论之后才能完成，因为它们的所有居民立即都会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成为当局慈父般关怀的对象。解除土著人的武装是因为要消除他们之间的内讧，这一目的完全达到了，现在旅行者独身一人也可以安全地经长途跋涉由里海来到西伯利亚边界。在外里海州建立 17 个俄罗斯居民点时库罗帕特金给移民分发过武器，但实际上根本无须这样。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俄罗斯农民在距阿富汗边界不远的地方醉得不省人事，几个土库曼人细心地给他裹上毯子，把他放在骆驼上送到了县长那里。俄罗斯当局在突厥斯坦居民中最可靠的支柱是商人，其次是农民，最后是妇女。如果发生什么骚乱的话，一定是由毛拉发动的，他们的权力与其说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毋宁说是建立在居民的宗教狂热基础上。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线是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确定的，这一边界完全符合俄罗斯的愿望。俄罗斯甚至没有向那些求助于自己的部落提供帮助。菲鲁兹古赫人、哈萨拉人和贾姆希德人 1000 多户成群结队地穿越我们的边界，但是我们总是将他们遣返回去。呼罗珊克勒特的全体居民由于受到沙赫官员的压迫都向我们寻求保护，我方动用护卫队护送其返回并通过外交步骤来保障他们得到豁免。与布哈拉之间的边界自 1868 年以来没有发生变化，与阿富汗发生纠纷的原因只是由于阿富汗人破坏了根据 1873 年英俄协议确定的边界。

这些对外国人说的话当然不可能不具有片面性。但是库罗帕特金

在俄国也表达了他对土著人尤其是土库曼人的好感，他曾在斯科别列夫时代与土库曼人打过仗。他在与一个英国人谈论乔克杰彼土库曼人首领特克玛－谢尔达尔时所说的“我的征服者”一番话，大概又在与特克玛－谢尔达尔交谈时被他本人以同样的形式（你拿走了我的大炮）重复了一遍，后来这些话被刊登在《突厥斯坦公报》上。在塔什干召开的地理学会突厥斯坦分会会议上，库罗帕特金发表演说支持萨尔特人反对一名分会成员在宣读论文摘要时对他们的负面评价，这引起了穆392 斯林舆论界对总督的好感。当然，这些好感已经被1916年暴乱之后对卡拉吉尔吉斯人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大大削弱了，当时曾打算把所有的卡拉吉尔吉斯人都赶入特克斯河谷地并剥夺他们所有剩余的土地分给俄国移民。“毛拉”根本没有参与[1]这次起义，这一事实本身就驳斥了库罗帕特金关于突厥斯坦的起义只能由穆斯林宗教界发动的观点。还需要对库罗帕特金关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言论进行修正，只能说俄罗393 斯从来也没有实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征服政策。[2]

[1]毛拉在许多情况下都参加了起义，虽然通常他们不是起义的领导人。——B.罗莫金

[2]斯凯列尔《突厥斯坦》，第2卷，第260页。

12　俄罗斯政权和诸汗国
布哈拉汗国

俄罗斯人征服突厥斯坦就像英国人征服印度一样,直接把一部分土地并入了征服者的帝国之中,把另一部分土地留给了从前的统治者使其成为沙皇的附庸。英国人承认这种相似性并认为布哈拉汗国等同于印度的"土邦"。

俄罗斯政府从一开始就打算保留突厥斯坦的汗政权,使其服从于俄罗斯最高政权。在戈尔恰科夫公爵1864年11月发出的同文照会中,谈到要划分从伊塞克湖到锡尔河一线与俄罗斯设防的奇姆肯特中心地带之间的界限。1865年2月在设立从咸海到伊塞克湖的突厥斯坦州的时候,州军督的住地还没有确定,突厥斯坦州大致相当于塔什干州。在当月外交部发出的同文照会中宣称不打算把塔什干并入帝国,甚至在占领塔什干后还建议居民自己来选择大汗。

在组建突厥斯坦总督区的时候,它与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之间的边界依然没有确定,只能以俄罗斯军队的实际占领线为边界。与浩罕汗国之间战争的结果是确定了一条非常清晰的边界,以至于1868年1月29日在考夫曼时代签署的和平条约甚至没有涉及划分边界的问题。条约仅有5项条款,其中只是谈到俄罗斯商人在浩罕汗国和浩罕商人在俄罗斯享有同样的权利。甚至没有对汗国事实上已经处于依附于俄罗斯的地位加以确认,也没有追缴赔款。1872年与浩罕汗国签订了新的贸易条约。沙皇下旨赐予胡德亚尔汗殿下的称号。同年汗的儿子纳西尔·阿德金在塔什干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捷连季耶夫认为接待的隆重程度"有些过火"[1]。浩罕史学家尼亚兹·穆罕默德　394

[1]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34页。

谈到了王子及其随行毛拉伊萨的使团抵达俄罗斯的情况。年轻的王子在塔什干待了20天,了解了一些俄国习俗,学会了喝伏特加和葡萄酒。他在担任伯克职务的安集延为自己建起了一座俄式宫殿,1873年他在这里接待了美国人斯凯列尔,在接受他礼物的时候,王子说了一句俄语:“用作纪念。”胡德亚尔汗向考夫曼提议在与喀什噶尔统治者阿古柏伯克进行谈判时由他来担当中间调停人,阿古柏伯克生于普斯肯特,被毛拉阿利姆库尔派往喀什噶尔。阿古柏伯克拦截了1868年赫卢多夫的俄罗斯商队和1870年涅姆钦诺夫的俄罗斯商队。调停是多此一举的:俄罗斯使者——赖因塔尔和考尔巴斯分别于1868年和1872年经七河流域来到了喀什噶尔,考尔巴斯成功地与阿古柏伯克签订了一个包含5项条款的条约,这些条款完全是与胡德亚尔汗所订立条款的翻版。但是无论哪一个条约都没有得到履行。1875年派官员魏因贝格和上校斯科别列夫经费尔干纳前往喀什噶尔。他们带着卫队来到浩罕加速了居民起义的爆发,在毛拉的影响下他们既反对汗同时也反对俄罗斯人。汗可能和俄国人一起离开了自己的国家,8月8日他抵达塔什干,根据考夫曼的吩咐他又于11日离开塔什干前往奥伦堡。塔什干卡迪赖姆·霍加1893年对Н.П.奥斯特罗乌莫夫叙述说,考夫曼在胡德亚尔汗抵达之后的第三天拜访了他,但是汗拒绝与他交谈,并宣称他是一国之君,只能与沙皇对话。[1] 随后在考夫曼那里讨论了一个问题:是把汗留在塔什干还是把他送走呢?赛义德·阿齐姆·巴伊发表见解说:“如果汗留在塔什干,那么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到他那里去,有的人去是出于好奇,有的人去是出于同情,大街上、集市上和草原上将到处都有人谈论他……何以知道其追随者不到他那里发动一场出其不意的进攻把他救出来或者干脆制造一场混乱呢?”[2] 考夫曼之所以决定把汗送往奥伦堡其原因似乎就在于此。[3] 当然,这一切叙述都是不近情理的,特别是关于汗态度高傲的说法很不真实,因为当时汗还

---

[1] 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210页。——Б.加富罗夫

[2] 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211页。——Б.加富罗夫

[3] 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210－211页。——Б.加富罗夫

指望俄国人帮助他重登汗位。[1] 在离开浩罕之前他在给考夫曼的信中写道:他已把“自己和浩罕汗国置于俄罗斯沙皇陛下的强大保护之下”[2],并请求“速派俄罗斯军队携带火炮前往浩罕城”。大概在许多描写胡德亚尔汗的诗歌中所抒发的那种情感的影响下产生了传闻。汗的不幸使那些在他统治时期憎恨他的人民迁就了他,对他仿佛形成了一种崇拜。一则关于他的爱子乌尔曼·伯克的悲歌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王子令人感动的命运,他 1883 年死于塔什干,年仅 19 岁,“人数众多的塔什干穆斯林参加了”他的葬礼。当然这种对胡德亚尔汗及其儿子的同情并没有威胁到突厥斯坦的安定。

参加叛乱的胡德亚尔汗之子纳西尔·阿德金在旧历 7 月 24 日星期五被推上了汗位,同日他致信考夫曼,说起义被证实是由胡德亚尔汗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所引起的,这些改革“违背了沙里亚”。两天后一些达官显贵也写信说明暴乱发生的原因,信中说起义是由苛捐杂税沉重而引起的,人民已经被这些苛捐杂税搞得陷入绝望。7 月 31 日,考夫曼收到了这两封信,考夫曼在回信中(8 月 4 日)说,自己“虽然与胡德亚尔汗有多年的友谊”,但也不赞成他的举动,如果他的儿子确定能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并同意对发生骚乱期间遭受损失的人进行赔偿的话,自己就将承认他儿子的地位。年轻的汗像他父亲一样从俄罗斯人那里得到了“殿下”的称号,但是他却应付不了这一运动。后来考夫曼得知他派使臣赛义德·阿里·霍加带着一封致埃米尔的信来到布哈拉,汗在信中告诉埃米尔自己已经继承汗位并反对俄罗斯人。那些给考夫曼写了一封表忠信的达官显贵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埃米尔和卡拉特伯克。当浩罕人在马赫拉姆失败后,埃米尔把这封信转交给了考夫曼。这些达官显贵还向塔什干发出了一份号召“赛义德·阿齐姆·巴伊和那些享有荣誉和声望的人以及塔什干城其他居民”进行圣战的呼吁书,呼吁书指责胡德亚尔汗完全卖身投靠异教徒,贪恋“从他们那里得

[1]比较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 2 卷,第 342－343 页。——B. 罗莫金

[2]引自魏因贝格的信。也参见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 2 卷,第 338 页。——B. 罗莫金

来的至高无上的汗的称号”。考夫曼不得不接手处理恢复秩序之类的事务，在进行军事行动期间，拒绝承认纳西尔·阿德金汗的地位，考夫曼在给他的信中称他为“王子殿下”（хан-заде）。在前往浩罕的路上考夫曼向“殿下”声明，邀请他到自己这里来是“为了协商”当军队开拔到城前的阵地上时“将要采取的下一步行动”。会见于8月29日在距浩罕3俄里的基什拉克贾尔清真寺举行，此时军事行动已经停止，没用面包和盐来迎接考夫曼，而是按照土著人的习俗带着一块达斯塔尔罕[1]来迎接他。获释俄罗斯俘虏告知他们的伙食供应很好，这部分是由于得到了汗的关照，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住在汗宫廷的女眷生活区。纳西尔·阿德金汗的地位又得到了承认，考夫曼和他一起隆重地进入了浩罕城，但他只转了几条街道就返回了营地，他把汗邀请到自己的营地。在以后的几天汗“差不多每日都像一名普通的警察局局长那样，到考夫曼这里来报告城里一切正常”（捷连季耶夫语）[2]，只有到9月3日当军队经过城里开拔到新的驻地之后，考夫曼才前往宫廷拜访了汗并接受了款待。在汗国的其他地方军事行动依然在进行，9月5日考夫曼本人来到了马尔格兰，此前马尔格兰还一直处于敌人手中。9月中旬这里的局势才恢复平稳，从各地“前往马尔格兰的代表团蜂拥而至，这些代表团都表达了自己的恭顺之情并表示愿意承认纳西尔·阿德金为汗”[3]，考夫曼邀请汗本人前往马尔格兰，9月22日与之签订了条约。条约将锡尔河和纳伦河以北的费尔干纳部分地区包括纳曼干城并入俄国。此外，浩罕人还承担义务在3日内赔偿在叛乱中遭受不幸的俄罗斯臣民60万卢布并每年向俄罗斯国库缴纳50万卢布。但是，次日汗亲自交给考夫曼一封信，信中说他无力承担要求汗国履行的财政义务。根据考夫曼在这封信上亲笔写的字句，汗在与他进行私人交谈时说：如果他有十分可靠的人手，就能履行条约。局势依然扑朔迷离，考夫曼在9月26日也就是在自己到达纳曼干的那一天致信“至高

396

〔1〕长方形桌布。——译者

〔2〕《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61页。

〔3〕《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67页。——Б. 加富罗夫

无上的汗”,信中谈到根据他所听到的传闻,说浩罕城里弥漫着暴乱的情绪,并建议汗严厉惩罚预谋犯。考夫曼在信的结尾写道:“为了您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这是必须的。”27 日在安集延就爆发了公开的起义,为了镇压起义 28 日从纳曼干派出了俄国军队,于是军事行动又恢复了。这一次汗的军队是与暴乱者作战。汗的叔叔穆拉德伯克(胡德亚尔汗时代曾担任马尔格兰伯克,9 月 14 日归附斯科别列夫)被派往马尔格兰镇压起义,他打败了叛乱者,但后来在叛乱者的新军队面前他临阵脱逃,逃到了浩罕城,那里的一部分居民背叛了汗并为叛乱者敞开了大门。穆拉德伯克后来被捕,普拉特汗下令将其处死。纳西尔·阿德金汗在 10 月 9 日离开了浩罕并致信苦盏县长诺尔德男爵寻求俄罗斯人的保护。10 月 10 日,在写这封信 2 小时之后,汗自己带着 60 人的卫队来到了苦盏。[1] 10 月 16 日,考夫曼从纳曼干来到苦盏,让斯科别列夫留住纳曼干。10 月 11 日有消息传到苦盏,说有一位自称是普拉特·伯克王子(实际上他是生在普斯肯特的毛拉伊斯哈克)的僭位者在浩罕被宣布为汗,俄国人没有与他进行任何谈判。考夫曼的行动仅限于从苦盏未经战斗重新占领了 9 月份俄国人撤出纳西尔·阿德金交给了军队的马赫拉姆堡。10 月 28 日,考夫曼致电陆军大臣说,“汗携自己的卫队住在苦盏等待着汗国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而他这位总督本人并不打算“动用军队帮助汗重返王位”。[2] 此前几天,10 月 24 日,考夫曼从苦盏向“乌列木、毛拉、德高望重者和所有善意的浩罕城居民”发出了一份呼吁,请他们考虑一下叛乱的后果。当时在浩罕城已经不存在汗的政权。普拉特汗在 12 月 14 日隆重地进入浩罕城,但大概他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长。他的住地起初设在阿萨克村,后来设在马尔格兰城。12 月 6 日,考夫曼前往彼得堡,事先他认可了斯科别列夫制订的作战计划。在这一段时间,没有从苦盏和马赫拉姆堡对浩罕城发动任何军事行动。纳西尔·阿德金从 1876 年 1 月 2 日起住在

397

[1]《征服中亚史》,第 2 卷,第 381 页。——Б. 加富罗夫

[2]《征服中亚史》,第 2 卷,第 382 - 383 页。——Б. 加富罗夫

马赫拉姆堡。同月普拉特汗的政权遭受了决定性的打击。1月20日他的军事力量长官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夫托巴奇宣称自己准备向斯科别列夫投降。24日他本人来到了胜利者面前,28日他从苦盏致电考夫曼表达了驯服之意。1月31日斯科别列夫致电考夫曼的副手科尔帕科夫斯基,请求允许他“向浩罕城进发并确定纳西尔·阿德金的地位”[1],但汗此时已经在自己的首都了。浩罕城可能在1月中旬就已经知道普拉特汗的倒霉境况了,一个来自浩罕城的代表团来到了纳西尔·阿德金那里,1月21日汗离开了马赫拉姆堡垒。在比什-阿雷克有人给他带来了“一块在宣布某人为汗时将其放在上面举起来的历史性的白毛毡”。但是汗没有进入首都,他停在了一座叫做奈曼恰的基什拉克,27日他在这里被一个代表普拉特汗的浩罕长官阿卜杜拉·伯克打败,重新逃回了马赫拉姆堡。第二天,浩罕人自己袭击了由吉尔吉斯人和钦察人构成的普拉特汗的追随者。他们重新向马赫拉姆堡派出了代表团,1月29日纳西尔·阿德金再次离开这里于30日在浩罕城登基。他的敌人脖套绳索来到他面前,他们得到了宽恕。2月3日,斯科别列夫电告科尔帕科夫斯基,说纳西尔·阿德金通知说他自己已经继承汗位,但是浩罕人自己派代表团到安集延询问是否应该接受汗。同日早上科尔帕科夫斯基收到了考夫曼的电报,电文中告知沙皇已经决定将汗国并入俄罗斯,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俯就全体浩罕人民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找到其他方式来安抚居民”[2]。当然,考夫曼在自己致亚历山大二世的报告中所坚持的后一种理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同后来考夫曼对Н.П.奥斯特罗乌莫夫所说的那样,报告是由不赞成在中亚采取征服行动的陆军大臣米柳京当着考夫曼的面向沙皇宣读的。根据沙皇的吩咐,米柳京应该和考夫曼一起把陛下的意志转告给也不希望扩充俄国疆界的戈尔恰科夫公爵。[3] 考夫曼陷入了某种自相矛盾之中,他在1872年11月给沙皇的关于浩罕

[1]《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96页。——Б.加富罗夫

[2]《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405页。——Б.加富罗夫

[3]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186-188页。——Б.加富罗夫

汗国的报告中提出的是另外一种观点,正是根据他的建议胡德亚尔汗获得了殿下的封号。

斯科别列夫完成沙皇的最高意志比计划得还要早。2月8日他向科尔帕科夫斯基报告说,他们已于一天前占领了浩罕城,当天在前往浩罕的路上,他在阿克毛拉基什拉克与汗会面,并且"汗对我们的不期而至感到很吃惊,他表示服从向他宣读的圣谕"[1]。在这份电报中斯科别列夫指责汗亲近圣战的追随者,让俄罗斯的敌人到自己身边任职。同年汗的家族中还出现了一位僭王,这就是胡德亚尔汗的侄子阿卜杜勒·克里姆伯克,所以斯科别列夫在5月18日致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信中坚持必须要把"胡德亚尔汗的所有亲属,甚至是远方亲属"驱逐到"俄罗斯本土偏远的地方"[2]。阿卜杜勒·克里姆证明自己的起义正是由于俄罗斯当局前所未有的背信弃义引起的。从前俄罗斯当局总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现在他们向纳西尔·阿德金承诺保全汗国却将他送往西伯利亚,向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夫托巴奇及其家人承诺保障他们在浩罕的生活安全却也将他送往西伯利亚。事实上并不存在驱逐到西伯利亚的事情[3],即使被流放到欧俄地区的人如果对边区的安定没有任何危害后来也被允许返回突厥斯坦。纳西尔·阿德金汗死在塔什干,胡德亚尔汗的许多亲属都生活在这里。

在费尔干纳被合并到俄罗斯后,确定俄罗斯与喀什噶尔汗国之间的关系并划定边界线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876年向喀什噶尔派出了以A.H.库罗帕特金大尉为首的使团。根据库罗帕特金的说法,俄罗斯曾"认为喀什噶尔是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国家,不仅那些还保持着独立的弱小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居民会把这个国家当做中心,对它寄予同情,而且那些被我们征服省份的居民也会这样做"[4],这种看法夸大

〔1〕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408页。——Б.加富罗夫

〔2〕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414页。——Б.加富罗夫

〔3〕"西伯利亚"一词在中亚是一个用于表示流放的普通名词。对外里海州的土库曼人而言,曼格什拉克半岛就是"西伯利亚"(萨莫伊洛维奇《摘自"花剌子模纳梅"的两个片断》,第82页)。

〔4〕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第2页。——Б.加富罗夫

了阿古柏伯克的力量。库罗帕特金确信,这种观念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异。阿古柏伯克的国家当时既面临着内部发生暴乱的威胁,也面临着外部敌人的威胁,他本人从外表上来看也不像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他的儿子伯克·胡里·伯克在喀什噶尔[1]"极其傲慢"地接待了使团并限制了使团的自由,只是在使臣中止谈判并以回国相威胁的情况下,他才撤销禁令允许使团在喀什噶尔逗留期间享有完全的自由。阿古柏伯克本人在库尔勒,1877年1月11日他在那里接待了使团,他的行为举止比较朴实谦虚。库罗帕特金在信函中称他为"毕条勒特汗[2]殿下"(阿古柏伯克采用的正式封号)。由于了解阿古柏伯克的处境,所以库罗帕特金在边界线问题上尽可能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要求阿古柏伯克撤出其在与前浩罕汗国边界沿线地带从伊尔克什坦到乌卢戈恰特建造的堡垒并将其让给俄国,同时告诉对方必须要"服从突厥斯坦总督先生的意志"。阿古柏伯克利用了这种表达方式,他声称自己不能违背总督的意志,但将派自己的使臣与库罗帕特金一起去塔什干,以便弄清楚这种意志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改变的,总督是否同意给他留下那些他已经经营了14年之久的地方。库罗帕特金不得不同意这一要求。阿古柏伯克的使臣在塔什干从俄方获得了实质性的让步,考夫曼同意为他留下乌卢戈恰特并在伊尔克什坦附近划定边界。条约没有产生影响,如同库罗帕特金所料想的那样,在同一年中国人收复了喀什噶尔。阿古柏伯克在战争结束前死去,他的儿子伯克·胡里·伯克为了获得短暂的统治权而背上了杀害兄弟的罪名,后来他逃往俄罗斯在普斯肯特避难,他在这里领取一份俄罗斯政府发给的养老金,不再参与任何社会和政治生活。笔者在写本书的时候曾有机会受到他的殷勤招待。当时伯克·胡里·伯克的外表和待人接物的态度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人想起他曾经是一位东方的君主。1878年,中国首领刘绍[3]要求

400

[1]在接待过程中,使团不得不"蹲在那里,确切一点说,坐在自己的马刺上"(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421页)。

[2]意为"洪福之汗"。——译者

[3]即刘锦棠。——译者

引渡伯克·胡里·伯克和其他逃往俄罗斯的穆斯林首领,如东干人领袖穆罕默德·阿尤布或称白彦虎[1]。当然引渡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在俄罗斯官方机构之间就此问题的往来通信中经常遇到这样一句话:"我们在突厥斯坦向许多政治活动家和觊觎亚洲领地者提供避难权,目的是指望从他们身上获得好处。"

在为阿古柏伯克服务的人员当中,大概只有高加索人扎曼汗也称扎曼汗阿凡提或扎曼伯克被俄罗斯录用,他曾居住在土耳其("阿凡提"[2]的称号就是因此而得),苏丹把他和其他"懂得军事艺术"的人一起派到了喀什噶尔,他在库罗帕特金使团到达前3年也就是1873年或1874年(从希吉拉历1290年也就是公元1873—1874年起,阿古柏伯克以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名义冲制货币)来到这里。他曾向普尔热瓦利斯基提供帮助,护送后者到罗布泊,也曾向库罗帕特金提供帮助。在俄罗斯他成了总督办公厅的翻译。1878年他加入了俄罗斯派往阿富汗(斯托列托夫)的使团。[3]

在中国恢复了对喀什噶尔的统治之后,喀什噶尔成了俄罗斯领事的住地(从1882年开始),这在阿古柏伯克统治时期是不可能的事。外国旅行者指出俄罗斯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对地方当局有着强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前这种影响非常大。在喀什噶尔形成了俄罗斯殖民区(在库罗帕特金使团到来的时候,受命经营贝科夫斯基商行的店员什科科夫是俄罗斯商界在整个这一地区的唯一代办),建立了俄华银行分部,1897年开始建立教堂,但后来停建。领事争取向喀什噶尔派驻一名东正教神甫的活动没有获得成功。强有力的领事给俄罗斯穆斯林臣民带来的好处最多,与中国穆斯林臣民的权力相比,他们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保障。从总体上看,喀什噶尔农民和

[1]现在关于东干起义者的领袖白彦虎有Л. И. 杜曼和M. 苏珊罗的研究。参见吉尔吉斯东干人史著作索引,舍尔斯托比托夫等《苏联吉尔吉斯坦史学史概论(1918—1960年)》,第74页。——B. 罗莫金

[2]土耳其语先生之意。——译者

[3]参见亚沃尔斯基《1878—1879年俄罗斯使团的阿富汗和布哈拉汗国之行》。——B. 罗莫金

市民有理由嫉妒自己的那些生活在俄罗斯统治之下的教友，但是游牧民（在喀什噶尔为数不多）认为中国的统治比俄罗斯的统治要好。

俄罗斯与布哈拉汗国的关系非常复杂。考夫曼从罗曼诺夫斯基那里继承了与埃米尔穆扎法尔之间的战争。向埃米尔提出的要求随着战争进程的变化而改变。在战争之前，切尔尼亚耶夫倾向于尊重埃米尔的大国要求，并至少从外在形式上通过俄罗斯与布哈拉之间的协议来决定浩罕汗国的命运。俄国人曾把埃米尔视为是“中亚伊斯兰教世界的领袖”（罗曼诺夫斯基甚至称他为“穆斯林宗教界的领袖”）[1]。俄罗斯和布哈拉的领土要求当时已经难以调和了，还在占领塔什干之前切尔尼亚耶夫就致信埃米尔，说他接到沙皇的命令不要越过锡尔河[2]，所以让埃米尔在“（浩罕）汗国那些根据情况不能成为俄罗斯领土组成部分的其他地区”确立统治秩序。在1865年8月6日给克雷扎诺夫斯基的情报中，他坚持必须要沿锡尔河和纳伦河来划定俄罗斯的边界，将费尔干纳的纳曼干和七河流域的库尔特卡并入俄罗斯。[3] 埃米尔在塔什干陷落之后就要求切尔尼亚耶夫撤出这座城市退到奇姆肯特，俄方对这一要求的答复是扣押了布哈拉在塔什干和奥伦堡的商队，为了进行报复埃米尔也扣留了在布哈拉的俄罗斯商人及其货物。后来埃米尔作出让步并要求在切尔尼亚耶夫得到彼得堡的命令之前，以奇尔奇克河为边界线，无论是俄罗斯方面还是布哈拉方面都不能越过这条河。但是由于塔什干和外奇尔奇克河地区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所以俄罗斯人不同意这一要求。用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讲，即使是暂时停止从奇尔奇克河输送粮食也会影响塔什干的物价。1865年9月，俄罗斯军队便在外奇尔奇克河开始了行动。由扣押使者而引起的进一步争论促使切尔尼亚耶夫于1866年1月31日越过了锡尔河，虽然他在河以南的行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866年4月在罗曼诺夫斯基时期，埃米尔只要求俄罗斯将军队撤往锡尔河以外的地区。在伊尔贾尔

401

---

〔1〕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80页。——Б. 加富罗夫

〔2〕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176页。——Б. 加富罗夫

〔3〕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174页。——Б. 加富罗夫

会战(5 月 8 日)和攻占苦盏(5 月 24 日)之后,曾打算以饥饿草原作为俄罗斯与布哈拉之间的边界。当时虽然与浩罕汗关系友好,但也没有放弃占领纳曼干的想法,此外,除了划定边界和保障自由通商之外,俄方还首次向布哈拉提出了赔偿军费的要求。9 月,使臣萨德尔卡迪毛拉米尔·哈米德·阿德金来到了苦盏,总督克雷扎诺夫斯基也抵达这里。根据罗曼诺夫斯基的说法,他是"首都德高望重的宗教人士",是一个在穆扎法尔前任时代就接近王朝的人,但是他没有接受俄罗斯条件的全权证书。与一年前切尔尼亚耶夫(的确他也没有国家管理机构授予的全权证书)信中要求相反的是,现在俄国要求埃米尔不再对浩罕的事情进行任何干涉并把年轻的浩罕汗苏丹·赛义德·穆罕默德交给俄国人。赔款的数量确定为 10 万梯拉(约 40 万卢布)。这些要求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接受条款的期限为 9 月 13 日到 23 日。俄方已经采取措施确保在超过这个期限之后能够立即恢复军事行动,它们的确被恢复了。在占领吉扎克(10 月 18 日)之后进攻又被暂时停止。没有签订和平条约,但采取了措施保证持续的战争状态不影响商业贸易。向居民宣布"商业贸易仍如从前,商队可以在和平时期他们通常所遵循的那些原则基础上自由活动"。由此可见与布哈拉汗国的贸易对俄罗斯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

402

布哈拉政府总是力争与俄罗斯中央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如同在与希瓦和其他国家交往时那样,大部分使臣都是由具有一定外交经验的同一些人士来充当。例如使臣涅什姆·阿德金·霍加在 1865 年夏天曾前往卡扎林斯克(1 号要塞),一度到过(1866 年 3 月之前)奥伦堡并徒然请求允许他前往彼得堡[2],1858 年他陪同伊格纳季耶夫从布哈拉回国,1859 年在彼得堡受到接待。1867 年和 1868 年他参加了与考夫曼的谈判。后来也参加了 1868 年谈判的布哈拉使臣米尔艾忽尔[3]穆

[1]11 月 14 日克雷扎诺夫斯基从奥伦堡致电陆军大臣"各地的商业贸易都已恢复。许多商队正从布哈拉返回"。

[2]1865 年 11 月代理人法赫尔·阿德金携带他的信件来到彼得堡,但无论是他还是信件都没有被接受。

[3]御用车马官。——译者

萨·伯克于1867年5月初到过奥伦堡，当时B.B.拉德洛夫曾见过他。拉德洛夫评论说穆萨是一位机智的老人，是一个轻于许诺的狡猾的谄媚者。比如说他答应拉德洛夫过几天就赠送给他一套波斯历史著作，于是拉德洛夫便回赠这位布哈拉人一本漂亮的《古兰经》，但他却没有收到答应给他的礼物。穆萨在奥伦堡一直住到秋天并等来了考夫曼，拟议中的条约文本是由后者与克雷扎诺夫斯基共同确定和签署的。布哈拉人请求沿锡尔河左岸划定边界，就像1866年9月俄罗斯人所建议的那样。俄罗斯人现在不想放弃乌拉-秋别和吉扎克，只同意返还他们所控制的位于吉拉努京斯克峡谷以南的亚内库尔干要塞。但在新条约中已经没有赔款的要求。1867年12月穆萨来到塔什干考夫曼处，

403 表示埃米尔同意了俄国的要求，但却并没有携带一份签署的条约。联络恢复了，可能希瓦和布哈拉之间正在就签署一份采取一致行动的协议问题进行谈判，所以决定通过自己的大臣与总督进行联系，1868年2月希瓦库什别吉的信到了塔什干，3月布哈拉库什别吉的信也到了这里，仅此一点就说明了问题。根据谍报员的情报，布哈拉不仅在与希瓦进行谈判，而且还在与阿富汗和喀什噶尔进行谈判，布哈拉使者穆罕默德·帕尔萨来到了加尔各答和君士坦丁堡，但是当然没有得到那里的支持。使臣穆萨·伯克一直在塔什干待到1868年3月，有人指责他曾利用在俄罗斯领土上（卡扎林斯克）长期逗留的机会在当地居民和在俄罗斯军队服役的穆斯林中从事阴谋活动。埃米尔在军队的伴随下来到了撒马尔罕，但对是否开战他还在犹豫，这甚至引起了他和臣民之间的冲突。[1] 卡迪和毛拉绕过埃米尔在巴哈·阿德金·纳合西班底的陵墓旁宣布进行圣战，毛拉在撒马尔罕的行动如此具有挑战性，以至于布哈拉军队长官奥斯曼、一位逃亡的俄罗斯哥萨克动用了武装力量来反对他们。根据捷连季耶夫的说法，当时有62名毛拉被打死。斯凯列尔的说法恰好相反，他说奥斯曼在镇压骚乱的时候损失了62人。希瓦

---

〔1〕关于撒马尔罕发生的事件，参见阿卜杜勒·阿齐姆·萨米《曼格特诸王史》，原文，第40页以下；译文，第67页以下。——B.罗莫金

史学家认为杀害毛拉是和约签署之后发生的事件，认为它的发生是由撒马尔罕的俄罗斯“哈基姆”造成的。埃米尔好像派毛拉前往被俄罗斯人占领的城市，并保证自己随后前往，但同时又背信弃义地通知俄罗斯长官，于是后者便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显然，在战争失败后埃米尔被指控犯有杀害毛拉之罪，埃米尔的许多行为证明他长子的起义是正当的，而屠杀毛拉正是他的这些行为之一。但是1868年春天埃米尔在返回克尔米涅之后，便顺应人民的意愿走上了圣战的道路。[1] 此前不久 404 286 名在布哈拉服役的阿富汗军人在伊斯坎杰尔罕王子领导下倒戈站到了俄罗斯人一边，伊斯坎杰尔罕王子是在阿富汗由于王位继承问题引发内乱的时候逃到布哈拉的，此后他英勇地进行了反对自己教友的斗争。根据拉德洛夫的描述，这些阿富汗人是一群仅仅为了获得利益而投身于军旅的暴徒。后来命运把王子带到了彼得堡，他从那里到了伦敦，又从伦敦来到锡斯坦。他在俄罗斯和英国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斯凯列尔说他具有卓越的才能，与他关系要好的捷连季耶夫甚至说他是“中亚最优秀的人物之一”[2]。

在撒马尔罕城前作战期间，使臣涅什姆·阿德金·霍加又来到考夫曼那里企图阻止俄国人的军事行动，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他说他带来了埃米尔签署的条约，文件被出示了，但却无法辨认清楚，因为它是用“波斯文写的，还带有大量的阿拉伯词语”。但似乎还是据此弄清了布哈拉条件和以前俄国人条件之间的差异。在占领撒马尔罕之后，考夫曼致信埃米尔提出了新的和谈条件，并且在原来要求的基础上又附加了让出撒马尔罕地区和赔偿军费的要求。规定要在 5 月 16 日之

---

〔1〕遭受沉重压迫的中亚诸汗国的人民群众，其中包括布哈拉人民，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得异常消极，他们对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参见《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1 卷，第 2 册，第 98 页）。维护自己特权利益的伊斯兰宗教界和封建贵族积极参加了反对沙俄征服的斗争。他们企图利用伊斯兰教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居民起来进行“圣战”。这些努力并没有挽救中亚诸汗国迅速溃败的命运。一位同时代的人和事件的目击者塔吉克学者多尼什描写了穆扎法尔的进军和埃米尔当局强行召集布哈拉居民进行“圣战”的情景。参见多尼什《从布哈拉到彼得堡之行》，第 49 页以下。比较谢苗诺夫《近代布哈拉汗国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概论》，第 6－8 页。——B. 罗莫金

〔2〕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 1 卷，第 413 页。——Б. 加富罗夫

前予以答复。信件是与两个撒马尔罕人一起被送去的，埃米尔把其中的一个人处死，把另一个人关进监狱。据传，撒马尔罕军队长官奥斯曼也根据埃米尔的命令在布哈拉被处死。[1]

与此同时，俄方策划了一个由撒马尔罕组成一个特殊汗国的计划，就像从前由塔什干组成一个特殊汗国那样。埃米尔赛义德·阿卜杜拉的侄子是考夫曼拟定的候选人，他从自己的叔叔那里逃到了沙赫里夏勃兹。不久考夫曼又放弃了这一候选人，因为王子受沙赫里夏勃兹伯克的影响太大了。沙赫里夏勃兹人后来支持这位王子的候选人资格以此与俄罗斯人相对抗，并且朱拉伯克说："他越愚蠢，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将会更自由。"年轻的王子后来居住在塔什干，1873 年斯凯列尔在那里见到了他，当时他 35 岁，已经学会说俄语和写俄语，他从俄罗斯人那里领取 2400 卢布的抚恤金，过着轻佻的生活，总是负债累累，他与自己在布哈拉的追随者保持通信联系，并没有丧失登上穆扎法尔宝座的希望。

在卡塔库尔干陷落之后，布哈拉使者以埃米尔的名义表示同意 1867 年的条件。这一次考夫曼建议埃米尔进行选择：(1)8 年缴纳 115 万梯拉(460万卢布)赔款，收回从卡塔库尔干到亚内库尔干之间的土地；(2)承认俄罗斯人对其所征服土地的所有权，只缴纳 12.5 万梯拉赔款。布哈拉人认为第二种选择比较好，但这一次也没有实现和平。在 6 月 2 日打败布哈拉军队之后，俄罗斯人由于得到消息说撒马尔罕城堡的驻防军处境危险，所以没有向布哈拉推进而是撤往撒马尔罕，这次撤退并没有使埃米尔焕发斗志，因为他已经明白进一步战斗是没有希望的。为了进行谈判，6 月 10 日晚穆萨·伯克便来到了撒马尔罕，12 日急使也带着埃米尔的信赶来了，信中埃米尔表示放弃王位，向俄罗斯人提议他要交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并请求与俄罗斯皇帝见面，见面的目的只是请求皇帝恩准他前往麦加。这一次考夫曼没有利用埃

[1] 根据另外一些资料记载，奥斯曼 1870 年在奇拉克奇被处决。参见阿卜杜勒·阿齐姆·萨米《曼格特诸王史》，第 148 页，注释 172。——Ю. 布列格利

米尔的不幸,他声称他从未打算消灭布哈拉汗国,只是要求埃米尔接受在撒马尔罕和卡塔库尔干向他提出的条件。正式条约文本由3部分组成:(1)5月11日从撒马尔罕寄给埃米尔的6项条款;(2)5月23日从卡塔库尔干寄出的4条"附加"条款,其中要求划定卡塔库尔干以西的边界;(3)4条"秘密附加"条款,其中要求赔偿军费12.5万梯拉,在签署和约的时候支付1万梯拉,从1868年5月21日起在30日之内支付9万梯拉,条约签署后一年内支付2.5万梯拉。最后一项条款只是叙及俄罗斯和布哈拉之间的友好关系,只字未提让埃米尔臣服于沙皇的问题。赔款实际上到1870年4月才支付完毕。6月23日,日间双方互换批准的条约文本,当天在撒马尔罕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但是条约文件中没有注明这一日期。

迄今为止所公布的资料都未能明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时考夫曼可以消灭布哈拉汗国,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虽然埃米尔准备放弃王位,但在汗国反对埃米尔和俄罗斯人情绪弥漫的状况下,占领汗国不可避免地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和约的签署并没有使军事行动停止下来,战争一直持续到1870年。只是随后俄罗斯军队在布哈拉领土上的胜利给埃米尔带来了好处,俄罗斯人把夺取的城市转交给他。更难以说明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关于赔款的条文作为"秘密条款"?从希瓦史学家对埃米尔在一个月之内支付1.2万梯拉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即使在希瓦要求赔款的事实也是人所共知的,只是不知道赔款的准确数额。

希瓦史学家认为俄罗斯放弃向布哈拉进军并同意只到那里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这一事实很有意义,这样一来埃米尔大概就能满足于不必亲自到胜利者那里去了。在泽拉布拉克会战之后人民的情绪是如此的惊慌,以至于埃米尔决定不回自己的首都了。那位涅什姆·阿德金·霍加好不容易才把人民安抚下来,胜利之后俄罗斯人的撤退也帮了他的忙,于是埃米尔返回了克尔米涅。还在1868年进行边界谈判的时候,B.B.拉德洛夫便作为翻译参与了会谈,他披露了一些关于布哈拉代表的资料,这些布哈拉代表包括济亚乌德金伯克拉赫马特·比伊、哈

特尔钦的巴哈杜尔·比伊和努拉京的阿卜杜勒·加法尔。万别里(在1863年)提到过拉赫马特·比伊(或拉赫马图拉·比伊),说他是一个在埃米尔外出的时候负责治理布哈拉并对乔装的游客进行审讯的官员。他给拉德洛夫的印象是狡猾、善于阿谀奉承,但同时他也善于利用俄罗斯军官的过失来贬低后者在居民中的威望。在与从卡塔库尔干派来迎接他的军官见面时,拉赫马特·比伊做出一副下马的架势,但却把一只脚放在马镫里,而俄军官此时已经跃下马来,于是布哈拉人迅速地重新在马上坐好,向双脚站立的军官伸出一只手来,然后傲慢地骑马走过。从奥斯特罗乌莫夫所写的关于考夫曼的书里可以看出,甚至在那些当事人的名字被忘记之后,这一事件还留在突厥斯坦人的记忆中。[1] 拉赫马图拉大概被认为是一名成熟的外交官,他曾几次作为大使前往塔什干。1883年他赴莫斯科参加加冕典礼,然后在塔什干迎接返回那里的切尔尼亚耶夫;1886年在占领塔什干纪念日到来之际,他曾前往向罗森巴赫表达祝贺。哈特尔钦伯克与济亚乌德金伯克不同,他的特点是鲁莽粗野。努拉京伯克给拉德洛夫留下的印象最好,他有专业知识有能力,既不像拉赫马特·比伊那样阿谀奉承,也不像巴哈杜尔·比伊那样粗鲁。人民非常尊重他,虽然他从不摆阔气,出门也不带随从和侍卫。书中也对那些把一份埃米尔批准的条约带到撒马尔罕来的布哈拉使者进行了描述。穆萨·伯克竭力打听俄罗斯人是从哪些书中学会了获胜的艺术,他们使用了什么样的咒语(都阿,дуʼа)。陪同穆萨前来的土库曼伊尚留给人的印象则是一个更严肃的人,他对拉德洛夫谈了许多关于土库曼人的事情,他喜欢谈论信仰问题并竭力劝说拉德洛夫皈依伊斯兰教。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根据条约规定成立的划界委员开始工作,这个委员会由布哈拉使者和总督代理人组成,俄罗斯护卫队担任护卫任务。布哈拉使者是米尔艾忽尔穆罕默德·纳西尔,后来在1886年在占领塔什干纪念日到来之际,他曾与拉赫马特·比伊一起前往向罗森巴赫表

407

---

[1]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78－79页。——Б.加富罗夫

示祝贺。俄方有 2 位全权代表——少校贝格巴乌姆和上尉捷连季耶夫。布哈拉使者从努拉塔启程来到他们那里。俄罗斯的边界被确定在努拉京州和布坎山之间的荒漠中，并且布哈拉使者是在进行了一番争辩之后才容忍了俄罗斯人擅自划定的边界，但仅仅在条约草案上加盖了自己的印章。

在此之前埃米尔成功地镇压了骚乱，甚至还向东方拓展了自己国家的疆界，这部分是由于俄罗斯人的支持。起初俄国曾打算将这种支持局限在道义的范围内，考夫曼命令“无论如何”要避免军事行动，但这种行动还是发生了。1868 年 10 月 23 日，俄罗斯人占领卡尔希对埃米尔与其长子（卡塔秋里亚）阿卜杜勒·梅利克之间斗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0 月 6 日阿布拉莫夫的宣告具有代表性，这份宣告 1896 年由已故 O. A. 什卡普斯基公布，其中指责王子“遗忘了真主和自己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迷恋于自己统治布哈拉的意愿，至今想杀死自己的君主和自己的父亲”。宣告请人民“珍惜自己，不要再使穆斯林流血牺牲”。王子起初想寻求俄罗斯人的庇护，他被允许来到撒马尔罕，但后来他认为还是逃到希瓦比较好，于是在 1868 年 12 月 22 日到达那里，3 个月后又从希瓦来到土库曼人那里，再后来去了阿富汗，最后到了喀什噶尔，1873 年他像“半个俘虏”（斯凯列尔的话）似的住在喀什噶尔的扬吉－希萨尔堡垒中。后来他又从那里前往印度，1909 年死在白沙瓦。俄罗斯的另一位敌人西迪克秋里亚（俄罗斯人那里也有一位萨迪克，他是著名的苏丹克尼萨雷·卡西莫夫之子）1869 年也在希瓦找到了避难所，后来他在俄罗斯过着恬静的生活（他是在 1877 年与喀什噶尔人伯克·胡里·伯克一起来到俄罗斯的）。

1870 年 1 月，埃米尔占领吉萨尔和库利亚布的消息传到了希瓦，希瓦史学家在谈论这场战争时对埃米尔带有明显的谴责语气，说战争持续了 6 至 7 个月，双方都牺牲了许多穆斯林的生命。埃米尔的征服活动可能引发了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新冲突。顺便提一下，被埃米尔所占领的卡拉特曾经是浩罕汗国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一举动引起了当时处于俄罗斯保护之下的胡德亚尔汗的抗议。根据捷连季耶夫的说法，

"布哈拉埃米尔被建议将卡拉特交还给浩罕汗,他按此建议做了"[1]。

408 捷连季耶夫在另一部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2],斯凯列尔利用了这部著作[3]。对埃米尔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是该建议没有被履行。当时卡拉特伯克希尔·阿里想借助浩罕人攫取对卡拉特的统治权,但是他的梦想被吉萨尔伯克和库利亚布伯克粉碎,并沦为他们的阶下囚。埃米尔依照俄国人的请求将其释放。胡德亚尔汗方面也应该恢复前任卡拉特伯克穆扎法尔·沙赫的自由,并将这一地带归还给他,穆扎法尔·沙赫那时被囚禁在浩罕。[4] 浩罕汗对卡拉特的权力实际上并未实现:在1876年征服浩罕汗国时考夫曼自己承认卡拉特是布哈拉的领地,在僭王阿卜杜勒·克里姆逃到卡拉特之后,考夫曼致信埃米尔要求他"劝诫卡拉特伯克,不要给反抗我们的叛乱者和逃亡的罪犯提供避难所"。虽然卡拉特与费尔干纳经济联系密切,卡拉特人常常在农忙的时候到那里揽工挣钱,但它依然是布哈拉汗国的领地。[5]

沙赫里夏勃兹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者在1868年进攻撒马尔罕失败后避免了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冲突,因此1869年他们拒绝向卡塔秋里亚提供避难场所。但是由于沙赫里夏勃兹拒绝引渡另外一名俄罗斯逃犯艾达尔(大概是海德尔)·伯克,所以1870年阿布拉莫夫将军进军沙赫里夏勃兹,后来俄罗斯人承认指责艾达尔·伯克在俄罗斯领土上进行抢劫活动是不公正的。俄罗斯人把征服的领土转交给了埃米尔,并建议他派自己的伯克到那里去。还在更早些时候,在1869年秋季埃米尔就请求俄罗斯人帮助反对沙赫里夏勃兹人。根据捷连季耶夫的观点,这种让步"博得了所有布哈拉人对我们的好感,可以认为从此以后,我们在布哈拉的地位已完全巩固了"[6]。斯凯列尔认为把俄罗斯

---

[1]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482页。——Б.加富罗夫

[2]《俄国和英国在中亚》,第71-72页。——Б.加富罗夫

[3]比较斯凯列尔《突厥斯坦》,第2卷,第276-277页。——Б.加富罗夫

[4]穆扎法尔·沙赫没有返回卡拉特。参见基斯利亚科夫《卡拉特史概论》,第82-83页。——В.罗莫金

[5]比较基斯利亚科夫《卡拉特史概论》,第85-87页。——Б.加富罗夫

[6]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510页。——Б.加富罗夫

征服的土地并入布哈拉“违背了当地居民的愿望,也没有顾及他们的抗议,在当地居民看来,俄罗斯人的统治要比穆扎法尔·阿德金的统治好得多”[1]。大概,1872年彼得罗夫斯基和布哈拉大使米尔艾忽尔伊萨姆·阿德金经过这里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俄罗斯领地时,居民们欢迎米尔艾忽尔的热情比欢迎彼得罗夫斯基高得多,然而在布哈拉领地特别是在沙赫里夏勃兹,人们对米尔艾忽尔漠不关心,对彼得罗夫斯基的到来表示欢迎。后来差不多在革命前,撒马尔罕地区的居民把布哈拉埃米尔称为自己的“钵谛沙赫”。1872年,在被强行合并到布哈拉的沙赫里夏勃兹地区对布哈拉当局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就像被强行合并到俄罗斯的撒马尔罕地区对俄罗斯人怀有强烈的反感情绪一样。可能当时并没有把这种合并视为是一种最终的结果,沙赫里夏勃兹人还寄希望于摆脱布哈拉的统治,而撒马尔罕人与自己从前的君主怀着同样的重新夺回撒马尔罕的期望。 409

俄罗斯政权除了让出俄罗斯人用武力征服的土地以外,在其他方面对布哈拉政府也表现出了比对其他亚洲专制国家更多的关注。1869/1870年在边界地带进行剿匪行动期间决定,双方军队即俄罗斯和布哈拉军队可以在对方领土上追击匪徒。在占领了距边界线18俄里的基什拉克恰尔沙姆贝之后,哥萨克在那里发现了5名受重伤的匪徒,他们被引渡给了济亚乌德金伯克,根据他的命令这5人在集市上被处死。匪首巴班逃往撒马尔罕避难,1871年根据阿布拉莫夫的命令他被引渡给布哈拉人,据说他被从一座大宣礼楼上扔了下来。在斯凯列尔到那里的时候(1873年),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被处以这种死刑的人。也是在1871年,被埃米尔派到沙赫里夏勃兹地区的伯克们在考夫曼到达撒马尔罕时前往迎接并参加了跑马赛,按照布哈拉的礼仪达官显贵只能为自己的君主这样做。他们因此失宠被黜逃到撒马尔罕。埃米尔要求引渡他们,虽然俄罗斯逃犯从未被从布哈拉引渡过来,这一要求还是被履行了。考夫曼只是告诉埃米尔他希望犯人将得到赦免。他

[1]斯凯列尔《突厥斯坦》,第2卷,第308页。——Б.加富罗夫

们的确没有受到惩处。总之，俄罗斯人将引渡政治犯的惯例带到了中亚，虽然附加了要求不为难他们的条件。我们看到，1866 年向埃米尔提出的引渡年轻的浩罕汗的要求（后来没有重提这一要求）就是这样安排的，1870 年逃到浩罕汗那里的朱拉伯克和巴巴伯克也没有逃脱被浩罕汗引渡的命运。[1] 1875 年魏因贝格和斯科别列夫在前往喀什噶尔的路上，也把年轻的僭王阿卜杜勒·克里姆交给了胡德亚尔汗。捷连季耶夫没有谈及引渡这位王子的事情（根据斯凯列尔的说法，他起初住在苦盏，后来在胡德亚尔汗提出抱怨之后，他又被转移到塔什干），只是叙述了他逃出苦盏被吉尔吉斯人宣布为汗以及 1876 年又逃往卡拉特的经过。彼得罗夫斯基在叙述1872年自己游历布哈拉的经

410

过时，谴责“政论家们”把两个汗国（说的是布哈拉和浩罕）当做“某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并懂得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我们把埃米尔和汗那样的微不足道的不学无术的半强盗和半唯利是图者当做（这仍然是我们的臆想）国王，并希望用和平政策和文明的恩赐来劝导他们”[2]。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在编写打败乌兹别克乌合之众的作战报告中要使用欧洲军事艺术术语这样的动机在起作用。在占领奇姆肯特的报告中甚至提到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有一种“带有来复线的炮”，但是这种炮上的“来复线并非是有来复线的炮上所具有的那种来复线，从总体上看浩罕人还不懂得使用这种炮”。[3] 毫无疑问，布哈拉人在外交领域如同在贸易领域一样获得了比在军事领域更多的技巧，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至少是暂时达到了目的。

埃米尔和总督之间争论的主题之一便是布哈拉和俄罗斯之间的往来的程序问题。埃米尔认为自己作为君主有权直接与沙皇打交道。总督则希望双方的一切联系都要通过他来进行。同时中亚的一些出身显赫的使者尤其是国王和王子来到彼得堡都明显说明了征服的荣耀，因

---

〔1〕他们年轻时期的肖像（像东方人那样坐着）被附在斯凯列尔的书中（《突厥斯坦》，第 1 卷，第 87 页）。

〔2〕彼得罗夫斯基《我的布哈拉之行》，第 210 页。——Б. 加富罗夫

〔3〕在切尔尼亚耶夫的报告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浩罕人使用有来复线的炮。

此总督倾向于允许他们前来,但要求不要在彼得堡进行任何政治谈判。自然,这种禁令在彼得堡既没有被俄罗斯人遵守,也没有被布哈拉人遵守,特命使团的旅行往往有可能提出政治问题。还在1869年的时候,彼得堡就接待了埃米尔的儿子——王储(秋里亚贾恩)赛义德·阿卜杜拉·法塔赫汗,随同王子前来的还有外交官,他们还带来了一件公文,文中以最高统治者的名义指责了俄罗斯州长们的行动。公文中说,埃米尔听从了土耳其苏丹与俄国沙皇和平共处的劝告,所以派使臣到沙皇这里来,起初派来了涅什姆·阿德金,后来派来了穆萨·伯克,但是他们都未获准从奥伦堡继续前行。萨瑟克湖会战(在希瓦历史中被称为伊尔贾尔会战)被描绘成这样:埃米尔只是为了恢复和平才来到这里,当俄罗斯人开始进攻的时候,他离开了那里并没有进行战斗;但是俄罗斯人却夺去了几座堡垒,埃米尔请求将其交还。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秋里亚贾恩在返回的路上于1870年3月在塔什干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然也未获成功。

1870年,由于听到埃米尔与希瓦和阿富汗进行联络的消息,前任吉扎克县县长诺索维奇上校来到了布哈拉,瑞士养蚕家莫泽尔为了前往布哈拉也利用了该使团出使布哈拉的机会。在他停留的巴哈乌金,商队的住处遭到了一群宗教狂的围攻,只是由于布哈拉警察局的干预旅行者才得以脱险。在诺索维奇使团出使期间产生了礼仪纠纷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也出现了几次,诺索维奇不顾自己随员中某些人的意见,同意采用布哈拉礼仪的要求,并坚持让使团所有成员在穿过城市的时候都穿上埃米尔赐给的长衫。1870年在考夫曼那里的外交部官员斯特鲁韦也是这样做的,1872年彼得罗夫斯基也按照米尔艾忽尔伊萨姆·阿德金的劝告这样做了。但是1871年前往吊唁秋里亚贾恩的科尔扎科夫上校借口身着军官制服拒绝遵从这一惯例。斯特鲁韦还不顾考夫曼的禁令收取了埃米尔赠送的货币礼物。关于土耳其使团、希瓦使团和阿富汗使团的传闻被证实了,但是没发现埃米尔有任何好战的意图。他请求向他提供4000支枪以应对一旦与阿富汗人发生的战争,遭到了拒绝。但后来埃米尔不止一次地收到了那样的礼物。根据

411

1889年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埃米尔的近卫军中有2000人是用“带有贝尔丹2号系统的来复枪装备起来的，这些来复枪是我们政府赠送给埃米尔的”。部分骑兵是用“布哈拉政府从欧俄获得的各种快速上弹式和冲击式枪炮”武装起来的。1881年，应埃米尔的请求向布哈拉派出了军事教官。1904年，又向埃米尔赠送了四轮马拉炮。

还在1869年布哈拉官员曾在彼得堡宣称：为了满足俄罗斯人的愿望，布哈拉已经消灭了奴隶生活。斯特鲁韦在1870年告知布哈拉的确不存在奴隶生活了。但是彼得罗夫斯基和斯凯列尔分别在1872年和1873年证实，就连奴隶市场也仍继续存在。总而言之，汗国依然长期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依然是一个特殊的国家。1871年，征服伊宁的消息被通知给了布哈拉埃米尔和浩罕汗。这一次并没有建立俄罗斯的附庸国，在科尔帕科夫斯基的军队靠近伊宁的时候，苏丹及其亲信步行前来迎接俄罗斯人。在俄罗斯人占领伊宁之后，苏丹住在韦尔内，保留了自己的财产。根据斯凯列尔的说法，他因善良、宽容、公正而受到了臣民的热爱，但他仍然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他说投降之后的夜晚是他自登基以来所度过的第一个平静的夜晚。

412

1873年俄罗斯军队占领希瓦汗国，于是俄国又拥有了一个新的附属国。在远征希瓦时突厥斯坦当局应该尊重政府的绝对命令——不许把希瓦并入俄罗斯。关于汗国对吉尔吉斯草原上所发生事件的影响，彼得堡后来并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切尔尼亚耶夫的机关报《俄罗斯世界》还在1875年时就否定了希瓦对吉尔吉斯人起义的影响，并认为希瓦人自己与土库曼人还有许多事情。同时后来关于希瓦向吉尔吉斯[1]草原进军的细节可能都被从希瓦官方历史中删掉了。[2] 希瓦人也以布哈拉为例，竭力要绕过塔什干与俄罗斯政府进行谈判。1872年，希瓦使团分别被派到了彼得堡和梯弗里斯，后一个使团是前往高加索大总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亲王那里的。两个使团都中途返回

〔1〕哈萨克。——Б.加富罗夫

〔2〕参见巴托尔德《希瓦历史学家所记载的1873年远征希瓦前发生的事件》。——Б.加富罗夫

了,一个是从奥伦堡返回的,另一个是从铁米尔汉－舒拉返回的。但是考夫曼对彼得堡的命令感到不满,同年他在给陆军大臣的信中写道:"最近关于希瓦的命令让我在这些汗面前名誉扫地。"希瓦人也效仿布哈拉的做法向印度派出了使团,当然其结果与布哈拉使团一样。使臣伊明·伊金(可能是耶明·阿德金)·比伊1872年3月离开希瓦,经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和白沙瓦等地于6月底来到西姆拉,受到总督的接见,1873年4月才返回希瓦。[1] 远征的结果在许多方面是与1868年远征不同的,这一次俄罗斯人占领了汗国的首都,汗逃跑了。希瓦人自己一度将他的兄弟阿塔扎扶上王位,此前他在监禁中度过了7年,但是考夫曼撤销了这一命令,他把汗召到自己这里来并将其领地归还给他。1891年希瓦王储(后来的汗)伊斯芬迪亚尔到塔什干的时候,由1873年在希瓦见过考夫曼的帕尔万·米尔扎巴希陪同,他告诉Н.П.奥斯特罗乌莫夫考夫曼迫使阿塔扎承认自己被监禁是由于参与了谋害兄弟的阴谋,并告知希瓦卡迪卡延竭力称赞考夫曼的做法。[2] 阿塔扎参加了高加索的俄罗斯军队,到过麦加,从麦加返回后在皇家护卫队服役,1883年在莫泽尔旅行时他重新回到希瓦生活,他在紧靠汗的夏宫的地方有一座两层的宫殿。考夫曼与汗本人是在6月2日会面的,并且是汗来到了总督的大帐中。谈判的结果当然是汗无条件地接受了俄罗斯的要求,但最终的条约是在8月12日俄罗斯撤军之前签订的。汗应该向俄罗斯支付220万卢布赔款,分许多年付清,承认自己"是全俄罗斯皇帝的忠实仆从",并保证不再与其他国家进行任何直接联系。阿姆河以东汗国的部分领土并入俄罗斯。与俄罗斯和布哈拉签订的条约不同的是,这里规定俄罗斯和希瓦之间实行免税贸易,不仅对俄罗斯人免税,而且对希瓦人也免税。俄罗斯船只享有"在阿姆河上自由特殊的通航权",希瓦和布哈拉船只只有"征得中亚最高俄罗斯政权的允许"才能享有此权。6月12日汗还宣布废除奴隶制,条约第17

---

〔1〕参见突厥斯坦公报中关于这个使团的论文,《突厥斯坦公报》,1896年,第72号(希瓦使团)。

〔2〕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403页。——Б.加富罗夫

款重申了汗的这项命令。

用捷连季耶夫的话来说，汗国"在某种程度上被赐予一部宪法"。为汗保留了司法权，行政权交给了由7人组成的咨议会，其中4人由总督指派，3人由希瓦显贵担任。在由总督任命的委员中有一名塔什干萨尔特人。但咨议会不是常设机构，它的使命是"在俄罗斯军队驻扎期间下达领导国家管理事务的指示"，这些指示在条约的绪论部分已经被谈到。在希瓦官员中迪旺伯吉[1]马特(穆罕默德)·尼亚兹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有理智的人"，在履行条约第3款时甚至为他破了例，根据这一条款原来属于汗国官僚的河右岸的土地要被夺走，而且没有任何补偿，只对汗在河左岸的土地给以补偿。马特·尼亚兹获得了河右岸的一块土地作为对他被夺走的土地的补偿，这块土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曾经是俄罗斯设立的阿姆河军事区内唯一的一块大地产。马特·尼亚兹1875年由于做结石手术死于彼得堡。他的对手，迪旺伯吉马特·穆拉德被视为是俄罗斯的主要敌人。他是1869年进攻草原部队的头领。在占领希瓦后，他的财产被没收，他本人被流放到卡卢加，在那里待了6年。返回希瓦后他重新恢复了公职，在1883年莫泽尔旅行时他担任第一任部长。当时他在希瓦有一座欧式住宅，里面摆设着欧式家具，窗户也是欧式的。那时在汗的首都再也没有另外一座带有欧式设施的房屋了。作为一名官员，马特·穆拉德是易卜拉欣霍加的竞争者和对手，后者死于1890年(根据莫泽尔的说法，易卜拉欣霍加是汗的叔叔)。为了消除他们之间的敌对状态，汗让易卜拉欣霍加和马特·穆拉德的儿女联姻，他们结婚所生的儿子伊斯拉姆霍加在新登基的伊斯芬迪亚尔汗统治时期(从1910年开始)担任部长，1913年伊斯拉姆霍加莫名其妙地被杀，已经开始的侦讯工作很快便被终止了，正如有人对我说的，因为发现的情况表明汗本人参与了这种犯罪行为。

414

这些事实已经表明俄罗斯在希瓦汗国的文明工作进行得并不十分成功，虽然在这里并没有遇到像在布哈拉遇到的那些障碍。对保障俄

[1]汗宫廷中的一种官职的名称。——译者

罗斯影响而言，建立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要塞是一种远比后来在布哈拉设立政治代办处甚至沿铁路线和阿姆河渡口设置驻防军要有效得多的手段。如果说“咨议会”仅仅是在俄罗斯军队撤退前起作用的话，那么后来咨议会中最有才能的委员伊万诺夫中校（以后的伊万诺夫将军）就是以阿姆河军事区长官的名义从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要塞进行自己的活动。这位在希瓦被称为“黄胡子”（萨雷－萨卡，伊万诺夫将军 30 年后成为总督时依然留着长长的胡子）的军官所面临的任务是纠正考夫曼最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屠杀土库曼－约穆特人，即使对妇女和儿童也毫不留情，1873 年 7 月 6 日完全彻底剥夺游牧约穆特人及其家庭的财产并将其消灭的命令得到了执行。[1]伊万诺夫后来收到了考夫曼关于约穆特人的严厉指示，例如在 9 月 12 日的指示中建议他“下达命令让军队在其所经之处用火和剑摧毁一切”。重温这一指示可以使我们看到，实际上在 8 月 12 日条约绪论部分中关于土库曼人的说法是多么缺乏依据，其中是这样说的：“他们的大部分财产被剥夺，人口大量减少尤其是正在经历道义上的失败，这一切都巩固了汗对他们的统治，并保障了整个国家未来的安定。”关于“道义上的失败”谈论得最少。相反，俄罗斯军官们的道德情感却由于自己被迫充当了希瓦汗宪兵和刽子手的角色而备受煎熬。对考夫曼的指示，伊万诺夫的答复是必须要爱惜土库曼人，他们是未来俄罗斯的臣民。他如此公正地向汗证明，向土库曼人提供水源并让他们自己承担修建灌溉工程的所有工作，这种政策远远好于希瓦通常所采取的不向他们提供水源并以此迫使他们驯服的政策。后来在外里海州俄罗斯人成功地实行了伊万诺夫所提议的政策。1877 年约穆特人自己请求加入俄罗斯国籍，伊万诺夫在确信希瓦汗软弱无力之后，便建议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取缔汗国，但是最高政府没有同意这些建议并撤销了他的职务。汗对土库曼人的政策一如从前，所以俄罗斯军队在 1916 年 415

[1] 为巩固希瓦汗穆罕默德·拉希姆的地位，根据考夫曼的命令派出了一支讨伐进行圣战的约穆特人的讨伐队，关于这支讨伐队的情况，参见《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1 卷，第 2 册，第 118－120 页。——B. 罗莫金

前不得不继续扮演希瓦宪兵这种角色所要求做的一切。在19世纪80年代初希瓦汗想利用俄罗斯军队的成就恢复自己对梅尔夫的统治，突厥斯坦当局认为这有利于经希瓦之手使梅尔夫臣服于俄罗斯，因此便支持了他的要求。还在1881年[1]在征得了突厥斯坦当局的同意后，希瓦汗的代表优素福·巴伊便被派往梅尔夫。[2] 优素福·巴伊1882年10月死于梅尔夫。希瓦汗不顾高加索当局的愿望，甚至没有通知切尔尼亚耶夫，便在这一年年底向梅尔夫派出了新总督阿卜杜勒·拉赫曼·巴伊。阿卜杜勒·拉赫曼·巴伊甚至从梅尔夫继续向南来到了约罗坦的萨雷科斯基汗那里，并与居住于此的四名英国间谍进行联系，但是“由于突厥斯坦总督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对汗施加了压力”，他很快便被召回了希瓦。

梅尔夫冒险是1873年后希瓦汗国试图发挥政治作用的唯一一次尝试，由于汗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没有获得成功。在其他方面汗也没有仿效布哈拉埃米尔，既没有颁发勋章，也没有进行大额捐款、馈赠丰富多彩的礼物。汗曾多次前往彼得堡(其中1883年是去参加加冕典礼的)，1902年获得了殿下的称号，后来又获得了汗殿下的封号，但这些都没有改变汗对突厥斯坦总督甚至对阿姆河军事区长官的依附地位。1873年的条约被严格遵守。俄罗斯人实际上在汗国享有进行免税贸易的权利，在汗国的商业中心乌尔根奇设有“邮政电报局、税务局、运输管理局和几座轧棉厂，其中包括设备极好的雅罗斯拉夫斯卡娅大纺织厂”。俄罗斯医疗和技术代表在汗身边服务。从1874年起汗国有了宫廷石印所(它的出版物不用于销售，而是分发给汗的近臣)。相对较好的道路状况和相对较多的桥梁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但是汗国的管理依然保持着从前的特点。为纪念沙皇一家在博尔基灾难(1888年)中幸免于难，宣布在汗国(可能是根据俄罗斯当局的命令)取消刑讯，至

〔1〕在谢苗诺夫的文中(《1881—1885年合并自由土库曼简史》，第23页)提到了切尔尼亚耶夫，但他那时不在突厥斯坦，当时因考夫曼生病由科尔帕科夫斯基主政。

〔2〕希瓦汗的代表优素福·巴伊于1882年夏来到梅尔夫，很快便死了，汗又派巴巴贾恩·伯克来代替他。关于这些事件，参见《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第1册，第133页；详情参见季霍米罗夫《梅尔夫归并到俄罗斯》。——B. 罗莫金

于这条法律是否被实行就不得而知了。 416

1873 年希瓦所遭受的屈辱更突出了布哈拉埃米尔的强大权力。在向希瓦进军时埃米尔的政策引起了人们的一些怀疑，他无偿地向俄罗斯军队提供骆驼，他的使臣伊萨姆·阿德金在考夫曼的军中服务。根据斯凯列尔的说法，埃米尔同时还向 3 位从布哈拉来到希瓦的土库曼军事长官提供资金。不管怎么说，官方承认战时埃米尔与俄罗斯人的关系是友好的和值得酬报的。1873 年 8 月 12 日的条约规定把让给俄罗斯的阿姆河右岸的部分地区转让给布哈拉，汗承担义务承认这一转让。同年 9 月 28 日签订的《俄罗斯和布哈拉友好条约》实现了这种领土的出让。这个条约规定俄罗斯享有在阿姆河上建立码头和仓库的权利，但也没有对埃米尔的强大权力进行任何限制。埃米尔政府负责码头和仓库的警卫，也就是没有规定俄罗斯的军事警卫权。俄罗斯臣民前往布哈拉应该从自己政府那里领取"可自由出入国界的证件"。俄罗斯政府有权在布哈拉派常驻代表或全权代表。没说这个全权代表是从塔什干委任的，但埃米尔应向塔什干派出自己的"常驻使臣和全权代表"。没有提及关于禁止绕过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交往的问题。与布哈拉签订的条约不顾与希瓦所订立条约中的有关条款，规定只有俄罗斯船只享有与布哈拉船只同样的沿阿姆河航行的权力。关于在布哈拉废除奴隶制的问题，条约中说这取决于埃米尔本人的决定，虽然强调这种决定要"满足俄皇帝陛下的愿望，并且要使皇帝陛下享有更大的荣耀"。[1]

考夫曼像罗曼诺夫斯基一样，竭力要使对俄亲睦的浩罕汗的光环凌驾于布哈拉埃米尔的光环之上，胡德亚尔汗从 1872 年起就被授予殿下的封号，而埃米尔穆扎法尔直至死前仍然被称为"亲王殿下"。但局

---

[1]1866 年初塔什干就发生了主人"自愿"解放奴隶的事情，并且赛义德·阿齐姆·巴伊第一个为他人树立了榜样。后来随着俄罗斯政权的建立，解放奴隶的事情到处可见。大概，废除奴隶制对突厥斯坦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大，所以俄罗斯人给当地生活制度所带来的这种变化在出版物中很少被提及。在纳利夫金关于费尔干纳的书中说，那里的奴隶只有东干人，在消灭奴隶制之后"大部分奴隶离开了自己从前的主人，而女奴几乎全部待在原地"(纳利夫金、纳利夫金娜《费尔干纳定居土著居民妇女生活习俗概论》,第 111 页)。

势的演变导致了浩罕汗国的崩溃和埃米尔权力的巩固。埃米尔在1875—1876年事变期间的举动同希瓦进军时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是友417 好的,但却令人怀疑。布哈拉使团携带着给考夫曼的礼物于1875年10月10日来到苦盏,但是埃米尔整个冬天都和军队驻扎在沙赫里夏勃兹,似乎是在等待着事态的发展。这时在浩罕宣传的影响下,泽拉夫善河下游地区爆发了起义,预料到卡拉特伯克也会进行干涉。阿布拉莫夫不允许商队由撒马尔罕前往布哈拉,因为他认为这样很危险。只是根据俄罗斯当局通过书面形式直接表达的愿望,埃米尔才于1876年初和军队一起离开沙赫里夏勃兹回到布哈拉。浩罕汗国的崩溃没有给埃米尔带来领土方面的好处,只是巩固了他对卡拉特的统治地位。

就其地理位置来看,如果俄罗斯与阿富汗和英国发生纠纷,布哈拉对俄罗斯有一定的意义。考夫曼在1870年违背外交部的愿望,开始和阿富汗埃米尔希尔·阿里通信,当时外交部认为就阿富汗事务进行接洽只能通过彼得堡来进行。考夫曼要求阿富汗埃米尔不对布哈拉事务进行任何干涉,并保证自己也不干涉阿富汗事务,虽然这时一位觊觎阿富汗王位者阿卜杜拉赫曼就在俄罗斯。考夫曼的信被附上了英文译本,以便向英印政府展示。阿卜杜拉赫曼,一位富有声望的特别英勇的军人,在逃出阿富汗后先是于1869年9月18日到了希瓦,之后到了布哈拉,最后于1870年2月13日携带着221名随从来到撒马尔罕。他起初每年从俄罗斯政府那里领取18000卢布抚恤金,后来领取25000卢布,但他并不十分满意对他的接待。他说,第一次到塔什干的时候给他提供的是总督的马车,第二次来的时候只是普通的马车,第三次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步行了。当时阿卜杜拉赫曼是英国的敌人,他对斯凯列尔说,阿富汗人民与英国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即使英国人把印度所有的收入都赠送给他,一旦爆发反对驻印英国人的战争,他也会加入英国的敌人一方。当时(1873年)他已经学会了说一些俄语,他寄希望于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获准布哈拉埃米尔允许其在克尔基或希拉巴德建立作战基地,并从那里向自己的拥护者分发传单。当时俄罗斯与英国的关系依然是友好的,俄罗斯政权不能支持这些计划,虽然在1875

年底布哈拉埃米尔自己倡议请求科尔帕科夫斯基（当时接替了考夫曼）允许阿卜杜拉赫曼返回阿富汗。

1878年与英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所谓的詹姆斯进军（反对英国人的军事佯攻），所以便与布哈拉埃米尔进行联系。考夫曼致电 418 大臣米柳京说，根据外交部官员魏因贝格（在这一年去世的通晓波斯语的专家斯特鲁韦的继任者）的情报，埃米尔保证在俄罗斯军队通过布哈拉领土时提供一切帮助，6 月 7 日斯托列托夫和拉兹戈诺夫作为使臣被派往阿富汗，他们在卡尔希见到了埃米尔，埃米尔派出自己的六轮马车来迎接他们。在经过古扎尔时与古扎尔伯克、埃米尔的次子发生了一些误会，伯克首先拜访了使者，但斯托列托夫感到这种拜访已经迟了。这位王子和其他边界地区的伯克们一起在撒马尔罕迎接于6月26 日抵达那里的考夫曼，7 月 8 日埃米尔的使者也带着命令伯克们无偿向俄罗斯军队提供粮食和饲料的消息来到撒马尔罕，但就在这个月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远征被取消了。考夫曼不必使用吉尔吉斯人献给他的用于远征的白色帐篷了。[1] 7 月 30 日他返回了塔什干。考夫曼当时赞成俄罗斯官方对英国所持的敌视态度，虽然他在 1876 年给陆军大臣的便函中说："我们和英国在亚洲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在那里的共同敌人是穆斯林和野蛮。"1878 年 12 月他高兴地听到了英国在英阿战争初期失利的消息，在同 Н.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的谈话中他表达了对不让他去阿富汗的惋惜之情，虽然曾建议他"带领一个营"前往那里并"自担风险"。[2] 考夫曼的政治计划（从英国人手里夺取阿富汗，把它像布哈拉那样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由于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没能实现。[3]

根据 A. A. 谢苗诺夫的说法，放弃军事行动同时继续进行外交讹

---

〔1〕关于"塔什干县吉尔吉斯人"（哈萨克管理者代表哈萨克居民）赠送的这件礼物，参见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 60 页。——В. 罗莫金

〔2〕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 83 页。——Б. 加富罗夫

〔3〕В. В. 巴托尔德在这里指的是沙皇俄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沙皇政府虽然在中亚进行了征服活动并为争夺在整个中东包括阿富汗的势力范围而与英国展开了竞争，但它还是担心与英国发生战争并竭力避免战争。——В. 罗莫金

诈是导致俄罗斯在阿富汗的威望“无可挽回地”衰落的原因,以后在阿富汗谈到俄罗斯人时“总是充满了仇视”。考夫曼和他的支持者后来竭力证明他对这一结局不负有责任,但在考夫曼本人的行动中也有许多“两面性”的手腕,这种手腕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 1878 年 5 月 26 日给斯托列托夫的指示中谈到与埃米尔缔结了同盟以防“我们与英国发生武装冲突”;在给埃米尔希尔·阿里本人的信中则强调 419 这一对俄罗斯有益的同盟对埃米尔“好处更多”。在此情况下,很难赞同只有在阿富汗人加入战时的俄国一方时才保证给他们这些好处,而不是在俄罗斯宣战前当阿富汗人与英国决裂时便给予这些好处的观点。1879 年 2 月 12 日,考夫曼在阿富汗人战败之后接待阿富汗使团时向大使表示希望上帝帮助希尔·阿里汗战胜英国人(当时希尔·阿里已经死亡,但还没有得到他死亡的消息),大使回答说:“我们寄希望于俄罗斯君主能帮助我们,尤其是不费劲地、方便地帮助我们。”在大使的回答之后,便是“外交上的沉默”。[1]

俄罗斯新使者的到来可能燃起了阿富汗人的某些希望,大概布哈拉埃米尔也对事件作了准备。1878 年 10 月,他在基塔布城接待了马特维耶夫将军。在希尔·阿里死后,当俄罗斯当局没有任何理由给他的继承人阿古柏汗制造困难时,考夫曼于 1879 年 3 月 19 日收到了总参谋长海登伯爵的电报,电文中认为派阿卜杜拉赫曼前往阿富汗是有益处的,1878 年秘密访问阿富汗的格罗杰科夫将军也支持这种观点,在此之前彼得堡收到了他的旅行报告。考夫曼强烈反对这种想法,但他还是履行了政府的愿望。[2] 5 月他来到彼得堡,11 月 5 日返回塔什干,布哈拉大使和阿卜杜拉赫曼本人都在这里迎接他。11 月 11 日,考夫曼用密码电报致电陆军大臣请求最高当局给阿卜杜拉赫曼拨付经费。11 月 30 日,阿卜杜拉赫曼拿到经费之后就离开了,并且官方宣布

〔1〕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 95 页。——Б. 加富罗夫

〔2〕阿卜杜拉赫曼返回阿富汗能给阿富汗人与英国征服者之间的斗争制造麻烦,这不利于与英国进行竞争的沙皇俄国,所以考夫曼强烈反对阿卜杜拉赫曼返回阿富汗。在英国人将阿古柏汗弄下台后局势发生了变化,考夫曼对阿卜杜拉赫曼返回阿富汗的态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参见哈尔芬《英国在阿富汗侵略政策的破产》,第 128 页。——B. 罗莫金

他失踪了,正在寻找他,实际上却给他提供了各种协助。布哈拉埃米尔被劝告不要对阿富汗人进行阻拦,也向伯克们下达了这样的建议。埃米尔穆扎法尔执行了这一指示,但他不想给逃亡者任何公开的帮助,对阿卜杜拉赫曼从马基安发来的信,他回复说"不希望与谢尔达尔见面,同样不会派任何人陪同他穿越布哈拉国土"。这迫使阿卜杜拉赫曼加速了自己的行程。后来阿卜杜拉赫曼的名字在突厥斯坦穆斯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从麦加返回的途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要前往喀布尔拜谒。19 世纪 80 年代初阿富汗的暴动把另一位阿富汗僭王伊斯哈克汗引到了俄罗斯,此外,还有阿富汗的移民、哈萨拉人和乌兹别克人来到了布哈拉领地。 420

布哈拉大使出席了 1880 年 2 月 19 日在塔什干举行的庆祝亚历山大二世登基 25 周年的庆典,当天在埃米尔所在的卡尔希,阿兰达连科大尉先是接受了官员们的祝贺,然后又接受了埃米尔本人的祝贺。早晨在卡尔希举行了阅兵式,夜晚街上张灯结彩。希瓦汗和埃米尔的继承人在 1883 年曾参加亚历山大三世的加冕典礼。

埃米尔在自己执政的末期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接待俄罗斯大使。1873 年埃米尔是按照东方的习俗盘腿坐着接待斯凯列尔的,1883 年他当着莫泽尔的面接见维滕施泰因公爵时,双腿下垂未触地面坐在御座上,身着一件离奇的制服,佩戴着将军的肩章还有授予他的俄罗斯勋章以及他为庆祝加冕典礼而设立的布哈拉新星勋章。首席大臣(库什别吉)仍然是 1872 年彼得罗夫斯基来的时候对其怀有一定好感的那个人。[1] 当然接待俄罗斯人的仪式与埃米尔接待其臣民时所采取的礼仪不同,埃米尔在接待臣民时所采用的旧礼仪一直保留到最后。1907 年 6 月,A. A. 谢苗诺夫在济亚乌德金见过埃米尔是怎样接见一些伯克的,这些被接见的伯克匍匐爬到坐在高高沙发上的埃米尔脚下,埃米尔把一只手放在伯克头上,后者把埃米尔的手贴在自己的额头上划过自

[1]1886—1887 年到过布哈拉的波斯拉夫斯基在谈到这位故人时也说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位愉快的身居高位的老人",他还说这位老人喜欢把俄罗斯和布哈拉比作是两个彼此紧贴在一起的食指。

己的脸,然后亲吻埃米尔的手。A. A. 谢苗诺夫问这种习俗有什么意义,埃米尔的答复是:“我们类似伊尚,他们类似我们的穆里德派教徒。”1902 年,A. A. 谢苗诺夫在察尔周目睹了埃米尔庄严的出行仪式,高级官员甚至王储也就是未来的埃米尔米尔·阿利姆都与埃米尔的马车并立而行。[1]

关于穆扎法尔的个性以及他的统治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他统治初期见到他的万别里把他描述成一个善良、公正和受欢迎的统治者,他父亲纳斯鲁拉在位初期也被认为是这样的,但后来却以残暴而著称。用斯凯列尔的话说,1873 年人民也开始仇恨穆扎法尔埃米尔了,因为他既不公正又残忍。在他以及继承人统治时期继续进行横征暴敛,这使人们倾家荡产。掠夺高级官员的方式是埃米尔对他们进行拜访,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为此高官们不得不为此而敬献珍贵的礼品,根据韦谢洛夫斯基教授的说法,埃米尔只拜访那些他想惩罚和使其破产的高官。惩罚制度也没有发生变化,在 1884 年天文学家施瓦茨与马特维耶夫将军来到布哈拉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偷被从大宣礼楼上扔了下来,他从一位富商那里偷了许多钱财,埃米尔吩咐杀死他,但在他承认自己陆续偷了寺院的财产之后惩罚被加重了。根据施瓦茨的说法,犯人似乎是故意要这样的,因为他认为这种死亡方式要比被刀砍死好一些。俄罗斯没有干涉汗国的内部事务。考夫曼称埃米尔是自己县长中最勤勉的一位,不仅俄罗斯人这样说,而且就是英国人也这样说。但是 H. П. 奥斯特罗乌莫夫在 1878 年 2 月从考夫曼那里听到的却是暗示科尔帕科夫斯基的话:某些军督自以为自己拥有像布哈拉埃米尔那样的独立性。[2]

俄罗斯与布哈拉的关系实际上在经布哈拉领地敷设铁路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敷设从里海到撒马尔罕的铁路也就是经布哈拉领地

---

〔1〕这里引用的描述阿卜杜勒·阿哈德接待伯克(1907 年 7 月)以及 1902 年他从察尔周到铁路线时的出行仪式细节,是 B. B. 巴托尔德根据 A. A. 谢苗诺夫的口述写成的。详见谢苗诺夫《近代布哈拉汗国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概论》,第 21 - 22 页。——B. 罗莫金

〔2〕奥斯特罗乌莫夫《突厥斯坦边区的筹建者》,第 40 页。——Б. 加富罗夫

修筑铁路的问题,在切尔尼亚耶夫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在布哈拉境内的实际勘察工作是在 1886 年进行的,并且只是引起了一些骚动,没有采用战争手段便平息了这些骚动。工程师波斯拉夫斯基指出了一个事实,“在布哈拉没有发生过一起”反对修筑铁路的“罪恶预谋”。众所周知,土著人很快便习惯于利用铁路了。

由于铁路的敷设,1873 年条约的条款实际上被运用了,而在此之前这些条款一直仅仅是字面上的死条款,这些条款包括:关于在阿姆河上通航(1887 年重建了阿姆河船队)的条款和关于俄罗斯常驻布哈拉代表职务的条款。总督罗森巴赫主张设立这一职务,并且从总体上讲主张提高作为俄罗斯朋友的布哈拉埃米尔的权威,但是他提议把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作为听命于总督的商务领事(根据阿兰达连科的方案)。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设立的是听命于外交部的政治代办处。代办的角色更像是俄罗斯派驻到外国君主那里的代表,只是第一批代表恰雷科夫、列萨尔、伊格纳季耶夫把自己的角色理解为相当于英印总督的权力和职责。但是,1891 年列萨尔和 1895 年伊格纳季耶夫提出的关于监督布哈拉财政事务的问题没有下文,伊格纳季耶夫死后(1902年)该问题再也没有被提及。伊格纳季耶夫的后继者和他身边的人接受了埃米尔丰厚的礼物,就像从罗森巴赫时候起总督身边的人一样。 422

1880 年考夫曼颁布了禁止接受礼物的命令,1883 年 12 月 26 日陆军大臣在给新总督切尔尼亚耶夫的信中写道接受礼物是与俄罗斯政权的尊严不相容的,在这一年外交大臣吉尔斯也提出了这一问题,然而礼物还是照收不误,尤其是那些被埃米尔邀请到宫廷中的女士们。无论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还是 1908 年帕连伯爵的监察委员会都不拒绝收受礼物,委员会出行的时候尼古拉二世委托它转达了自己对埃米尔的问候。根据已故彼得罗夫斯基在私人信件中的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评论,说沙皇的问候是这样的沉重,以至于委员会得用一整节车厢来携带它。只是到了 1908 年底新总督米先科(他只任职到 1909 年春天)才坚决拒绝接受送给他的礼物。

埃米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父亲在自己统治末期竭力要达到的

目的,1884年他宣称"他作为一个统治者,有权与俄罗斯皇帝本人直接打交道",并且他甚至决定扣留俄罗斯军事代表团,直至给他提供2000支步枪。后来布哈拉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以埃米尔的名义而是以库什别吉的名义与政治代办处进行联系。

在俄罗斯因素向布哈拉进行渗透方面,轮船航运所起的作用要超过铁路运输。1888年8月28日签订了《关于在布哈拉火车站和航运码头建立居民点》的条约,在该条约中除了提到布哈拉火车站之外,只提到察尔周,它当时是一个航运码头。在铁路沿线除了新察尔周和新布哈拉以外,没有出现其他俄罗斯居民点。航运局的设立和由于列萨尔的坚持于1894年宣布的布哈拉与俄罗斯在关税方面的统一,没有经正式条约批准,而是以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体现出来的(1894年夏埃米尔颁布了相应的命令,库什别吉将此通知了政治代表),它引发的后果便是在汗国的南部边界配备了一些驻防军。

克尔基的驻防军和村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里后来发展成一个主要的地毯交易集市。俄罗斯村落分布在河上游直至萨莱的地方,1907年这里建起了一座"中亚最遥远的教堂"。克尔基驻防军曾给埃米尔提供了像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要塞为希瓦汗提供的那种服务,由于驻防军的存在使埃米尔有可能向土库曼人征收新的赋税。阿姆河上的铁尔梅兹是新铁路(从布哈拉到卡尔希和克尔基)的终点站,新铁路早在1892年就已经开始筹划,但到1913年才开始建设,当时向工程师科瓦列夫斯基下达了允许建设的指令(库什别吉以书面的形式将此通知了政治代表),铁路于1916年建成。原计划从卡尔希到沙赫里夏勃兹和基塔布的支线那时还没有敷设。在更早些时候铁尔梅兹就已经通过一条路经沙赫里夏勃兹的邮路与撒马尔罕连接起来了,这条邮路是在1902年1月1日开通的。1903年总督伊万诺夫来到铁尔梅兹,但走的不是邮路,而是乘船从察尔周来到这里然后返回。这是突厥斯坦主要长官的首次布哈拉汗国南部边界之行。

423

盖尔在指南中对铁路、航运和公路沿线汗国的状况进行了最为详细的描述,并使人们对那个时代之前汗国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至少是

物质文明的成就有了一个了解。除了俄罗斯人以外，亚美尼亚人特别是察尔周和克尔基的亚美尼亚人也享受到了贸易的好处，他们在察尔周经营起欧式的旅馆，此外，在俄罗斯的察尔周还有"外交使节的住宅、军人俱乐部、调解法官、俄罗斯学校、军官管理局、金库、邮政电报局和教堂"。在新布哈拉设有国家银行分行、药房、2家药店、2家轧棉厂、3个旅馆、公共俱乐部和图书馆。在老布哈拉设有莫斯科国际银行分行。[1] 无论哪一家银行都不开设小额信贷业务，这种业务完全掌握在印度高利贷者手中。位于老布哈拉的库什别吉的住宅与位于新布哈拉的政治代办处之间用汗国唯一的一部电话联系起来。在埃米尔府邸所在地克尔米涅城中没有任何欧洲的机构，但从外表上看与富裕的萨尔特人住宅没有什么区别的埃米尔宫廷在内部装饰方面还是受到了欧洲的影响。在克尔基的俄罗斯城区有许多"欧式的建筑，活跃的集市（地毯交易市场）、欧式商店、邮局、金库和军人俱乐部"。位于老城遗址和基什拉克帕塔－吉萨尔之间的铁尔梅兹居民点当时还没有出现。

在汗国中心地带的城市中，卡尔希和古扎尔具有特殊的意义。卡尔希是吉萨尔州农产品输入的中心，是当地葡萄栽培、糖果生产和榨油工业的中心，这里被认为是汗国粮仓。而古扎尔则是牲畜交易的中心。 424
泽拉夫善的种棉业取决于水量的多少，所以水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布哈拉汗国泽拉夫善河流域第一州即济亚乌德金州的种棉业最为繁荣。一位旅行者还注意到从前那种所谓的"臭虫窝"监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条件更好一些的监狱，虽然这里的犯人仍然带着镣铐。1906年，旅行者里克默尔·里克默斯在更遥远的拜松还见到过彼此用套在脖子上的铁链拴在一起、从暗无天日的地牢中拉出来的罪犯。[2]

总起来说俄罗斯学术刊物不赞成为埃米尔赛义德·阿卜杜勒·阿哈德（1885—1910年）歌功颂德，这样做是对的。这位埃米尔起初获得了殿下的封号，后来获得了汗殿下的封号，他加入了捷列克哥萨克军，

[1]指的是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Ю. 布列格利

[2]参见 Rickmers, *The Duab of Turkestan*, p. 474. ——Б. 加富罗夫

身着这支哥萨克军制服并把自己的布哈拉近卫军军装穿在这套制服的里面。他是侍从将军、骑兵上将和圣安德烈勋章获得者，曾多次前往彼得堡、克里木和高加索，会讲一些俄语，当然从外表上看他与自己的前任截然不同，给俄罗斯政治代办处的官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典型的东方暴君，在他统治时期没有采取改变管理体制的措施。在他统治初期访问布哈拉的波斯拉夫斯基在里吉斯坦见到过一大摊血，这是当日清晨一些被斩首的犯人死后留下的。他统治时代只是废黜了从宣礼楼上抛下犯人的死刑方式。可能施瓦茨所记载的1884年的事件是最后一起这样执行的死刑。1888年杀害显贵穆罕默德·谢里夫迪旺伯吉的凶手按照传统的伊斯兰教习俗被交给了死者的亲属和仆从，他在经受了长期折磨之后被他们弄死了。[1]

1910年1月在埃米尔统治的最后一年，布哈拉发生了骚乱，对此俄罗斯媒体的解释各不相同。一些报刊认为骚乱只是表明狂热的逊尼派教徒反对以库什别吉阿斯坦纳库尔为首的波斯什叶派官员，反对那些为埃米尔本人“改革措施”的狂热迷恋者所痛恨的人。而其他媒体则认为起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什叶派官僚的横征暴敛以及总的管理体制，1910年时这种管理体制依然同1868年时一样。起义被俄罗斯军队镇压下去了，俄军首领利林塔尔将军安排了动人的一幕：两个宗教团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主要代表握手言和并亲吻对方。在起义之后没有进行法院审理，管理体制一如从前，可能起义者满足于库什别吉退休，他们自己也对其他一些在屠杀期间曾竭力安抚人民的官员如列伊斯和沙赫里夏勃兹伯克表示赞成。来到布哈拉的王储（随后在那一年登上王位）的生命安全也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425

关于君主专制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汗国的福利状况，其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与同期中亚其他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相比是高还是低，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公正研究的对象。在一份歌颂埃米尔赛义德·阿卜杜勒·阿哈德的颂词中把埃米尔臣民的福利生活与英印政

[1]阿卜杜勒·阿齐姆·萨米《曼格特诸王史》，原文，第111－112页；译文，第118页。

府臣民的贫困生活进行了对比:“当时在好大喜功的英国人统治之下的印度,人民面临着饿死的威胁,他们牢骚满腹并发动起义反对自己的压迫者,而幸福的布哈拉在俄罗斯的保护下怡然自得并感谢命运之神对自己的厚爱。”在 Д. Н. 洛戈菲特的著名著作中对布哈拉汗国的评论则完全相反。[1]

在旅行者的观察中可以找到更客观的资料。盖尔在卡尔希恰好见到过一些当时在俄罗斯国内至少在较大的城市中难以想象的场景,在茶馆中服务的“男孩儿们身着丝绸长衫,脚上带着叮当作响的镯子”——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表明在穆斯林统治下讲究仪表的风俗被夸大到了什么程度。埃米尔的个人生活方式也和其前任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区别。波斯拉夫斯基 1887 年在布哈拉听到这样一句俗语:“你摆什么架子?你已经不是埃米尔的亲属了吗?”当时埃米尔经常更换自己的妻子,一年能纳百名妻子。至于经济生活,那么主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居民群众在多大程度上深受王朝、官僚贵族和僧侣土地所有制之苦。马萨利斯基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无论是希瓦汗还是布哈拉埃米尔都没有像穆尔加布国家庄园那样大规模的私人地产。但是埃米尔是全国最大的工厂主之一,他拥有几座轧棉厂,居民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向自己国王的工厂缴纳棉花。此外,埃米尔还从事卡拉库利羔羊皮的收购,把它销往莫斯科每年都获利1500万卢布。布哈拉地区官僚贵族的米尔科的规模可能要大于撒马尔罕地区的米尔科。虽然在撒马尔罕州废黜米尔科的权力并没有引起任何骚动,但根据波斯拉夫斯基的观点,在布哈拉汗国被合并到俄罗斯后,不动用武力也不能进行这项改革。但是,米尔科的所有者并不拥有像从前俄罗斯地主那样的凌驾于在其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之上的权利,洛戈菲特说布哈拉存在着“农奴制,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官僚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官阶占有一定数量的

426

[1]尤其参见洛戈菲特《无权的国家 布哈拉汗国现状》,第 153 页写道:“可以想到如果英国统治布哈拉,布哈拉就会在短期内完全变样,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

由依附于他的居民组成的农户用于供养自己"[1],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某些寺院不动产就其规模来看也相当于一些特别的行政单位,1889年工作的参与者之一别利亚夫斯基上校描写了位于古扎尔以东山区的良加尔寺院不动产的情况。[2] 埃米尔委托出自圣徒后裔的穆泰瓦里以伯克的名义来管理寺院不动产(实际上这种管理权通常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的),他手下有两名阿姆利亚克达尔。穆泰瓦里为清真寺和麻札也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聚敛收入。对居民而言,他同时也是"世俗的行政长官和伊尚"。

很难举出实例证明这样一种观点:埃米尔和伯克的专制统治能够"进一步把一个繁荣的国家变成死气沉沉的荒漠"。从塔赫塔卡拉奇山口到繁荣的卡什卡河上游谷地的景色1889年给别利亚夫斯基留下的印象与1872年给彼得罗夫斯基留下的印象一样。1898年和1906年从南部来到这里的里克默尔·里克默斯也谈到了沙赫里夏勃兹绿洲和基塔布的富庶。[3] 卡什卡河下游也是文明繁荣的地区。在盖尔到那里的时候,从卡尔希到其北面(12俄里)的基什拉克尼卡兹和其南面(26俄里)的基什拉克亚内肯特也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文明带。[4] 盖尔说,希拉巴德河沿岸的特点是土壤肥沃,这里从利亚伊利亚干开始便是成片的稻田。为了收购农产品亚美尼亚人从外里海州来到希拉巴德州。产生了新兴的经济部门,用盖尔的话说,在基什拉克尼卡兹(是卡尔希迈德赖塞式宗教学校不动产的组成部分)"不久前"开始种植棉花,"不久前这里还开始繁殖卡拉库利绵羊"。[5] 有时伯克的专断也会对一些经济部门产生影响。别利亚夫斯基注意到沙赫里夏勃兹有大量

427

[1]布哈拉在法律上不存在类似改革前俄国那样的农奴制,但是农民却遭到了残酷的剥削,他们对封建主有很大的依赖性。参见加富罗夫《塔吉克民族简史》,第422－425页;谢苗诺夫《近代布哈拉汗国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概论》,第11－13页;基斯利亚科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哈拉汗国农业定居居民中的封建宗法关系》,第100－119页。——B.罗莫金

[2]参见别利亚夫斯基《古扎尔州沙赫里夏勃兹和杰尔宾特山区土地及道路全面勘察概述》,第109页及下一页。——Б.加富罗夫

[3]参见 Rickmers, *The Duab of Turkestan*, p.478. ——Б.加富罗夫

[4]参见盖尔《突厥斯坦指南》,第125－126页。——Б.加富罗夫

[5]盖尔《突厥斯坦指南》,第126页。——Б.加富罗夫

的烟田，而基塔布则没有，有人向他解释说“几年前”基塔布提高了烟草税，沙赫里夏勃兹则降低了烟草税。[1] 由于布哈拉政府的阻挠，一些灌溉草原和排干沼泽地积水的方案没有得以实现，如19世纪80年代列萨尔拟订的从阿姆河引水灌溉卡尔希草原的方案（预算为700万卢布）和1896年格尔曼制订的排干布哈拉周围沼泽地中的积水的方案（预算总额为12万卢布）。在列萨尔的坚持下，布哈拉政府表示同意后一项工程，而在列萨尔离开后此事又销声匿迹了。但是，灌溉系统的状况在俄罗斯治理下的突厥斯坦地区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无疑，布哈拉汗国的交通道路情况比总督辖区更糟。汗国西部地区的驼路很少得到改善，虽然像在俄罗斯一样，在高级官员来到之前道路已经被整修过并达到了尽可能好的状况。在纳斯鲁拉时期（1827—1860年）为了运送大炮修筑了从卡尔希到阿姆河流的道路。在赛义德·阿卜杜勒·阿哈德时期没有进行过任何类似的建设。当俄罗斯人决定修筑从撒马尔罕到铁尔梅兹的道路时，最初打算利用埃米尔的资金来完成这项工程（预算额为17万卢布），但是布哈拉政府接二连三敷衍了事的态度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动用俄罗斯军事部门的资金来修筑这条道路。据说，在平原地区居民们遵循的原则是“你要到有道路的地方去”，他们还竭力乘坐大马车到所有能到达的地方去。在古扎尔以东人们不使用任何带轮的轻便马车甚至大马车，只满足于有驮载牲口走的驮路就行，虽然从前有更完善的道路从加尔姆通往卡拉特。布哈拉居民没有使用俄罗斯国库的资金建造了从克尔基沿阿姆河通往丘别克的道路以及从丘别克到库利亚布的道路。根据洛戈菲特的说法，这条道路“没有设计好，仅仅从需求上看可以被称作是一条公路”[2]。但我听到的恰恰是人们对俄罗斯人修筑的从撒马尔罕到铁尔梅兹的道路持有这样的抱怨。即便如此在这样的道路上运送货物还是绰绰有余的。盖尔谈到几万普特亚麻从杰瑙州、吉萨尔州、卡菲尔尼甘州、巴利

[1]别利亚夫斯基《古扎尔州沙赫里夏勃兹和杰尔宾特山区土地及道路全面勘察概述》，第88页。——Б.加富罗夫

[2]比较洛戈菲特《无权的国家　布哈拉汗国现状》，第125－126页。——Б.加富罗夫

朱安州和库利亚布州运到了卡尔希的榨油厂，谈到了古扎尔作为主要牲畜交易市场的意义，以及整个夏天库利亚布—拜松—古扎尔商路上携带丝绸、亚麻、小麦、胡麻、皮革等货物的商队往来熙攘的热闹景况。

428

在俄罗斯统治时期，贸易往来发展的民族学影响是伊朗语为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突厥语所取代，这种影响在布哈拉汗国也有所表现，虽然程度较轻。1920 年我就在布哈拉听到过这样的话语：турки немидонем（突厥语的意思是不知道），虽然只听到过一次。别利亚夫斯基的话也证实了这里的伊朗语正在遭受排挤，他说“受过教育的布哈拉人”说沙尔萨比兹（也经常发沙尔绍兹 Шаршауз 的音），“我们所采用的说法沙赫里夏勃兹 Шахрисябз 被认为是对他们口语中所使用的词汇沙尔萨比兹 ШаарСабиз 的歪曲”[1]（的确，萨比斯 сабис——就是波斯词谢勃兹[себз“绿色”]的突厥语发音）。[2] 别利亚夫斯基的报道很有趣，他说在马耶夫时期（1878 年）“根本不懂突厥语的”的杰尔宾特居民，在他那个时候（1889 年）已经像其他塔吉克人一样，“懂得并普遍使用突厥 - 萨尔特语了”。[3]

布哈拉汗国城市生活的发展大概要比俄罗斯境内城市生活的发展缓慢，虽然我们还没有掌握有关这方面的准确统计资料。关于布哈拉本身，里克默尔 · 里克默斯只是简单地说了三言两语，他说现在（书是 1913 年出版的，序言中标明的时间是 1912 年 11 月，作者的旅行大概结束于 1908 年）城市已经不完全是 18 年前他看到的那个样子了。[4] 根据加尔金的说法，1889 年开展工作的地区囊括了整个汗国，在这一地区除了库利亚布、巴利朱安和达尔瓦兹以外，城市居民总共约占居民总

---

〔1〕比较别利亚夫斯基《古扎尔州沙赫里夏勃兹和杰尔宾特山区土地及道路全面勘察概述》，第 87 页。——Б. 加富罗夫

〔2〕比较马松、普加琴科娃《帖木儿和兀鲁伯时代的沙赫里夏勃兹》，第 23 页和 88 页，注释 26。根据 M. E. 马松的说法，迄今为止在日常生活中城市还被叫做“沙尔”或“沙尔绍兹”，“沙尔萨比兹”的形式是欧洲人的曲解。——Ю. 布列格利

〔3〕别利亚夫斯基《古扎尔州沙赫里夏勃兹和杰尔宾特山区土地及道路全面勘察概述》，第 105 - 106 页。——Б. 加富罗夫

〔4〕Rickmers, *The Duab of Turkestan*, p. 92. ——Б. 加富罗夫

数的15%，其中约有10%从事手工业和商业，5%是打短工的无产者。[1] 在布哈拉和卡尔希之后排第三位的是沙赫里夏勃兹。洛戈菲特说卡尔希有7万人，沙赫里夏勃兹有3万人。但根据里克默尔·里克默斯的说法（1906年），沙赫里夏勃兹差不多和卡尔希一样大，所以有些人已经把它排在了第二位而不是第三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城市与以前相比有所发展。在汗国东部城市的发展不太活跃，只有一些关于希拉巴德的相互矛盾的资料，洛戈菲特认为这里总共有3000人，但盖尔说根据"布哈拉官方统计资料"在19世纪末这里的人口就达到了2万人。另一方面洛戈菲特断定杜尚别城有2万人，而在马萨利斯基那里它仅被称作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整个汗国东部地区的领军城市、吉萨尔伯克或库什别吉所在地吉萨尔，1907年10月8日毁于地震，这年夏天居民们差不多完全离开了吉萨尔，他们和自己的伯克一起来到了卡拉塔戈城。根据里克默尔·里克默斯的描述，搬迁总共持续了6个小时，但却运走了伯克所有的家具甚至档案和带着镣铐的罪犯，所有的辎重车队需要整整一群骆驼、马匹和驴子。即使在汗国东部的城市中，例如在巴利朱安和库利亚布，伯克们也拥有招待客人的欧式陈设的房间。罗热维茨（1905年）感到库利亚布是一座设施最完善的城市（仅次于在"一切方面都显现出欧洲文明影响"的老布哈拉），主要街道上甚至辟有"某种类似人行道的道路"。[2]

429

替埃米尔歌功颂德的人认为在1892—1895年帕米尔划界之后部分居民从划归阿富汗的地区移居汗国，标志着布哈拉汗国的生活要比阿富汗富裕。也有人对1889年工作报告中（加尔金）所说明的这种移民发生的原因作出了另外的阐释，这就是"布哈拉臣民的现存生活条件虽然从欧洲的观点来看是不合格的，但对被压迫的不幸的恰尔维拉耶特（阿富汗突厥斯坦）居民而言毕竟是诱人的"[3]，于是就出现了一

---

[1]加尔金《突厥斯坦军区总参谋部军官野外考察区1889年布哈拉汗国和撒马尔罕州南部军事统计简述》，第15页。——Б. 加富罗夫

[2]罗热维茨《1906年布哈拉汗国南部和中部之行》，第620页。——Б. 加富罗夫

[3]加尔金《1889年苏尔汉谷地中部和南部地区军事统计概要》，第373页。——Б. 加富罗夫

种将移民继续进行下去的期望，尤其是布哈拉政府也迁就移民并将苏尔汉谷地及其附近地区的空地划给他们。另一方面，洛戈菲特指出1902年萨莱谷地居民开始移居阿富汗，到1909年这种移民已经具有了“群众运动”的性质，并且他认为这种状况的发生是由于阿富汗“把肥沃的土地划给了来自俄罗斯的移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移民

430 是双向的，双方政府都认为吸引移民对自己有利。[1] 洛戈菲特还指出了一个更奇怪的事实，这就是吉尔吉斯人从俄罗斯领地移居布哈拉汗国，移居到吉萨尔州、库利亚布州和库尔干秋别州，他们在这里必须同时向俄罗斯政府和布哈拉政府交税，虽然是通过吉萨尔库什别吉。一部分移民从事农业，一部分移民从事畜牧业。由此可见，至少吉尔吉斯人并不总是认为俄罗斯政权比布哈拉政权好。[2]

根据洛戈菲特的说法，在划界之后被并入布哈拉的舒格南、罗珊地区以及瓦罕的一部分地区，布哈拉埃米尔的统治“在短时间内便使得所有这些地区的居民完全破产”。帕米尔军队长官阿尔谢尼耶夫上校和政治代办处的秘书切尔卡索夫男爵也都是这样评论埃米尔统治的。从前逃往俄罗斯和阿富汗的舒格南人，在俄罗斯庇护下返回祖国，却遭到了伯克努开尔的暴力对待，他们“被反绑双手吊起来，用马鞭抽打”，霍罗格哨所的哥萨克救了他们。这引起了伯克和霍罗格哨所长官之间的冲突，在冲突期间伯克遭到软禁。在帕米尔地区，俄罗斯当局和布哈拉当局关于职权范围的争执后来也发生过。作为对伯克要求的回复“瓦罕一些激烈反对伯克的居民给他送来了一份声明，声称他们将杀

---

[1]B. B. 巴托尔德所指出的事实的确如此，但他在解释移民的原因时没有指出阿富汗和布哈拉汗国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据目击者观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包括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在内的从阿富汗北部迁往布哈拉汗国的移民运动的原因正在于此。但是追寻更好命运的移民们并没有找到这种更好的命运。在移居到布哈拉汗国的最初两三年中，他们曾获得过各种优待条件，但后来正如在布哈拉服务了14年之久的俄罗斯海关官员科瓦廖夫所指出的，“布哈拉政府对他们并不比阿富汗政府对他们好”。参见科瓦廖夫《阿富汗及其工业和贸易——布哈拉海关关长科瓦廖夫1907年考察报告》，第10－11页。——B. 罗莫金

[2]这是唯一涉及少数哈萨克人的事实，其具体情况巴托尔德没有进行阐述，这种事实的发生是一个例外。通常而言，中亚游牧民还是认为当俄罗斯臣民要比当布哈拉埃米尔和希瓦汗的臣民好。——B. 罗莫金

死任何一位到瓦罕来的布哈拉官员，然后移居阿富汗"。争执当然以有利于俄罗斯当局的结果而告终。革命前最后一位研究者 И. И. 扎鲁宾到那里的时候（1914 年），布哈拉政府还向霍罗格（罗珊乡和舒格南乡）、良加尔（瓦罕乡）和伊什卡希姆地区委派了伯克，但他的权力仅仅是名义上的，他根本没有参与管理。在 И. 斯卢茨基 1910 年 2 月发表的文章中[1]谈到了当时提出的向帕米尔地区居民征收赋税的问题。方案是由省税务局长伊帕托夫拟订的，但在总督委员会上没有获得通过。帕米尔地区的居民到 1914 年也不缴纳任何赋税，只是承担一些徭役，并且其中只有一项徭役——修路，可以说"是居民的沉重负担"。长官其中包括军队长官要付钱购买所有的食品，与扎鲁宾谈过话的达尔瓦兹伯克的儿子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一点。这些制度"对布哈拉和阿富汗塔吉克人而言"似乎根本难以置信，总起来看布哈拉和阿富汗臣民不能"幻想还能有这样的制度"。在俄罗斯突厥斯坦所有的居民中，帕米尔地区的居民如果把自己的命运与其邻居的命运相对比的话，他们最有理为自己的好运而庆幸。

431

在布哈拉东方专制制度不可动摇的基本特征一直持续到最后，这就是国家财产与君主个人的财产混为一体。甚至埃米尔在 1917 年 4 月宣言中宣布要进行的谨小慎微的改革也没有推行。由全体首都居民从自己中间选举出来的附属于卡迪卡延的 5 人委员会被取代，仅组成了由首都毛拉 5 位全权代表（韦基尔）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为卡迪卡延反对改革的支柱。地方管理的性质没有改变，直至 1920 年革命爆发伯克都靠居民供养，他们没有任何薪水。在个别州——达尔瓦兹、卡拉特、库利亚布和库尔干秋别，"伯克认为自己几乎就是独立的统治者"。但是俄罗斯因素的大量渗透还是使从前那种封闭的生活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虽然这种渗透只是局限于铁路沿线和海关沿线 2 俄里的范围内。俄罗斯贸易代表比征服时代活动家们所料想的更为活跃。1872 年彼得罗夫斯基指出布哈拉有俄罗斯商品但缺少俄罗斯商

---

[1]参见斯卢茨基《论向帕米尔居民征税问题》。——Б. 加富罗夫

人，布哈拉俄罗斯商品的交易都由土著人或鞑靼人来进行。到19世纪末布哈拉已经设立了俄罗斯银行和工贸机构。

追逐贸易利益对俄罗斯征服所起的作用有时并没有得到承认。例如，捷连季耶夫反对吉尔斯所提出的征服的目的"是给俄罗斯工厂提供产品（销售）市场"的观点，他证明说在征服时期"谁也没有想到要为莫斯科商人寻找市场的问题"。[1] 彼得罗夫斯基认为，开辟市场并非必须采取军事征服行动，从前打开市场也并未采取多少军事征服行动，并且中亚主要的政治和贸易中心布哈拉依然掌握在土著君主的手中。[2] 当时的沙赫里夏勃兹州和卡尔希是俄罗斯纺织品销售的边缘地区，在吉萨尔几乎没有俄罗斯商品，俄罗斯商品只是偶尔才到卡尔希而且很少。从沙赫里夏勃兹到卡尔希，人们都请彼德罗夫斯基吃用白沙瓦大米做的手抓饭。布哈拉当时已经完全被吸引到了俄罗斯市场中来，俄罗斯棉织品至少是英国棉织品的6倍。但彼得罗夫斯基仍然担心，由于俄罗斯商人的惰性和其竞争对手的强大有力，布哈拉市场将转入英国人或其阿富汗帮手手中。在布哈拉只有一名俄罗斯商人，但是"不停地往来穿梭于布哈拉和喀布尔、白沙瓦之间的阿富汗商人的店员"却有数十名之多。[3] 英国作者（斯克拉因）在19世纪末忧心忡忡地指出，这种"可怕的危险"已经因关税保护主义的实行和外里海铁路的修筑而得到了预防。

1894年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根据科别科委员会的结论撤销了俄罗斯—布哈拉边界上的海关并沿布哈拉—阿富汗边界设置了海关。这几乎完全阻挡了英印商品进入布哈拉，英印商品不得不经巴统、巴库和克拉斯诺沃茨克转运，输往汗国的俄罗斯商品"在短期内便达到了每年2000万卢布"。但是，俄罗斯商品销售区域的扩大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了，还在1889年加尔金就谈到苏尔汉谷地"是一个有益于工业产品尤其是俄罗斯工业产品销售的市场"，虽然"当地商人对商品过

[1]比较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324页。——Б. 加富罗夫

[2]彼得罗夫斯基《我的布哈拉之行》，第209－210页。——Б. 加富罗夫

[3]彼得罗夫斯基《我的布哈立之行》，第240页。——Б. 加富罗夫

度的提成”危害了这种贸易的发展。[1]

从前布哈拉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采取了缩减与阿富汗贸易并将东部地区的产品吸引到古扎尔、卡尔希和布哈拉来的措施，这也有利于俄罗斯人。加尔金谈到“由于布哈拉政府禁止农产品输往阿富汗境内”，所以帕塔－吉萨尔变成了一个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贸易点，“由于与阿富汗贸易的萧条”，位于帕塔－吉萨尔附近的渡口很少被利用。[2]

俄罗斯所面临的越来越清晰的历史使命是成为欧亚之间陆路交往以及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居间者，政府所采取的某些开放或关闭市场的措施，其中包括军事征服，仅仅是在实现俄罗斯这一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本能的步骤。在修好了大道又敷设了通过西伯利亚的铁路之后，世界贸易路线由前亚经突厥斯坦到达远东的时代便一去不复返了。由此中国突厥斯坦对世界文明的意义仅仅是从前的一种特殊现象。而俄罗斯突厥斯坦对完成另一种还没有完成的使命——建立陆路印欧贸易通道，则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俄罗斯贸易的先驱们竭力摆脱任何政府的政策来到这里，只有到了17世纪60年代莫斯科公国才将开辟经中亚前往印度商路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还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商人列昂季·尤金就“为做生意而在布哈拉和印度待了7年”。征服时代的活动家明白，俄罗斯人被贸易利益吸引到了亚洲，虽然有时是不自觉的。罗曼诺夫斯基就写道，俄罗斯与中亚的贸易“还在条件恶劣时就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尤其是当从那里获得棉花变得有利可图时。例如，从1825年到1850年，俄罗斯与欧洲的贸易增加了43%，而与亚洲的贸易发展则超过了300%”[3]。正是与布哈拉贸易的意义在1866年特别清晰地显现出来，当时罗曼诺夫斯基为了自由发展商队贸易甚至在战时采取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措施。

敷设从布哈拉经卡尔希到铁尔梅兹的铁路更提高了布哈拉汗国主

433

[1]参见加尔金《1889年苏尔汉谷地中部和南部地区军事统计概要》，第377页。——Б. 加富罗夫

[2]加尔金《1889年苏尔汉谷地中部和南部地区军事统计概要》，第381页。——Б. 加富罗夫

[3]罗曼诺夫斯基《中亚问题札记》，第117页。——Б. 加富罗夫

要城市的商业意义，有损于撒马尔罕的利益。阿富汗人以及俄罗斯人和英国人的政治经济顾虑妨碍了下一步任务的实现。但在1907年英俄协议签订之后，俄印铁路的问题立即被提了出来，而且在当年《突厥斯坦公报》第200期（11月14日）上已经刊载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当时曾推测，英国人打算修筑遍布阿富汗境内的铁路网，从那时起这一想法被事实推翻了，但文中提出的另一种设想却被证实了，这就是阿富汗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再是“两艘铁舰之间的瓦罐”。总起来讲，这个完全符合20年前实际情况的比喻，现在已经丧失了任何意义。不用说已经变成了苏联的俄罗斯，甚至就连英国现在不仅同阿富汗而且同印度也不能用以前那种语气说话了。在突厥斯坦如同在印度一样，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没有军事征服、没有哪怕是短暂的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的征服，就不能完成历史任务[1]，但是以往历史上这些阴暗的篇章当然遮挡不住更加光明的未来之路。

437

〔1〕参见前面编者绪论，第12页和注释20。——Б. 加富罗夫

13　从有史以来到俄罗斯人到来时中亚的种棉业

公元6世纪中国人对广义突厥斯坦(包括现在的中国突厥斯坦地区)的棉花文明进行了最初的十分明确的记载。关于最靠近中国的高昌(现在的吐鲁番地区)地区的种棉业,公元5—6世纪3个南方王朝(南朝)史书(《南史》,卷79)的叙述与梁朝(502—557年)专门史书《梁书》(卷54)中的记载几乎是相同的。根据沙畹的译文[1],《南史》中说在高昌有"一种植物,其果实很像茧。茧里面有像线一样的纤维,名为白叠子[2]。土著人采集之后用它织成一种非常柔软洁白的布"。根据夏德和柔克义的译文[3],《梁书》中说:"在高昌有一种大量生长的植物,其果实像丝茧。茧中有丝状的东西,像薄纤维,名为白叠子。土著人用它织成柔软的白布,并将这种布运往市场(中国)销售。"从最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在吐鲁番棉织品的生产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要,而且是为了出口。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记载7、8世纪历史(后来中国与突厥斯坦的联系变得松散起来)的《唐书》即唐王朝(618—907年)的历史中,也只有在记载吐鲁番地区时才谈到种棉业,并且也使用了白叠这个词。[4] 如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棉花文明是在9世纪或10世纪才从中亚传到中国本土的。[5]

实际上中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棉花的?这一问题是与对一个

---

〔1〕沙畹《文件》,第102页。

〔2〕正确的写法是бодецзы,也参见后面注释10。——Ю.布列格利

〔3〕赵汝适《诸蕃志》,夏德、柔克义译本,第218页。

〔4〕沙畹《文件》,第102页;也参见比丘林《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Ⅲ,第209页,这里写的是白擿байцзе。

〔5〕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2卷,第192页。

438 中国术语的解释密切相关的。[1] 根据夏德和柔克义的说法[2]，音义为白叠的象形文字并不与固定的中文词汇联系在一起。此外，在转写的时候也并不总是使用同样的象形字，而是使用各种各样的意义不同的象形文字，虽然这些象形文字的发音都一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象形文字是在翻译外国词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并且他们还推测这个外国词就是突厥语中的帕赫塔 пахта，按照拉德洛夫词典的解释帕赫塔即“棉花，裂开的棉花”，按照布达戈夫词典的解释，帕赫塔即“棉花，棉絮”。我试图在另一处[3]证明，帕赫塔这个词从发音来看不是突厥词，而是来源于一个已经消失的意为“践踏、挤压、压紧”的伊朗动词的被动形动词形式，也就是说它表示的不是植物也不是纺织品，而是棉絮。汉语中的白叠一词是否与这个词有关仍然未被证明。在中国文献中白叠一词在东汉王朝史中(《后汉书》)，也就是在公元25年—220年间已经出现，在叙述南部中国云南省的异族人(卷116)[4]时，提到他们有这样一种布。如果接受夏德和柔克义的理论，那就必须假设中国人在与中亚进行最初交往时便了解了那里的种棉业，为了对它进行表述他们吸收了一个伊朗词，后来又用这个词来称呼在云南发现的布，当然云南的种棉业是从棉花的故乡——近邻印度直接传入的。从更晚些时候的史料《魏书》(6世纪)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白叠一词被认为是汉语，云南的土著人把自己的布称作兰干 ланьгань。这一切表明汉语的白叠与帕赫塔一词相近的说法是有争议的，尤其是用于翻译第一个音节的象形文字即便不总是那么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的是一种普通意义——“白色的”，用“白色的”一词来做棉织品的修饰语，可能只有

[1]不久前刚刚获得的考古文献证明早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亚已经有了棉花。撒马尔罕、塔什干和花剌子模的发掘工作证明6—8世纪中亚存在着种棉业。参见斯普里舍夫斯基《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些穆格山文物》(其中有图书目录)；罗扎诺夫斯基《公元最初几个世纪费尔干纳墓葬建筑中植物残余的属性》。——Б. 斯塔维斯基

[2]赵汝适《诸蕃志》，夏德、柔克义译本，第218页。也参见评论，巴托尔德《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会论丛》，第21卷，第168页以下。

[3]巴托尔德《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会论丛》，第21卷，第168页以下。

[4]引自沙畹《文件》，第102页；也参见赵汝适《诸蕃志》，夏德、柔克义译本，第218页。

发音为叠的第二个象形文字才是纺织品本身的译名。[1] 汉学家 Э. 布列特施奈德[2]把白叠布翻译成"用白叠织成的布"。的确，无论是叠，还是中国人在云南听到的兰干这种名称可能都没有从印度语中获得解释，而我们最指望能从中获得解释的语言便是印度语。

希腊人在薛西斯远征的时候便注意到印度士兵穿着一种用木材果实织物做成的特殊的衣服（希罗多德，Ⅲ，第 106 页；Ⅶ，第 65 页）。可能说的是吸水棉 gossypium arboreum，这是一种只有在热带地区才能遇到的植物，这种植物现在主要产于美洲。在公元前 694 年的亚述手稿中就提到了木本植物棉花[3]，当时使用的术语是"丝树"（比较与此相反的德文词棉花 Baumwolle，树丝之意）。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无论是亚述利亚人还是希腊人都不知道印度术语是什么。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当与印度的贸易关系活跃起来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可能起源于梵文卡帕萨 karpasa 的词[4]，这些词是与印度海路和陆路交往发展的反映。阿拉伯语中的库尔素福 курсуф 或库尔素法 курсуфа，科普特人的 korsipion 是从海路传来的词，希腊埃及语中的 gossypion 一词（拉丁语的 gossypium）就是从这里来的。通过商队贸易从东方传播到西方的词汇更接近梵语的最初形态。波斯词基尔帕斯 кирпас、由此产生的阿拉伯词基尔巴斯 кирбас，复数形式为卡拉比斯 карабис、拉丁词 carbasus 以及其他词汇都是这样产生的。马来人的卡帕斯 капас 一词也是从梵文词那里借用来的，在白叠一词出现之后很久这个马来词出现在汉语中，被翻译成古白或吉白，大概从公元 6 世纪开始西方人就没有完全搞清楚印度棉布与当地麻或亚麻织物的区别，他们常常使用同样的词来称呼它们，仅仅到了后来才只用其中的某些词来特指棉布。某些词的起

[1]在古代表示这个术语的象形文字发音为帕克叠（b'pkd'iep，参见卡尔格林《语音学》，第 861 页、880 页），因此 B. B. 巴托尔德认为这个词与帕赫塔无关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Ю. 布列格利

[2]《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 2 卷，第 192 页。

[3]参见金《早期提到的棉花》，第 339 页以下；赵汝适《诸蕃志》，夏德、柔克义译本，第 218 页；赫沃斯托夫《希腊罗马所属埃及的工业和贸易组织概论》，第 131 页。

[4]关于这些词，参见舒雷德《古代印地语文化研究词典》，S. V，《棉花》。

源至今尚未弄清。顺便提一下，也不知道波斯名词佩姆贝 пембе、巴列维语中的名词帕姆巴克 памбак 是如何产生的，希腊名词 bombukion、俄罗斯名词 бумага 是从哪里来的。在巴列维语中，памбак 这一名词被解释为"一种树，其果实是一种丝，可以用来做衣物"。波斯名词 bombukion 的含义是柔软，在表达堵上耳朵之意时经常使用这个词，也就是说帕赫塔 пахта 和佩姆贝 пембе 这些词所表示的并不是植物也不是织物，而是棉絮。也不清楚转变为罗马语和英语（棉花 cotton）的阿拉伯名词库敦 кутун 或库吞 кутн 起源于何处。俄文名词库特尼亚 кутня 就起源于这个阿拉伯词，根据达里词典的解释，库特尼亚是"亚洲的一种名为阿拉贾的半丝制纺织品"。在古代名词中最与它接近的是表示织物而不是植物和原料的希腊名词othonion，复数形式为othonia。也有人说 othonia 产生于卡尔帕斯半岛。

关于种棉业在罗马帝国后来在拜占庭帝国以及与其相邻的萨珊波斯帝国传播的广泛程度我们没有准确的资料。相对来讲，谈论最多的是埃及的棉纺织业，从事这种生产的中心地区是位于尼罗河以西的巴赫纳萨城[1]，该城距开罗和苏尤特距离大致相等。但是与亚麻和毛纺织业相比埃及的棉纺织业只占据次要地位。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都既没有谈到现在已经在埃及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棉花出口问题[2]，也没有谈到棉纺织品的出口问题。在所有哈里发国家中，大量出口棉纺织品的可能只有突厥斯坦。突厥斯坦的棉纺织工业是波斯模仿的对象。顺便提一下，被称为"梅尔夫"的棉纺织品是在波斯西部的胡齐斯坦制作的。[3] 这一切都表明在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的制作方面，突厥斯坦不大可能向穆斯林征服者学习什么。埃及对突厥斯坦工

---

〔1〕贝克《艾尔－巴赫纳萨》，第 601 页；贝克《埃及》，第 17 页。

〔2〕根据 1908 年的统计资料，埃及的出口总值为 2135 万 5673 埃及磅，其中棉花、丝和其他纺织品占 717 万零 643 埃及磅，棉花的栽种面积大约占总栽种面积的 20%（特里奇《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手册》，第 144 页以下）。

〔3〕马克迪西《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第 416 页$_{11}$（指注释 11。下同。——译者）。

业的影响可能只表现在亚麻织物的制作方面。[1] 可能，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使得突厥斯坦与西亚之间的密切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因此间接地推动了突厥斯坦的种棉业和棉纺织业取得更大的成就。[2]

总而言之，10 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们的著作无论对突厥斯坦文明史而言还是对突厥斯坦棉纺织工业史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史料。关于这个时代我们了解的比其他之前和之后的时代都要多得多。在资料分配不平衡的条件下往往不得不放下一些问题不作解答，如这一时期的作者们所谈论的那些条件是怎样产生的？是何时产生的？它们又是如何、何时转变到另一方面的？此外，也不总是能搞清楚哪些记载是对棉纺织品的记载。如果库敦 кутун（波斯语基尔帕斯 кирпас）一词一直用来表示“棉花”之意，那么贝兹 безз 一词则既可以表示丝织品、麻织品，也可以表示棉织品等（中亚的巴兹 баз 或标兹 боз，俄文的“粗平纹布 бязь”也是如此），如同希腊名词 byssos 最终大概只有在 2 世纪末或 3 世纪初才被用于表示棉布一样。[3]

441

织布业属于手工业生产，所以不是集中在大的中心城市，而是集中于个别的工业村镇，有时纺织品以其所在的加工地来命名，甚至在其他地区加工的布匹也叫这个名字。在撒马尔罕附近的地区中韦达尔[4]城（或村）便以其纺织品而闻名，该城位于撒马尔罕西北距撒马尔罕 2 法尔萨赫（伊本·豪卡尔的说法）或 4 法尔萨赫（萨曼尼的说法）[5]，这里居住的主要是阿拉伯人。根据伊本·豪卡尔的说法[6]，该城“制

---

[1]关于此，参见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 2 册，第 246 页和 526 页（本版，第 1 卷，第 295 - 296 页。——Б. 加富罗夫）。关于达比吉布（дабики），现在也参见贝克《达比克》，第 922 页（这是一种带有金丝的亚麻）。

[2]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厥斯坦使用阿拉伯名词纳达夫来表示“梳棉工”。比较巴托尔德《1365 年撒马尔罕的民族运动》，第 9 页。由词根库吞 кутн 形成了表示“棉纺织品销售者”的卡坦 каттан 一词，由词根贝兹 безз 形成了贝扎 безза 或贝扎兹 беззаз 一词。

[3][illegible]沃斯托夫《希腊罗马所属埃及的东方贸易史》，第 139 页。

[4]关于韦达尔，比较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 2 册，第 97 页（本版，第 1 卷，第 146 页。——Б. 加富罗夫），那里引用了一些史料。

[5]1 法尔萨赫大致相当于 6 俄里（一小时能穿越的空间）。

[6]伊本·豪卡尔《诸地形胜》，第 403 页。在布哈拉地区的达布锡亚城也加工韦达尔纺织品，该城位于现在的济亚乌德金附近。比较马克迪西《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第 324 页$_{18}$。

造韦达尔棉布,人们穿着的是未经剪裁的整块的布。在呼罗珊[1]不论是埃米尔、维齐尔、卡迪、富人,还是平民、士兵,在冬装外面都穿着韦达尔布。他们认为这是优雅和考究的象征,因为这种布从颜色上看一般趋向于黄色,穿起来又柔软又舒服。这种布织得既密实又细腻。一匹布的价格为2第纳尔到20第纳尔不等。5年来,我不止一次地穿过这种纺织品。有人从伊拉克(巴比伦)来买布,将它们运回去,那里的人以穿着这种布而自豪"。

布哈拉城也以生产某种纺织品而著称,在堡垒旁边[2],位于堡垒和大清真寺之间有一座专门制造纺织品的工场,纳尔沙西[3]在布哈拉史中对该工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但其中没有谈到这种纺织品是由什么材料织成的。顺便提一下,因为也可以用它来编织地毯,所以这种纺织品可能未必只是棉布,虽然人们也用它做衣服,并且说"无论是国王、埃米尔,还是长官、公职人员都穿着用这种布做的衣服。布有红色的、白色的和绿色的"。这位历史学家(或者他的继承人)补充说:"现在各地的赞达尼奇 занданичи 布比这种纺织品更著名。"[4]后一种纺织品毫无疑问是棉纺织品,在描写布哈拉以北现在的赞达纳村时谈到了这种棉纺织品,说从这里运出了所谓的赞达尼奇,即棉纺织品,这种棉纺织品因其产于赞达纳村而得名。[5] 这里的"布匹质量很好,同时能够大量生产。在许多布哈拉村庄都用这种棉花来织布,这种布也被称作赞达尼奇,因为它最早产于这个村庄。由那种棉花织出来的布被运往各地,例如运往伊朗、法尔斯、克尔曼、印度半岛以及其他地区。所

[1]就广义而言,包括突厥斯坦在内的阿拉伯总督区也被称为呼罗珊。

[2]关于布哈拉的地貌,参见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2册,第111页以下(本版,第1卷,第160页以下。——Б.加富罗夫)。

[3]关于这位作者及其继承人,参见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2册,第15页以下(本版,第1卷,第59页以下。——Б.加富罗夫)。

[4]纳尔沙西《布哈拉史》,舍费尔版,第18页;雷科申译本,第29页以下。

[5]正如现在根据破译的写在一块丝绸上的7—8世纪的粟特铭文所表明的,赞达尼奇这个名词最初表示的是丝织品,只是从10世纪末开始赞达尼奇纺织品可能才成为棉布。参见夏波德、海宁《赞达尼奇》;别列尼茨基、边托维奇《中亚丝绸纺织史论》。——Б.斯塔维斯基

有的达官显贵和国王都穿这种布做的衣服，他们以购买吉巴赤[1]（柔软如缎的纺织品）的价格来购买这种布”。这里还补充说，瓦尔丹纳（现在的瓦尔丹津）邻近的村庄也出产高质量的赞达尼奇布。[2] 布哈拉以东的工业村镇沙尔格和伊斯基什克特也出口棉花。[3]

确定纳尔沙西记载的具体历史时代比确定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的历史时代要困难一些，因为不总是能弄清楚哪些记载是纳尔沙西的（10 世纪），哪些记载是其继承人的（12 世纪下半叶前）。在这种情况下，10 世纪的地理学家没有谈到赞达尼奇纺织品，而萨曼尼[4]（12 世纪中叶）则谈到了这种纺织品，雅库特[5]根据萨曼尼的记载也谈到了这种纺织品，这些事实显然就具有一定的价值。赞达尼奇这一名称可能流传了很久。在“布哈拉和尤尔格捷济克人”即布哈拉和希瓦的塔吉克商人 1616 年和 1619 年经阿斯塔拉罕运往喀山的商品中，有各种被统称为“赞捷尼”的纺织品，赞捷尼有红的、花的、窄幅的、宽幅的，以及谢缅季等等。[6] K. A. 伊诺斯特兰采夫[7]证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由赞达纳村的名字形成的名词，这可能是有根据的。根据 П. 萨瓦伊托夫的著作《古代国王用具、服饰、武器、盔甲和马具概览》，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赞捷尼”一词表示的是丝织品之意，当然把棉纺织品的名称转移给丝绸不是不可能的，但萨瓦伊托夫没有引用论据来进行证明，并且就其实质而言在 17 世纪布哈拉和希瓦的丝绸被运到俄罗斯的可能

443

[1]常常被解释为“锦缎”（伊诺斯特兰采夫《法蒂玛哈里发隆重的出行》，第 42 页；贝克《迪巴赤 Dibadj》）。韦达尔布也可与吉巴赤相媲美。10 世纪末的地理学家马克迪西听说，巴格达的一位苏丹称其为呼罗珊吉巴赤（马克迪西《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第 324 页$_{19}$）。

[2]纳尔沙西《布哈拉史》，舍费尔版，第 13 页以下；雷科申译本，第 23 页以下。

[3]纳尔沙西《布哈拉史》，舍费尔版，第 11 页和 13 页；雷科申译本，第 21 页和 23 页。关于地理位置参见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 2 册，第 101 页（本版，第 1 卷，第 150 页。——Б. 加富罗夫）；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灌溉史论》，第 120 页。

[4]《谱系之书》，马格利乌斯版，第 280 页 a。

[5]《地理辞典》，Ⅱ，第 952 页$_{15}$。雅库特称这些纺织品非常著名。

[6]《莫斯科罗斯与波斯外交和贸易关系古文献》，Ⅲ，第 277 页以下，第 641 页以下。

[7]《古代纺织品简史》，第 84 页以下。

性也不大。[1] 在各种“赞捷尼”名称中令人费解的还有“谢缅季”一词。在武列尔斯词典中说“谢缅德”是位于撒马尔罕附近一个乡村的名称,可能谢缅季纺织品就是在那里加工的,虽然在我所知道的东方地理学家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这个名称,可能在 В. Л. 维亚特金所研究的寺院不动产文件中也没有这个名称。[2]

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纺织品同样齐名的是梅尔夫的纺织品。伊斯塔赫里谈到,梅尔夫出产一种棉花,这种棉花可以与(任何一种)柔软的棉花相媲美,也生产出口到各国的纺织品。[3] 马克迪西也谈到棉花是梅尔夫的出口货物之一。[4] 在10世纪末一位佚名的波斯地理学家那里,我们也发现了关于梅尔夫出口一种“高质量棉花”(或瓦塔、佩姆贝 пембе)的记载。[5]

最后,根据伊斯塔赫里的说法,从花剌子模(现在的希瓦及希瓦地区)出口“许多棉织品和毛织品,它们被运往各个国家”[6]。很可能,至少这些商品中有一部分被运到了土耳其人那里,花剌子模与他们的贸易非常活跃。[7] 马赫迪西[8]更明确地谈到了棉花(当然是以棉布的形式)从沙什即塔什干地区出口到土耳其人那里的问题。可能那些从费尔干纳和伊斯菲扎布即现在的奇姆肯特地区出口的“白色纺织品”

---

[1]丝主要产于波斯。在18世纪Г. Ф. 米勒谈到赞捷尼时说它是棉布。里特尔、格里戈里耶夫《自然地理学 直接与俄罗斯往来的亚洲诸地理 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第2册,第377页。

[2]参见维亚特金《撒马尔罕省历史地理学资料》。

[3]伊斯塔赫里《道里邦国志》,第263页。В. А. 茹科夫斯基《外里海边区的古迹老梅尔夫遗址》中的译文(不完全准确),第20页。在伊本·豪卡尔的文中(316)写的略有不同:“这种在所有国家都被称为梅尔夫棉的棉花非常柔软”(比较《土库曼人和土库曼史资料》,Ⅰ,第174页。——Б. 加富罗夫)。

[4]马克迪西《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第324页$_6$。

[5]原文和茹科夫斯基的译文《外里海边区的古迹老梅尔夫遗址》,第21页。在9世纪末地理学家雅库比就已经谈到了不知道用什么材料织成的“高质量”的梅尔夫纺织品(《诸国志》,第279页下面),可见梅尔夫纺织品那时已经从呼罗珊的其他纺织品中脱颖而出了。

[6]伊斯塔赫里《道里邦国志》,第304页,以及伊本·豪卡尔《诸地形胜》,第354页$_{15}$。

[7]比较伊斯塔赫里的说法,第305页,他说花剌子模人的所有福祉都是建立在与土耳其人贸易基础之上的。

[8]马克迪西《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第325页$_{12}$。

也是棉纺织品。[1]

关于以后的情况我们只有很少的、零星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不可能写出突厥斯坦种棉业的历史。中文史料的记载具有一定的价值,在中文史料中把当地的术语翻译成了汉语。曾于1220年与成吉思汗一起到过撒马尔罕的中国大臣耶律楚材说,那里所有的衣服都是用白颜色的屈眗(ku-sun)做成的。[2] 屈眗一词与阿拉伯的卡斯、卡萨姆[3]或突厥斯坦的古扎一词相近,古扎就是处于植物时期的棉花和棉铃。关于古扎 гуза 一词的起源及其命运还不十分清楚。可能它更早的形式是阿拉伯语中的贾乌扎克 джаузак 或贾乌扎卡 джаузака,即"棉花"(外来词)和土耳其语中的库扎戈 кузаг,植物荚、棉铃、松柏球果都叫做库扎戈。[4] 甚至在13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对棉花还了解较少。中国的长春真人[5]在描写他于1221年经过的伊宁边区时,提到了棉花。他把棉花叫做"种羊毛"。中国人得到了七束做御寒衣,柳花鲜洁细软,除了可做衣服之外,还可为线为绳,为帛为绵。还提到一种叫做都鲁麻[6]的纺织品,翻译者认为它就是现在中国突厥斯坦的一种叫做托尔麻的纺织品[7]。在描述撒马尔罕时,长春真人说下层人用白么斯布盘在头上。翻译者认为这就是穆谢林,一般认为穆谢林得名于摩苏尔城,这里"首次开始制作这种漂亮的薄棉布"。[8] 但马可·波罗在描述摩苏尔时把"金丝"织物称作"摩苏林"。对此俄文译者只是指出,"这个名称可能不总是指同一种纺织品"[9]。在一种马可·波罗[10]的版

[1]马克迪西《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第325页15。

[2]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21页以下。

[3]在伊本·贝塔尔(死于1248)的药用和食用植物专业词典中引用的是其同义词库吞 кутн;左特哈伊梅尔译本,《药物学集成》,Ⅱ,第304页。

[4]比较武列尔斯的《词典》和布达戈夫的《词典》。

[5]关于长春真人的旅行,参见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2册,第486页以下(本版,第1卷,第517页以下。——Б. 加富罗夫)。

[6]正确的写法是秃鲁麻 тулума。——Ю. 布列格利

[7]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70页。——Б. 加富罗夫)。

[8]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89页。

[9]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米纳耶夫译本,第32页。

[10]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米纳耶夫译本,第33页。

本中描写穆什和马尔金时谈到了棉花和棉织品。如果布列特施奈德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在 13 世纪突厥斯坦已经有了从西部运来的纺织品,而在 10 世纪时还只谈到从突厥斯坦出口纺织品。但是穆谢林被运到撒马尔罕供下层人使用的可能性很小。更合乎情理的是么斯就是标兹 бoз(标布)一词的转写。

445

在明朝时期(1368—1644 年),主要是在 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帖木儿和帖木儿帝国时期,中国人获得的关于棉花以及棉花文明的资料并不明朗清晰。用库桑 кусань 一词来表示植物,可以把这个词视为是对库扎戈 кузаг 或古扎 гуза 的更准确的音译,但谈到纺织品(在描述吐鲁番及其附近地区)时,则说它是用一种生长在这种植物上的野生蚕茧制作的。还补充说,在进行交易时用棉织物来做交换单位。[1] 我们在后来 18 世纪卡尔梅克国王从东突厥斯坦的城市中征收棉织物作为赋税这一做法中看到了同样的现象。[2] 在描写撒马尔罕的情形时还谈到了棉织物,人为地创造了一个中国名词黄如意布 хуажуйбу 代替了突厥名称的音译,这个名词的字面意思是"用花织成的布"。[3]

当 13—14 世纪蒙古帝国统治时期欧洲商人开始来到中亚并经中亚地区前往中国时,他们感兴趣的主要还是丝和丝织品而不是棉纺织品。在一本专门研究这种贸易的英文著作[4]的索引中,甚至根本没有"棉花"这个词(却有好几个地方引用了"丝绸"一词),虽然在谈到"亚麻布"[5]这种纺织品的名称时使用了打上问号的棉花一词。可能那里所谈到的普通纺织品(普通材料)指的就是棉纺织品。[6] 但是中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却在自己的书中多次提到棉花,特别

[1]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 2 卷,第 192 页。

[2]伊诺斯特兰采夫《古代纺织品简史》,第 91 页以下;那里引用了史料。

[3]布列特施奈德《东亚资料中的中世纪研究》,第 2 卷,第 271 页。
该著的第一版中有错字:хуа-туй-бу。——Ю. 布列格利

[4]于勒《契丹》,第 2 卷。

[5]于勒《契丹》,第 1 卷,第 157 页。

[6]于勒《契丹》,第 1 卷,第 297 页。

是在描写他所见所闻的东突厥斯坦时[1]（他没有到过现在俄罗斯的突厥斯坦，只有他的父亲和叔叔到过布哈拉）。有意思的是他还提到[2]了一种叫“波卡兰”或“布克拉姆”的纺织品，并说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波卡兰”是在亚美尼亚的埃尔津普坦城制造的，如果这个在不同时期表示不同种类纺织品的名称的确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3]起源于一个布哈拉城市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便拥有了一个中亚棉纺织业影响西亚工业的新例证。

446

突厥斯坦发生的政治事件不能不对经济生活条件包括种棉业和棉纺织工业产生影响，其中蒙古人在 1221—1223 年彻底摧毁梅尔夫这样的事实也不可能不留下什么痕迹就悄无声息地过去，梅尔夫被蒙古人摧毁后直到 15 世纪初期之前一直都是一片废墟。但是在泽拉夫善河地区和阿姆河下游地区棉花加工业和棉纺织品制造业可能从来都没有被中断过。游牧汗国统治地位的确立、经过中亚的商队贸易的衰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与其他国家文明交往的减少是否降低了纺织品的质量，对这一问题还不能明确地断言。[4] 在帖木儿时代尽管伊朗东部和突厥斯坦在科学（除了神学以外）和艺术（帖木儿时代建筑的设计师都是设拉子人、伊斯法罕人、大不里士人）领域完全依附于伊朗西部，但仍然有“大量成品和半成品棉纱以及染成各种颜色用来做衣服的棉布”从呼罗珊运往波斯西北部的主要贸易中心苏丹尼亚。[5] 布哈拉和波斯商人不仅把“库马奇 кумач[6]”（大概是个土耳其词，被引用[7]的方言形式有库马奇 кумач、库马茨 кумац、库马斯 кумас、库马什 кумаш）运往莫斯科公国，而且还在俄罗斯境内的阿斯特拉罕省、喀山

---

[1]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米纳耶夫译本，第 69 页以下。（喀什噶尔、莎车、和田等。）

[2]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米纳耶夫译本，第 27 页。

[3]伊诺斯特兰采夫《古代纺织品简史》，第 85 页。

[4]关于种棉业和棉纺织品加工的资料即使在一部描写俄罗斯征服前布哈拉汗国的最优秀的著作中也是匮乏的，这部著作就是 H. B. 哈内科夫的著作（《布哈拉汗国概要》）。

[5]克拉维约《克拉维约东使记》，斯列兹涅夫斯基版，第 178 页。

[6]红布。——译者

[7]拉德洛夫《突厥方言词典试编》，Ⅱ，第 1048 页。

省和维亚特卡省为自己的纺织品建立了染坊。[1] 1740年前后到过俄罗斯及与其邻近的波斯和中亚地区的英国商人指出,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与布哈拉和希瓦的贸易完全终止了(大约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奥伦堡,后来与中亚的所有贸易都集中到这里来了),只有与波斯的贸易还在继续。[2] 希瓦和布哈拉依然像从前一样存在着种棉业,但希瓦的棉花加工业是微不足道的。[3] 布哈拉的贸易与从前相比已经急剧地衰落了。在出口到波斯的商品中只有棉纱和细平布(callicoc),同时布哈

447 拉人却从波斯进口纺织品其中包括布匹。[4]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当伊斯兰世界文明彻底衰落、欧洲工业的统治地位最终确立起来之后,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所有东方产棉国从埃及到印度的棉花都是以原料的形式出口的,在西欧和俄罗斯加工之后又以布匹的形式返回其原产国。[5] 当然,中亚的棉花也出口到俄罗斯。在18世纪下半叶1磅未加工的棉花的价格为10至15戈比,1磅棉纱的价格是30至40戈比。[6] 大概这些价格后来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俄罗斯统治时代,塔什干1磅棉纱的平均价格是40戈比。[7] 在希瓦未加工的棉花和棉纱全部都被俄罗斯人收购去,棉织物除了从俄罗斯进口之外还从布哈拉进口。吉尔吉斯人从希瓦人那里购买的长衫和纺织品一部分是在希瓦和布哈拉生产的,一部分是在俄罗斯生产的。[8] 在俄罗斯统治时代,就当地棉花的等级来看,塔什干和

---

[1]瓦尔扎尔《棉纺织工业》,第336页。

[2]汉威《英国贸易》,第1卷,第74页、84页。

[3]汉威《英国贸易》,第1卷,第241页。

[4]汉威《英国贸易》,第1卷,第243页。

[5]例如比较一篇论文中有关波斯的资料:哈夏布《现代波斯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第176页以下,其中谈到在一系列出口商品之中占第一位的是棉花,在进口商品之中占第一位的是棉织品。也参见哈内科夫《布哈拉汗国概要》,第172页,书中说在从布哈拉出口到波斯的商品中有棉纱,并且补充说汗国出口的成品(可能这种成品也属于纺织品)很少,因为它们在波斯很难销售。

[6]佩卡尔斯基《彼得·伊万诺维奇·雷奇科夫的生平及其文学通信》,第105页。

[7]科斯坚科《突厥斯坦边区》,第3卷,第35页。

[8]巴西纳《旅行》,第243页。

浩罕的棉花等级要低于布哈拉和希瓦的棉花。[1] 浩罕汗统治时期在费尔干纳修建的灌溉工程[2]应该促进了种棉业的发展，但我们当然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促使费尔干纳的棉花出口达到占突厥斯坦棉花出口总量的2/3多（通常是3/4或者甚至达4/5）的那些条件，都是从80年代开始由俄罗斯统治时代创造的。在科斯坚科的《突厥斯坦边区》一书中（1880年），费尔干纳在突厥斯坦的产棉区中被放在第一位，但当时却并没有对费尔干纳抱有什么特殊的指望，一般认为中亚能够提供300万普特的棉花，其中200万普特来自布哈拉，50万普特来自希瓦，只有50万普特来自俄罗斯治理下的所有地区[3]包括费尔干纳。在1897年[4]所获得的总数为250万普特的棉花中产自费尔干纳的棉花占了200万普特。因此在占领外里海州（现在的土库曼）时俄罗斯人根本没有看到10世纪时曾在梅尔夫地区繁荣一时的种棉业，这里的棉花文明是在俄罗斯统治下复兴的。[5]

448

451

---

[1]科斯坚科《突厥斯坦边区》，第3卷，第33页。

[2]关于这些灌溉工程，参见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灌溉史论》，第20页以下，第24页和第136页。费琴科（《突厥斯坦游记》，第1卷，第2册，第39页和64页）在把自己观察的结果（1871年）与菲利普·纳扎罗夫《关于中亚某些民族和土地的报告》在1813—1814年看到的情景进行对比之后，指出19世纪费尔干纳的播种面积急剧地扩大了。

[3]科斯坚科《突厥斯坦边区》，第3卷，第30页。

[4]这一年《突厥斯坦公报》上关于种棉业的文章，第6期以下。

种棉业和棉花贸易。——Б. 加富罗夫

[5]比较《外里海州概述》，1882—1890年和1890—1896年。阿什哈巴德，1897年。

塔吉克人历史概论[1]

[1]有关塔吉克人和塔吉克斯坦历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中亚民族历史的文献和研究成果索引，参见加富罗夫《塔吉克民族简史》，第492－538页；《中亚民族》，I，第701－704页。——B.罗莫金

1　花剌子模人和粟特人[1]

现代突厥斯坦的土著居民是属于伊朗语系的民族集团。我们在这里不谈关于伊朗部族的发祥地、它在古代的地域分布以及在中世纪这些地域经常缩小等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问题，只限于确定一个事实，即在从公元前6世开始的1500多年间，在现代突厥斯坦有两个起源于伊朗的文明民族——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在保存于波斯波利斯遗址附近的大流士（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86年）陵墓上雕刻着这位国王所辖臣民的画像，其中就有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的画像。关于这两个民族的语言，我们只拥有他们快消失时期的一些略准确的信息。这些信息存在于公元1000年花剌子模人比鲁尼用阿拉伯语编撰的关于各民族纪年的著作中。[2] 在谈到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的历法时，比鲁尼引用了当地月份、日期和宗教节日等的名称。根据这些名称可以勾勒出这两种语言与其他语言比如说与波斯语相比较的一些方言特点。

在中亚的两个农业和文明的伊朗民族中，花剌子模人在政治生活中保持了比较长时期的独立性。在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形成之前，中亚的政治优势地位属于花剌子模人。花剌子模人曾一度臣服于波斯人，但后来便摆脱了这种依附地位。当亚历山大·马其顿远征中亚时（公元前330—公元前327年），花剌子模有自己的国王，但是中心在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粟特人的地区却是波斯的一个行省。据我们所知，无论是亚历山大、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的征服活动，还是前穆斯林时期中亚游牧民族的征服活动都没有波及花剌子模。穆斯林的征服结束了花剌子模的政治独立，之后甚至泯灭了花剌子模的民族特点。但是直到

452

[1]原文没有标题，标题是译者后加的。——译者

[2]比鲁尼《过去世代的遗迹》。关于新出版的粟特语和花剌子模语的主要资料及研究成果，参见前面第115页注释14和第122页注释8，以及后面第459页注释20。——B.罗莫金

包括最后几位希瓦乌兹别克汗统治时期，穆斯林统治者都沿用了前穆斯林时期花剌子模统治者的称号——花剌子模沙赫。在前穆斯林时期突厥斯坦一些地区统治者的所有封号中，只有这一封号一直延续到现代。粟特人居住区域成了亚历山大帝国的组成部分，后来又成为希腊巴克特里亚国家的组成部分，至少从公元前2世纪也可能从更早的时期开始，它多次遭到了游牧民族的侵袭，因此这里没有像花剌子模那样的适合建立独立政治生活传统的土壤。只是在穆斯林征服之前不久撒马尔罕统治者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整个粟特民族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粟特伊赫希德”（费尔干纳的统治者也带有伊赫希德的封号）。但伊赫希德的政权是极端不稳固的，在伊斯兰时代便很快消失了，并且在突厥斯坦以后的生活中也没有留下任何印记。然而，粟特人对文化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却大于花剌子模人，在前亚文明由突厥斯坦向东方的传播过程中，他们是主要的传播者。粟特人从事这种活动的历史之所以能够为后人所知，得益于在中国突厥斯坦以及中国边境地区发掘的出土文物。在敦煌边防站附近中国城墙的一座城楼里发现了一些公元1世纪的公文[1]，通过与比鲁尼的粟特语言资料进行核对，发现其中所使用的语言就是粟特语。这些文件中的字母是经波斯传往中亚的东方闪米特语或“阿拉米语”字母的变种。在罗布泊地区也找到了这样的文件。在更往西的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宗教古文献——佛教、摩尼教[2]和基督教古文献也是用粟特语写的。这些古文献一般来讲是7世纪和7世纪以后的文献。从总体上看，我们认为其中所使用的就是这种字母，但有很大的改变。粟特语的主要研究者——已故哥提欧教授没有发现“早期粟特”文件与佛教文献之间在语言上的差别，虽然这两种文献之间的时间间隔很长。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是用更晚时期的方言写成的，并且摩尼教文献所使用的方言和基督教文献所使用的方言之间

453

〔1〕正如B.亨宁格所证实的，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不是公元1世纪的文件，而是公元4世纪初的文件。参见亨宁格《古粟特书信的日期》。——Б.斯塔维斯基

〔2〕摩尼教教义是公元3世纪在把古代波斯的宗教（拜火教）与佛教和基督教思想相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摩尼教徒和基督教徒除了使用粟特民族字母之外也使用了由这两种宗教的传教士带到中亚的字母。

关于在阿黑门尼德王朝时代、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时代以及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统治时代伊朗的中亚对游牧民族的文化影响问题,我们尚无确切的资料。粟特人贸易和文化活动的足迹只是从所谓的印度西徐亚国家时代开始的,这个国家是公元前 2 世纪由来自于东方的外来人(很可能,这也是起源于伊朗的民族)——吐火罗人或贵霜人创建的,他们摧毁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国人的势力在公元前 2 世纪也渗透到了突厥斯坦,这也促进了贸易的繁荣。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土耳其[1]字母——叶尼塞鄂尔浑(在两条河上都发现了碑铭,其中在鄂尔浑河上发现的注有日期的 8 世纪的碑铭具有特别的意义)字母,就是从粟特字母中产生的,而且是从比流传到今天的公元 1 世纪的粟特字母更古老的字母形式中产生的。现在愈加明确的是,从时间上看后来产生的突厥文即回鹘文也起源于粟特字母,这种文字是统治蒙古近百年(744—840 年),后来又在中国突厥斯坦现哈密(库木尔)、吐鲁番、古城和其他城市所在的地区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几个世纪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虽然如同在世界各地一样,在中亚所使用的文字也与宗教传播有关,但粟特民族文字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传教士带来的文字即佛教(印度文字)、基督教(叙利亚文)和摩尼教(阿拉米斜体文)文字的影响。还有一种越来越占据上风的观点认为,回鹘文不是像从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起源于基督教的叙利亚文,而是起源于粟特的民族语言,这种语言主要由佛教徒保存下来,但基督教徒和摩尼教徒却把它们与自己的宗教文字并列使用,后来的蒙古文就是从回鹘文中产生的(从蒙文中又产生了满文)。哥提欧指出粟特字母与

---

[1]这里以及俄罗斯学术界所使用的“土耳其人”、“土耳其的”与在突厥斯坦和外高加索地区所使用的俄语词汇不同,它们表示的是学者们人为创造的词汇——“突厥人”和“突厥人的”。

俄罗斯语言和学术术语发展的结果是使“突厥人”和“突厥人的”这些词成为表示许多或者所有突厥语系民族的集合名词,而“土耳其人”和“土耳其人的”的这些术语则作为狭义的名词保留了下来,现在它们只用于称呼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及其语言、土耳其(过去的“奥斯曼”)国家等。——B. 罗莫金

回鹘字母之间是非常相像的，甚至于不可能列举出这两种文字之间的区别。在蒙古发现的粟特语碑铭与9世纪中国回鹘汗的碑铭（其中谈到回鹘人于762年皈依了摩尼教），从字母的形状来看与回鹘字母十分相似。因此，闪米特字母之所以能够传播到太平洋地区要归功于粟特人。

454

公元7世纪是粟特贸易最繁荣的时代，当时粟特人的国家或者臣服于突厥汗（突厥人在现代突厥斯坦的政治优势地位是于公元6世纪确立的）或者臣服于中国皇帝。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大实力促进了商队贸易的繁荣。粟特人不仅利用此发展了贸易而且利用此在遥远的国家建立了商业殖民地。关于这一点，除了出土文物可以为证以外，保存下来的中国同时代人的文字记载以及更晚些时候阿拉伯作者的文字记载都可以为证。在中文史料中提到了7世纪建于罗布泊的粟特殖民地，这一殖民地在100年之后依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中国旅行家玄奘在630年路经突厥斯坦的时候，把从楚河谷地开始到包括沙赫里夏勃兹在内的整个地区都称为窣利（有人推测，窣利克就是粟特一词的佛教和摩尼教写法，因为在方言中 д 转变成了 л），在这一地区到处都通用同一种标准语和同一种文字，人们书写的时候是从上往下写的（就像后来的回鹘人一样）。从玄奘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在粟特人的国家已经没有佛教，因此在伊斯兰时代除了伊朗人的民族宗教——拜火教之外，在粟特人中间盛行的还有摩尼教和基督教，但却没有佛教。可见，如果说粟特语的佛教文献的确产生于7世纪的话，那么这些文献不是在粟特人的祖国而是在更遥远的粟特殖民地书写的。除了玄奘的叙述之外，还没有其他关于粟特人的领土连成一片直达楚河沿岸的记载，但11世纪的穆斯林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尔谈到粟特人的殖民活动已经到达楚河谷地。他在评论粟格达克民族时说：这是“迁居到巴拉沙衮[1]的人，他们来自于位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的粟特，只是他们接受了突厥人的服饰”。在该著的另一处还说“巴拉沙衮的居民讲粟特语和突厥语，塔拉

〔1〕这个城市的确切位置还存在着争议，但不管怎样它都位于楚河谷地。

兹[1]和白城[2]的居民也是如此"。大概,巴拉沙衮和其他地方的居民11世纪在突厥化的影响下经历了丧失自己语言的最后阶段。还有一些讲粟特语的人,但他们已经不是那些只讲粟特语的人了。关于粟特人进一步向东的殖民活动马赫穆德·喀什噶尔没有提到。但10世纪末一位佚名的波斯地理学家提到,在通古兹古兹人或回鹘人的国家也就是在发现了粟特宗教文献的中国突厥斯坦的那个地区有5个粟特村庄。那位作者还补充说,在这些粟特人中有基督徒、格布尔(拜火教徒)和"萨比",最后一个名称当时泛指异教徒,其中包括佛教徒,在撒马尔罕也把摩尼教徒称为萨比。由此可见,粟特殖民地还在前穆斯林时期已经建立。[3] 甚至在13世纪初的作者法赫尔·阿德金·穆巴列克沙赫那里还保留着突厥字母起源于粟特字母的记忆。

穆斯林史料认为粟特和前穆斯林时期撒马尔罕王公领地的南部边界就在玄奘到过的地区,即在"铁门"或布兹加尔山口附近。在这个山口以外是吐火罗人的居住区托哈利斯坦。阿姆河上游以北和以南地区都是托哈利斯坦的组成部分。在玄奘西行时代,在托哈利斯坦占据统治地位的还是被粟特人驱逐出境的佛教,那里有一种特别的从左向右写的文字,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文字起源于印度。这些文字与其他在东突厥斯坦即库车和和田地区使用的印度文字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从玄奘的记载中看不出来。在穆斯林作者中,只有一位作者也就是萨曼尼(12世纪)谈到了前穆斯林时期托哈利斯坦的文字。他在描述瓦什吉尔德城(现在布哈拉的法伊扎巴德)时提到"在伊斯兰教传播初期那里有一种著名的文字,书就是用这种文字写的"。可见,萨曼尼论述的并不是他发现的新事实,而是一个为他同时代人所熟知的事实,但只有这一记载流传到了今天,至于萨曼尼所提到的"书"可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4]。

---

〔1〕或者是塔拉斯——今天的奥利耶阿塔(现在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江布尔市。——Б. 加富罗夫)。

〔2〕可能该城位于奥利耶阿塔以西。

〔3〕关于粟特殖民地的主要文献参见前面第114页注释11。——Б. 加富罗夫

〔4〕关于粟特语和吐火罗语的详细情况,参见巴托尔德《论粟特语和吐火罗语》。——B. 罗莫金

2 塔吉克人的起源及其含义的演变[1]

公元7—8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改变了突厥斯坦伊朗居民的民族成分,并为该民族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在前穆斯林时期的伊朗,在萨珊王朝统治时代(3—7世纪),塔伊部落从地理位置上看是最靠近波斯的贝都因部落,他们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建立了希拉城(众所周知,在伊斯兰时代库法就产生于希拉城附近),后来这里成为一个依附于波斯的阿拉伯公国的首都。早在公元3世纪,一位在埃德萨从事写作的叙利亚作者就使用了"塔伊"一词,他用"塔伊"和"萨拉基内"来泛指所有的贝都因人。波斯中部或巴列维语(帕提亚和萨珊王朝时代波斯的标准语被称为巴列维语)和亚美尼亚语中的塔奇克意为"阿拉伯"一词就是从这个部落的名称中产生的。我们看到在穆斯林时代这个词有了更晚些时候的形式——塔济克和塔济。从前者当中产生了一个突厥词捷吉克 теджик。[2] 字母 з 和 едж 交替为 ж 音,我们在马赫穆德·喀什噶尔那里的确发现有捷日克 тежик 一词。[3] 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同11世纪的另一位突厥作者优素福·巴拉沙衮一样使用这个词表示"波斯人",但是从前突厥人称阿拉伯人为塔吉克人,中国人把"阿拉伯"人称作大食证明了这一点。

按照当时的理解,皈依了伊斯兰教顺理成章就成了阿拉伯人。布哈拉达官显贵在728年把伊斯兰教在突厥斯坦传播的成果告知阿拉伯

---

[1]原文没有标题,标题是译者后加的。——译者

[2]关于塔吉克这一术语起源于最初表示"阿拉伯"之意的塔济和塔济克的问题,也参见前面第121页和注释6。——B.罗莫金

[3]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赫拉特作者塞菲·阿德金经常把塔日克 Тажик 和塔吉克 таджик 同样使用,他著有赫拉特史,该著在巴托尔德去世后出版。参见塞菲·阿尔·赫列维《赫拉特史》,索引。——B.罗莫金

总督阿什拉斯时,使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阿拉伯人。”很自然,与其说突厥人把出身于阿拉伯民族的人称作捷吉克人(按照突厥发音),倒不如说他们把那些来到他们草原上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文明的代表称作捷吉克人,毫无疑问,不久西部的伊朗人就在这些代表中占据了多数,因为移居到中亚的阿拉伯人的数量不是很多。因此对突厥人而言波斯语就成了“捷吉克语”。当突厥人征服穆斯林地区并且近距离地接触两个主要的穆斯林民族——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时,他们便只把波斯人称作“塔吉克人”并开始把“塔吉克人”与阿拉伯人区别开来,虽然一开始波斯人和援引他们做法的突厥人正是把阿拉伯人称作塔吉克人。很可能,在粟特人看来不仅阿拉伯人是塔吉克人,而且波斯穆斯林也是塔吉克人,但我们没有找到当地伊朗人这样使用“塔吉克人”一词的例子。

突厥斯坦的文明区域被合并到哈里发国家之中,这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活方式。虽然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粟特贸易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仍然是亚历山大·马其顿时代的社会制度。[1] 从亚历山大东征到穆斯林征服这是1000多年的时间,这1000多年在突厥斯坦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无论是公元前4世纪的马其顿人还是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人,在突厥斯坦遇到的都是居住在设防城堡中的地主贵族的统治。城市比较少,而且规模也不大。所有这一切在伊斯兰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优势地位越来越转移到商人阶级手中。大概新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波斯移民带来的,伊斯兰教在消灭了波斯萨珊王朝(这个王朝支持的是被宗教神圣化了的陈腐的等级制度)的君主制度之后,为波斯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但同时波斯人出于爱国主义精神坚持其以萨珊王朝为代表的国家制度的传统,这些传统连同波斯的语言一起被中亚的伊朗人所吸收。当地方贵族的代表一开始作为哈里发的总督、后来作为世袭统治者参与穆斯林时代

[1]不能赞同巴托尔德的这一论断。参见前面第117页注释18。——B.罗莫金

突厥斯坦的政治生活时，他们便开始为自己制造出一个源自萨珊王朝的家族。这些王朝中势力最强大的代表——萨曼王朝就是这样做的，萨曼王朝在10世纪从布哈拉统治突厥斯坦和呼罗珊。12世纪胡塔尔地区即现在库利亚布地区的当地统治者也是这样做的。布哈拉的居民甚至在10世纪的时候还讲粟特语，但在萨曼国家只有被称为"宫廷语言"(дери)的波斯语是与阿拉伯语并用的官方文献的语言。出身于撒马尔罕的一位诗人鲁德基在穆斯林波斯文献中甚至被列入经典诗人的行列。渐渐地，粟特语从人民群众所使用的语言中消失了，现在在凡河源头之一的雅格诺布河河谷地区存在的两种方言被认为是它所留下的唯一痕迹。雅格诺布方言并不是由我们所知道的标准粟特语直接演变而来的，而是更接近基督教文献中所使用的语言。[1]

很可能，早在前穆斯林时代平原地区的居民和山民之间便产生了差别。我们遇到了一些伊斯兰时代的术语，这些术语从其发音来看起源非常古老：加尔"山"的意思，加尔恰或现代发音为加利恰"山民"的意思，加尔奇或加尔奇斯坦"山区"之意。人们专门把在11世纪初期之前构成了一个特殊公国的穆尔加布河上游地区(梅尔夫)称作加尔奇斯坦。此外，萨曼尼在12世纪还谈到"撒马尔罕的加尔奇斯坦"，显然他把这个地区理解为是泽拉夫善河上游的山区。但是据我们所知，在中世纪的文献中还没有使用这种术语来称呼阿姆河上游山区居民的例子。可能其他人理解不了的特殊语言概念在穆斯林作者那里是不能与加尔恰或加利恰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穆尔加布河加尔奇斯坦的方言只是说：正如根据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所能预料到的那样，它是介于赫拉特方言和梅尔夫方言之间的某种混合方言。在现代的中亚加尔恰一词表示的是"山民"之意，并不代表一个特殊的语言学群体。俄罗斯大使迈因多夫1820年在布哈拉听说居住在布哈拉以东和吉萨尔以北即泽拉夫善河上游的贫穷但独立的民族被称为加尔恰，这个民族

[1]正如B.A.利夫希茨所指出的，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基督教经文从语言上来看与8—10世纪流通的粟特语非常接近，但雅格诺布语是一种未被文字资料所证实的粟特语方言。——B.罗莫金

讲波斯语并且不懂得其他的语言，他们在外表上与塔吉克人有着很大的区别。[1] 我们发现英国研究者肖对加利恰这一术语的使用最为广泛(1876年)，他说库利亚布居民、马特恰居民、卡拉特居民、达尔瓦兹居民、罗珊居民、舒格南居民、瓦罕居民、巴达赫尚居民、泽巴克或桑格利奇居民以及明占居民等都被"自己的突厥邻居"称为加利恰。在德国伊朗语言学汇编所收入的B.盖革[2]的论文中，加利恰一词被视为是一个表示帕米尔山谷讲特殊方言的伊朗居民的统称，达尔瓦兹、库利亚布、卡拉特和巴达赫尚被排除在这个地区之外，那里的居民讲的是与平原居民一样的塔吉克语。不管怎么说，从词源来看在加利恰一词当中没有任何侮辱性的含义，但由于山民的文化水平较低，所以平原地区的居民便以蔑视的口吻来使用这个词。在波斯词典中赋予加尔切吉一词(гарчеги，由加尔恰一词构成的名词)"愚蠢、无知"之意，赋予加利恰一词"流浪者"之意。很自然，泽拉夫善河上游地区的山民(在其他地区山民们自己可能并不知道加利恰这个词)不希望人们这样称呼他们。大概在泽拉夫善河外彭吉肯特的法利加尔有人对一位俄罗斯研究者C.Д.马斯洛夫斯基说："我们不是加利恰，加利恰在雅格诺布、在马特恰，那里有令人生厌的塔吉克人，而我们不是加利恰。"[3]大概在某些山民那里把接受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文明的人称作塔吉克人，这位C.Д.马斯洛夫斯基"在达尔瓦兹东部、舒格南和罗珊"听到过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不久前成了塔吉克人。"[4](很遗憾研究者可能没有向自己的交谈者询问他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459

10世纪末，突厥斯坦的政治优势地位再一次彻底地转入突厥人手中。除了塔吉克之外，还使用起源并不十分清楚的塔特一词来表示被

[1]在迈因多夫之前，曾于1813—1814年到过浩罕汗国的纳扎罗夫提到过"加利恰"，他解释说加尔恰一词用于表示"山区的波斯人"。他对居住在紧邻俄罗斯使团必经之路附近的"山区波斯人"进行了简短但却内容丰富的评论，指出了他们所从事的主要职业和日程生活中的某些特点(参见纳扎罗夫《关于中亚某些民族和土地的报告》)。伊万诺夫的论文《哈萨克人和浩罕汗国》第一次指出了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B.罗莫金

[2]Geiger, *Kleinere Dialekte*. ——Б.加富罗夫

[3]马斯洛夫斯基《加利恰(突厥斯坦的原始居民)》，第3页。——Б.加富罗夫

[4]马斯洛夫斯基《加利恰(突厥斯坦的原始居民)》，第3页。——Б.加富罗夫

征服的伊朗居民。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指的是非突厥出身的人，毋宁说指的是过着定居生活的人。不仅伊朗人被称为塔特，而且回鹘人也被称为塔特。现在土库曼人也使用它的这一含义，对他们而言乌兹别克希瓦人就是塔特人。在外高加索塔特一词具有民族学的意义。在突厥斯坦，当地的伊朗人从不把自己叫做塔特人，但他们在自己突厥主人的影响下开始称自己为塔吉克人。在萨曼王朝时代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样使用塔吉克一词的例子，但11世纪伊朗人在与突厥统治者说话时往往使用“我们塔吉克人”这样的表达方式。[1] 历史学家贝哈基认为这种表达方式源自于一位1039年与伽色尼王朝苏丹马苏德（我们都知道，萨曼王朝在阿姆河以南地区的遗产都转入了出身于萨曼王朝突厥近卫军的伽色尼王朝之手）进行过交谈的著名的伊朗人士。

从11世纪开始伊朗各地区越来越多地处于突厥人的统治之下，当然山区或被高山拱卫的地区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在起源于伊朗的王朝中只有一个王朝即古尔王朝（12—13世纪）提出了建立大国的要求，古尔王朝出自于阿富汗西部的古尔山区，它占据着包括阿姆河以北一些地区例如苏尔汉谷地在内的辽阔地域。

在13世纪初与花剌子模的突厥统治者——花剌子模沙赫争夺穆斯林世界东部地区霸权的斗争中，古尔王朝的苏丹们遭到了失败。这时花剌子模不仅从突厥人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层面而言已经是一个突厥国家，而且从绝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语言层面而言也是一个突厥国家，尽管在11世纪他们在讲话和书写的时候使用的还是花剌子模语。很遗憾，无论是花剌子模语的语言文献还是公文都没有流传到今天。[2]

除了王朝之间的斗争之外，民族之间的纠纷也表现出来。在叙述

[1]贝哈基《贝哈基历史》，莫尔列伊版，第746页（ما تازيكان）。——Б. 加富罗夫

[2]不久前为了研究花剌子模语利用了对13世纪花剌子模[illegible]阿拉伯语作者涅什姆·阿德金·阿布尔·拉贾·阿尔·加兹米尼著作 *Кинйат ал-мунйа*（参见沃林《研究花剌子模语的新史料》）的注释。目前在发掘托普拉克－卡拉宫殿遗址时发现的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花剌子模经济文献也被应用到学术界。参见托尔斯托夫《1949—1953年花剌子模民族考古考察团的工作》，第207－212页。——Б. 斯塔维斯基

花剌子模沙赫贾拉勒丁与蒙古人的斗争时，谈到了花剌子模沙赫的突厥军事长官和古尔军事长官之间的冲突。突厥指挥官拟定的协议遭到了古尔人的否定，他们说："我们是古尔人，而你们是突厥人，我们不能与你们一起生活。"[1]当一位花剌子模沙赫与马詹德兰统治者缔结了同盟时，同时代的人都不相信这种友谊能够长久，他们说"突厥人和塔吉克人之间的道路笼罩着黑暗，难逃破灭之命运，友谊和亲近总会以敌对而告终"（马詹德兰的确后来被花剌子模征服）。当一位花剌子模王子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遭到失败被迫离开花剌子模时，有人警告他不要到马詹德兰去，因为"塔吉克人永远都不会信任突厥人"[2]。但是突厥人离不开塔吉克人，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就曾援引过一则俗语："没有塔特人就没有突厥人，没有脑袋就没有帽子。"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下塔吉克人的生活状况当然有的时候是异常艰难的。根据历史学家拉施特·阿德金的说法，以公正而闻名的波斯蒙古统治者加赞汗（1295—1304年）曾对自己的蒙古人说，要掠夺塔吉克人很容易，但随后他们将很难获得食物；他们殴打塔吉克人的妻子和孩子，而忘记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对他们本身有多珍贵，其实塔吉克人"也是人"。

460

作为伊朗工业、商业以及文明的代表塔吉克人是为突厥人所需要的。在突厥人统治时代波斯语仍然是国家的公文和文献用语，伊朗商人越来越扩大了自己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区域。11世纪的突厥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和优素福·巴拉沙衮使用了萨尔特一词来表示"商人"之意，这个词正如已经被证明的那样起源于印度，很可能突厥人与之打交道的最早的商人就是印度人，印度人在贸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佛教的广泛传播。有可能，佛教的衰落是与商人的角色由印度人转变为伊朗人有关。在这方面塔吉克人成功地继续了自己先驱粟特人的活动，以至于蒙古人大概还有更早些时候的东部突厥人把从中产生了商人的整个中亚的伊朗民族及其国家制度和文明都称作萨尔特。

[1]比较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卡兹维尼版，Ⅱ，第193页。——Б. 加富罗夫

[2]扎希尔·阿德金·马拉希《塔巴里斯坦史》，第248页、253页以下。——Б. 加富罗夫

萨尔特一词的蒙古形式是萨尔塔乌尔 сартаул 和萨尔塔克塔伊 сартактай，蒙古史诗中塑造了一个勇士萨尔塔克塔伊的形象，他建造了神奇的堤坝，由此可见伊朗人在草原上不仅是商人而且是物质文明尤其是灌溉技术的载体。另一方面，塔吉克穆斯林像从前的粟特人一

461 样，并不传播自己的宗教，在蒙古部落当中有基督教徒，但并没有穆斯林，虽然穆斯林是贸易的主要代表者。归属于一定的文明类型在游牧民族的眼中要比民族属性和语言属性还重要。根据历史学家拉施特·阿德金的说法，成吉思汗把第一个臣服于他的穆斯林统治者葛逻禄的阿尔斯兰汗（在七河流域的北部）称作萨尔塔克塔伊，也就是把他称作塔吉克人，虽然葛逻禄人属于突厥民族，而且自然讲突厥语。在成吉思汗时代的碑铭中记载了他远征萨尔塔乌尔人的国家，即花剌子模沙赫穆罕默德及其儿子贾拉勒丁的国家之后返回的情形。1246 年到过蒙古的圣芳济派修士普兰诺·卡尔平尼在谈论蒙古人征服了"萨尔特人"时指的就是这次远征。在 14 世纪一位佚名的阿拉伯语言学家论蒙古语[1]的著作中，萨尔塔乌尔一词被翻译成"穆斯林"，但在蒙古人所建立的中亚国家和波斯，萨尔特和萨尔塔乌尔这些词更经常是作为塔吉克一词的同义词被使用的，14 世纪末这些国家在帖木儿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在帖木儿的后裔统治时期，已经把"萨尔特"语言和文献与突厥人的语言和文献相对比来谈论了，也就是说从整体上看把波斯人当做萨尔特人了。不久前 A. H. 萨莫伊洛维奇所注意到的巴卑尔（16 世纪初）的论证是非常孤立的，其中谈到萨尔特人与塔吉克人是有区别的。在描述喀布尔州时，巴卑尔说在那里的"牧场和盐泽地里居住着突厥人、艾马克人（混血游牧民族）和阿拉伯人，在城市和一些乡村居住着萨尔特人，在其他一些乡村居住着塔吉克人、阿富汗人"以及其

---

〔1〕著作的作者是贾拉勒丁·伊本·穆罕纳（死于 1425 年）。原文、译文以及对其著作《基塔比塔尔朱曼法尔斯瓦图尔基瓦穆古里 Китаб-и тарджуман-и фарси ва турки ва мугули》的资料分析，参见梅利奥兰斯基《阿拉伯语言学家论蒙古语》。——B. 罗莫金

他 3 个民族的代表。[1] 不知道巴卑尔所说的塔吉克人和萨尔特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未必指的是语言上的差别，因为在列举喀布尔地区所通用的语言时他既未提到萨尔特语也未提到塔吉克语，而只是谈到了波斯语（法尔斯语），可能这是塔吉克人和萨尔特人的共同语言。在巴卑尔著作的其他地方没有提到塔吉克人，例如在描述费尔干纳时，只是把萨尔特人及其语言与突厥人及其语言做了对比。

462

在乌兹别克人征服突厥斯坦（也在 16 世纪）之后，便把那些被征服的既讲波斯语又讲突厥语的定居居民称为萨尔特人。无论在 17 世纪的作者阿布尔哈齐的著作中还是在现代都特别明确而又合乎情理地把花剌子模的萨尔特人与“乌兹别克人”进行了对比。值得注意的是，阿布尔哈齐只有在谈论花剌子模时才使用萨尔特一词，凡是在谈论伊朗人及其语言时都使用塔吉克一词。阿布尔哈齐把与他同时代的布哈拉居民叫做“塔吉克人”。在 19 世纪，萨尔特一词经常被浩罕历史学家所使用，并且不止一次地同时提到“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萨尔特人”。可见，萨尔特人与塔吉克人是有区别的，然而是否只能把当地那些突厥化的定居居民称为萨尔特人（欧洲和俄罗斯学术界的代表竭力赋予萨尔特一词这样的意义），从历史学家的记载中还看不出来。在费尔干纳经常使用“乌兹别克人和萨尔特人”来表示“全体居民”，也就是说萨尔特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差别比其与塔吉克人之间的差别更明确。已故 B. П. 纳利夫金是最精通费尔干纳生活的专家，他说费尔干纳的定居居民被通称为萨尔特人，它是由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构成的，但由于“在费尔干纳境内萨尔特 – 乌兹别克人明显超过了塔吉克人”，纳利夫金主要把“萨尔特语”理解为“突厥语”。总起来讲，随着乌兹别克人逐渐转变为定居居民，人们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把乌兹别

[1]原文中是这样写的：“……在城市和一些乡村里有萨尔特人，在该州的其他一些乡村（ولايتي）有帕沙伊人、帕拉奇人、塔吉克人、巴拉克人和阿富汗人”（《巴卑尔回忆录》，别维里什版，第 131 页 a – 6；伊利明斯基版，第 161 页）。接下来在列举喀布尔省流通的语言时，巴卑尔指出了这些语言共有 11 – 12 种，它们分别是：“阿拉伯语、法尔斯语、突厥语、蒙加里语、印地语、阿富汗语、帕沙伊语、帕拉奇语、格布雷语、巴拉克语和拉姆加尼语”（《巴卑尔回忆录》，别维里什版，第 131 页 6；伊利明斯基版，第 161 页）。——B. 罗莫金

克人与萨尔特人对立起来了，而是开始把哥萨克人[1]与萨尔特人对立起来。在现代，萨尔特一词被认为是对土著居民的贬称并且已经不再使用，虽然这个词最初并不包含任何贬义的成分。其中之所以产生侮辱性的意义只是由于游牧民族把对农民和市民的蔑视情绪置入了这个词汇之中。突厥人有时以这种蔑视的语气谈论塔吉克人，但这对语言的影响较小，因为塔吉克一词至今仍然是与其最初的语言学意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2]

---

〔1〕哈萨克人。——Б.加富罗夫

〔2〕关于萨尔特一词的意义，也参见B.B.巴托尔德发表在本版第2卷第2册上的论作（《论撒马尔罕土著方言的教授》；《代替对拉宾先生的回答》；《再论萨尔特一词》；《萨尔特人》）。——B.罗莫金

3　巴达赫尚简史[1]

在伊朗居民居住的地区中，根本没有受到蒙古人侵的是巴达赫尚。从前巴达赫尚并没有躲过征服活动的侵扰，突厥人早在前穆斯林时期就已经来到那里。在阿拉伯征服史中已经提到了现在居住在巴达赫尚的突厥-葛逻禄人。葛逻禄王公是当时包含巴达赫尚在内的广义上的托哈利斯坦的最高统治者。稍晚些时候出现了一个拥有突厥封号的人作为巴达赫尚和舒格南的统治者。在蒙古人出现之前不久，古尔王朝占领了巴达赫尚，但在蒙古统治时期存在着一种观念，似乎巴达赫尚不仅在蒙古人统治时期而且就是在以前也没有臣服过任何征服者，在3000年的时间里（显然没有明确的年代观念）一直由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后裔来治理。 463

欧洲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个传说是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安纳山区展开军事行动并娶当地王公的女儿罗克珊为妻这些历史事实的反映，但我们看到在前蒙古时期中亚的当地伊朗统治者希望成为萨珊王朝的后裔。关于巴达赫尚的统治者出自于“亚历山大大帝和大流士国王女儿”的传说最早见于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后来从瓦罕到包括达尔瓦兹和卡拉特在内的阿姆河上游以及印度河（赤特拉尔河）上游支流地区的所有统治者都自称亚历山大的后裔。15—16世纪的穆斯林文献只是证明巴达赫尚的王公源自于亚历山大。文献中说，亚历山大的谋臣们为留在巴达赫尚的亚历山大的后裔写了行动准则，这份行动准则保障了巴达赫尚的独立性，可能有人认为正是这种独立性使得巴达赫尚与自己的邻居有着不同的文明特点。当最后一位巴达赫尚王公苏丹·穆罕默德（15世纪）开始对波斯文学感兴趣并且自己用波

[1]原文没有标题，标题是译者后加的。——译者

斯语写诗歌的时候,便被认为是破坏了亚历山大留下的遗嘱。从那时起,巴达赫尚的统治权转入帖木儿后裔的手中。乌兹别克人的入侵(16世纪初)引发了巴达赫尚的民族运动,至今仍然矗立在科克恰河左岸的卡拉伊扎法尔要塞便是这次民族运动留下的纪念物,这座要塞由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穆巴列克沙赫·穆扎法尔重建(之前这里的要塞带有别的名称),他是前巴达赫尚王公手下的大臣。穆巴列克沙赫成功地赶走了乌兹别克人,但后来他在与自己的竞争者祖边尔·拉吉的斗争中战死。民族运动领导人之间的纠纷为帖木儿帝国所利用,帖木儿王朝的统治者之一米尔扎汗成功地除掉了祖边尔,随后又取得了反对沙赫·拉济·阿德金领导的伊斯玛仪派运动的胜利。

帖木儿王朝在巴达赫尚的统治持续到1584年布哈拉汗阿卜杜拉征服巴达赫尚为止,从此巴达赫尚留在乌兹别克人的统治之下直至阿富汗人征服了阿姆河以南乌兹别克人的所有土地为止。在17世纪末乌兹别克汗国解体后,统治巴达赫尚的是一个特殊的米尔(埃米尔)王朝,该王朝的建立者为亚尔·伯克,现在巴达赫尚的首都法伊扎巴德就是他创建的。这些乌兹别克[1]王公也认为自己是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后裔。伊什卡希姆和瓦罕处于巴达赫尚人的最高统治下,由此这一时期在那里被称为是"乌兹别克人的时代"。大概难以到达的达尔瓦兹和卡拉特地区仍然独立于乌兹别克人之外。历史学家马赫穆德·伊本·韦利说,在1047/1637—1638年胡塔良地区的卡拉伊胡姆(卡拉伊胡姆布,达尔瓦兹的主要城市)要塞才首次降服乌兹别克人。乌兹别克人的首领是出身于卫拉特氏族的巴基·阿塔雷克,统治者沙赫·加里布被打死,他的头颅被送往布哈拉,他的兄弟——从幼年起就居住在乌兹别克宫廷(在巴尔赫)的沙赫·吉尔吉斯取代了他,沙赫·吉尔吉斯显然是乌兹别克人的附庸。可能19世纪末C.Д.马斯洛夫斯基所听

---

[1]1068/1657—1658年被巴达赫尚人推举担任埃米尔对抗卡塔干乌兹别克人统治的亚尔·伯克以及他的后裔可能像随后的绝大多数巴达赫尚统治者一样,都承认巴尔赫和布哈拉乌兹别克统治者名义上的最高统治权。关于亚尔·伯克,参见《巴达赫尚史》,第2页a-5页6。——B.罗莫金

到的叙述就是这一事件的反映。有人告诉他说,卡拉伊胡姆布城得名于"16世纪埃米尔阿卜杜拉汗的总督吉尔吉斯汗统治达尔瓦兹时期"[1]。纪年自然是非常不准确的,尤其是突厥斯坦的传说倾向于把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划归到帖木儿或阿卜杜拉汗统治时期。关于卡拉特,那种史料中说在1045年赖哲卜月(1635年12月11日—1636年1月9日,即冬天,一般都认为是在卡拉特河不能通行的时候)有12000户被认为是卡菲尔人的吉尔吉斯人(卡拉吉尔吉斯人)在12名首领的率领下经卡拉特来到希萨尔,所有这12位首领于下个月的月初在巴尔赫受到了乌兹别克汗的接见。现在有时候援引这一传说,说明卡拉特从前属于卡拉吉尔吉斯人,只是不久前才被塔吉克人占据。这是鲜有的已经为突厥人所攫取的政权又重新转入伊朗人之手的例子之一。尽管被称为"拉什特"的卡拉特在10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是穆斯林的地区,但1820年有人在布哈拉对迈因多夫谈起它的时候,还是把它作为卡菲尔人的地区,虽然卡菲尔人并不凶恶。迈因多夫说卡拉伊胡姆是残酷的(redoutables)卡菲尔人的集中地。实际上,无论是在达尔瓦兹还是在其东南地区,伊斯兰教早已成为居民的宗教了。

关于19世纪塔吉克公国的历史我们在西欧和俄罗斯旅行家那里找到了许许多多的记载。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在这些记载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之处,尤其是在纪年方面。必须搜集这些资料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但这项复杂的工作迄今也没有完成。[2] 更困难的是在阿姆河上游地区几乎完全缺乏文献,也很少有人了解自己国家过去的条件下,把旅行家的叙述与当地居民的叙述进行对比。舒格南历史概论则是个例外,该书是1912年底由舒格南人赛义德·哈伊达尔·肖用波斯文编写的,由A.A.谢苗诺夫翻译成俄文。[3] 译者在注释中也引用了旅行家的叙述,尤其是引用了俄罗斯的官方文件。此外,还有布尔罕·

[1]马斯洛夫斯基《加利恰(突厥斯坦的原始居民)》,第12页。——Б.加富罗夫

[2]关于卡拉特的历史,现在可以参见基斯利亚科夫《卡拉特史概论》。——B.罗莫金

[3]参见谢苗诺夫《舒格南史》。——Б.加富罗夫

阿德金汗·库什克基的波斯文著作《卡塔干[1]和巴达赫尚指南》[2]，该书是最近几年在阿富汗撰写的，这已经是在埃米尔阿孟乌拉统治时期，当时恰逢陆军大臣穆罕默德·纳迪尔汗旅行之际。除了地理概要之外，这部书的组成部分还包括历史概论，也就是简明通史（第12－18页）、巴达赫尚史（第162－173页）、舒格南史（第336－348页）、达尔瓦兹史（第356－365页）。历史概论部分写得很肤浅并且往往自相矛盾。我是通过И.И.扎鲁宾了解这部著作的。

我不打算谈论细节问题，也没有打算把有关姓名和日期中那些相互矛盾的记载研究清楚，我只是要对主要的事实作一些比较。全体归附于巴达赫尚乌兹别克人并没有把塔吉克公国从它们彼此间的战争中拯救出来，也没有把塔吉克公国从它们与达尔瓦兹的战争中拯救出来，达尔瓦兹既没有臣服于巴达赫尚，也没有臣服于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统治昆杜兹的穆拉德·伯克，巴达赫尚及其以东地区以及南部的赤特拉尔河和北部的库利亚布一度归顺了他。穆拉德·伯克在山区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成功，有一次由于发生雪崩他在舒格南损失了将近100人，虽然当时是夏季。根据旅行家伍德（1837—1838年）的说法，达尔瓦兹沙赫供养了大批的军队[3]，至少与他那些弱邻相比他的军队数量相当庞大。关于卡拉特，伍德说（只是根据传闻，欧洲人中首先来到这里的是俄罗斯人，并且是在1878年才来到这里的），它在归附浩罕和昆杜兹之间摇摆不定。[4] 我们都知道卡拉特被浩罕汗玛达里（1822—1842年）所征服。有消息说当时浩罕首领穆罕默德·谢里夫·阿塔雷克还征服了达尔瓦兹。达尔瓦兹“哈基姆”苏丹·马赫穆德汗被带往费尔干纳，他死在途中并被葬在沙希马尔丹。在1842年以后浩罕汗国发生内乱期间，达尔瓦兹和卡拉特显然恢复了独立，虽然浩

---

[1]卡塔干是从18世纪初开始统治昆杜兹的乌兹别克氏族的名称。

[2]1926年出版了俄文译本：库什克基《卡塔干和巴达赫尚》，该书的编辑是A.A.谢苗诺夫，也由他作序并加上了注释。关于巴达赫尚史，现在还可以参见《巴达赫尚史》（A.H.博尔德列夫版，带有前言和索引，1959年）。——B.罗莫金

[3]伍德《旅行》，第249页。——Б.加富罗夫

[4]伍德《旅行》，第249页。——Б.加富罗夫

罕汗并没有放弃对卡拉特的要求，但 70 年代达尔瓦兹和卡拉特还是被布哈拉人征服。根据谢苗诺夫的说法，达尔瓦兹最后一位出自于亚历山大后裔的统治者西拉赤汗被俘后死于布哈拉，他的兄弟马赫穆德汗是阿富汗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1880—1901 年）的大维齐尔。达尔瓦兹"当地的土著人和一些布哈拉官员"是这样告诉谢苗诺夫的。根据布尔罕·阿德金的说法"沙赫·马赫穆德"是达尔瓦兹的统治者，早在布哈拉人征服达尔瓦兹前后阿卜杜拉赫曼在撒马尔罕时（1869—1879 年），他便与阿卜杜拉赫曼有交往。所以阿卜杜拉赫曼继位后便把沙赫·马赫穆德和他的兄弟沙赫·阿夫扎尔从马尔格兰叫到喀布尔，他们在被驱逐出达尔瓦兹后曾住在马尔格兰，来到喀布尔后他们在这里过了几年便去世了。谢苗诺夫在卡拉伊胡姆见到了出身于亚历山大后裔的前达尔瓦兹统治者那"被砸成了几块的石制宝座"。马斯洛夫斯基谈到"保存至今的用花岗岩砌成的工作锅炉，据说这是亚历山大·马其顿战友们留下的。根据土著人的说法，大概卡拉伊胡姆或卡拉伊胡姆布（字面意思是'锅炉要塞'）似乎就得名于这座锅炉"。[1]

卡拉特的命运是比较有争议性的，它曾一度归属于浩罕人，所以对前浩罕汗国在帕米尔和喀什噶尔的领土提出了要求的俄罗斯政府便宣布卡拉特为自己的领土。但这一声明没有实现。1876 年 8 月在费尔干纳合并到俄罗斯之后，斯科别列夫与卡拉特伯克签署了边界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卡拉特仍然从属于布哈拉。

阿姆河更往南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地区逐渐归附了阿富汗人。这一过程开始于 19 世纪 50 年代在阿富汗埃米尔朵思忒·马黑麻统治时期，差不多 40 年后于 80 年代末完成。当地的统治者几次归附过阿富汗人，又在条件有利的时候起来反对他们。在俄罗斯行动的影响下，阿富汗人有时采取了一些巩固自己权力的措施。由于 1882 年夏天医生和植物学家列格利来到舒格南，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派久利扎尔汗来到舒格南，他成功地说服当地统治者优素福·阿里汗（在 1871

[1]马斯洛夫斯基《加利恰（突厥斯坦的原始居民）》，第 12 页。——Б. 加富罗夫

年时谈到过他,他的兄弟沙赫·阿米尔·伯克因为倾向于伊斯玛仪派被自己的父亲阿卜杜勒·拉希姆剥夺了在舒格南的继承权,还在60年代的时候曾一度统治瓦罕)前往巴达赫尚,在那里他和他的儿子——罗珊统治者库巴德(优素福·阿里本人在其父亲在世时曾统治过罗珊)被扣并被带往喀布尔。这样看来1886年英国人亚特关于当时罗珊仍处于自己世袭埃米尔统治下的说法未必正确。最后一次起义发生于1888年,当时由于担任阿富汗突厥斯坦总督的阿卜杜拉赫曼的堂兄弟伊斯哈克发动了反对埃米尔的暴动,所以阿富汗军队撤出了舒格南。于是前舒格南统治者的后裔穆罕默德·亚格伯汗从吉萨尔回到舒格南。在打败伊斯哈克之后,阿富汗人又重返舒格南和其他地区,根据M.C.安德烈耶夫的说法,在1889年和1891年间阿富汗人征服了泽巴克、瓦罕和伊什卡希姆。1895年,帕米尔的划界工作完成了消灭塔吉克人政治独立的过程,他们的领土被俄罗斯、阿富汗和布哈拉瓜分。这次划界在经济上对居民是不利的,因为巴达赫尚在政治上被与那些一直与它有经济联系的地区——西部的库利亚布和东部的舒格南地区割裂开来。

467

在突厥斯坦的3个乌兹别克汗国中,塔吉克语作为国家公文和文明用语使用最多的国家是布哈拉汗国,最少的是希瓦汗国,浩罕汗国居中。与希瓦相比,布哈拉的塔吉克成分是这样的浓厚,以至于希瓦历史学家甚至把布哈拉军队称作是塔吉克人的军队,虽然在布哈拉尤其是在军人阶层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成分是乌兹别克人。塔吉克语不仅在布哈拉汗国是国语,而且就是在1920年9月成立的布哈拉共和国也是国语。

随着乌兹别克人转入定居生活,塔吉克人及其语言越来越被排挤到山区,这是一种现存的局面,这种局面使纳利夫金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塔吉克人的民族特征之一便是他们向往山区。”乌兹别克人转入定居这一事实对整个突厥斯坦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一点在基什拉克(突厥语“过冬地”)一词的命运中有所反应。在1598年1月即布哈拉阿卜杜拉汗去世前夕写的一份文件中,列举了德赫尼申 дех-нишин、基

什拉克尼申 кышлак-ниши 以及萨赫拉尼申 сахра-нишин 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乡村居民、基什拉克居民以及草原居民之间的区别。对居住在过冬地的居民而言，过冬地逐渐成了他们唯一的处所，因此他们的生活状态介于定居的农民和游牧民之间。现在大家都知道，基什拉克指的正是完全定居的农民的村庄，不仅乌兹别克人这样称呼自己的村庄，而且塔吉克人甚至山民也这样称呼自己的村庄。 468

俄罗斯的征服把塔吉克村落从突厥游牧民族的掠夺中拯救出来。奇尔奇克河上游的皮斯坎村（普斯克姆）最后一次遭卡拉吉尔吉斯人抢劫是在俄罗斯人夺取塔什干时期，也就是在 1865 年前后。在俄罗斯人统治下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抢掠。另一方面在秩序建立和交通道路得到改善的条件下，大部分人所使用的乌兹别克语逐渐成为所有居民的语言。正如人们告诉我的，在征服时代奇尔奇克河上游的山区村落中没有人懂突厥语，我本人在突厥斯坦游历时期也只有一次在布哈拉听到了一些词：Турки немидонем（突厥语不知道的意思）。拉德洛夫院士 1868 年在撒马尔罕的大街上听到的几乎全是波斯语。我到那里的时候（例如在 1904 年）讲突厥语的已经比讲波斯语的多得多了。用这种语言可能比用波斯语更容易与俄罗斯当局沟通，因为俄罗斯人随身带着鞑靼和吉尔吉斯[1]翻译。由于这个原因，失宠的前撒马尔罕卡迪卡延凯末尔·阿德金在 1871 年不是用自己的本族语言波斯语而是用突厥语写了一封证明自己无罪的陈述书，以便俄罗斯人能看懂信的内容。大约在这一时期，当认为有必要用当地的语言出版《突厥斯坦公报》副刊的时候，首次把塔吉克语与“察合台语”和吉尔吉斯语[2]一起列入当地语言之中。后来用《突厥语（萨尔特语）和吉尔吉斯方言副刊》取代了它。从 1871 年开始以这两种语言出版的副刊每月 4 期——其中萨尔特语的副刊每月 2 期，吉尔吉斯语[3]的副刊每月 2 期。从 1883 年开始只出版“萨尔特语”的一份小报，并以此取代了《突厥语

[1]哈萨克人。——Б. 加富罗夫
[2]哈萨克语。——Б. 加富罗夫
[3]哈萨克语。——Б. 加富罗夫

（萨尔特语）和吉尔吉斯方言副刊》。在 1920 年通过突厥斯坦共和国宪法时，只承认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为“土著民族”，边区的古老居民塔吉克人被忘记了。1924年进行的民族划分将在多大469 程度上促进塔吉克民族的复兴将由以后来证明。[1]

---

〔1〕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民族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塔吉克民族完全可以与苏联的其他民族一样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在这里发表的 B. B. 巴托尔德的历史概论完稿后，塔吉克人很快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1924 年 10 月 14 日在中亚进行民族国家划分的时候建立了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后来又于 1929 年 12 月 5 日建立了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B. 罗莫金

塔吉克人

——选自《伊斯兰教百科全书》

塔吉克,更早期的形式为塔济克 тазик 或塔日克 тажик(在马赫穆德·喀什噶尔那里写的是捷日克,Ⅰ,324:тежик),是一个民族的名称,最早用于表示"阿拉伯人"(后来只有塔济 тази 保持了这种意义),晚些时候用于表示与"突厥人"不同的"伊朗人"。该词来源于阿拉伯塔伊部落的名称。在阿拉伯的部落中塔伊部落是最靠近伊朗人的邻居,所以这个部落的名称被用于表示整个阿拉伯民族。塔伊"与萨拉肯在公元2世纪初被一位埃德萨人说成是全体贝都因人的代表"(Cureton,Spicilegium Syriacum, p. 16 sq.; Noldeke, ZDMG, Bd ⅩLⅨ, S. 713)。巴列维语中的塔奇克 тачик、亚美尼亚语中的塔奇克(比较 Horn, Neupersische Schriftsprache, S. 187)以及汉语中的大食都相当于表示"阿拉伯人"的塔吉克一词。可能中亚的伊朗居民这样称呼穆斯林征服者。由于根据那个时代的观点,任何一个伊朗人只要皈依了伊斯兰教便成为阿拉伯人(比较塔巴里,Ⅱ,1508,$_{13}$),所以突厥人用这个词表示"伊斯兰教徒,来自于穆斯林文明传播地区的男人"之意。又由于绝大多数为突厥人所知道的穆斯林是伊朗人,所以捷吉克 теджик 一词作为一个民族名称在突厥语中就有了"伊朗人"之意。马赫穆德·喀什噶尔(Ⅰ,324)把捷日克 тежик 一词解释为"波斯人"(阿尔-法里锡 ал-фариси)。在同样属于这一时代的《福乐智慧》(拉德洛夫版,尤其是 8,$_{1}$)中,"捷吉克 теджик"作为波斯人是与阿拉伯人有区别的(比较拉德洛夫《突厥方言词典试编》,Ⅲ,1096)。伊朗人把自己与突厥统治者对立起来,同时也称自己为塔济克。例如,贝哈基,莫尔列伊版,第746页上面。尤其经常强调的是突厥人与塔吉克人之间的对立性。比如说,有人断言:无论突厥人与塔吉克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还是

姻亲关系都总是以恶劣的后果而告终,塔吉克人永远也指望不上突厥人(扎希尔·阿德金·马拉希,第248页、253页以下)。关于塔吉克一词与萨尔特一词的关系参见巴托尔德《萨尔特人》(本版,第2卷,第2

470 册。——Б.加富罗夫)。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伊朗人作为商业民族的意义。萨尔特一词最初在突厥人那里出现的时候是一个表示"商人"的普通名词,后来演变成一个民族即伊朗人的名称,伊朗人被认为是一个主要从事贸易活动的民族。相反,塔吉克(捷济克 тезик)这一民族的名称更晚些时候至少在伏尔加河鞑靼人那里是作为一个表示"商人"的普通名词被使用的。根据俄罗斯人1552年征服喀山史的最早史料之一(《库尔布斯基大公报告》)的记载,喀山城堡的四周是"捷济克人的沟壕"("捷济克人的"或"捷什克人的"沟壕),并且捷济克一词被解释为"商人"(比较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第8卷,第110页;扎林斯基《喀山16世纪古代史概论》,第8页)。

现在有时把与波斯人本身不同的东部地区的伊朗人称作塔吉克人。阿斯特拉巴德(参见《伊斯兰教百科全书》,Ⅰ)和亚兹德之间的界限是塔吉克人移居的西部边界。在突厥斯坦,尤其是在乌兹别克人统治时代的突厥斯坦,塔吉克人逐渐被从平原排挤到山区。俄罗斯人把突厥斯坦所有的伊朗民族——塔吉克人本身即讲塔吉克语的居民(参见《伊斯兰教百科全书》,Ⅳ,648)以及在语言方面占有特殊地位的喷赤河沿岸的居民(参见巴托尔德《阿姆河》[本版,第3卷。——Б.加富罗夫])和泽拉夫善河上游的居民都称为"塔吉克人"。据此在1924年建立了以杜尚别(在卡菲尔尼甘河上游)为首都的塔吉克斯坦自治共和国。根据该年的人口普查,塔吉克人的数量为871532人。居民本身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使用塔吉克一词。某些山区的居民例如像舒格南和罗珊地区的居民,自称塔吉克人,但把达尔瓦兹讲塔吉克语的邻居称作是"讲波斯语的人"(парси гуй)。与此不同,泽拉夫善河上游地区讲一种波斯方言的居民把自己称作塔吉克人,而把雅格诺布谷地讲独特方言的人称为"加利恰",这种居民可能把自己的雅格诺布语与塔吉克语区别开来。

以前经常遇到的（还参见查斯丁《伊朗人种》，第402页）关于塔吉克民族的名称起源于塔赤头饰的论点应当无条件地被推翻，无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还是从历史原因方面看这一论点都是错误的。 471

参考文献：卡尼考夫《人种史报告》；希绍夫《塔吉克人 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巴托尔德《塔吉克人历史概论》；M. 安德烈耶夫《论塔吉克人的民族特点》。

也参见加富罗夫《塔吉克民族简史》；《塔吉克民族史》；《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民族》，Ⅰ，第528－628页。——B. 罗莫金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项目执行／施援平
责任编辑／马继萌　施援平
封面题字／冯天亮
装帧设计／张友乾


ISBN 978-7-311-04054-3

定价：200.00元（上、下册

[General Information]
□□=□□□□ □□□□□□□2□□1□□1□□ □□
□□=□□□□□□□·□□□□□□□·□□□□□□□□
□□□B.A.□□□□□□□□□□Б.Я.□□□□□□□□
□□□□□Б.Г.□□□□□□□□□□□□□□□□□□
□□□=□□□□□□□□
□□=519
SS□=13483836
□□□□=2013.04
□□□=□□□□□□□
ISBN□=7-311-04054-3
□□□□□□=K36
□□□□=200.00□□□□□□
□□□=□□-□□-□□
□□□□□□=□□□□□□□·□□□□□□□·□□□□
□□□□□□□B.A.□□□□□□□□□□Б.Я.□□□□
□□□□□□□□□Б.Г.□□□□□□□□□□□□□□□
□□□.□□□□ □□□□□□ □2□ □1□ □1□□
□.□□□□□□□□□□□,2013.04.